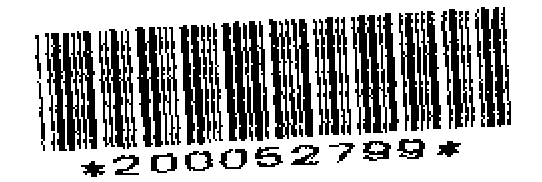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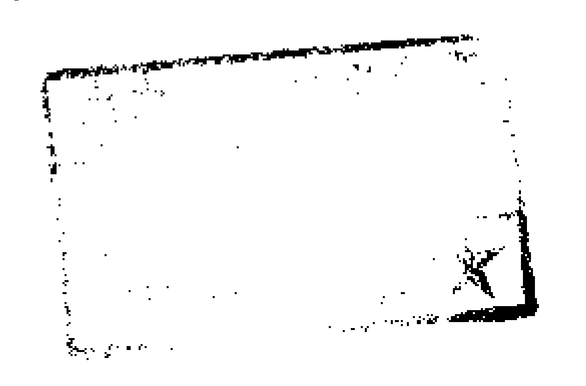

欧阳东 著
东欧大裂变纪实

东欧大裂变纪实

欧阳东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欧大裂变纪实/欧阳东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ISBN 7-5017-2951-4
Ⅰ.东… Ⅱ.欧… Ⅲ.①国际政治-东欧②政治事件-东欧
Ⅳ.D75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2788 号

责任编辑：李晓岚

东欧大裂变纪实
欧阳东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北街 3 号·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华燕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5.875 印张 404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017-2951-4/F·2093

定价：12.50 元

前 言

也许，本书提到的一个个历史事件，人们或多或少有所知晓。但是，人们并不一定完全了解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柏林墙——这座神秘的欧洲“长城”为何兴建？又为何拆除？纳吉的悲剧，难道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吗？寒风袭人的1989年冬季，统治罗马尼亚达数十年的齐奥塞斯库家族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天灰飞烟灭的？……这一切，无不带着几分神秘。人们需要了解，也渴望了解。我们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产生了撰写本书的想法，目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些事件的全貌。

作者根据国外最新发表的有关资料，或亲身经历，或外国友人的介绍而成就此书的。因此，本书首先是纪实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作者力求客观，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描写各个事件，将事件的本来面貌呈现给读者。

本书各章的作者如下：第一章：朱晓中、童小英；第二章：高原、平原；第三章：陈新、李丹林；第四章：熊飞云、熊利娥；第五章：石雀、杉水；第六章：高德平、王屏；第七章：罗柯、凯瑟；第八章：庞激扬、罗扬；第九章：阿德娟、宫献。

欧阳东

1993．4．17

目　录

第一章

小拇指的力量
——铁托勇抗斯大林

我伸一伸小拇指，铁托就要完蛋。

——斯大林

引　子

公元1948年。1月。

这年的冬日异常暖和，阳光明媚的日子一个接一个。

如同这温暖的冬日，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表面看上去是稳定的。人们正在兴高彩烈地谈论5年计划中南斯拉夫东部的第一个巨型企业、地处贝尔格莱德附近泽列滋尼克的机械厂开始投入生产的情况。西方政府虽未对共产党管理的南斯拉夫表示出特殊的好感，但在那时也未采取更多的敌对行动。

然而，正是在这种貌似平静的气氛中，巨大的危险正向南斯拉夫袭来。用南斯拉夫人自己的话来说，当南斯拉夫正在为恢复国家经济，并为完成5年计划而以超人的努力日以继夜地奋战时，当数以百计的经济建设项目的订货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

利加工生产的时候，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向南斯拉夫发动了突然袭击。

1948年6月28日，情报局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该决议向全世界宣告，南共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国际主义，已处于“和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地位……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

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的消息对1500万南斯拉夫人来讲不啻晴天霹雳。当时正在散步的铁托在听到情报局决议后，盛怒之下，拔出手枪，怒射正在芦苇丛中呱呱鼓噪的青蛙。

乍看起来，这种攻击是如此突然，如此荒谬。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当时的南斯拉夫是苏联最真挚的朋友和忠诚的盟国。但是，大量事实表明，这种冲突既不荒谬，也不是情报局同南斯拉夫的矛盾，而是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而且其酝酿已颇有时日。

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南矛盾就初露端倪。双方因苏联支持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而多有龃龉。此后，双方又在南斯拉夫新政府问题上、北部边界问题上，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不断出现矛盾。

1948年以后，这种冲突逐渐公开化了。

一、雪压冬云白絮飞

1. 巴尔干联邦——冲突的起源

1948年1月，正当南斯拉夫为黄金问题与美国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半路里又杀出个斯大林来。他给铁托发来一封电报，要求南斯拉夫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德热拉斯，立即启程赴莫斯科讨

论当前的各项问题。

贝尔格莱德没人为这封电报感到吃惊。因为双方需要讨论的问题的确很多。

德热拉斯一行启程了。他们乘火车经罗马尼亚赴莫斯科。陪同访问的还有一个军事代表团。

代表团在罗马尼亚的雅西换乘苏联政府备用的特等客车。苏联的宽轨铁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火车开得很慢，每小时不到30英里。结果，他们从贝尔格莱德到莫斯科足足走了5天。

到莫斯科后，代表团被送到位于市中心的莫斯科饭店。

德热拉斯一行到莫斯科后不到3小时，还没来得及活动一下筋骨，德热拉斯就接到斯大林的电话邀请说，如果他不感到旅途劳累的话，请他去克里姆林宫会见。

德热拉斯立即前往。在大厅里，他受到斯大林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欢迎。他们寒暄了几句就转入了正题。

斯大林谈起了阿尔巴尼亚问题。他说，“苏联政府对阿尔巴尼亚没有任何要求。南斯拉夫任何时候都可以吞并阿尔巴尼亚，只要南斯拉夫愿意。”讲到“吞并”二字时，斯大林打了个手势，摇晃着他的右手指头。

德热拉斯对斯大林的谈话颇感突然和惊讶。他紧接着澄清道：“斯大林同志，我们两国（阿、南）除了友好同盟的关系外，不存在阿尔巴尼亚被吞并问题。”

这时莫洛托夫在一旁说：“唷，那是一回事。”

斯大林接着说，他认为南阿两国关系是正常的，应按这个意思给铁托拍一份电报。斯大林的盘算是，这样可以诱使德热拉斯按她讲的有关阿尔巴尼亚的言论草拟电报，以此为把柄，说明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有所谓帝国主义意图。

第二天，德热拉斯将电文草稿交给了斯大林，但内容未按斯大林的吩咐写。期大林颇为不快，电报当然也就没有拍往贝尔格莱德。

在这次会谈中，德热拉斯还向斯大林介绍了同行的军事代表团，并希望苏联方面能给予帮助。斯大林表现得很慷慨："小意思，我们什么东西都给你的，谁让南斯拉夫是我们的友好同盟军呢？"

接着，他当着德热拉斯的面，给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打了个电话，叮嘱他立刻接见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并满足其一切要求。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便邀德热拉斯赴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除斯大林外，坐陪的有莫洛托夫、日丹洛夫、沃兹涅先斯基和贝利亚。

第二天下午 5 点左右，布尔加宁元帅在国防部大楼接见了南军事代表团。俄方在场的还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安东诺夫等人。

德热拉斯代表南斯拉夫方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布尔加宁听后微微一笑说："小意思，你们将会得到一切。"斯大林式的慷慨。

布尔加宁随即吩咐华西列夫斯基成立一个专家联合委员会，讨论南斯拉夫人的要求。他命令星期天加班工作，星期一提出报告。

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成员满心欢喜，满以为全部工作可在三四天内就完。

但是 7 天很快就过去了，苏联方面什么也消息没有。南斯拉夫人似乎被遗忘了。代表团成员伏克曼诺维奇·泰波找布尔加宁说项，布尔加宁故作神秘地回答说："情况复杂了。"

南军事代表团只好接着等下去。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大剧院，而白天则参观博物馆。他们甚至有时间访问了列宁格勒。

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毫无结果。南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们开始纳闷，斯大林在玩儿什么花招？

原来，苏联人此刻正在为巴尔干联邦问题大动肝火呢。

在德热拉斯一行访问莫斯科时，南国民议会批准了以南斯拉夫为一方，和分别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及匈牙利为另一方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此之后，保共中央书记季米特洛夫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在访问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巴尔干联邦问题。

季米特洛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称："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

来说还不成熟……当这个问题成熟了的时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将和希腊一起解决它。”

《真理报》虽然发表了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但斯大林对此的反应是愤怒的。“你们竟想私下里建立一个不包括苏联的巴尔干联邦！”斯大林怒不可遏，决定在《真理报》上公开抨击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

1948 年 1 月 29 日《真理报》的评论说，“《真理报》编辑部认为，这些国家需要的不是靠不住的、硬性制造出来的联邦、邦联或关税同盟，……他们需要的是动员和组织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巩固和捍卫他们的独立和主权。”

紧接着，莫斯科立即致电索菲亚和贝尔格莱德，让他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商讨此事。保加利亚派出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代表团。苏联人虽然希望铁托能来，但南共中央最后指派卡德尔、巴卡里奇和德热拉斯（还在莫斯科）去莫斯科。

正当卡德尔等人准备启程时，阿尔巴尼亚政府请求南斯拉夫派两个师的兵力去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预防希腊人的入侵。南斯拉夫在研究了阿政府的请求后，原则上同意出兵，但具体时间未定。在这之前，南斯拉夫的一个空军联队已应邀进驻阿尔巴尼亚。

莫斯科对南、阿两国政府的这些举动深为不满。莫洛托夫就此事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称苏联政府不满意阿、南两国政府的这些安排。这位外长甚至威胁说，如果阿、南两国政府不废除他们之间的协议，苏方将公开提出警告。

2 月 8 日，卡德尔等人到了莫斯科。两天后，他们才被通知去克里姆林宫开会。

晚上 9 时整，他们来到了斯大林那宽敞的办公室里。约莫过了十几分钟，保加利亚代表团也到了。

9 点 50 分开始开会。斯大林坐在桌首，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

林科夫、苏斯洛夫和佐林坐在桌子右边，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等人坐在左边。

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称，苏联方面同保、南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岐，这些分歧“无论从党的角度还是政府的角度来说，都是不能允许的。”

莫洛托夫发言时，斯大林满面怒容，一直心不在焉地翻着他的笔记本。

莫洛托夫一股劲儿地列举南保两国的错误。一是南保两国的同盟条约，二是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声明，三是南阿关系。

莫洛托夫说，苏联已告诫过南保两国政府，在和约期限未满之前，不得签定这项同盟协定。但是，两国政府还是瞒着苏联干了这件事。苏联后来只是从报纸上才得知这件事的。

在谈到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时，斯大林插话说：“我们见到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极端放纵自己，他讲话一点也不考虑。外国都认为他和铁托的一切言论是通知我们后才说的。”

卡德尔接着斯大林的话解释说：他们曾把南保条约的草案送交莫斯科看过。当时苏联政府只回复了一句话：条约的期限应为20年，不得是“永久的”。而南保草案中也是这样写的。

斯大林满脸怒容地瞅着莫洛托夫，此刻莫洛托夫正在那里对卡德尔的发言点头称是。

卡德尔接着说，除了期限问题外，他看不出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有什么分歧。

突然，斯大林打断卡德尔的话说：

“这里存在着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你说，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怎样？”

卡德尔作了一番回顾。斯大林又打断了卡德尔的发言。

“这里有一个事实，你们派两个师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商

量。”

卡德尔回答说，派两个师去阿尔巴尼亚是没有同苏联政府商量。但南阿尚未签订具体的 协议。南斯拉夫政府还没有明确决定是不是要派军队去帮助阿尔巴尼亚。南政府的这一行动不会对和平构成威胁，因为它唯一的目的是保护阿尔巴尼亚人。

斯大林又愤怒地打断了卡德尔的话，他说："这是不真实的，在任何问题上，你们都没有同我们商量。"

由于斯大林的插话，卡德尔显然讲不下去了。这已不是什么三方讨论会了，而是斯大林发泄心中不满和发布命令的场合了。

会谈到半夜才结束。在整个会谈中，斯大林语气尖刻，看上去是在批评季米特洛夫，而实际上是在批评南斯拉夫。

斯大林这次一反常态，既没有请保加利亚人，也没有请南斯拉夫人到他的别墅去吃夜饭。

2月10日，会谈接着进行。斯大林一上来就批评南斯拉夫人说，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养成同苏联磋商的习惯。斯大林断然地说，今后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最后，他突然对南斯拉夫人说，你们应代表政府同苏联签订一项关于相互就外交政策进行磋商的协定。

第二天午夜时分，莫洛托夫突然打电话给卡德尔，让他立刻到苏联外交部来一趟。

卡德尔匆匆走出旅馆，坐上莫洛托夫派来接他的车，直奔苏联外交部。

卡德尔来到莫洛托夫办公室。莫洛托夫请他坐在宽大的皮沙发里，接着递给卡德尔两页写满字的纸。原来苏方已把"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议"写好了。

卡德尔后来栩栩如生的回忆说：

"我看着蓝夹子里的这两张，耳听着莫洛托夫命令'签字!'的粗暴声音，真使我怒不可遏。虽然南斯拉夫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

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协议规定，为什么还要签订这么一份协定呢？这种屈辱使我感到困惑与厌恶。它只能使我想起大国对小国的专横。我当时努力思索，到底签不签，最后我还是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不想让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由于很紧张，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的地方。结果，协定的原文必须重写，整个签字程序推迟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之后，我和我的同志们马上离开了莫斯科。

2. “我感到好像遭到雷击

2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议标志着斯大林要对南斯拉夫公开施压。他开动了东欧各国的机器，企图粉碎南斯拉夫任何潜在的反抗。

首先采取行动的是罗马尼亚。不知是克里姆林宫下的命令，还是罗马尼亚人自做主张，铁托的画像从罗马尼亚各地的宣传橱窗中消失了。苏联的报刊则大力渲染这件事，以使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件事。

1948年2月12日，法国的《费加罗报》以“布加勒斯特的橱窗取消了铁托元帅的像片”为题刊登了该报记者发自维也纳的一则消息：

“据来自布加勒斯特的报道说，罗马尼亚共产党已下令从一切橱窗中取消铁托元帅的画像。这位南斯拉夫政府首脑的画像以往是同斯大林元帅、季米特洛夫和格罗查的画像陈列在一起的。布加勒斯特正流行着各种各样关于铁托元帅的谣言，他的地位似乎没有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巩固了。他似乎失去了莫斯科的信任。这些谣言目前尚未得到证实，但值得记载。”

在地拉那庆祝红军节（2月17日）的宴会上，苏联驻阿代办加加里诺夫在回答南斯拉夫公使杰尔贾为斯大林和铁托祝酒的建议时

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集团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南斯拉夫公使当即对此进行反驳，并在宴会后立即将此事通知了国内。

斯大林对撤掉铁托画像和地拉那祝酒事件似乎并不感到满足。他要使南斯拉夫人意识到，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这就是经济制裁。

在战后初期的年代里，南斯拉夫的对外贸易大部分依赖东欧国家，而且主要依赖苏联。1947 年，它出口的 56%、进口的 53%是同东欧国家进行的。南斯拉夫特别依靠苏联某些主要原料，如油和棉花。

但此时，斯大林准备拧紧经济这颗螺丝了。1947 年底，南斯拉夫的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准备同苏联讨论续签贸易协定，但代表团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竟一无所获。1948 年 2 月底，苏联外贸部部长助理克鲁季科夫通知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外贸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说，苏方不愿签订新的议定书。南斯拉夫不能指望扩大金属、石油和棉花的交换。4 天后，苏方又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他宣布了此事。

苏方的这种态度使南方代表既惊讶又生气。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得空手而回。

由此，经济上的压力变成了经济封锁。苏联政府以这一谈判把我们整整蒙骗了 3 个月，而我们什么措施也未采取，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可以从苏联得到这些原料。我们这里出现了可怕的危机，庄稼行将收割，石油的储备只够十来天。棉花的储备也差不多枯竭。南斯拉夫人如是说。

一场大赌博就此开始了。

3 月 1 日，铁托在鲁蒙斯卡街的家里举行了南共中央全体会议，主要讨论目前的南苏关系问题。

铁托发言说，近来苏南关系已进入了死胡同。俄国人推迟贸易协定，已是对我国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必须忍受。而且，我国的独立更为重要。

其他委员在发言中都支持铁托的主张，同意对苏联采取不妥协立场，只有财政部长斯坦雷·茹约维奇—茨尔尼一人默然无语，只顾做笔记。

铁托在会议上强调，这场争论是南斯拉夫独立的问题。

很快，莫斯科得知了会议内容，斯大林随即采取了新的措施。

3月18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南政府，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已下令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敌对的待遇”。

第二天，苏驻南临时代办阿米尼亚诺夫要求铁托接见，并向铁托宣读了一份苏联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文职专家的电报。这些决定被迅速执行了。苏联专家纷纷报告他们已接到了撤离的命令。

就在接到苏联临时代办送来电报的当天，铁托就此事致函莫洛托夫。他在信中坦率地告诉莫洛托夫，他不认为撤离的真实理由是苏联军事教练人员在南受到“不良待遇”。他请苏联政府坦率地告诉他事情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铁托的信发向了莫斯科，斯大林将如何答复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世界舆论对苏南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所闻。而此时，大部分西方报纸却在为意大利的选举掀起了反对南斯拉夫的新浪潮报道说，南斯拉夫对意大利有作战的意图：南斯拉夫在南意边界城市设有射程约300—900英里的V1和V2火箭发射台；意大利的城市随时都可能受到轰炸云云。

此刻，铁托已顾不上理会西方国家的这些宣传叫嚣，他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斯大林对他3月19日信件的答复。

3月27日，南外交部官员报告铁托，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和代办阿米亚尼诺夫要求铁托接见他们，说斯大林有封信要交给他。铁托答应立刻见。

斯大林选择这个日子把他的第一封信交给南斯拉夫人是有他的

考虑的。他认为南斯拉夫人迷信，认为南斯拉夫过分迷恋农村，过分固守农村的保守传统。因此，他为自己的第一封信选择了 3 月 27 日这个南斯拉夫历史上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一天发生了反对亲希特勒的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的暴动。他似乎也指望他在这天给发了铁托的信能使南斯拉夫人发动反对铁托的骚乱。

当时，铁托并不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而是在萨格勒布林木茂密的郊区什卡茨纳的别墅里。

1 小时后，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和代办阿米亚尼诺夫到了铁托的别墅。

他们走进铁托的书房时，铁托正坐在写字台旁等他们。拉夫连捷夫体格魁伟，一副没有表情的外交面孔。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那里面装着斯大林的信。

握过手后，苏联大使向铁托呈递了那封信。铁托和苏联代表都站着，因为铁托没有请他们坐下。

铁托站在写字台的背后，一只手撑在台子上，另一只手翻着信纸，迅速读着，这封信是用俄文打印的，共 8 页，信笺上附有紫色“机密”字样。

信的语调是极其粗鲁与命令式的，内容同语调相符。

铁托对这封信的感受如何呢？1952 年 6 月 15 日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上回忆此事时说：

“看过头几行，我感到好像自己中了雷击。拉夫连捷夫和阿米亚尼诺夫却在一旁冷眼瞅着我，端详着我的反应。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尽量克制住自己。

拉夫连捷夫他们一直盯着我。又向我迈了半步。当我匆匆把几页都看完了，拉夫连捷夫就忍不住问：

‘我们什么时候得到答复？’

‘我们要研究一下这封信’我简单地说。

我挥了一下手，表示会见结束。会见总共只有 3、4 分钟。”

苏联人走后，铁托又把信读了一遍。

斯大林在信的开头猛然攻击南政府阻碍苏联文职专家从南政府以外的地方收集经济情报。他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代表才会受到同样的监视，这并不是肤浅的看法。"

在信的第二部分里，苏联企图将苏南关系中的冲突伪饰为思想上的争论。他们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表示不安，说南共的地位是半合法的，党没有贯彻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资本主义因素正在乡村中增长，而党的领导不加反对，党在人民阵线中消失了；党内没有民主气息……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信中还称吉拉斯、泰波、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人是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信上签名的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后来，当苏联政府发表这些信件时，信件上盖的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官印，而不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个人签名。这种改动是不愿让世界上的人们想到，南斯拉夫人竟敢反抗斯大林本人。

读完第二遍信后，铁托立即打电话给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等人，让他们马上来。打完电话后，铁托又读了一遍信，然后，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在书房里踱来踱去，琢磨信的内容。接着他又重新坐在写字台边亲手起草给苏共信函的提纲。他用33张印有"南斯拉夫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头衔和原信纸，用很大的字体写成了他的复信稿，2小时后提纲拟就了。

这时，铁托通知的几位领导人已经到了。他们看了苏联方面的来信，表示一致支持铁托，并说苏联对南共的指责是凭空捏造，应予以否认。

铁托此时非常激动。他甚至说，如果苏联认为他是南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阻碍，他愿意退休。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

里奇一致拒绝他这样做。

5个人平静下来之后，都坐下来商讨对策。最后，南共中央书记处的这5名成员一致决定，拒绝苏联的指责和一切要求，并下决心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4月12日，星期一。

清晨，南共中央委员们纷纷抵达贝尔格莱德郊区德迪涅的亚历山大国王皇宫图书馆，出席全体会议。这座图书馆是30年代塞尔维亚式建筑，结构成横宽状，样子很俗气。它不是真正的图书馆，而只供节日活动或政府接待宾客之用。

当铁托进入图书馆坐下时，时钟正敲10点。大门关起来了。铁托首先致简短的开幕词。

"我意识到这次会议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生活教会了我，在危机的时候最危险的莫过于站不稳立场，摇晃不定。"

接着，他叙述了冲突的来龙去脉，宣读了苏联的来信和他的复函，最后说：

"同志们，记住，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犯了错误，不是我们在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我们被迫陷于这种争论。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在利用思想意识的问题为对我们，对我国施加压力而辩护。同志们，这便是问题所在。"

铁托讲演完毕后，全体中央委员依会议桌的次序表示了态度。绝大多数中委都同意铁托的立场。只有财政部长茹约维奇例外。

在他发言前，17名中委都是坐着发言的。但此刻他站起来，把椅子朝后一推，高声说道：

"同志们，我请你们以革命的觉悟来公断。我反对给苏联党写那封信。不要忘记，这涉及许多重大问题。我反对对苏联和苏联党采取这种态度。"

古老的图书馆里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铁托在茹约维奇发

言时站起来，在图书馆里踱来踱去，他默默自语道，“这是背叛人民，背叛国家，背叛党。”

铁托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但茹约维奇没有听见，还是自顾自地讲着：

“苏联党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也足以警告我们在决定采取行动前，应重新检查一切。我们必须探索斯大林每一个字的全部意义。如果苏联党和斯大林不同意的话，我们怎么能使自己和人民相信，我们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呢？我相信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他的话极大地伤害了其他中委，他们几乎全都暴跳起来，同他争吵。铁托也在问：

“茨尔尼，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的政府在豢养特务吗？我们党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了吗？”

茹约维奇开始不安起来。接着发言的是南驻苏大使波波维奇。他开口便说，“茹约维奇在我们面前讲的是不真实的，不是共产党人应说的话。联合股份公司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斯大林也承认这一点。”

此后，其他中委也都表了态，会议快结束时皮雅杰说：“同志们，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的来信，水平真低。”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会上，他的话居然引起了一片笑声。

会议在2点时休会，午饭后立即复会。此后的讨论更加激烈。铁托再次发言，他说：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并入苏联，而是每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便是我们同苏联党的分歧。……接受苏联党的来信的观点是大错特错。他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们的信是一个大错误。接受这封信是卑鄙的，是承认虚伪的东西。我们有权平等地与苏联说话。他们对我国发生的一切简直是愚昧无知。你茨尔尼，居然宣称你有权去爱苏联胜过爱你的国家……”

铁托讲这些话时，很多中委都是眼泪汪汪的。在接下去的讨论

中，不少中委以批评了茹约维奇的错误观点，并质问他是否将3月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情况透露后了苏联驻南大使。因为德热拉斯曾向铁托报告说，3月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后几天的一个中午，他乘车经过苏联大使馆门口时，意外地发现茹约维奇的车停在大使馆门口。

茹约维奇面色惊慌，但他极力否认，并辩解说，“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我一个字也没向拉夫连捷夫吐露。但是，同志们，请问，南斯拉夫能捍卫自己吗?”

卡德尔回答了他的疑问。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初步决定由3名中央委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茹约维奇和赫布兰案件。会议最后通过了致苏联党的复函。

复函建议苏联派一个代表团来南斯拉夫，以便核实他们对南共的诬告。铁托和南共其他领导人希冀以这种方式来调解和终止双方的冲突。

复函在结束语中称，“如果你们问，我们对你们有什么不满，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首先认为苏联情报机关在我国雇佣我国公民从事情报活动是不适当的……”

复函由铁托和卡德尔代表南共中央委员会署名，由南驻苏大使波波维奇送至莫斯科。

中央委员会一结束，波波维奇就立即启程去莫斯科。他在苏联外交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内受到接见。一位苏联秘书也在场，他做了谈话记录。

据波波维奇后来的描述，莫洛托夫当时很激动。波波维奇在递交铁托的信后，按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当场向莫洛托夫解释了南共的立场。他大约讲了45分钟，莫洛托夫几乎没有听他的讲话，而一直咬着嘴唇向窗外眺望。当波波维奇说完时，他问道：“完啦?”

“完了，有什么问题没有?”波波维奇说。

"我什么问题也没有。"莫洛托夫应口道。

"你没有问题，我感到意外。"波波维奇又说。

接见就此结束，最后两人没有握手道别。

3. "只要我们不丧失勇气，我们必定会赢得胜利……"

当斯大林看到南共中央的复函后，意识到他已经输了第一个回合。南共中央委员会已证实了它本身的团结。南斯拉夫 6 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也一致拥护铁托。只有茹约维奇一个人宣布他支持斯大林，但他是孤立的。

斯大林是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开动了情报局的机器。

情报局的全称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 年 10 月成立，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最初的宗旨是加强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但随着苏南冲突的展开，它成了斯大林反对南斯拉夫的工具。

这时，斯大林也把他 3 月 27 日的信抄送给了情报局各个成员国，他要求各党只按苏联的资料，就南苏冲突表态。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各党把答复直接交给他。

4 月 16—19 日，除保加利亚外，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均表示支持斯大林。在这些日子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十分激动，党内就这些信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5 月 4 日，苏共中央又给南共中央来了一封信，语调更加专横恶毒。但最使南斯拉夫人感到不能容忍的是，这封信攻击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的作用。

苏共中央的信称，1944 年 5 月，德国人袭击了铁托在德瓦尔的最高指挥部后，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困境之中（事实上正处于高潮），是苏联红军挽救了南人民，驱走了德国占领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

由于这封信攻击了南斯拉夫人最引以为荣的地方，因此，这封信甚至使那些原来怀疑铁托是否正确的南共党员也极感愤怒，转而

支持铁托。

苏共那封长达25页的信明确拒绝了派一个代表团到南实地考察的建议，反而建议将此问题提交给共产党情报局来讨论。

5月9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苏共的信件，并草拟了对苏共的答复，答复很短。

南共称，她不怕就原则问题进行争论，但要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南共目前不能同意在情报局讨论这项问题。因为其他9个党在南共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已收到苏共3月27日信的抄件，而且已作出了表示立场的决议。现在，这已不是两党间的事务了。今天，南共及南斯拉夫都已在某些国家受到了污辱。所有这一切后果，对南斯拉夫来说是极其沉痛的。

5月9日的会议还听取了茹约维奇和赫布兰案件委员会的报告。最后中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及党组织，并将以叛国罪对他们进行起诉。几天后，公众检查官查出一些危害国家利益的分子，并逮捕了这些人。

莫斯科就此向南共发出一封极具挑衅性的电报。严辞恫吓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莫斯科在煞费苦心筹划用飞机将茹约维奇劫持至苏联。但是已经太晚了，茹约维奇已被捕入狱。

到这里，斯大林的第二个回合又输了。接着，苏联人加紧策划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准备在会议上公开驱逐南斯拉夫。

5月19日，苏共中央机关的一位名叫莫塞托夫的青年人（实际上是内务部中校）拿了一封由苏斯洛夫书记签名的信件，来到贝尔格莱德，要求亲自见到铁托，并转交这封信。

铁托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莫塞托夫。本来，铁托书房里挂有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事情真碰巧，这一天的早晨，钉在斯大林画像上的钉子脱落了。像掉了下来，一时又没挂上，此刻正依墙而立。这立即吸引了莫塞托夫敏锐的目光，他瞅着斯大林画像，也许在想，铁托已下令在南斯拉夫全部撤掉斯大林画像。

实际上，南共并未下达过撤掉斯大林画像的命令。只是随着苏南冲突的加剧，人们自发地摘掉了斯大林的画像。这个过程差不多历时1年。到1949年底，人们在南斯拉夫再也看不到一张斯大林画像了。这一年恰为斯大林70岁诞辰，东欧名国为了祝贺他的寿辰，将整列车的礼品送到莫斯科。南斯拉夫有人开玩笑说，南斯拉夫应当送上一列车他的画像。这个玩笑像野火燎原一样，立刻传播开来。

这时，铁托接过信件，并告诉莫塞托夫，南共中央委员会将会作出答复。但铁托此刻肯定地告诉他，他们不会出席情报局的会议。

第二天，即5月20日，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不出席情报局会议。

南斯拉夫人熟悉斯大林邀请“持不同政见者”去“磋商”的手法。1937年，乌克兰党的政治局全体反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政策。莫洛托夫按斯大林的命令去基辅出席广政治局会议。他说乌克兰人错了，但任何一个委员都没有被说服。几天后，斯大林来了封信，叫乌克兰政治局全体委员去莫斯科进行磋商。他们接受邀请来到了莫斯科，刚走进克里姆林宫，就被内务部人员抓了起来，后来他们都被斯大林枪毙了。有这种前车之鉴，大家都很担心，如果铁托去参加会议，他是否能活着回来。

最后，南共将拒绝出席会议的决定通知了苏斯洛夫。

两天后，俄国人做出了反应。斯大林又给铁托去信。他在信中态度蛮横地说，“不管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否出席情报局会议，苏共坚持要在会议上讨论南共问题。”

5月25日是铁托的生日，南斯拉夫人为此举行了庆祝活动。除季米特洛夫以外，没有一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象以往那样致以礼节性的祝贺。

同一天，南共中央宣布在7月21日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便让全党就南苏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对斯大林是个意外打击，因为这意味着铁托已决定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南斯拉夫举行公民投

票。

6 月下旬，共产党情报局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会议。最初，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反对由苏联代表团日丹诺夫等人提出的反对南斯拉夫的书面决议。但日丹诺夫坚持说，“铁托是帝国主义间谍。”

这便是苏联代表团反对南斯拉夫的主要“论据”。在 6 月 28 日下午的表决中，苏联代表团几乎是采用威逼利诱手段强迫 6 个东欧国家签署苏联向南斯拉夫公民发出的呼吁书。呼吁书号召南公民迫使政府向苏联政府屈服。如果政府拒绝这样做，人民应当另立政府来取代它。

情报局的决议称，“南共中央使自己和南共处于兄弟的共产党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因而，也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

苏联人以为，这篇决议一发表，便会促使南斯拉夫分裂，促使人民起来反叛铁托政府。他们还确信铁托会用各种手段禁止南斯拉夫发表情报局的决议。

但是，6 月 29 日早上情报局的决议一公布，南共中央便举行了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由德热拉斯起草的对苏联攻击的答复，还决定在南斯拉夫的报纸上全文发表情报局的决议和南共的答复，让人民自己判断谁是谁非。

6 月 30 日，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全文刊登了情报局的决议。苏联驻南人员对此感到惊愕。后来听说，那天早晨，拉夫连捷夫和情报局头目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见面时仅谈了两句话。

“发表了吗?”拉夫连捷夫问。

“发表了。”尤金回答。

南斯拉夫国内绝大多数人不了解真情，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许多人甚至在街头伤心地哭了起来。

4. “谁都不相信我们会得救”

情报局决议发表后的一段日子里，南斯拉夫的处境万分艰难，说她是孤家寡人一点也不为过。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断绝了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而且因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否定南共。

全世界当时共有 80 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苏南冲突期间，没有一个党支持南共。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拜倒在斯大林的权威面前，接受了他对南共的指控。

铁托曾痛心地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难道有什么比不公正地宣布他为叛徒，全世界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否定我们的党，并宣布我们的国家为瘟疫地区这件事更难受的呢?”铁托说：“苏联对南共的指责是地地道道的干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经历过这种干涉。不过那时要容易得多，列宁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支持他，而我们的革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正濒于窒息。因为这种压力正在迫使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宣布反对我们。正如黑山的一位老游击队员讲的那样：‘我们遭到从亚得里亚海到日本海这四面八方的唾弃及攻击。’”

而在西方，误解和由来已久的威胁并存。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小国面临过这样的困境，对南斯拉夫来讲，那真是生死攸关的日子。

当铁托接到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时，他足足在房间里来回走了 3 个小时，推敲那份可耻的文件，他的胆囊炎也发作了。

在南斯拉夫境外，很少有人相信铁托能在这样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6 月 29 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写道：“……很难设想，现在治理着南斯拉夫的那些人还能继续掌权。”

同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社论称：南斯拉夫政府很可能已经易手。情报局公报已公开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抛弃自己的领导人、改组政府。很可能已经这样做了。据悉，苏联红军的托尔布欣元帅现在南斯拉夫，已在那里设法控制局势。据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行

动，这样的公报是不会发表的。或许明天我们会听到，公报中所提到的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已经被捕，他们已经因背叛人民的事业而受到审判。

同日，路透社消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一位记者说，华盛顿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不会决裂，铁托元帅要么满足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要么被撤换。

西方的评论是如此，东方也是这样想。斯大林认为双方的力量悬殊。苏联当时有2亿人，其他东欧国家有近8000万人，总共有2.8亿人。而南斯拉夫只有1600万人，而且武器装备差、经济上落后，而且处境孤立。尤金在离开贝尔格莱德时就说：

"你们连3个星期都坚持不了。你们不让步的话，西方帝国主义会把你们吞掉……"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是匈牙利的拉科西预言南斯拉夫要迅速垮台。他在7月2日说：

"小市民的民族主义在1941年使南斯拉夫陷入灾难，如果南共领导人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的话，将再次使南斯拉夫陷入灾难……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期地抗拒下去……"

罗马尼亚的安娜·波克也预言、南斯拉夫将迅速垮台。她断言，消灭"骄傲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对南共来讲是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西方的南斯拉夫流亡者们此时也表现出极为振奋的心情。

7月3日，克罗地亚前傀儡政府的主席帕维利奇的代表卡夫兰从奥地利非法潜入南斯拉夫，但立即被捕。他在被审时称，他来到南斯拉夫是因为他认为铁托垮台的时候已经到了。

但是，南斯拉夫人并未被吓倒，他们以自己瘦弱的身躯，勇敢地承担起外界向他们施加的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南斯拉夫人说得好，南斯拉夫是个不可思议的民族。他们从来不害怕最蛮横的暴君。当希特勒的权势处于高峰时，当欧洲在他的铁蹄下惨遭蹂躏时，南斯拉夫人撕毁了前政府同他的协定；1946年，

当美国的权势处于高峰时，当世界各国都惧怕1年前美国人在日本扔下的原子弹的时候，南斯拉夫军队却击落了入侵的美国飞机；现在，当斯大林的声望如日中天时，南斯拉夫人又拒绝了他的最后通牒……

南斯拉夫人就是这般勇敢、这般不可思议。情报局决议带来的巨大的痛苦稍稍逝去后，愤怒和自豪感的浪潮便接踵而至。全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

许多身处异国的南斯拉夫人的反应也很相似。

情报局的决议发表时，4000多名南斯拉夫运动员正在布拉格参加盛大的索科尔集会。6月29日他们到达布拉格时，当地的所有报纸都发表了决议。他们一下车，便在车站集合队伍，举着彩旗和南斯拉夫国旗，在布拉格街道上游行，高歌颂扬铁托。

这天下午，运动员在一个偌大的体育场上为28万观众进行表演，人们对南斯拉夫运动员的喝采特别热烈。当700位水上运动员表演结束排列起来拼出"铁托"字样时，整个运动场掌声雷动，人们不断地高呼"铁托！铁托!"。应大会组织者的请求，这批水上运动员在第二天又为25万观众表演了一场。这些观众对南斯拉夫运动员和铁托的热爱无以复加。

苏联大使馆在布拉格采取了强硬措施。他们认为，决议发表后的第二天，对铁托有这样的表示是不能容忍的。捷克警察已接到搜查南斯拉夫运动员住处的命令。后来，苏联的内务部人员亲自出马，对南斯拉夫运动员威逼利诱，试图说服某些人留在布拉格，同时叫他们声明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苏联人甚至许愿说，推翻铁托后，让他们在南任高官显职。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4000多运动员全都返回了南斯拉夫。

在苏联的南斯拉夫人经受了更大的压力。当时，除了有数千人在军事学院学习之外，仅在莫斯科的大学里便有461名南斯拉夫学生。苏联人告诉这些南斯拉夫学生说，铁托已经下令拆毁了南斯拉

夫境内的红军纪念碑，国内发生了叛乱，他们也向军官许愿说，推翻铁托以后，他们便可回国担任要职。在这461名学生中，除1人表示支持情报局的决议外，其他人均唾弃了这些骗人的诱饵，毅然回国。

有如此众多忠诚的人民热情和坚定的支持，南共中央也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定的信心。

7月21日，南共五大正式开幕。2344名代表聚集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托背契德公园古老的御林军营的大厅里。

大厅里摆放着马、恩、列、斯的半身像，中间悬挂着铁托的画像。代表大会的全部过程都通过广播电台进行广播。在大会召开的6天里，一切工作实际上均已停止，人人都坐在无线电旁收听大会的进展。

大会由铁托主持。宣布开会后，铁托就党的发展历程和最近与苏联人的冲突做了8小时的报告。报告之后举行讨论。由于要发言的人很多，大会不得不继续到深夜。发言的人相继谴责了对南共的攻击。无一人支持情报局的决议。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来临了，届时要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也是支持“决议”的人们反对铁托的最后的机会，因为投票是不计名的和秘密的。到上午10点，代表们结束了投票。

接着，选举委员会当着全体代表们的面打开了票箱。经计票，2344名代表中的2323人投了票。

午夜时分，选举委员会主席米尼奇走上讲台宣读了选举结果。他宣布，铁托共得2318票，也就是说，只有5人反对他。选举结果刚一公布，掌声就响彻了大厅，接着便是一片欢呼声，随即，欢呼声又被即席编出的一首歌曲声淹没了：

“铁托同志，我们向您发誓，

我们将不离开您的道路。”

……

选举委员会主席再次试着继续宣读选举结果，但他的话被代表们连续的歌声淹没了。他们直到唱完了《国际歌》才静了下来。又过了5分钟，主席才得以继续宣读选举结果。

次日凌晨1点多钟，选举结果才宣读完毕。接着铁托上台讲话。他显然十分激动，因为台下的欢呼声又骤然而起。

铁托先是感谢代表们的信任，然后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显示出来的团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我们正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的党保持团结，只要我们不丧失勇气，我们必定会赢得胜利。"。

南共五大不仅是南斯拉夫人民维护国家独立的一次公民投票，也是主张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一次公民投票。

事实上，情报局的决议公布后，南共并非如其党的领导人自诩的那样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南共当时共有正式党员468175人，候补党员51612人。他们当中共有5.5万人拥护情报局的决议。其中：

1.4万人是工人、农民、大学生和中学生；

21880人参加过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

1673人从1941年起参加反法西斯解放战争；

4183名现役军人；

2616名南共各级领导；

1722名内务部工作人员；

1189名采购机关工作人员。

据1987年出版的马尔科维奇的《荒岛真相》一书透露，在拥护情报局决议的2616名南共各级领导人中包括：2名政治局委员、8名中央委员、16名共和国级中央委员、50名州党委委员。773名区党委委员、6名联邦部长、14名联邦副部长、30名联邦议员、33名共和国议员、17名共和国部长、85名共和国副部长、293名州主席、72名区主席。

这些人被开除出党，关押在亚得里亚海的一个荒岛上。另有16312人被囚禁在集中营里。大约5000名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和其他国家里成了政治移民。

将持不同政见者关押在荒岛上的决定是铁托在1948年秋天做出的。1949年底，德热拉斯曾建议铁托，是否可取消这些集中营，把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送交法庭。但卡德尔第一个出来反对。他说，集中营绝对必要。另一位党的要员兰科维奇也称，用普通审判的方法对付“情报局分子”不那么容易。铁托听了这些辩论之后谨慎地说，对这一问题做出决定为时尚早。南斯拉夫小说家A·伊萨科维奇在198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两个瞬间》，完整地描述了1948年遭受镇压的人们的悲惨命运。

5. 两难境地

说来也奇怪，南领导一方面在镇压国内的“情报局分子”，继续顽强地反击苏共和情报局决议对南共的攻击，另一方面，又热情颂扬斯大林，并努力“用行动来驳斥情报局的指责”。

自苏南冲突后到1949年初的日子里，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人都并不责怪斯大林，认为他与此事无关，他是无辜的。的确，在苏共和南共交换几封信时，斯大林并未公开攻击过南共及南斯拉夫。倒是《真理报》、《消息报》和《布尔什维克》等报刊，以及个别的苏共领导人在大骂南共。1948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时，莫洛托夫再次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举行反铁托的起义，但斯大林此时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是金”的现象使南斯拉夫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并对他抱有厚望。有实例为证：

在南共“五大”前夕，贝尔格莱德第5区的1.5万人举行集会，支持代表大会的召开。会上，参加者通过了斯大林的致敬电，致敬电对斯大林期望颇高：

“我们深信，你将竭尽全力排除对我国、对我们党和我们中共委

员所提出的没有根据的指责”；

铁托在“五大”闭幕式上发言时也振臂高呼：“苏联万岁！斯大林万岁”；

1948年12月21日斯大林69岁生日那天，南斯拉夫《战斗报》发表题为“伟大的斯大林的69年”的长篇社论，并用3栏位置刊登了斯大林的相片；

1949年1月20日列宁逝世纪念日那天，南《战斗报》写道：南共“遵循列宁和斯大林学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另外，《斯大林选集》被纳入南各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之中。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南斯拉夫人一面抗击斯大林的进攻，一面又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呢？1952年6月20日，铁托在一个范围极小的场合道出了其中原委。

当时，许多普通老百性，甚至一些领导人也满脑子都是“俄国人民的黑山人民传统友谊”这类信条。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不是曲意逢迎，这是为了我们的群众，不得不十分谨慎。斯大林的威信是不用怀疑的。如果走得过快，我们就会脱离群众。而我们走得慢了，俄国人就会践踏我们。……我们不敢发脾气。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苏联以其行动使群众自己喊出来：‘打倒斯大林’”。

与此同时，为了向世人证明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南共强化了国内政策，因而出现了一个与其对外政策反方向的运动。

这是一个真正的似是而非的时期。1949年1月底，南共中央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农民生产方面基本任务的决议》。这是战后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斯大林主义气味最浓的一项措施。根据这一决议，南斯拉夫将完全按照苏联的做法加快集体化。这是南共强烈希望“用行动来驳斥情报局的指责”的一种表现。情报局对南共诸多指责中的一项就是，南共把农村让给了富农。

这项决定的直接后果十分严重。从单纯追求合作社数量，农民反抗的规模和方式，以及党和政府机构所施加的压力等方面来看，都与苏联斯大林集体化运动初期的情况不相上下。

在此以前，南斯拉夫集体农庄和农业劳动合作社的总数增长不快。1946年有454个，1947年779个，1948年也只有1318个。但二中全会后，1949年的数目猛增4倍，达到6626个，拥有200万合作社社员，230万公顷土地，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5。

农民入社的动机各种各样：有的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个人的或党员亲属的影响），或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无地或少地农民），也有的是希望借此机会逃避强迫交售制度和歧视性的税收制度，以及其他故意刁难惩处个体农户的经济和行政措施。

但是，大多数农民顽强地反对执行这一决议。他们或是屠宰牲畜、逃避强迫交售，或是干脆逃离家园，任土地荒芜；再加上1950年的特大旱灾，南斯拉夫农业经济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农业产量大幅下降，整个农业产量只及战前水平的73%，谷物产量则降至战前平均水平的41%。饥饿在威胁着城市。当时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外交官幸灾乐祸地对一位西方观察家说，旱灾证明"上帝是站在情报局一边的"。

农民顽强地反抗强迫集体化，更使党的核心集团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处境艰难。在革命时期，南全国人口的75%是农民，1948年，一半的党员是农民出身。对南共农业政策的反对，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受到饥饿的威胁而崩溃，而且这些政策也破坏了群众对政权仅有的一点支持，并在以农民为主的普通党员中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应。

但是，当时公认的斯大林教义却指明，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是把社会主义关系引入农村。面对农民几近疯狂的抵抗，南共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镇压农民的反抗。据南小说家A·伊萨科维奇的小说《两个瞬间》中披露，在镇压时期，每5个农民就有1个蹲过监狱。

进入 1949 年后，苏南冲突升级了。

从这年的初春开始，苏联集团恶毒的反南宣传开始加码。这可能与所传双方和解的尝试受挫有关，因为各方都发现妥协的代价太高。

4 月，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宣称，由于南斯拉夫已经“转入帝国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变为一支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共产党情报局决定将其总部从贝尔格莱德迁至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

9 月 28 日，当时还很年轻的苏联副处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向南斯拉夫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照会说“9 月 24 日在布达佩斯城结束的对国家和罪犯间谍拉伊克及其同伙的审讯表明，南斯拉夫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反苏的敌对和破坏性活动。南领导还主动按帝国主义布置的直接指令从事反苏的敌动活动。南斯拉夫已完全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宣布废除 1945 年 4 月 11 日的苏南友好合作条约。

9 月 30 日—10 月 4 日，波、匈、保、罗、捷五国也步苏联的后尘，相继宣布停止履行同南缔结的友好条约。正式开始对南实行外交封锁。

11 月初，共产党情报局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会上听取了苏共领导苏斯洛夫、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及罗马尼亚共产党书记乔治乌—德治的报告。会议号召南斯拉夫国内的共产党员们推翻铁托政权，并告诫其他国家领导人要严厉镇压本国的“铁托分子”。

会议结束时发布了一个决议。决议采用乔治乌—德治报告的标题“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为自己的名称。

情报局的这个第二个决议对叛逆的南斯拉夫人倾泻的恶毒咒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收罗和杜撰的许多措词和口号，在后来情报局的宣传中广为应用。这此词语有：“铁托法西斯集团”，“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战争贩子的帮凶”，

“残暴的흉世太保式的恐怖主义政权”,“由间谍和杀人犯组成的贝尔格莱德集团”等等，不一而足。

二、东欧的宗教裁判

为了强化对铁托的攻击和诬陷，斯大林在1948年夏天到1951年的这段时间，在东欧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擒妖逐魔”运动：以批判“铁托的民族主义偏向”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为名，对东欧国家党内的所谓“铁托分子”进行残酷的血腥清洗。

一时间，从波罗的海到爱奥尼亚海，整个东欧大陆上空乌云密布，每个角落都感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严寒。东欧国家的“铁托分子”纷纷被革职、被捕、入狱，甚至被处死。有人戏称，这段时间是苏联出口绞刑架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血腥的政治清洗涤荡着东欧大地。其来势之猛，犹如涛涛洪水，令人避之不及，其波及面之广，令人咋舌不已。下面的这组数字多少能描绘出这次政治地震的震级。

波兰自1940年9月至1949年12月，共进行了3次清洗，清洗几乎涉及到1/4党员。波党在1948年时有140万党员，但到1952年只剩110万人；

捷共在1948年底时有200万党员，到1954年时不足140万人；

匈牙利在1948年6月时有共产党员120万，而在1951年2月时只剩下不足85万；

保加利亚共产党在1948年12月时有党员50万，到1951年时已不足30万人；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1948年时有100万党员，到1955年时只剩下60万人。

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出清洗的程度，因为在整个大清洗期间仍在继续发展新党员。据估计，从1948年至1952年，东欧各国共产党内被清洗的总人数约为250万人，其中大约12.5万到25万人被监禁，被处决的人数只有天晓得。

政治清洗的受害者中间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有3位总书记（他们是：波兰的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一位总统（匈牙利的萨克西茨），4位副总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几十位部长和党政高级官员，以及100多位将军。

1.“大清洗的第一声雷电”

大清洗的第一声雷电首先击中了山城地拉那。

就在情报局一纸宣言将南斯拉夫革出教门的第二天，阿尔巴尼亚遂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以示效忠斯大林。

这一天，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鹦鹉学舌般地谴责南斯拉夫是国际共运的“叛徒”，斥铁托为“托洛茨基分子”。在全党“同仇敌忾”反铁托的热浪中，有一个人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而奋力拼斗。这个人便是科奇·佐治。

科奇·佐治是阿尔巴尼亚的政要，身兼数职。他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在政府里担任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反对铁托对他来讲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纳粹的共同目标使他同南斯拉夫游击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领受过铁托的恩泽，接受过铁托的保护。在情报局决议前的苏南冲突中，他同情南斯拉夫。

也正是由于他同南斯拉夫人的这层友好关系，所以他在风云突变的政坛上突然失去了方向。他此刻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唯恐大难临头。但政治家特有的嗅觉和变色龙的习惯，以及明哲保身的人生信条，使他立刻清醒了过来，他看准了方向，参加到对铁托进项

的队伍之中。但他的这番不知是否真心的番然悔悟为时晚矣。

一个多月以后，他成了阿尔巴尼亚的"铁托份子"，被解除了党和政府的职务。劳动党中央认为，科奇·佐治在1944年11月举行的二中全会前就成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理人，进行了反党幕后活动。

11月，科奇·佐治被逮捕。翌年6月，他被秘密审判并处决。

不幸的并非科奇·佐治一个人。他的最亲密的同事，政治局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潘·克里斯托，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诺·凯伦蒂，内务部副部长瓦·科列茨基，国家保安警察负责人瓦·米特罗约里和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诺塔等都被判处长期徒刑。

第二年，霍查和谢胡又进行了"巩固性"清洗。至此，铁托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就被民族主义派消灭了，这受到了苏联人的热情称赞。

2. 对铁托的异地审判

刚刚把科奇·佐治斩首，刽子手又把匈牙利外交部长拉斯洛·拉伊克推到了绞刑架前面。

30年代，拉伊克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领导匈牙利地下党，开展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内务部长。共产党情报局发表"6·28决议"时，他改任处长。

1949年6月15日，匈牙利工人党发表公报称：拉伊克及另一名党的领导人斯祖尼伊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及托洛茨基的代理人"，并宣布他们二人已被开除出党。

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拉伊克等人的起诉。一个星期后，开始对他们进行审判。

按照拉伊克案件起诉书的说法，早在1945年，南斯拉夫就在匈

牙利组织了间谍网，目的在于推翻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和打倒匈牙利政府。据说，贝尔格莱德还给布达佩斯发出秘密指令，要求杀害匈牙利最活跃的领导人。

起诉书说，铁托于1947年12月对匈牙利的访问使得这些计划加速贯彻执行。1948年10月，也就是在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南斯拉夫内务部长亚历山大·兰科维奇曾潜往匈牙利，在波克什附近霍尔蒂分子、大地主克拉伊那·安塔拉的狩猎场会见了拉斯洛·拉伊克。下达了在匈牙利发动政变的最新指示。据说，同兰科维奇同行的还有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卡尔洛·姆拉佐维奇以及一位叫塔里斯纳什·杰尔迪的匈牙利女人。

起诉书接着诋毁道：早在西班牙内战时（1936—1939年），拉伊克就是外国间谍。当时他是国际旅的战士。但他去西班牙不是为了抗击法西斯，而是为盖世太保效劳。西班牙内战失败后，他在法国居瑟、维尔纳和圣基普里安的集中营里，开始同国际旅的南斯拉夫人进行勾结。

起诉书断言，在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南斯拉夫人中，至少有150人是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后来盖世太保接收了这批人。1941年南斯拉夫爆发起义时，这些人被派回国内。

起诉书列举了这批南斯拉夫人的名字。其中有：阿莱什·贝勃勒、伊万·戈什尼亚克、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科斯塔·纳吉、卡尔洛·姆拉佐维奇、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斯韦蒂斯拉夫·斯特瓦诺维奇。

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起诉书说，1941年，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贝勃勒在法国的集中营里同拉伊克有间谍关系，而实际上，贝勃勒在内战中受重伤后，从西班牙直接撤退到巴黎，又从巴黎回国。1938年，他被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府以“颠覆罪”投入监狱。

1948年时任克罗地区政府副主席的马斯拉里奇将也受到同样的诽谤。荒唐可笑的是，从1939年至1945年，他恰恰是在苏联，而

不是像起诉书所言是在法国。

姆拉佐维奇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审判拉伊克时，他是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这之前，他曾出任过驻布达佩斯的外交使节。而起诉书中所说的那个时间，他也恰恰是在苏联。

南斯拉夫军队的戈什尼亚克大将及科斯塔·纳吉大将被控自1941年以来即是德国秘密警察的特务。然而，从1941年至1945年，他们是南人民军战略部队的司令员，正指挥千军万马痛击德国人呢！

起诉书控告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在二战前的法国兵营里同拉伊克有间谍联系，这对泰波来说太冤枉、太不公平了。这位泰波先生是位地地道道的"土包子"，1948年以前，他从未踏出过国门一次，只是在1948年，他才有机会对保加利亚和苏联进行短暂的访问。

简而言之，起诉书将南斯拉夫解放战争中的所有领导人、联邦的和各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长们、政府总理、所有军队的领导人都说成是为德国秘密警察服务的特务。这一大批人在1943年以后摇身一变，又都为美国人效劳。南斯拉夫驻东欧的外交官尤其如此。

起诉书公布1个星期后，开始审理拉伊克案。由于"涉及面广"，这次审判是东欧国家中这类审判规模最大的一次。

法庭设在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大厅里。审讯是公开的，允许旁听。但是，由于座位有限只有持有法庭发出的"邀请信"者才能出席。为了扩大影响，法庭还请了60名外国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外交代表也可以参加。苏联《真理报》特派记者、著名的小说家波列伏依也在场。

审讯的场面是精心设计的，它完全是莫斯科审讯的翻版。包括拉伊克在内的所有"被告"全都承认了对他们的指控。

拉伊克在开始"招供"时，把自己描述成是个卑鄙无耻之徒，早在1931年就受豪萨警察的雇用。他"承认"，他被关押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时，以及后来作为地下党领导人参加匈牙利抵抗运动期间，就是为盖世太保服务的特务。

他向法官“供认”，他奉南斯拉夫领导人之命从事推翻匈牙利政府的活动，然后他“揭露”说，铁托、兰科维奇等领导人全都是德国警察的特务。

其他被告也无一例外地给自己描绘了一幅丑恶的嘴脸。

当拉伊克等人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之后，法官当庭对他们进行宣判：

拉伊克被判处死刑；

参谋长兼军队政治部主任帕尔菲中将和科龙迪上校（两人均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判处死刑；

匈牙利广播公司副主席尤什图什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他几十名人士受到不同刑期的处罚。

拉伊克被处以绞刑，两名军人被枪决。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对拉斯洛·拉伊克及其同谋者的审讯。它不过是代替了不可能举行的对贝尔格莱德的审讯，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这一帮阴谋分子有罪，在道义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这个犯罪集团。这次审讯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一位西方政治家如是说。

3. 编造的遗书

在拉伊克的悲剧上演之前，厄运的幽灵就已降临玫瑰花都保加利亚了。

1949 年 3 月，当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赴苏治病期间，保加利亚的政治气候骤变，在总书记缺席的情况下，保共中央召开全会，将季米特洛夫的副手，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斯托夫宣布为“人民的叛徒”，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3 个月后，他被开除出党并被捕入狱。同年 11 月 30 日，检查官公布了对“以特雷乔·科斯托夫为首的阴谋分子和犯罪集团”的起诉书。

科斯托夫是位资深革命家。1920年入党，30年代起开始任保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他曾在共产国际工作，并一度担任主要领导人。他有几近30年地下活动、群众斗争和武装起义的丰富经验，也经受过狱中考验。他是东欧国家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有大学学历的人。

科斯托夫学识渊博，对马列主义有较深研究。1944年解放后他但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时，主张维护民族利益，按保加利亚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1949年底，他在莫斯科被斯大林当面指责为“民族主义者”和“反苏分子”。

但是，检察长的起诉书却颠倒黑白，将科斯托夫描述成一个典型的“阶级敌人”。

起诉书称：“他一生的主要特征就是两面三刀，叛国通敌，阴谋反对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和人民最神圣的利益。”起诉书还“揭露”说，科斯托夫曾向共产国际领导建议，让铁托担任南共的领导成员。虽然这是起诉书中唯一真实的内容，但也是致他于死地的指控之一。

检察长还提到这样的“事实”：科斯托夫在1942年以后便投靠了英帝国主义的情报部门，后者建议他与铁托联络。科斯托夫和铁托密谈后商定，借助南斯拉夫军队消灭保加利亚人民军（拉伊克也坦白说，他曾与铁托合谋借助南斯拉夫的兵力，在豪萨旧部队和警察的配合下推翻匈牙利人民政权）。

“庄严的”审讯仪式在索非亚人民军总部大厅公开举行。到场的除了国内人士外，还有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必不可少的“工人代表团”。

审讯的程序和场面几乎一丝不差地重复了布达佩斯的表演。先是起诉人宣读起诉书，接下来应当是被告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悔，但这一次却出现了意外的情况。

科斯托夫这位老革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当众羞辱自己，他推翻了预审期间的“口供”，当众正式拒绝对他的一切指控。

这一情况委实出乎庭长的预料，在场的“工人代表团”也不知所措。庭长当即宣布暂时休庭。

在休庭期间，各方面人士不断向科斯托夫施加压力，逼迫他重新认供，让他当众说他的脑子一时混乱，记错了云云。科斯托夫对这些人的话不置可否。这些人以为他已“回心转意”，便宣布重新开庭。但开庭后，科斯托夫依然坚决拒绝对他的指控，令审判长无比尴尬，再次宣布休庭。

保加利亚的报纸没有报道这个场面，但苏联塔斯社却称科斯托夫的行为是“无法无天”和“不可容忍的”。

在这以后，科斯托夫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但这并未能使这位革命家屈服。他以超人的力量，至死也坚持自己是清白的。

戏还要演下去，而且要有个“令人满意”的结尾。这次，戏的导演也有备而来。

最后一次开庭那天，当庭长要科斯托夫做最后陈述时，他依然强烈表示收回预审时的“供述”。但科斯托夫刚说了几句话，公众席上就响起了阵阵喧叫声和口哨声，科斯托夫的声音被淹没了。这时供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使用的同声传译装置也神密地失灵了。尽管科斯托夫极力为自己辩护，声明自己无罪，法庭还是判处他死刑。12月17日晨，科斯托夫被自己的同胞吊死在绞刑架上。

几天以后，保加利亚的报纸发表了科斯托夫临死前“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收回在法庭上的表态，承认起诉书中对他的全部指控。1956年保共给科斯托夫平反的时候，有人揭露这封“遗信”是捏造的。

在科斯托夫死后，大清洗和一连串的示众性审讯立刻接踵而来。大清洗涉及1080人，其中有33名党政要员。他们的罪名很多，从“铁托主义者”、“法西斯特务”、“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直到充当“南斯拉夫情报员”。仅被列在“叛徒”名单上的要员就有：军队情

报负责人彼·兰切夫将军、军队政治部主任鲍·巴尔加兰诺夫将军；国家秘密警察局的几位局长斯·鲍格丹诺夫、乔·加涅夫、尼·扎德戈尔斯基；保加利亚国民银行行长查·宗切夫；财政部长姆·萨克拉罗夫；交通部长斯·顿切夫；外贸部长约·鲍日洛夫，以及电气化部长留·凯拉科夫。

4. 最后的悲剧

东欧国家的反铁托主义运动进行了大约两年后，罪恶的轮盘赌的指针瞄准了东欧的最后一块净土——捷克斯洛伐克。

1951年9月6日，在捷共中央委员会上，斯兰斯基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职务。

如果说东欧其他国家里被清洗是人是斯大林不喜欢的“国内派”和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那么，斯兰斯基被清洗则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因为，他在共产党内的资历和表现就是从莫斯科那多疑的眼光来看也是无懈可击的。

斯兰斯基20岁刚出头时就加入了刚刚建立的捷共。后来，他与年长他4岁的哥特瓦尔德一起成了著名的“卡尔林”左派集团的骨干。这个派别在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曾得到斯大林的支持。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位一本正经的、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未背离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呆在莫斯科，是地地道道的“莫斯科派”。1944年他被秘密派回捷克，作为党在国内的主要代表来筹划解放后共产党的工作。

1947年，当哥特瓦尔德总理因同意让捷克参加斯大林所诅咒的“马歇尔计划”而几乎断送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时候，斯兰斯基似乎更受莫斯科的宠爱。他代表捷克参加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会后，他留下担任捷共常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1948年6月，他也在共产党情报局将铁托革出教门的文件上签了字。

1949年12月，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在捷克已开始，斯兰斯基依

然身居显要。在捷共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而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他被指定来发表对斯大林的正式颂辞。1951年4月，当捷克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清洗机器已在高速运转时，共产党情报局的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还发表了斯兰斯基写的一篇颂扬斯大林“天才”的长文。

至今仍使人百思不解的是，1951年4月到9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令斯大林不安的事，致使克里姆林宫转而反对斯兰斯基，并下令清洗他。

现有的资料表明，清洗斯兰斯基的决定是莫斯科单独作出的。斯大林甚至没有同哥特瓦尔德及其最亲密的同事们商量。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多少证明这一点：

1951年7月31日是斯兰斯基的50岁生日。这一天，党授予他社会主义勋章，中央委员会还给他发了一封由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总理署名的热情洋溢的贺电。党的主要宣传家兼情报部长瓦茨拉夫·柯别茨基为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力报》写了一篇社论，称斯兰斯基是“共产党革命家的杰出典范”、“列宁和斯大林旗帜下的一名忠诚和热情的战士”。

斯兰斯基在他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从东欧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来的生日贺电。但是，令斯兰斯基大为惊讶的是，莫斯科没有发来电报，不仅如此，苏联的报纸对他的生日也置之不理。在苏联，这种事情不会被忽视或疏漏的。克里姆林宫从礼宾角度发出的这个信号是带有特尔菲神示性质的。斯兰斯基深谙克里姆林宫的礼仪，他看出肯定出了问题。

不知是哥特瓦尔德等人忽视了莫斯科这不同寻常的“疏漏”，还是布拉格尚未正式得知斯兰斯基即将失势，8月18日，《红色权力报》还报道说，列托夫飞机工厂的工人们在前一天将这个工厂命名为鲁道夫·斯兰斯基工厂，来表达他们对“哥特瓦尔德同志的最亲密战友”的“感激和热爱”。

3 个星期之后，还是这份《红色权力报》告诉公众说，中央委员会已经解除了这位“列宁和斯大林旗帜下忠诚和热情的战士”的总书记职务，原因是他在“挑选党的干部工作中”犯有错误和不适当地干预政府机构工作。他的职位由哥特瓦尔德代理。

9 月 8 日，曾颂扬过斯兰斯基的情报部长柯别茨基却又急急忙忙地在报纸上向深感迷惑不解的读者解释说，斯兰斯基曾企图把他所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变成“党的领导机关”，而这个机关却背着负责同志工作。

在中央委员会紧闭着门的会议大厅里发生了什么事，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莫斯科及其布拉格代理人还不想完全搞掉斯兰斯基，他还有机会承认错误，并留在政治局内。此时他在中央的排行是在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和西罗基之后作为第 4 号人物，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被任命为副总理。

一般人认为，他的下台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与来势很猛的对“铁托主义叛徒和阴谋份子”的清洗没有关系。

现在重新回顾整个事件的发展，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克里姆林宫当时已得出结论，为了让即将举行的审判显得合理，有必要揪出一个大人物。把已经揪出来的什林、什维尔莫娃、胡萨克、克列门蒂斯、斯姆尔科夫斯基、帕维尔、朗登和洛市尔这些人凑在一起只能拼凑出一个相互矛盾的大杂烩。审判案的设计者一定感到，需要有一个象科斯托夫或拉伊克这样的“大人物”来作这班人马的头子，作审判案的首犯。

为什么选中了斯兰斯基，而不是哥特瓦尔德或萨波托斯基作为清洗对象，至今令人费解。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由于他是犹太人，在早期的清洗中，被捕的人士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而且，斯大林本人对犹太人怀有一种偏见，他在国内也开始清洗犹太人。这一点可能是选中斯兰斯基的决定性因素。

也许事情就是这样，反正斯兰斯基被捕了，那是 1951 年 11 月

24日夜里的事。4天以后，官方就此事发表的一项公告称："最近查明了过去未曾掌握的情况，鲁·斯兰斯基犯有积极的叛国活动罪"，现在拘押斯兰斯基是为了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但是，捷克共产党和政府从未向公众说明这些"过去未曾掌握的情况"究竟是什么，以及这些"情况"又是如何突然出现的。虽然在逮捕斯兰斯基之前已有数十名重要犯人被审讯了近1年时间，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斯兰斯基的"罪证"不大可能在11月中旬到下旬这十几天里突然具体化。这是斯兰斯基案中的又一个谜团。

1951年12月6日，哥特瓦尔德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宣布："新查明的情况"证实斯兰斯基"在反党反国家的阴谋集团中起领导作用"。一夜之间，斯兰斯基就变成了铁托份子和叛徒。

几天后，为了向公众显示斯兰斯基在"阴谋集团"中的"领导作用"，捷共邀请了大量客人来旁听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在古老的赫拉德强尼城堡里举行。这是间西班牙式大厅，高高的大厅顶上悬挂着华丽的枝形吊灯。虽然乳白色的灯光如同往昔一样自然地洒下，但此刻，人们却无心领略西班牙风格的魅力。主席台上坐着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台下是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和列席会议的客人。到会的人无一不是神色穆然。只有那些平日里与斯兰斯基有不解之仇的人在心中窃喜。

会议开始后，首先宣读了一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撤销斯兰斯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

决议宣读完后，台上台下无人鼓掌，人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台下人们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台上。此刻，哥特瓦尔德神情严肃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他面前的话筒开始宣读对斯兰斯基的起诉书（是由党的领导人宣读起诉书，而不是由检察长！）。

起诉书说，总书记"有意识地支持敌对和犯罪集团的一切颠覆活动"，并且试图背着总理另建一个党的特别中心。为了把斯兰斯基同早些时候被清洗的人联系在一起，哥特瓦尔德称，"在调查各被捕

的地下集团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材料。它们证明，斯兰斯基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阴谋，说得准确一点，他是反党反国家阴谋的领导成员。”起诉书还把斯兰斯基同国外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哥特瓦尔德说：“西方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计划让斯兰斯基逃往西方，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计划和确凿的证据。”

捷克斯洛伐克示众大审判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演好”这台戏。

尽管克里姆林宫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一个“阴谋集团案”已花费了3年时间，但为了让“演出”顺利完成，还需要做大量的幕后工作。

此刻，监狱里已关押了数千名政治犯，为了把这些互不相干的“铁托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部谍”分子拼凑成有内在联系的案件，布拉格的检察官和审讯工作人员还得对已有的剧本初稿进行一番剪辑加工。这么复杂的工作甚至连30年代莫斯科大清洗时的检察官们都未曾遇到过。

从斯兰斯基被捕到开庭对他审判间隔了1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专家”指导和帮助捷克的检察人员搜集和整理了几百名犯人的“供词”。

人们从斯兰斯基案幸存者的众多回忆中了解到，审讯人员为了能得到他们所期望的供词，不仅动用了各种刑具对“犯人”进行残酷的肉体折磨，而且还使用现代方法对这些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之方面，审讯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极高的专业素质。也正是由于审讯人员的精明能干，使许许多多忠诚的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牺牲人的尊严。正如一位名叫朗登的幸存者后来在回忆录中所透露的那样，他在坐牢期间已经被搞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如果检察官需要，他甚至能证明自己1岁的儿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托洛茨基分子。许多被判刑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对

自己所犯“罪行”笃信不移，以致后来在给他们平反时，他们感到惊讶之极，仿佛时光在倒流一般。

1952年11月21日，斯兰斯基审判案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开庭了。在被告席上，除了斯兰斯基外，还有他的13名“同案犯”。在证人席上坐着33名“证人”。无论是被告还是证人都已受过审讯人员完美无缺的训练，并已排演过多次开庭场面。

示众大审判一共进行了7天。在审判的最后一天，这些被告当众坦白了他们在幕后不知已重复了多少遍的“罪行”。朗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整个“演出”没有露出一点马脚，演员和布景都调度得好极了。审判中最具卡夫卡特色的是，受审人员想在法庭上看到审讯他们的事实。后来，被告受到了审讯人员的赞扬就象孩子们渴望得到严格要求的父母或老师的赞扬一样。

在所有人都正式认罪了之后，判决宣布了：14名被告中的11名被判处死刑，三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处死刑的有：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贝·盖明德（党中央国际关际部前部长）、前总统府经济司司长卢·弗兰克、前党中央副总书记约·弗兰克、前国防部副部长贝·雷岑将军、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卡·什瓦布、前外贸部副部长鲁·马尔戈留斯、前财政部副部长奥·费舍尔、原《红色权力报》编辑奥·什林和安·西蒙。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是：前外交部副部长瓦·海杜、前外贸部副部长埃·洛布尔、朗登。

判决之后，检察长约瑟夫·乌尔伐列克在总结发言时胜利地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审判意味着摧毁了象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阿尔巴尼亚的佐治、罗马尼亚的巴特勒什卡努、波兰的哥穆尔卡那样的“叛徒集团”。他自豪地断言，“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

除斯兰斯基外，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向党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上诉书。他们在上诉书中极力辩白说自己无罪，说他们“承认”指

控仅仅是"为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哥特瓦尔德拒绝了所有上诉。

12 月 3 日，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都被处以绞刑。后来，斯兰斯基的骨灰被撒在布拉格南面的"一条街道上"。

1949—1953 年期间，东欧国家的所有政治诉讼案显然是按照一个版本进行的，原版是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此刻，所有的示众审判都为了一个目的：把南斯拉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基地，它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这些诉讼案是由一个中心来策划、导演的。

另外，人们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东欧的这些诉讼案中，被送上断头台的首先是战时呆在国内，同本国人民共命运的那些人，而不是 1945 年在红军开到之后从莫斯科前来接管政权的那些领导人。当然，斯兰斯基是个例外。

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国家陆续开始为 1948—1953 年期间大清洗中无辜牺牲和被判刑的平反昭雪。但是，平反的深度有限，许多问题仍旧含混不清。

在保加利亚，科斯托夫只是表面上被平反了，而未涉及是谁下令以司法途径来谋杀他的这类根本性问题。

在匈牙利，人们曾试图深刻揭露拉伊克被害的全部真相，但他们也不敢深究到底是谁下令让格罗和拉科西杀害拉伊克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 年 1 月，特别是诺沃提尼下台之后开始平反工作。对以往诉讼案的重新研究使历史学家清楚地看到了斯大林主义阴谋的背景，而更重要的是，暴露了苏联秘密警察积极指导和参与了对无辜革命者的杀害。有些人猜测，苏联政府在 1968 年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勃列日涅夫要制止进一步揭露这一骇人听闻事件的真相。

三、逆境中的苦斗

1. 绳索越拉越紧

在政治高压不断加码的同时，斯大林挥舞起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这两根大棒。

早在苏南冲突的初期，斯大林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操纵经济杠杆对南斯拉夫人施压。到1948年底，斯大林的老虎钳已将“经济援助”这颗螺母扭得不能再紧了。

1948年12月，南斯拉夫派经济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下一年度南苏两国贸易问题。使南斯拉夫人大为惊讶的是，商谈的结果竟是600万美元的贸易额，这只是相当于1948年贸易额的1/8。苏联塔斯社就此发表的一项公报称，苏联政府减少贸易额是因为“南斯拉夫对苏联采取了敌对的政策”。

继苏联之后，其他东欧国国家也随即取消或大幅度减少了与南斯拉夫的外贸合同。

当时，南斯拉夫5年计划中95%的投资本应由苏联和东欧国家提供，此时苏联和其他东欧家中止提供资本货物（价值约3.6亿美元），必然对处于战后恢复时期的南斯拉夫经济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在当时，被共产党奉若神明的基础工业的许多大型工厂正处于“骨架”、甚至是“地基”阶段，十几座新的水力发电设施正在施工之中。还有许多工业设备在其他东欧国家加工制造。苏联集团的经济封锁使这些项目完全瘫痪或部分瘫痪了。

苏联集团的经济封锁，再加上1948年的农业欠收，使战后一度

出现的经济建设兴旺景象一落千丈。国民收入连年剧减。1948年，国民收入增长23%，1949年只增长了9%，而以后的3年则连年下降。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也因遭到严重破坏而未能完成。

为了给南斯拉夫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其他东欧国家单方面中断了同南斯拉夫的运输、交通联系。罗马尼亚停止了同南斯拉夫的一切铁路、邮政往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将客货运输及邮政往来减少到最低限度，阿尔巴尼亚切断了一切交通，仅留邮政一项。

尽管国民收入不断减少，南斯拉夫人还不得不勒紧裤带，忍受因1/5的国民收入被挪作军用所带来的新的困难，因为他们不断听到有人大喊“狼来了！”

的确，自从被革出教门以后，南斯拉夫人也确实感觉到来自苏联集团的军事威胁在与日俱增。

不知是冷战中东西方的对峙使西方国家对其敌手——苏联集团的军事调动特别敏感，还是到处都有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西方报刊上屡屡出现苏联欲对南斯拉夫以兵戎相见的报道。

就在情报局的决议刚公布了1个月的时候，法国的《世界报》刊登了一条题为“斯大林是否打算动武?”的消息。这条消息是美联社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据土耳其人士说，强大的苏军已开始在南斯拉夫边界上集结，苏军新的增援部队也正在通过罗马尼亚……

铁托不相信武装入侵的谣言，“因为我们知道，红军进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是决不会发生的，因为那将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末日。”但他又有所指的说，“凡是胆敢阻挠我们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威胁我们领导完整的人，无论他是谁，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1949年初，又有关于苏联军队在南阿、南保及南罗边境集结的消息见诸于报端。

4月，全世界的报纸再次盛传苏联集团的军队在南斯拉夫边境上集结。

这年8月，苏联的军事威胁真正到了剑拔弩张之势。

这一年夏天，南斯拉夫保安机关几乎破获了苏联在南境内的所有秘密特务组织。被逮捕的人中有不少白俄。他们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移居南斯拉夫的，其中有些人在1945年以后取得了苏联国籍。

8月18日，苏联就逮捕白俄一事向南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抗议。苏联的照会赤裸裸地威胁说：如果“南斯拉夫打算继续非人道地对待苏联公民，继续进行违法逮捕和殴打，继续侮辱苏联公民……苏联政府将不会无动于衷，它将不得不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来维护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的利益……

就在递交照会的那天，一个新的苏联坦克师出现在距贝尔格莱德45英里的南、罗边境上。

铁托认为此事十分严重，他从布里俄尼发来电报，让南共中央领导人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

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南共高级领导人在卡德尔那里开了会，“我们商定，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执行以前从中央委员会接受的自己的任务。鉴于我曾被确定为南斯拉夫游击队总司令，我立即采取了一切措施，使整个组织作好准备。”

接着，南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战备工作，将一些食品仓库、档案及工厂从伏伊伏丁那平原向内地，特别是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撤退。

为了加强战备，铁托建议增加军费开支。从1946年的3.3亿美元增加到1950—1952年的6.65亿美元。这个数字约占1948年国民收入的23%。

1949年9月，南人民军在北部地区举行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南领导人认为，未来的侵略很可能来自北方。

在这同时，边界事件也不断增多。南斯拉夫同苏联集团若干国家接壤的边界线长达1250英里。在同斯大林较量的4年半时间里，共发生5000多起边界事件，其特点是，挑衅事件与年俱增。有明细帐为记：

1948年7月1日到1949年9月1日，南斯拉夫东部边界共发生边界事件219起，侵犯南领空69次；

1950年的边界事件升至937起；

1951年更上升为1517起；

1952年达到创纪录的2390次。

1951年11月15日，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联合国控告苏联集团，强调指出苏联集团的侵略行动构成了危及和平的严重危险根源之一。

2. “突破重围”

苏联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胁犹如三座大山压在南斯拉夫人的身上。此时此刻，铁托再次显示出他的应变能力及雄才大略。

他选择了同西方国家接触作为突破重围的突破口。

还是在1949年年初的时候，南共领导人在同西方非官方的接触中，就非正式地试探过同西方大国改善关系和获得支持的可能性。7月，他们不再支持亲情报局的希腊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转而同希腊政府谈判，并与雅典和安卡拉签订了巴尔干条约。

9月，正在担心情报局军事入侵的时候，他们又“发现”了联合国。他们在联合国上同苏联集团的路线一刀两断，并且第一次在这个机构里对苏联集团提出控诉。也是在9月的这次联合国会议上，南斯拉夫不理会苏联代表狂暴得不顾体面的反对，推举自己的代表来竞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与此同时，铁托派自己的战友泰波到美国去寻求经济援助。9月，美国政府批准了向南斯拉夫提供的第一笔贷款，金额为2000万美元。表面上这是一笔“正常的商业交易”，但双方私下里都承认这是一笔政治贷款。

稍后，南斯拉夫又得到了美国小麦，使它渡过了1950年灾难性

的干旱和当年冬天面临的饥荒。

闻此讯，苏联人又开动宣传机器，大肆攻击了铁托一番。苏联报刊称，“铁托已完全转入了帝国主义阵营”，国内一些人也出来反对，认为不可能用资本主义的小麦来建设社会主义。

铁托对此的回答是：“只有那些理解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谁要对此毫不理解，即使用自己的小麦，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西方的外交和物质上的援助，使南斯拉夫实现了新的政治平衡，使之能够喘过气来，同斯大林进行新一轮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转守为攻。

3. 走离经叛道之路

1949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与情报局的争论中转守为攻，同斯大林的冲突解除了禁忌。南斯拉夫人开始采用新方法来同苏联进行斗争，突破逐渐实现，信心也与日俱增。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发现，如果他们在同苏联的争论中不能从意识形态上进攻苏联，就只能囿于否认苏联关于铁托“脱离正轨”的无理指责，只能以此来为南斯拉夫自己的立场辩解，从而也就限制了批判性的思考。然而，一旦对苏联放手实行正面进攻和批判，南的理论家们便可以转而用反对派的眼光来寻找对方“脱离正轨”的疵点，进而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及正统性提出批评。

南斯拉夫的雄辩家们和严肃的政治家们领悟到这种斗争艺术之后豁然开朗，欣然踏上了一条冒险探索、发扬批判性思考、实现制度革新的令人惊异的旅程。此时此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批判、理论和实验之花竞相开放。

在大规模的理论研究之后，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一个完全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全新的理论——工人自治，并在全国实行这一制度。1953 年 1 月 1 日，南联邦议会以宪法形式确定了自治的思想

和原则。西方人称此为"铁托主义"。

铁托的实验不权使南斯拉夫摆脱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它为社会主义可多样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例证明。当斯大林模式在东欧其他国家生根开花之时，铁托却带领南斯拉夫人民独辟蹊径，勇敢地走上了自治之路。这一果敢之举不啻是现代的"丹柯之心"，成了斯大林死后东欧国家掀起的第二次寻求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拉丁神灯。

到了80年代，"自治"思想已被许多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承认和接受。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铁托留给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遗产。丹柯死了，但丹柯的探索精神永存。

进入50年代以后，苏南冲突不仅没有丝毫缓和，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双方都陷入了越来越激愤的状况之中，很有些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宗教冲突的气氛。

1952年11月2—8日，南共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大会总结了同斯大林作斗争的经验，批判了作为制度的斯大林主义。大会将南共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大会确定了党的新概念：放弃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并为在南斯拉夫建设自治的社会而斗争。改变称呼首先是要使其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党。

"六大"会场上有种战斗气氛，有种扎波罗热的哥萨克给苏丹写信的气氛，每一个人都胁迫执笔的人要把他对博斯普鲁斯海峡那边的帝王的谩骂都写上去。

"六大"的决议称：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苏联作为一个新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大国所起的作用，其目的在于追求世界霸权。

苏联政府的侵略政策和霸权政策特别是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

"六大"正好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闭幕。那天，米洛

凡·德热拉斯发表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讲话，他说，南斯拉夫革命捡起了斯大林扔在泥淖中的十月革命的旗帜。

四、冰雪消融

1. 北方伸来橄榄枝

1953年对苏联和东欧来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年份。

这年的3月5日，一代天骄、神明似的斯大林溘然长逝。他的撒手西归对苏联和东欧，乃至对世界的影响恐怕大于世界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领袖人物。在苏联及东欧，政治积雪开始溶化，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在这之后，苏联国内及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斯大林逝世后，一个非正式的5人领导机构开始管理苏联。这5人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

但还不到3个月，5人领导机构中就去掉了一个。6月间，4个人联合起来反对贝利亚，剥夺了他的权力，并将30年代以来苏联内外政策中的许多错误归咎于他。12月，贝利亚被处决。

随着贝利亚的垮台，外界发现苏联领导人开始小心翼翼地从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做法中后退。在国内，曾经盛行一时的反犹太人运动被制止；代表斯大林晚年恐怖高潮的“医生阴谋案”被平反，作家和艺术家开始拥有更多一点的自由。

在对外关系方面，新领导人不再坚持斯大林主义僵硬的对抗政策，开始缓和东西方关系。南斯拉夫成为苏联东欧关系中被首先关注的问题。

几乎在贝利亚被废黜的同时，苏联决定缓和同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

4 月 29 日，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接见南斯拉夫驻苏临时代办，商谈恢复关系。1 个月后，铁托在一次讲演中对苏联的建议做出了反应，他表示南斯拉夫愿意同苏联建立“正常的，过得去的关系”。

6 月 6 日，莫洛托夫再次召见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建设双方互派新大使。10 天后，南斯拉夫表示同意。17 日，苏联任命瓦尔科夫为驻南斯拉夫新大使。此后，东欧国家也相继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国家关系。

6 月，苏、南双方还就取消对对方使馆人员活动限制达成共识。苏联方面还表示准备同南斯拉夫建立经济联系，并在文化和科学领域里进行接触。为了表示恢复关系的诚意，苏联停止了反南宣传，不再出版南斯拉夫政治侨民办的报低，并将这个侨民组织解放。

第二年 6 月，苏共正式向南共建议，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像苏南冲突时期一样，这次和解也是以苏南秘密交换信件开始的。

6 月 22 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致函铁托。他在信中承认苏联方面在苏南冲突中负有主要责任。他建议两国捐弃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为此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

虽然此时两国关系已出现解冻迹象，但苏共中央如此大胆而直接了当地呼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且两国领导人实现直接对话，仍使南斯拉夫人多少感到意外和吃惊。

对于莫斯科的热情和主动，铁托并不感到激动，此时更多的是谨慎，生怕这又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玩的什么鬼把戏。因而未敢贸然立即回复。

一直拖到 8 月 11 日，铁托才给莫斯科回信。信的措辞小心谨慎，并无乐观之情。铁托在信中对苏联人说，南斯拉夫人想看看（你们的）行动，空口白话是不够的。

写完这封信后，南斯拉夫又认真地研究了苏联近来的内外政策，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讨论，南斯拉夫人多少感到放心了。他们确信，苏联的主动和倡仪并非是做给世人观赏的花枪而是真心的，他们想做出某种让步。

11月21日，铁托在科帕尔市视察工作时，就苏南关系的最新发展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欢迎苏联新领导人有勇气同旧政策决裂，并重新建议同我们建立正常的、甚至是良好的关系。我们已同苏联建立了相当正常的关系。我相信，(这也是他们的愿望)，这种关系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合作对双方均是有益的。"

5天后，南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苏南关系问题。会上，铁托手里拿着赫鲁晓夫写给他的信对大家说，"从今天在这里读的信中你们将看到，南共联盟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接着，全会对苏共的倡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全会决定同意苏联的建议，举行两国首脑最高级会谈。

虽然苏共主动向南斯拉夫伸出了橄榄枝，但苏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苏南和解的进程非常艰难。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老斯大林主义者仍旧死死抱住斯大林式僵硬的教条主义不放，在同南斯拉夫缓和紧张关系总的气氛中，仍不失时机地攻击南斯拉夫，两国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犹如走钢丝一般。

莫洛托夫于1955年2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例。当时他说，"苏南关系最近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并不认为在这方面已经大功告成，但我们相信在这方面也要看南斯拉夫的态度。在最近几年里，南斯拉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里所走的路。当然，这完全是它自己的内政问题。"

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莫洛托夫的这篇讲话十分气愤。铁托在3月7日召开的南联邦议会上回击了莫洛托夫的陈词滥调。

铁托说，去年年底之前，东欧国家停止了反南斯拉夫的宣传，而

且流亡组织也中止了公开敌视我国的活动。但奇怪的是，几乎在所有国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怪事，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他们在党员和普通群众面前，仍然一如既往地对我们进行指控。这就不免使我国人民对于那些国家的最主要负责人的声明是否完全真诚发生怀疑……莫洛托夫先生提交最高苏维埃的声明中提到南斯拉夫时的说法，当然与事实不一致。我们认为这是企图在他们的人民面前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这是又一次对我们的损害。

铁托此刻向苏联政府呼吁，"现在是该按事实真相和发展过程说明问题的时候了。不应中途停止正常化和继续在我们的人民中间制造怀疑气氛，因为这样的声明无助于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除了这些表面文章之外，苏共内部就要不要同铁托握手言和及怎样和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88 年，赫鲁晓夫的儿子在《卫星时代》第 16 期发表回忆文章，谈到了当时苏共内部的一些情况。

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我 21 岁。从父亲同来我们家及到别墅来的人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很多事。当时父亲建议我们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派一个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去承认所犯的错误，但许多人坚决反对这样做。另外一些人连听都不要听这个话题，有些人甚至发出疑问：'赫鲁晓夫的大脑正常吗？'但父亲觉得铁托是对的。他对铁托本人、他的勇敢和勇气的评价与众不同。而苏斯洛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特别是莫洛托夫固执的认定，南斯拉夫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同'铁托——兰科维奇集团'没什么好谈的。"

赫鲁晓夫本人也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是否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个问题一提出，就遭到许多人的激烈反对。许多人认为，南斯拉夫已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我们怎么能同他们恢复关系呢？他们的经济已被美国垄断资本吞没，私有财产已经恢复；私人银行已经建立起来。在

众多的反对者中，老牌的“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的态度特别强硬，反对我们同南斯拉夫缓和紧张气氛的任何尝试。但我始终认为南斯拉夫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认为产生这些可笑主张的原因是，苏联同南斯拉夫太疏远了。赫鲁晓夫说，“我们想出了太多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以致连我们自己也开始相信了。这就像古代一个伊斯兰教教士的故事。他走过一个乡村小镇的广场时对人讲，他来的那个地方在免费供给羊肉和大米。这句话很快传遍了全镇，人们都向着他指的方向跑去。当这位教士看到人人都跑时，他却拦住一个人问：‘发生了什么事?’

那里在免费供给羊肉和大米。

教士一听马上提起他的袍子，飞块地去追上人群，也去索取免费的食物。

南斯拉夫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南斯拉夫人正在干许多可怕的坏事，现在我们听得太多，以致我们自己也开始相信了。”

针对许多人的顽固立场，赫鲁晓夫认为要用过硬证据来驳斥这些人的观点。他向中央委员会建议，组织一个由经济学专家和其他方面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由他们分析一切有关的因素，然后决定南斯拉夫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

经过讨论，成立了一个由《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由他们负责对南斯拉夫国情进行“彻底的调查”。不久，这个委员会向中央提供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的结论是，没有理由把南斯拉夫看成是资本主义。虽然农民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生活，个人使用自己的土地，可是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银行、商业和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掌握，而国家的权力在人民手中，国家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专政。因此，南斯拉夫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报告在苏共中央内部引起哄动，斯大林据以在两国间制造

争论的基础被拆除了，而在这一基础上反对同南斯拉夫和解的论点也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坍了。

和解已成定局，但如何去同铁托接触才是最好的方式，又引起人们新的争论。那些反对同南斯拉夫握手言和的人此刻又借机制造麻烦。他们提出要南斯拉夫人到莫斯科来谈判。

赫鲁晓夫认为这根本不能考虑。他说："我不相信他们会接受邀请，这会显得是他们恭恭敬敬地来乞求我们。其次，是我们先主动断绝了同他们的关系，是我们先攻击了他们，因此应该由我们采取主动来结束分裂。"于是，苏共决定派代表团去贝尔格莱德。

在决定举行最高级会谈后，苏南外交人员频繁地进行接触，就最高级会谈的最后细节进行磋商。

1955 年 5 月 14 日，苏南两国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代表团不久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为此，双方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代表会议，双方的代表团已经组成。

苏联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阿·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真理报》主编德·特·谢皮洛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安·葛罗米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普·恩·库米金。

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有：共和国总统铁托；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兰科维奇、富克曼诺维奇一泰波；外交部长波波维奇；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托多罗维奇和外交部副部长韦·米丘诺维奇。

联合公报宣布，最高级会晤将于 5 月底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铁托对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表示欢迎，他说："许多人对苏联最重要的代表到贝尔格莱德来访问感到大为惊讶。但我只能说，我对苏联领导人这一大胆的决定表示欢迎。"他称赞"南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是个巨大的成功，是对和平的一个贡献。"

但铁托也再次强调说，"我们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独立的

国家参加会谈。而且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无论它来自西方还是东方。”

他说，苏联领导人已经直接了解到这一切，我们要让苏联人知道，在一些问题上，双方均不应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为了不让南斯拉夫的朋友们对苏南和解过于担心和神经过敏，铁托表示，“我们的会谈情况将向世界公开，在东方，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都知道我们谈了些什么，在什么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因为我们无意在背地里耍花招，也无意做任何损人利己的事。假如西方有人幻想南斯拉夫改弦更章，因而最后大失所望的话，我们是没有责任的。”

铁托再次重申：我们将不依附于任何集团。

2.“卡诺萨”之行

公元 1955 年 5 月 26 日。

这一天对南斯拉夫人来说极其荣耀，因为号称国际共运领袖之国的领袖将飞来当面就 6 年来苏南关系中所发生的令人极其不愉快的事情向南斯拉夫及铁托本人赔理道歉。

878 年前，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前往意大利的卡诺萨，向教皇格雷戈尔七世作 3 天忏悔，以换取教皇的宽容，并同教皇和解。由于此行意为低三下四的忏悔之行，因而，一些西方人把赫鲁晓夫的贝尔格莱德之行谑称为现代的卡诺萨之行。

这一天，贝尔格莱德并未因苏联人的到来而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城市里没有传统上欢迎共产党国家所应有的那种气氛，主要大街两侧既没有振备人心的口号，也没有迎风招展的彩旗。这似乎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故意表现出来的不卑不亢的态度。

贝尔格莱德机场上的情形则有些不同。在机场四周，一些穿战斗服的军人手持冲锋枪，警惕地站在那里。每个进入机场的人均要受到严格的盘查。

机场内的主跑道已经腾空，用来降落来自莫斯科的飞机。跑道边上，数十辆擦得铮亮小轿车一字排开。在先导车之后，是两辆专门为赫鲁晓夫准备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

在南面专为记者设立的地段里，来自全世界的数百名记者早已聚集在那里。摄影机、照相机早已就位。记者们个个兴奋异常，他们准备一显身手，通过自己的镜头和笔来向全世界报道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

在候机大楼的贵宾室里，铁托和南共其他领导人坐在大沙发上谈笑风声。

约摸快到5点的时候，铁托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提醒他，苏联的飞机就要到了。铁托站起身来，带领他的一班人，向停机坪走去。

这天应当是铁托感到无比自豪的日子。在以往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南斯拉夫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压力，忍受了无数指责和困难。但他们坚持下来了。今天，那个曾经用无数莫须有罪名将南斯拉夫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领导人要亲自来这里向铁托赔不是，想到这里，铁托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毕竟是他领导这个国家度过了这极其困难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场不见炮火硝烟的战争中，南斯拉夫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刻，他正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子走向停机坪。

今天，铁托刻意打扮了一番，他穿上了那套最能表现其身份及尊严的笔挺、洁白的元帅服。魁伟的身材配上这套军服使他看上去既是一位戎马征战的将军，又是一位无畏的角斗士。此时此刻，他虽不清楚赫鲁晓夫会向他说什么，但他已做了充分准备，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5点整，机场上空传来飞机马达轰鸣声。又过了十几秒钟，一架标有苏联民航字样的大型客机进入人们的视线。不一会儿，飞机已经对准了跑道，徐徐降落，贝尔格莱德的机场跑道稳稳地托住了它。

机舱门打开了，赫鲁晓夫那极具喜剧效果的大脑袋首先出现在

舱门口，随后是布尔加宁、米高扬、葛罗米柯、谢皮洛夫，以及一些穿元帅服的军人。

铁托迎上前去，同赫鲁晓夫互致问候。虽然人们不能揣测铁托和赫鲁晓夫面对面时各自的心理活动，但这两人毕竟握手言和了。

接下来便是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传统的欢迎仪式：奏国歌、检阅仪仗队。

当苏联人检阅完威武的南斯拉夫仪仗队，赫鲁晓夫发表了讲话。

南斯拉夫人在赫鲁晓夫面前摆放了一个立式麦克风。赫鲁晓夫穿着皱巴巴的夏装，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到麦克风前。他从上衣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讲稿，然后戴上眼镜，对着麦克风，念起了那份苏联共产党卑下的道歉书。

赫鲁晓夫首先对苏南关系中那段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深表遗憾，并表示要清除那段时间的一切痛苦。赫鲁晓夫并未把引发苏南冲突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斯大林，而是另找了替罪羊。

他说，当时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各种材料是由以各种欺诈手段钻入党的队伍中来的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和阿巴度莫夫（前安全部负责人）等人一手捏造出来的。

他接着向在场的人表示："我们深信，我们两国历史上乌云密布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我们方面，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排除实现我们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一切障碍。"

在整个讲话中，铁托的脸上一直看不到笑容，表情十分严肃。

在赫鲁晓夫讲话完毕之后，铁托对赫鲁晓夫说："好，用不着翻译您的话了，因为这儿的人全懂俄语。"说完，铁托把麦克风一推，粗鲁地一挥手，让俄国人上了等候在一旁多时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目送着车队离开了机场。

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当时的感受。

"我们踏上南斯拉夫国土时，受到了对一个外国代表团应有的一

切礼遇。但是，看不到有任何兄弟般的感情。领导和人民对我们都显得拘谨、小心。我被邀请在机场讲话。我的讲话是集体草拟的，因此，与其说是我的个人见解，不如说是苏共中央领导的意见。在我讲话后铁托说：'你看，我们不用把你的讲演翻译出来，在场的人都懂俄语。'我想他是在故意显示我们在总的气氛中已经感觉到的那种保留态度。"

"我必须承认，我对在机场上受到的冷漠接待有些失望，因为我知道这会助长我们自己的某些领导人反对恢复友好关系的情绪。"

赫鲁晓夫到达的当天晚上，铁托没有设晚宴款待远道而来的苏联客人。赫鲁晓夫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只好怏怏地呆在下榻的宾馆里。

5月27日上午，双方开始会谈。会谈的地点是南共召开著名的"五大"的地方——近卫军宫。

两国代表团成员进入会场，互致问候。双方落座后，赫鲁晓夫首先发言。

他说，苏南冲突完全是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冲突的扩大完全是贝利亚等人以及情报局的错误所致。他承认是苏联发动的冲突，理应由苏联来结束。他对南斯拉夫人表示，会谈将是顺利的。这场争论，既无战胜者，也无被战胜者。

赫鲁晓夫还告诉铁托，他来贝尔格莱德之前，已经把此行通报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西欧国家的共产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完全支持赫鲁晓夫的贝尔格莱德之行。

赫鲁晓夫发言之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泰波发言。此人的脾气有些暴躁，言语尖刻。铁托吸收他参加代表团是有用意的。

泰波不同意赫鲁晓夫将苏南冲突的全部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的说法。他质询苏联党魁："赫鲁晓夫同志，我不明白，我们两党之间的冲突全都归于贝利亚，好像是贝利亚诋毁我们的国家……，你们全都在谴责贝利亚，我要问，谁能保证不会再出现某个贝利亚呢？"

听了泰波的话，赫鲁晓夫真有些坐不住了。在场的人都看到他

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心里也暗暗称泰波为“小资产阶级份子”。

此时，铁托安然地稳坐在他的椅子上，扮演着国务活动家和调停者的角色，他绝无必要自身投入喧嚣吵闹之中。此刻，铁托虽然有些不快，但他还是让泰波把话讲完了，

为了不使谈判复杂化，泰波问“老头子”，是不是想把他撤出代表团，因为，他很可能会让苏联人暴跳如雷。

铁托命令他继续留下。铁托是搞平衡的大师，他需要性情暴躁的泰波。此人习惯于一会儿顶撞美国人，一会儿违拗苏联人，这也是一种显示独立的示威。

铁托提醒泰波，在斯大林的“控告信”中，他也是属于“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列的。他应当继续参加会谈。只是要记住，苏联人不能绝对保证不再犯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中出现的错误。甚至可以说今后肯定还会出现。全部的问题在于，现在应当尽力使之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应当展望未来，当然也不能忘了过去，但没必要老盯着过去不放。他们到贝尔格莱德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想纠正自己的错误。在目前这就足够了，为什么要求他们做现在做不到的事呢？我们应当支持他们，让他们沿着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对泰波的印象和评价。

“我记得同伏克曼诺维奇—泰波的谈话。他给我的印象是开诚布公和真情流露，尽管他强烈地直言责备我们，我还是喜欢他。当然他讲话时这样冲动得忘乎所以，我想是大可不必的……”

“我喜欢人家能这样透彻地表达阶级仇恨，但当伏克曼诺维奇—泰波以尖锐之词针对我时我确实感到讨厌。我在一次会上讲，‘如果你们再想使你们同某个国家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担任这个差使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泰波。’

铁托看了我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泰波同我相处得很好。我非常尊敬他。他的暴躁脾气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愤慨。

他之所以对我们讲了一些过分的话，也是由于这一点。讲得婉转一些，在南斯拉夫面临最严重的困难时，我们毕竟对他们缺乏一定的同情。”

27日下午，会谈继续进行。

赫鲁晓夫开诚布公地坦述了这次贝尔格莱德之行的艰难。他诉苦道："甚至我那身为共青团员的女儿也不明白我怎么能到南斯拉夫来。说实在的，我们并不确信在这里我们得同谁谈话。我们知道铁托，他是位老革命，参加过'十月革命'，在苏联呆过很多年。我们同他能找到共同语言，但我们不了解他的同事们。我们还知道兰科维奇同志，他是位工人，知道卡德尔，他曾在苏联学习，至于其他人，我们就不了解了。”

28日，双方进行第二轮会谈。

铁托首先发言，他也不同意苏联方面把苏南冲突的原因归咎于情报局错误的说法。他说，冲突是由许多问题引起的，其中，有些源于战争时期，例如雅尔塔会议及其决议中有关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铁托说，我们曾一直避免冲突，1948年间，我们曾向苏联人建议派一个小组来实地考察所有问题。甚至在冲突开始后，我们也采取措施不扩大冲突。我们是很能忍耐的，但这由不得我们。

铁托接着真诚而深情地说，"苏联没有比南斯拉夫更忠诚的朋友和盟友了，数十年来，我们的人民所受的教育一直是热爱苏联。看着老朋友反目为仇，我们比你们更难受。”

铁托责备苏联人说，冲突带给南斯拉夫的不仅仅是道德损失。冲突开始后，"你们取消了所有合同，而这些合同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完成5年计划。我们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你们不仅不给援助，还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试图调整同西方的关系。”

铁托发言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先后发言，他们都

对1948年以来的苏南关系感到痛心。但他们在发言中却极力捍卫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立场，并再次把引起苏南冲突的主要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南共领导人对这番话的反应。

“我们当时还是死去的斯大林的俘虏。甚至在审判贝利亚之后，我们还对党员和人民做出不正确的解释，并将全部（罪过）推到贝利亚身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让人们不责备斯大林，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編袒罪犯。”

“我第一次感到我们立场的虚伪性是我们去贝尔格莱德同铁托谈话的时候。当我们把罪责推到贝利亚身上时，他们全都笑了起来，并反驳我们。这惹怒了我们。我们展开了大辩论。后来，我公开捍卫斯大林，反对南斯拉夫人。现在清楚了，这种立场是不正确的。这是没有意识到要彻底揭露罪行，以使类似的问题不再出现在我们党内。”

几天的会谈下来后，大家都感到很累。为了让苏联人放松一下，南斯拉夫方面为苏联代表团组织了一次去全国各地访问的旅行。

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在城市和乡村受到的接待仍然是不热烈的。街上夹道欢迎的人很明显不是自愿出来的，他们是组织起来的党员。我不是说他们怀有敌意，但我不能说他们是非常友好的。他们呼喊的口号大都是：‘铁托，铁托，铁托万岁！’

“但是，我们在全国旅行时，高兴地看到南斯拉夫人民以相当崇敬的心情怀念为把南斯拉夫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出来而牺牲的我国战士。那些牺牲的我国烈士们的墓地保持得很好，还竖有刻着他们名字的墓碑。”

当8天的访问结束时，苏南双方总算就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6月2日，铁托和布尔加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上签了字。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熟悉的《贝尔格莱德宣言》。

《宣言》正式承认南斯拉夫关于走向社会 主义有不同道路的立

场。两国政府一致肯定：在两国关系中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相互平等。两国保证，相互尊重并且不以任何（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理由干涉它国内政。因为国内的政治结构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不同的具体形式问题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考虑到过去6年中两国关系受到严重破坏，两党的关系及国际关系受到损害，苏、南两国政府决心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发展未来的关系，并且以宣言中列举的原则为出发点，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

双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创正常谈判的局面，在此基础上调整并保证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加强和扩大两国的经济往来及合作；

双方准备缔结文化协定，发展文化联系。

随着《宣言》的签署，从1948年6月以来开始的苏南冲突到此暂告一段落。

3. 老谋失算

铁托和南斯拉夫曾公然反抗活着的斯大林，并取得了胜利。斯大林的继承人现在戏剧性地承认了这一点。斯大林过分自信，而且总是估计错误，所以，他的行动总是不得力，老是为时过晚，从而帮助南斯拉夫人取得了胜利。

最初，斯大林认为动一动小姆指，铁托就会完蛋，没想到，南斯拉夫人更忠于铁托而不是他。接着，斯大林又很不高明地实行经济封锁，结果发现西方意外地愿意“保存铁托”，而不要求作出根本不可能妥协的政治和思想上的让步。最后是迷信于武力威胁，但那也太晚了，因为，当时仍然无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保护伞已悄悄地、有效地扩大到了南斯拉夫。

苏南和解了，斯大林失败了，这是他在重大政治冲突中的一次重大失败。他未能损伤南斯拉夫的一根毫毛，也没能贬低这一胜利

在东欧及世界上的重大意义。世界上第二强国被一个小国弄得公开出丑。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国被迫屈服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对苏联控制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和党的思想政治上的仲裁地位提出了挑战。如果说南斯拉夫能真正摆脱苏联而独立，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能得到苏联的同意，那么别的国家又为何不能呢？

4. **锦上添花**

1955 年 5 月以后的 17 个月中，铁托被展现在眼前的美景弄得眼花缭乱：整个苏联帝国将转而采取南斯拉夫的原则，他自己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1945—1947 年的梦想以一种新的，更为美妙的形式复活了。到 1956 年夏天，波兰和匈牙利一直在激烈地讨论工人委员会，以及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其他方面；曾再次担任情报局官员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已在走南斯拉夫 5 年前所走的道路……

当然，最令铁托感到振奋的还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在会上所做的“秘密报告”。

1956 年 2 月 24 日夜到 25 日凌晨，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62 岁的赫鲁晓夫走上了苏共“二十大”大会主席台，他面对在场的 1436 名大会代表，以他那固有的热情奔放而且十分自信的表情，发表了战后共产主义时期共产党最重要的一篇声明。

可能是出于要在苏联残酷的政治环境中一劳永逸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及认识到要想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的世界上生存下去，苏联共产党必须纯洁自己和恢复活力等一系列原因，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及其实践作了全面的“控诉”。他用越来越激烈的口吻，列举了一件件“斯大林时代的罪行”，以致使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变了样。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搞“大规模镇压”和“独裁专制”；他是“迫害狂”，他屠杀他最亲密的同事，制造清洗和审判案使几十万人丧生；谴责他迷恋于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制造他战时“军事天才”的神话，实

际上他是个懦夫，几乎使苏联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他同铁托的灾难性的破裂，还列举了一长串的其他罪行、不法行为和错误。

代表们屏息倾听，惊喜交集。讲演者自己也被自己滔滔不绝的辩才所陶醉，说了些事先没准备讲的话。但在这些即席发表的激烈言辞中也有赫鲁晓夫的深谋熟虑：人们对已故领导人的憎恨和恐惧长期积郁在胸中，要求有机会倾诉。第一书记把这些话讲出来了，这自然是加强自己权威再好不过的方法了。此外，赫鲁晓夫显然希望以此示意西方：他已断然背离了斯大林的道路。借以博得好感。报告长约3万字，外加从秘密档案中摘录出来的30个附件，使赫鲁晓夫从深夜一直谈到天亮。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斯大林荒谬的反铁托政策。

“斯大林的任性不但表现在决定国家的内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处理苏联的国际关系方面。

党的七月全会仔细研究了同南斯拉夫发生冲突的原因。斯大林在这里起了不光彩的作用。南斯拉夫问题中没有通过同志式的党内讨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并不存在扩大事态的充分理由；完全有可能来阻止同那个国家关系的破裂。这当然并不是说，南斯拉夫领导人没有错误或者没有缺点，但是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极端夸大了，其结果就同一个友好国家断绝了关系。”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回忆起苏联和南斯拉夫间冲突开始被人为地煽动起来的那些日子。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我被请去见斯大林，他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一封信的副本问我，‘你读过这个吗’？

没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我伸一伸小拇指，铁托就要完蛋。他一定会垮台。’

我们为‘伸一伸小拇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句话反映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就是这样干的……

不管斯大林伸的是他的小拇指还是大拇指，而且凡是他能使出来的招数他都使了，铁托还是没有垮台。为什么？道理就是，在我们同南斯拉夫同志不和这件事上，铁托后面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作后盾，这个民族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中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他们支持了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仔细审查了南斯拉夫的问题，并找出了适当的解决方法，这得到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人民的赞同……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关系是符合社会主义整个阵营的利益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秘密报告"给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东欧共产党人以巨大的冲击。虽然早些时候一些东欧国家的动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苏联式政策的不满，但全面揭露旧体制的弊端，甚至攻击领袖人物，仍出乎他们的意外。

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共和国总统波莱斯瓦夫·贝鲁特率领波共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后来，他与匈牙利的拉科西一同被邀请参加听取"秘密报告"。报告后，赫鲁晓夫要贝鲁特表态，贝鲁特被这种突然袭击弄得不知所措。后来，他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说，"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此后，他精神抑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三个星期后（3月12日），他在莫斯科猝然去逝。

不同于贝鲁特，贝尔格莱德对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表示欢迎和满意。南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衷心支持这种决定"。

苏共二十大闭幕的一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将"秘密报告"的副本交给了南斯拉夫人。

那是在苏联领导人为欢送即将离任的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维季奇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维季奇跟前，同他碰杯。突然，赫鲁晓夫从皮夹克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大使先生说："请把这个转交给铁托同志，他会有兴趣读完它的。我认

为，你们南斯拉夫人写不出比这更好的报告了。”

1956年3月24日，南斯拉夫新大使米楚诺维奇到了莫斯科。据他说，临行前，铁托召见了他。铁托叮嘱他，“不要同俄国人发生冲突和争吵。但在大事大非问题上也不要让步。”

新大使到任一个星期后，赫鲁晓夫接见了他。两人海阔天空地谈了4个小时。米楚诺维奇代表铁托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有历史意义。南共坚决支持二十大确立的内外方针的基本方向。米楚诺维奇代表南共领导感谢赫鲁晓夫将“秘密报告”的文本交给南共。他说，这个报告已在南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宣读过了，大会一致认为这是有深远意义的报告。

“我们认为，报告不仅告诉人们有关斯大林的真相，而且彻底同过去决裂，开辟了苏联及全世界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国内及整个东欧开始了非斯大林化运动。

4月18日，苏联《真理报》宣布“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解散的消息。

两天后，南斯拉夫外交部秘书处发表声明，对17日情报局宣布解散表示欢迎。同时认为，情报局在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是消极的。

19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发表文章称，情报局的解散“有利于社会主义和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表示不同意情报局公报中对这个组织的自我评价。

在波兰，“不同社会主义道路”的辩护士哥穆尔卡和斯波哈尔斯基几乎被 同时释放出狱；

在保加利亚，保共中央书记日夫科夫声明，责怪 南斯拉夫是没有道理的，并给已处决的“铁托分子”科斯托夫恢复了名誉。

……

5. 不是尾声的尾声

大约在赫鲁晓夫的贝尔格莱德之行的 1 年后，铁托总统应赫鲁晓夫之邀回访了苏联。这是进一步改善苏南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这是1946 年以来铁托第一次回苏联。苏联方面像欢迎当代英雄和衣锦还乡的游子一样欢迎铁托。为了表示诚意，在铁托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从外交部长的座位上拉了下来，因为他在 1948 年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信上签了名，也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关于“加强同南斯拉夫兄弟人民友好与合作”的决定。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楚诺维奇称莫洛托夫的下台是苏联送给铁托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礼物”。

与铁托同行的有他的夫人约婉卡及大批随员。除了莫斯科之外，铁托一行还访问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黑海疗养地索契、诺沃俄罗斯克等地。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及米高扬等苏联最高级领导人全程陪同铁托。在 6 月 5 日举行的宴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称铁托是“共产党人——列宁主义者”。

苏联国家元首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为他曾按斯大林的指示不得不发表反南斯拉夫的讲话向铁托总统表示道歉。这位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老泪纵横，他对铁托说，“我是个蠢坯，我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被迫讲了许多蠢话，我羞愧难当……请您原谅我。”

铁托似乎被此情此景感动了，当他在列宁格勒发表演讲时，信誓旦旦地对在场的苏联领导人及群众说：“万一发生新的战争，南斯拉夫将站在苏联一边作战。”

6 月 20 日，双方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中的格奥尔基宫里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谈纪要及最后的联合公报，即《莫斯科宣言》。

在《莫斯科宣言》里，1 年前在贝尔格莱德确定的路线得到了详

细的叙述及肯定。

《宣言》说，贝尔格莱德宣言中宣布的各项原则在两国的合作中正日益得到贯彻执行。贝尔格莱德宣言发表之后两国的合作及两国关系总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之间政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接触，已经为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有鉴于此，继续发展两党间已有的接触是必要的。

《宣言》说，双方认为，国家不同，情况各异，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与形式问题上，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的倾向，都是不能容忍的。苏南两国认为，双方的合作应当以完全的自愿和平等为基础，以友善的批评和两党间有争论的问题同志式地交换意见为基础。

双方认为，以上述原则为基础进行的合作，将有利于两国人民及其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做正是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之间总的友好的事业做出贡献，这对世界和平及整个人类的进步也将同样是有利的。

《莫斯科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自1948年以来的苏南冲突划上了句号。冲突虽然过去了，但教训是沉痛的。

苏南关系的破裂，以及1956年后苏南之间的又一次冲突，主要原因在于苏共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态度对待南共和南斯拉夫。苏联以“解放者”自居，把南斯拉夫为维护本民族利益和独立自主的正当作法诬蔑为“盲目的妄自尊大”和“民族主义”。至于说南共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更是无稽之谈。苏共对南共的态度是共产国际后期错误的重复。

不知是俄罗斯人的特性还是俄罗斯历史的传统，就在《莫斯科宣言》公布后的几个月，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中、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态度上，一再重犯斯大林式的大党、大国的极端错误，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感情，破坏了苏联与这些国家的正常关系，并不断削弱国际共运的力量，极

大地损害了共产党、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导致1989年以来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历史原因。

第二章

德国统一日的由来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日志

如果你有幸在1990年以前去过联邦德国，而且，恰好是在某一年的6月17日这一天去逛商店、或去图书馆、或去拜访政府机构，你是会吃“闭门羹”的。说明牌会写着：“节日，休息！”

翻开联邦德国的旧日历，6月17日这一天的的确确写着：德国统一日。而1990年10月3日，才是明明白白的德国统一日，对此，德国人无人不晓，那么，6月17日又从何谈起呢？还是让我们共赴柏林，去探讨它的由来吧。

沿着西柏林最长、最宽阔的“6·17”大道一直向东行，途中你会看到一座广场，广场中心耸立的胜利柱上，站立着一位身披圣光的女神，她的金臂指向东方，引导人们再一直向东。这时，展现在你面前的是柏林象征之一，勃兰登堡大门的背景。昔日，这儿就是东西柏林的分界线。如今，一切障碍都已荡然无存。你可以穿过勃兰登堡大门，穿过历史的隧道，去追寻那发生在40年前的事情。

1953年6月17日，在东柏林，在民主德国，的确发生过并不是传说的事件……

一、历史，在东柏林拐弯

1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翻开德国现代史，不难发现：德国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伴随着德国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

1919 年，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熄灭，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即把战争遗留下来的全部负担转嫁到德国百姓的身上。贫困和饥饿迫使德国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罢工反抗：

1919 年 9 月 18 日，20 多万柏林五金工人举行罢工示威，要求增加工资。

1920 年 1 月 13 日，数千名柏林工人在国会大厦前示威，反对新宪法抹煞了工人选举企业工人委员会的权利。结果，死亡 42 人，伤 105 人；

同年 3 月 13 日，在柏林及其他主要城市，举行了工人总罢工，反对“卡普暴动”……

1923 年，通货膨胀危及到德国工人的生存，工人们不断地以劳资谈判、罢工等形式，要求提高工资，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利。

1928—1929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德国。德国工人的生存再一次受到严重威胁。历史，又一次记载了柏林工人浩大的示威之举：

1928 年 5 月 1 日，柏林工人举行自德国十一月革命以来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929 年 5 月 1 日，柏林工人不顾当时政府的禁令，仍举行游行

示威。结果造成死亡27人，重伤35人。

即使是在阴森恐怖的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工人的反抗意识也从未泯灭过。

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德国工人可以称得上是老罢工运动员了。从1918年至1945年两个德国的产生，他们从来放弃过以罢工、示威游行争取自己合法的权利。

2

1949年10月3日，在昔日的德国东部、当时的苏占区诞生了民主德国。

这块土地养育了昔日参加过惊心动魄斗争的老一代工人阶级，他们如今已成为新时代和新国家的主人；这里还有经历过二战洗礼的前职业军人，他们也进入了民主德国工人阶级的行列，同样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这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组成了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同时也是叛逆的生力军。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新生的民主德国，虽然在政治上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在经济上却未能幸免于危机和侵扰。战后的恢复期尚未结束，民主德国的新生政府便在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1955年）。

五年计划强行规定：到1955年，工业生产总值应提高到1936年的一倍；农业的每公顷产量应比1950年平均提高25%；国民收入总值应比1950年提高16%以上。

为实现这一空想计划，民主德国发动了一个“生产积极分子运动”，工人们在食品得不到保障的艰苦条件下努力地劳动。但到1953年，不仅生产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各种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

工业生产率低、居民生活必需品没有保障、工人和知识分子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农业欠收、向苏联偿还战争赔款、专业人员外流

……

困难和矛盾迫使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作出了一项不得人心的决议：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提高10%的劳动定额。他们想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达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

1953年5月28日，当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宣布提高劳动定额的决议时，产业工人们当即表示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竟收到了小小的效果。

1953年6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发表决议，正式承认：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政府过去曾犯了一些错误，这在一些规定和条例中都有所反映。例如：重新调整食品供应量，接管破产的农业企业的条令，实行特别征购措施，以及严格提高税收标准等等。同时，也忽视了个体农民、个体商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等平民阶层的利益。另外，在实施上述规定和条例过程中，一些地区、县和地方政府也曾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致使许多人逃离共和国。……"

"6·9"政治局决议暂时平息了工人们的不满情绪。他们静静等待着部长会议对劳动定额重新作出修改的决议。

7天，东柏林的工人们在沉默，在等待。

危机并未过去，爆发前的沉默笼罩着东德……

3

此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部却没有沉默。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正在悄悄进行。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了。无疑，这为那些早就想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推行新方针的人，带来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也有目的地对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施加影响，以迫使其改变以往的方针。

然而，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早在1952年7月的第二次党代会上，乌布利希就提出了一个民主德国发展方向的新方针：建设社会主义。随之而来的是：大力发展重工业，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社制，解散5个洲的行政机构和议会，采取行政办法提高劳动定额。

斯大林的逝世并未能改变乌布利希的内政方针。在恶化的经济形势面前，乌布利希不得不于4月向莫斯科的新领导人写信，请求“给予民主德国名副其实的支持”。

4月15日，莫斯科的回信带来了好消息，答应提供那种名副其实的支持，但同时又向乌布利希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缓和对劳动者的强硬路线。

乌布利希在4月16日的《新德意志报》上坚决地进行了反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英明领袖斯大林”的指示，“取消落后的劳动定额”是最重要的任务。

一意孤行的强硬方针使民主德国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日渐增长，这大大影响了莫斯科新领导人马林科夫等正在筹划的新外交政策。他们准备放弃民主德国，以换取阻止联邦德国进入西方军事联盟，在欧洲中部建立一个不使苏联受到军事威胁的中立的德国。

1953年6月，莫斯科终于失去了对民主德国党的领导人的耐心。为了不失时机地推行新的德国政策，谢苗诺夫被任命为驻东柏林的全权代表。谢苗诺夫带来了克里姆林宫的旨意：改变已在民主德国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硬方针，平息群众中正在增长的不满情绪。

以乌布利希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被迫作出了“6·9”决议。局势似乎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主编赫恩施塔特提倡人们对党进行批评，并在6月14日的《新德意志报》上公开刊登了题为“是扔开大棒的时候了”的批评文章。文章

大胆地指出：党和政府不应该把新定额强加于人。新定额只有在人们认为有必要实施后，才会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否则将事与愿违。党的领导应抛弃“虚伪的乐观主义”和“骄傲自大”的做法。

政治局委员、民主德国安全部长蔡塞尔也与苏联同行贝利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随时准备撤换乌布利希总书记的职务。赫恩施塔特还带头起草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新纲领，并提出了一份党内改革的草案，酝酿着政治局的新人选。

一个领导层更迭的行动正在筹划……

一项新的德国和欧洲政策正由莫斯科周密地推行……

一场骚动也正在孕育……

谁料想，一颗火星竟引燃了一场社会大爆炸。历史，在东柏林来了个急拐弯。

二、血溅菩提树

1

1953年6月16日清晨，人们尚在沉睡。

各家报社的送报车已开始将一捆捆报纸堆放在一个个报亭前，售报人揉着睡意朦胧的眼睛，漫不经心地打开来自不同报社的报纸，把它们排列整齐，等待着第一批读者的出现。

天渐渐亮起来，工人们潮水般从各个方向涌向工厂，涌向建筑工地。

途经报亭的工人们买下各自感兴趣的报纸，边走边看。一些人读着读着竟怒骂起来。工人们争相传阅那份引人发怒的报纸：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机关报《论坛报》。

“关于提高定额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全力以赴地贯彻下去。”

这是工会联合会书记雷曼在《论坛报》的头版文章中的话。它是引爆炸弹的火星。

工人们被激怒了。他们在战后的废墟上和未曾开发的荒僻地区进行艰苦的劳动，几年来，他们忍受了各种困苦，住在简陋的木棚中，没有足够的食品供应，没有业余生活，没有温馨的家庭和女友的陪伴……而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会主席不仅没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反而硬要他们执行这种不近人情的劳动定额。

已是上午，太阳仍未露面。位于东柏林市中心的几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们，首先拉起了“我们要求降低劳动定额”的横幅。

罢工和游行开始了。

最初300多人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不少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当游行队伍到达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大厦前，竟然汇集了1万多名工人。

他们没有事先的精心策划，也没有罢工组织，但他们的要求却非常现实和一致：

充分保证罢工发言人的人身安全；

取消提高的劳动定额；

采用适应民主德国价格的工资标准，降低食品和消费品的价格；

立即重新实行工人上下班和车票减价75%的规定。……

工人们要求乌布利希和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亲自出来解释，并撤回提高定额的决议。部长会议大厦的铁门紧闭着，无情地锁上了沟通领导与工人们心灵的窗户。

迫于工人们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在下午终于作出了一项决议：废除提高劳动定额的决议。决议是部长会议发言人通过广播车向工人们传达的。

但此时，工人们已经厌倦了中央政治局自相矛盾的言行。他们高呼：明天举行总罢工！

总罢工！喊声响彻柏林上空。喊声也传到联邦德国美占区。美占区电台在下午 4 点 30 分当即详细报道了东柏林工人罢工的消息，并详细地例举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电波传得很远……

民主德国其他城市的工人们听到总罢工的号召，便积极准备起来。柏林工人们提出的那些经济要求，也正是他们想要得到的。

明天，等待罢工工人的会是什么呢？

2

1953 年 6 月 17 日，凌晨，东柏林。

天，灰蒙蒙的，下着毛毛细雨，凉气袭人。工人们从漫长的黑夜中苏醒过来。

上午九时，雨突然大了起来。然而，倾盆大雨也无法阻拦工人们罢工的势头。东柏林的产业工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不约而同地涌向东柏林市中心的几条主要街道。他们排着队，呼喊着政治口号，在行进途中表现出良好的纪律性。

行进中的罢工队伍不断有同情者，一般群众，妇女和少年加入，势头越来越大。单纯的经济罢工已升华为政治示威。游行者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政治要求：

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

在整个德国实行自由选举；

取消占领区边界；

撤走所有的占领部队；

取消警察部队；

释放所有政治犯；

遣返所有战俘；

取消对人民的监视……。

游行队伍已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井然有序。目标，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宣传机构，警察局，占领区边界，监狱。

……

火星已变成熊熊大火。大火烧毁了报纸、宣传资料、斯大林像、警察局、牢房。政治犯，纳粹战犯在混乱之中逃窜。

纵火、抢劫、冲突在中午时分发生了。局势突变。

“十万火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请求苏联军队出面干涉。苏联方面在犹豫。

苏联驻东柏林全权代表谢苗诺夫迟迟不作决定。谢苗诺夫清楚地知道：用苏联军队来镇压民主德国的示威群众，意味着苏联新领导人计划实施的德国政策的流产。然而，如果任这种局势继续恶化下去，无疑将会危及到民主德国的现任政权。苏联在战后精心扶植的民主德国将会毁于一旦。谢苗诺夫还清楚地知道：只有苏联能拯救这个局面。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某些领导无法忍受苏联方面的无动于衷，他们指责苏联人是：“没有骨气的朋友”。骂声未落，苏联驻民主德国军队指挥官已决定出兵了。

13点左右，大雨初停。但混乱中的人们却听到了隆隆雷声。雷声来自苏联坦克！雷声所过之处，留下的是血泊中的亡灵。

东柏林进入紧急状态。苏联军队同时在民主德国的167个县实行戒严，并立即投入了15个师的兵力。

仅仅几个小时以后，组织得很松散、没有统一罢工领导和具体行动纲领的游行示威活动被镇压下去了。东柏林恢复了平静。罢工的工人、游行示威者、旁观者以及那些“右翼”破坏分子转瞬间便销声匿迹了，只有那些不幸的牺牲者仍静静地躺在菩提树下那潮湿的马路上。

4名人民警察、2名旁观者、19名示威者。这是事发后民主德国安全部公布的死亡统计。

3

东柏林平静了，但民主德国其他城市的罢工示威活动刚刚进入高潮。

6月17日，莱比锡、德累斯顿、哈勒、马格德堡、耶拿和勃兰登堡等工业城市，同时举行了罢工集会。然而，各城市的工人并没有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他们只是在单纯地发泄对经济政策的不满，要求降低劳动定额和食品价格。

6月18日，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仍在进行小规模的罢工活动，甚至个别城市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罢工队伍。他们就这样坚持了4天之久。德国工人具有勇于反抗的传统，即使是在苏军宣布了戒严令之后，他们也不愿放弃这个传统。代价是沉重的：31名示威游行者在戒严的几天内丧生。

全国272个城镇卷入了这场罢工运动，30多万群众参与了示威活动。这是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事后公布的数字。

三、清洗，在秋后开始

1

6月下旬，是柏林的好季节。阳光驱走了连绵阴雨，毫不吝啬地洒在柏林古老的建筑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东柏林中心大道两旁挺拔的菩提树散发出阵阵幽香。

然而，公园里，绿茵上，不见酷爱阳光的德国人；闹市区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食品店购物的家庭妇女也没了往日说常道短的兴致，个个表情肃穆。

人们并没有忘记几天前发生的事，人们也不会对那些不知姓名的死难者无动于衷。一切都在几天前发生过：罢工、示威、混乱、警察、苏军、坦克、流血、死亡……

此时此刻，关押、审判、清洗乃至死刑的判决才刚刚开始。

从6月17日到戒严令宣布后的几天里，有成百上千的罢工示威者被关进了监狱。西方的报道说：当时共有1383人被迅速地判了刑，其中4名首犯被判无期徒刑。与死刑犯相比，他们已是幸运儿。

死刑判决是在不同的法庭上进行的。

1953年6月下旬的某一天，17名参与6月17日罢工示威活动的德国人被宣判死刑。他们中有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老工人，有经过二次大战的前职业军人。他们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企图颠覆国家的暴乱分子。

另一日，3名民主德国的人民警察被处决。罪名：参与了反革命暴动。6月17日，当他们受命维护秩序时，竟在那些游行示威队伍中发现了他们的兄弟和朋友，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身不由己地也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

军令如山倒，但18名苏联官兵却没有被军令所吓倒。面对手无寸铁的德国工人，他们没有开枪。在他们看来，德国法西斯分子已被消灭了，眼前站着的是兄弟加朋友的德国工人，他们在“战场”上第一次当了逃兵，向天空鸣放了空枪。但长官的子弹无情地穿过了他们的心脏。6月27日，在东柏林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突然传出了一阵枪声，这18名官兵永远地留在了异邦。

死刑的执行很容易，然而……

2

清洗，尤其是党内的清洗，却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反复交待、反复讨论、反复批判，直到免职、开除，甚至软禁、关押为止。

“6·17”事件不仅打乱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更迭的部署和

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德政策步骤，而且还使得民主德国的政局朝着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乌布利希的政权不仅没有被动摇，反而更加巩固，并重新得到苏联方面的坚决支持。

1953年6月7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部的气氛异常紧张，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拉开了序幕。

东柏林事发后，政治局内的一部分人当即表示极大的遗憾，他们感到作为“集体领导”中的一员，未尽到职责，以致事态发展为流血冲突。他们建议党内应作自我批评，检查以往的错误。有些人甚至大胆地建议乌布利希放弃个人独裁政治，退出中央政治局。

1953年6月25日，“6·17”事件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召开。会上，政治局候补委员霍恩施塔特按既定方针提出：政治局工作必须由集体领导，请乌布利希同志放弃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在场的其他几位委员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乌布利希见状，便敷衍道：“霍恩施塔特同志，这也是我原本的意思。我非常赞同集体领导。”在场的多数委员竟相信了他的话，他们乐观地认为政治局领导人的更迭计划可以付诸实施了。

他们哪里知道，来自莫斯科的冷空气正缓缓侵入民主德国。就在“6·17”事发后的第二天，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便被秘密逮捕了。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撤销贝利亚的一切职务，并将他的案件提交法院审理。6月底，消息已传到柏林。

7月2日，政治局继“6·17”事件之后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气氛异常。苏联方面派米洛什尼琴科出席了会议。显然，贝利亚的被捕，预示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内反对派政治生涯的结束。

7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刚结束，格罗提渥和乌布利希便匆忙飞往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几天后，他们带着苏联的“上方宝剑”，胸有成竹地返回了柏林。

“贝利亚是此次民主德国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他的投降主义政策，纵容了骚乱者的行为。当事态恶化时，他的国家安全部门

表现得软弱无能，并放弃了军队的全部工作，使人民的敌人乘虚而入。……”

一贯嗅觉灵敏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长蔡塞尔此时已感到自身不再是那么安全了。他和霍恩施塔特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被指控为：“结成了反党集团”。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霍恩施塔特邀请蔡塞尔去家里坐一会儿，这是他们共事4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私访。蔡塞尔神色不安地瘫在沙发里。霍恩施塔特递给他一杯殷红的葡萄酒。蔡塞尔连饮几口，酒的香醇没能使他兴奋起来。

“6·17”事件后，他们需要找替罪羊。蔡塞尔喃喃道，那神情分明告诉霍恩施塔特：“这羊就是我们呀！”

霍恩施塔特沉着地说：“嘿，别那么沮丧。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忠于党的。……”霍恩施塔特试图说服蔡塞尔，也是在为自己申辩。

“干杯！”他们不知为了什么而干。

7月24—26日，召开了第15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对于党内反对派来讲，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会议作出第一次决议：

免去国家安全部部长蔡塞尔和《新德意志报》主编霍恩施塔特中央委员的职务；开除司法部长、中央委员费希纳的党籍；免去阿克曼、廷德雷茨基和施密特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决议中明确指出：

霍恩施塔特和蔡塞尔进行了失败主义的、旨在破坏党的统一战线的反党宗派活动；费希纳利用职权保护法西斯主义的挑衅分子，并对公民进行的无数不公开的严厉处罚负有责任，费希纳是党和国家的敌人；阿克曼、廷德雷茨基和施密特参与了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

霍恩施塔特回到报社的办公室，默默地收拾私人物品。部下们悄悄地从门缝中窥视着主编的一举一动。他就这样简单地、从容地、

永远地离开了《新德意志报》。

从 50 岁告别政坛到 63 岁告别人间，霍恩施塔特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辩护："我是那样地坚信和忠于党，我怎么会去结成反党集团呢！"

霍恩施塔特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党要给他扣上这个罪名。霍的女儿都为父亲的这种忠诚所感动了，她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党如此忠诚不渝。

处理尚未结束。

1953 年 12 月 23 日，贝利亚等 7 人被处决。他们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组织反苏阴谋集团，妄图夺取政权，重建资产阶级统治的罪行"。

1954 年 1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也作出最终判决：开除霍恩施塔特和蔡塞尔的党籍。

同年 6 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向全体党员代表揭露"霍恩施塔特——蔡塞尔反党集团"的罪行，批判了他们要求"革新党""更换党的最高领导"的言行，并指控他们准备在政治局内制造政变和党内暴乱的罪行。

民主德国第一代党的领导核心是由政治局委员 9 人、政治局侯补委员 6 人组成的。1953 年的事件提前结束了其中 6 人的政治生涯。

此后，1950 年上任的专区一级的领导人中有 62%被撤换；县一级的领导人中有 71%被撤换。1954 年底，党内领导层的清洗基本结束。

普通党员的清洗最为简单，开除了之。1953 年底，竟然开除了一大批党员，其中不乏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加入德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至此，党内自上而下的清洗宣告结束了。应该说，这是一次最为彻底的清洗。然而，却有一个"漏网"了。他就是贝利亚派驻民

主德国的全权代表谢苗诺夫。

谢苗诺夫如何得以在这场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幸存下来，至今仍是个谜。

四、功罪，谁人评说

1

无法改变的，是历史。可以改变的，是认识。

几十年来，6月17日拥有了许许多多的前置词和定语，人们赋予它那样多、那样鲜明的感情色彩：事件，反革命暴动，人民起义，法西斯分子的挑衅，德国统一日，未遂反革命政变，骚乱，阴谋颠覆活动……

就在事发后不久的几天内，各方都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

6月23日，西柏林人当即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追悼会，悼念几天前在东柏林事件中被枪杀的游行示威者，并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那条大道命名为“6·17”大街。

6月2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同各地群众一道举行了示威游行和集会活动，以“回敬”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间谍活动。示威口号就是“拥护党和政府的新方针”、“加强工人和政府及党的团结”等。

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积极表示支持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方针政策，抗议法西斯分子的挑衅行经。

7月24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15次会议，称6月17日事件是西方策划的一场反革命暴动。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昂纳克在他后来的自传中写道：

"社会主义的敌人利用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开始了他们策划已久的、被帝国主义情报机构和特务中心操纵的反革命政变尝试，但是，他们力图制造的'总罢工'没有发生……

"1953 年 6 月 24 日，我在波茨坦——巴贝尔斯贝格的'卡尔·马克思'机车车辆厂，向工人们揭露了未遂反革命政变的原因和目的。……"

关于 6 月 17 日，民主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几乎都千篇一律地写着：

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利用 1953 年 6 月 9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修改某几项经济措施的机会，于 1953 年 6 月 17 日在民主德国导演了一场未遂反革命暴动。

在民主德国，这段历史就这样沉寂了 30 多年。只有在每年 6 月 17 日的晚上，总有一些没有忘记发生在 1953 年这一事件的人，在东西柏林的边界地区燃起焰火以示悼念。

时代的车轮驶入 1988 年，苏联的改革之风也吹到了民主德国。有些人开始重新考虑党在几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是否留有遗憾。虽然民主德国第二代党的领导仍未改变"6·17"是一场反革命暴动的观点，但党的刊物却在"6·17"事件 35 周年之际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承认：当时党是犯了错误，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于事件的性质没有变，但原因已不仅仅是……

2

位于东柏林市中心的柏林歌剧院，是德国古典音乐的象征。以往，在这座音乐殿堂里演奏的是举世闻名的古典歌剧或曲目。然而在 1990 年 6 月 17 日，距两德统一还有最后的 100 天时，歌剧院内汇集了两个德国议会的 1 千名议员。他们正在这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举行礼拜仪式，共同纪念 1953 年的 6 月 17 日。

有谁会想到，37年后的这一天，两德政治家会聚集在这座辉煌的音乐殿堂里，第一次为“6·17”唱出了同一个音符。37年来，民主德国的政治家们终于对“6·17”发表了不同于以往的言辞。民主德国人民议院第一任女主席波尔毫不隐晦地说：

“在6月17日的历史真相被当权者隐瞒了37年后的今天，人们可以在民主德国第一次自由地、符合事实地纪念这个日子。我们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同联邦德国议院的议员们共同纪念这一事件，也是第一次。1989年打开了关闭两德几十年的大门，并实现了1953年6月17日工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所提出的愿望：自由和自决权。……”

上帝的使者，民主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基督教教区主席施托尔佩，也以一生中不曾经历过的方式为那些死难者祈祷：

“1989年10月9日，民主德国人民完成了1953年6月17日没有成功的事业。在冷战时期，人民的尝试以几乎500人的死亡而宣告结束。在今天欧洲缓和时期，民主德国的和平革命终于成功。民主德国的德国人在1989年获得了父辈们在1953年6月没能得到的自由的生活条件。”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再一次重复着前任们的话：

“1953年6月17日发生的事情，是为了自由和重新统一。……”

斗转星移，天翻地覆，40年过去了，那些经历过“6·17”事件至今尚活在人世间的人们，是否终于得到了某种慰藉呢？

第三章

匈牙利的悲剧

——纳吉沉浮录

“我必须承认，纳吉及其周围的人不想搞反革命。”

——卡达尔·亚诺什，1989年6月

1956年是匈牙利人大喜大悲的一年，也是匈牙利人的希望与失望交相映错的一年。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中旬举行的苏共20大会，做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报告犹如一般清新的春风，吹走了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方面的严寒，匈牙利人也从中倍受鼓舞。一个萦绕在匈牙利人心中数世纪之久的梦想，一个使匈牙利人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民族灾难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换来的历史誓言，再次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空回响，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自由的匈牙利。然而，在当时那种大国纷争、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处在世界敌对力量的冲突焦点之上的中欧小国，在追求这个梦想方面又怎能有多大的余地？由此，这个几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异族包围之中的民族在1956年秋季再次经历了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的中心人物——纳吉·伊姆雷则更是成为国际格局棋盘上的

一个听人摆布的棋子，成为大国政治家们幕后交易的一枚砝码。

屹立在英雄广场上的匈牙利人的列祖列宗们辛酸地记住了历史的这一页。

一、几度沧桑，几度沉浮

>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有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信仰；也许当你说出了这些真理，你的头颅会落到断头台上。”
>
> ——裴多菲·山陀尔

1956年2月，克里姆林宫。外面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而宫内的大会中心却春意盎然。参加苏共20大的代表们情绪激昂，他们用一种愿意信又不敢信的眼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报告人，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发言。

他就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此刻，他正作着长篇秘密报告，畅快淋漓地痛斥着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极端措施，抨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行为。赫鲁晓夫这时感觉良好，神采飞扬之际，他把四处飞溅的唾沫星都看成了是一颗颗重磅炸弹，去炸毁斯大林的权力金字塔。他仿佛看到自己已被圣殿中的圣光所笼罩，正在缓缓走向那象征权力的宝座，众臣民及对手们谦躬垂手，侧立两旁。此时此刻的他，根本就没有意料到他这篇精彩讲话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会把他带入何等境地。也许他无需预测，因为权杖已掌握在手中了。

然而，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喀尔巴阡盆地中，在美丽的多瑙河畔，对这一报告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因为报告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强烈共

鸣。他就是后来成为悲剧性人物的纳吉·伊姆雷。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早春点燃他心头希望之火的人在深秋又把他抛向了绝望的边缘。他想到的只是近3年来的遭遇，嘘吁着心中的感慨。

1. 改革者说："我就是不愿无原则地放弃我的信念。"

出身在农民家庭的纳吉·伊姆雷早年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在30年代移居苏联期间曾对农业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因此成为布哈林最勤奋的学生之一。1944年，匈牙利被苏联红军解放后，纳吉返回匈牙利，担任临时政府中的农业部长，负责土改。1948年，他担任了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被匈党中央全会指责犯有"布哈林倾向错误"，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1951年，匈党中央又恢复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委任他担任书记处书记、政府副总理兼农产品征集部长。

"您先请，伊姆雷！"

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三个月后，德国柏林发生了"6·17"事件，东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骚动不安的迹象。6月下旬，克里姆林宫召集匈党第一书记兼政府总理拉科西、马加什率领匈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会谈，纳吉出人意料地也在莫斯科开出的代表团名单之列。

由苏联总理马林科夫（斯大林生前就指定的接班人）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等人组成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给兴致冲冲赶来的拉科西迎面泼了一盆冷水。马林科夫对近期在匈牙利的切佩尔、欧兹德和迪欧什杰尔等工业中心发生骚乱极为不满。赫鲁晓夫还认为拉科西的权力过于集中，他用食指指着拉科西喊道："常此以往，人们将用粪叉把你赶出这个国家！"最后，马林科夫提议让纳吉担任政府总理，理由是纳吉在1948年提出"强制实行的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而告

终”这一告诫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领导人还责成匈党彻底修改经济计划，恢复法制，并为近来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

克里姆林宫的闷头一棒把拉科西打晕了，不过有一点他是清醒的。按照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名次排列顺序，政府总理马林科夫位居第一，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排在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之后，位居第三。因此，在匈党代表团走出会议室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拉科西让纳吉走在他前面，并说：“您请，伊姆雷，现在您是领导人。”

6月会议，7月纲领

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返回布达佩斯后，匈党中央于6月27——28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会上，拉科西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独断专行，高傲自大，并且对一些司法调查和政治诉讼擅自插手干预。鉴于这些问题，他提出辞去总理职务。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打来电话，强调人事变动必须按照苏联的意见行事。在拉科西的坚持下，并且也得到赫鲁晓夫的同意，六月全会决定对拉科西的错误不予以公布。全会还决定恢复纳吉的名誉，承认他自1949年以来批评集体化运动搞得过快的观点是正确的，并选举纳吉担任政府总理。

纳吉在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该纲领在7月初得到了国民议会的通过。纳吉认为，过去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生产衰退，损害了工农联盟；而对法制的践踏更是削弱了人民民主政权，导致党群关系紧张。因此，纳吉提出了要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发展轻工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农村，允许退社，允许取消合作社；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撤消某些拘留措施，关闭集中营等等措施。

接受“马林科夫方式”?

由于纳吉推行的政策直接有悖于拉科西早先的政策，再加上拉科西又被削弱了部分权力，这样匈党内的斗争激化起来。

拉科西深知要想把纳吉赶下台，离不开苏联方面的赞同。因此，拉科西在国内阻挠推行纳吉政策的同时，还不断地想借助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斗争来达到自己整垮对手的目的。1953 年底，苏联第二号人物、内务部长贝利亚被赶下了台，拉科西想利用贝利亚事件来整纳吉，但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顶了回去。1955 年初，拉科西的机会终于到了。

这一年的 1 月，匈牙利党政领导人被召集到莫斯科，这时克里姆林宫内已经发生了变化。马林科夫 1953 年 8 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了“为了能够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种种办法加速轻工业的发展”的“新方针”，这一方针在 1955 年 1 月遭到了政治对手们的批评。而纳吉关于发展轻工业的政策与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又很相似，自然到达莫斯科后等待他的只会是指责。圆滑的马林科夫请求承担责任，并主动要求给予降职处分，因而在 2 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而纳吉的命运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拉科西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

匈党中央于 3 月初召开全会。拉科西在会上批评纳吉的一系列做法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苏共派中央委员苏斯洛夫来到布达佩斯，劝说纳吉模仿“马林科夫方式”，做出自我批评，以便能保留一定的职务。纳吉坚持他有权向党中央辩护自己的理论和做法，并对拉科西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说：“我就是不愿无原则地放弃我的信念。”莫斯科的努力未能成功。

不屈不挠的“代价”

拉科西理直气壮地在4月初立刻再次召开中央全会，在会上通过决议把纳吉开除出政治局，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全会结束后没几个小时，匈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撤销了纳吉的总理职务，赫格居什·安德拉什接任总理。

根据1955年3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匈党中央委员会将在该年秋季讨论纳吉问题。因此，从1955年夏季至9月，纳吉埋头致力于写作工作，把他的意见转变为文字，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他的思想，并满怀希望准备将他的文稿交给中央委员会。然而，他的这一希望落空了。11月中央全会并没有讨论纳吉的问题，相反匈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席向纳吉宣布了两条罪状：一是拒不交代错误，二是纠集反党集团进行分裂活动，并将他开除出党。

纳吉回想到这里，心中隐隐作痛。他又重温了他所写的那些文稿，更是相信他以前的那些见解是对的。在新的形势下，他又继续写了两章手稿，把它汇集成册，希望能尽快呈交给匈党中央委员会。

2. 独裁者的下场：“你必须辞职！”

正值纳吉忙于奋笔疾书申诉材料之际，匈牙利国内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那就是拉科西·马加什辞去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挺而走险：“格拉古道路”

苏共20大后，匈国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中受到鼓舞，在青年团组织——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的组织下，建立起裴多菲俱乐部，定期组织讨论会，针对历史、社会、哲学、经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

又广泛的讨论。人们无情揭露斯大林主义给匈牙利带来的恶劣影响，要求“斯大林最忠诚的学生”拉科西下台，给受到拉科西迫害的人进行平反，恢复纳吉·伊姆雷的一切职务。

拉科西对此十分恼火。参加完苏共20大之后，他不但没有表示出任何悔改之意，相反却认为现在社会上针对他的思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此他准备走“格拉古的道路”。

格拉古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执政官。公元前261年，在雅典平民要求有成文的法律压力下，他制订了一部法典，但内容极其苛酷，对盗窃蔬菜水果的人都要处以死刑。格拉古道路向来被看作是表面上应承要求，实际上却是严厉镇压的策略的象征。

于是，拉科西一方面代表党中央宣布，放慢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速度，允许工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允诺准备设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另一方面却在磨刀霍霍。具体说来就是召集中央全会，以便在会上通过一份逮捕400多名党内外持不同意见者的名单。自然，纳吉·伊姆雷名列榜首，还有一批曾经联名上书党中央，抗议拉科西等人滥用职权，并对纳吉表示支持的作家、学者和党的干部。

克里姆林宫的来客

7月中旬，风声传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感到了不安，6月底发生的波兰波兹南事件还使他们记忆犹新。赫鲁晓夫预感到如果拉科西在匈牙利采取强硬措施的话，结果只能是成为波兹南第二。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考虑到苏南关系已经有所改善，而拉科西在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方面不太尽力。早在1955年夏天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之前，他就暗示拉科西对拉伊克案件重新审理，以显示改善苏南关系的诚意。然而拉科西对赫鲁晓夫的暗示置若罔闻。直到1956年3月底，拉科西才宣布恢复拉伊克案件中被告们的名誉，但他又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因此匈党内外一些人士称他为“犹大”，

因为当初拉伊克案件是拉科西一手炮制的，并以此来向斯大林表功。如今看来，拉科西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相反却有制造第二个拉伊克案件的意图。

赫鲁晓夫想到这里，主意已定，撤换拉科西，既有利于平息匈国内的不满，又有助于进一步改善苏南关系。于是，在7月18—21日的匈党中央全会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布达佩斯的匈党中央大厦内气氛紧张。拉科西正在一间舒适的会议室内向政治局委员们作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这时，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以及其翻译和警卫人员健步走进会场。他们的到来使委员们惊诧不已，他们暗暗揣摩着苏联特使的来意。

拉科西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显然感到惴惴不安。米高扬请拉科西继续他的报告。拉科西清理了一下嗓子，拿着讲稿，接着大讲纳吉·伊姆雷组织的反党和反人民民主的公开派系活动，以及裴多菲俱乐部的性质。突然，米高扬举手要求发言。

"请原谅，拉科西同志。您说裴多菲俱乐部是由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所组成的，而据我们所知，这些人在所有集会上都高呼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反革命分子会唱这支歌。"

拉科西额头开始冒汗，他不明白这位苏联特使的话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宣布休会，然后与米高扬一起走出会议室。

二人来到拉科西的办公室后，米高扬开始逐字逐句地向拉科西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

"鉴于拉科西同志的这些非法措施，建议他辞去在匈牙利共产党内的一切职务，并离开这个国家。"

晴天霹雳。拉科西显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要通了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再次听到了明白无误的回答。拉科西急忙申辩到："如果我下台，一切都会完蛋的！"

赫鲁晓夫厉声说到："没有什么可完蛋的，你必须辞职！"

拉科西沮丧地放下了听筒。

第二天，匈报纸公布了匈党中央全会公告。公告宣布，拉科西因健康原因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前往苏联治疗。格罗·埃尔诺接任党的领导职务。

3. 接任者认为："照过去方针办。"

格罗出任第一书记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格罗是拉科西的亲密朋友，是拉科西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拉科西时期执行的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实际上就是由格罗一手制造的。因此，格罗接替拉科西，这当中虽然也有拉科西的一部分功劳。他极力坚持让格罗上台，但是赫鲁晓夫同意了拉科西的要求，这也说明了赫鲁晓夫当时的矛盾心情。

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一方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专制所造成的恶果予以无情揭露，另一方面他又不敢放任东欧国家中代表民族自决倾向的领导人执政。波兰的事态已经使赫鲁晓夫担心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因此，尽管赫鲁晓夫在 1956 年夏季与铁托在克里米亚会谈时曾考虑到让卡达尔·亚诺什和纳吉·伊姆雷分别担任匈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但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让格罗出任匈党总书记，政府总理不变，因为他担心出现混乱，然而事态的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

格罗一上任便宣布："过去方针不变。"但有些事情已经由不得他说变还是不变了。

人们要求重新安葬拉伊克

随着拉伊克案件的平反，受案件牵连的有关人士陆续获释出狱，有关案件的内幕也频频曝光。人们要求重新安葬拉伊克。格罗等人则称不知遗骨在何处。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拉伊克及其三位同伴的

遗骨在一条公路边的小树林里被发现。匈党中央于是决定重新安葬。

10月6日这一天，共有20多万群众自发参加了葬礼。拉伊克的遗孀尤莉奥·拉伊克和纳吉·伊姆雷走在队伍的前列。送灵队伍漫长凄凉，肃穆的人群与其说是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倒不如说是对专制的无声抗议。布达佩斯的空气仿佛凝固了，20万人宛如一只巨大的火药桶，一触即发。

参加葬礼的人数之多，大大出乎匈党领导人的意料。葬礼的气氛也使他们受到震撼。不久，一些内务部的军官因"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罪遭到逮捕。10月13日，曾在7月被革职并开除出党的前内务部长法尔考什·米哈伊也被正式逮捕。

纳吉要求恢复党籍

纳吉·伊姆雷在拉伊克葬礼上感受到了人们对他的同情，因为人们已自觉地把他与拉伊克作了比较，并把他看作是活着的拉伊克。因此，纳吉从葬礼上回到家中后，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预感到自己要成为极端活动的口实。

早在1956年夏季，莫斯科方面就派出苏斯洛夫、米高扬婉转地向纳吉表示，当初开除纳吉出党并不是莫斯科的意见，而是拉科西的个人决定。如果纳吉认个错，表个态，就可以回到总理的岗位。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还表示，苏联方面对纳吉所写的书稿感兴趣，并希望翻成俄文出版。当时，纳吉没有答应"认错"这个先决条件，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随着近一段形势的发展，他觉得应该从大局出发来考虑这件事。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而使党内斗争再度激烈起来，因为这种斗争是有害的，它"可能会变为妨碍党的团结的巩固以及党的坚决一致的政策的障碍"，而要克服这一障碍只有并且应当是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

经过深思熟虑，纳吉于10月4日向匈党中央致信，要求党中央

讨论前一段时期对他的政治和思想活动所提出的控告。他进而表示，如果匈党中央“纠正这个毫无根据的控告”，他愿意从大局出发，作出让步，准备承认他“确实存在的错误”。纳吉还在他的信中说，把他开除出党是和党的精神相违背的，而且是对党内民主和党章的破坏。他要求中央委员会恢复他的党籍以及作为党员的一切权利。

拉伊克葬礼之后，纳吉更是觉得自己前两天向党中央写信这一行动是正确的，并焦虑地期待着匈党中央能够早日作出答复。

10 月 13 日，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废除 1955 年 11 月开除纳吉出党的决定，但没有立刻讨论纳吉的问题，因为党的领导“另有公务在身”。

格罗觉得“治内必先安外”

格罗在处理完国内政治生活中的这两件大事之后，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两件事都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与此同时，格罗在国内大政方针方面也没有举动，只是继承了拉科西的衣钵。布达佩斯的紧张气氛并没有消除。

然而，此时的格罗已顾不了许多，他认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修复匈南关系，以便补上早该上的一课，进而能得到莫斯科的赞许。于是，格罗于 10 月 15 日率领党政要员组成党政代表团，前往贝尔格莱德进行“亲切、友好的朋友会晤”。

布达佩斯出现了权力真空。

二、夜来山雨风满楼 黑云压城城欲摧

“匈牙利人的上帝哟！
你打个信号，
暴风雨来临前，
你让我们知道……”
——裴多菲·山陀尔

10月22日深夜，一列专列正由南向北疾驰，起点站是贝尔格莱德，终点站是布达佩斯。

格罗躺在包厢的沙发上，还在回想着贝尔格莱德之行，回味着酒会上的觥筹交错、淑女如云的盛况。想到对南斯拉夫访问的顺利成功，他不禁满意地咂了咂嘴巴，起身准备宽衣就寝。

殊不知，就在这几天中，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1. 这世界变化快

波兰翻天覆地

华沙。哥穆尔卡当上波党第一书记使这几天发生在华沙的戏剧性事件达到了高潮。

哥穆尔卡曾任波共领导。40年代末，他作为波兰的铁托分子被捕入狱。他和匈牙利的拉伊克、纳吉一样，都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不只一条”观点的持有者。1956年7月，波党中央全会为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

波兰的波兹南危机也使波党领导层陷入危机。在10月19日召开的波党中央全会上，波党准备改组政治局，推选哥穆尔卡担任党的领导。

就在会议举行之际，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乘专机不期而至，同时，驻在波兰的苏军也包围了华沙。华沙工人学生宣布罢工、罢课，支持哥穆尔卡。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就波共领导的组成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会谈。直至19日深夜，双方才签署了一份公报。赫鲁晓夫做出了让步，同意波共的人事安排，并且同意苏联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不再担任波兰国防部长。

20日凌晨，苏联代表团飞离华沙回国。苏军也陆续撤回兵营。波共继续召开二届八中全会。全会选出了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的领导班子。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10月22日，哥穆尔卡满怀激情地在给工人和学生的信中写道："在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告诉全体党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只有开创民主化的道路，并且铲除过去时期的一切弊害，我们才能够建立符合我国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我们决不脱离这条民主化的道路，我们决不允许我们自己被人推开脱离这条道路，我们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国生活的高度民主化来达到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苏军蠢蠢欲动

匈牙利塞盖什费赫尔堡。苏军驻匈牙利特种部队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司令部里，电讯信号显得格外繁忙。

匈牙利国内局势的发展，已经使这里的指挥官们感到不安。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的频繁来访更加深了这里神秘紧张的气氛。安德罗波夫多次暗示司令部的人员作好准备，一旦"西方帝国

主义者”在匈牙利引发内战，苏军部队就将介入。但他又表示，如果布达佩斯发生“起义”，那镇压将由匈牙利武装力量来完成，苏军只起支持、威摄作用。

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波中，特种部队司令部得知，苏军总参谋部已经开始着手部署部队：

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第7空降师已进入战备状态。该师的两个团于10月20日起从考那斯和维尔纽斯机构分批被运往匈牙利。这两个空降团最终于10月25—30日之间在维斯普雷姆附近布署完毕。

10月20—21日，驻罗马尼亚苏军部队中第33机械化师进入戒备状态。(该部队后来于10月24日越过匈罗边境，直取布达佩斯。)

10月20—21日，匈苏边境关卡扎霍尼附近，苏军工程技术人员已在蒂萨河上架起数座战备桥梁。苏军第13装甲兵方面军约6个师的兵力后来在10月23日凌晨从这些桥梁上开进匈牙利。此时，格罗等人还在开往布达佩斯的火车上沉睡。

法英以密谋策划

法国巴黎。法国、英国和以色列三国正在针对苏伊士危机问题进行秘密会谈。

埃及总统纳赛尔于1956年7月26日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一决定使一直控制着苏伊士运河的英、法两国受到沉重打击。以色列与埃及为西奈半岛发生领土之争。于是这三国在巴黎结成秘密联盟。由于纳赛尔早已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埃及与苏联之间存在着军事合作，因而三国联盟在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的时间问题上不敢轻易作出决定。

进入10月之后，东欧事态的发展使三国联盟认为有利时机到了，因为苏联的注意力正放在东欧，对中东可能无暇多顾。因此，三

国联盟于10月17日在巴黎秘密约定，将于11月7日凌晨对苏伊士运河发起联合军事行动。

美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看法与英、法有异。而11月6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日。由于中东与美洲之间的时差，11月7日凌晨正是美国总统大选扣人心弦的时刻，因而三国联盟预测美国此时也无暇顾及中东。

然而，三国联盟怎么也没有预计到匈牙利事态的进展会变得如此之快。

布达佩斯的气温在上升

匈牙利布达佩斯。10月21日的匈牙利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波党八中全会的情况。

匈牙利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中受到鼓舞，于是一个想法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让匈牙利的哥穆尔卡——纳吉·伊姆雷重新回到最高领导岗位。布达佩斯电台宣布说："波兰的事件同样也可当作我们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的情况相同。"全国上下沸腾起来。

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经过讨论，向匈党中央提出10点要求。同日，布达佩斯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决定，响应匈南方城市塞盖德的大学生于16日提出的倡议，成立匈牙利高等院校独立联合会，并提出16点要求。这两个组织提出的要求有相同之处，主要是让纳吉主持工作，把拉科西开除出党，修改经济计划，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在列宁主义原则和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巩固匈苏、匈南友谊等。

当天晚上，布达佩斯工业大学的学生决定于次日（23日）下午3时集会游行，声援波兰共产党人以及哥穆尔卡。他们还欢迎市民和工人参加游行。这项决定得到了首都其他大学，包括军事学院学生们的响应。

2. 不识时务者难成俊杰

10月23日上午，匈党政代表团的专列徐徐驶入布达佩斯东站。迎接专列的既没有乐队，也没有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只有一些神色慌张的迎接人员。

他们上前向满带胜利微笑走下车来的格罗低声概述了布达佩斯的情况，格罗脸上的微笑凝固了，对国内情况的一无所知使他面对突发形势手足无措。格罗等人的车队从火车站直接驶向多瑙河边的匈牙利中央大楼，政治局会议马上就要召开。

朝令夕改

会议由格罗主持。他强按住心中的不安，开始不厌其烦地介绍在南斯拉夫的会谈情况，就好象他并没有意识到国内的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政治局在中午12时30分左右做出决定，坚决禁止任何游行，并分派政治局的成员前往工厂、学校和电台作劝阻工作。

12时53分，布达佩斯的科苏特广播电台突然中断了音乐节目，播发了内务部关于禁止任何游行集会的决定。这一禁令的效果适得其反。学生们并没有理睬这一禁令，仍按照原计划继续准备游行。许多市民出于对内务部的反感也决定参加学生的游行。此时，布达佩斯的街头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群众。

匈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仍在继续举行。与会者们还在讨论是否允许游行。有人一语惊人，掷地有声："如果游行者不顾禁令照常举行游行活动的话，投入内务部队，不出半小时必能恢复平静。"但是，大部分与会者好象并不欣赏这种豪言壮语，大家对波兹南事件还记忆犹新。

就在会议进行期间，匈党基层组织推选出来的代表团，例如匈

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代表团，布达佩斯市委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代表团，以及许多企业、机关党组织的代表不断来到会场。会场的秩序已经显然非常混乱，人们随便地走进走出。代表团们向政治局建议取消禁令，并且组织党员一起参加游行，以便能够控制局面，而且能团结群众。看样子，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于是，科苏特广播电台在下午2时23分再次中断广播，宣布取消内务部长比图什·拉斯洛颁布的禁令。学生和市民们听到这一广播后，欢呼雀跃，陆续向裴多菲纪念碑涌去。

喻古还是讽今

下午3时，首都各高校学生及市民1万多人手持标语，聚集在裴多菲塑像下。标语上写道："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苏匈友谊——平等、自由！""纳吉领导匈牙利！""民主、独立、平等！""宗派主义领导和复辟势力下台！""错误我们已经厌烦，新经济政策赶快实现！"

青年学生们首先向裴多菲塑像敬献了花圈。然后，来自国家歌剧院的演员辛科维奇·伊姆雷满怀激情，跃上塑像的底座，向群众们朗诵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1848年反抗哈布斯堡王朝、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写下的著名诗篇——《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不再继续作奴隶！

……”

在诗句的感召之下，人们的情绪越发激昂。学生们在宣读完16点要求之后，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高唱激昂的歌曲，向位于布达山上的贝姆将军塑像进发。

贝姆是波兰的一位将军。在1848年匈牙利自由斗争中，他曾率领一支部队远道抵达匈牙利，投身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自由斗争。

游行队伍到达贝姆塑像前时，已汇集了数10万人。人们高呼着“匈波人民友谊万岁！”“庆祝友好的波兰人民拥有新的团结的党组织！”等口号。作家协会主席维列什·彼得还发表了简短讲话，以示对贝姆将军的纪念。

一部分游行群众这时已在匈牙利国旗上开了“天窗”。挖去了共和国国徽，因为这个国徽是拉科西当年效仿苏联的样式亲自设计的。偏激的迹象已经出现。

3. 执迷不悟终酿成“祸”

游行队伍在贝姆广场稍作停留后，又向位于国会前的科苏特广场浩浩荡荡涌去。到达目的地后，人数已达到25万多人，占当时布达佩斯人口的1/6。

人们在广场上期待着纳吉·伊姆雷的出现，希望能听到他的声音。暮色四垂，游行群众一路奔波所发出的热汗在等待中逐渐消退。夜幕降临，带来阵阵寒意。游行队伍开始骚动不安。

纳吉迟迟未到。

纳吉在等党的指示

纳吉·伊姆雷正在奥示索街上的家中等待着党中央的指示。作为一名党员，特别是不久前刚被恢复党籍的党员，他遵守着一个党员所应遵守的纪律。纳吉当时并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他不能随

便答应群众的要求出来发表公开讲话。然而，从坐落在学院路上的党中央大厦里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考虑到广场上人们已等了很久，在几位同伴们的劝说下，纳吉最终决定前往国会。还有一种说法是，纳吉是被他的同伴们强拉到国会的。当纳吉出现在国会大厦的一个阳台上时，人声鼎沸的广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

“同志们！”纳吉的话音刚落，即被一阵嘘声打断。有人喊着：“我们不是同志！”但这种喊声很快又被另一种喊声压了下去：“安静！听纳吉讲话！”

纳吉在人群安静下来之后，简短地说了几句。他说：“我向到场的人们热烈致敬！我的全部尊敬都属于你们——民主的匈牙利青年！靠你们的热情，你们定会协助排除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将通过党内谈判和对问题进行讨论的途径，来解决我们的冲突。我们要捍卫宪法、秩序和纪律。政府将会尽快作出决定的。”他呼吁大家要有耐心，先回到家中去。

纳吉说完之后，带领大家唱起了国歌。然后，他便离开了阳台。

游行的人群对纳吉的讲话毁誉参半。有些人开始散去。但绝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的要求并未得到答复。于是，人们想到了格罗。人们要见党的第一书记格罗。

但格罗在哪里？

格罗火上浇油

23日下午出版的报纸和号外都以大号字体刊出：“格罗·埃尔诺将在今晚8点发表广播讲话！”电台每隔半小时重播这一消息。于是人群从国会前又向匈牙利电台大楼涌去。

电台大楼内，由25名学生组成的代表团已与电台台长进行了近1个小时的谈判。学生们要求广播16点要求，但没有结果。台长正

色向学生们宣布："电台是属于人民的，不是为你们学生服务的。"学生们质问道："我们不是人民的一员吗？"

随着电台大楼前小广场的大座钟时针慢慢向8点滑去，电台前的人群越聚越多。为了加强警戒，一队国家保安队人员进入了电台大楼顶上的阵地。人们仍在要求电台宣读学生们的16点要求，并要求格罗出来对话。格罗没有出来，也不可能从电台里出来，因为技术人员已经从电台架好一条线，直接通往格罗在党中央大厦的办公室。

电台的工作人员还架起一只喇叭，重播纳吉在国会大厦阳台上的讲话录音。人群并未能安定下来。一辆电台的工作车也开到电台门口，说是前来广播学生的要求的。一名女青年抓起话筒，爬上汽车车顶，从提包里拿出一张纸，大声朗读起16条。但附近居民家里的收音机并没有传出女青年的声音。这时，失望的人群冲向汽车，从车中拉出了工作人员，并推着广播车去撞击电台的大门。形势急剧恶化。

8点到了。格罗那神经质的声音在广播中传来："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决心以最坚决的态度……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爱国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因此我们遣责在青年中散布沙文主义毒素，利用我们的国家给予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来制造民族主义性质的示威的人们。……我们应唤醒最大的良知，别让敌对因素扰乱我们党、我们的工人阶级和我们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并打开通往资本主义的大门。……在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会议作出决定以前，应该加强党的团结，让党能够反击民族主义骚动和挑拨的任何试图。工人、全体劳动者们行动起来，保卫工人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成就！"

格罗的这番不负责任的、充满遣责性语调的讲话，对示威群众不啻是火上浇油。人们提出的要求不但没有得到答复，相反还被诬蔑为“人民的公敌”、“敌对因素”、“暴徒”。激愤的人群立即骚动起来。铁托后来曾这样评介格罗的这次讲话：“他把当时还只不过是在举行示威的 80 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样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想一想他的愚昧到了什么程度！想一想他是怎样的一个领导吧！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当一切都在混乱中，当全国都在不满的时候，他竟敢用‘暴徒’这个字眼来污蔑人民，而这些人民当中有很大一个数目，甚至也许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和青年。这就足以点燃火药桶，引起事件爆发了。于是，冲突跟着就发生了。”

谁开了第一枪？

谁在电台大楼前开了第一枪？这是政治家们、历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现场的形势十分紧急。那时一支陆军摩托部队恰巧从电台前的广场路过。车队被人群挡住。人们向士兵们诉说着现场的情况。士兵们显然对游行的学生持同情态度。格罗的讲话已使电台大楼前出现混乱，人们在冲击着电台的大门。电台大楼顶上的国家保安队员们荷枪实弹，俯视着广场上发生的一切。黑压压的人群在昏暗的街灯下涌动，犹如沉闷的阴云使他们感到窒息。

8 点半左右，广场上响起了第一声清脆的枪声。混乱中的人们一刹那间并没有感觉出枪弹来自何方，但人们相信他们真切地听到了枪声。有些人四处逃散，而另一些人却在到处寻找可以用来作为武器的东西。大楼内外的持枪者开始互相射击。

冲突激化了……

三、船与水的关系

“一条永恒的真理，
由浪花写在天上；
船在水上航行，
水在船下翻腾，
可水永远是主人。”
——裴多菲·山陀尔

阵阵枪声在布达佩斯上空回荡。

开枪的一方为国家保安队，另一方则是对国家保安队深恶痛绝的学生、市民。人们之所以痛恨国家保安队的原因是，在拉科西时期，国家保安队肆无忌惮地践踏法纪。其罪行令人发指，以致当时流行的政治笑话说，每当小孩子哭闹时，只要说一声国家保安队来了，小孩就会悄然不语。

电台广场上的枪声向布达佩斯的其他地方扩散。弹药库打开了，工人们开始武装起来，军事院校的学生们也行动起来，甚至本来被派去支援国家保安队的匈牙利人民军部队也调转了枪口，与游行者们并肩抗击国家保安队。

一场反抗拉科西主义的人民武装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1. 当局者迷，抓住苏军当救命草

多瑙河边学院路上的党中央大厦里已出现混乱。格罗等人仓惶失措。从起义者看似训练有素的行动中，他们匆忙判断出这是一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组织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政变。事实上，在

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国之都，特别是在经历了拉科西多次肃清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间谍行动的布达佩斯市区中，反革命分子在一夜之间忽然遍布全城这个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反革命分子，那也恰恰说明了拉科西及其制度在这10多年当中的无能。

斯大林铜像也倒了

斯大林铜像告急！消息传来，格罗的头皮都发麻了。今天是怎么了？

一部分游行者离开国会广场后，没有去电台，而是来到了坐落在城市公园边缘的游行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旁。塑像的底座高10米，铜像本身高8米。这座庞然大物于1952年12月16日落成。在建造这座塑像的过程中，为了平整游行广场，当局曾拆除了圣母玛丽亚教学，并且为了筹集所需的铜，又溶化了好几座匈牙利民族人物和民族英雄的铜像。匈牙利人民积聚多年的愤懑今天就要喷发，他们想要拆除这座塑像。

晚上9时37分，随着一声巨响，斯大林铜像轰然倒下。格罗得知消息后，感觉到大地仿佛因此也在颤动。

怎么办？

电台在广播完格罗的讲话后，宣布政治局将于10月31日召开中央委员会。几分钟后，电台又播出更正，宣布政治局将早日召开中央全会。枪声蔓延到全城之后，党中央大厦里的决策者们感到不能再拖延了。于是晚上10点半左右，电台广播又宣布政治局已召集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形势并提出解决办法。中央委员一个接一个赶到了会场，纳吉·伊姆雷也来到了。

纳吉被带到格罗的办公室。格罗一见到纳吉，便指责一切事情都是纳吉搞起来的。纳吉争辩说，他早已提醒党和政府要注意面临的危机。最后，格罗决定让纳吉以客人的身份参加马上就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议。

代表们在关于事件的性质以及应采取的措施这两大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但在立即恢复秩序这一点上毫无异议。因此，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便协调行动。鉴于谁也不能保证匈牙利人民军的部队是否能执行命令，匈党中央决定立刻请求根据华沙条约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予以协助。

部分与会者想到了1953年柏林事件时苏军坦克的威摄作用，于是他们自言自语道，要是苏军现在就开进布达佩斯该有多好。他们还不知道，苏军已经在布达佩斯郊区集结了。

还是“老大哥”有先见之明

10月23日晚8点(莫斯科时间晚上10点)。就在格罗发表广播讲话的同时，苏军总参谋部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从莫斯科向驻匈牙利特种部队司令部拉斯琴科将军下达了行动命令。于是，苏军两个师的坦克和装甲车从塞盖什费赫尔堡和塞格莱德的苏军营地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布达佩斯。而在此之前，苏军的侦察部队已经抵达布达佩斯西郊。

虽然苏军是在全副武装的战斗状态下开往布达佩斯的，但并没有得到开火的命令。他们受领的任务是列队示威，帮助匈牙利武装力量恢复秩序，而并非直接参与镇压。因此，一部分苏军在遇到抵抗时并未回击，而是继续向前行驶。

晚上10时30分，格罗从中央委员会会场拨通了苏联驻匈大使馆的电话，在与安德罗波夫大使进行了简短交谈之后，格罗决定请苏军协助恢复秩序。这时，与会者才知道，苏军已经包围了布达佩

斯，正准备向市内进发。有些人终于放下心来，他们认为苏军的到来将会解决一切问题。而另一些人则更加焦虑不安，他们不知道这一请求是福还是祸。

午夜之前，苏军完成了对一些战略目标的包围。国会大厦、党中央大厦、国防部等建筑物前组成了苏军坦克构成的防护网。拉斯琴科将军来到了黄色的匈牙利国防部，把二层楼辟为他的临时指挥部。

市内的枪声并未因苏军的到来而中止，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估计有几千人参加了战斗。起事者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大中学生、工人，并且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但也有一少部分是寻衅闹事的流氓、犯罪分子和追求冒险的青少年。

下半夜，电台大楼被群众攻克。电台广播被转移到国会大厦的一个房间内进行。国际电话中心等其他一些地方也相继被控制在起事者手中。

推出纳吉装门面

党中央大厦内，中央委员会会议仍在继续进行。24日凌晨，会议投票通过了戒严令，并建议纳吉来担任总理。紧接着政治局进行了改组，纳吉及其支持者们进入了政治局。

凌晨4时30分，匈电台广播称“法西斯分子向我们的公共建筑物发起了武装进攻。”一个小时后，广播改称“法西斯分子”为“反革命分子”。8时13分，电台宣布了纳吉·伊姆雷已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但同时又宣布前任总理赫格居什留任第一副总理以协助纳吉工作。广播还说：“中央委员会对格罗·埃尔诺担任党的第一书记表示完全信任和支持。”8时45分，电台广播了戒严令，并宣布请求苏军出兵。9时18分，电台又宣布了禁止出门令。

但这一切似乎没有什么效果。24日上午，大约有350辆苏军坦

克和装甲车，1万名苏军士兵在布达佩斯市内活动。10时左右，拉斯琴科将军下达了可以还击的命令，因为苏军已经开始遇到“训练有素”的人的猛烈攻击。苏军坦克轰隆隆在街上列队示威，而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他们对政府变动这种象征性措施丝毫不满，因而根本就没有理睬戒严令。

起事者的队伍日益壮大。而达佩斯的警察部队和部分军队“掉转了枪口”，同起事者一起共同抗击国家保安队和苏联坦克部队。他们已在布达的塞纳广场和莫里兹·日格蒙德广场，佩斯的卡尔文巷以及第8、9区等地方建立起了一些据点。

中午12时10分，纳吉·伊姆雷第一次发表广播讲话：“我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理纳吉·伊姆雷。布达佩斯的公民们！我宣布，为了阻止流血事件的继续发生，所有在下午2时以前停止抵抗并放下武器的人们，都可免受军法处置。”然后，他又允诺实现1953年6月宣布的政府纲领。

然而，匈牙利人这时已不满足于6月纲领了。

特使亲临指挥

布达佩斯的局势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深为不安。他们派出了特使前往匈牙利。

24日下午2时，两辆苏军装甲车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从布达佩斯郊区的一个军用机场抵达了多瑙河边的党中央大厦。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两名特使找到了格罗。

他们开口就指责格罗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没有按照苏共20大的精神去实行改革，不听从苏联的劝告去同纳吉和解，并且还发表了火上加油的广播讲话，致使局势无法收拾。他们提出：“格罗同志，你应该辞职！”格罗抗议道：“赫鲁晓夫同志亲自说过，格罗是匈牙利党团结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我下台，匈牙利党就会瓦解。”米

高扬反驳道："由于你所犯的不可思议的错误，匈牙利党已经分崩离析了。"经过1小时唇枪舌战，格罗终于同意辞职，但提出暂不公布他辞职的消息。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意了这一要求，但不允许格罗再发表任何讲话，出席任何群众会议。匈党第一书记由卡达尔·亚诺什接任。

与此同时，党中央大厦外面谣言四起。有些人散布道，是纳吉把苏军请进来的，因此他也不值得信赖。而在另一些人中则流行着一个神奇性的传说：纳吉被软禁在党中央大厦内，面对格罗等人的威胁，他毫不动摇。纳吉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纳吉在党中央大厦里正和苏联特使们商量行动方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认为应迅速以武力粉碎骚乱，而且越快越好。纳吉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向公众说明请求苏军干预是格罗提出的，这样事态的发展可能会缓和。因此他要求苏联特使们给他一个机会。这一要求遭到拒绝。纳吉在下午的广播讲话中，只被授权将大赦时间延长至晚上6点。

从下午开始，一些知名人士也发出呼吁，希望恢复秩序。随着6点的临近，电台中开始倒数时间："还有15分钟！""还有12分钟！""还有5分钟！""现在是18点整！大赦令期限已过！所有继续抵抗者将以军法论处！"

2. 旁观者也未必清："一万人马还不管事?!"

25日上午，又一支苏军装甲部队——第23装甲师抵达布达佩斯市中心。由于行动仓促，侦察工作没有做好，这支部队在毫无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冲进了卡尔文巷街区。守在该街区的武装人员当即对苏军予以迎头痛击。7辆装甲车和5辆装甲运兵车当场起火。第33装甲师的一部分部队在这里遭到了重创。

苏军总参谋部不明白

布达佩斯郊区的一个军用机场上，一架专机正在盘旋降落。机上载有多名莫斯科的高级军事人员，为首的是米哈伊·谢尔盖耶维奇·马利宁将军，他是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第一副手。

这些人的来意很清楚。苏军总参谋部不相信布达佩斯会发生真正的巷战，于是便派人前来亲眼视察一下匈牙利的局势，并试图解答总参谋部的一个疑问：为什么1万多名苏军士兵竟不能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

与此同时，人们再次聚集在议会广场上。几千名示威者要求格罗下台。他们并不知道格罗已不在其位。一些学生向守卫在国会前的苏军坦克内递送俄文传单。传单上写着："马克思语录：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列宁语录：民族自决从历史和经济角度来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不会是别的东西，只会是政治自决、国家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

这时，从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射来一排子弹，一些人应声倒地，其余人四处逃散。枪是谁开的，这也是政治家们、历史学家们争执的焦点之一。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国家保安队的武装人员分布在国会大厦屋顶。但广场四周建筑物上的人是否也是国家保安部队的人员就不得而知了。但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消息说这些建筑物已被起事者们占领，因为它们是党和政府的机关所在地，如党中央大厦、农业部等。

有些起事者听到枪声后赶到广场，对周围建筑物上的人进行回击。广场上的苏军可能受传单的影响，也开始把周围建筑物上的人作为射击目标。在苏军火力的压制下，广场逐步恢复了平静。

格罗正式下台

议会广场上的流血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事态。人们强烈要求格罗下台，解散国家保安队，并呼吁苏军撤退。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得知议会广场事件后，终于同意公布格罗辞职的消息。不久，电台宣布格罗已经下台，卡达尔接任第一书记。电台同时宣布内务部长地罗什·拉斯洛已被革职。电台工作人员自己对这一消息也感到欢欣鼓舞。播音员们此后在广播中不断号召大家挂出民族的三色旗。国歌一遍又一遍在收音机中响起。

下午，卡达尔和纳吉发表了广播讲话。卡达尔表示："由我们的一部分年青人发起的、大部分参加者们的目标是正直的游行，在几个小时后已经令人痛心地变成了按照混杂进游行队伍之中的反对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意愿进行的、旨在反对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武装进攻。"纳吉的语调有所不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秩序发动了武装进攻。他们受到了布达佩斯一部分对国家状况感到愤懑的劳动人民的支持。"纳吉还宣布："匈牙利政府正在着手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主要是关于撤退驻在匈牙利的苏联武装部队的问题。……在和平秩序恢复以后，由于情况的必要性来帮助恢复社会主义秩序的苏联部队将立即召回。"

"伊万，回家去吧!"

到这时，苏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已看清楚了布达佩斯的形势。

匈牙利人民军实际上已经瓦解。匈国防部长鲍道上将在25日向拉斯琴科将军等人摊开双手，耸耸肩解嘲道："我没法向你们提供帮助，因为我已没有军队了。"匈牙利人民军政治部主任豪萨伊·耶诺

则寄希望于二战中的老游击战士的支持，当苏军一位名叫马拉森科的将军按照豪萨伊提供的地址来到新佩斯区的一间房屋前时，他只看到了15—20名老弱病残的游击战士。

苏军部队在布达佩期无法起到支持匈牙利人民军的作用，只好取代他们，孤军执行任务。这无疑增添了行动的困难。当苏军试图驱散人群时，士兵们向人群喊道："别聚集在一起了，回家去吧!"而群众则齐声回答："我们在自己家里，该回家的是你们!"苏军士兵的情绪也受到影响。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战。长官向士兵训令到："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匈牙利人民发动进攻我们要为保卫匈牙利人民而战!"而士兵们看到对他们发起进攻的是手持苏式武器的青年人，而并非手持西方武器的武装分子。有的士兵向长官报告说："连长同志！这种景象我经常在苏联革命电影中见过。比如《列宁在十月》……"

苏军的后勤也出了问题。苏军行动如此仓促，以至于下级指挥官拿到的是1945年以前的布达佩斯地图。进入市区后，部队便迷途转向了。士兵们饥饿难熬，有人竟以枪换取面包充饥。更有甚者，几名士兵联合用一辆坦克换来食物。在混乱的巷战中，适于野外作战的苏式坦克又显露出弊端。坦克顶上没有顶盖，抵抗者们用酒瓶制成的土炸弹——"莫洛托夫鸡尾酒"从一楼窗户内很容易就会击中座舱里的士兵。橡胶轮胎的运兵车，一旦轮胎被击中便动弹不得。

嗅觉灵敏的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也许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他猛然想起苏联方面在出兵问题上只有格罗的口头请求，没有匈政府签字的正式声明。于是国会大厦里出现了一个戏剧场面：安德罗波夫手拿一纸声明请求现任总理纳吉签字。纳吉对此置若罔闻，疾步向前走去。安德罗波夫紧跟几步，嘴里还在念叨，最终还是未能赶上纳吉那几乎是小跑的步伐。安德罗波夫沮丧的摇摇头，叹了口气。字还是要签的，前任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西成了"替罪羊"。他的大名落在了匈牙利政府向苏联政府请求出兵的公函上，那时已

是 28 日，而签署的日期却是 24 日。

3. 顺其自然——匈、苏理解不一

事态扩大，良莠掺杂

起事者的队伍越来越扩大，群众基础也在不断充实。25 日以后，首都许多工厂、机关、学校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布达佩斯的消息传到外地，许多城市、乡镇的人们也行动起来。一时间，这种群众自发组成的委员会（匈牙利语中此处的“委员会”一词的另一个含义是“苏维埃”）遍布全国，匈党基层组织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匈党已失去了行动能力，匈牙利人民军和警察的“倒戈”更使匈党失去了控制能力。

于是一些极端事件，特别是针对国家保安队的极端事件发生了。25 日以后，一些混杂着犯罪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武装小组开始对国家保安队成员发起了“捕鱼”活动。他们见到穿黄色翻毛皮鞋的人就认为是国家保安队员。在抓到国家保安队员后，他们经常在街上公开折磨乃至吊死俘虏。据后来统计，共有 28 人死于惨无人道的酷刑，其中有 23 人是国家保安队员。

纳吉开始正视现实

10 月 26 日，格罗等人乘坐苏军坦克溜走了。权力中心这时实际上从党转到了政府，重担落在了万人仰慕的纳吉·伊姆雷身上。

在当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一些人提议“将这场起义变为一场民族民主运动”。在会议进行中，不时地有来自各行业的代表团来到会场，向纳吉等人描述外面发生的事。纳吉这两天来几乎与外界隔绝，对外面的情况知之不多。

综合种种情况，纳吉感到事态严重。裴多菲的诗句开始在他耳边回想："船在水上航行，水在船下翻腾，可水永远是主人。"是啊，人民是无论如何不可轻视的。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顺应时势才能化敌为友。于是他做出了决定："如果不接受人民的要求，就谈不上任何走出困境的可能。"因此，他宣布，取消戒严令，延长起事者停火时间，后来又通过布达佩斯警察总局同起事者进行谈判；改组政府，承认已经建立的新组织，吸收前小农党的领导成员参加政府；准备着手同苏联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

10月27日中午，电台广播了政府改组的消息，并公布了新政府组成人员的名单。新政府的一号令是，成立社会供应委员会，以保证对居民的粮食供应。

莫斯科也愿意顺其自然

10月28日早晨，纳吉来到办公室，喝完一杯黑咖啡之后，清理了一下思绪，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机，要通了克里姆林宫。

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向赫鲁晓夫提出苏军撤退问题。纳吉措辞谨慎地建议："赫鲁晓夫同志，我想红军部队目前在布达佩斯遇到了诸多不便，是否可以考虑暂时让他们返回营地？"

"是啊，我也看到了一些有关红军在你们那里行动的报告。看样子，红军是该回营地休整一下了。"

纳吉对赫鲁晓夫如此爽快、直接的回答暗吃一惊，他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

"我已经派米高扬去你们那里了。可能他现在正在路上。我让他带去了一份书面的政策声明。你看怎么样？"

"我想，我们可能等不到米高扬同志来了。我们不忍心看着红军战士在忍受饥饿，眼睁睁看着他们宝贵的鲜血白白流掉。形势要求我们早做决定。"

“纳吉同志，你的心意我明白。你先不要着急。我会通知安德罗波夫大使，让他转告布达佩斯苏军指挥部执行这一命令。你看这样可以吗?”

“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纳吉放下电话，来到了就要举行中央委员会议的会场，简要地通报了刚才的通话内容。根据纳吉的提议，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决议。同时，中央决定成立6人主席团，卡达尔任主席团主席。

下午5时，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全面停火和苏军48小时内撤离布达佩斯。他说：“政府谴责那些把目前气势磅礴的群众运动说成是反革命运动的观点。实际上，这是一场以维护民族独立、自主、主权为宗旨的全国性的民族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直接前因是前一段时间的错误”纳吉接着表示：“政府赞同按人民意志建立的崭新的民主自治形式，力争请他们一起来治理国家。”他还宣布解散国家保安队，建立由国防和警察部队以及工人和青年的武装小组组成的新的公安部队。

四、绝望与希望：不仅是一字之差

“绝望之为虚妄，
正如希望相同。”
——裴多菲·山陀尔

10月29日下午4时，以色列突然对西奈半岛发起攻击。埃及守军猝不及防，节节后退。战线向苏伊士运河推进，中东战争爆发。

骤然发生的战事使世界的注意力从东欧转到了中东。匈牙利的消息已不是电台、报纸的头条新闻，取而代之的是西奈半岛的战争。

中东战争不仅使新闻焦点发生了变化，而且使整个国际形势复杂化了。

苏联军方人物已经从中嗅到了帝国主义扩大势力范围、镇压第三世界人民正义斗争的气味。进而联想到匈牙利局势的发展。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在东欧——苏联的缓冲地带中寻找突破口，最终目的是直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结论是帝国主义正在全世界掀起一轮新的攻势。

1.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布达佩斯的时针在加速摆动

纳吉在29日下午通过电台宣布，政府已根据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的建议，决定结束一党制。

30日下午，纳吉又发表广播讲话："全民政府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的完全同意下，已经决定了对国家生活有意义的措施。为了在我国继续进行民主化运动，同时也为了结束一党制，我们把执政的基础放在1945年新生的联合政府时期各党的民主合作之上。为此，我们在政府内部设立了一个由有限人员组成的内阁，由以下人员组成：纳吉·伊姆雷（劳动人民党）、埃尔德·费伦茨（民族独立党）、卡达尔·亚诺什（劳动人民党）、洛松齐·盖佐（劳动人民党）、蒂尔迪·佐尔坦（小农党）、科瓦奇·贝洛（小农党）和一名有待社会民主党提名的代表。卡达尔·亚诺什和洛松齐·盖佐担任国防部长。全民政府促请苏军司令部立即开始从布达佩斯地区撤退部队。"纳吉还任命毛雷泰尔将军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指示原布达佩斯警察局长科帕奇·山道尔从警察部队和军事学院学生中挑选一部分人重新组成一支国民警卫部队。纳吉还着手在军队里成立革命委员会，改组原来的军队，同时撤消原来一些军官的职务。

同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宣布解散该党，并决定建立一

个新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的筹委会成员有：多那特·费伦茨、卡达尔·亚诺什、科帕奇·山道尔、洛松齐·盖佐、卢卡奇·捷尔吉、纳吉·伊姆雷和桑多·佐尔坦。

莫斯科放出和平鸽

莫斯科的和平鸽在扇动着翅膀。10月30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表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将以完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基础。当天的《真理报》还发表一项声明，称“纳吉政府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莫斯科电台在这一天也说到“从匈牙利全国各地源源而来的报导表明，工人们支持新政府，并赞同它的纲领。”

就在这一天晚上，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出席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匈牙利的局势有了好转，一个我们能够信任的政府已经成立。”到处都是友好的表示，到处都是积极的评价。

特使们也显得大度

苏联特使们也在布达佩斯摇动着橄榄枝。纳吉最近这两天的举动无一不是事先同苏联特使们商量过的，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得到了允许。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于10月31日同匈政府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匈牙利方面出席的有纳吉·伊姆雷、卡达尔·亚诺什、蒂尔迪·佐尔坦等人。会谈的议题有4个：一是立即撤回苏军，二是匈牙利退出华约，三是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政权，四是准备自由选举，

并保障匈牙利的自决和主权。谈判进展顺利，顺利得连纳吉等人都难以置信：匈方提出的所有问题苏方都同意了！

会议结束后，米高扬同大家握手话别。他说："我们现在不得不离开你们的国家。你们要尽最大努力协助纳吉·伊姆雷同志！"随后，他把手伸向纳吉道："纳吉同志，你要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于是两人相互拥抱，互道珍重。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离去了。

纳吉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两国军队领导人将很快进行会面，坦克撤离布达佩斯，全部苏联军人将在3个月内撤出匈牙利。我们将举行普选，所有民主党派都可以提出它们的候选人。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当然不会放弃，土地、银行、工厂和企业将继续掌握在国家手中。"然而，纳吉在兴奋之余，回想起苏联人惯用的口是心非手段，心中又不免暗暗担心：大喜是否也预示着大悲？

特使们另有重任

纳吉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布达佩斯不仅与纳吉的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还个别接触了代表团国内外的一些"莫斯科的候选人"。纳吉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更是一个民族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国际主义者"。因此，纳吉在克里姆林宫的眼中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苏联特使们来到布达佩斯与其说是同纳吉进行谈判，更不如说是在赢得时间，寻找合适的替代人选。这才是特使们的特别使命之所在。

米高扬在24日来到布达佩斯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设想，一个浪漫主义的设想。在匈党军事委员会上，他提出，如果党控制不了警察和军队，国家保安队也解体了的话，那么应该从志愿的工人当中组成红色民兵。这样，红色民兵便应运而生，并于28日将指挥部

悄悄搬到了位于共和国广场附近的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内。按照计划，红色民兵将举旗反对纳吉政府，同时苏军将提供帮助。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第二次来到布达佩斯后，与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达尔·亚诺什和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分别交换了关于时局的看法，因为这两人被克里姆林宫看作是信得过的人选。特使们在试探二人的态度，所以没有将计划告诉他们。

按照莫斯科的计划，在推翻纳吉政府后，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军事政权。政权的领导将是贝尔科·拉约什少将，他是总部设在盖奇凯梅特市的匈牙利人民军第三军前指挥官。拉约什少将在30日已被苏军用直升机从盖奇凯梅特带到了斯洛伐克境内。按照"剧本"，他将"请求"苏军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

苏军并没有闲着

苏军也在准备。27日，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从政治局得到指示，为苏军第二次干涉做准备。

28日，第38方面军的6个师在苏匈边境集结。伦伯格又有两个空降团进入战备状态。第128机械化师也从喀尔巴阡山向匈牙利边境进发。第13坦克方面军则翻越喀尔巴阡山，向匈牙利挺进。

30日下午3时，设在匈牙利国防部的苏军指挥部突然接到命令："立刻撤退。"拉斯琴科将军在抱怨命令来得突然的同时，未敢怠慢，立刻组织布达佩斯的苏军撤退。24小进之内，苏军撤出了布达佩斯。一切都按照"剧本"顺利进行。

偶然事件？必然事件？

苏军从布达佩斯市季大楼前撤走以后，楼前发生了一起血腥事件。

不知是苏联人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还是偶然的巧合，布达佩斯已流传着一条消息，说有些人想把市委大楼建成反对革命的政治—军事中心。苏军在时，楼前经常停着卡车，从车上卸下大量武器、设备。苏军一走，楼前便来了一群武装分子。他们声称大楼下面有一个秘密监狱，关押着几百名无辜者。武装分子要求进大楼，守卫大楼的国家保安队员则不允许。争执变成冲突。参加攻击大楼的人越来越多，守在楼内的国家保安队员和一些人民军政治军官终因寡不敌众，挂起了白旗，并陆续弃枪走出了大楼。但是，偏激行动发生了，有的保安队员被开膛剖肚，有的被吊死。布达佩斯市委书记麦泽·伊姆雷走出大楼时，在混乱中中弹倒地。

市委大楼血案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又重新修改了计划。

2. 赫鲁晓夫的难眠之夜

10 月 30 日晚到 31 日清晨，是赫鲁晓夫的艰难时刻。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不停地给自己提一个个问题，再一个个地解答，同时又不断地提出一个个假设，再一个个加以论证。难就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险就险在错一步而招致终身恨！

桌上放着米高扬和苏斯洛夫 30 日晚从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发来的密码电报。电文赫鲁晓夫都快背熟了。两名特使描述了市委大楼战斗的经过，得出的结论是，反革命分子正在残酷危害共产党人。苏斯洛夫在电文中已直接提出，如果华约总司令伊万·科涅夫能来就好了。布达佩斯的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预想。是听之任之，还是进行干涉？

• 西方怎么想？

美国方面似乎已经发出了暗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 27 日就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下达指示，让他转告赫鲁晓夫："美国不想打

破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的格局。”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说得更直率：“美国不关心对匈牙利的干涉，美国不把东欧被奴役的民族看作是美国可能的军事伙伴。”赫鲁晓夫听到这一消息时，高兴得差点要用家乡话骂娘。这真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它意味着苏联在“铁幕”后面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胆行动。

英国和法国的用心比较险恶。它们想借着苏联在东欧无法脱身之际，伙同以色列在中东另辟战场。两国表面上不偏不倚，对埃及和以色列各打五十大板，呼吁双方停火，实际上，英法清楚埃及是决不会停火的。这样，两国联军就可以借调停者的名义重返苏伊士运河。一旦中东得手，英法两国还可回过身来，继续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苏联“侵略”他国的“丑恶行径”。“好个又吃苹果又摘桃的英、法帝国主义，我叫你竹篮打水一场空。咱们比试比试，看谁来得快！”赫鲁晓夫想到这里，不禁暗暗攥紧了拳头。

可是，万一美国是在下钩呢？那我不就象鱼一样，只能被钓起来在世界面前出丑了吗？不过，退一步说，如果我们很快在匈牙利得手的话，量美国也不敢马上行动。况且，我们要是赶在英、法结束中东行动之前动手，还有一张牌可打，那就是你们在中东干你们的，我们在东欧干我们的。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在东欧得手了，同时又不让你们在中东得手，那才叫绝呢！可英法什么时候会行动呢？两国海军舰队正由地中海向苏伊士驶去，但还没有抵达塞浦路斯，英国空军驻塞浦路斯的人马还不够，看样子他们的调遣还没有完毕。那具体是哪一天呢？11月7日？对了，美国在同一时刻正在另半边球上进行总统大选。美国人在苏伊士问题上与英、法意见不一。英法要想绕开美国的指责，这一天无疑是最好的时机。艾森豪威尔连自身的命运还不知道呢，哪还能顾得上中东的战事？！”狡猾的两只老牌帝国主义狐狸！”赫鲁晓夫暗自骂道。“就是在这一天英法会采取行动。”

啥时动手？

那我们在哪一天行动呢？11月4日是否合适？其他兄弟国家的意见呢？我想他们一般是不会反对的。对波兰已经够宽容的了，他们不会不识趣。唯一捉摸不透的是南斯拉夫，铁托这人不好打交道，特别是在这件事上更得下把功夫。我得找几个人好好合计合计，怎样争取铁托。

当然，匈牙利忠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如果能强大到足以消灭反革命就好了。可是，万一他们失败了呢？万一反革命分子上台了呢？那时肯定会有更多的工人流血，而且北约会涉足社会主义阵营。保险的办法还是我们直接动手，象我们原来计划的那样，找个匈牙利人挑头。谁合适呢？贝尔科·拉约什？还是卡达尔·亚诺什？或许还有其他人选？……

不知不觉之中，天色渐亮，赫鲁晓夫终于下定决心："干吧！"

赫鲁晓夫起床后，口授了给米高扬的电文，命令他们答应纳吉的一切要求，只要能够赢得时间。于是，便有了上文中提及的米高扬与纳吉的最后一次会谈。

接着，赫鲁晓夫又派人把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召进克里姆林宫："恢复匈牙利的秩序需要准备几天？"

"两天，至多三天！"科涅夫回答得很干脆。

"那就考虑一下准备工作吧！时机一到，我会通知你的。"赫鲁晓夫的指令也很简洁。

然后，苏共一号人物通知专机做好准备，他要与东欧诸国兄弟党的领导通通气，打打招呼。

3. 纳吉被逼宣告中立

10月31日下午1时17分，匈牙利北部工业城市米什科尔茨。

工人委员会的电台突然中断正常广播，宣布正在撤退的苏军已经停止行动，掉转了炮口、枪口；已经撤回苏联的部队又重新返回匈牙利，原因不详。

到了 11 月 1 日凌晨，苏军第 13 坦克方面军的 6 个师越过匈牙利国境，并且向纵深方向推进。

消息传到布达佩斯，舆论哗然。

纳吉等人得到消息后，感到严重不安，他预感到最不愿面对的现实正在出现。

当天上午，纳吉召开政府中的党组会议，卡达尔、明尼赫、卢卡奇、洛松齐、奥普罗等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不少人建议，既然苏联言而无信，还不如退出华约，宣布国家中立，奥普罗建议立即起草中立宣言。

紧接着，纳吉又召开了内阁会议。他脸色沉重地向内阁成员说："要是苏联政府不立即对这次出兵作出解释，匈牙利政府就要退出华沙条约，宣布中立，并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四大国帮助维护匈牙利的中立。"同时，纳吉还责成内阁采取坚决行动恢复秩序。这样，内阁的有关行政组织开始组建，毛勒泰尔担任武装力量的领导，街头行刑被禁止，地方革命组织和工人委员会开始进行地区合作，各政党重建工作也正在展开。纳吉希望治理好国家，避免给苏联干涉造成口实。

下午 4 时，内阁再次开会。会议决定召见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5 时整，全体内阁会见了安德罗波夫，纳吉要求他对苏军行动作出解释。

"红军正在进行调防，这是无关紧要的正常行动。请不要误解。"安德罗波夫说道。

"那么请您通知贵国政府，立即将红军撤回苏联去。匈牙利政府已决定，毫不迟延地退出华沙条约，并宣布国家要实行中立。我国政府将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四大国维护匈牙利的中立。"纳吉义

正言辞道，“请转告贵国政府，红军继续留在匈牙利国土上已毫无意义！”

安德罗波夫表示马上通知莫斯科立即予以答复。卡达尔这时激动地上前对安德罗波夫说道：“如果苏联军队重返布达佩斯街头，我将走上大街，赤手空拳地同他们战斗。”老谋深算的安德罗波夫不露声色，连声说道：“同志们，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说完退出了大厅。

纳吉待安德罗波夫走后，继续开会，内阁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纳吉。于是内阁作出决定，把匈牙利中立的消息电告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同时要求把匈牙利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第十一届大会议程。内阁还决定，把这一消息通知所有在布达佩斯的外交使节和外国记者。

然后，纳吉赶往广播电台，向人民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匈牙利人民！匈牙利全民政府深知它对匈牙利人民和历史所负的责任，现在宣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立，希望以此表达数百万匈牙利人一致的愿望。匈牙利人民希望能够在独立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同它的邻邦，同苏联和全世界一切国家的人民友好相处……”

当天晚上，安德罗波夫通知纳吉说，苏军占领匈牙利机场只是为了保护苏联侨民从匈牙利撤退。纳吉当然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即使明知是骗他，他又能做什么呢？他这时还不知道，明天还有更让他不安的消息在等着他。

4. 卡达尔“失踪”了

11月2日清晨，纳吉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警卫人员快步走进来，告诉纳吉，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下落不明，卡达尔·亚诺什也不知去向。纳吉听到这一消息，暗吃一惊。他嘱咐警卫暂先不要走漏风声，并派人调查一下这两人的踪迹。

11月1日晚，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成立大会，卡达尔任第一书记。他在演说中指出："在此紧要关头，为反对拉科西暴政而进行战斗的共产党人决定按照许多真正的爱国人士与社会主义者的愿望，成立一个新的党。"他强调"新的党现在保卫，以后还要继续保卫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这种事业的实现不该凭借盲目地摹仿外国榜样，而应当通过与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相适应的途径，这条途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科学社会主义与匈牙利历史和文化的革命进步传统的训诲的。"

纳吉不明白，卡达尔在讲完这番话之后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卡达尔在发表完演说后，被人叫出来，说明尼赫在外面有事找他。卡达尔走出会场，看见明尼赫正站在一辆小轿车旁。明尼赫告诉他，他的老战友，布达佩斯市委书记麦泽·伊姆雷因抢救无效，刚刚在医院去世了。卡达尔沉默不语，坐上汽车，准备去医院。在路上，明尼赫向卡达尔透露了苏联人想要另立山头的意思，劝说卡达尔遵从莫斯科的指示，挑起重担，"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分子作斗争。"卡达尔当即拒绝。车在一片黑暗寂静的街上停下。两人走出汽车，争吵起来。最后，明尼赫挽着卡达尔的胳膊，领他来到路对面的另一辆汽车前。这是苏联大使馆的车，明尼赫硬把卡达尔推进汽车的后座上，然后坐上车。汽车飞速开进了苏联大使馆。

大使馆内戒备森严。人们来来往往，显得分外繁忙。卡达尔在大使馆没呆多久，又被送上小轿车，直接驶向布达佩斯郊区由苏军控制的一个军用机场。机场上，一架苏军运输机已经启动。卡达尔被送上飞机后，驾驶员即驾机起飞，飞往苏匈边境附近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城市乌日哥罗德。

卡达尔与赫鲁晓夫在乌日哥罗德举行了会晤。赫鲁晓夫开宗明义，直接了当地告诉卡达尔他想干什么。赫鲁晓夫说："纳吉必须下台。取代他的，要么是你，要么是贝尔科·拉约什，你考虑考虑。"卡达尔进行了艰难的权衡，认为与其让贝尔科领导一个军事专政的

政权，还不如自己承担责任，执行一条妥协的政策，使人民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他也深知，这一举动会招致的辱骂和诅咒。可是面对现实，是选择保全促使自己的名节，还是以民族利益和百姓的性命为重？卡达尔最终做出了决定，置自己的名节于度外，暂做千人辱万人骂的罪人，待以后自有人会秉公判断。

赫鲁晓夫听到卡达尔的决定，自然乐不可支。实际上他也不愿意贝尔科·拉约什上台。那是一个强硬人物，弄不好只会更糟，因此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比较好的人选自然是卡达尔，他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符合莫斯科的标准，虽然带有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倾向，但他毕竟比较温和。

当然，这里发生的一切，纳吉是不清楚的。他只知道卡达尔被弄到了苏联大使馆后就杳无音信了。回想起昨日卡达尔在安德罗波夫面前的情绪，他不免为卡达尔捏把冷汗。毕竟他俩是多年的朋友了。

5. 联合国冗员的失误

纳吉发觉联合国对昨日匈牙利的声明还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又起草了一份电文，再次发往联合国。纳吉要是知道这两天联合国发生的事，肯定要背过气去。

纽约联合国大厦。11 月 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匈牙利时间下午 4 时 30 分），第 21 层办公室的电传收到来自布达佩斯的一句问话："你是纽约联合国吗？"联合国还从来收到过直接发给它的电传，以往都是发给各国代表团的。于是联合国的官员们和秘书们围聚在电传机旁，等待下文会是什么。

10 时 42 分，又一行字出现在电传机上："致联合国秘书长：如果您很忙，我可以过几分钟再找您，我们的电文就要准备好了。是否可以？请回答。"

操作员答复道："我们不忙，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等。"

11 时 14 分，布达佩斯中断了电传。因为这时纳吉正在召见安德罗波夫。12 时 21 分，联合国的电传机又出现讯号："布达佩斯呼叫。你们准备好了吗？"

操作员回答后，纳吉的历史性文件—匈牙利政府关于中立和请求四大国保护的英文声明出现在电传机上，直接要求递交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12 时 27 分，操作员答复布达佩斯："接收良好。谢谢。"

这份电文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紧急。操作员复核了电文的签名后，交给了专门信使。8 分钟后电文被送到了秘书长的办公室。秘书长的助手们对电文没有感到丝毫惊讶，他们的注意力正全部集中在苏伊士运河口。于是，不但秘书长的办公室没有对电文发表任何声明，就象根本没有收到过一样。

纽约的记者们已经从布达佩斯获悉了纳吉的举动，于是前来询问联合国的态度。秘书长办公室给予的答复是还没有进行讨论。

最终，下午 2 时左右，电文被找出来了。2 时 30 分，电文被印刷并散发给各代表团。但是，电文的重要性和紧急性并没有被代表们所认识，它被塞进不重要的公文盒中。

匈牙利代表团想将匈牙利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然而遭到了亚非各团的拒绝，他们担心这会干扰苏伊士问题。他们向匈牙利团解释道："这上面注明的是到下一次大会上讨论。"下一次大会要在 11 天以后才能举行。

哈马舍尔德秘书长还失去了另外一个机会。要是他的助手们不犯悲剧性的错误，他本来是可以立刻着手解决的。纳吉在向秘书长发出声明 18 分钟后，再次通过电传给哈马舍尔德本人又发出一段电文："我很荣幸地通知阁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等秘书绍伯·亚诺什先生将在 1956 年 11 月 1 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代表匈牙利人民政府。"

纳吉的电文已经很清楚地标明了日期，丝毫不会引起异议。然

而，秘书长的助手们忽略了电文的重要性，因而也就没有将它递给秘书长。甚至 24 小时之后，副秘书长还不知道这一电文，并向安理会表示没有收到类似的文件。

这样，等到纳吉 11 月 2 日再发出电文时，联合国失去了一天的时间。纽约时间 2 日下午 3 点，安理会才讨论匈牙利问题，会议没有结果。与此同时，布达佩斯已经谣言四起，谈联合国已派考察团前往匈牙利，更有人绘声绘色地谈，考察团的成员有 16 人。人们同纳吉一样，把希望都寄托在联合国身上。

6. 苏联“一号专机”穿梭旅行

赫鲁晓夫于 11 月 1 日开始了他的巡回旅行，他想听听波，保、捷、罗、南等国领导人关于出兵匈牙利的意见，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11 月 1 日，波苏边境城市布列斯特，赫鲁晓夫的专机在跑道上降落，飞机停下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三人走出机舱。在飞机舷梯旁等候的是波兰新任党总书记哥穆尔卡以及总理西伦凯维兹。匈牙利的形势起初与波兰很相似，因此，向波兰同志们征求关于出兵匈牙利的意见，赫鲁晓夫感到很难堪，因为约半个月之前他对波兰采取过同样的措施，但没有成功。他现在面对的正是当时波兰的政治对手。

哥穆尔卡在 10 月 31 日接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通知，让他于次日到布列斯特准备见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预测到赫鲁晓夫会问他什么，于是他和西伦凯维茨一起给波兰驻匈牙利大使馆发了电报，指示威尔曼大使火速求见纳吉和卡达尔，听听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威尔曼不敢怠慢，接到电报后就打电话求见。当天晚上，纳吉与卡达尔一起接见了威尔曼，双方就时局交换了看法。匈方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是苏军撤出匈牙利，这样才能稳定局势，平息人民的不满。纳吉还向威尔曼表示，希望得到波兰党和政府的支持。威尔曼回到大

使馆官邸后，马上拨通华沙热线，向西伦凯维茨总理汇报了会谈情况，并简要谈了一下使馆对形势的看法。威尔曼认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完全无力控制局面了。

哥穆尔卡与赫鲁晓夫稍作寒暄后转入正题。赫鲁晓夫搬出苏共中央的决定："苏联共产党已决定出兵拯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你们波兰人有什么看法?"哥穆尔卡见赫鲁晓夫用大棒压人，便缄口不言，场面很尴尬，赫鲁晓夫再次发问。哥穆尔卡最终表示，波党和政府已经知道苏联的这一决定，此外便又无语。赫鲁晓夫知道哥穆尔卡也不会多谈出什么来，于是也不强求，转入别的话题。

告别了哥穆尔卡，赫鲁晓夫的专机飞往乌克兰城市乌日哥罗德。11月2日清晨，他在那里见到了卡达尔。2日上午，专机继续南下，来到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在布加勒斯特迎候专机的不仅有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还有从布拉格和索菲亚赶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党政领导人。三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赫鲁晓夫步入罗共党中央大厦。可能是从北方来到南方的关系，赫鲁晓夫感觉到这儿比北边要热得多。

赫鲁晓夫到布加勒斯特来的任务不是说服大家，而是重申一下对局势的看法。这个任务要轻松得多。大家对赫鲁晓夫讲话的反应都非常积极。很快，意见得到了统一，那就是必须采取行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还表示，他们希望与苏联人一起"给匈牙利的革命工人在打击反革命斗争中提供军事援助"。赫鲁晓夫婉言谢绝了，他对罗马尼亚人调侃道："1919年，罗马尼亚人参与镇压了库恩、贝洛领导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当时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一边的。这次你们再去岂不有嫌疑?"罗马尼亚领导人哈哈大笑，最终没忘预祝苏联同志成功，并希望从快行事。

告别了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踏上了巡回旅行的最后一站一南斯拉夫。终点是亚德里亚海滨的布列俄尼岛。

南斯拉夫是最艰巨的一站。苏南关系一直是赫鲁晓夫头痛的问题。双边关系时好时坏，赫鲁晓夫也奈铁托不何。前不久，双方的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最近又由于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变得紧张起来。在除去拉科西的问题上，铁托是积极支持的。但是，当时并没有按南斯拉夫人的意见行事，让卡达尔和纳吉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而是让格罗接替拉科西，以保持现状。南斯拉夫人对此深为不满。现在纳吉把匈牙利的事搞成这样，而纳吉又是铁托最欣赏的人之一，把他搞下台，难啊！机窗外一道闪电打断了赫鲁晓夫的思路。他看着机窗外漆黑的夜空，听着阵阵雷鸣和噼叭作响的雨点声，心中升起一种不祥之感。但愿铁托能合作，他祈祷道。同行的马林科夫经受不了狂风暴雨造成的颠簸，脸色苍白"这可能是我遇到的最坏的天气了。"赫鲁晓夫自言自语道。

飞机终于在海滨的一个简易军用机场降落。一艘汽艇将苏联客人带上了布里俄尼岛，铁托在那里的别墅里迎候他们。例行的拥抱、寒暄之后，赫鲁晓夫向铁托说明了来意，告诉他苏军将向布达佩斯出兵。

铁托的答复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甚至比波兰人的态度还要好。赫鲁晓夫不禁喜上眉梢，心想不管你提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你同意出兵就行。

铁托的要求终于提出了。一是保证纳吉的安全，二是答应支持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对于铁托的第一个要求，赫鲁晓夫当场满口应承下来。对于第二个要求，他稍作了考虑。

赫鲁晓夫对纳赛尔本人并不特别欣赏。1954 年纳赛尔上校通过政变当上埃及总统后，立场摇摆不定。他一开始倾向西方，后来他的野心超出了埃及的国界，西方已无法满足他的胃口了。埃及当时的军备较弱，为了获得武器，他又转向东方，并宣称要在埃及实行社会主义。虽然苏联人怀疑纳赛尔是否真正懂得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但出于战略考虑，还是与埃及签署了军事协议，向埃及提供武器军

备，从而取得了在中东的一个立足点。相比之下，纳赛尔与铁托的关系更为密切。南斯拉夫报刊赞扬埃及政府的语气也比苏联热烈得多。所以在埃及面临危机之际，铁托提出这一要求也很自然。赫鲁晓夫考虑了一下后，表示同意这个不太苛刻的要求，因为国内军方也存在这种压力，要求打击"犹太复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正题谈完后，赫鲁晓夫准备休息，但铁托兴致正高，想邀请赫鲁晓夫多留几天。在赫鲁晓夫婉言谢绝之后，铁托又提议道："听我说，为什么现在睡觉？你们急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利用这晚上谈谈呢？到天亮还有几个小时，我乐于和你们在一起度过这一点时间。"

赫鲁晓夫无奈答应道："好吧，我们就等到回莫斯科的路上，在飞机上打个盹。"

双方彻夜长谈，就许多问题交换了看法。不知不觉已至清晨，东方的太阳从海上冉冉升起，雨后天晴的天空显得格外净朗。铁托兴致勃勃地亲自驾驶汽艇，将苏联客人送至海滨码头。

专机终于在11月3日傍晚时分回到了莫斯科。车队将赫鲁晓夫一行送入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进入办公室后，拿起电话，通知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元帅："出击！"

五、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已经写过很多的诗，
并不是每一首都毫无用处；
可给我带来声誉的诗篇——
最美丽的诗篇，
我还没有写出……”
——裴多菲·山陀尔

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元帅日前已来到了苏军驻扎的匈牙利西部城市索尔诺克，11月2日，他把拉斯琴科和斯捷潘诺夫、马拉森科召到了索尔诺克。24小时之内，他们共同制订了作战计划。

11月3日，马拉森科和拉斯琴科回到了特克尔苏联驻军总指挥部。深夜时分，他们完成了布达佩斯作战计划。行动需要3个师，估计2—3天内就可以完成任务。同日，科涅夫元帅在索尔诺克同13和38方面军的指挥巴巴疆扬元帅和马姆苏罗夫元帅协调了在匈牙利境内的行动。当时，年青的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政治局的特使坐镇索尔诺克。根据行动计划，索尔诺克将是新政府的临时所在地。

1. 缓兵之计

苏联人在布达佩斯正在演着另一出戏。安德罗波夫大使在11月2日通知纳吉，苏联政府愿意就苏军撤退问题同匈牙利政府进行谈判。苏联大使还向纳吉呈递了苏联代表团的名单。马利宁将军、施捷巴金少将和切巴宁·斯捷普琴科中将，以及两名翻译——希斯康和福明。匈牙利政府于3日组成谈判代表团，成员是，国务部长艾

尔戴伊·费伦茨，国防部长马勒泰尔·帕尔将军，匈牙利人民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科瓦奇·伊斯特万将军和作战部长徐奇·米克罗什上校。

3日上午，马利宁将军从索尔诺克回到布达佩斯。他率团来到匈国会大厦，与匈方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谈判冗长拖沓，许多细节问题，如撤军的日期和形式，军乐和告别讲话等被提上议事日程。匈方可能认为这是苏方有诚意的表现，诚恳到连细节都要确定下来。苏方当时心中明白，这是缓兵之计，他们正在赢得时间，以获得克里姆林宫的最后指示。

问题没谈完，时间却过去了很久。马利宁将军建议于当之晚上继续谈判，但不是在国会大厦，而是在苏军总指挥部特克尔。马利宁将军很有礼貌地说："这是出于礼节的需要，我们希望下一轮谈判在特克尔举行。"

匈牙利代表团带着复杂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在这种紧张的空气中去苏军兵营谈判无疑是自投罗网。下午，各种消息汇集后，匈牙利人发现，苏军已停止运动。代表团成员轻呼了一口气，自我安慰道："怕是苏军真的准备撤退了吧！至少他们已不再前进。"可是他们哪里想到，苏军之所以停止运动，是因为他们已部署完毕，全部到位了。

傍晚时分，匈牙利代表团身穿戎装，一一向纳吉握手告别，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之势。纳吉目送着他们离去，眼眶不禁湿润了。

2. 当政的最后一天

纳吉仍然对苏联抱着最后一丝希望。11月3日是他最忙碌的一天。上午他代表政府与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进行会谈，并达成一致意见。工人委员会宣布11月5日（星期一）开始结束罢工，全面复工。市内交通开始恢复正常。文教部已通知学校星期一复课。纳吉之所以责成各行各业这样做，是因为他想向苏联表示，国内已恢复

正常。

这几天新成立的以及重新恢复的政党正在紧张地活动，吸收新党员，向市民阐述他们的方针。当然也存在一些极端团体，例如由杜达午·约瑟夫领导的一群武装分子在攻占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报《自由人民报》大楼后，宣布成立了“匈牙利民族革命委员会”，并在30日宣布拒不承认纳吉政府，煽动谁的枪多谁就执政的论调。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纳吉相信，在国内秩序日趋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贸然进行新的挑衅。

国民警卫队已经开始行使职责。由于30日实行大赦，监狱大门四开，政治犯、刑事犯统统重见天日。

红衣主教明曾蒂也从软禁中获释。他在11月3日晚发表广播讲话，支持恢复工作和正常生活秩序，建立人民之间真正的友谊。他呼吁民族感情不应该继续成为国家之间斗争的源泉，而应是在真理基础上的和平共存。他认为，前制度已经失败，“前制度的继承者们，包括纳吉在内，应对所犯错误和罪行负责。”他还描述了未来匈牙利的蓝图——“法制国家，无阶级的社会，民主成果得到发展，受到社会福利利益正确和公正限制的私有制，绝对以民族文化成分为基础的民族和国家。”

纳吉在听完明曾蒂的讲话后，进行了一番思考，他不敢完全苟同受到基督教信徒们尊敬的这位主教先生的思想。人各有志，他相信，新成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会以新的面貌去努力实现的追求的理想。但明曾蒂有一句提醒了他：“我们整个局势取决于，拥有2亿人口的俄罗斯帝国运用它的军事力量想要在我们国家境内干什么。”这时，他桌上的电话全部响起，国民警卫队司令基拉伊向纳吉报告：“我们与特克尔苏军司令部失去联系，马勒泰尔将军等处境不详！”

纳吉镇定地回答：“我命令你，恢复匈牙利政府和她的代表团之间的联系。请您派代表去谈判地点。”

时值午夜，基拉伊派了一辆坦克前往25公里以外的特克尔。坦克抵达苏军司令部后，又失去了与基拉伊的联系。纳吉得知这一消息后，预感到苏联人已开始动手了。

3. 动手了!

1956年11月4日，苏联人动手了!

苏联克格勃主席伊万·谢洛夫中将早在11月1日就率领一支克格勃部队抵达特克尔。马勒泰尔率领代表团来到特克尔后，还没有开始与苏联代表团进行正式会谈，谢洛夫走进了会议室。身穿制服的谢洛夫将白手套扔在谈判桌上，随着这一信号，一群执枪的克格勃士兵从门外涌了进来，把匈牙利代表带离了会议室。基拉伊后来又派来一辆坦克自然也是有去无回。

11月4日(星期日)凌晨4时30分，人们还在沉睡中。苏军特种部队的三个师正式发起占领布达佩斯的进攻。另一部分，苏军于5时左右在匈牙利其他地方投入战斗。苏军第二次干涉正式拉开帷幕，这次投入的总兵力有17个师之多。

两个电台　两种呼吁

清晨5时20分，纳吉·伊姆雷的声音在电台中再次响起，在轰隆的枪炮声中显得那么伤感:“我是纳吉·伊姆雷，匈牙利共和国总理在对你们说话!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已对我们的首都发起了进攻，目的显然在于推翻合法的匈牙利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已投入战斗!政府仍在其位!我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在纳吉发表讲话的前一刻中，明尼赫·费伦茨在索尔诺克从另一个电台广播了他和其他三人致匈牙利人民的公开信:“我们，前纳吉·伊姆雷政府的部长安托尔·奥普罗、卡达尔·亚诺什、科沙·伊斯特万、明尼赫·费伦茨声明，我们已经于1956年11月1日退

出政府，同这个政府割断一切关系，并且倡议建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6时左右，索尔诺克电台发出呼吁：“请注意！请注意！卡达尔同志就要发表讲话！”于是卡达尔的声音出现在广播中。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了！

10月23日，在我国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崇高目的是纠正拉科西和他的同谋者所犯下的反党、反人民的错误，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纳吉·伊姆雷政府的软弱以及钻入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日益得势，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的人民国家、我们的工农政权和我们整个祖国的生存面临危险。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匈牙利国人士建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纳吉在获悉卡达尔的讲话后，感到震惊。这时，警卫人员报告苏联坦克已逼近国会大厦。于是纳吉带着身边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前往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寻求避难。

留守在国会大厦中的人仍在通过电台发出呼吁。7点5分，电台用俄语呼吁苏联士兵不要开枪。差几分钟8点时，著名作家哈伊·贝拉以匈牙利作家们的名义向世界呼救：“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哪儿也没有回音，好象世界都沉默了。

不久，苏军占领了国会大厦。

市内激烈的枪声表明，抵抗还在继续。在新佩斯区和切佩尔岛上，枪声直至10日才停息。

中东的另一个允诺

苏联人在布达佩斯得手后，开始实现另一允诺。

11月5日深夜，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时针正向午夜缓缓挪动。一辆英国使馆的小轿车在空荡的莫斯科街道上急驶。11时30分，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急匆匆赶来的英国外交官。随

后，法国、以色列外交官也来到克里姆林宫，从布尔加宁那里接到了同样的文件。

伦敦大笨钟的时针刚过8时30分。英国首相安东尼正在阅读驻莫斯科使馆发来的加急电文，上面是那份备忘录："如果比贵国更强大的国家攻击贵国，运用所有现代化的大面积杀伤性武装，那大不列颠的形势又该如何？现在已经可能有这样的国家，并且它们可能做的，不是派出海军或空军去袭击英国海岸，而是运用其他手段，例如用导弹也可以达到目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在中东投入武力消灭侵略者，恢复和平。我们希望贵国明智行事，取消相应的行动……"

巴黎时间晚上9时30分，法国总理居·莫勒也看到了同样内容的备忘录。

戴阿维得到的备忘录则最严厉，文中提到要"采取目的在于消灭以色列国的措施。"

三国联盟一下子乱了阵脚。11月7日即将到来、胜利在望，但这飞来的一棒打得这三国心慌意乱，他们没料到苏联抢在了前面。提前发起攻击，准备又不充分，甚至部队还在茫茫大海之中，唯有伞兵部队在塞得港奋战。

英法首脑迅速接通了电话，交换了看法，一致认为对苏联最后通牒性的备忘录不可等闲视之。有消息说，苏联正在组建志愿军前往中东。

华盛顿直接而又迅速地从莫斯科得到了同样的备忘录。只不过布尔加宁还希望"美国坚决同苏联站在一起，阻止入侵，恢复中东和平。"艾森豪威尔指示智囊团全力行动起来，商量对策。

终于，经过充分权衡，美国国务院于11月6日凌晨3时致电巴黎和伦敦，如果苏联向中东而不是巴黎和伦敦发射导弹，北约将无法提供保护。中午，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英国艾登首相，如果在午夜前，在塞得港以及整个埃及不结束战斗，那就别想指望华盛顿的10亿美元贷款。

艾登无奈，只好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居·莫勒，陈述自己的困境。“一切都在反对我！”他终于宣布退出三国联盟。

法国此时已孤掌难鸣。晚上7时，法国埃里将军签署给塞得港法军的命令：“午夜12时停火，在此之前尽可能占领更多的地盘。”

苏联人在中东也赢了。

决战岂止在沙场

卡达尔于11月7日凌晨在一次苏军坦克的掩护下，乘坐装甲车进入了硝烟弥漫的布达佩斯。

苏军为卡达尔基本消除了武力抵抗，布达佩斯市民们心理上的对抗就得由卡达尔来解决了。卡达尔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党的基层组织已经瓦解，许多党员在思想上想不通，军队也已解体，不少战士投入了狙击苏军的战斗，警察部队也已溃散。而在前一段时期成立的工人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也对卡达尔采取拒不合作的态度。更有甚者，首都的工人委员会在11月14日组成了联合组织——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公开宣布举行罢工。中央工人委员会要求纳吉官复原职，国家中立，苏军撤退，同时还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工厂、银行社会化。匈牙利作家协会、匈牙利科学院、匈牙利通讯社、匈牙利电台、匈牙利演员协会等组织纷纷表示支持中央工人委员会的要求。

卡达尔最终坐在谈判桌旁表示，如果纳吉·伊姆雷离开南斯拉夫使馆，“那才有进一步谈判和达成协议的可能。”他接着说：“我们将解除垄断局面，建立多党体制，实行纯净、正直的大选。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不光是可以用子弹来攻击工人政权，用选票也可以打击工人政权。我们估计到人们可能会在大选中给我们以彻底的打击，但我们将承担起选举斗争，因为共产党会有力量来重新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4. 幕后交易

纳吉进入南斯拉夫使馆请求避难，再次引起了苏南关系的紧张。赫鲁晓夫与铁托之间开始进行频繁的信件交换。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早在11月2日，纳吉政府的成员——桑多，前往南斯拉夫使馆，试探如果出现极端情况，是否可以到南斯拉夫使馆避难。

大使经请示国内后，在3日给予了肯定的答复。铁托在希里俄尼同赫鲁晓夫会谈时，没有向他透露此事，答应说服纳吉辞职。但是，铁托当时也没有料到纳吉在离开国会大厦之前会发表那么一通讲话，本人也到了南斯拉夫使馆。

纳吉的“政府还在其位”的讲话使赫鲁晓夫很恼火，因为这样搞得苏联有些被动。纳吉从苏军眼皮底下溜走，他感到很气愤。11月5日下午3时30分，一辆苏军坦克对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开了一炮，这并非偶然。南斯拉夫政府急忙致电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要求作出解释，如果苏方不答复，南斯拉夫“准备将整个事件公布于众。”苏联政府很快表示了歉意。当然铁托也明白苏军这一炮的用意，于是急忙致信赫鲁晓夫，解释说由于时间不够充分，未能成功地劝说纳吉。同时还解释，11月3日同意桑多的请示时，并没有料到纳吉也会来，因为桑多当时只是说他和“几名共产党人”，并未提纳吉的名字。纳吉在使馆避难使南斯拉夫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在铁托致赫鲁晓夫的信中，提出一项建议，让苏联允许纳吉等人离开南斯拉夫使馆前往南斯拉夫进行政治避难。

赫鲁晓夫于7月回信铁托，强烈批评了铁托的建议，并暗示道，这一建议已经超出了布里俄尼会谈的界限，他还指责铁托未能实现劝说纳吉辞职的允诺，以致于纳吉在最后一刻做出了“反动的行

为”。总之，赫鲁晓夫认为铁托在搞两面派。

各打各的算盘

纳吉总呆在使馆也不是个事。南斯拉夫的国际声望使得铁托不能轻易地把纳吉交给苏联人，而苏联人对纳吉的最后广播讲话刻骨铭心，不愿就此罢休。赫鲁晓夫在7日的信中向铁托建议，把纳吉等人交给卡达尔政府，这样对谁都有好处，同时又威胁铁托，如果纳吉等人在南斯拉夫进行避难，那将“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并将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

铁托感到左右为难，拒绝交出纳吉，将会加剧与苏联的冲突，交出纳吉，那就意味着南斯拉夫也成为苏联干涉的实际参与者。8日，铁托再次致信赫鲁晓夫，提请克里姆林宫理解贝尔格莱德的两难处境，希望共同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铁托解释道，当时在接受纳吉进入使馆时，“我们并不知道你们来信中提到的纳吉·伊姆雷的广播讲话，是否真是纳吉的声明，或者是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播出的。”因此，“现在讨论允许纳吉进入使馆这一决定是否正确已毫无意义。眼前重要的是鉴于两国和两党之间业已形成的友好关系，我们应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最终也是作为布里俄尼会谈的结果出现的，只不过3日夜里4日凌晨发生的事与我们原来想象的不完全一致罢了。”显然，铁托也在要挟赫鲁晓夫。铁托最后提议，可以用“大赦”这一形式解决纳吉的问题，这样对苏联、匈牙利卡达尔政府以及南斯拉夫都有好处。

还是苏联人如了愿

10日，赫鲁晓夫致信铁托，建议纳吉等人不去南斯拉夫，而允许他们去罗马尼亚。铁托对此没有答复，他派人与卡达尔进行谈判，

商讨赦免纳吉等人的可能性。卡达尔在与克里姆林宫通完气之后，向南斯拉夫人宣布：将不通过任何方式对纳吉及其同伴们进行迫害，同时为他们自由地回到各自家中提供可能。至此，南斯拉夫使馆向纳吉等人提供的避难权失效。

11月22日下午6时30分，纳吉以及其他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的同伴及其家属们走出了使馆，坐上一辆准备好的大轿车，在两名南斯拉夫使馆外交官员的陪同下，准备各自回家，车没开几步，就被苏军装甲车包围了。一群克格勃军官冲进车内，强行把那两名提出抗议的南斯拉夫外交官赶出了汽车。随后，在一队苏军坦克的掩护下，大轿车被押解到了苏军司令部。当天晚上，纳吉等人被塞进一架军用飞机。11月23日，新闻界刊登出一条消息说，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伴"根据自己的要求"已前往罗马尼亚共和国。看样子，克里姆林宫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他们现在肯定能听任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咆哮。

5. 沉重的代价

苏联人满意了，而卡达尔面临的局面更加棘手。他在布达佩斯面临的是人们的愤怒。

11月23日下午2时到3时，布达佩斯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们以此表示抗议，同时全面罢工开始。

卡达尔为了缓和局势，开始采取一些迎合人心的措施：提高工资，发放援助，取消粮食征集制等等。

莫斯科要求断然行动

1956年12月初，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布达佩斯，想实地看一下这里的局势。他觉得卡达尔在恢复秩序方面太软弱。于是12月2—5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一致决定将10—11月的

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发生事件的原因归咎于拉科西、格罗的错误政策，纳吉—洛松齐"反党集团"的活动，"霍尔蒂—法西斯分子"和其他资本家—大地主势力的地下活动，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

12月5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下令解散国家、经济、文化领域生活内的"革命委员会"。

12月9日，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政府在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所在地逮捕了200多名活动分子，同时，政府宣布解散全国、首都、首都各区、州和市等各级工人委员会。

从2月中旬起，苏军坦克开始逐步撤离布达佩斯市区。市内秩序由匈牙利革命国防卫队接管。1957年2月起改由工人纠察队治理。

苏军在整个10—11月行动中，死亡650人，受伤员1520人，51人失踪，共伤亡2241人。

同期内，匈牙利人死亡2502人，受伤19226人，还有20万人逃往西方。匈牙利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占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

事件结束后，从1956年12月20日至1961年12月13日，共有289名有关人员被判处死刑，1.6万人被监禁。

丹心照汗青

1958年6月17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叛国罪"叛处纳吉死刑。

纳吉·伊姆雷在被关押期间拒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临刑前他说："在多瑙河的河谷中，我曾在1953年和1956年两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拉科西和俄国人都阻止了我。如果现在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情愿做出这一牺牲。"

1989年1月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这在全国引起一片哗然。沉默了多年，但在人民心中一直未被解答的问题再次公开在人民面前。经过调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9年5月31日发表声明，为纳吉平反。6月1日发表的公报中承认："1956年10月，纳吉再次出任总理。在当时的特殊的环境下，他为拯救国家而斗争。他既要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匈牙利的束缚而战斗，又要为医治民族创伤而斗争。他既要排除外来的干涉，又要同隐藏在人民起义后面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6月16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纳吉及其三名同伴重新进行安葬。布达佩斯几十万人自发参加了葬礼。

1989年6月，卡达尔·亚诺什在接受《匈牙利》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必须承认，纳吉及其周围的人不想搞反革命。"

第四章

布拉格之春

——破灭的“人道社会主义”之梦

“我们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更珍视我们意欲留给子孙后代的遗言。”

——摘自《捷克作家积极分子会议声明》

（1968年10月31日）

“我们并没有沉默，而是进行了尖锐的、反复的斗争——既同我们谈判的对手争，也在我们之间争——我们使用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论据。

我们也是在占领我国的坦克和飞机的阴影下进行谈判和决定问题的。”

——斯姆尔科夫斯基

引子：历史的回声

公元198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在东欧大地势不可挡地爆发。如狂飙，如雷霆，这场地震把东欧的一座座权力金字塔冲击得南倾北斜。

几乎所有东欧执政党在这股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政治冲击波中都面临一个严肃而棘手的问题：重新评价历史。

20 年在时间长河中说它长也长，说短也短。它可以抹去许许多多无足轻重的生命痕迹，也可以孕育和诞生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英雄与罪人。然而，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难忘却的依然是 20 年前那个辉煌的恶梦，那个带来光荣与耻辱的 1968 年。

布拉格在那年春天里迸发出来的灿烂光华在一个无知之夜被来自莫斯科的寒流浇灭。20 年来，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一直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吃力地走过失真的历史时空。

1988 年，压抑的痛苦终于无法再压折，沉淀的记忆也终于不能再沉淀。被屈辱噬咬得残缺不全的民族良心与尊严终于汇聚成一股正义的洪流。

8 月 21 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20 周年之际，布拉格爆发了 20 年来第一次万人反政府示威，要求撤走占领军，为 1968 年事件平反。此后，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就成了捷当局一个始终无法摆脱的幽灵。

到了风云激荡的 1989 年，没有勇气正视历史与现实的捷共执政者在高举民族大旗的反对派面前节节败退，最后成了“自我孤立的牺牲品”。

8 月，波兰议会通过决议，谴责 1968 年华约 5 国侵捷行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执委会发表声明，表示该党现领导不赞同 1968 年对捷的军事干涉。

12 月 4 日，苏、保、匈、波和民主德国 5 国领导人在莫斯科联合宣布，1968 年他们的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捷内政的干涉，应当受到谴责。”次日，捷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乌尔班内克宣布：捷共愿为 1968 年“因不赞成华约 5 国出兵而被迫离开党的人恢复名誉”。至此，举世瞩目的 1968 年事件在拖了 21 年以后，终于彻底翻案。

这些声明或决议给争论不休的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然而，它们能冰释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因那个时代而产生的种种误会吗？能完全解开民族心理中那个众说纷纭的情结吗？

啊！“布拉格之春，一个无法忘怀的情结！你究竟告诉了人们什么？

一、滚滚车轮

1．“解冻”之年

公元1953年3月5日，一颗曾经光芒四射的巨星在莫斯科陨落。在他用铁腕主宰了苏联乃至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一代天骄斯大林与世长辞了。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一个英雄与崇拜的时代终于完结；而一个痛苦与希望交织，失落与追求并存的变幻莫测的时代开始了。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他那双巨灵之掌遮盖下的冰封的苏联大地，悄悄地出现了第一批“解冻”的信号。年底，贝利亚——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中最骇人听闻的冤案的策划者和执行人——被作为“人民的刽子手”秘密处死。

苏共新任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从克里姆林宫刮起了一股试图摆脱斯大林遗产的所谓“非斯大林化旋风”。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不知不觉地变得宽松，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也渐渐发生微妙变化。1955年春，赫鲁晓夫亲赴贝尔格莱德与铁托言归于好。他一下飞机就把不久前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双手沾满鲜血的走卒”铁托称为“亲爱的同志”，从而把变化推到了顶点。

东欧国家很快感受到了赫鲁晓夫旋风卷来的暖流。在它的融化

下，各国政治生活中也先后开始了“解冻”过程。不过，它们的速度大相径庭，程度也强弱不一。

1954年底，波兰的哥穆尔卡悄悄地离开了监狱；匈牙利开始复查“拉伊克案件”；卡达尔度过3年的监狱生活后也重新获得了自由。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审判机器仍在无情地转动。古斯塔夫·胡萨克等人被冠以“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前国家安全部官员扎沃茨基遭到处决；约·帕维尔因“西方间谍罪”被判25年徒刑……捷克斯洛伐克的恐怖之夜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斯大林逝世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主尊偶像哥特瓦尔德紧随而去，继任捷共第一书记的安托尼·诺沃提尼成了一号人物。

这是一位不学无术，但又爱摆架子的人。对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崇拜使他始终不能走出过去的泥泽，在自大和守旧的篱笆里，他既不会透视历史，也不会洞察现实，对外界的变革信息表示出超乎常人的迟钝。因此，尽管斯大林逝世已经一年，他却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奉为圣典，继续转动政治清洗的法轮；尽管自由的清风已吹入华沙、布达佩斯的千家万户，他却依然我行我素，严格实行政治和思想控制，拖延对历史错误的纠正。

1956年，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转折之年。

2月末的一个平凡之夜，赫鲁晓夫向苏共20大代表，也向全世界宣读了一个最不平凡的报告，从而将“非斯大林化”的旋风刮至极致。报告几乎是一份控诉书，对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暴力”和“恐怖行为”作了全面的控诉，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专制”进行了系统的谴责。赫鲁晓夫喊出了一个惊雷般的声音：

“必须坚决消除个人崇拜，一劳永逸地谴责和根除同马列主义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必须彻底纠正作为个人崇拜消极影响结果而长期积累起来的违犯社会主义革命法制行为造成的种种罪恶。”

秘密报告不啻一颗炸弹，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它的影响

如此之大，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大变模样；它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所有与苏联有着类似遭遇的国家从此不再沉默，所有无视历史与现实的人不再心安理得。

不用说，诺沃提尼这些人是不大高兴的。因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否定了他们一直尊奉的“上帝”，动摇了他们据以维持权力的政治基础——斯大林式的清洗和高压。

但是，缺口毕竟出现了。

赫鲁晓夫的声音鼓舞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他们终于发出呐喊。站在前沿的是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4 月，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意味着对当局的首次挑战。著名的抒情诗人雅·赛弗尔带着诗人特有的伤感，对过去岁月的政治迫害作了控诉性发言，呼吁当局从监狱中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地判刑的作家和其他公民。5 月，一些作家编辑了一份名为《五月》的杂志，并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五月”小组来讨论和推动他们的文学活动。紧接着，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效而仿之，组织学习和朗诵小组，阅读和流传被禁止的文学书 。

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生活中渐渐地爆出了新的火花，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似地闪耀一下，便很快归于熄灭。

1956 年晚些时候，波兹南流了血，布达佩斯枪声阵阵。皆由于谴责斯大林及其遗产而激起了共产主义世界巨大希望的赫鲁晓夫，亲手消灭了匈牙利的纳吉及其“异端”给所有希望探索“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某种政治解放的人当头一瓢冷水。

诺沃提尼及其战友象预言家一样不禁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这一切证明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放松控制只能导致“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活动。于是，在布拉格，1956 年的解冻由于接着而来的寒风而再次结冰。

2. 山雨欲来

60年代的到来，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似乎具有特殊的心理影响。人们现在可以说，“可怕的50年代”终于逝去了。某种新的东西在流传着，某种东西在向人们窃窃私语：变化将要发生，他们会看到的那一天也许不会太远了。

变化最快的迹象是捷共党内暴露出了矛盾，捷共领导集团不再铁板一块。面对内外压力，在接受挑战还是僵化固守之间，捷共内部出现了第一次政治分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是以一个堂·吉诃德式人物所发起的挑战为标志的。

鲁·巴拉克，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内务部长。他曾是一位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从过去的政治审讯案中获得过不少好处，与那些给许多无辜带来痛苦的迫害行为密不可分；但他又是一位能充分领悟生活的现实主义者。当他发现旧的统治方式日渐远离生活而去时，便义无反顾地第一个向它发起了挑战。

从1955年起，巴拉克便领导着一个委员会，专门从事复查1951—1954年审判案件的工作。这项工作使他得以接触到大量秘密档案，看到了那些触目惊心的所谓“刑讯证据”，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被深深震动了，于是他要以行动表明自己与过去的决裂。

捷共主席团是诺沃提尼的堡垒，巴拉克的立场无疑遭到坚决反对，他不得不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密信。

巴拉克在信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向诺沃提尼的广泛个人权威公然挑战。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困难是同消除“个人崇拜……缓慢和不坚决有关”。他揭露道，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重要人物，正是50年代参与了政治审制案的准备和组织工作的人。这样，矛头既指向了诺沃提尼等少数人，也指向了他自己。

巴拉克太天真了。他以为那位率先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的赫鲁晓夫会理解他，并支持他。他不知道，这种近乎颠覆性的、严重违反共产党纪律的行为连赫鲁晓夫也不会容忍。

信被赫鲁晓夫转到了诺沃提尼手中。

接着是一段肮脏的插曲，它导致了巴拉克的毁灭。

首先，1961 年 6 月他被调离了内务部，然后巴拉克和他的私人秘书耶尼什少校被控从政府资金中贪污了 1000 美元。

1962 年 1 月 24 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滑稽剧发生了。那天夜里，诺沃提尼带着西罗基总理、新内务部长斯特劳加尔等人突然冲到巴拉克办公室，逮捕耶尼什少校。堂堂的共和国总统和党的第一书记为了一桩可能纯属莫须有的贪污案亲自出马，深更半夜去逮捕一名下级官员，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

其实，更可笑的一幕还在后头。

耶什尼被捕之后，诺沃提尼转过身来向斯特劳加尔，

——“我有权这样做吗？”

——“我也不能肯定，但您毕竟是国家元首、最高统帅和第一书记……”斯特劳加尔的回答很含蓄。

这时，耶尼什试图申辩，他说：“总统同志，这不符合事实……”

“不许你用‘同志’这个词来称呼我！”诺沃提尼大声打断了他。

巴拉克被特意找来，目睹了逮捕的全过程。不久，他也以贪污罪被捕，被最高军事法庭判处 15 年徒刑，耶尼什被判 10 年徒刑。

巴拉克从此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但是，捷共党内的裂痕并没有弥合，矛盾反而越来越尖锐了。而且，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由下往上正在形成一股要求变革的社会潮流。

革命导师们曾经指出，社会进步是合力作用的结果。60 年代初，内外因素促成诺沃提尼政权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就外部而言，赫鲁晓夫——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即兴表演家在苏

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掀起了第二次非斯大林化运动。紧紧追随苏联的诺沃提尼终于明白：继续回避历史问题已太不明智；列特纳山上的斯大林巨型塑像——8年前他亲自揭幕的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像——也不合时宜了。

在国内，知识分子和青年共产党员提出新要求——使捷克斯洛伐克走出思想冰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经济严重衰退。这些政治与经济危机是如此之深，以致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忽然都冒了出来，最终使诺沃提尼政权失去了控制。

如果要为诺沃提尼及其小集团开始走下坡路划出一个时间起点的话，那就是1963年。这是1948年到1968年这段时期内最重要的一年。很难准确地说，是哪件事，在哪一点上牵动了全局。冲击是如此迅速地相继而来，仿佛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顺理成章。

代表了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再次率先发难，掀起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抗。

第一枪是在4月22日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打响的。斯洛伐克人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10年前的大清洗中首当其冲。于是1963年反对这些清洗的思想情绪就表现为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复活和对捷克斯洛伐克依然存在的斯大林主义残余的抨击。

刚刚获得平反的诗人拉·诺沃麦斯基用心有余悸的声音声讨了那些可怕的岁月。他说，斯大林主义是一件"荒谬可怕的"事情，它毁掉了千万人的信任、自信甚至忠诚。

诗人的发言引出了关于"集体罪过"的问题。他说：

"事物的悲剧性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有些人或多或少地相信和接受了谎言，……悲剧在于以下事实，即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整个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知识分子的骚动很快蔓延到大学。五一节在布拉格和布拉格斯拉发发生了学生反对统治当局的示威游行。

5 月 27—28 日的斯洛伐克记者协会代表大会上，米·希斯科的发言象一根导火线，引爆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真正激情。他指责当局阻挠党的"更新过程"，他说，共产党的觉悟"决不应理解为驯服地服从领导机关的庸俗态度，而应该是按照列宁主义精神对党的事业自觉地和忠诚地服务，是从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立场出发对一切事实作客观的判断，这些原则对于被领导者和领导者同样具有约束力。"

这无疑是一个号角，一个战斗的号角，它提出了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一个根本命题，从而为 1968 年的改革展示了蓝图。

诺沃提尼政权马上对这些大逆不道的思想和行动展开反击，一场公开战斗在当局和知识分子之间打响，并毫无结果地一直持续到 1967 年。

3. 四面楚歌

诺沃提尼，这位脱胎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老一代政治官僚是一个矛盾思想的混合物。他的政治信条是：不必要求人们同意你，但必须让他们喜欢你，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尊敬你。

这些格言的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说，官僚集团可以不顾民众的舆论，实行不民主的统治，但无视人民必须有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不能保证人民最起码的需要，或者官僚集团表现软弱，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人民就会失去对它的尊敬。

基于这种信条，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范围越来越广，当局的选择余地一天一天地变小的时候，诺沃提尼便很策略地作出了一些小小的妥协和让步。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著名经济学家奥塔·希克教授被起用了，

允许他领导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潜心研究经济问题，为经济改革制订纲领。

对50年代政治清洗案件的复查和平反工作在小心翼翼地开展着，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被从监狱释放出来，越来越多的蒙冤者被恢复了名誉。

……

在许多单纯的眼光看来，光明似乎真的来临了，国家和社会似乎要从过去的扭曲中摆脱出来了。

然而，现实是复杂多变的，历史也是无情和曲折的。人们不久就发现，诺沃提尼并非一个真正宽容大度的人。

变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是，随着捷共领导层的新陈代谢，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日益增多也日益大胆的不同声音；来自社会的压力日渐增强；而更加恶化的经济形势则迫使当局不得不寻求灵活性。

但是，官僚制度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不会真心鼓励触及他们利益的经济改革，更不会容忍经济改革必须伴有政治改革的异端思想；诺沃提尼也不会长期宽恕知识分子到处公开挑战的过火行为。

捷克斯洛伐克就带着这样一种矛盾进入了1967年，它标志着诺沃提尼的“半截子暴政”到了最后阶段。

这年6月，诺沃提尼与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它成了“布拉格之春”的诱因之一。

大约是5月的某一天，在苏联的沃罗涅尔，一位叫帕·利奇科的捷克斯洛伐克记者采访了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他当时被贬在沃罗涅夫教书）。索尔仁尼琴把一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致苏联作家的公开信》交给帕·利奇科，托他在外头发表。信的内容是要求取消书报审查制度。那位记者把信带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并把它交给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从而在6月举行了的作协第4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激烈的冲突。

当作家帕·科胡特和亚·克里门特建议大会宣读这封信时，引人深思的一幕发生了。中央委员会书记、诺沃提尼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领域的真正主宰伊日·亨德里赫当时正率领党的代表团主席这次会议。这个又肥又胖、不修边幅的亨德里赫本来一直平静地坐在沙发奇上，这时突然跳了起来，冲着会议主席嚷道："如果你们宣读这封信，那么你们就一切都完了！"

会场顿时大乱。有的要求宣读这封信，有的反对，于是进行讨论，结果表决通过当众宣读。

亨德里赫怒而起身，提着他的公文包离开了会场。

事态一下子严重起来。诺沃提尼接到报告后，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硬反应。在他干预下，党中央决定：禁止公布大会记录；凡表决时赞成宣读索尔仁尼琴信件的党员作家，不能再担任作协主席团委员，必须辞职。许多作家被开除出党；科胡特和米兰·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看来，诺沃提尼似乎成功地粉碎了叛逆的知识分子。可是，另两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正在等着他：一个是濒临崩溃的经济问题，另一个是斯洛伐克问题。骄狂自大的诺沃提尼最后就被这两块顽石轰然绊倒了。

1963 年以后，斯洛伐克人之所以反对诺沃提尼政权，既是他们渴望民主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普遍反感，也是出于他们的民族主义。争取斯洛伐克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反对诺沃提尼及其中央集权的统治。从斯洛伐克人的观点看，诺沃提尼是可恶的，因为他的中央集权既伤害了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感情，也剥夺了斯洛伐克的金钱。

事实上，捷克人也看到，对斯洛伐克有害的事情对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也是无益的。因此他们与斯洛伐克人在反对诺沃提尼这一点上结成了联盟。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也正是在斯洛伐克这个问题上，一位在此

之前一直默默无闻的斯洛伐克人开始崭露头角。他就是身为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又兼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

自从进入捷共高层领导集团以来，杜布切克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起初试图在党内争论中、在诺沃提尼政权与社会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实际上是支持了诺沃提尼。后来他反对镇压知识分子，反对中央政府对斯洛伐克的经济歧视，从而逐渐走向诺沃提尼的对立面。

1967年的经济计划规定全国基建投资的28%用于斯洛伐克，实际执行时却不到22%。9月的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要求纠正这种不平衡现象，建议设立一项投资基金，以便更好地分配现有资金。他支持希克教授的经济改革方案，要求实行更大的地方分权，这样斯洛伐克人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就能和捷克人平起平坐，共享决定权。

他与诺沃提尼第一次发生了交锋。此后，双方关系一步步恶化，终于达到互不相容的地步。

10月30日，又一次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本来是想讨论“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斯洛伐克的问题压倒其他一切问题。有人提出应在捷建立联邦制。诺沃提尼听了很生气，他武断地声称，斯洛伐克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不再存在联邦制这样的问题。

“我不明白有些同志想干什么，总是重复联邦制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难道过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诺沃提尼用带侮辱性的语言指责了主张联邦制的人。

杜布切克挺身而出，作了反击。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勇敢和大胆过。他指责诺沃提尼的“行为象一个独裁者”，蓄意破坏经济改革；谴责诺沃提尼干预斯洛伐克的事务，损害那个地区的经济。

诺沃提尼简直气急败坏了。他想不到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之一杜布切克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如此不恭。他一把抓过话筒，直呼杜布切克的名字说：“亚历山大，你别忘了，斯洛伐克的经济有今天

的水平，完全是靠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帮助。你如果对过去处理这些事务的方式有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代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可以自行其是，不要再指望布拉格的帮助了。”

这是威胁，杜布切克听得出来，但他并不惧怕，因为他知道诺沃提尼的话触犯了众怒。

杜布切克从容不迫地把挑战升高了一级。

“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安托尼同志？“他也直呼其名，只不过稍有礼貌地加了一个“同志”，“我们都明白，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治制度问题了。如果要讨论经济分立的话，好吧，我们就首先讨论政治分立，从上面分起，从党的领导分起。”

会议在对骂和攻击中乱作了一团。

斯洛伐克的代表们团结在杜布切克周围，要求对捷共的结构、工作方法和党与国家的关系实行根本性改革。与此同时，捷克代表们也大都起来支持斯洛伐克人的攻势。

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呼声，那就是要诺沃提尼辞去最高领导职务。

正当捷共领导内部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诺沃提尼节节败退之际，一场意外的风暴加速了他的垮台。

晚上 9 点刚过不久，正当诺沃提尼和他的同事们在总统府设宴招待苏联贵宾，为十月革命干杯的时候，大约 1500 名查理大学工学院的学生从位于伏尔塔瓦河左岸的破旧不堪的大学生宿舍列队出发，朝着总统府的方向前进。

这次自发的游行同白天中央全会上的争吵毫无联系，大学生根本无从得知党中央的争论，他们上街是因为宿舍里经常停电、暖气不足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情。

布拉格的秋天天气很凉，到了 10 月底，学生宿舍里简直又冷又黑。学生们对这些问题早就怨声载道，可有关领导却一直没有予以

重视。

这天晚上，学生邀请了几位布拉格的记者去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大学生宿舍是个什么样子。正好这时候又碰上停电。一些年青人提议举行抗议游行，马上就有大群的人响应，于是游行开始了。

这是一次非政治性的游行。学生们手里拿着点亮的蜡烛，弹着吉他，敲着小鼓，边走边唱："我们要光明，我们要光明！"

当他们沿着聂鲁达大街走到一半的时候，被警察挡住了去路。他们便改道而行，但警察又尾追过来，驱赶人群。双方发生冲突，警察使用了警棍和催泪弹。骚乱一直持续到11月1日凌晨，有12名学生和3名警察受伤，其中一名学生失去知觉，两名学生脑震荡。

警察对举行非政治性游行的青年学生进行粗暴镇压引起了很大的反应，给日趋严重的危机火上加油。可是，自负而又迟钝的诺沃提尼在此可能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却一如既往地前往莫斯科去参加十月革命的庆典去了。

一个星期过去后，11月8日，诺沃提尼从莫斯科返回布拉格，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陷身于四面楚歌的局面。在学生们要求追究警察暴行、改善生活待遇的压力下，捷共内部要求他辞职的声音增强了。

现在，诺沃提尼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苏联的态度。

12月8日，在接到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拍来的急电以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秘密飞到了布拉格。次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主席团成员除杜布切克（他在斯洛伐克）以外全都出席了宴会。

勃列日涅夫默不作声地坐着吃着，当宴会大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宣布：他即将离开布拉格回国。至于捷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他说："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言毕马上离座而去。这一举动使诺沃提尼

及其拥护者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脱身事外实际上是对诺沃提尼的抛弃。诺沃提尼也许想起来了，这是他早晚要遇到的一次报复。三年前，他曾经给克里姆林宫发去一封愚蠢的电报，对赫鲁晓夫的倒台表示十分遗憾。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忘记他的那次表现。因此，当契尔沃年科大使期望勃列日涅夫来帮助诺沃提尼渡过危机时，心怀芥蒂的苏共总书记便毫不客气地利用了这个机会。

至此，诺沃提尼终于完全绝望。在12日下旬的党中央一系列会议上，他试图作最后挣扎，但亲信一个个叛离。1968年1月5日，中央主席团决定“将共和国总统和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免去诺沃提尼的第一书记职务，保留总统之职。杜布切克当选为第一书记。

二、春天始于元月

1. 春潮涌动

杜布切克，一个忠诚的、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员，同时又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共产党领导人形象。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式的、由社会党转变而来的共产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举家迁往苏联，杜布切克在苏联从幼年起就受着共产主义的熏陶，成年以后全心全意投入了共产党的事业。

作为一名严格培养起来的共产党员，他对事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抱有执着信念，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异常严格的自我纪律，在党的利益需要时，他能够忍辱负重，牺牲一切。

可是在杜布切克身上，是时也存在另一些与这种忠诚相互矛盾

的因素，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作为一个斯洛伐克人）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和带着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

当杜布切克刚刚掌权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改革计划，更没有想到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一条为苏联所不容的道路。事实上，莫斯科对他的上台并无丝毫不安，反而在分当选的第二天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祝他工作"顺利"，并且希望，在他领导下，苏捷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诚挚友谊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西方人称"布拉格之春"是一场革命。从捷共领导层的变化来看，这场革命是随杜布切克上台开始的；从革命本身的内容与方式来看，它是以自由发表意见、公开辩论和政治气氛空前活跃为起点的。

起初，最高领导层的变动并没有立即在捷引起一种真正变革之感，更没有使人看到这是一场正在兴起的革命。在布拉格等地，既没有群众欢呼的热烈场面，也没有洋溢着胜利气氛的游行活动。甚至连斯洛伐克人也没有十分看重这件事，尽管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斯洛伐克人担任全国最高的政治领导。

人们并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时刻。以往每次领导人变换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呢？虽然他们迎来过一个又一个的新人，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是那么贫乏单调，他们的国家也依然是在缓缓爬行。因此，默默无闻的杜布切克上台怎么能轻易地使人们产生希望呢？

1968 年 1 月是一段平静的日子，社会上看不到任何过份的渲染和鼓动。人们一如既往，奔波于机关、工厂、商店之间，为生计和收入机械地忙碌着。然而，正是在这种平静的表象下，一种崭新的希望在悄悄酝酿着。

1 月 12 日，斯洛伐克的文化刊物《文化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旧的纪念日和新的希望》的文章，作者是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

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古·胡萨克。他写道：

“新年引起了我国人民的深思，也唤起了新的希望：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对于新思想的探索和思想的成熟也许将逐渐获得具体的成果，在整个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我们在全体进步人民支持下为发展我国社会的民主改革而作的努力，也许将加速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这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场斗争。我们深信，对于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党的领导机关中进行的讨论和它在人民中间引起的反应唤起了新的希望。”

胡萨克虽在1963年获得平反，但至今并未恢复官职。因此如果说他这篇呼唤“新希望”的文章更多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关注他的存在的话，那么，作为共和国内阁部长和中央委员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观点就颇具影响了。

他于1月21日在《劳动报》上发表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充满信心地说到：“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调整和克服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我们不能容许再度发生这种情况。关于问题应如何解决的不同观点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民主方式加以解决，而决不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在经济领域中，必须将经济改革坚决继续推行下去……在社会领域，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知识分子也许比别的阶层有着更深沉的历史和社会使命感，因此总是最迅速地领悟历史转折的重大时刻，并本能地对社会变革的每一次机遇作出直接反应。

准确地说，对于196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如晨曦初露般的希望之光，正是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看得最清楚，他们毫不犹豫地迎接和拥抱了希望。

1月24日，作家协会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下选举了爱·戈尔德斯图克担任主席，米兰·昆德拉等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中青年作家被

选入作协主席团。为了表示与过去的决裂，作协将自己的刊物《文学报》改名为《文学通讯》，准备使它成为一个鼓吹改革的阵地。

新闻工作者在短暂的沉默后，终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明白必须向民众解释当前的事实，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正面临的历史机遇以及改革的重要意义。

很快的，几乎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苏醒过来，一股呼吁自由和宽容的浪潮开始在整个文化界涌动。

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人们由交头接耳悄悄传递消息逐渐走向礼堂、会议厅、青年活动中心以及早已被收归国有的天主教大教堂。在这些场所，他们倾听着，注视着一场又一场热烈的辩论与对话。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自己都成了各种自由讨论的参与者，大学讲堂、报社、编辑部、工厂和企业的俱乐部以及生产合作社大会……激动人心的讨论不断举行。

过问政治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最时髦的消遣。

2. 天降大任

政治热情引发出对改变现状的深情期待和急切盼望。这些情绪自下而上影响着政治舞台上主要角色们的意志，推动着他们仓促而艰难的起步。

杜布切克对于突然荣升为共和国第一人物有过短暂的意外和慌乱。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开动，不管他愿意与否，不管前途将会如何，他都只有与自己的同行们结伴而行，即使是走向一个布满风险的未知时代。

也许是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惯例，也许是杜布切克出于自身固有的谨小慎微，这位并不十分幸运的政治明星在真正向观众亮相之前，特意安排了一连串闪电式的访问和会谈，给至高无上的苏联领导人和其他体华盟国首脑带去一片真诚和许诺。

1 月 29 日，杜布切克飞抵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在"热烈友好、诚挚的会谈中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和"友好的谅解"。

2 月 4 日，杜布切克在捷匈边境的科马尔诺小城会见了老朋友卡达尔。这位正谨慎地跳着经济改革"小步舞"的匈牙利领导人，对杜布切克用一口流利匈语介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宏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2 月 7 日，杜布切克又匆匆赶赴紧依波兰的工业城市俄斯特拉发同哥穆尔卡进行会谈。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杜布切这些寻求理解和支持的礼节性外交活动中，没把东德的乌布利希列入日程表，这个有意无意的遗漏使乌布利希在以后几个月中变成了折磨杜布切克的急先锋。

2 月 1—3 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这本来并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政治场合，但出于人们意料的是杜布切克却选中了这次会议作为自己首演的舞台，从而使它有了不同寻常的含意。

面对 1800 名代表，戴着眼镜的杜布切克似乎略带羞怯与腼腆。

"捷共中央全会 1 月 5 日的决定为人民在各方面发挥积极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把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发动起来了。"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也包括处理人民意见的方式：人民是否真正感到他们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作出决定，他们是否真正感到他们是在参与处理和决定这些重大问题……"

杜布切克最后告诉他的人民：党正在准备的一个"行动纲领"将明确规定"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阐明"党在社会、国家和经济领域的当前政治任务"。

尽管这位第一书记的讲话并没有为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指明具体的步骤和措施，但它所包含的主题——执政党自我革新、改革陈旧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新型社会等等——无疑给了人们以某种启迪，人们从中汲取的显然是探索的信心和勇气。

斯姆尔科夫斯基，这位善于思索和追忆的老共产党员，以轻松愉快的语调在 2 月 5 日布拉格电台特别节目中发表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谈话，公开主张党政分开。他在文章中写道：“勇敢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归根到底也是我们对于自己和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责任。”

3. 走向辉煌

三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大地。满怀希望的布拉格市民畅快地吸吮着空气中的清新。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央全会在万民翘首的情形下于 3 月 28 日召开了。全会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诺沃提尼总统的辞职要求。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孤家寡人，因自己的粗暴和守旧终于被历史和现实完全抛弃，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布拉格宫——他曾经作了 12 年主人的总统府。

接替他的是年过古稀的卢·斯沃博达将军。他是一位有着运动员般体魄的老人，那富有表现力的、布满银发的“个性化脑袋”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

他有过传奇式的经历。许多人把他看作象征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英雄。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作为捷克军团的一员与俄国人并肩对奥匈作战，并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担任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流亡苏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志愿军司令。1945 年出任战后第一届政府的国防部长。50 年代的大清洗使他遭受不白之冤，由于赫鲁晓夫的亲自过问于 1957 年被恢复名誉。

“斯沃博达”的捷克语意思是“自由”。人们把他当选看作是吉兆。奇怪的是苏联人也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斯沃博达。

与此同时，中央全会对党政领导机关进行了一次人事大改组，在

新的党中央主席团、书记处、政府和国民议会中，以杜布切克为中心的改革力量扩大了阵营。虽然他们的份量尚不足以赶走所有的保守势力，但对于掌握改革之舟的航向，他们无疑有了更大的自信。

1968年4月5日，历经4个月的酝酿和起草之后，一份将使共产主义世界震聋发聩的政治文件——捷共《行动纲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终于问世了。

在这份历史性文件中，杜布切克与他的谋士们全面托出了自己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索成果，展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纲领的基本论点是承认有一条“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核心思想是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个所谓“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社会。

长达63页的纲领由5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猛烈抨击了过去的错误和扭曲；第二部分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命题，主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新体制；第三部分是关于经济民主化，阐述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方向；在关于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第四部分，纲领探讨了使这些领域健康繁荣地发展所应创造的条件；最后一个部分涉及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在表示要坚决与其他社会主义盟友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纲领着重强调了与西方恢复联系的重要意义。它宣称：“在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我们将积极推行和平共处政策。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作为一个工业国的需要与可能都要求我们执行一条更加积极的欧洲政策，其目的是发展互利关系，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

《行动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布拉格之春”进入实质性阶段。在它的感召下，捷克斯洛伐克走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辉煌境界。

历史给这个中欧民族留下了太多太多的伤痛，毋庸置疑，人们的第一个行动必然是重新审视过去，卸脱沉重的心理包袱。

4月初，《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呼吁调查前外交

部长扬·马萨里克神秘死亡之谜。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1948年3月10日早晨，共和国战后的第一位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被发现死在他寓所楼下的院子里，死因不明。官方草草作出结论说，马萨里克系“自杀身亡”。但人们心中一直存着疑团，怀疑外长是阴谋的牺牲品，阴谋的主使者是苏联安全部门。

现在，在寻找历史的氛围里，马萨里克事件被重新提了出来。

事实上，对马萨里克父子的纪念活动在此之前就已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进行着。3月7日，人们自发纪念了托马斯·马萨里克——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缔造者和总统——诞辰117周年；三天后是老总统之子扬·马萨里克之死20周年忌日，有组织的代表团以及成群结队的学生、工人和普通百姓纷纷前往位于布拉格以西50公里的小墓地，向马萨里克父子的坟墓敬献花圈，表示哀悼。人们打着写有捷克民族英雄胡斯的格言——“真理将获胜”——的标语，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

马萨里克神话的复活有着感情和政治上的双重原因。如果说对老总统的纪念寄托了某种怀旧感的话，那么对小马萨里克的纪念显然表明了人们心中一直不曾消失的疑团：他是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

对马萨里克死因的大胆猜测引出了人们对50年代清洗的恐怖和迫害的控诉，为蒙冤受屈者平反，恢复名誉的工作大规模地展开了。

4月29日，斯沃博达总统举行了一次象征性的仪式，将社会主义勋章”和一级“2月25日勋章”归还给鲁·斯兰斯基的家属。他是那不堪回首岁月里最大冤案的主要牺牲品。

16年前，身为捷共总书记的斯兰斯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同哥特瓦尔德总统一起掌管着国家的政治命运，但大清洗的浪潮连他也不能幸免。

1951年11月24日夜，斯兰斯基突然被捕入狱。他被指控为一个“叛国阴谋集团”的头子，受牵连者达数十人。一年以后，对所谓的“阴谋集团”进行了一场耸人听闻的大审判，一场由魔鬼导演的、空前荒诞的审判，事先精心周密的“取证”和“劝服”，使审判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14名被告和33名证人在法庭上对自己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

然后，斯兰斯基等11人被顺理成章地判处了死刑，另3名被告被处以无期徒刑。从此他们成了一群冤魂！

16年过去了，在布拉格的春天里，历史终于又还给了他们一个公正。

三、阳光与阴影

1. 大使的不眠之夜

布拉格春天的信息，吸引了世界范围的注意，其中最为关注的当首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苏联领导人物。

20多年来，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旨意亦步亦趋的不正常状态使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未经苏联允许的任何事情不得擅自妄为。因此，捷领导人企求恢复中欧传统，重建对外关系的尝试无疑是对苏联权威的一个无法容忍的挑战。另一方面，莫斯科的颐指气使也导致素以发达民族而自豪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积聚起强烈的逆反情绪。当“布拉格之春”为渲泄不满打开闸门以后，这种情绪必然地会在某种程度上爆发为对苏联的厌恶。

冰球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最喜爱的运动项目。2月15日，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第19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赛事正酣。一场冰球冠亚

军争夺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队和苏联队之间紧张进行。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数十万人从电视和电台上看着、听着实况转播，急切地盼望着他们所喜欢的结果。苏联队是一支有着不败纪录的劲旅，要战胜它谈何容易！但是，捷克斯洛伐克队以5：4力克对手，捧回了激动人心的奖杯。

消息传开的顷刻之间，布拉格街头出现了一片沸腾的海洋，人们欣喜若狂，激动地庆祝着这一非同寻常的胜利。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人过了个并非节日的节日。

这一似乎偶然的事件其实包含了某种特殊的意味，它暴露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内心深深埋藏的反感与愤懑。他们利用欢庆体育健儿获胜的这种特殊方式表达了固有的民族情绪。

苏联领导人或许在其他许多事情上是迟钝的，但对任何涉及苏联利益或尊严的信号却是异常敏感，并能作出惊人的快速反应。

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契尔沃年科大使的房间里，灯火彻夜通明，大使已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一双焦虑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他忧虑重重地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切，心中那早就出现并怎么也挥不去的预感似乎越来越明显了：眼前正在变化的现状不仅仅是关于如何最好地治理这个国家的理论探讨，有一种不利的倾向——也许可以称之为“反革命”的东西——正在酝酿、膨胀。

焦虑不安的并非只有大使先生一个人。2月下旬，勃列日涅夫率华约其他盟国首脑人物借捷共的一次庆祝活动之机考察了布拉格以后，也开始紧紧地锁上了他的眉宇。尽管他曾为杜布切克的崛起发过一封心情愉快的贺电，但他的愉快心情很快就被那位斯洛伐克人倡导的那些东西搅乱了。

随着捷国内局势的迅速演化，勃列日涅夫觉得自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3月23日，即诺沃提尼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的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突如其来地把波兰、东德、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

领导人召集到东德的德累斯顿开会，谋求与各国首脑一起劝阻杜布切克的“过火”行动。勃列日涅夫提醒杜布切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复杂的形势下潜藏着危险，威胁着“华沙条约体系”（实际是苏联）的利益，他表示将“全力协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反社会主义分子”。

杜布切克虽然感谢他的这番“好意”，但一再表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捷共受到人民最广泛的拥护，实行改革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其榜样对西欧各国共产党也有好处。这时候，12年前曾以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姿态启发过波兰人思想的哥穆尔卡却粗暴地打断杜布切克的话说：“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感兴趣！我们只关心维护我们已有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允许搞什么实验。”

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领导人与盟友之间虽然发生了第一次大对抗，但勃列日涅夫还不想使冲突公开化，因此在公报中仍然粉饰性地称这次会议“在真诚友谊、平等、互相信任、互相支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人很快就发现，东柏林的宣传家们有着打破沉默的天赋。

2. 军事演习的幽灵

3月27日，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库·哈格教授在东柏林哲学家代表大会上讲话说：“西德宣传中心在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运动中引述……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它们卖力地引用捷林业部长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他们非常详细地报道捷新闻记者和作家对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作用的攻击。……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的这种行径使西德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可能在动乱中覆灭。”

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次公开谈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背景和捷共的作用。同时，布拉格出版的德语日报在东柏林遭到禁止。

东柏林和华沙还对布拉格电台的节目进行了干扰。

很难说捷克斯洛伐克人对多嘴多舌的东德理论大师们有什么好感。因此，哈格的话一传到布拉格，马上激起了极大反响，并几乎导致一次不大不小的外交危机。捷外长戴维召见东德驻捷大使，对他提出正式抗议。捷驻东柏林大使也向东德外长奥·文策尔和党中央书记埃·昂纳克提出口头抗议。捷《红色权利报》强烈谴责东德“严重干涉（捷）内政”。各种群众性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作出强烈反应。反法西斯战士联盟的决议认为，哈格的讲话不仅有损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荣誉，而且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事业”。

四月的布拉格，真是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行动纲领》引起轩然大波；作为过去错误化身的人物纷纷滚落尘埃；一桩桩所谓的“阴谋”、“疑案”被公诸于众；一个个蒙受冤曲的亡魂得到了抚慰。沐浴在春之气息中的人们禁不住对美梦成真产生了更多的憧憬和希冀。然而，现实总是及时告诫人们：美梦毕竟是虚幻的境界。

4月底，正当捷克斯洛伐克人以空前的热情盼望着即将来临的“五一”节和灿烂的五月时，布拉格迎来了一位不大受欢迎的客人——华沙条约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这是他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来访。人们不清楚他负有什么使命，但捷国防部长楚尔将军含糊其词的解释使人们明白，雅库鲍夫斯基元帅曾建议在最短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举行华沙条约各国军队的联合演习。

这条消息无疑给春意正浓的布拉格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完全想象得到，华沙条约值此关键时刻在捷境内举行演习，对捷正进行的改革运动具有何种含意。一位布拉格市民担心地说：“放他们进来之后，谁知道他们走不走？”事态的发展不幸证实了他的这种担心。

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军事演习的威胁就象恶梦一样萦绕着捷克斯洛伐克，直到苏军入侵那一天。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人走入了喜忧参半的五月。

5月1日是一个欢乐的节日，鲜花、笑语点缀着喜庆的布拉格，

簇拥着风华正茂的杜布切克。“他的长鼻子尖尖翘起，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不管他走到哪里，群众都向他欢呼，他有时微笑，有时欢笑。”狂热的崇拜者们向他献上一束束美丽的鲜花，他腼腆地，但也不禁有点自得地收下……

5月3日子夜，夜色笼罩下的布拉格似乎还弥漫着节日喜气的余波，一架专用飞机从布拉格郊外的鲁津机场悄然起飞，掠过静静的苍穹，向东方飞去。机上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政府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比拉克等人。他们是突然接到“苏共中央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进行紧急会谈的。

在莫斯科，他们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以及其他克里姆林宫官员连续会谈36小时后立即飞回国内。会谈的真实结果秘而不宣，但公报中“简单而冷淡”的提法和杜布切克对报界的谈话不由令人产生不祥之感和深切的关注。

杜布切克的谈话公开承认了苏联领导人对捷克斯洛伐克感到“担心”。而布拉格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担心”很容易变成敌对行动。虽然杜布切克一再宽慰他的人民，说苏联人“理解了我们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而作的努力”，但世故和多疑的捷克人不相信这种解释的表面价值。

在人们日益加重的顾虑中，军事干涉是最可怕的前景。克里姆林宫把布拉格之春与1956年匈牙利悲剧相提并论使人们不由自主对可怕前景的可能性产生更强烈的预感。

来自苏联的压力在明显增强。5月7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否认捷克斯洛伐克报刊关于杨·马萨里克之死可能与“苏联保安机关的顾问”有牵连的报道，称之为“捏造和挑衅性的”。次日，波兰大使照会捷外交部，抗议捷报刊、广播和电视关于波兰国内情况的报道。同一天深夜，除杜布切克以外的华沙条约各国领导人被召往莫斯科去密商，中心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

与此同时，华沙、东柏林等地的报道都说，苏联部队正通过波兰向捷边境进发。

布拉格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华约各国首脑的莫斯科会晤和苏军调动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绝非巧合，问题是苏军出于什么意图而调动？是否马上就要对捷进行武装干涉呢？人们对此尚不确知。5 月 9 日是苏联坦克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布拉格 23 周年纪念日，布拉格人在表面隆重的庆祝中度过了极度紧张的一天，经历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剧。

分析家们对这幕讽刺剧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苏联人正在搞一次毫不掩饰的示威，警告不听话的捷共领导人：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纲领就会大难临头。另一种看法认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确定打算在 5 月 9、10 两日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没有扩散以前就加以切除。5 月 8 日将华约各国首脑紧急召到莫斯科，就是要他们同意这一行动。

从军事角度看，5 月份发动一次小规模突袭的可能性已经具备。据捷军事情报机关了解，苏联在 2 月底就已经拟定了一项紧急应变计划，开始了包括空军在内的部队调动的后勤支援工作。

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发生入侵呢？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也许是策划者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在华约各国首脑中，卡达尔是坚决反对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极力主张的“警察行动”的。据说，卡达尔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争辩说，应该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找到一种“政治解决”办法。这个年长而又成熟的政治家肯定回忆起了 12 年前导致他上台执政的布达佩斯悲剧，他可能不希望给自己印象不错的杜布切克成为又一个“纳吉·伊姆雷”。显而易见的是，苏联领导人中也并非个个都是“鹰派”人物。

然而，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似乎是：苏联当时还缺乏足够的“政治理由”。苏联的宣传机器才刚刚开动，虽然布拉格被描述成反

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阴谋"的罪恶渊薮，但实行武装干涉的政治借口并不充足。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莫斯科的"大棒"毕竟推迟了3个月才挥舞起来。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这是侥幸抑或是更大的不幸？

3. 达摩克利斯之剑

初夏来临，捷克斯洛伐克的气候依旧凉爽。温和的日光在青山绿水间照射出融融的温馨。

在布拉格，宽敞的市中心大街旁边延伸着两条绵长的绿色林带。公园里鲜花盛放，鸟语声声；葱葱绿树环抱中的一座座别墅、公寓，透着一般宁静；伏尔塔瓦河两岸，游人络绎不绝，缓缓流淌的河水不知带走了多少个哀怨动人的爱情故事……

置身于这座中欧古城的迷人风情里，从春天走来的布拉格人似乎忘却了眼前的危险和不安，尽情陶醉在改革所带来的轻松之中。

然而，1968年夏天对于"布拉格之春"的建筑师们却是一段危机四伏、烦躁不安的艰难时光。

5月以后，在莫斯科指挥下，主要由苏联、东德和波兰的舆论工具担任角色的宣传大军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显示的捕风捉影、造谣诬陷的本事足以令任何高手自愧弗如。最可笑的谣言莫过了一个关于"美国兵和美制武器"的故事。

戴·沃尔泊是一位美国制片商。他赞助拍摄的《里马根桥》是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莱茵河上的事情的电影。捷克斯洛伐克被选作主要外景地。因剧情需要，沃尔泊向奥地利军队购买了8辆拆除了武器的美制坦克作为拍摄道具，并运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东德的《柏林人报》竟因此借题发挥，称美国军人伪装成临时演员进入捷境。事实上，当时在布拉格唯一的美国军人是担任电影

技术顾问的一位美军退役上校。

几乎是与此同时，东柏林和保加利亚索非亚的一些报刊说，在波希米亚西北部矿业城市索科洛夫附近发现了美制武器。捷当局不得不下令立即进行调查。结果很快表明，这是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美制武器，由于特殊的防腐剂（苏联军队使用这种防腐剂）迄今仍保存完好，武器装在麻袋里，藏在一座桥底下，麻袋上有表明莫斯科制造的"GUM"标记。显然，这是苏联或东德情报机关的一个杰作，其用意当然是希望以此向世人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反革命形势和帝国主义阴谋。

怒不可遏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这些忍无可忍的无稽之谈奋起反击。布拉格电台 5 月 13 日国际时事评论说，苏联、东德对捷的攻击"是如此耸人听闻的蛊惑之词，以致于对这一套颇为熟悉的人也为之瞠目结舌……我们从亲身体验中知道，少数几个人用什么方法和诡计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整个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

坦白地说，捷克斯洛伐克人如果仅仅只需要应付这些诬陷和指控，事情也许简单得多。但苏联人何曾如此容易被打发过呢？

5 月 17 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苏联高级将领代表团和苏联总理柯西金突然接踵降临布拉格。

柯西金总理全然不顾自己给捷克斯洛伐克人带来的措手不及，在18日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以后，便带着孙女悠然前往卡罗维发利休养地去领略那里的日光浴了。如果象西方媒介所言，柯西金的这次来访是以鸽派的身份出现，是苏联人还没放弃和平解决的尝试，那么格列奇科元帅的到来就颇为令人费解了。

显然他是来跟捷克斯洛伐克人重提军事演习之事的。

他没有徒劳。当他于 22 日离开后，捷国防部就宣布了华约 6 月份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的消息。演习的规模也升级了，由原来所谓少数参谋人员的"沙盘演习"变成了检验华约部队战斗准备状况"的作战演习。

6月18日，华沙条约的军事演习在波希米亚西部正式开始。苏联宣布派出参加演习的总兵力是数千人，但事实上被调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部队有1万多人，并且代表了苏军几乎一切重要兵种。早在6月3日夜到4日晨，一个苏联坦克师从波兰悄悄地进入捷境，驻扎在离波兰边界约30英里的利巴瓦军事宫地。

这次看似与以往一样的常规军事演习实际上包含着人所共知的特殊寓意，因此不能不给捷克斯洛伐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动。人们从“布拉格之春”开始以来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有形的威胁。

7月3日，苏军元帅雅库鲍夫斯基宣布，“演习达到预定目标”以后正式结束，苏联部队开始分批撤退。然而，直到7月中旬，人们发现苏联士兵仍呆在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捷情报机关还得知“苏联人敷设了专用电话线，用以窃听政府和党的谈话。他们绘制了所有机场和军事设施的详细平面图。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想永远在这儿呆下去……”

捷克斯洛伐克人当然明白苏军不愿撤出是什么意思，他们看见了一把高悬于顶的“达魔克利斯之剑”。荒唐的是，当切尔尼克总理试图打电话给雅库鲍夫斯基，同他交涉苏军尽快撤离事宜时，这位元帅却躲了起来，让人转告说他不在。

6月底7月初，随着《两千字声明》和“华沙五国信件”的先后出现，“布拉格之春”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

6月27日，根据捷一批科学家的建议，由小说家卢·瓦楚利克执笔起草了一份“致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及所有人”的声明，发表在《文学通讯》上。在这份被称为《两千字声明》上签名的有70人，发表后签名者增至数万人。

《声明》的内容本身并没有特殊之处，人们在报刊文章和广播电视评论里早就以各种形式谈论过这些问题。它只是明确地表达了一部分激进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顾虑。“他们担心，由于

过多的保守分子、极权专制的拥护者还在捷共内部和整个权力机构中占据着很多职位，并且得到国外的支持，整个‘复兴进程’可能受到阻碍和威胁”。《声明》号召人们支持“一个更好的、更诚实的共产党”，支持和保卫”民族复兴进程”，甚至不惜“拿起武器来”。

《两千字声明》引起了克里姆林宫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勃列日涅夫立即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的正式宣言，要求捷共当局与这个声明划清界限。

杜布切克理解《两千字声明》作者们的心情，但对他们的冲动不禁有点窝火，因为这种冲动给苏联提供了指责捷共的借口。他不得不警告说，没有理由认为“民主化的努力正在放慢，或者认为，民主化的努力已完全停止了”，“采取脱离现实的、不虚心的和不负责任的作法可能造成无政府局面并造成许多物质和精神损失”。

杜布切克表面上对苏联人作了一个交待，但谁也不知道苏联人的怒火是否真的熄灭了。

事实果然证明，莫斯科不想放过这个借口。7 月 8 日，勃列日涅夫、乌布利希、卡达尔、哥穆尔卡和日夫科夫给杜布切克发来了措辞几乎完全相同的邀请信，要求他参加华沙条约国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两千字声明》引起的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事业的威胁。杜布切克在中央主席团支持下拒绝了邀请，提议先举行双边会谈，然后再召开首脑会议。

7 月 15 日，华沙条约国的 5 国领导人撇开捷克斯洛伐克，按原计划在华沙举行了会议。他们通过了一封充满火药味的 5 国联合信，以威胁的口吻警告捷共领导人说：“我们不能同意让敌对势力把你们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的事了，这是我们这些华沙条约国的共同事业。”

这封信是对布拉格的最后通牒。它要布拉格选择：要么刹车，不然就不客气了。

但是，布拉格还是没有屈服。杜布切克代表捷共中央写了一封

坚定而有礼貌的回信，表示捷共将继续自己的方针、路线，并宣称捷不存在“华沙来信”中所说的“反革命局势”。

4. 从切尔纳到布拉迪斯拉发

切尔纳，斯洛伐克东南角上的一个僻远小镇，位于捷、苏、匈三国边界交界处附近。它的南边约10英里处是蒂萨河，这条河从匈牙利流入斯洛伐克，然后蜿蜒曲折地沿苏匈边界而下，最后重新折回匈牙利。

华沙来信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人与苏联人之间的公开对抗已完全明朗。其高潮的第一幕从1968年7月29日开始，持续了4天时间，地点就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

这是两个国家的当政者之间最奇怪的一次会面。每天早晨，一列火车从苏联载来阵营庞大的苏共代表团，与斯沃博达总统和中央主席团全体11名委员组成的捷共代表团进行较量。晚上，他们坐专列返回苏联境内。一时间，小小的切尔纳镇变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人们想知道，苏联人在这场奇特的较量中会使出什么招术。

在戒备森严的切尔纳电影院里，会谈一开始就带有火药味。勃列日涅夫宣读了一个长篇声明，指责捷克斯洛伐克背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效劳；指出新闻自由正威胁着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作用，从而使这个国家有脱离华约和经互会的危险。这些指责简直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侮辱，因此遭到了坚决拒绝。杜布切克再次申辩说，捷改革运动的唯一目标就是建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双方对立的立场很难调和，会谈一度破裂。虽然不久又恢复进行，但终于未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成果。8月1日发表的联合公报非常简单，除了“反帝反修”和重申“团结、忠诚”等老生常谈以外，唯一实际的东西是计划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华沙条约国的

首脑会议。

那天晚上，回到布拉格的杜布切克对记者说，他带来了好消息，捷克斯洛伐克人可以安心睡觉了。然而，4 天切尔纳会谈期间，人们在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中积聚起来的疑虑和沉默并非第一书记故作轻松的保证就能烟消云散。从杜布切克疲惫的面容和沙哑的嗓音里，人们有理由想象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切尔纳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是苏联提出的一个方案。经过 3 天空洞而又乏味的会谈，6 国领导人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堡的明镜大厅签署了一份空洞而又冗长的文件。

它差不多提到了所有问题，可是差不多什么问题也没有透彻地说明。

对捷克斯洛伐克而言，这份文件似乎是一个胜利——尽管胜利是短暂的。因为它没有提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危险，也没有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帮助兄弟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义务，它甚至连捷克斯洛伐克的名字都没有单独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领导人似乎忘掉了“华沙 5 国信件”和切尔纳会谈所带来的不愉快。因此，当镁光灯闪烁，一幅幅“兄弟”之间微笑、拥抱、握手和接吻的历史镜头被定格时，外面的政治世界理所当然地松了一口气，错认为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几乎所有西方报刊都作了一厢情愿的解释，鼓掌欢呼这个事件是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的彻底胜利。于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纷纷外出度假，其中包括副总理奥·希克和外交部长哈耶克。杜布切克在电视讲话中的语气也一派乐观。

只有苏联知道，这是他们在教训杜布切克之前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杜布切克虽然也知道这是短时间的暂缓动手，但他看错了时间表。他在会谈后告诉朋友说：“我们赢得了 3 个月或者 6 个月的喘息时间。”

然而苏联仅仅推迟了三周时间。

8 月 11 日，苏军又沿着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东南部和北部边界开始了新的演习。与此同时，苏联驻东德部队于 8 月 14 日进入紧急备战状态。8 月 16 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军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飞抵东柏林进行最后的视察。次日他们为了同样的目的访问了华沙。

大棒终于高高举起。

5. 乌布利希的“黑信”

8 月 9—10 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来到了布拉格。这位敢向莫斯科挑战的首倡者在布拉格街头受到了人们对待英雄一般的欢呼。

正如铁托自己所说，他的来访是为了显示友好关系和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发展。他告诉记者，捷共中央委员会的态度完全适合当前的发展和民主化的需要；捷当前的进程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的全世界的发展也很重要。铁托的言行令捷克斯洛伐克人着实地感动了一番。5 天以后，另一位面对苏联的权威和压力桀骜不驯的人——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也给捷克斯洛伐克人带来了同情和支持，使布拉格度过了最后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

绝非巧合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瓦尔特·乌布利希夹在铁托和齐奥塞斯库来访之间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尽管乌布利希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安排一次会见，但为了不致于触犯他，杜布切克还是同意与他在卡罗维发利举行会谈。

据说他起初要求得到“和铁托总统同等的待遇”，但立即被婉言拒绝。这小小的不愉快有没有让乌布利希怀恨在心不得而知，不过，至少他故意作出潇洒，表现得非常无拘无束的通情达理。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那里是没有书报检查制度的，所以我更能理解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希望取消有关报刊、广播和电视的检查制度的心情。”

乌布利希真的是来表示理解的吗？会谈中，乌布利希终于抛出了他的真正意图。他提出了那个曾一再纠缠杜布切克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对西德的政策和立场，希望获得一个满意的答复。他问道：杜布切克能否答应，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除非事实在布拉格同东柏林之间取得一致，就不同波恩进行任何接洽？

杜布切克的答复是直截了当的，“不行”，他说，“同所有盟国全面协调外交政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是重要的，但答应同特定的一个国家——东德密切配合可办不到。这样做等于给东柏林以永久的否决权。”

几个钟头的会谈一直弥漫着冷冰冰的气氛，一无所获的乌布利希是吹着山羊胡子怒气冲冲而去，还是落落大方地与杜布切克友好分手，传闻不一。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乌布利希回去后立即写信向莫斯科作了汇报。而且正是这次会谈以后，克里姆林宫对杜布切克的感情更加恶化了。那么，乌布利希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显然他大肆抱怨了一通杜布切克的傲慢并提供了自己遭拒绝的所有细节。但更令莫斯科不安的看来是他提供的铁托同杜布切克商谈的“内幕情节”。乌布利希断定说，铁托叫杜布切克取消在切尔纳所作的保证，劝他彻底反抗莫斯科。乌布利希的想象力富于随意性，他说：铁托还劝捷克人更加靠拢南斯拉夫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不结盟国家”集团，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乌布利希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叛变，转向中立，直至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结合在一起，就会撕碎“社会主义阵营”的心脏——这是铁托的访问给莫斯科和它的几个盟国所造成的重大危险。

乌布利希的诽谤也许包含着几分真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其它渠道传来的情报相符合，因而克里姆林宫的不安情绪便越加增长，粉碎那似乎存在着的“布拉迪斯拉发精神”的决心越加坚定了。

这时，还有一个人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他就是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8 月 17 日，杜布切克应卡达尔的紧急邀请飞往靠近匈牙利

边境的科马尔诺诚。虽然卡达尔根据事先同莫斯科打过的招呼，责备杜布切克未能履行他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作出的诺言，并且重申了勃列日涅夫的要求：撤换捷国内所谓“自由派”领导人的职务，同意华约部队在捷驻留。但据知情者分析，卡达尔是在知道莫斯科决定进行军事干涉后想警告一下杜布切克。卡达尔未向杜布切克透露这一决定，但隐约暗示了军事干涉的意图。

无奈杜布切克“执迷不悟”。卡达尔感到很失望，临别时他问杜布切克：“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吗？”

杜布切克不可能一点都没有意识到眼前的危险，他只是不相信打击会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无情。他也许过于拘泥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古训，一直试图用自己诚恳的解释和不懈的努力让苏联领导人理解。

从科马尔诺回来的当天，杜布切克召集了中央主席团会议，然后发出了一份要求国民克制的号召。

但为时已晚。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了。

8月17日夜，正当杜布切克主持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时候，一架苏联民航的专机在布拉格降落，送来了一批克格勃的高级专家。他们与捷内务部负责国家保卫工作的某些官员会晤，为占领以后应采取的措施作准备。这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动手前的第一个步骤。

18日，勃列日涅夫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分别通了电话，通知他们苏联领导已决定下达侵捷命令。

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克里姆林宫秘密召开，会议批准了侵捷决定。同一天，柯西金总理通知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非常乐意参加总统主张的最高级会晤，讨论越南问题和裁军问题。

现在，入侵的政治和军事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一天以后，一场从天而降的大祸击碎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所有的梦想与希望。

四、祸从天降

1. 闪电行动

公元1968年8月20日，苏联人从无耻的欺骗开始了当代史上一次最为成功的闪电式军事行动。

这一天，格外闷热，捷克斯洛伐克已到了一年中最为难熬的日子。在布拉格，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人们的紧张情绪，只有少数敏感的人似乎隐约预感到了不祥。

下午，布拉格鲁津机场接到两架苏联民用客机要求临时降落的信号。机组人员声称，飞机发生了技术故障，必须在布拉格等候莫斯科空运配件。机上载有据说是去南斯拉夫的乘客。鲁津机场是国际机场，按照国际惯例无法拒绝苏联飞机的要求。

于是，苏联飞机在获得机场官员准许后徐徐降落，安全地停靠在机场大楼的玻璃门前面。令捷克警察感到奇怪的是，机上下来的所有“乘客”穿着清一色的鞋子，提着清一色的箱子。但他们以为这些人可能是运动员，便没有太放在心上。

当天夜里11时，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5国军队未经任何宣告，突然从东、北、南和东北等4个方向分18路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以精锐的机械化师为先锋，向捷克斯洛伐克内地神速推进。

几乎同时，静静地坐在鲁津机场候机室里的几十名苏联“乘客”突然从他们的箱子里取出机关枪，闪电般占领了机场，原来他们是一群伪装的苏联突击队员，那两架“出故障”的飞机是活动雷达站。几分钟后，第一架装载着坦克的巨型苏制AN—12运输机在

活动雷达站的指挥下降落机场，坦克隆隆驶出了机舱。机场来不及发出一声警报，就落入了“兄弟般的”敌人手里。紧接着，根据一个象时钟一样准确的空运计划，苏联运输机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降下来，吐出坦克、装甲车、大炮、卡车等军需品。

在跑道边，苏联驻捷使馆的汽车里，契尔沃年科大使派来的“向导”立即把这些张牙舞爪的钢铁猛兽引向市中心的主要目标——伏尔塔瓦河大桥、总统官邸、捷共中央大厦、政府主要大楼、邮电局、布拉格广播电台、特定的军事设施……

在布拉迪斯拉发，轰鸣的苏军坦克以35公里的时速冲进还在沉睡的城市，撞倒了街上的路灯柱子，碾碎了停放着的汽车。

不到24小时，担任侵捷苏军司令的伊凡·帕夫洛夫斯基将军便得意地向上级报告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务已经完成。

这是一场双方力量悬殊之极的“闪电战，”是一个军事集团强加给一个主权小国家的战争。入侵的军队达到50多万人，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每26个人就要面对一名侵略军。

2. 正义与阴谋

20日夜11点40分，苏军入侵的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捷共主席团。杜布切克猝不及防，象突然被人打了一记耳光似的，一下子僵在那里。片刻之后，他好象想起什么，缓慢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是早一天勃列日涅夫署名的苏共中央来信，信中没有任何关于入侵的暗示。杜布切克原打算在21日白天的会议上向大家宣读的，现在，他痛苦地提前读给大家听了以后，禁不住十分沉痛地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保证，我根本没有怀疑过，没有料想到，竟然会有人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反对我们。”

他两眼含泪继续说道：“我一辈子致力于同苏联的合作，而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这真是我一生中的最大悲剧！”

杜布切克哪里知道，主席团里刚刚发生的一场斗争正是配合这

次入侵的一个政治行动。

入侵之前，为了拥有一个“适当”的政治借口，苏联与捷共内部的“保守派”曾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准备由保守分子首先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读一份分析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以来政治形势的长篇报告，然后通过一项谴责“反革命”的决议，撤销杜布切克的领导职务；接着由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什维斯特卡等人组成新的捷共领导和政府，他们将发表声明，邀请华沙条约的军队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

这们一来，苏联及其盟国军队的行动就可以涂上一层“应邀而来”的“合法”色彩。

然而，如意的算盘并不如意。虽然苏联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如入无人之境，但它的政治行动初遇抵抗就败下阵来。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讨论比拉克等人提出的、要求谴责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的决议时陷入了僵局。赞成的票数不多，无法强行通过。

入侵的消息使会场情势大变，可它不但没能使杜布切克等人陷于被动，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度过最初的震惊之后，主席团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把国家遭到侵略的消息告知全国民众，谴责这一行动“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同时要求“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保卫我的国界了。”

这份文告无疑是对苏联的政治计划的第一个打击，它把曾径精心策划的、立即扶植起一个傀儡党中央和傀儡政府的阴谋击得粉碎。苏联人本来希望让捷克斯洛伐克人在8月21日早晨醒来时就听到消息说：兄弟国家的军队应新政权的请求来帮助你们。结果人们听到的却是：国家遭到了侵略！

苏联人恼羞成怒。21日凌晨，苏联军队在捷少数秘密警察的配合下，用武力逮捕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总理、国民议会主席斯姆

尔科夫斯基、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克里格尔博士和党中央书记齐萨日等人（这两人是苏联领导一直耿耿于怀的所谓“自由派”，切尔纳会谈时克里姆林宫就要求杜布切克解除他们的职务）。

苏联的意图很明显，它想把这些人拘禁起来后，使捷共中央和政府里的改革派群龙无首，然后扶植一个亲莫斯科的新领导班子。为了保持合法性，他们想让斯沃博达总统给予批准。

这时的总统府实际上也处于坦克的包围之中，亲苏的捷领导人英德拉在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帕夫洛夫斯基将军的陪同下，登上赫拉德查尼堡的总统官邸，交给斯沃博达一张据说是切尔尼克签了名的总理辞职书，要求总统委托英德拉组织新内阁。刚强的老总统怒而拒之。

8时多，斯沃博达总统的讲话通过布拉格广播电台传向全国。总统呼吁民众。保持理智和完全的镇静”，不要采取任何轻率行动。”

10时，在苏军包围的议会大厦里，几十名议员举行了紧急会议，通过了一份致华沙条约5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撤退入侵部队。以80岁老人兹·费林格为首的议员代表团前往苏联大使馆递交了这份抗议书。

12时55分，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广播了由消费工业部长博·马哈乔娃主持的政府部长联合声明，谴责对捷的占领“违反了国际法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马哈乔娃的无畏之举证明，切尔尼克总理虽然失踪，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却依然存在。

苏联人没有料到一个已被完全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竟然有如此坚强的政治韧性，更没有想到他们事先费尽心血准备的计划居然一开始就完全失灵。8月21日的形势对于苏联人来说真是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塔斯社早在凌晨5时25分就已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但直到这一天快要过去，苏联人还没能明确

告诉捷克斯洛伐克人：谁是“请求”外国军队“支援”的“领导人。”

这种政治上的惨败对契尔沃年科大使的打击也许特别沉重，因为他是苏联政治计划的直接策划者和执行人。

就在这天夜里，为了挽救政治上的失败，在请示莫斯科同意以后，契尔沃年科大使和帕夫洛夫斯基将军决定采取一个更加直接的行动。十几位支持莫斯科的捷保守派人物——比拉克、英斯德拉、科尔德、波列尔、巴尔比雷克、什维斯特卡等人早已来到苏联大使馆商谈局势。契尔沃年科对他们说：“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大家考虑一下，能否建立一个把党和国家的职能结合起来的非常机构。在座诸位可以构成这个新政府的基础，因为大家既有合法的身份，又得到苏联的信任。”

众人面面相觑，没有立即置以可否。谁都明白，这是非同儿戏的事情。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那他们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就是邀请外国军队“支援”的人，他们谁也没有勇气挺身出面，斯沃博达的不妥协立场彻底粉碎了苏联和捷共内部亲苏分子组织新领导班子的一切密谋。承担捷克斯洛伐克“吉斯林”[①]的称号。

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按照捷宪法，在政府总理不能行使职权时，总统可以主持工作。此事必须到总统府去和总统面谈。契尔沃年科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但他的计划离不开这些人，因此不得不同意这个意见。

21日深夜11时，契尔沃年科带着这一群人再次来到总统官邸。大使让大家在大厅等候，自己先走进总统的办公室。过了一会，他满面怒容地从里面走出来，穿过大家坐在那里等候的大厅，一句话都没说就直接走了出去。斯沃博达跟着走了出来，向大家宣布说：“你们的建议我不能接受，永远不会接受！如果照这个建议办，我们的人民就会把我象癞皮狗一样赶出总统府！”

---

① 吉斯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侵占挪威后扶植的傀儡政权头目。——编者注

总统正告诉大家，他决定次日就到莫斯科去，同勃列日涅夫当面会谈，要回杜布切克等党和政府领导人。

斯沃博达的不妥协立场彻底粉碎了苏联和捷共内部亲苏分子组织新领导班子的一切密谋。

3. 劫 持

21 日凌晨 3 时，刚从捷共中央主席团赶回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召开政府会议，苏联军队突然冲了进来，一排伞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逮捕了他。

4 时半左右，一队苏联装甲车随着苏联使馆的黑色伏尔加轿车开到伏尔塔瓦河右岸的捷共中央大厦，包围了这座绿色圆顶建筑物。

几名军官带了约一个排的伞兵从装甲车上跳下来，进入大楼。一名军官和 8 个士兵冲进杜布切克的办公室，把坐在会议桌旁的捷共领导人团团围住，枪口对着他们的后背。跟着进来两名军官，其中一名上校宣布，这些捷共领导人从现在起将处于他的“保护之下”。当捷共领导人中有人交谈了几句话时，他马上大声喊道：“不准讲话！不准说捷语！”中央书记姆利纳日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他斥责：“你们要懂点规矩，不许胡来！这里是党的第一书记的办公室！”

上午 9 时许，那个上校带着两个苏联军官和 3 个捷公安机关的便衣进来。一个便衣宣布：奉“以英德拉为首的革命法庭”的指令，要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跟他们走。斯姆尔科夫斯基当场责问：“这算个什么机构？作为国民议会主席怎么对此毫无所知？宪法中也没有这个规定嘛！”接着便衣们要他们交出武器，斯姆尔科夫斯基哈哈大笑，把衣兜全翻了出来，拿出一把水果刀放在桌上说：“我们对自己的人民是不需要武器的。”杜布切克冲着走近他的便衣说：“来，搜吧，搜吧！”苏军上校看到情况不妙，催促快走。于是，这几个人就被带走了。

苏联人用武力拘捕了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改革派领导人以

后，起初对如何处置他们似乎不太明确。

当天下午，杜布切克、斯姆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被带上一辆苏联装甲车，由重兵押送至鲁津机场。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天刚亮时就被送来的切尔尼克总理。

四人相逢，恍如隔世。他们关切地探询对方的遭遇，同时更想知道苏联人准备把他们弄往何处。但是，苏联士兵的枪托制止了他们之间的任何交谈，他们只能用忧伤的目光交流各自内心的感情，默默地互道一声珍重。

不久，他们被戴上手铐，塞入一架 AN—12 巨型运输机。

飞机往北飞行了两个小时左右，降落在斯洛伐克的特里·杜比军用机场。然后他们又坐上汽车被秘密押送到离斯利亚奇矿泉疗养地不远的一个谷仓里。杜布切克被单独关押起来，他和自己的同事们在 48 小时内与外界完全隔离。

苏联人给这些“俘虏们”拿来了一点仅能维持生命的食物，每人分得一片面包和意大利腊肠；没有任何饮料，他们只能以水代替；洗脸、刮胡子的要求遭到拒绝。切尔尼克事后回忆说：“我当时曾担心，我和其他 3 个同志的性命恐怕难保了。”

8 月 22 日，他们被迫开始了新的旅行。一架苏联军用飞机载着他们向东南方向飞去，不久到达苏联外喀尔马阡的穆卡切活，从那儿又转到位于乌克兰的利沃夫市。

在利沃夫的监狱里，他们仍然受到囚犯一样的对待。苏联人似乎想用虐待和侮辱摧垮他们。的确，两天来的囚徒生活使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过度的疲劳和紧张已使他们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杜布切克后来曾跟一位朋友谈起：“我要是带着手枪的话，那时就自杀了。我为了共同目标贡献了一生，现在那些家伙竟然如此待我！”

然而，他们毕竟都活了下来。谁能知道，支撑着他们的到底是个人意志还是民族尊严？

8月23日早晨，囚徒们惊讶地发现早餐食物突然丰富起来。正当他们纳闷不已的时候，苏联军官来通知说马上要送他们去莫斯科。这一次坐的是伊柳辛——18型飞机。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到了莫斯科的谢列梅捷夫机场。囚徒们看到来迎接的不再是装甲车，而是舒适的民用客车；等待他们的也不是监狱，而是莫斯科郊外绿树环抱的假日别墅。自从离开布拉格，他们就如经历了一场恶梦，现在终于第一次吃到了热腾腾的午餐。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从“阶下囚”一变而为“座上客”有什么含义？但他们都知道，苏联人安排的游戏绝不会如此简单。

4．“欧洲的孤独者”

8月20日深夜，几乎就在华沙条约国部队的坦克隆隆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时间里，苏联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多勃雷宁约见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告之苏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并说明对捷的干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情，不应看作是对美国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胁。相同的通知，同时送达英、法等其他一些国家。

人们肯定要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此消息有何反应呢？可悲的是，它们的反应比入侵本身更加令人震惊。

对于几个月来华约军队的频频调动和演习，拥有高度发达情报系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非不知。特别是到了8月后，苏军战备骤然加强，武装入侵事件已露凶兆，很多紧急信号火速传到了西方各国首都和北约总部。

不过，它们全都是纯粹的军事信号。

关于克里姆林宫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西方在那段令人窒息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而只能凭借自己并不怎么丰富的想象力。

遗憾的是它的想象力差不多跟所有人一样，也出了差错。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北约理事会及其专设机构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同：即苏联和它的盟国正在加强它们军队的临战态势，以便随时可以袭击布拉格。

“这只不过是为了继续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一位西方要人认为。于是，北约组织跟杜布切克一样，认为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也许，苏联人的高明之处正是利用了西方判断上的误差。

入侵消息确实令西方猝然不知所措。猝然之后又能如何呢？关于这一点，苏联人又一次显示了他们正确的估计力。他们相信，“所谓自由世界的反应不过是说几句遗憾和谴责的话而已”。

约翰逊总统倒是连夜在白宫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苏军侵捷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以及如果苏联军队越过捷西部和南部边界继续前进的话应采取何种对策。约翰逊总统在次日的声明中说：“苏联及其盟国入侵了一个无法进行防御的国家，镇压复苏基本人权的活动……是断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我以人类对和平怀抑的希望的名义要求苏联及其伙伴从捷克斯洛伐克撤退它们的军队。”

正被越南战争搅得寝食难安的山姆大叔当时除此之外还能有何惊人之举呢？

公平地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从来没有指望过美国和西欧国家会派兵来保卫他们。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从一开始就呼吁民众保持“镇静”，放弃武装抵抗。因为他们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孤军作战，这个世界不会为了它而打第三次大战。

苏联人非常自信于自己的军事优势。60 万精兵陷在越战泥潭中的美国将对用最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 50 万华约大军敬而远之。有理由认为，苏联及其盟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投入这样大的优势兵力，不仅仅是为了使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敢抵抗，而且也是为了让西方明白：在欧洲同苏联打一场常规战争是无望取胜的。

捷克斯洛伐克人能够指望、或者说只能指望西方在政治上和道

义上的支持。但他们惊奇地看到，约翰逊总统“顾左右而言他”，醉心于同柯西金总理举行关于裁军的“最高级会谈”，而对入侵事件作出的反应是无力的。显而易见的是，当时华盛顿和北约各国首都首先关心如下问题：即侵捷事件会不会破坏西方同苏联的缓和关系。它们希望这个事件作为大国游戏中的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尽快为人们所忘却。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 8 月 22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种行动不可能有助于而只会损害东西方关系”，但又说，“我们没有考虑到采取报复性行动或制裁的问题。”

伤心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得不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无情。

尽管它是西方传统文明的产儿，一直具有亲西方的倾向，但被西方遗弃却是 1918 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无法摆脱的命运。“欧洲的一位孤独者”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曲。

当 1938 年西方在慕尼黑撒手不管捷克斯洛伐克时，痛苦不堪的贝奈斯总统曾以沉重的声音告诉他的内阁，“他们背着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大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并不把小的国家和民族看作是平等的一员”。

30 年后，在布拉格街头成千上万条标语中，“慕尼黑＝雅尔塔”的字眼尤为醒目。它表达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伤感与失望；正如 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导致了纳粹德国占领捷克一样，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1945 年的雅尔塔协定造成了 1968 年的入侵。人们终于明白，在雅尔塔会议上，世界被分成了两大势力范围，苏联和美国各占一块。既然捷克斯洛伐克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就很难乞求西方的干预，至多，西方国家在其报刊社论和领导人的声明中滴几滴同情之泪而已。

历史不会忘记，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最真诚的支持恰恰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

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对苏联侵捷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意共总书记隆哥说："该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政府来保卫这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主革新精神。"意共中英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5国军队撤出捷克斯洛伐克。

法共中央通过了一项谴责侵略的决议。

在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典、日本……共产党组织纷纷发表声明或决议，对苏联出兵行为作出强烈反应。

8月21日，铁托说：这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侵犯和践踏"。

同一天，布加勒斯特共和国广场，齐奥塞斯库总统向集会群众发表了一生中最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讲，他说："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是对欧洲和平、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严重威胁。"

22日，20多万人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捷克斯洛代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南斯拉夫政府在一份正式声明中要求苏联等5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结束对捷的占领。

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烈谴责苏联侵捷的霸权主义行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

……

莫斯科或许想不到，正是它的悍然黩武行动促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场巨大裂变。这裂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对莫斯科不再顶礼膜拜，一种新的思潮——欧洲共产主义随之兴起。

五、为了尊严与自由

1. 燃烧的布拉格

那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夜晚。

当苏联飞机的轰鸣声伴随着一批批空降部队和坦克群隆隆冲向布拉格的时候，睡梦中惊醒过来的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们立即奔走相告，把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首都的每个角落。霎时间，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涌向黑夜笼罩的街头，满载着青年人的汽车在街上飞驰而过，喇叭齐鸣，号召人们到老城广场和瓦茨拉夫广场去举行示威。尽管党和政府领导人呼吁民众“不要抵抗”，不屈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还是坚决地发出了无法遏止的怒吼。

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科希策等地十几座城市，愤怒的人群围住苏军坦克和伞兵，用唾沫、脏物和谴责表示了他们对背信弃义的鄙视。

站在自发抵抗运动最前列的当属代表了民族骄傲的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他们无畏地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前进，或爬近坦克，把点燃的破布塞进坦克的排气管，致使数十辆苏军崭新的坦克在熊熊火光中炸为废铁。抵抗招来了侵略者的无情镇压。

请看那一幕幕悲壮的场面吧！

一群坦克被阻挡在街垒前面，不停地射击。男人、妇女和儿童开始倒下去。一个小伙子冒着弹雨爬上了一辆正在射击的坦克，用手高高举起一面捷克斯洛伐克国旗。

一个血坑旁边，一位儿童的衣服被碾成了布片，一辆坦克压碎

了他的双腿，他的身边有一面染着鲜血的国旗。

在接近波兰边界的松佩克，“妇女们躺在地上阻止坦克前进”。

8月21日下午4点，布拉格人民为死难者举行送葬游行。1000多人唱着《国际歌》和《殉难者之歌》从中央大厦出发，每走200米停下来，立正致哀。在队伍前面，有人举着一顶带血的钢盔。这是布拉格第一个在占领下死去的人的遗物。

在另一支游行队伍里，捷克著名田径运动员、奥林匹克冠军查托波克奋勇当先，高声呼吁墨西哥奥运会把苏联开除出去。一位退休工人感慨万端：“看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青年，是在社会主义下成长起来并被教导把俄国人看做兄弟的一代。但是在这一个星期中，一切变了。这是值得全世界思考的事情。”

23日中午12点，布拉格举行了一次1小时的抗议罢工。当那个时刻到来时，警报声、汽笛声、喇叭声一齐拉响，汇合成一部高昂强大的乐章，响彻在城市的上空。随着鸣声嘎然而止，瓦茨拉夫广场上数万群众席地坐下，整整一个小时一动不动。全市人民停止所有活动和言谈，连车辆也当即停驶，到处交通中断。一座金色的城市瞬间陷入了可怖的沉寂之中。在这巨大的海洋似的人群里，苏联士兵显得渺小而孤单。如果说沉默能致人于死命的话，那天中午瓦茨拉夫广场上的沉默就具有这种威力。

为了不给入侵者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捷克斯洛伐克人响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号召，努力克制内心的激愤，以冷静和秩序避免了过多的流血。然而，这个富有幽默感的民族并没有放弃反抗，为了尊严和自由，它发挥最大想象力，创造出五花八门的斗争方式。

“街道无名化”就是1968年捷克人民最具有民族个性的反抗。根据布拉格自由电台的号召，人们把全国，尤其是布拉格变成了地理上的无人区。许多地方的路标被弄掉了或者倒转过来，使人地两生的占领军方寸大乱，行军途中经常走错了方向，后勤计划漏洞百出。

有一支波兰坦克部队在乡下转了几个钟头，最后还是兜回到波兰领土上去了。占领军在城市和乡村购买食品和饮料时，遇到地方政府和居民的抵制，甚至连搞点水也要费尽周折。一位苏军指挥官抱怨捷克人民不够友好，遭到一个小镇镇长针锋相对的反驳，他说："水你们是能够弄到的，但你们却得不到友谊。"

在布拉格，电台呼吁市民们把街道的标志牌和各自门牌都设法破坏掉或涂上油漆。一时间，布拉格成了一座既无街牌也无门牌的城市。有些地方虽然留着街牌，但上面写的是"杜布切克大街"或"斯沃博达广场"等字样。

可怜的占领者就象走入迷宫一样，四处碰壁，出尽洋相。一名苏军大尉无可奈何地说："我接到命令把部队带到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街上去，可是谁也不告诉我这条街在哪儿。"

在"街道无名化"运动的同时，布拉格人民还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标语和漫画。它们或声讨，或嘲弄，或庄严，或诙谐，嘻笑怒骂和大智大勇浑然一体。

在民族博物馆的正面墙上，布满了坦克机关枪扫射留下的累累弹痕，有人在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是俄国的文明"，"俄国留下的纪念"等字样。

有一份传单如此写道："列宁醒醒吧！勃列日涅夫发疯了！"另一张传单煞有其事地登了一封当地妇产医院给"勃列日涅夫同志"的电报："今天出生了几个反革命分子，请赶快派坦克来。"

一堵旧城墙上，用黑色沥清写成的"反抗十诫"在夕阳下凝重而潇洒：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我们没有——我们不给——我们不干——我们不说——我们不理解——我们不出卖——我们不支持——我们将不忘记！

许多商店橱窗和住宅的玻璃门上写满了"杜布切克——斯沃博达"的字眼，贴满了他们的肖像。

最有挑战意味的口号是把苏联和纳粹德国等同起来。五角红星被歪曲成五角卐字。到处都写着这么一句话："法西斯分子 1938——苏联人 1968"。某些漫画把外国占领者比拟为希特勒臭名远扬的党卫军。

更有甚者，捷一些青年学生为扰乱苏军士气，编制了一条恶作剧般的标语："回家去吧，伊凡，你的奥尔嘉正同别的男人睡觉呢。"

哦，布拉格，一个标语和漫画的海洋！

2. 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抵抗侵略者的斗争中，广播电台创下了最为可歌可泣的业绩。

苏联坦克势不可挡地闯入布拉格以后，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占领或包围了首批目标，布拉格迅速沦入侵略者之手。帕夫洛夫斯基将军禁不住为军事行动如此顺利暗自庆幸。他自豪地把这当作自己戎马生涯中又一次了不起的成功，心中不由对束手就擒的捷克斯洛伐克产生一丝轻蔑。

然而，这位骄傲的将军怎能料到，事实很快给了他一个无情的嘲弄。令他难堪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是用武力，而是用"声音"嘲弄了他。

8 月 21 日早晨，就在苏军入侵和消息刚刚传开不久，位于维诺赫拉德大街的布拉格电台大楼通过电波向全国人民播放了一首庄严的乐曲，随后开始宣读捷共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由此，一个顽强的声音诞生了。

布拉格被占领了，全国被占领了，但布拉格电台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工具却在镇定地工作着。它反复播放主席的告人民书，源源不断地播送一些最新情况报导，声讨入侵部队的行径，有条不紊地组织居民进行抵抗——尽管只是消极的政治抵抗。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它深深地惹恼了占领者。

上午7时左右，苏军指挥部决定用武力夺取电台。于是，一场保卫电台的战斗开始了。当坦克从瓦茨拉夫广场开到电台大楼前面摆开阵势时，数千名群众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道道防线，阻挡坦克前进。

战斗十分激烈，“在收音机里也能听到枪声，还有苏联飞机在电台上空低飞而过的轰鸣声”。夹杂在枪炮声中的，是男女播音员那平静而熟识的声音，还有斯美塔那缓慢而悲哀的《摩尔道组曲》。

7点36分，电台仍在广播，播音员对全国说：“我们仍然在这里……”37分，广播中突然奏响了国歌，这意味着电台终于被占领了。人们一下子都哭了起来。

然而，电波并没有消逝。

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布拉格电台的使命，与比尔森、布拉迪斯拉发等几十个电台继续进行战斗。

与此同时，布拉格电台的一批技术人员和播音员迅速转入地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异乎寻常的地下广播网。

当天中午，一个新的电台—“合法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就开始播音了。广播是从布拉格十几个秘密地点发出的：地下室、私人住宅，或无人的阁楼、废弃的工地等等。有的播音点似乎就在身边，可苏联人就是找不到。

当广播人员发现可能有苏联无线电追踪队在追踪他们时，就转移到预先准备好的地点去。有时播音员还告诉听众说：“我们要转移了，播音将中断片刻。”转移时有的步行，有的用出租汽车、私人汽车，甚至使用救护车搬运广播器材，播音人员则装扮成医生和护士。

苏联人四处搜寻，但对这套灵活运转的地下广播网却无可奈何。

两天后，布拉格、布尔诺、俄斯特拉发和布拉迪斯拉发的电视台也从秘密地点恢复了播出。

在那些异常艰难的日子里，秘密电台成了国家合法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唯一联系工具，它所产生的政治作用究竟有多大，恐怕只有

沮丧的苏联人能够体会。

3. 难忘的党代表大会

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事情：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不得不秘密地举行，因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坦克阻止大会公开召开。

8 月 21 日凌晨 2 时，根据胆识过人的布拉格市委书记博·西蒙的建议，捷共中央主席团决定立即召开原定于 9 月 9 日举行的捷共第 14 次非常代表大会。

秘密电台把这一决定向全国播发，通知代表们 22 日上午 11 时到布拉格的切卡德工厂集合。苏联人绝对不相信这个明目张胆的通知里所说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本能地认为，大会将在另一天、另一个地点举行。因此，他们既没有包围切卡德工厂，也没有对那天早晨上班的工人特别留意。

于是，就在苏联军队的鼻子底下，各地党代表云集首都。他们乔装打扮，带着假证件，闯关卡，躲跟踪，拿出了纳粹占领时期地下斗争的所有技巧。

上午 11 时 18 分，作出决定后不到 24 小时，捷共秘密的非常代表大会便在切卡德工厂礼堂正式开幕了。这真是一个组织工作的奇迹，其安排之巧妙令人惊叹不已。它的成功召开给此后局势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当时，杜布切克等捷共主要首脑已先后失踪，代表大会在此情况下仍然做了几件非凡的事情。它选出了新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全党对杜布切克的信任；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即释放捷共领导人，举行关于撤退外国军队的谈判。

这是一次令代表们永生难忘的大会。

他们穿着工人的服装，坐在一个无论如何算不上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冒着占领者坦克随时可能冲进来把他们逮捕或杀死的危险，为

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命运行使着神圣的权利。

在工厂的大门口，全副武装的工人民兵组成了一道森严的防线。他们带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和步枪，还有唯一的一门反坦克炮，保卫着代表大会的安全。

会场内，代表们临危不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纪律性和果敢、坚毅。每个发言者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以致大会主持人不得不提醒大家说："注意，你们的掌声太响，如果你们表示同意，最好是举双手，如果不同意，就举一只手。"

代表大会显示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空前团结。一位主席团成员说出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应该具备的宽容。他说："我们今天必须从新的基础出发，不要再纠缠在过去的一些事情上，不管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应负多少责任，现在主要看他对军事干涉的态度。如果他反对军事干涉，那末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即使在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中曾经是保守派或教条主义者。"

这次非常代表大会成了一次战斗的大会，它所蕴含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自尊迫使克里姆林宫释放了捷领导人，使他们从"阶下囚"成为"座上客"。

它还是一块政治试金石，检验出每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民族良心和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气量。在莫斯科那场漫长的谈判中，对这次秘密代表大会的不同立场在谈判双方之间划出了一道长长的鸿沟。

六、城下之盟

1. 艰难的使命

8 月 23 日上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从秘密电台里再次听到了他们崇敬的斯沃博达总统的讲话："昨天我同苏联的代表讨论了如何处理由于苏联等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土而形成的局势问题……由于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今天凌晨向政府成员们提出要求，请他们同意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谈判。" 9 时半，讲话播出之后不久，总统座机从鲁译机场正在莫斯科，随行的有胡萨克（副总理）、楚尔（国防部长）、比拉克、英德拉等人。由此，当代历史上一次最艰难、最令人心碎的使命开始了。

入侵以来，斯沃博达总统一直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契尔沃年科大使和帕夫洛夫斯基将军屡次登上赫拉德强尼城堡，要求总统同意以英德拉为总理的政府和英德拉—比拉克—科尔德 3 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大使的政治劝降和将军的军事恫吓轮番表演，将威逼利诱的伎俩发挥得淋漓尽致。

倔犟的老总统以不屑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大街上蓬勃高涨的民族激情使他勇气倍增，他似乎又找回了当年驰骋疆场时那种豪情和自信。

在严词拒绝充当傀儡政权的合法证明人之后，总统轻蔑地告诉苏联大使和将军，他们没有资格同他进行谈判，他要求同华沙条约的最高领导人会晤。

斯沃博达的顽强使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接受他的建议，同意他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临行前，总统对他"亲爱的人民"说，希望

能从悲剧性的局势中“找到无损于国格的出路”。可是，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

当天下午1点，斯沃博达一行的座机徐徐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当他们步出阶梯时，看到了一个隆重得有些别扭的欢迎场面。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都来到了机场，这也许是任何东欧国家领导人都不曾享有过的“殊荣”。人们不知道斯沃博达总统此时此地心中是什么感受。想起布拉格街头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也许会对此啼笑皆非。

在布拉格时，被捕的捷领导人的命运就令总统坐立不安，他希望来到莫斯科后，首先能见到自己亲密的同事和战友。但是，一踏入克里姆林宫他就意识到，即使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得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

总统说，只有4名捷领导人获得自由，才能开始真正的谈判，这是入侵那天他就宣布的立场。苏联领导人告诉斯沃博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对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反革命负有责任，必须受到惩罚。勃列日涅夫甚至表示可以把他们交给斯沃博达进行公审。

老总统闻听此言，象受了侮辱般地勃然大怒，他满面通红地对勃列日涅夫嚷道：“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是依法当选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是我的同事，我不能容忍别人指责他们，更不能容忍别人挑拨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苏联人也许忘了，斯沃博达总统曾是一位荣誉感极强的将军，他那慈祥的面容并不能掩住内心丰富的感情和顽强的意志。因此，当苏联人固执己见，拒不答应总统的要求时，他冲动地掏出身上佩带的手枪，对苏联人威胁说，如果不立即释放捷领导人，他就在克里姆林宫自杀。

午夜，斯沃博达与苏联人的较量仍在继续着，他的顽强不屈加上国内抵抗运动的日益高涨终于产生了效果。勃列日涅夫突然宣布：为了苏捷友谊，苏联政府决定释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

尔尼克等人，并让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参加会议。

苏联人意识到了，迫使斯沃博达同意所谓的"工农革命政府"合法，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已不可能，平稳过渡只是一个梦想，因此，他们决定以退为进，选择了"谈判"。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只要斯沃博达，还需要杜布切克和其他一些人。何况当时武装干涉已成了国际丑闻，需要某种伪装，"谈判"恰恰是最好的伪装手段。

当斯沃博达一行还在前来莫斯科的途中时，克里姆林宫就有了这个打算。正是从那个时刻，被押到莫斯科的"囚犯们"发觉自己的待遇起了微妙的变化。那么，莫斯科为什么还要与斯沃博达演出那场"放人不放人"的游戏呢？人们不应忘记，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都是政治技巧娴熟的专家，他们要让老总统感到这是对他作出的一次让步，以后他也应以让步来回报克里姆林宫。军人出身的斯沃博达总统的政治头脑显然比勃列日涅夫单纯得多，怎能搞清克里姆林宫里迷雾般的心理呢？何况他绝对不会知道克里姆林宫接下去要他作什么样的让步。总统的悲剧角色也许就这样注定了。

2. 斯沃博达的悲剧

8 月 23 日那天的深夜 11 点，勃列日涅夫刚刚宣布放人不久，杜布切克等人被带到了克里姆林宫。他们鱼贯进入一间看来早已准备好的"会议室"。杜布切克走在前头，他看到，在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旁边，坐着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苏联主要领导人。没有寒暄，没有握手，只有波德戈尔内打手势示意他们坐下。里面的每个人似乎都在试图让自己装出一付最佳表情，但杜布切克感到，勃列日涅夫的眼睛总是盯着别处，象是在回避他的目光，而柯西金的下巴比平常垂得更低了，倒是波德戈尔内仍显得漫不经心。

一阵难堪的沉默过后，勃列日涅夫终于开了口。

"让我们大家都不要忘记彼此之间的友谊，"他说，"当然，我们不能说你们现在的心情很好，但是，你们的心情并不是什么问题…

必须明确指出，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法律秩序已无法得到执行，（我们）才不得已采取了果断的、必要的措施。”

杜布切克反驳道：“出兵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政治错误，这会引起悲剧性的后果……”，他似乎抑止不住多日来蒙受的委屈，情绪激动地说：“让一切都冲着我来吧，我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会谈不得不中止，杜布切克被带出会议室，来到一间宽敞的休息室。他吃惊地发现，这里有很多他熟识的面孔，斯沃博达那一头苍苍白发一下子就攫住了他的视线。他立即冲动地快步走过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杜布切克象一位受了欺侮的孩子突然见到父母一样，在这位一直爱护他的长者面前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老总统也是满含热泪，激动得语不成句，只是反复说着：“你们受苦了，受苦了……”站在后面的比拉克、英德拉也想跟杜布切克等人打个招呼，但谁都没有理睬他们。

从 24 日凌晨直到 27 日，对杜布切克等人来说，时间似乎停滞了，一场屈辱性的谈判几乎使他们心力交瘁。在这短短的 4 天里，他们就象穿越了一片漫漫无边的道德荒漠，尊严和自信被强权的烈焰炙烤得荡然无存。

苏联人提出了一份包括 16 点要求的协议草案。协议的内容是：苏军要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直到“局势正常化”（这个定义含糊的词从此将长期折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书报检查制度；撤消令莫斯科不快的人的职务，包括外长哈耶克、副总理奥·希克、内务部长帕维尔、齐萨日等等；宣布秘密召开的捷共非常 14 大无效……

为了压服捷克领导人，苏联人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他们冷冷地告诉捷领导人，如果不能接受苏联的协议，布拉格就可能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故意把苏军在布拉格周围兵力部署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详情一遍遍告知捷领导人。

苏联人关于流血的警告并非只是为了渲染紧张气氛。那时候布拉格及其周围的情景的确充满了许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在两天内，苏

军在布拉格内外的兵力由4万人增加到7万人，在周围半径20英里以内的地区，部署了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几个炮兵营。炮兵装备的是口径155毫米的榴弹炮和160毫米的迫击炮。市内和市郊，至少有华约部队的500辆坦克，另有装甲运兵车和若干伞兵营。

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表明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抗打算在内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捷领导人在莫斯科坚持己见，苏联人并不排除使用这支力量。

25日，根据杜布切克的要求，中央委员姆林纳日等人从布拉格赶到莫斯科加入谈判行列。他们带来了有关布拉格的最新消息：占领军未能压制住广播电台，许多自由报刊继续在武装干涉者的眼皮底下出版。民众非军事消极抵抗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这一切至少使杜布切克等人略感到了一丝鼓舞。但是，他们同时从中央主席团，国民议会捎来的信中也看到了某种不安。信中写道："日益增长的厌烦情绪和占领军与我国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目前的危险因素。"信中要求斯沃博达中止莫斯科会谈，快同杜布切克、切尔尼克一起回国，以便稳定局势，并同国内商量后再跟莫斯科会谈。

显然，局势已到了需要捷领导人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刻，他们的决定既关系他们自身命运，也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命运。这对他们每个人的理性和情感都是一次炼狱般的考验，使他们在荣与辱的自我对白中找到各自新的座标。

在这场考验中，斯沃博达总统扮演了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为了谋求"无损于国格"的解决办法，他可以不顾高龄，不辞劳苦，亲赴莫斯科；为了争取杜布切克等人的释放，他不惜与勃列日涅夫公开对垒。然而，他毕竟是一位对苏联怀有特殊感情的人，战争年代，他有过同苏军在苏联领土上并肩作战的光荣历史，在那时他就形成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都应依靠苏联的想法；战后的风风雨雨中，莫斯科对他个人的尊重使他对苏联怀有一种由衷的感激，1953年，因

赫鲁晓夫过问，他才得以恢复名誉；1965年，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一切把他的命运与苏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军人，他看待一切问题都从严格的军事观点出发。当他用这种观点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地域政治关系时，苏联大国的不可动摇性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苏联人完全了解斯沃博达的这种心理特点。因此不厌其烦地在他面前强调苏联的大国利益和拖延时间的危险性，希望他采取"现实的"立场。苏联人的心理战术证明是有效的。73岁的老总统归根到底是一位军人，而不是政治家，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是避免在手无寸铁的居民与占领军之间发生流血冲突，正如他27日回到布拉格后向民众发表演讲时所说：

"近几天来我国局势的发展每时每刻都有导致最大悲剧的危险。我是一名军人，我知道，如果平民和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发生冲突，会出现一场什么样的流血牺牲。因此，作为你们的总统，我认为我的职责是竭尽全力防止这一惨剧的发生，不使世代友好的两国人民无谓流血。"

斯沃博达终于投降了。他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以此去影响他的同事们。当捷方代表团中仍然意见分歧、争论不下时，他甚至怒气冲天，对着那些不赞成他的人叫道："你们老是不停地空谈，已经谈得让人家把国家都给占了，还在谈！现在办事应该正视现实了。我这一辈子见到的死人能堆成山，我决不允许再让你们的空谈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苏联人到底还是从斯沃博达这里获得了报答。他们曾对他让过步，释放了杜布切克等人。现在，回报是丰厚的，其性质和意义远非释放几个人所能比拟。

3. 历史在重演

苏联人提出协议书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强硬和耐心摆到了捷代

表团成员的面前："你们现在不签，过一个星期再签。一个星期后不签，过 14 天再签，如果 14 天后还不签，那就过一个月再签。"

斯沃博达总统屈服了，剩下的关键人物有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等人。这时，一位并不显要的人物出乎意料地来到了前台，他就是副总理古·胡萨克。

这是一个带有知识分子特点的斯洛伐克人。1944 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时，他是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管内政的委员、斯洛伐克地下共产党的副主席，那时只有 31 岁。1945 年以后，他在党和政府领导机构中提升很快，但到 1951 年因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这对他的雄心壮志无疑是一次大挫折。在度过近 9 年的狱中生活后，他以改革派领导人之一的形象出现在 1968 年的布拉格政坛。虽然他只是一名副总理，但他已成熟许多，而雄心仍未减当年，他相信，时势终有一日会造就他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8 月 21 日凌晨，坦克包围了布拉迪斯拉发党中央办公楼，在马达的隆隆声中，胡萨克告诉他同事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把我们的民族从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显然，不是坚信自己负有救世主使命的人是说不出这种话的。当他随同斯沃博达总统来到莫斯科时，他正是怀着这种使命感的。不幸的是，他把自己的使命与权力欲、与政客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就把他自视神圣的使命中的神圣成份阉割殆尽，只剩下一个追求权力顶峰的外壳。

在克里姆林宫，胡萨克的表演是出色的。他既没有比拉克、英德拉等人遭万民唾弃的"捷奸"形象，也不象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人拒不与苏联人合作。一开始他就精明地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同意苏联人提出的基本要求。苏联领导人很快就发现他是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理想人物。柯西金直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胡萨克同志既有才干，又是好党员。我们以前不了解他，这次印象很好。"无疑莫斯科已选中了胡萨克。

8 月 26 日，苏捷双方举行了最后谈判，第位捷代表团成员都面临最后选择：要不要在屈辱性的协议书上签字。斯沃博达的屈服和胡萨克的倒戈使捷方反对签约的力量大受削弱。切尔尼克经胡萨克的劝说，已经改变了主意，同意签字。杜布切克自从到达克里姆林宫后，身体状况一直很坏，对苏联的要求犹豫不决，虽然直到最后仍试图争取对正式文件作些修改，但斯沃博达和胡萨克的影响以及苏联人的军事恐吓，也迫使他作出了让步。从杜布切克晚年的回忆录中，人们可以看出，当时不断萦绕于怀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的国家被一架庞大的军事机器占领着，世界上也不存在能够把它赶走的力量。……我的名字已成为'布拉格之春'的象征。我要对祖国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负责。"他担心自己一旦拒绝签署协议书，民众就会把它视为进行积极抵抗的号召。他认为自己无权发动这种流血斗争。

几位关键人物中，比较坚决反对签署协议书的是斯姆尔科夫斯基，但他很孤立，改变不了整个结果。莫斯科非常明白这点，因此半是威胁半是得意地对他说："以您目前的处境而言，您没有资格提条件。"最后，斯姆尔科夫斯基也悲哀地认识到，大势已去。他不得不痛苦地服从集体决定，签下了自己沉重的名字，尽管他犹豫了很久，很久……

深夜，又是一个深夜，多么离奇的巧合！也许莫斯科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夜幕的掩护。在那间熟识的会议室里，苏捷莫斯科会谈议定书的签署仪式正在举行。在切尔尼克的主持下，捷代表团成员轮流在议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只有克里格尔例外，因为苏联人根本就没有让他参加谈判）。

斯姆尔科夫斯基事后说到，那是命运攸关的一步，只有历史能作出结论：他们这么做是拯救生命，还是出卖祖国。

杜布切克则产生了一种十分痛苦的感觉，他觉得这完全是历史的重演：希特勒 1939 年 3 月在柏林把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捷克

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现在，勃列日涅夫们又以武力和威胁，把一份事实上的投降书强加给了他和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

从莫斯科归来后，捷领导人按照议定书的内容开始了一个所谓的“正常化”过程。新闻书刊审查制度逐步恢复了；外长哈耶克、副总理奥·希克等所谓自由改革派领导人被解除了职务；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被从联合国撤了回来；布拉格街头的标语、漫画也被清除、洗刷掉了……

随着“正常化”的加快，一个个莫期科信任和支持的人进入了捷共和政府最高领导阶层；而绘制了“布拉格之春”的大师们纷纷退出政治舞台。一年后，不仅斯姆尔科夫斯基等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被中央委员会除名，连杜布切克也被挤下台去；斯沃博达仍然当着他的总统，而胡萨克则终于爬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权力宝座。

根据 1968 年 10 月的附加协议，苏联军队将合法地无限期驻留捷克斯洛伐克。

“布拉格之春”结束了，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第五章

地拉那的枪声

——山鹰之国的悬案

1981年12月18日黎明前的某个时刻，东方尚未露白，万物还披着一层淡淡的晚纱，沉浸在睡梦之中。一片宁静，一片朦胧。

这时，地拉那市区南端紧挨劳动党中央大厦的领导人住宅区，同样是一片朦胧。这里与别处所不同的是，在暗淡的路灯下偶而闪过卫兵的身影，平添几分森严、神秘的气氛。今夜，这特有的气氛在扩展，扩展……。

就在这深不可测的长夜里，只有在霍查私邸斜对过的一幢花园式二层小楼里，在树影婆娑之中，从一个窗户中整夜透出灯光。显然，这里有人陷入了难言的烦恼之中。那么，这人是谁呢？

他，就是在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上显赫30多年的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全国第二号人物穆罕默德·谢胡。今天，正是这个不寻常的人物却罕有地彻夜未眠……。

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军人出身，素以强悍、粗暴出名的总理陷入烦恼之中呢？

终于，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人们感到震惊、迷惑……

一、谢胡之死——一个难解的谜

18日晚，地拉那广播电台广播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的一则公告，宣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因“精神忧郁”，自杀身亡。

这条消息够得上一条爆炸性新闻，引起国内外一阵震动。但人们惊奇地发现，地拉那电台随后照常播放着文艺节目，次日的报纸也只在头版下方1/4处刊登了这则共约400字的公告。此外，官方没有组织任何哀悼活动，没有成立治丧委员会，没有举行葬礼，更没有为这位做了33年政治局委员（1948～1981）和27年部长会议主席（1954～1981）的死者致哀，相反，阿尔巴尼亚的公共场所都摘掉了谢胡的照片。据传，有些国家的外交官代表本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和死者亲属表示哀悼，但都遭到阿尔巴尼亚有关方面的拒绝，并被告知：他们的关心是多余的。

对这种种反常现象，在贝尔格莱德的外交人士解释说，阿尔巴尼亚不为自杀的人举行哀悼，因为阿尔巴尼亚人，尤其是共产党人认为，自杀是一种极其可耻的行为。但是，这个简单的解答并没有真正消除人们的疑问，因为人们的疑问太多，实在太多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地拉那当局对此事只字不提。始终保持着沉默。至少在表面上看，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这样，无论是谢胡“自杀”本身，还是这种种意味深长的反常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默，都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和迷惑。

人们在问，谢胡是自杀还是他杀？自杀是因为什么，他杀又是为了什么？地拉那最高层发生了什么？

问号，问号，这一连串的问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一个难解的谜团。

接着，围绕这个神秘的死亡，围绕这个死亡所引起的谜团，人们开始了种种议论和猜测。

当时，人们最早的议论是：仅一个月以前，即在11月初召开的劳动党“八大”上，谢胡刚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的报告；在死前仅2天，即12月16日，谢胡还会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据在场的人士事后说，当时谢胡说话正常，没有什么病态或不安的表现。那么，“精神忧郁”从何说起？

自然。为破释这类谜一般的事件，最先涉足的总是那些活跃在世界各地、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们。这次也并不例外。

事后仅2天，即12月20日，美国《观察家报》记者弗兰克兰认为，“谢胡是最有可能接替霍查的人选”，但别的“年轻政治家难道就不盯住接班人的位置想把谢胡排挤出去？”

几天后的12月25日，贝尔格莱德《新闻周报》写道，“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神秘地死去，引起全世界的很大关注和疑心，以及各种各样的猜测：谢胡之死与最高一级算老账有关”。该报接着援引西方人士的话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2月17日在地拉那举行了会议。……会上据说霍查和谢胡发生了冲突”。“谢胡作为主张阿尔巴尼亚实行逐步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在这次会议上失败了，会后他不是被迫自杀就是遭到了谋害”。1982年1月3日，这家报纸再次发表文章称，“在12月17日深夜，人们听到了枪声”。当然，对它的真实性，这枪声来自何处，它与谢胡之死有什么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不久，日本《每日新闻》刊登时事社记者1982年1月6日发自汉堡的消息说，“在阿尔巴尼亚，以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为首的霍查派和以已故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谢胡派之间，正在展开权力斗

争。其原因在于外交政策问题。……两者发生了对立”。

1982年1月14日，塔斯社从贝尔格莱德报道，“南通社援引权威观察家的意见说，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是被杀害的，他成了该国最高层领导尖锐冲突的牺牲品。这就反驳了地拉那的以下报道，即霍查的亲密战友于去年12月18日“自杀”。

几天以后，即1982年1月10日，英国《星期日报道》援引南斯拉夫外交官的话，并根据从地拉那回到奥地利的旅客以及在维也纳的阿尔巴尼亚流亡者证实的最新消息，描述了谢胡“自杀”的经过。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政治局委员们聚集在一张铺着绿色台面呢的大桌子周围。当时提出的问题是，当73岁的霍查死后或下台后由谁来接替他。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明显地看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这位党领袖当然接班人的谢胡，已经再也不能谋到这个职位了。这样，谢胡发火了，他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手枪，朝坐在桌子对面的他的领导人开了枪。可是这一枪没有打中，子弹嵌进了墙壁。谢胡没有再开第二枪。当治安卫兵向他围上来时，他把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等卫兵跑到他身旁，他已经倒在桌子上死了，鲜血沾污了绿色的台面呢。

1982年初，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扎米亚京在莫斯科电视台发表谈话说，关于阿尔巴尼亚前总理谢胡之死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说法，即他是自杀；第二种是外国人的说法，即“霍查不想让谢胡成为他的接班人”，因此杀掉了他。扎米亚京强调说。很难判断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他又说。“阿尔巴尼亚的派别斗争已暴露多年了，目前仍继续存在”。他说，谢胡一派同霍查一派从来就互不信任，因此造成了这次枪杀事件。

同年3月15日，当时的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的《学生报》断言，“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是在同霍查主席进行激烈争吵后被霍查的副官打死的”。这则消息说，“这次对抗事件是在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会12月17日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之后发生的。”这次特别会议是要

研究华沙宣布波兰实行戒严状态所造成的后果。会上，谢胡建议，“暂时停止同南斯拉夫、希腊和梵蒂冈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他还说，地拉那应该仔细分析莫斯科最近提出的缓和关系的建议和“波兰事件后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对巴尔干地区的确切立场”。但谢胡的建议当即遭到霍查的拒绝，说这是“反革命”建议。霍查指责谢胡已“出卖给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叛徒”。报道说，听到这些指责，谢胡“本能地”掏出了他的手枪。但是，霍查的卫士长和贴身警卫动作更快，他们立刻朝谢胡射击，击中了谢胡的头部、颈部和胸部。

从上述种种报道可以看出，外界的猜测基本是：谢胡是他杀而不是自杀；他同霍查之间发生了激烈矛盾。至于什么矛盾，有接班人问题和政策分歧两种说法。当然，所有这一切更多只能说是记者们未经证实的某种猜测，是想破解这个谜所作的努力。正如英国《卫报》1982 年 1 月 15 日说的，“巴尔干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谜，而这个生活在关得紧紧的百叶窗后面的、与世隔绝的共产党国家是否正在经历一场真正流血的权力之争，这个谜仍然没有解开。……在被严密控制从不泄露机密的核心机构之外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总而言之，这仍然是个谜，一个未解的大谜团。

二、谢胡与谢胡家族的兴衰

在进一步破释这个谜团之前，先回过头来说一说 40 多年来谢胡与谢胡家族的兴旺和衰落过程，是颇有趣味的。

从本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初，阿尔巴尼亚的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险象环生，演出了一幕幕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权力之争。在这些斗争的风雨雷电中，多少人突然厄运临头，昨日的“亲密战

友"，一夜间就成了怨家对头，从此黯然消失，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就此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就在这些凶吉莫测、心惊胆颤的斗争风云中，有一个人迅速地占据了这个舞台的核心位置，俨然成了霍查的左膀右臂。他就是显赫全国的穆罕默德·谢胡。

谢胡于1913年1月10日出生在马拉卡斯特地区焦卢希村。1932年毕业于地拉那技术学校。1933年进入意大利那波利军事学校学习。1937年11月，他经法国进入西班牙，加入了国际二十七旅——"加利巴蒂旅"，参加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据说，谢胡在战场上表现出少有的英勇，并为此获得了共和国军上尉的军衔。1937年12月，他被吸收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1939年，共和国军撤至法国境内时，谢胡和其他战士一起被法国当局关进了集中营。在那里，他成了意大利共产党党员和集中营党委委员。

在集中营关了40个月以后，谢胡于1942年8月10日回到了国内，并加入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来的劳动党）。后来，他被委任为发罗拉州党委委员和州党委组织书记。

在1943年3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谢胡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3年8月，他被任命为民族解放军第一突击旅旅长；1944年任第一突击师师长。

1944年5月，在佩尔梅特市召开的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上，谢胡当选为阿尔巴尼亚最高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委员（该会议为临时国家立法机关）。

1944年11月，谢胡指挥了解放地拉那的战役。不久，他被任命为人民军副参谋长。全国解放后，他曾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高等参谋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任人民军参谋长。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48.11）直到他死前不久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48年10月，在发生科奇·佐治"反党案件"后，谢胡继佐治

之后接任内务部长。同年11月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可以说，这在谢胡的政治生涯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1954年，霍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谢胡继任。专掌边防和公安大权的内务部长一职，由谢胡的内弟卡德里·哈兹比乌担任。

上述事实说明，正是凭着他的种种功绩和他对霍查的无限忠心，谢胡得到了霍查的青睐。在解放后两任第二把手（科奇·佐治和屠克·雅科瓦）在党内斗争中先后消失以后，谢胡终于做了阿尔巴尼亚的党政第二把手，并且长达27年之久。这期间，霍查和谢胡紧密配合，相辅相承，以至60年代初阿苏争论中，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都把阿尔巴尼亚领导称作"霍查—谢胡集团"，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谢胡当时在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非同一般。不仅如此，1956～1959年曾任南斯拉夫驻阿大使的米拉托维奇也说，33年来，谢胡一直是"掌握着党政大权的霍查作出的党政决定的始终如一的执行者"，"谢胡参与了阿尔巴尼亚在政务和党务方面的所有重大改变，参与阿尔巴尼亚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参与对党政领导人的历次清洗……"。一个对阿尔巴尼亚问题有所研究的外国人曾经说，在阿尔巴尼亚，霍查是脑袋，谢胡是胳臂。还有一位外国记者说，"40年来谢胡对霍查的忠诚，就象彼得对耶稣基督那样虔诚"。这些话形象地说明了霍查和谢胡的关系，也说明了当年谢胡在阿尔巴尼亚所起的作用。

当然，最说明问题的应该是他们两人自己的表白了。这里不妨引用一些两人相互吹捧的话：

1948年6月，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此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就揭发了以当时的第二把手科奇·佐治为首的"反党案件"。为说明这一案件的前前后后，在阿尔巴尼亚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48年11月召开）的前夕，即1948年10月4日，地拉那举行了党的积极分子大会，霍查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就盛赞谢胡"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对我军的士气，组建和现代化作

出了重大贡献。穆·谢胡以一个中央委员所应有的坚定性捍卫了党的总路线和我党在军队中的正确路线”。

1962年，在人民议会五届一次会议上，霍查代表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推荐谢胡再次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时，对谢胡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谢胡是“我国人民卓越的和天才的儿子，党和国家最忠诚的领导人之一，他把一生献给了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至于谢胡对霍查的吹捧更是不胜枚举。1950年10月16日，谢胡就在党报《人民之声报》上发表文章，祝贺霍查的42岁生日。谢胡在文章中称霍查“不仅是党的缔造者和组织者，并且也是我们英雄的军队和人民政权一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组织者，是我们党取得一切成就的主要因素”。

1976年11月，谢胡在劳动党“七大”上作关于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六五”计划（1976—1980年）的报告时说：“我们有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不朽思想和霍查同志富有生命力的学说所培育出来的人民和党。”这就把霍查放到了与马、恩同等的地位。

最典型的吹捧发生在1964年5月。当时，在佩尔梅特市为庆祝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20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上，谢胡发表了感情激动的即席讲话，甚至当着霍查和其他党政领导人以及大批外宾的面，称霍查是“我们亲爱的爸爸”。当时，细心的人发现，谢胡仅比霍查年轻5岁；还有不少人还当即联想到，当年赫鲁晓夫不是也曾这样称呼过斯大林吗？

让我们接着看看谢胡家族的兴衰过程。

从阿尔巴尼亚解放到1981年的近40年中，随着谢胡的飞黄腾达，他的许多亲属进入了党政重要部门。首先当然是谢胡夫人费契莱特，她自党的“二大”（1952.4）直到1981年11月的“八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50年代初曾任首都地拉那市党委书记，随后任党校校长。

谢胡家族中另一个重要成员是谢胡的内弟卡德里·哈兹比乌。他自党的“二大”起就进入中央委员会，党的“四大”（1961.2）和“五大”（1966.11）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六大”（1971.11）、“七大”（1976.11）和“八大”（1981.11）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54年，谢胡继霍查之后任部长会议主席，原任的内务部长一职由哈兹比乌接任。

接着就必须谈到阿尔巴尼亚军界1975年发生的“巴卢库反党案件”。此案涉及面颇广，除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军参谋长彼特里特·杜米和党中央委员、人民政治部主任希托·恰科军队三巨头外，还撤换了军队的几乎全部中、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各军兵种司令和军区司令。正是在这么多高级干部消失的同时，谢胡和谢胡家族却到了极盛时期。当时，国家总理谢胡亲自兼任国防部长，掌握了全国的军事大权。1980年，谢胡不再兼任国防部长，其职由原任内务部长的哈兹比乌继任，而内务部长一职由谢胡的侄子费乔尔·谢胡接任。这样，军警大权仍然保持在谢胡家族的手中。

另外还有一种传说，当时的外交部长、曾任驻苏、驻华大使的奈斯蒂·纳赛，也与谢胡有亲戚关系。

显然，在阿尔巴尼亚的政治舞台上，那时的谢胡和谢胡家族确实达到了权势的顶峰。对这样一个颇具敏感性的问题，素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霍查恐怕不会视而不见的吧！

果然，好景不长，在某种扑朔迷离的情况下，谢胡自己也终于从最高层跌落下来，象他的许多前人那样倒了下去，紧跟着，谢胡家庭也迅速走向衰落……。

谢胡死亡的当天，他的老婆费契莱特第一个销声匿迹。连与政治舞台不沾边的三个儿子也在那一天被捕入狱。1982年1月，费乔尔·谢胡被解除了内务部长职务。同年11月底，阿尔巴尼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改组，16个政府部长更换了12个，其中包括国防

部长哈兹比乌、外交部长纳赛以及工矿部长、能源部长、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建筑部长、商业部长、外贸部长、计委主任等。

据传，在谢胡死后约两年，即1983年某个时候，哈兹比乌被枪决，费契莱特和几个儿子都被判处徒刑。这样，谢胡家庭也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谢胡家族的衰落从一个角度说明，谢胡之死确实不同寻常。

三、"间谍"、"叛徒"——霍查的指控

让我们还是回到谢胡死后的反应中来。

谢胡死后的整整一年中，客观上始终存在着一种看起来相互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的奇特现象。一方面，阿尔巴尼亚当局对谢胡之死，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另一方面，围绕这一死亡形成的谜团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久久没有得以破释。

这漫长的365天里，许多人虽然作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提出过这样那样的猜测，试探着来破释这个难解的谜。但始终得不到可靠的证据。这样，猜测仅仅只是猜测，谜，依然是个谜。

但是，时机一到，沉默也就打破了，更何况象谢胡这样一个总理级的人物神秘地消失，或迟或早、或多或少总得有个交代。

终于，这样的时刻到了，恩·霍查亲自打破了这个沉默。

1982年11月10日，霍查在地拉那会见第210选区的选民时发表了长篇讲话。虽说这是一次选举活动，但实际上是一次中央和地拉那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会上，霍查神情激动地公开指责了当年的"亲密战友"穆·谢胡。他称谢胡是美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的间谍，是"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最危险的叛徒和敌人之一"。他说，谢

胡“曾多次因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到党的批评，但他都掩饰过去了。已经发现的资料和不可否认的证据说明，他早在战前就为美国秘密情报机关效力；战争时期和解放以后，穆·谢胡作为外国的雇佣者在阿尔巴尼亚作战和活动，并对他们唯命是从。早在第一旅期间，他被南斯拉夫秘密情报机关，后来又为苏联的克格勃所收买，并为它们尽力效忠。根据外国特务机关，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指令，他及其现已移交侦查机关的阴谋集团成员曾企图破坏我们党和人民政权，使阿尔巴尼亚屈服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

霍查接着指出，“为了执行他们在华盛顿、贝尔格莱德等地的主子确定的间谍和强盗计划，穆·谢胡及其同伙准备开始他们的罪恶活动。谢胡接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指令，要他谋杀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用恐怖手段镇压所有敢于反对这一大背叛行径的人们。……穆·谢胡绝不可能动摇和歪曲党的路线，因为他如果企图这样做，就会马上暴露自己。”

霍查最后说：“处于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要求……以及害怕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两面夹攻之中的穆·谢胡走投无路，只好走上自杀这条可耻的道路。”

霍查的上述讲话，不管是不是真的点破了这个谜，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即谢胡是在企图杀害霍查不成时被迫“自杀”的。这就明确地否定了一年以前阿尔巴尼亚当局关于谢胡因“精神忧郁”而自杀的公告，也就是说，霍查亲自证实，谢胡的自杀不是因为“精神忧郁”，而是因为同霍查发生了某种冲突并打了败仗。

可是，霍查的指控显得那么笼统和空洞。事实真相还蒙在一层层迷雾之中，人们在问，谢胡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他同霍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此外，人们又提出了两个新问题：阿尔巴尼亚当局一年前为什么制造了关于“精神忧郁”这样一个假动机？霍查一年后提出的指控到底是不是事实？

结果，谜，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四、霍查笔下的谢胡

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上的这场离奇的话剧还在继续……。当然，死了的已经彻底闭上了嘴，他是无法为自己申辩了，但活着的总还要说话的。正出于这个原因，霍查在1982年出版了回忆录式的作品《铁托分子》。在这部长达600多页的著作里，除了大谈阿南关系以外，霍查以很大篇幅叙述了谢胡沦为“多国间谍”的整个过程和作为“人民敌人”的种种罪行。这里且不说它的真伪虚实与是非曲直，在没有得出真正的“谜底”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霍查笔下的谢胡，并结合霍查的叙述介绍一些来自其他方面的有关资料。

“四料间谍”——谢胡

30年代初，年不满20的谢胡在地拉那技术学校念书。这所学校是美国创办的，主持人就是当时美国少有的阿尔巴尼亚通哈里·弗尔茨。阿尔巴尼亚解放初期，他以美国驻阿尔巴尼亚文官使团副团长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地拉那；1946年，他被阿尔巴尼亚当局指责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而离阿回国。据霍查在书中透露，正是在这个弗尔茨的一手培植下，作为中学生的谢胡成了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而谢胡1933年到意大利那波利军事学校学习和1937年参加西班牙战争，都是出自美国情报机关的安排。西班牙战争后，他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在这里，他又被英国情报机关收买，成了它的间谍。代号BAB—008。后来，集中营里来了一个德国盖世太保军官和一个意大利军官，他们把谢胡从集中营里带了出来，并把他送到了意大利。

2个月以后，谢胡回到了国内，在都拉斯投靠了一个名叫曼·库卡莱希的阿尔巴尼亚人、意大利间谍。又过了20天，谢胡出现在自己的家乡马拉卡斯特，并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谢胡和他的老婆费契莱特又被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驻阿尔巴尼亚的代表杜尚·穆戈沙双双收买为南斯拉夫间谍。按霍查的说法，谢胡和费契莱特的结合正是穆戈沙做的大媒。

1944～1948年，霍查与当时的第二把手、政治局委员科奇·佐治有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情报局1948年6月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在客观上帮助霍查扭转了局势，佐治被谴责为南斯拉夫的代理人，并于1949年被判处死刑。在过去的阿尔巴尼亚文件中，都提到谢胡在这场斗争中是站在霍查一边的，并因此进了政治局，接替佐治而做了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但在30多年后霍查的这本书里，却说谢胡"自杀"后找到的文字材料证明，谢胡同科奇·佐治曾经有过勾结。1944年12月10日，谢胡曾在写给党中央（实际上给了佐治）的一封信中攻击党的路线是"宗派主义的"和"地方主义的"，并把当时党的领导说成是"党内小集团"，认为"我们党需要进行一次全面的革命"，实际上是要把霍查等人加以清除。此外，他对1943年3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仅仅选他为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5月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没有授予他将军衔而表示过不满。霍查接着历数谢胡在战争年代的主要罪行：宗派主义，恐怖行为，在救援陷于敌人包围中的总司令部时行动迟缓，没有及时投入什库宾河以北地区作战，等等。

霍查认为，谢胡实际上不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和游击战士进行战斗，而是作为英、美的雇佣兵和派遣分子开展活动。例如，谢胡死后，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找到了一份他1942年回国时亲笔写的行动计划。这里他根本不提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而主张实行多党制。霍查认为，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民主计划。

全国解放后，谢胡又成了另一个大国苏联的间谍。霍查说，他

已掌握了谢胡在解放初期写给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军事使团团长伊凡诺夫少校的一封信，信中攻击了党的路线和党的总书记霍查。

在霍查的笔下，一个当了整整27年总理的谢胡竟然是一个美、英、南、苏“四料间谍”。

一连串“反党案件”的总后台——谢胡

阿尔巴尼亚在从1944年11月解放到1981年12月谢胡“自杀”的30多年中，劳动党内“反党案件”接连不断，仅有阿尔巴尼亚官方资料可查的就达16起之多，平均约2年一起。在这些频繁的斗争中，许多干部或倒下，或入狱。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政治局委员就有18人，中央委员约50人；至于遭到株连的人更是不可胜数。据外界估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阿尔巴尼亚因政治问题被处决的达45000人，另有9万人左右被关在各地的18座集中营、6座监狱和7座劳改营中。对一个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刚过百万，目前人口也才320万的小国来说，这些数字确实是相当惊人的。但今天更耐人寻味的是，霍查在1982年发表的这部作品中，把30多年来的主要案件一个个用“谢胡”这两个字串了起来，说谢胡是它们的“总后台”。这里试举数例。

阿尔巴尼亚解放后的第一个大案就是“科奇·佐治案件”。霍查对谢胡与佐治关系的“新发现”，前面已作过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50年代发生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一起大案——“地拉那党代会事件”。当然，主要还是看一看霍查在这本书中是怎么说的。

1956年2月，苏共举行了举世注目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有名的“秘密报告。”此后，它在不少东欧国家和世界许多共产党内引起了种种反响。当然，阿尔巴尼亚也不在例外。

据霍查在这部著作中说，当时，谢胡接到苏联和南斯拉夫情报

机关的命令，并得到英、美间谍机关的同意，要他及其同伙加紧开展活动，使阿尔巴尼亚步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后尘。这样，就发生了“地拉那党代会事件”。

在1956年5月劳动党举行“三大”前夕，即同年4月，地拉那召开了市的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代表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矛头直指霍查本人和以霍查为首的党中央。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批评的一些现象在劳动党内同样存在着，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特权、腐败、官僚主义和霍查的人个崇拜等；他们还提出要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接着，他们主张劳动党，特别是即将举行的党的“三大”，应该按照苏共“二十大”的精神重新审查党的路线，并为一些人恢复名誉。

这出人预料的一幕使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当天，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贝基尔·巴卢库赶紧向谢胡作了汇报，两人随即找了霍查夫人涅什米叶·霍查，并建议她赶赴发罗拉，向正在那里休假的霍查报告。就这样，霍查连夜返回地拉那。次日，霍查率领全体政治局成员，到会亲自处理这一事件。会后，有27人当即被捕入狱，而地拉那市委第一书记、谢胡老婆费契莱特不久也被撤职，在党内受警告处分；至于因此事遭受株连的人那就更多了。

在1982年的这本书中，霍查还认为，这一事件是南斯拉夫和苏联间谍机关策划的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而贝基尔·巴卢库实际上是南斯拉夫情报机关的代表、“谢胡集团”的成员。当然，谢胡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

在中国，许多经历过60年代的人都还记得，1960年夏，阿苏之间的矛盾开始走向表面化，并日趋尖锐。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发生了“贝利绍娃事件”。到了1982年，霍查写道：

1960年6月，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利丽·贝利绍娃作为议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但霍查等人发现，她违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愿过早卷入中苏矛盾的立场，前往苏联驻华

大使馆，把中国领导人同她的谈话内容全都告诉了苏联人。为此，当她还在北京的时候和后来离华回国的途中，地拉那就给她发出了两封电报，对她在北京的态度提出了警告，并说明了她到莫斯科后应采取的立场。但是，作为苏联间谍的贝利绍娃不听党中央的劝告，会见了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甚至把党中央给她的电报也交给了苏共领导。

霍查在书中还第一次透露说，贝利绍娃一回到国内，就私下对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煽动说："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应该搞掉霍查。"但当场遭到始终站在霍查一边的卡博的拒绝和谴责。

最后，贝利绍娃被指责为"苏联领导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传声筒"，在1960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在1982年发表的这部著作中，霍查称这一事件是谢胡手中的一步棋，把它同谢胡又串在了一起。

据霍查在书中介绍，1973～1975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接连发生的帕奇拉米·巴卢库和凯莱齐三大"反党案件"也有一个总后台，他，就是国家总理谢胡。有关他们之间的奥妙，下面还有详细介绍，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谋害霍查的"杀手"——谢胡

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上的这场话剧在继续看……。但星转斗移，随着时间的消逝，它的情节越来越离奇。让我们继续看霍查是怎么说的。

1960年9月，联合国召开第15次大会，这就是赫鲁晓夫拿着皮鞋敲打桌子的那次大会。谢胡率政府代表团赴纽约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及其随同人员乘坐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远洋游轮。据谢胡"自杀"后被捕入狱的当年的随同人员交代，当时，铁托也在这艘游轮上。在这漫长的远洋航行途中，他们两人见了面。进行了交

谈。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同行的旅客中竟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哈里·弗尔茨和以记者身份出现的英国间谍兰道夫·丘吉尔。谢胡在同他们的秘密交谈中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情况，特别是阿苏矛盾激化的情况以及阿党的态度，谈到了劳动党将在莫斯科会议上采取的立场。当然，他们究竟具体谈了些什么，霍查没有介绍，外人就更不得而知了。

故事还在发展之中……

1968年8月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布拉格事件"。此事也波及到阿尔巴尼亚。据霍查在书中说，当时，身为西方和南斯拉夫间谍的谢胡也行动起来。1972年，他以动手术为名，带着去纽约的同一个随从班子和费契莱特，前往法国巴黎。在那里，谢胡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汇报了国内形势以及他与巴卢库和凯莱齐等人谈妥的行动计划。美国人要求谢胡加紧活动，但不要暴露自己。他还向谢胡提出了谋害霍查的要求，并设想了三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第一，制造交通事故；第二，远距离射击；第三，下慢性毒药。最后采取那个方案，由谢胡自己看情况决定。

几乎与此同时。费乔尔·谢胡向穆·谢传达了南斯拉夫情报机关内容基本相同的指令。

谢胡从巴黎带着一台收发报机回到国内，并把它安装在自己的家里，由他的作为电子工程师的大儿子弗拉季米尔负责。这样，霍查在书中把一个国家总理的家庭说成了"间谍老巢"。

在作了这种种准备之后，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令，谢胡开始了他计划中的一系列行动，目的是使阿尔巴尼亚局势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变化。据霍查在这部著作中介绍，这些行动中最主要的要算1973～1975年发生的三大案件。但谢胡的这三步棋都失败了。

这三大案件就是：以中央委员法迪尔·帕奇拉米和托迪·卢鲍涅为首的文化界"反党集团"；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

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人民军总参谋长佩特里特·杜米和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希托·恰科为首的军界“反党集团”；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阿卜杜勒·凯莱齐、政治局委员、工矿部长科乔·戴奥多西和中央委员、贸易部长基乔·恩杰拉为首的经济界“反党集团”。事实上，他们都只是因为同霍查有过不同政见而已，但当时这对霍查来说，就构成了不能容忍的“反党行为”。这样，这些人都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大部分被判处死刑。但不仅如此，从各方面的资料得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71年11月选举产生的六届中央委员71人，因这三大案件而被开除的达14人；随之被清洗的党员和干部多达3万余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株连面之广更是非同一般。

1981年，南斯拉夫和美国情报机关都进一步要求谢胡在肉体上清除掉霍查。为此，它们首先要求谢胡老婆费契莱特去巴黎听命。那年的4月，费契莱特来到巴黎。在那里，她与一个南斯拉夫的情报头子见了面，主子交给她一包毒药，要她尽快用来断送霍查的性命。

南斯拉夫人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的指令使谢胡颇感意外，他觉得准备不足，把握不大。于是，他决定找他的头号主子，美国中央情报局……。

费契莱特不顾夏天的炎热，也不怕旅途劳累，奔波于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她到了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她陈述了谢胡的困难和意见，并建议把在肉体上消灭霍查的行动时间推迟到1982年3月霍查休假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同意按谢胡的方案进行。

就这样，按霍查的说法，阿尔巴尼亚的总理谢胡开始了谋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的行动，成了名副其实的谋害霍查的“杀手”。

从霍查书中的介绍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上经过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全剧已经到了高潮。可说是双方磨刀霍霍，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但是，在霍查的笔下，在最后一击的前夕，还演出了谢胡为儿子斯坎德尔订婚的小插曲。

1981年9月，经谢胡同意，他的第二个儿子斯坎德尔准备与地拉那大学经济系学生希尔娃·图尔迪订婚。但霍查发现，姑娘家里有6—7个人是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争罪犯，至今还逃亡在外，其中，希尔娃母亲的表兄阿尔希·比帕是一个逃亡的反共头目，现在美国任教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当然，在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心目中，这是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政治错误和大逆不道的反叛性行为。结果，儿子的婚事没有办成，老子却因此挨了批评，并要求他作出深刻的检讨，挖掘犯这一错误的根源。显然，一场可怕的厄运降临到了谢胡的头上，这可能就是西方记者估计的最上层发生的“算总帐”吧！

据霍查说，当时考虑到正筹备11月1～8日举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谢胡的问题先放一放，待党代会以后再让谢胡作检讨，这样，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谢胡作为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照例作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指示草案（1981～1985年）的报告，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81年12月16日晚上10点钟，即政治局准备开会讨论谢胡错误的前一天，费乔尔·谢胡突然来到穆·谢胡的家里，向他传达了贝尔格莱德“最后通谍式”的命令。命令要求谢胡“即使在会上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性命，杀掉恩维尔·霍查。”

但就在这时候，谢胡自身的处境已经十分不妙。12月17日，政

治局开会听谢胡作检查。并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甚至追溯到战争时期，说他曾经把自己置于党之上。对下级表现了一种难以容忍的狂妄自大和粗暴，包括对自己在政府和政治局里最亲密的同志都是这样。尽管如此，大家在会上建议只给他严重警告处分。最后，决定第二天继续开会。但在散会以前，霍查对谢胡说："今晚你要深刻地反省自己，明天再向政治局说明你的动机。你对订婚的辩解是站不住的。另外有什么东西促使你采取这种该受责备的举动。"据霍查在书中说，他的这一番话使谢胡大受震动，以为霍查已经发现了他筹划中的罪恶行径。

会后，谢胡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这一夜，他陷入了难言的烦恼之中，彻夜未眠。他反复捉摸着霍查话中的真意、反复掂量着自己眼前的处境……

是的，谢胡已觉得处境不妙。一方面，贝尔格莱特来了硬性命令——尽快干掉霍查；另一方面，政治局勒令他作出彻底检查，并且从霍查最后的话中觉得话里有话……。谢胡感到自己已处于两面夹攻之中，两头为难，他该怎么办呢？

走投无路的谢胡最后下定了一个决心……。在这之前，他和费契莱特一起，把毒药扔进了抽水马桶，叫大儿子拆掉了收发报机。很快，一切就将完结，一切就将成为过去。

终于，……枪声送走了谢胡的性命。

——这就是霍查 1982 年的叙述，是不是事实，由你自己评判。

但铁的事实是：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上这场扑朔迷离而又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结束了，谢胡成了霍查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输家"。

五、枪声的余音

许多年过去了，但断送了谢胡性命的枪声却一直在地拉那上空回荡，余音缭绕，久久没有消失。

当年。谢胡神秘地“自杀”身亡，对此，在阿尔巴尼亚的表面生活上虽然显得异样的平静，但在政治舞台厚厚的帷幕后面却确实紧张和忙碌了一阵子。首先，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从全国各地被紧急召到了地拉那，举行了中央全会。会上，霍查向大家通报了谢胡“自杀”的前前后后。当然，外界对其内容是不得而知的，但霍查在 1982 年的书中透露。当时，与会者听了政治局第一天会议的“实况录音”。中央全会后，在全党各级组织都播放了这个“实兑录音”。这样，在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公众心目中，谢胡真可说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了。

此后，特别是在霍查公开宣布谢胡是“多国间谍”以后，阿尔巴尼亚全党全国对谢胡谴责之声四起。别的不去说它，单说霍查 1985 年 4 月 11 日病故后继任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拉米兹・阿利雅的一番话。1986 年 11 月 3 日，他在党的“九大”上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之一，就是揭露和粉碎了多国间谍穆・谢胡的阴谋及其罪恶集团”，因为他“代表着对祖国的自由独立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未来的危险”，他的活动“在党内、经济上、国家机构中以及在军队和内务部造成了后果”，而这一胜利要归功于“恩・霍查同志的高度的阶级警场性。”

至此，围绕谢胡“自杀”身死的一切，似乎就按这个调子定了性，一切就算作了交代，该结束了。可是，“不”……，一个无情的声音冒了出来，他是谁？

1990年下半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国内局势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不安之中。不久，在种种压力和内外多种因素的交相影响下，拉·阿利雅主持的人民议会主席团决定释放全部政治犯。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发生了。

1991年3月。谢胡的第二个儿子斯坎德尔（正是当年准备订婚的那个儿子）也获释出狱。同年4月5日，路透社记者从地拉那报道说，那时已经41岁的斯坎德尔用英语向记者透露了“阿尔巴尼亚的这一政治之谜的某些细节”。他说：“我认为他是被迫自杀的”。他没有证据来证明西方关于他父亲可能被谋杀的持续不断的猜测。1981年9月至12月，他虽然在瑞典进修，但他从他母亲和哥哥处得知，1981年12月18日，费契莱特和她的长子弗拉季米尔发现谢胡已躺在床上，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身边放着一支手枪——他已经死了。

这样，地拉那枪声之谜又在人们的脑海中升起。人们还在想破释它。

作为死者的儿子，斯坎德尔的话是否可以算作谜底，断定谢胡是“自杀”了呢？人们在问。突然，又一个问号，一个使人惊讶不已、异乎寻常的大问号出现了……。

1993年1月6日，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民主复兴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题目是：《拉米兹·阿利雅为历史作证》。文章再次提出谢胡之死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迄今十多年来。只有外国人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并想尽办法来寻找它的答案，可是今天，却是阿尔巴尼亚人自己提出了这个“自杀”还是“他杀”的问题。这充分证明，围绕谢胡之死这个谜提出的种种问题，既不是无谓的好奇、更不是无聊的编造，而是确实的客观存在，值得一问。

更令人吃惊和深思的是：《民主复兴报》的文章提出了这一疑问的根据。请看：

文章质问阿利雅道："为什么在老百姓的公墓里被埋葬不到3天，你们又把他挖了出来，并且不知道他的尸体到哪里去了？难道我没有权利说，你们销毁他的尸体，不正是害怕以后有人会检查发现，他不是自杀，而是被一串子弹连发打死的吗？"这样，作者为谢胡是"自杀"还是"他杀"画上了一个问号，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夺走谢胡性命的地拉那枪声余音不散。它仍在回荡……。

十多年过去了，谢胡之死依然是个谜，一个难解的谜……。

第六章

柏林墙风云

——两德统一的前前后后

1989年12月2日，地中海风大浪高。这一天，美苏首脑在马耳他海域一艘苏联客轮上会晤。虽然是非正式会晤，然而就其重要性而言，此次为期两天的会晤被认为是战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当美国总统布什向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送上一块柏林墙的碎片作为礼物时，世界舆论一致认为：冷战结束了。柏林墙的坍塌，结束了一个时代。

这灰色的水泥块，凉森森、沉甸甸。它几乎凝结了战后几十年国际政治变幻动荡的风云。它像一位历史老人，无声地叙述着从雅尔塔到马耳他的漫漫历程，把我们带回到炮声骤停，百业待兴的40年前……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 柏林：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德国的命运之城

从1948年6月到1949年5月，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柏林这个

城市始终吸引着整个世界的目光。

仲夏的柏林，蓝天辽远，白云悠然，摄氏20度上下的气温很是宜人。然而，战争把美丽柏林摧残成一片废墟，居民从战前的430万锐减到250万。眼下，他们的生存又受到了严重威胁。

自从1945年5月2日柏林被攻克以来，就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1947—1948年间，西方三国合并其占领区，成立联占区。1948年6月18日，联占区实行的币制改革，加上柏林市政府领导人的选举都触犯了苏联。盛怒之下，苏联于6月24日彻底封锁了柏林美英法三个占领区（简称西柏林）。一时间，西柏林与苏占区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全部中断，煤、电、牛奶、蔬菜及其他食品供应也被切断了。三国驻军和200多万居民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斯大林真是大手笔，不做则已，一做惊人。也难怪，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与盟国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和尖锐，共同面对希特勒纳粹时的盟军感情已荡然无存。不象在雅尔塔时，苏美英三巨头还能平心静气地坐在谈判桌前。那是在1945年2月4日到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举行了长达8天的会谈。其间，在2月8日的夜宴中，三人相互祝酒竟达45次。丘吉尔举杯祝愿：百年的和平；罗斯福许诺：尊重小国的权利。就在这连日欢宴的友好而又闲散的气氛中，三巨头打乱国界，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及对德国处理问题激烈地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协议，签署了举世闻名的克里米亚声明。

1945年2月11日，星期天，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会定于中午举行。白厅一片肃然，桌子上铺着白布，上面插着三国国旗。12点50分，三巨头走到桌前；16点，他们在最重要的一页上签了字；尔后，他们相互道别，互赠礼物。在这次会议上，三巨头决定了未来德国的命运，他们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把足以搅乱世界政治地理的钥匙。日后人们才明白，就是在斯大林选择的雅尔塔，在黑海之滨昔日沙皇的宫殿利瓦基亚宫，诞生了一个时代。

著名的克里米亚声明的内容大致是：德国无条件投降，盟国分区占领德国领土，共同监管德国，为此设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邀请法国以第4个占领国的身份参加管制委员会。三国还一致同意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解散一切可能用作军事生产的工业，根除德国军事参谋本部，惩办所有战争罪犯，对德寇发动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索取赔偿，消灭纳粹党、纳粹法律、组织和制度，并创造一切条件，使德国决不能再破坏世界和平，等等。

这个声明确定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雅尔塔格局或雅尔塔体制，直到东欧和苏联剧变后，这一格局才告结束。

就德国问题而言，克里米亚声明只是一个框架。因此，到几个月后德国无条件投降时，苏美英法四国又于1945年6月4日发表了《苏美英法四国关于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和《鉴于德国失败和接管最高政府权力的声明》，以及关于管制办法、占领区和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关系的三项补充规定。随后，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后为艾德礼）又于7月17日开始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谈。就处理战败的德国问题再作具体规定。8月2日，共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波茨坦协定》。

克里米亚声明和波茨坦协定并未提及分裂德国，相反，它一再强调德国是一个整体。然而，冷战的加剧使得后来根据波茨坦协定召开的苏美英法和中国五国外长会议断断续续，最后终于失败。在从1945年9月第一次伦敦外长会议到1947年11月最后一次会议的两年多时间里，竟无法就德国和平方案达成协议。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致力德国分治的意图，也就在一次次争吵中昭然于世。从此，各国开始明目张胆地把已控制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实，多年来无数次令人疲倦的会谈只是外交游戏，各国早就别有宗旨。杜鲁门总统早在德国投降的第二天就秘密指示艾森豪威尔："处理德国事务，必须使其全国政治管理机构趋于分裂割据的局面……为此目的，必须对各省、各地方、各市政当局的任何自治的

企图予以支待……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在管制委员会中提出以集中管理德国经济为目的的建议，也决不可支持这样的建议。”就连斯大林也在德国败局初定时毫不隐讳地说：“这次战争非同以往。谁攻占一块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之于它。军队所到之处，各自建立自己的制度，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战败的德国象鲤鱼放在砧板上，分裂的命运已定。

沿鲁贝克经杜德施塔特至霍夫一线为界，苏联人占领了德国东部，约占领土的1/3；西部就是美英法三国联合占领区。

然而，作为帝国首都，柏林的情况是特殊的。根据克里米亚声明及战后的有关文件，柏林虽为四国分区占领，但有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民主政府，政治上是独立的。不过，任免市政府领导人须经盟国城防司令部批准。

1947年6月，柏林市议会选举恩斯特·罗伊特为市长。罗伊特早年参加共产党，后脱离而加入社会民主党。苏联城防司令断然拒绝了这个选举结果。正是柏林市长的任免问题，成了东西方严重对抗的引爆点，导致了战后第一次“柏林危机”。

就在苏联封锁西柏林3天后的6月26日，西方三国，主要是美国迅即建起了“空中桥梁”，夜以继日地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

东西方剑拔弩张，到7月中旬，苏联在其占领区的驻军已增加到40个师，盟国在占领区也有8个师的兵力。7月底，美国将载有原子弹的三个战略轰炸机大队从本土调往英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告成立。作为反措施，西方三国同时也封锁了苏占区与西占区之间的交通运输，并禁止进口东方集团的全部重要出口产品。

如此对峙一年后的1949年5月4日，苏联同意解除封锁。5月12日，四国终于在巴黎达成协议：各自退回原地，同时取消封锁。

在危机期间，西柏林靠美国人的空中走廊为生整整一年有余。空运从1948年6月26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9月30日，耗资2.24亿美元，运送食物、燃料、机器与其他物资共2323738吨。

就在“封锁时期”，柏林市议会迎来了换届选举的日子。柏林市宪法规定，1948年12月5日为选举日。但早在11月30日，柏林苏占区（简称东柏林）先发制人，宣布成立“临时民主政府”，并选举了新市长。在此情况下，市议会换届选举只好在西柏林举行，社会民主党人罗伊特重新当选为市长，然而其职权已只限于西柏林了。

从此，柏林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西边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城两制”就这样诞生了。尽管是“一城两制”，但双方都将自己看成柏林市的唯一合法代表。

1949年，联邦德国在西部联占区建立，民主德国东部苏占区则在建立，分裂成为现实。两个德国都把柏林视作自己的领土，互不相让。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州。而民主德国宪法也宣布：民主德国定都柏林。

柏林，德国的命运之城，如今成了世界两大国分庭抗礼的前沿。

如果说，第一次柏林危机直接催生了东西柏林乃至两个德国的话，那么，第二次柏林危机就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建立。

2. 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

年轻的美国总统说，将会出现一个寒冬。

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依然战云密布。美苏争霸，针锋相对。1958年，柏林问题再次成为热点。

而在此前，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生效，联邦德国于5月11日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举再次惹翻了苏联。

苏联不仅严厉谴责联邦德国，而且在3天后，即1955年5月14日，火速成立了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华沙条约组织。世界上从此出现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而两大集团的严重对抗，使二者交界的东西柏林成为世界政治利益的交点。

西方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西柏林作为瓦解和摧毁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而苏联则坚持要求废除占领柏林制度，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一厢情愿地要让西柏林归并于民主德国。

从地图上看，西柏林是一块名符其实的“飞地”。它为民主德国包围，距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边界176公里，距民主德国与波兰边界48公里。在1961年8月13日以前，柏林虽分属两大集团，但边界一直开放，在东西柏林之间，在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之间，边界线长达165公里，它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花园或河道中间，每天有50万人来来往往。西柏林是个“自由城市”，形形色色的人应有尽有。据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我的经历》一书中记载，在西柏林，“至少有80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大肆进行货币投机、试图瓦解民主德国的经济，成立机构，招募民主德国的劳动力”。1961年7月10日的《科隆周报》更直言不讳地称，对付民主德国，要“采取冷战、神经战和射击战等一切手段……不单单使用常规军事力量和装备，也要使用渗透，煽动内部抵抗，搞地下活动，瓦解治安机构，破坏扰乱交通和经济，鼓动抵制和暴动”等各种手法。西方如此对付苏联的盟国——民主德国，盟主岂能坐视！

1958年11月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宣布，苏联主张废除占领柏林制度，要求改变西柏林地位，使之成为“非军事化自由城市”。12月27日，苏联政府照会美英法政府，宣布西方三国在西柏林的占领制度已无基础，要求其军队在6个月之内撤出西柏林。如半年之内西方三国就西柏林地位问题达不成协议，苏联将单方面采取行动，使民主德国对出入西柏林的通道行使安全的主权。这就是最后通牒，也是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肇始。也许柏林墙的雏形早在1958年冬就已孕育在这位苏联领袖的头脑中了。赫鲁晓夫后来沉着地说，如果西方将坦克开到柏林，苏联的火箭就会自动发射。

西方以一连串的军事演习回答东方。又有“迂回”，又有“坚

持”，又有“冬天之盾”。从这些意味深长的演习名目中，足可看出西方与东方抗争到底的决心。

而1961年6月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会晤的失败，使气氛更加紧张了。

6月的维也纳，森林滴翠，花香醉人。然而在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眼中，一切都黯然失色。在这次会晤中，克里姆林宫首脑依然老生常谈，宣布在年底前要单方面与民主德国缔结和约。这意味着取消盟军在柏林的权利。赫鲁晓夫强硬地说：如果美国要打仗，那是你们的事。

年轻的美国总统上任不久，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手，美国不接受最后通牒。他当美国总统不是为了让他的国家遭受孤立。美国进入柏林是打仗打出来的。留在这个城市是条约规定的权利。临别时，美国总统对苏联领导人说，将会出现一个寒冬。回到华盛顿，肯尼迪对美国民众说：关于德国和柏林，我们进行了最黯淡无光的谈判。

7月25日，肯尼迪发誓说，如果有人使用暴力，美国将为保卫柏林而战。5月间，美国已增加了34亿美元的国防费用。这一天，美国总统又下令扩充22.5万兵员和更多的后备部队，保留原已废弃的B—47型轰炸机，要求战略轰炸机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同日，英、法两国宣布往联邦德国增兵。而联邦德国在扩充兵力（已愈35万）的同时，甚至还谋划了有关“某日”行动的详细报告。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弗·约施特劳斯在美国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人们需对某种形式的德国内战有所准备。

对于美国总统的讲话，赫鲁晓夫照例评价为“好战”和“歇斯底里”。然而面对强硬的对手，克里姆林宫虽然让华约国家加强战备，“决不在帝国主义侵略压力面前退缩”，但事实上却改变了计划。8月初，莫斯科传出信息：不想触动西方国家的合法利益，并不准备封锁西柏林。

那么，对于苏联来说，既不退缩又不触及西方利益的最好方案

似乎就是保持保护现状，筑起一道墙来。

而对于民主德国，筑墙还基于现实的生存危机：公民外逃浪潮日甚一日，留住这些建设国家的最重要的“资本”，已是当务之急。

3. 阻止公民逃亡，成为柏林墙最现实的功能

伴随着民主德国的建立，公民逃亡浪潮便时起时伏。从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间，逃亡从未停止，最大的逃亡潮有3次。第一次发生于1949年10月至1953年间，在此期间，发生了“6·17”事件。1953年6月17日，民主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盲目提高劳动定额等作法。“6·17”事件遭到了苏联坦克和民主德国政府的镇压。第二次逃亡潮就发生在1961年，直接导致了柏林墙的建立。第三次逃亡潮则出现在1989年，致使民主德国消亡，两德统一。

据联邦德国“难民部”公布的数字，从1949年至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修建前一天止，从民主德国逃亡联邦德国（包括西柏林）的总人数达260万之多，占民主德国1600万总人口的16%左右，其中半数以上是从东西柏林之间和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边界上出逃的。尤其是1961年，“难民”数字显著上升：6月份2万人，7月份3万人，8月上旬几乎每天出逃1500人。就在修建柏林墙的当天，从紧靠封锁线的住宅后院或花园越墙逃跑的，或从运河和哈维河漂渡过去的仍有1500人之多。外逃人员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民警、边防军人、医生护士、法官、律师、科技人员；简而言之，从大学教授到中小学教师，从知名人士到家庭妇女，无所不有。

大量人员，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外流无疑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据有关部门统计，损失达1200亿马克，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向战胜国支付的赔偿。而且，外逃浪潮对社会造成强烈的心理震憾。还有，当时家住东柏林，每天去西柏林上班

的人达10万上下。他们挣着西德马克，又到西柏林的银行里以1：4（民主德国官方兑换价为1：1）换成民主德国马克，然后在东柏林享受便宜的住房、服务和食品等。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拿着资本主义的高工资，享受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他东德居民见此就更加沉不住气了，纷纷加入逃亡的行列，但战后的民主德国劳力奇缺，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民主德国再次面临生存危机。

对于危机的产生，从来都有不同的解释，且种种解释大相径庭。昂纳克在《我的经历》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义愤难平：

> “我们以应有的警惕注视着这一危险的事态发展。难道我们能够坐视别人利用开放的边界，在一场无可比拟的经济战中把我们共和国吸干吗？难道我们能坐视西方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制造类似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战争动员和战争歇斯底里的升级吗？当柏林西区成为冷战的桥头堡并且肆无忌惮地干着扰乱活动时，我们能坐视不管吗？如果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纵容了侵略者，那么民主德国人民、欧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会原谅我们吗？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曾发誓，决不允许再从德意志土地上发动战争，我们准备在任何情况下履行这一义务。”

苏联与民主德国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克里姆林宫眼看自己的意图难以实现，只好“以退为进”，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保护”民主德国，守住这个华约集团的前沿堡垒。

1961年8月3日至5日，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建议：对民主德国与柏林西区以及联邦德国的边界按一般主权国家边界实行检

查。会议一致同意这一建议。

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如愿以偿。他拿得令箭，便兴匆匆打道回府。很快，以国家名义发表的声明、决议便接二连三地宣布了。

8月11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发表声明：称欧洲和平面临严重的危险，因此责成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采取保障和平所必要的一切措施。

8月12日，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把欧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尚处于开放状态的边界有效地控制起来。当天下午4时，乌布利希签署了《关于民主德国与柏林西区以及联邦德国之间边界安全措施的命令》。

这就是建筑柏林墙的命令！1961年8月13日零点，是个注定要在历史座标上凝固的时间。从此，一个举世瞩目的行动开始了。

二、乌布利希的“长城”

1. 一夜之间控制了边界

1961年8月13日是个星期天。按照传统习惯，盛夏正是欧洲人的假期。凌晨的新闻使人们大为吃惊：东西柏林之间，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边界被封锁了。于是，这一天成了“惊惶、恐惧、迷惑不解的一天”。

建墙的准备工作快速而神秘。怪不得当时负责建墙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中央书记昂纳克以此而自豪。从莫斯科会议结束到建墙的仅仅一周内，一个以昂纳克为首的“行动指挥部”便正式成立了；对国家人民军、国家安全部、内

务部机构、警察部队和工人战斗队的指示纷纷下达；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人力、物力的准备也都就绪。

8月12日下午，总指挥昂纳克驱车前往德恩湖畔，他满意地看到：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摩托化装甲部队已进入道路两旁的戒备地区；警察部队也占据了有利地点；从外地抽调的工人战斗队在东西柏林相邻的波茨坦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专区进入了指定地区。关于这段历史，1960年7月出任民主德国国防部长的海因茨·霍夫曼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如何通过部队调动，声东击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部队调到指定地点。夜里，埃里希·昂纳克打电话给我，通知我行动时间。他说：'任务你清楚，行动吧！'我们刚到边界，昂纳克也到了，他要亲眼看看，我们的坦克和部队是否占据着有利地点。他不仅和我以及其他高级军官交谈，而且他还习惯地和士兵交谈，向他们阐述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

与此同时，各地段的人力物力已配备停当，大捆大捆的铁丝网、水泥柱和各种器具堆放在警察局大院里及另外一些秘密可靠的地方。万事俱备，只等命令。

这几天，柏林警察总局人来人往，显得十分忙碌。12日下午，值班警官冈·甘绍格上尉刚回到格施维斯特—绍尔大街部队的驻地，警察局长的一个电话就把他召去。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腕上的表针指向6点。

直到晚上8点，警察局长弗里茨·艾克迈埃尔将军才把甘绍格与其他警察部队的干部召集到会议室。他传达了当天下午乌布利希签发的文件和命令。

会议室里嗡嗡地响起一阵议论。甘绍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终于采取行动了！最近传达的党政机关的文件中对西方的警告，在这位警官心目中有了新的含义。不过他也有点担忧：不知西方会有什么反应？

艾克迈埃尔将军接着宣布了行动指挥部制定的具体行动措施：

动员柏林市的工人战斗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将铁丝网等全部器材按规定时间运抵指定地段，以待13日零点全线行动。这位警察局长还明确地说，将为西柏林人和外国人设立13个过境站，名称和位置也已确定；在整个行动过程中，苏联驻军和国家人民军将提供一切支援并承担安全保卫工作。

晚上9点，局长在结束会议时再三嘱咐，全体与会者要严守秘密。

甘绍格上尉驱车前往波茨坦广场。夜半天气凉爽，月色如水，然而上尉觉得阵阵躁热。他还得佯装一无所知的样子继续巡逻一个多小时。而实际上，甘绍格与同事们也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了，比如他就不知道刚才开会的地方就是昂纳克的行动指挥中心，也不知道，指挥部里的要人已各就各位。他们是：政治局委员、总指挥昂纳克、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维·斯多夫、政治局委员保·维尔纳、中央委员和国防部长海·霍夫曼、国家安全部长埃·米尔克、国家内务部长卡·马隆和副部长维·赛费尔特、交通部长埃·克拉默尔，东柏林市警察局长和内务部指挥班子负责人霍·恩德。气氛有点紧张，人们的喘气声依稀可闻。时针在跳动，11点15分，11点30分，11点59分………新的一天开始了。13日零点，行动命令通过电话下达给全线各个指挥点。

瞬间，集结待命的国家人民军、警察部队和工人战斗队开始投入“战斗”。柏林市成千上万个工人战斗队员家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门铃被按了又按，敲门声咚咚不息。街道上脚步纷杂。住在法兰克福门附近的卡尔·埃格尔被叫醒时已是凌晨三点半。他很快穿好衣服，准备停当。10分钟后出了门。他本来是坐地铁去上班的，单位远在勃兰登堡门附近，可是那会儿，他只好以步当车。一小时后，他终于来到自己的工作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所大楼前厅里已集结了不少人，他们编好队，迅速躲到离勃兰登堡门100码左右的一片桑树丛后面，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自己要干

什么。柏林电机厂工人赫尔穆特·乌尔利希和他的同事们，则被叫去与由沃尔夫冈·普里斯中尉带领的边防部队一起，在所管辖地段附近的树林里建立起自己的阵地，准备随时应付“敌情”。在以后的几天里，乌尔利希又带着一挺“马克西姆”机关枪进入了布里茨运河地段的阵地，武装保卫那些加固边界墙的工人和战士的安全。

不知究竟动员了多少工人战斗队员参加修建柏林墙。这支令昂纳克骄傲的队伍建于1953年夏天，当时爆发了“6·17”事件。直到1989年12月15日，柏林墙倒塌之后，民主德国政府才宣布解散工人战斗队，其武器、枪支和弹药让人民警察尽数收缴。当时的战斗队下设分队，又称百人队，通常以百人队为基础接受训练。昂纳克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支队伍时说：“1953年夏，工人阶级为了保卫共和国，对付反革命的阴谋破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工人战斗队。……从基层到中央，战斗队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昂纳克接着说：“在1961年8月13日以后的日子里，我仍然经常到坚守在边界的战斗队员、人民警察和武装部队中去。我向他们阐述这一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和意义，转达党中央和政府对他们的感谢。我还经常注意……与驻守边界的战斗队员……保持联系。”

此时，在165公里长的边界线上，人们在开阔的路面上竖起一个个水泥柱，架设倒刺铁丝网；而在别的地段，或利用河面，或利用建筑物，或利用战争遗留下的断垣残壁，很快地拉起了一道道铁丝网。

不能不叹服，乌布利希和昂纳克的行动策略严密而有效。三个梯队配合默契，行动有序工人战斗队是第一梯队，他们活跃在最前线，负责筑墙，控制居民，驱散群众。

第二梯队是人民警察，万一工人战斗队控制不住局面，由其出面干预。

第三梯队是包括苏联驻军在内的军队，准备应付最特殊的情况。

还有一支队伍很特别，同样不容忽视，他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训练有素的一群。在筑墙开始后，他们混在骚动的人群中，将大街上的老百姓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听其宣传演说，以此牵制注意力。就这样，东柏林开发锅一样的民众情绪被压制下去，大街上的人群被一一驱散。

天亮之前，民主德国广播电台播发了一项特别公报：

> 迄今为止，西方大国还无意通过谈判解决和约问题，而以扩军备战，煽动战争歇斯底里、威胁入侵民主德国的方式来响应社会主义各国和平建议。西方各国在继续利用西柏林作为颠覆民主德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大本营。西柏林密如蛛网的间谍组织派遣特务潜入民主德国，从事颠覆活动，招募特务并唆使敌对分子进行破坏，制造混乱，瓦解民主德国经济。联邦德国的政府机关采取欺骗、贿赂和讹诈等手段，使民主德国的某些不坚定分子跑到联邦德国。这些受骗上当的人在那儿被迫参加国防军，或被各国情报机关招募，然后被派回民主德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面对联邦德国及北约盟国反动势力的侵略野心，华约各国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自己的安全，首先是民主德国的安全。华约各成员国政府建议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和政府控制西柏林周围的边界，以堵住反社会主义各国的颠覆活动。

电波把这一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

当西柏林人，当联邦德国人，当整个西方世界从惊兀中明白过来时，柏林墙的一期工程，边界全线铁丝网的架设已近尾声。天亮之前，民主德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已把整个边界控制起来。

成功了！

昂纳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悠悠地松了口气。他似乎并不担忧“帝国主义侵略者会有什么大举动”。

果真如此吗？

2. 西柏林市长说，这次难以平心静气。他第一次体会到无可奈何的愤怒。

凌晨，一位铁路官员匆匆敲开一扇包厢门，告诉他的乘客说，西柏林已被封锁，请他尽快返回他的城市。这位乘客就是当时的西柏林市长，后来曾任联邦德国总理20年之久的维利·勃兰特，此时他正在从纽伦堡到基尔的软卧车厢里酣睡。昨天，他在纽伦堡社会民主党的一次大会上发了言，今天打算去基尔真正开始竞选活动。勃兰特已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离联邦议院选举只剩5个星期。

勃兰特只好中途下车。5点左右，他和小群随行人员由汉诺威搭清晨首次航班飞回柏林。下飞机后，他立即驱车直驶边界，先去波茨坦广场，然后折向勃兰登堡门。边界上已竖起一道铁丝网，这位市长睁大了双眼，他看到，民主德国的大批军队正在执行封锁通道的命令，警戒部队严阵以待。

勃兰特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他感到对事变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采取行动。他感到难于平心静气，镇定自若。他说过去几次柏林危机时，他都不得不保持冷静的头脑。这回不同，柏林遇到了1948年封锁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在他看来，一个政权怎么能这样残忍地把自己和人民封锁起来呢！勃兰特回到市政厅，立刻主持召开了一次参议院特别会议。然后驱车去盟军司令部大楼。勃兰特出任市长以来，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这座大楼。进入司令部后，他意外地看到墙上竟然还挂着苏军将领柯蒂科夫的照片。勃兰特猜测，盟国把他的照片安排在这里，大概不会是出于敬意，而只是拘泥于此时仍然有效的四国共管城市协定。桌旁甚至还为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后任留下一个空位子。勃兰特抽动一下嘴角，他想说，看看外边吧：按照四国协定，民主德国的军队本来无权进入东柏林，

如今眼前已是黑压压一片了！

盟军司令部和西柏林一样晕头转向，迷惑不解，他们立即召开会议。勃兰特其实也提不出什么真正的反击措施，只是要求：你们至少应该在莫斯科与其他华沙条约国的首都提出抗议，你们至少应该立即向边界派出巡逻队，以稳定人心，向西柏林人承诺他们并没有遭受威胁！

然而，三国城防司令愁容满面，不敢冒然行动，甚至不敢向卡尔霍斯特——驻柏林苏军司令部提出抗议。因为这是个星期天。美国总统正在他的游艇上，白宫没有应付危机的班子，而在西方其他国家的首都，连中央办公机关都无人值班。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同样正忙于竞选前的游说。

这么看来，民主德国和整个东方集团对封锁西柏林的决定及其牵涉到相当大范围的准备工作保密得异乎寻常的成功，乃至美英法和联邦德国以及西方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都未能觉察这一动向。

应该说，蛛丝马迹是很多的，早在6月15日，民主德国首脑瓦尔特·乌布利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有过明显暗示："没有人想要筑墙……"。而西柏林市长应是最敏感的。勃兰特于8月11日去纽伦堡之前赴波恩拜会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曾提醒说，估计民主德国当局即便纯粹出于保存自身的本能，也会采取强硬措施。8月12日下午，他在纽伦堡广场介绍了民主德国急剧上升的难民数字——24小时内的逃亡人数首次达到2500人。勃兰特警告说，"东区的同胞害怕他们的出路可能被切断，他们可能陷入孤独无援的境地并遭到封锁"。

对于勃兰特，对于联邦德国，对于西方，只是看到了事情的发展趋势，却并不知道事变发生的时间和具体形式。怎么会筑一道墙呢？按照西方人的逻辑，这岂不是对本国公民实行"保护性拘留吗"？

8月13日，联邦德国政府全德事务部长莱麦尔飞抵西柏林。西

柏林市民更是情绪激烈，纷纷奔向边界。勃兰登堡门的“大柏林”的象征，离它百米处就是分界线，如今正在横起一道铁丝网。市民们对正在架设铁丝网的东柏林人不住地谩骂，有的人投掷石块，急眼了还围住正在施工的士兵和工人，动手夺对方的工具和器材。气氛十分紧张。

冈·甘绍格上尉是位训练有素的警官，他虽然心急如焚，仍指挥若定：一面组织士兵保护工人，一面派人请求增援。

不一会儿，一批集结待命的工人战斗队赶到了。他们在勃兰登堡门前围成一道半圆形的人墙。他们个个身穿制服，手握转盘冲锋枪，肩并肩，形成一股威慑力量。面对枪口，西柏林人退却了。

第二天，8 月 14 日，又有数千人在这儿举行抗议集会。西柏林人投掷石块、爆炸物，双方发生多次冲突，民主德国人民警察动用了高压水龙来驱散人群。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主德国决定永远关闭这个刚开设一天的过境站。

8 月 16 日下午，勃兰特号召西柏林市民举行抗议大会。这位市长后来说：“8 月 13 日以后的那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紧张的日子”。那一天，舍内贝格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一片人海，附近的街道也挤满了人。形势无法预计，失望的西柏林人很容易把满腔怒火转向保护国。勃兰特真正感到为难了。他说他“第一次痛苦地体会到，什么叫无可奈何的愤怒”。那几天，西柏林众议院几乎天天召开特别会议，市长既要表达市民的愤慨，同时又要约束这种愤怒。作为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炸药解决不了问题。他想起前天晚上，一个电话把他叫到市政厅，城里又爆发了示威游行，一群青年人嚷嚷着要去炸墙。他上了一辆警车，用喇叭向青年人喊话：不要去撞啦，墙可比你的脑袋硬实，冒险帮不了那边同胞的忙。他力图让学生和青年人明白，墙的问题是不能用炸药解决的。然而在此时自己发动组织的有 30 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上，讲什么呢？怎么讲好呢？勃兰特终于知道怎样安慰他的民众了，他说：“这个城市希望和平，但是它不投降。世

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比柏林更希望和平、宁静和安全”。他告诉柏林人，他已紧急发出致肯尼迪总统的电文。是的，这年3月他访问美国，在华盛顿拜访肯尼迪时，美国总统特地关照，只要他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与其直接联系。

西柏林人把目光转向美国——他们的头号保护神。

3. 西方箭上弦，却引而不发。

西方整整三天按兵不动。

政治家们在权衡利弊。

8月13日，西方三国驻柏林城防司令急电报告本国政府，西柏林被突然封锁。但美军司令和美国外交官迟迟才接到指示，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只是说：“绝对不准发生无法控制的反应”。一位美国政界要人认为，“一般看来，西柏林没受到直接威胁，苏联人只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德国统治区域的秩序。他们虽然采用残暴手段，但是他们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制止无穷无尽向外逃亡的人流，这种外流使东区的经济和知识界有枯竭的危险。”英、法司令也被着重告知：不要造成麻烦。他们接到严格指示：绝对不能擅自行动，只有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协商后，才能采取行动。

此时在游艇上度周末的肯尼迪，不会担心有人来打扰他的宁静。美国总统最关心的是盟军在西柏林的直接权利是否受到直接损害，而情况似乎没有那么严重。就在不久前，莫斯科还传出消息，将尊重西方在柏林的权利。

这就难怪昂纳克胸有成竹。他在《我的经历》一书中回忆说：“一再有人问我，我们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行动可能冒一场大战的风险。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对于仅仅发生在我们领土上的行动，北约难以用军事侵略报复。我们的情报表明，没有北约中的头号国家美国参加，一次军事行动是不可想象的，而美国关心的是柏林西区现状保持不变，西方三大国留在柏林西区，确保柏林西区和联邦德

国之间的交通安全。所有这一切都未受我们戍边措施的影响。华沙条约国家尊重柏林西区作为一块特殊政治领土的地位，对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可以从1961年8月初华沙条约国党的第一书记会议通告中得知。我们方面不存在任何引起北约军事干涉的理由。”

不过，对于华约的这颗定心丸，西方总也是半信半疑。肯尼迪的心一直提在嗓子眼里，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会不会导致一次核危机？他甚至想，一场毁灭文明的战争已因为柏林迫在眉睫。那年夏季，美国总统一直困扰于此。8月初，肯尼迪对一个助手说，“为了重新控制局势，赫鲁晓夫肯定要在民主德国耍花招。”他又说：“如果赫鲁晓夫对西柏林搞什么名堂，我就可以促使盟国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他只在东柏林变花样，我就不能这样做了。”在8月13日以后的几天里，华盛顿一直猜想，苏联与他的东德盟友是否仅仅想控制外逃人流。有人认为，这“构不成向东区进军，从而挑起反击而冒战争风险的理由”。

西方显然把战争的风险估计过高了，然而西方也不肯示弱，虽然谨慎，却也强硬。

在西柏林被封锁24小时后，盟国的军事巡逻队在市内边界上出现。

40小时之后，盟军司令部向苏联驻军司令提出抗议。

过了72小时，8月17日，美英法三国政府向苏联政府递交抗议照会。

勃兰特的急电显然已放在肯尼迪案头。西柏林市长建议：第一，加强美国卫戍力量；第二，明确强调三国对西柏林负责；第三，明确提出德国问题不能认为解决了，尚需等待和平解决；第四，把柏林问题提交联合国。美国总统就此3次答复勃兰特：第一次托人转告说，几天内将派副总统约翰逊到柏林来；第二次答复说，他将向西柏林增派一个战斗队；第三次通过约翰逊转交一份正式的书面答复。

就在8月17日，美国政府下令本土113个国民警卫队和陆军后备队处于紧急戒备状态；海军扩充42艘战舰，原定退役的26800名海军官兵暂缓退役；空军扩充28000名官兵。

英国宣布，为加强其驻扎联邦德国的兵力，将建立一支配备坦克和大炮的战略预备师。

法国则决定，加强法国本土及其驻扎在联邦德国的陆、空军，下令已从阿尔及利亚抽调回国的一个陆军师在法国与联邦德国边界地区待命。

8月18日，联邦德国联邦议会举行紧急会议。总理阿登纳和西柏林市长发表声明，说"苏联别以为打了我们耳光后，我们还会笑容满面"；要求北约盟国采取必要措施来反击苏联。

8月19日，美国副总统约翰逊飞抵西柏林，检阅美军西柏林卫戍部队，他引用罗斯福总统1933年就职演说中的一句名言：我们唯一可以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以此向苏联示威。

8月20日，1500名美军、250辆军车沿公路从联邦德国开赴西柏林；34辆英国军车和坦克从联邦德国用火车运达西柏林。

西方迟到的反应是如此强烈，苏联静观10天，开始有所动作。8月23日，苏联政府向西方三国政府发出照会，通知说苏联打算关闭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空中走廊，以制止"复仇主义分子、极端分子、破坏分子和特务还在利用这些空中走廊"从事罪恶活动。

次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警告苏联和民主德国，称"干涉这些通道将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政府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8月31日，苏联恢复核试验；9月8—9日，华约成员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议，商讨加强华约各国的军备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宣布，即将派遣4万美军到欧洲，其中大部分将驻扎在联邦德国。英国和联邦德国也作出了关于增兵的决定。

对抗在不断升级。

就在东西方较劲儿的过程中，民主德国的柏林墙在一步步地加固完善。

4. 柏林墙大观

从8月13日白天起，民主德国开始对夜间匆匆拉起的铁丝网作适当加固。经过10天的紧张奋战，到8月23日，整个工程告一段落。

逃亡潮被遏止了。

然而铁丝网毕竟过于简陋，逃亡事件仍不时传进民主德国领导人的耳中。于是，一个修建一道永久性的坚固高墙的决策形成了。柏林墙的二期工程随即开始。

到1961年9月中旬，一道高3.5米，长3.5公里的水泥勾缝石头墙已破土而出。后因这种墙实在太费工费料，造价也实在太昂贵，而且还易于攀缘而一度停建。

从1963年起，民主德国开始在凡能施工的地段逐步建造光滑的水泥墙，并在其顶部加上水泥圆管，使人无法越墙而过。1964年起，又决定在一些重要地段建造一道内墙，两墙之间的100米宽的“无人地带”，其间有巡逻道、防汽车壕、防坦克路障，配有强光灯、电网、瞭望塔、警报系统、地雷、自动射击装置；在一些铁丝网地段还设置了警犬桩和装有一触即发信号的铁栅栏。荷枪实弹的边防人员一天24小时值岗，一旦有人越境，边防人员随时有权开枪射杀。

那个建立“无人区”的决定其实早在1961年8月22日就作出了。当时的决定称：1. 在边界两侧各划出100米宽的“无人地带”作为缓冲区，为安全起见，人们不得进入这一地带。2. 把过境站从13个减至6个，3. 原来可自由出入民主德国的西柏林市民今后需要办理专门签证手续，否则不得进入民主德国；为了方便起见，将在西柏林火车站开设两个专门办理签证手续的办事处。对于这一决定，西柏林市政府马上宣布禁止民主德国在西柏林开设这样的办事处。美

英法三国驻西柏林最高司令也斥责建立“无人地带”的命令是“厚颜无耻”的行为，并出动上千名军人，在坦克、装甲车和反坦克炮的陪伴下，紧挨着民主德国架设起来的铁丝网西侧来回巡逻。由于遇到强劲的反对，民主德国上述决定没有立即生效。

然而时隔三年，无人地带终于建了起来。

从1981年起，民主德国又沿柏林墙增设了20个瞭望台，将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墙再增高60厘米，达4.2米。此外，还增设了警犬警戒地段（每个地段长80—100米）、地堡、铁丝网和其他许多障碍物。除了飞鸟阳光，任何想自由逾越的尝试均属徒劳。

到1989年10月，经过28年修缮的柏林墙俨然成为一大景观。它全长165公里，高达3.5—4.2米，其中水泥墙114.5公里，铁丝网55公里（主要架设在以河流为边界的水面上）。沿柏林墙建筑了瞭望塔290个、地堡137个、警犬桩（警犬警戒地段）274个。此外，还有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壕和防坦克路障、123.5公里长的电网和巡逻道，以及布雷区和自动射击装置，等等。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柏林墙。

它绕过一个又一个街角，穿过一道又一道河流，曲曲折折，在德意志敞开的胸膛上，留下了一道道滴血的创口。

它被称为“乌布利希的长城”，在原民主德国领导人眼里，它是保卫社会主义、防止西方颠覆和破坏的护卫墙，是和平之墙。但在全世界面前，柏林墙的意义似乎更多的是德国和欧洲分裂的标志，东西方冷战的象征。

三、风雨二十八年

1. 绷紧的弦突然松动，大墙两边各舒一口气

仿佛在一夜之间，绷紧的弦松动了。1964 年 6 月，苏联彻底放弃了“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并与民主德国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承认“将把西柏林看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至此，从 1958 年 11 月开始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才真正成为过去。

几乎不可思议。

在此之前，紧张局势有增无减，几近战争边缘。柏林墙建立以后东西方的冲突一天天升级，然而在何种程度上才可能引发真正的“麻烦”呢？1961 年 10 月底，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试探一下虚实。当时总统驻柏林的私人代表卢修斯·克莱将军派美国公使阿伦·莱特纳闯一闯查理检查站，看看是否有权自由地出入东区。查理检查站是专为外国人出入东柏林设置的过境站。

莱特纳长驱直入。然而刚到过境口，民主德国边防哨便拦住了公使，坚持要他出示证件。

克莱将军立刻让坦克开到查理检查站，摆开阵势，作一次“小小的升级”。

几乎同时，苏联坦克出动，与美国坦克对峙。

1962 年初，这位克莱将军和西柏林市长勃兰特同坐一架美国专机从西柏林飞往不来梅，参加那里为海员举行的传统饯行，路上遇到苏联战斗机的麻烦。

其实这时的美国倒真的有心与苏联一块儿坐下来谈谈了。1962 年初，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美国总统的兄弟、司法部长罗伯特·

肯尼迪来到西柏林。那天，10万人集合在舍内贝格市政厅前，倾听这位司法部长的演说。罗伯特穿一件旧大衣，没有戴帽子，虽然冷得发抖，但说话却斩钉截铁。

仿佛是回应他的讲话，这时从东柏林方向飘来几个宣传气球。罗伯特当即举起手高喊："共产党让气球通过，但不让人通过！"但突然之间，这位司法部长降下调门。他把准备好的措词激烈咄咄逼人的讲话移搁到一边，扫视一下眼前的听众，接着说，把激情煽动起来对谁也没有好处，要通过谈判来改善柏林地位。

美国的试探似乎没有引起注意，抑或苏联方面压根儿就不信这一说。相反，这年7月，赫鲁晓夫又出新招，他建议，由挪威、丹麦或比利时、荷兰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联合国旗帜下驻扎西柏林，代替美英法三国占领军。8月，苏联宣布撤销驻柏林司令职位，作为结束四个战胜国对柏林联合占领的一个步骤。

恰在此时，碰上建墙一周年的日子。柏林墙西边都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墙的东边，则频频调集军队。

12月12日，赫鲁晓夫再次建议，主张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的占领军以联合国旗帜代替北约组织的旗帜，由联合国在西柏林承担国际义务和职权。1963年1月，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也呼应苏联领导人，提出相同的主张。

苏联态度的再次强硬着实使西方紧张了一阵。其实，勾心斗角的冷战，使政治家们忽略了多次缓和机会。赫鲁晓夫咬紧牙关之时，也是他寻求退路之日。1963年1月，他到东柏林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在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馆，这位首脑发出一个信息：准备与西柏林市长勃兰特会谈。

当勃兰特从苏联官员，从奥地利和瑞典的两位总领事那里明白无误地得知赫鲁晓夫这一提议时，他觉得机会来了，再不能拒绝会谈。勃兰特想起1959年，他曾拒绝了赫鲁晓夫同样的提议，也许是错失良机。这回该认真对待。于是，他向波恩请示。年迈的联邦总

理阿登纳含糊其词，他在电话中说："维利，你自己决定吧！这种会谈既无好处，也无害处。"勃兰特找盟军磋商，答复也不甚了了。他想给肯尼迪打电话，但美国国务院的代表却挡了驾。明确的意见也是有的，全德问题部长赖纳·巴泽尔在电话中反复强调反对这次会见。外交部也不赞成。

后来，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阿勃拉西莫夫告诉勃兰特，当他把西柏林市长的拒绝告诉他的首脑时，赫鲁晓夫完全迷惑不解：正提着裤子换衣服的领袖吃了一惊，差一点让裤子掉落地下。阿勃拉西莫夫补充说："这次错过了机会，因为赫鲁晓夫当时想给你（勃兰特）些什么。"

假如当时双方举行会谈，历史也许就该重写了。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事实是，勃兰特和西方拒绝了赫鲁晓夫。气氛再次紧张。最强有力的反弹，该是美国总统的西柏林之行。

1963 年 6 月 26 日，肯尼迪访问柏林。敞篷汽车穿过街道，两次在占领区边界停下来。美国总统看到查理检查站多加了一道警卫，在远处，有几个东柏林人犹犹豫豫地向他招手。肯尼迪登上木制的看台（这是西柏林政府为市民特制的），他想看看阿德隆饭店。然而，勃兰登堡门上悬挂着一块巨幅红布挡住了视线。肯尼迪忘不了柏林：二次大战前不久，他去伦敦探望在那里任驻英大使的父亲时，曾游览柏林，当时就下榻在阿德隆饭店。1945 年夏波茨坦会议期间，肯尼迪作为美国记者，目睹了一片废墟中的帝国首都。他先到市长办公室稍事休息，然后，在勃兰特和联邦总理阿登纳陪同下，来到市政厅前。在鲁道夫·维尔德广场——后改名为肯尼迪广场上，人声鼎沸。美国总统呼吁，被困扰的城市要发扬反抗精神。

对于肯尼迪的演说，连勃兰特市长也觉得不免锋芒太露，过于热情奔放，然而他仍然佩服这位年轻总统的谈吐高雅。

掌声雷动。要求妥协与让步的插话声被淹没了。

肯尼迪激情难抑，他用德语高喊："我是柏林人！"这是他在市长办公室休息时学会的一句德语。这句话弄得西柏林人激动不已，在他们眼里，这位昔日的敌人似乎已经谅解了德国。据说，约翰·肯尼迪曾把德国比作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每晚都要问她的丈夫："你也爱我吗？"但当她得到肯定的答复时，却又感到不满意，于是再次问道："你真的爱我吗？"然后又派侦探在他后面盯稍。

下午，美国总统赶赴柏林自由大学。在大学召集的会议上，他阐述了和平战略。他说，东西方接触有助于逐步消除紧张因素。德国问题只能在双方参加下得到解决。肯尼迪预言：历史演变的力量也将在东欧出现。

柏林之行使肯尼迪精疲力竭，但他却兴奋异常。他明白，绷紧的弦可以松动一下了，推行和平战略的时机也该到了。他说，美苏两国对抗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建立"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

而从对抗到缓和的转折点则是刚刚结束的美苏核对峙。肯尼迪的柏林之行只是在天平的一端再加一块砝码，再朝着赫鲁夫踹一脚。这场核对峙是由苏联首先发难的。1962 年，苏联准备在古巴安置战略性导弹，这引起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高度紧张。肯尼迪动员了军队，而且两次提醒柏林，围绕古巴的冲突弄不好会对柏林产生重大后果。然而赫鲁晓夫突然于 10 月 28 日上午致信肯尼迪，宣布准备撤出苏联导弹。东西方都松了一口气。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同时往深渊里看了一眼。

当然，东西方从对峙到缓和还有许多因素。不可忽视的是，1962—1964 年之际，苏联人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且不说 1962 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惨败，就说国内，苏联在 1963—1964 年的经济增长率大大下降，从前 10 年每年增长 6—10%下降到 3%弱。从此，苏联不再坚持原先对西柏林问题的一贯要求，对西方开始采取和解姿态。这就是柏林危机结束的原因。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苏美调整战略，在欧洲推行"缓和"政

策。从1970年3月开始，苏美英法四国就西柏林问题艰难谈判，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终于在1971年9月签订了四国柏林协定。苏联首次承认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的“权利和责任”，同意“维护和发展”西柏林与联邦德国的特殊关系，准许联邦德国政府在西柏林建立常设联络机关作为其派驻三国占领当局和西柏林市政府的代表。认可联邦德国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美英法三国除此之外则仍强调四国对整个柏林都有“权利和责任”。

从此，西柏林这块“飞地”归联邦德国代管。

不过，两个德国仍互不承认。几十年来，两德关系几乎成为东西方关系的风向标，而柏林问题，则是风向标上最敏感最突出的风球。随着柏林地位的“正常化”，两德关系也开始缓和。柏林墙也渐变为观光游览的名胜。而德意志民族面对冰冷的水泥墙，依然心潮汹涌。

2. 年年8·13，岁岁不宁日

就象两个德国分裂的同时伴随着统一的呼声一样，柏林墙建立的同时也引发了拆墙的怒吼，28年来声声泣血，不绝于耳。

就在建墙的第一个纪念日1962年8月13日，西柏林举行了游行示威。8月17日，东柏林建筑工人彼得·费希特尔以身试法，死在查理检查站，年仅18岁。费希特尔事件再次引了了西柏林大规模的自发的游行示威。人们空前激愤，青年人和大学生甚至议论起炸墙。

从那时起，直到推翻柏林墙，年年8·13，岁岁不宁日。

1987年8月13日，柏林墙又起事端，这是20余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一次。8月14日，新华社从柏林发回电讯，摘要如下：

> 昨天（8月13日）午夜，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约300人（青年人居多）聚集在市中心与西柏林交界的勃兰登堡门东侧不断高呼口号，要求拆除柏林墙。

民主德国宣传工具对上述事态未加报道。联邦德国电视台当晚播送了实况录相。

今年的8月13日是民主德国根据华约国家建议修建柏林墙26周年。每年这个时候，围绕柏林墙总要发生一些事端。但今天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发生这类事件却是1961年建墙以来第一次。

据西方报道，由于民主德国警方采取克制态度，事态没有扩大，也未发生冲突。只是为了驱散闹事群众警方暂时拘留了11人。

同一天午夜，逃亡在西柏林的数十名前民主德国公民在勃兰登堡门西侧柏林墙点火闹事，要求拆除柏林墙，被西柏林警方驱散。

……

8·13只是德国人要求拆墙愿望最为迫切最集中体现的日子，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同宗同胞从未忘却这一隔断天伦的大墙，勃兰登堡门东西两侧，永远是德国人相互怀念的地方。

就在1987年6月7日午夜，柏林墙又发生冲突。这天傍晚，勃兰登堡门西侧帝国国会大厦前的共和国广场上，西柏林人举行大型摇滚音乐会，听众多达6万。大墙东侧，民主德国公民在倾听，在欣赏，从那大型扩音器里，节奏强烈的摇滚乐声声入耳。而在他们的领地，这样的音乐是绝对禁止的。他们按捺不住了，陆陆续续地聚集到勃兰登堡门前的铁栅栏边。偷听禁乐的人越来越多。东柏林出动了警察，在离铁栅栏200米处迅速设立一道封锁线。午夜12时，聚集在封锁线前的青年已有3000人，突然，约有1000多名青年突破了封锁线。警察和便衣赶来增援，他们强令青年离开铁栅栏，遭到拒绝和诟骂。警方动用了警棍，一些青年也用石块、瓶子还击。大多数青年则四散逃开，边跑边喊："打倒猪猡和公牛（指警察）!""必须拆墙!""自由和民主万岁!"

在这次冲突中，大约有30多名青年被捕。

联邦德国第一电视台记者柯尼希举起摄像机，当场吃了警棍，被打倒在地。而后被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的人带走，过了一段时间才予释放。此事引起西德政府和电视台分别提出了抗议。

就这样，年年冲突，一次甚于一次，柏林墙在激愤中摇摇欲坠。

3. 大墙边的人间悲剧

自从1961年8月13日那个星期天起，多少伉俪隔着铁丝网对泣，多少母子不能团圆，多少有情人不能成眷属。悲莫悲兮生别离！

这场人祸在顷刻之间就使西柏林成了孤岛。在东西柏林之间，在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之间，从高架列车到地铁，从柏油马路到河流湖泊，一切交通阻断，即使在南北干线的地铁和公共汽车，驶入民主德国地界都不得不停车听候检查。西柏林，一个面积480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的城市，与联邦德国的联系只能借助于3条空中走廊，4条公路，4条铁路和3条水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林墙的建立等于默认了西柏林的地位，或者换句话说，是为日后西柏林地位"正常化"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如果说战后两个德国的分裂是冷战的结果，那么柏林墙的建立便是冷战升级到热战边缘时出现僵持局面的结果。通常一个物体达到最热点时，如果不爆炸就趋于稳定。以后柏林墙两边冷战秩序的建立就是证明。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许过于冷静与理智，过于超然与轻松。而对于东西德国、东西柏林人民来说，那是实实在在的民族分裂与骨肉离散。

最早的松动发生在1963年底。一位记者向西柏林市领导人暗示，民主德国方面有意会谈。市政厅马上通过那个与民主德国有贸易关系的颇为老练的商人席博德博士进一步摸清了民德的意图。西柏林猜测，对方大概希望通过探亲访友问题的处理而在贸易方面得到好处。一些迹象也表明，松动是可能的。比如对华沙条约各国之

间人员来往的限制放宽了。

这一年12月5日，西柏林市长勃兰特收到了亚历山大·阿布施的一封信，这位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在信中提出了一个有限度的、有限期的通行证建议。勃兰特立即行动。会谈于12月12日在东柏林开始，到12月17日，经过7次谈判，历时30多个小时的讨价还价，第一个通行证协定终于签字，第二天，即12月18日开始生效。期限规定至1月5日，共18天。

在隔离28个月之后，东西柏林的人们终于可以相会了。在那些日子里，手持通行证，来往于东西柏林之间探亲访友的，少说也有400万人。1964年，还设立了一个紧急家庭事务处，一年中有36000人申请在规定时间以外探视。每年一度的通行证协议一直持续到1966年才告终止。1972年四国柏林协定生效后，西柏林居民才再次获准去东柏林，甚至到民主德国各地探亲——而且不限于看亲戚，还可去旅游。

70年代以来，按照两德基础条约及其有关协议，双方往来人数猛增，且稳定在相当数量上。从1976—1978年，平均每年有300多万联邦德国公民、330万西柏林人到民主德国旅行或探亲访友，民主德国每年也准许近140万人申请到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探亲或旅行。1986年，有组织地去联邦德国参观游览（不包括探亲）的民主德国公民人数也从以前的6万猛增到50万，1987年达100万，1988年多达600万。“为解决与家人团聚有关的问题”，民主德国政府在1977年7月1日—1978年6月30日的一年中准许1.5万名公民迁居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不过，这些人主要是退休的老年人。在民主德国，有权出国的大多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或是头顶乌纱有权有势的，或是三亲四戚享有一官半职承蒙荫庇的，或是在西边有亲戚关系或政治上可靠，官方信得过的。

尽管交往在逐步恢复，但对于两德公民来说，仅有的7个过境站仍束缚着民族感情，梗阻着民族的血脉经络。对于希图从大墙的

这一边走到那一边的人们，那狭小的通道永远是希望、迷惘和心悸。而且，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还一步步地紧闭了通向两德统一的大门，甚至荒唐地提出了两个民族的观点。说什么，不仅德国已经分成两个国家，而且德意志民族也分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民族：联邦德国人属于“资本主义的德意志民族”，而“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正在民主德国发展”。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提法。

面对高墙的悲慨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淡化，相反，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人们对柏林墙的愤怒有增无减。年年都有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大墙。28年的岁月中发生过多少逃亡事件？柏林墙哪一天不目睹一幕幕伴随流血死亡的惊险的逃亡剧！

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民主德国公民为越过这堵人为的墙冒了多少风险，策划了多少种外逃方式。就一些报刊透露的资料看，逃亡招式令人眼花缭乱，无所不用其极。

柏林墙目睹的第一起逃亡发生在筑墙的第二天。1961年8月14日。联邦德国的一群议员从波恩赶来西柏林，在市长勃兰特陪同下到了勃兰登堡门。就在这一刻，勃兰特看到：一个小伙子沿着铁丝网向他们奔来，脸上的表情既紧张又激动。小伙子利用了这一刹那的机会，他明白，士兵和工人战斗队决不敢向联邦议院主席和西柏林市长开枪。

人们还从距离柏林墙很近的住宅窗口和楼顶上沿着绳索下滑而越过大墙，或身裹毛毯纵身跳向西侧。

利用汽车冲越边境，是很多逃亡者尝试的方式。曾经有14辆载重卡车一齐拼死冲过关口，也有人乘微型汽车从过境口冲出东柏林，还有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在即将越过关口的瞬间被炮火击中。

有人使用假证件或仿制苏联军官证件，伪装过关。有人自制热气球，载着一批人飞渡边界。

下水道、地道也被用来逃跑。有36名学生干了6个月，硬是挖

出一条长 145 米的地下通道，两夜之间有 57 人经此逃亡。

……

一起秘密组织乘机大发横财，专营“人口走私”，以每人 1.4 万到 6 万美元的要价负责偷越国境。

西柏林《每日镜报》1982 年 8 月 12 日报道，从 1961 年 8 月 13 日到 1982 年 6 月 30 日，共计 187868 名民主德国公民逃离（1977 年以前每年外逃人数仍高达 5000—6000 名），其中 2757 人为武装部队成员（大部分系边防部队），38260 人为所谓的“突破封锁者”。登记在册的因逃亡而丧生者计 180 人，其中 73 人死于 165 公里长的柏林墙边，107 人死于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边界上。而因犯“叛逃罪”被民主德国法院叛决监禁的达 5.5 万人，其中有 1.7 万人经联邦德国政府赎出。

1981 年，民主德国再次加固柏林墙。但这仍未杜绝逃亡。1988 年 8 月到 1989 年 3 月 10 日期间，还是发生了 6 起逃亡事件，有驾车的，有翻墙的，有乘气球的，他们或被击毙，或不幸坠地身亡。

1989 年，笔者在柏林自由大学进修，曾多次漫步于柏林墙边。每每来到帝国国会大厦附近的施普雷河畔时，总要驻足凝视。柏林墙在这里穿河而过，对岸一片无人区，则布满地雷与警犬桩，河边停着一艘小艇，一旦有人强渡，即可下河搜捕。对岸，边防警察荷枪实弹。

微风拂动着我的衣衫，我仿佛嗅到淡淡的火药味远远飘来。在我身边，紧靠柏林墙的一道铁栏杆上，挂着一块块一尺见方的墓碑，上面记载着逃亡者的名字与死亡时间。这是西柏林人为那些驾船偷渡而丧生的人立的。墓碑上总有花圈，也总有一朵朵白色的纸花，不绝的哀思象施普雷河一样绵绵流淌。

就在墓碑旁，还竖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书“gefahr”（危险）！然而这是警示西柏林人的，我想，西柏林人并不会去强渡，那么又警示谁呢？对岸的同胞明知危险仍冒死一渡。那么，这警示只是提

醒人们，此地不可久留，以防流弹，或许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分关怀？

1990年8月13日两德统一前夕，民主德国在柏林，也为越墙逃跑的死难者举行了树碑仪式。

在不断完善的柏林墙下，逃亡事件确实越来越少。然而，平静中孕育着雷暴，一场民主德国历史上最大的逃亡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4. 风声鹤唳：战后最大的逃亡潮

涌潮是怎样形成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或许可以说，一切是从问号开始的。

对于民主德国普通百姓来说，光是围绕去联邦德国与西柏林探亲旅行问题，不明白的事就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只有那些“旅行干部”才可以打着出差的幌子在东西部之间招摇往来？

为什么只有到了暮年领取养老金的光景才能获准去西边？

为什么只有那些在“对面”有亲属的公民，而且还有“生老病死”等理由，才有资格出去？

为什么出去一次不得超过一个月？

青年人问：既然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达，旅行中为什么拿不出必要的外汇？

还有许许多多人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隐瞒与西边的关系？这份隐痛埋得太深太久，一旦剖开就痛苦不堪。几十年来，他们断绝与西边亲友的往业，为的是划清界限，不影响自己谋职。因为东德人在就职之前，每人均需在履历表上填写有否西方关系。

为什么旅行问题在民主德国如此敏感？他们的旅行愿望又为什么如此强烈？昂纳克下野之后上台的埃贡·克伦茨在回忆录中说：“如果民主德国公民向往改善生活质量，旅行便是他们的头号愿望”。

而“每当西方政治家会谈后离开国务委员会大楼或党中央时，就有人拿着信件和请愿书站在人行道旁，几乎总是涉及到一些未解决了的出境问题”。

旅行与迁移自由成了导火索。

从1988年初开始，在东柏林和德累斯顿等大城市已出现数百名要求出境者的示威游行。据估计，到1988年9月初，至少有25万人以书面形式提出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而不断为这支申请大军补充新人员的预备队甚至达500—600万人之众，约占民主德国总人数的1/3。提出迁居申请的主要是青年人、医生、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科学家。

1988年，民主德国已进入多事之秋。

就在这一年10月，民主德国建国39周年的庆典几乎被申请出境的新浪潮所淹没。不得已，以部长会议主席斯多夫和内务部长兼警察总署署长迪克尔的名义，于12月14日发布了关于民主德国公民到国外旅游的新规定：从1989年1月1日起，民主德国公民在提出申请并经有关方面审批后即可去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旅游。

本来这个规定已经宽松了许多，但就在这个时候，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拆除了铁丝网和其他一切设施。人们把铁丝网当作纪念品一段段地出售。这一举措震惊了世界。原先，同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公民一样，民主德国公民也可以比较方便地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旅游、度假，而相比之下，去西方国家就控制较严。如今匈牙利首发其端，于是，顷刻之间，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借去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旅游之机，绕道奥地利前往联邦德国，从而形成战后最大的一次居民出走浪潮。

——1月至7月，上千名民主德国公民经匈奥边界出走西方国家，主要是去联邦德国。

——8月，民主德国公民驾驶的小汽车象洪流般涌向匈奥边界，坐火车和飞机到达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出高价请“黄牛”带领出境，

也有不少人被匈牙利边防哨抓获，并在旅行证件上盖章加注。然而他们并不灰心，留下来重新一试。到29日，匈牙利政府不得不为滞留布达佩斯的1500多民主德国公民建造第3个宿营地。与此同时，在联邦德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和驻捷克和斯洛伐克大使馆，寻求避难的民主德国公民也有500多人。8月8日，联邦德国驻民主德国代表处更因人员爆满而关闭。

——9月1日至11月9日，越来越多的民主德国"难民"涌向匈牙利。匈牙利政府不得不宣布，9月10日零点起，对民主德国公民开放通向奥地利的边界。而在民主德国国庆40周年前夕，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和华沙的大使馆里仍然爆满，每天有数百人进入使馆。对此，昂纳克坚定地说，不为出走者感到惋惜！只是由于国庆节临近，不能在全世界国宾面前出丑，所以采取了一项快速解决办法。9月29日，昂纳克动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昂纳克提出让滞留在联邦德国驻布拉格使馆内的公民乘火车经民主德国境内前往联邦德国。后来有人评价说，这仅仅制造了合法出境的假相。此举非但于事无补，反而惹出了更多麻烦：年轻人沿着铁路线纷纷趴车，10月4日，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的警察关闭了火车站，从而导致人警察与民众的冲突。

据联邦德国新闻媒介报道，从9月11日至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开放边界之日止，至少有11万民主德国公民经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出走西方国家。

至此，在民主德国建国40年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已有34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1989年12月12日，民主德国德意志通讯社这样报道。而1989年初，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也就是1600多万。

逃亡潮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个国家。

公民为什么出逃？

联邦德国民意研究所于1989年8月29日—9月11日在吉森和拉施塔特难民营作了调查，统计数字表明，出走西方的民主德国

公民一般较年轻，他们情绪乐观并受过良好教育。40 岁以下的占 77%，20 岁以下占 16%。该研究机构对 537 名出逃者的出逃原因的调查结果是：74%的人说没有言论自由，74%的人认为是旅行受限制，72%的人表示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69%的人认为对民主德国的前途缺乏信心，65%的人说是不愿受国家管束，56%的人认为供应太差，28%的人是要探亲，而 93%的人则认为民主德国的政治状况在后退，31%的人认为自己的专业才能发挥受到限制，92%的人认为联邦德国的生活水平高于民主德国。

由于民主德国公民能够借道邻国大量逃往西方，柏林墙已名存实亡了。

四、推倒柏林墙

1. 祸起萧墙

1989 年 10 月 18 日下午，东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大楼里气氛异常。还不到 14 点，中央全会预定的开会时间，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坐满了大会堂。埃里希·昂纳克走进大厅，所有的谈话刹那间停止，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人们有点发愣，谁也没有象往常那样起立，欢迎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在自己通常的位置上落坐，但随即他就站起来，他不想挨到 14 点了，他宣读了一份声明：

亲爱的同志们

经过慎重考虑，并根据政治局昨天讨论的结果，我作出如下决定：由于我的病情和刚动过手术，我的健康状况不再允许我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我们党和人民今天

以及未来提出的要求。所以，我请求中央委员会解除我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谨向中央委员会和人民议院推荐埃贡·克伦茨同志，他有能力，而且有决心，担负并胜任这一工作。……

说完，昂纳克坐下来。他神情恍惚，两眼发直。太意外了！事后他一直愤愤然：那个政治局会议，完全是个大花招，大阴谋。

头一天，即10月17日上午10点，政治局会议在党中央大楼举行。昂纳克一如既往，在桌首坐下，宣布开会，提出议事日程。这一天，除了在尼加拉瓜的大将海因茨·凯斯勒缺席以外，其他25位政治局成员——社会主义国家人数最多的政治局——都到齐了。昂纳克问："对议程还有什么建议？"话音未落，维利·斯多夫说话了，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声调不高也不低："是啊，我提议：第一项议程——解除埃里希·昂纳克的职务，选举埃贡·克伦茨当总书记。"

昂纳克闻此坦然自若。在上星期四10月12日的各专区第一书记会上，就有人说什么如果一位总书记能把工作交给一位更为年轻的人，这就是我们党史上的光辉范例。而马路上要求他下台的口号更多。他不在乎。他有足够的自信。再说，他早就提出过辞职了。近年来，政治局里的意见越来越难得一致，每每他说：老啦，身体不行啦，让年轻人来干吧。总有人劝：埃里希·昂纳克同志，还得你来干，人民需要你！

这次不同了，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连昂纳克最亲密的助手，党中央主管经济的京特·米塔格也抢着表态说："我同意。"接着还补充一句："早就该作这样的决定了。"米塔格落井下石，倒弄得其他政治局成员莫名其妙。

主持会议的斯多夫打断了昂纳克的沉思。斯多夫感谢昂纳克发表了这份声明。然后表决，只有一票反对。昂纳克的职务被解除了。埃贡·克伦茨当先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多夫客气地说："如果埃

里希·昂纳克觉得身体太虚弱，不能继续参加会议的话，请大家予以谅解。”

昂纳克站起来，他刚动过胆囊手术，看起来确实身体虚弱。他缓步走出大厅，这一回，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站了起来。掌声响起来，欢送这位77岁的老人。

老人感到痛心，他后来说："竟然大家都鼓掌，政治局里从没有过这种情况。"这位老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的监狱里度过了10年，面对盖世太保的审讯，从来威武不屈。作为最高首脑，他领导民主德国近20年。

昂纳克时代结束了。结束得如此匆忙。

几乎与势不可挡的出走浪潮相呼应，在民主德国国庆40周年庆典前后，各大城市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0月7日是国庆节，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为首席贵宾参加庆典，夫人赖莎陪同。他们头天上午10点30分飞抵柏林，车队穿过密密匝匝的欢迎队伍，下塌达尼德舍恩毫森宫官邸。一路上，"戈尔比一戈尔比"的呼声不绝。戈尔巴乔夫在官邸大厅里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成员。苏联领导人表示：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德国进行合乎时代的改革具有最好的条件。确实，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在苏联及东欧各国中名列首位。不过，戈尔巴乔夫警告说：过于迟缓，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

在随后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改革，介绍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与"政治新思维"，关照民主德国领导人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

昂纳克面对来参加庆典的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一如既往地介绍了民主德国的巨大成就，全党的团结一致，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与人民的信任和紧密联系等等。在他眼里，民主德国就是一个幸福岛，窗外风平浪静，绿树婆娑，阳光和煦。这样的地方，何需改

革呢？

电视把这一场面传送到千家万户。

人们惊异：昂纳克对现实视而不见。早在9月间，示威游行就已明显增加。9月18日，艺术家们发表一份声明，他们“为国内目前状况，为许多老同志的大量出走，为社会选择的信仰危机，为党政领导人让人难以忍受的无知状态而感到忧虑。党政领导人看轻了现有矛盾而在坚持一种僵硬路线。”这被视为抗议浪潮的“第一枪”。

然而抗议不仅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一些地方的工厂已出现罢工危机。

10月7日晚，柏林共和国宫举行国庆招待会。场外，一批青年人在游行示威，一路上加入的群众有六七千人。当局出动了警察，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数以千计的游行者被捕，游行队伍被驱散。事后政府发布的通告说，在冲突过程中，有106名警察受伤，游行示威者中有40人受伤。

同时，波茨坦、马格德堡、德累斯顿、卡尔·马克思城等地先后出现规模不等的群众游行示威。10月9日，莱比锡爆发7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其人数之众为民主德国历史上所罕见。事态在不断扩大、口号也不断升级，从要求“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迅速变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真正的多党制，举行“自由选举”。在所有的示威游行中，两个口号贯彻始终，那就是：“不要使用暴力！”“我们是人民！”

随之而来的冲击一个接一个，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许多党员退党了。作为执政党，该党原有230万党员。据西方报刊说，在1989年10月的上半个月，就有2万多名党员退党。而据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1990年2月25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又改称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居西1989年12月在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的说法，该党在短短时间内已有近80万名党员退党。

民主德国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为此，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

政治局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两天后，会议发表了一项政治局声明。声明中再次确认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取得了胜利，要坚决地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对工作中的缺点与问题，要同全体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智的对话，共同寻求新答案；对社会主义民主，按劳分配，改进新闻，改善供应，改进旅游等也多有承诺。声明还请广大群众体谅民主德国在特殊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要操之过急。

然而群众显然缺乏耐心。尽管昂纳克被迫下台，尽管克伦茨上台伊始就信誓旦旦“彻底改革”，并严厉批评前领导人严重错误，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走上街头的群众仍有增无减。11 月 4 日，东柏林 50 多万人大游行；11 月 6 日，莱比锡也有 50 多万人大游行。

压力巨大。11 月 7 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总理辞职；次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第十一届十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也宣布总辞职。此次全会同时选举产生新的政治局。党总书记克伦茨在报告中向全党全国人民再次承诺：民主德国要在世界开放的形势下革新社会主义，进行彻底改革。

然而，人们依然出逃，依然上街。其原因深究起来，自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主德国建国不久就全面照搬“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客观地讲，这一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它保证了战后政局的稳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体制有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特别是在建国后一二年内迅速实现战后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固守这一体制就显得不合时宜，其弊端便一一暴露。

第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专权愈演愈烈；党内民主遭到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形同虚设。在一些企业，工人不相信“企业大会能自由发表意见”，“谁也不清楚大会讨论什么问题，多

数人昏昏欲睡。”

谁提意见谁倒霉。连中学生也不放过。在民主德国建国 40 周年前夕，东柏林奥西耶茨基中学的几名学生向校领导提了一个问题：“在裁军与缓和的时代，每年举行国庆阅兵式是否仍有意义?”于是，4 名学生被开除学籍，一名被迫转校，另一名受留级处分。此事甚至连官方的人权委员会也看不下去而向国民教育部长、昂纳克夫人致信抗议，要求学校收回成命，但无济于事。

第二，滥用职权，腐败现象大肆蔓延。典型的例子或许可数“万德利茨症候群”了。万德利茨森林别墅座落在柏林城北的万德利茨小镇，离市中心约有半小时车程，归属法兰克福/奥得专区贝尔瑙县。一道一人多高长达五六公里的绿色围墙包裹着这个秘密小城。它由部长会议直接管辖，“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警卫团负责警卫，所有职工，包括面包师、司机、售货员、警卫员及服务人员等都是国家安全部成员。别墅由内外两个区组成，内区有 23 套房子，专供政治局及其家属居住，那里有游泳池、电影厅、医疗所、干部专用俱乐部、小卖部及国际水平的餐厅等。外区为服务单位、商店及幼儿园。小卖部里多为特供高级商品，很多是专从西方进口的，吃的用的应有尽有。据调查，政治局委员京特·米塔格一家平均每年在这里购买 10 台进口彩电；政治局委员兼人民议院主席辛德曼一家平均每年购买 20 万马克的物品，仅在 1989 年 10 个月里就买走 4 台彩电。辛德曼的儿子在这里为自己的汽车免费加油是“正常的事，因为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这座别墅建于 50 年代末，1960 年 5 月 31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通过一项秘密文件，规定政治局成员必须搬进万德利茨。

万德利茨特权阶层的所做所为，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 1989 年 10 月 7 日晚的国庆招待会上，青年小提琴手维希·古特勒在演出结束时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万德利茨的灯光还在亮着!”

第三，经济体制始终没有跳出“苏联模式”。历史上虽曾经过多

次改革，但一次也没能坚持下去。民主德国自7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经济困难，到1989年10月，经济增长率降为2%。尤其是市场供应紧张，居民有钱买不到东西。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居西在1989年12月17日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有过一段生动而不乏辛辣的概括，他说："40年后，我们倒是不费劲地得到了蔬菜市场，但人们常常高兴地进去，看一眼又出来了。即便是交叉上市的白菜与苹果，也是不充足的。"

在首都东柏林的大商店里，几乎看不到录像机和录像带，更别提高级组合音响、激光唱机和唱片了。笔者当时想在东柏林买一辆儿童玩耍的遥控汽车，寻遍全城未得。一个小男孩告诉说：我们国家没有。商店里虽有彩电，但价格高昂，且品种极少。小轿车造型差、噪音大、速度慢、耗油高，即便如此，买一辆小轿车，无论是卫星牌、瓦尔特堡牌，还是拉达牌，也需要等候10—12年方可得到。许多人没有这份耐心，只好多花3倍以上的钱光顾黑市，一辆新型拉达牌小轿车索价高达7万马克。

对于重压下的克伦茨来说，除了一再承诺彻底改革，还有什么绝招呢？

2. 埃贡·克伦茨开放边界。沙博夫斯基的一个疏忽，使历史事件提前了一天

1989年11月9日，与1961年8月13日一样，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这一天的柏林，细雨濛濛。凌晨5点天还不亮，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52岁的埃贡·克伦茨就早早地起床了。他只睡了3个小时，恶梦联翩，心潮难平。国内局势越来越糟。他一睁开眼，政治问题就一连串袭来。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克伦茨和其他政治局成员一样住在万德利茨。1989年11月，克

伦茨夫人才果断地在尼德舍恩豪森区马雅可夫斯基大街另找了一栋房子。民主德国电视台还报道了新居情况。克伦茨私下里深深地感激妻子的帮忙。

屋外空气清冷，正好醒醒脑子。克伦茨想，前天开始的十中全会一直争吵不休，在今天的马拉松会议之前，跑上五公里该是有益的。克伦茨多年来坚持晨练，他边跑边想着国家大事。然而这一天最大的事——开放柏林墙，此时却还没有出现在脑子里。

7点45分，克伦茨走进位于党中央大楼二层的办公室。总书记先翻阅当天的报纸，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头版，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致民主德国人民的呼吁书赫然在目。克伦茨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听她读过这份呼吁书：

> 我们大家深感不安。我们看到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我们国家。我们知道，一直延续到最近几天的错误政策，加强了他们对革新这个社会的不信任。我们明白，面对群众运动，言语是软弱无力的，但我们除了言语之外没有其他手段。现在还在出走的人们，减弱了我们的希望。我们请求你们，留在你们的家乡，留在我们这里！我们所能允诺你们的，是一种并非轻松，然而有益和有趣的生活；并非迅速富裕，而是共同参与巨大的变革。我们愿意为民主化、自由选举、司法安全、迁移自由作出保证。不能不看到，数十年之久的扭曲在几周内迸发出来，我们刚刚处在我们国家根本变化的开始。请你们帮助我们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它保留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幻想。如果你们能同我们一起防止民主社会主义重新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不是梦想。我们需要你们。相信你们自己，相信愿意留在这里的我们。

女作家情意真挚，言词恳切。许多人在呼吁书上签字。克伦茨看到，这些签名中，有不少人曾被监禁，曾被驱逐出境。而此时，他们却杜鹃泣血般地呼唤，呼唤自己的同胞留在自己的国家。

克伦茨接着阅读文件，阅读来信。来信中的不满主要针对新旅行法草案，这种不满广布各个阶层。其实，这份草案如在6周前公布，人们不知会有多惊喜，但这些日子里，新事迭出，人们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大家不满：旅行法草案中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批准？一位公民在来信中直接了当地说："我就想凭着身份证就能出境旅行，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乐意。"

又是柏林墙！克伦茨从沉思中惊醒，他看看表，已是9时30分。他得赶紧去参加中央全会，他要请斯多夫修改旅行法，加快出台。此时，一个清晰的思路才开始跃入脑海：推倒柏林墙。

下午3时过后，政府首脑斯多夫递给克伦茨一份新的旅行条例草案。总书记觉得这份文件非同寻常，它包含着一部分世界政治。这样重要的东西不应该只让政治局和政府作出决议，有必要与党中央磋商。于是，克伦茨绕开正在举行的中央全会的议程，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宣读了条例全文：

1.1988年11月30日关于民主德国公民出国旅行条例在新旅行法生效之前不再施行。

2.下列关于出国旅行和从民主德国移居出境的暂行过渡规定立即生效：

a）申请私人出国旅行不需要陈述条件（旅行理由和亲属关系）。应在短时间内予以批准，只是因特别例外的情况才不予批准。

b）民主德国县警察局主管护照和申报的部门奉命立即发放移居出境签证，不需要陈述移居出境的条件。也仍然可以向内务部门提出移居出境的申请。

c）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移居出境。

d）取消民主德国驻外机构临时发放有关准许以及凭民主德国身份证经第三国移居出国的做法。

3. 所附关于暂行过渡规定的新闻公告于11月10日公布。

文化部长霍夫曼建议将“暂行”二字删去，免得人心惶惶，再生压力。中央全会一致赞同这一条例。

中央全会的辩论还在继续，对于“革新的步骤”，大家各有高招，一个人的发言很快被另一个打断，听起来一片呼喊。克伦茨突然问：“记录员还听得清楚吗？”

就在这时，柏林专区第一书记京特·沙博夫斯基走过来，向克伦茨请假。他说要去参加18时举行的国际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央全会的进展情况。沙博夫斯基此时还负责联络新闻媒介。临走，他请示克伦茨，能否向新闻媒介谈及旅行新规定。克伦茨答：“一定要说，这是世界新闻！”

沙博夫斯基点点头，立即赶去莫伦大街。国际新闻中心里，一大群记者正等着他。19点差几分，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这时，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的一位记者试探地问起新的旅行规定，沙博夫斯基笑笑说：“我刚获悉，部长会议已经决定……”，他按正式的新闻公告的措词回答。当有人问，什么时候开放边界？这位官员说：“假如我的消息正确，据我所知是立即。”

话音落地，全场发楞。大家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记者们万没想到最后爆出个大新闻。19时刚过，头号新闻就传遍了世界。历史在这里又匆匆地早走了一天。

克伦茨说：“世界获悉了本应第二天才知道的事情。”“11月9日倒偶然成了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日子。”

当晚8时，民主德国政府发言人迈尔在电视台宣布了部长会议批准的旅行新规定。一时间，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揣着一颗将信将疑的心，东柏林的男女公民还是麻利地穿上大衣，披上围巾，甚至没忘了带上几瓶香槟，各自来到就近的过境站。果然，凭着身

份证出去了，又回来了。一个青年工人揉揉眼睛，莫不是在梦中？他犹豫了一下，拿着身份证，再次来到过境口，这一回，连身份证都不用了。拥护不堪的人流，显然难为了警察，他们已无法执行公务。安全部长米尔克一跺脚认可了：无法查验证件了。

一切都太匆忙。在波恩霍姆过境站，晚上9时就已聚集了几百人。人们高呼：把门打开，我们要过去！然而，边防站也是刚刚从电视中得知边界开放的消息。他们不知所措。克伦茨又是一阵紧张，经与米尔克商量，下令各边境通道统统打开。到了这种地步，早一天晚一天已无关紧要。波恩霍姆过境站在夜间12时打开了大门，而肖泽过境站则于凌晨4时才放行。

一清早，在波恩霍姆过境站前，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车流滚滚，人们三四人一排，队伍以1分钟两米的速度加长。边防军、警察维持秩序，疏通车辆，一切都井然有序。

一位年轻的母亲说：去西边看看，得马上回家。两个孩子还在家睡觉呢。

一位身着风衣的中年妇女走在西柏林一侧的伯泽桥上，她声泪俱下："就是过来看看，28年了，终于有了这种机会！"

一位中年男子刚从西柏林返回，他说："好极了！我刚刚过去在那边看了看我的哥哥，希望以后就这样。"

一群布景美术职业学校的学生刚利用星期天没课的日子去西柏林，他们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去柏林墙的那一边旅行。16岁的赞特在回答塔斯社记者的问题时说："想利用这个机会到那边去走一走，亲眼看看商店的橱窗，看看资本主义世界的邻居是怎样生活的。"

西柏林人同样情绪激动，表达得也许更淋漓尽致。10月9日夜间，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人将"6月17日大街"的路牌改写成"11月9日大街"。在库菲斯滕达姆大街和勃兰登堡门的墙上，有人在跳舞。在跨越东西柏林的伯泽桥西侧，近百名西柏林学生组成了两道人墙，夹道欢迎来自东柏林的同胞，向他们献上一束束鲜花。在

行人出口处，更是聚集着大群的西柏林人，他们都在急切的等待亲友的到来。一对老人不时翘起脚尖，向不尽的人流张望。

此时，在各个过境站，东西柏林的同胞相互拥抱、亲吻，欢呼声和哭泣声响成一片……。

此时，两德乃至全世界的新闻高者都已聚集到各个过境站口，争相拍摄这一民族团聚的场面，记录这一历史性事件。

这一天，数十万名民主德国公民涌向西柏林和联邦德国。我们从西德电视上看到，在前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公路上，民主德国的汽车络绎不绝，有的高速公路上车队长达四五十公里。来往两德的公共汽车和火车加快速度，增加班次，西柏林所有的旅游车和备用车辆尽数投入使用。

11 月 11 日是开放边界的第三天，在从早上 7 点到下午 3 点的 8 个小时内，共有 206645 个民主德国公民去了西德，其中 28666 人宣布移居西德。而去西柏林的更多达 50 万。这一天，民主德国方面在柏林墙上新开了三上通道。从中午起，关闭了 28 年的雅诺维茨布吕肯地铁站开放，以减少市中心几个过境站的压力。

11 月 12 日早上 8 点，位于勃兰登堡门南侧波茨坦广场附近新开的过境通道也交付使用。至 11 月 25 日，通往西德与西柏林的边境站已达 94 个。

11 月 13 日，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宣布：从 11 月 13 日起，新的旅行规定也适用于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他们可以随意出国旅游。但对掌握机密的人员作了限制。

据民主德国电台广播，在边界开放的最初 10 天里，前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探亲访友、参观游览的民主德国公民就达 1000 多万，几乎占了民德总人口的 2/3。民主德国内务部公布的数字说，警察局到 19 日为止已签发了 1000 多万个私人旅游证，并批准了近 2 万份长期移居国外的申请。

从东到西，人流滚滚。

闸门大开，郁结的亲情如洪水奔泻。

在那些日子里，笔者看到：即便在匆忙的边界开放声中，在汹涌的情绪冲击下，德意志人仍然保证了秩序与安全。在雅诺维茨桥和罗森塔尔广场的地铁站，站长手持民主德国的圆牌，向开往西柏林的车辆发出了信号。头戴红帽子的车站人员微笑着，熟练自如地报着各站站名："开往帕拉泽苏斯巴特……"，"开往莱内大街……"。好像两个柏林的地铁交通从未中断似的，一切都那么自然。克伦茨后来惊叹：就连轰动的事情也能很快地融入日常的潜意识！

笔者还看到：从西柏林回来的民德公民，无论男女，人人手里都提着花花绿绿的精制塑料袋，里面装满各种物品。也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去西柏林就先抓几个空塑料袋。这在东边也是稀罕物。而在银行、储蓄所、邮局门口，长蛇阵似的队伍成了西柏林的特有景观。人们冒着瑟瑟寒风，在这里领取欢迎费。西德和西柏林官方曾有每年给每个到那里去的民主德国公民提供100西德马克"见面礼"的规定。民主德国公民只要过了边界，凭护照或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为此，银行、储蓄所、邮局、商店都加班加点。

在那些天里，西柏林街道人挤人，人撞人，酒吧、电影院里也塞满了人。在火车站，笔者曾问一个喝得微醉的东德汉子，为什么不用有限的钱买点东西回去，让老婆孩子高兴。他说：不管他，先享受一天！确实，西柏林人表示了最大的热情，在商店里，摆满了免费的各种饮料和食品。这对于民德公民来说，也实在是大开眼界。

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和与联邦德国的边界，在世界各国引起巨大反响。

11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谈话，说开放边界是"戏剧性事件"；并对民主德国出乎意料地开放边界表示欢迎；贝克国务卿则说，这一消息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积极的和重要的发展"。

同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开放边界是"令人高兴的事件"。

11 月 11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赞民主德国取消旅游限制的决定是朝着进一步获得自由方向迈出的一步。英国《卫报》说：粉碎柏林墙明显意味着超级大国在欧洲冷战的结束。

同一天，奥地利联邦总理弗拉尼茨基说，在柏林发生的事情是"欧洲政治历史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意大利《团结报》认为，在德国舞台上关键的问题是民主德国的民主化，民主化将会消除欧洲的边界"长城"。

苏联《真理报》11 日发表社论，认为"东德政府的决定是一个勇敢的和明智的政治步骤，从而证明彻底打破了旧的教条"。这一天，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东德领导人作出的决定"。

也是在 11 月 11 日，捷克和斯洛伐克《青年阵线报》和《匈牙利新闻》都发表社论，欢迎民主德国开放边界的决定。《青年阵线报》说："这堵墙不再是自由通行的障碍……它开始使我们的大陆，使东方和西方的人们意识到，在多年不相往来之后应该学会共处"。《匈牙利新闻》乐观地预言："既然柏林墙已失去作用，欧洲和解的进程可能加快。"南斯拉夫国家通讯社也认为，这是"朝着清除欧洲集团障碍迈出的积极一步"，"为改革欧洲大陆战后地理政治形势创造了机会"。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可以说是一个最敏锐最果断的政治家，他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以"统一总理"而闻名于世。16 日，他在联邦议院发表的政府声明中说："1989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凌晨开始，被分裂的德国国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柏林这座拥有伟大人民的城市将向全世界表明，它是全体德国人的城市。柏林市的男女公民以令我们大家非常激动的方式宣告，他们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城市里。"

东西柏林真正合二为一的日子确实不远了。然而此时，在柏林人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柏林墙仍然存在，过去的几天里只是多开了几个"口子"。尤其是，大柏林的象征——勃兰登堡门依然紧闭。

人们呼唤着：打开勃兰登堡门。

3. 打开勃兰登堡门

12 月 22 日，我起了个早，又是乘公共汽车，又是赶地铁，从自由大学到勃兰登堡门足足用了两个小时。车厢里处处爆满，这在柏林实在是空前绝后。仗着年轻力壮，还有在北京挤车多年的经验，才算上了车。

上午 10 时，勃兰登堡门前已是人山人海。有的人身背大包小包，香槟、啤酒应有尽有，只等那一刻到来；有人在兴奋地议论，青年人则愤怒地高呼：柏林墙滚开！墙边挂着一块白色横幅颇引人注目，上面好象是一首打油诗，一声无可奈何的浩叹：

墙在人就走，
墙塌国就垮。
呵，沉重的墙，
可怜的民主德国。

昨天，21 日夜间，人们从电视和广播中得知，民主德国将于今天下千 3 时打开勃兰登堡门。消息传出，整个柏林沸腾了，整个德国沸腾了，整个世界竖起了耳朵，睁大了双眼。德国人夜不能寐，他们深知：打开勃兰登堡门就意味着柏林墙将彻底消失，被拦腰截断，被肢解的东西柏林将重新成为一个整体。而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被人为地分裂了 40 多年的两个德国将从此走向统一。

我匆匆登上“瞭望台”。只见西柏林、联邦德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早已占据了有利地形，升降机、吊车各就各位，摄像机随时准备开拍，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也拉开了架式。紧靠墙边停放着一溜儿警车。西柏林警察列队警戒，未雨绸缪，以防不测。而在墙上，则站着一排民主德国边防军士兵，他们手持冲锋枪，脸色紧张，但看起来却十分和气。几个当官模样的不时地对着报话机联络着什么。东边，大型推土机和吊车发出隆隆的响声，等着直冲钢筋水泥墙。

勃兰登堡门，这个大柏林的象征，今天将畅通无阻。这座欧洲著名的建筑建于1789～1793年，200年里历尽沧桑，它曾目睹二次大战的狼烟从这里燃起，也曾眼瞅着第三帝国在此宣告灭亡。当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修建勃兰登堡门使柏林蜚声世界。它按照古希腊雅典卫城城门的式样建造，高达20多米，前后各6根陶立式圆柱修长匀称，5个大门比例和谐。城门上，铜铸的维多利亚女神乘坐驷马战车，神彩飞扬。整个建筑庄严宏伟，富丽堂皇。当年把勃兰登堡门建在市中心，真正是独具匠心。以门为中心，东西就是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西面是夏洛登堡大街（后改为6·17大街）。周围为柯尼希广场、原帝国国会大厦、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普鲁士王宫、波茨坦广场、德皇威廉一世纪念教堂和动物园等所环抱。众星捧月，托出一个德国的标志。

瞭望台上挤满了西柏林居民。离开门仪式还有个把小时。前几天报纸上还报道说，一位12岁的小女孩梅拉尼希望留下柏林墙，她说："我觉得柏林墙看上去很美。"

看我这个外国人东张西望，旁边的一对老夫妇谈兴大发。老头一开口就抑止不住激动。28年来，他们夫妇几乎每星期一次来这里登台眺望，回忆往事。筑墙以前，他与所有德国人一样自由地出入勃兰登堡门，当年这里繁华热闹，对对情侣来此散步漫游，而他们就是其中的一对。后来，这里成了无人地带，多少骨肉离散，多少人冒死越墙……。说着说着，老人热泪纵横，紧紧抓住了我的手。我再次为德意志民族内心的创痛所震憾。

下午两时许，突然降下一阵大雨，仿佛要洗清旧日的恩怨，还柏林一个亮丽清晰的勃兰登堡门。过了不久，人群突然涌动起来，接着欢呼声、口哨声、香槟开盖的"呯呯"声响成一片。我放眼望去，联邦总理科尔和西柏林市长蒙佩尔以及总理随从官员正向柏林墙边走去。瞬间，一大块钢筋水泥墙板被吊起来，科尔走过柏林墙，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踏进民主德国首都的德国总理。新上任的民主德

国部长会议主席汉斯·莫德罗迎面走来，身后是东柏林市长克拉克及其他政要。

莫德罗走路样子很特别，左右摇晃，有人说象一位海员，有人说象一位长跑运动员。确实，这位62岁的总理如今动作敏捷得象中年人，这应该是得益于每个周末的8公里长跑和每周两次游泳。莫德罗原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专区党委书记，在克伦茨下台后，被当作希望之星出任总理。他在台上的时间恰好比克伦茨多一倍，刚刚100天，被称为百日总理。几乎从上任第一天起，总理办公厅就被"现在就开放勃兰登堡门"的电话和信件所困扰。更有甚者，有人公然声称计划在附近组织群众集会，好为工兵部队冲击大门加油助威。但莫德罗很沉得住气，他说，东西德国、东西柏林要谈判，条件成熟才能开放。

先是与西柏林市长蒙佩尔在约翰内斯霍夫宾馆会晤，就开放勃兰登堡门问题交换意见。接着是与科尔在德累斯顿会晤。柏林与波恩反复磋商，才确定了日期，4位政要都讲话，一人两分钟。

此时，4位首脑见面了，他们相互问候。莫德罗与科尔手拉手走过勃兰登堡门。

第一个讲话的是莫德罗。他穿着湿漉漉的皮鞋，到处摸讲话稿。原来稿子不在西装兜里，而放在了大衣口袋里。他刚才坐着黑色雪铁龙专车，好不容易才穿过水泄不通的人墙，越过警察设置的防护栏杆，来到勃兰登堡门前。莫德罗站在讲台上，他拢了拢略显稀疏的白发，对着麦克风讲：柏林墙本应有益于人民，到头来却给人民造成了不少苦难。今天，勃兰登堡门的开放，是正处于改革时期的民主德国决心参与建设欧洲和平大厦的标志。勃兰登堡门必须成为和平之门，决不能成为战争之门。

掌声四起，一阵阵滚过勃兰登堡门。接着，科尔、克拉克和蒙佩尔先后讲话。科尔讲话基调平和，他明白，在两德关系问题上应保持耐心、理智与分寸。科尔表示，两个德国决心争取和平与自由。

说完，他把一只和平鸽送上蓝天。顿时，几百个青年跃上柏林墙，他们放开嗓门欢呼，他们举起双手鼓掌；在菩提树下大街与夏洛登堡大街上，两个德国和柏林市的旗帜交相挥动，人们载歌载舞。

庆祝仪式约举行了半小时。据后来报道，这一天共有20多万人汇集这里，许多人远道而来，他们连夜起程，为了与历史共享这一难忘的时刻。

4. 拆毁柏林墙。这水泥块值多少钱？
尽管东德政府说：这是非卖品

勃兰登堡门开放以后，拆毁柏林墙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尽管莫德罗一再表示，"目前我们根本不考虑拆墙"，拆墙"只会引起混乱"，但事实上，从边界开放的第二天起，柏林墙的拆毁就已开始了。

还是西柏林人先动手。11月11日星期六上午，一群西柏林青年来到勃兰登堡门附近，他们先用气锤在水泥墙上打出一道10厘米深的裂缝，然后把铁链固定在钳入的钢柱上，连结几辆吉普车来拉动墙板。那几天里，西柏林人甚至开来了掘土机，锤子的敲击声更是一天24小时在空中回荡。一时间，这道举世闻名的墙体千疮百孔。西柏林市政府不得不动用大批警察来维持秩序。

后来，东柏林青年也开始动手拆除大墙。他们从过境通道着手，用一切可以到手的工具：洋镐、铁锹、凿子……直到炸药，将厚厚的墙体捅开一个个大窟窿，人们就从这些洞里跑进跑出。最初，边防警察曾用高压水枪喷射，没几天，也就听之任之了。

很快地，破碎的墙体就被挖掘出了原先不曾料到的价值与意义。不少青年站在大墙上吁请围观的人们认购柏林墙。更多的人则用锤子凿子将崩裂的大预制体敲击成一个个小块，现敲现卖。而一些涂有色块的墙体，显然卖得快些，价钱也高。在11月9日以后的日子里，柏林墙东西墙体上也被涂上了各种标语口号和漫画，杂色斑驳，

灰色墙体面目全非。而在西面墙体上，28 年间早不知有多少人用多少种民族文字和图画表达描绘自己的激愤。从西柏林看，100 多公里长，3.5—4.2 米高的墙面成了一道宽宽的彩带。在很多年里，这道墙成了旅游观光的名胜，而墙上五彩的文字与图画，又未始不是最令观光客着迷的景观。如今，这五彩的碎块，政治家们作为礼物相赠；收藏家与博物馆贵为文物珍藏；街头小贩商号老板则以纪念品出售。在勃兰登堡门前，在这块昔日被大墙阻隔开的空地上，因此兴起了一个奇特的“自由市场”。在这个自由市场上，商贩们出售的商品多数与柏林墙有关。即有从墙体直接凿下的原始的水泥块，也有用带颜料的墙块制作的各式工艺品，诸如别针、耳环等等。原始的水泥块按体积大小分别标价出售，如一块拳头大的水泥疙瘩可卖 5—10 西德马克。更有精于赚钱的角色专门出租锤子、凿子，短短几分钟，租金便高达 5 个西德马克。不过，几分钟时间已足够那些观光游游者摆个样子，摄影留念的了。这个行当，对于众多的游客自然是求之不得、别具情趣的项目。

柏林墙同时也引来了世界各地的“纪念品销售商”。请看世界各国通讯社的报道：

[法新社西柏林 11 月 17 日电]：柏林墙的开放引来了大批“纪念品销售商”，他们想把柏林墙的碎块变成西德马克和美元。

11 月 16 日，57 岁的美国人用 450 马克从“商人”手里买下一块 1.5 米长的柏林墙水泥块，“商人”是西柏林一所中学的几个学生。

[法新社汉堡 11 月 19 日电]：美国航空公司说，10 吨柏林墙碎块 11 月 19 日从汉堡经纽约空运给芝加哥的收藏家。

这些碎块分装在 19 个箱子里，用卡车从柏林秘密运到汉堡机场，装上一架波音 767 飞机。

[路透社华盛顿 12 月 8 日电]：克伦茨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开放柏林墙的决定将会使大西洋彼岸的资本家们在圣诞节期间赚得千百万美元。

从11月中旬以来，曾象征铁幕的50多吨混凝土被一些美国企业家买下来，随后弄成十万件小纪念品。

各大商店的阵列架上已摆满了一个个小布袋，里面装着柏林墙的碎块。每件都有检验证；并用一个硬纸盒包装。这将作为圣诞节的礼物，每份售价10美元。

[路透社洛杉矶11月13日电]：一位经营硬币的美国商人愿意出5000万美元买下柏林墙，预计这项投资将使他牟取4—5亿美元暴利。这位名叫巴里·斯图普勒的商人说："我将把柏林墙破成几百万个碎块，然后向世界各地销售"。

[法新社日内瓦11月14日电]：日内瓦一家小拍卖行宣布，它想拍卖由艺术家加工成艺术品的柏林墙碎块。

民主德国驻伯尔尼商务处干脆说，柏林墙是非卖品。

就在一片拆卖柏林墙的吆喝声中，在德国人的欢呼与历史的沉思中，走来了90年代，一个更需要理性与理性觉醒的时代。1990年5月31日，民主德国政府发言人宣布，从7月2日起，所有存在于边境通道上的障碍物都将消除掉。民主德国政府同时希望"西边无偿帮助拆除有关地段的柏林墙"。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拆除柏林墙的二期工程。东西柏林间隔断28年的街道终于重新连接。在两街的接缝里，人们不也同样看见了历史的曲折与历史的情义么？

一个完整的柏林又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它再次成为德国的首都，而残存的柏林墙该是一座永久的纪念碑。

尾　　声

埃里希·昂纳克已经第13次站在法庭上了。他满头白发，病入膏肓。柏林地方法院指控他与5名助手在"柏林墙和两德边界枪击

事件”中犯有杀人罪。指控材料长达800页，共涉及49桩命案和25起企图杀人案。

这是一场90年代最轰动、也最富争议的政治审判案。有的德国报刊甚至认为可与二战后对纳粹战犯进行的纽伦堡审判相比。审判从1992年11月12日拉开帷幕。

这一天，柏林阴冷阴冷的，莫阿比特刑事法庭700号审判厅看上去那么狭小。仅有的65个旁听位子早已座无虚席。为争取一个座位，人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在这个古旧的大厦前排队数小时之久。门外，各国记者已集聚300余名，各种镜头和几百双眼睛急切地张望着。上午9时30分审判开始。但是，17分钟后，审讯被迫中断。因为同案的斯多夫心脏病发作，不能到庭。审判推迟到16日。这次审判持续近两小时。在审讯1个多小时后，昂纳克称身体不适。医生查验证明，昂纳克血压升高，心律不齐。

法官问：“昂纳克先生，你身体怎样，还能继续下去吗？”

“不，再也不行了。”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问题你都听明白了吗？”

“差不多。”

这次审讯又告中断。

后来的几次审判不是由于前民主德国安全部长，85岁的米尔克心脏病发作，就是因为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73岁的阿尔希特耳聋无法对话而夭折。

1992年底，昂纳克病情恶化。一份医学检查报告说，昂纳克肝部的恶性肿瘤直径已达11厘米。医生认为，昂氏的肝癌细胞已扩散，危及肾脏，生命也许只能维持3—6个月。而他的律师齐格勒早在1992年7月20日昂纳克被正式逮捕时就向法院提出，鉴于被告病重，请取消逮捕令，但未获准。

审计一波三折，十分棘手。舆论纷纭，莫衷一是。

看法之一：怀疑昂纳克案的立案基础，认为法律依据难以确定。

在枪击事件发生的年代，民主德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按民德法律，昂纳克等人根本无罪。

看法之二：用现在的德国法律条文来权衡另外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过去在宪法赋予的权力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有悖法理。

看法之三：昂纳克犯有“刑事罪”。应先把民主德国判为“非正义国家”，然后再象当年审判纳粹战犯那样，根据另一套法律来审判。

看法之四：审判昂纳克是为了“寻找替罪羊”，因为柏林墙边的开枪杀人事件，首先是冷战的产物。

看法之五：坚持审讯一个患晚期肝癌、濒临死亡的老人，有失人道。原民主德国 2/3 居民认为，应该停止审判。

昂纳克本人在 12 月 3 日的第 6 次出庭中，按法庭规定作了一小时辩护发言。他说，对他的审判是一场“可笑的政治闹剧”。他表示，他将对 1971 年 5 月以来未经批准越界而又在使用射击武器规定的条件下造成死亡的那些人“承担主要政治责任”。但是，“我本人没有杀害任何人”，所以柏林司法当局“无权对我行使国家任务提起诉讼。”昂纳克指出，柏林建墙是北约和华约对抗的结果，是华约 1961 年 8 月 5 日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因此，在建墙问题上，“不能仅由民主德国负责”，而他，“既不承担法律责任，也不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如应判罪，首先应去找苏联和华约。

昂氏口若悬河，一小时竟无一次停顿。他肯定不会忘记，那个夏天，赫鲁晓夫怎样下令筑墙。事实上，赫鲁晓夫早年间已对波恩驻莫斯科大使汉斯·克罗尔坦率地说，虽然乌布利希对他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不屑于把乌布利希当作挡箭牌。赫鲁晓夫晃晃大脑袋，“他太苗条，挡不住我”。

1 月 5 日，昂纳克审判案的首席法官被解职，理由是“有失公正”。这或许是此案的一大转折。在 1 月 13 日的第 13 次出庭后，下午 3 时 02 分，昂纳克获得自由，离开了莫阿比特监狱。

柏林地方法院的两个审判庭宣布撤销对昂纳克的两个逮捕令后

4 小时，老人在警察保护下，乘专车直驶柏林特格尔机场。14 日，飞抵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13 天后，1 月 26 日晚，柏林地方法院决定，于 2 月 8 日 9 时 30 分开始，继续审讯昂纳克。

2 月 4 日，新华社报道，德国法院终止审讯昂纳克。

沸沸扬扬的昂纳克审判案，终于不了了之。

然而对于德国，重要的不仅是清理历史，而且要警示后生小辈。

就在昂纳克出走智利之时，柏林墙拆除三年之后，柏林又建柏林墙。

当然，这一回是纪念性的。因为留下的一小段仅仅是墙而已，岗亭、铁丝网、“死亡地带”皆荡然无存。早在两德统一之时，德国政府就有意再现一堵象征性的柏林墙，纪念世界现代史上这一重大事件。当时这一动议遭到市民的激烈反对。心灵的创痛太深，大家不愿再见到大墙。

时隔三年，几经周折，政府与市民达成谅解。德国历史博物馆承担了新柏林墙的设计，图纸获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批准。

新柏林墙长 70 米，岗亭、铁丝网、“死亡地带”……一切均恢复原貌。1993 年 8 月 13 日建墙 32 周年的纪念日那一天，新柏林墙向世界开放。

人类应永远铭记柏林墙带来的历史教训。

第七章

再创波兰

——团结工会与瓦文萨

1945年，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邱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这世界三巨头挥动巨手，签订了雅尔塔协议。协议不仅确定了波兰的战后边界，也拉开了世界新秩序的序幕。波兰由此与雅尔塔体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44年后，雅尔塔体系的崩溃也是从波兰开始的。1989年，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头，一个迟早要来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团结工会从圆桌会议走向了政治舞台，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铁板一块的苏联帝国开始分崩离析，波兰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率先倒下，随后多米诺效应波及了整个东欧……

波兰是多难之邦，历史上曾被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三次瓜分，亡国达123年之久。人们至今可以从肖邦的音乐中去感受这段惨痛的历史。他的音乐旋律优美，处处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又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刑场，奥斯威辛、布热津卡、华沙犹太区都记载着人类的劫难。战后，波兰成为其宿敌苏联的卫星国，演出了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悲喜剧……

波兰战后的历史充满了波澜，但改变波兰历史的不是权倾一方的权贵，而是一些手无寸铁的工人。十九世纪末，波兰社会学家克莱维茨基指出："工厂工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英雄主义。"波兰战后的历史为此提供了注脚。

当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宣布实行军管之后，团结工会会员惊呼“乌鸦钻出了红色的壳，”1989年一位波党人士也以“乌鸦钻出了红色的壳”来回敬团结工会。

解释团结工会在红色波兰的崛起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本文只是提供一些基本的事实。

一、波兹南的鲜血

1956年波兹南街头流淌的鲜血抹去了社会主义无冲突这一荒唐而不可思议的命题。

1. “二十大”冲击波

战后的波兰被拉进了苏联的怀抱，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不仅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波兰，还向波兰出口了具有波兰血统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担任波兰国防部长，对波兰实行控制。

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在华沙重复出现，象个人崇拜、目无法制、侵犯人权、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莫斯科派的领导人排挤打击国内派领导人，哥穆尔卡等一大批在国内进行抵抗的共产党人遭到整肃，身陷囹圄。秘密警察部门不受制约，肆意妄为，整个社会处在恐惧之中。1950——1955年实行的经济发展6年计划，引进了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加快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投资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从1949年的15.4%提高到1955年的20. 6%，这对饱经战争破坏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投资大部分用于重工业，牺牲了一般消费品的生产，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官方许诺6年计划期间提高实际工资40%的诺言没有兑现，人民怨

声载道。

苏联的变化与波兰息息相关，苏联感冒，波兰就要咳嗽。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斯大林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昭然若揭，笼罩在他周围的神圣光环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座用最美好的词藻装点起来的大厦坍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在出席苏共二十大后死不逢时，客死异乡，波兰出现了继承危机。赫鲁晓夫亲自到华沙坐镇指挥，选举妥协人物奥哈布为波党第一书记。

早在1955年，波兰就感受到了解冻之风的吹拂。波党撤销了主持保安部门的政治局委员拉德凯维奇的职务，这表明秘密警察部门对于政治生活影响的下降。国内气氛发生了微妙变化，人们开始谨小慎微地议论时政。数千名遭到囚禁的无辜公民悄然回到了公共生活，哥穆尔卡便是其中之一。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波兰广为流传。人们开始对某些领导人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的作法严词抨击。在华沙，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了“曲环”辩论俱乐部，讨论社会形势、创作自由及政治民主化等问题。大学生创办的《直言》周刊一反官方的陈词滥调，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波党内部在对待这些变化上出现分歧：一部分人冥顽不化，反对变革，认为这会威胁社会主义；另一部分人力主变革，主张党采取主动。波党在面对变化时举棋不定，不知所措，而整个社会累积的不满情绪正在膨胀。

2. 黑色星期四

1956年6月28日星期四，这是一个令波兹南居民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天，斯大林机车厂和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对于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不满，派出8名代表到省委请愿，要求提高工资，但是遭到扣

压。

代表遭到扣压的消息激怒了工人，他们走出工厂，举行示威。其他工厂的工人、社会各界人士陆续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引人注目的是教堂孤儿院的孩子们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游行的人数有数万人之多。人们打出了“提高工资”、“降低物价”、“打倒共产主义”、“与苏联断交”、“要民主要自由”、“要上帝”等标语，不断高喊口号，沿途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有人鼓掌欢迎。

波兹南谣言四起，有人说华沙、罗兹等地发生了“革命”。参加波兹南博览会的外国人有些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游行的人群冲击省委、省政府、市政府、法院、检察院和监狱，他们解除门警的武装，烧毁法院档案，释放罪犯。

公安局前聚集了数千人，他们要求释放请愿的工人代表。愤怒的工人用石块攻击公安局的门窗。忽然，哒、哒、哒一阵枪响，人群中有数人饮弹身亡。当人们看到满是血迹的尸体时，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恐惧，他们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局，但这已是血淋淋的事实。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到了民警面前，向民警要枪。民警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迷茫中将枪交给了工人。拿到武器的工人向公安局射出了一串串仇恨的子弹，公安局里也在不断向外射击。

人群中又不断有人倒下，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人群中的大多数已经离去，一部分工人在公安局对面的公园里修筑避弹壕进行还击。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罪犯也抢到了枪支，到处乱打。示威已演化为一次流血冲突。

这次示威是由一些传统意识和政治意识较强的老工人发动的，他们仅仅提出了经济要求，没想到示威竟发展为一场流血悲剧。这使他们感到痛心。

波兹南发生的事件震撼了最高当局，迅速平息骚乱已成为当务之急。

约 14 万军人全副武装，浩浩荡荡开进波兹南，坦克在大街上巡

逻，飞机在低空盘旋，这里似乎在举行实战演习。巡逻的士兵不时受到袭击，士兵们则进行还击。军队迅速控制了局势，29日虽然还有零星的冲突，但已基本平静。

持续两天的冲突造成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

30日，一场大雨冲刷着波兹南街头的鲜血，波兹南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3. 十月的希望

波兹南事件震撼了波兰，在全世界也引起了反响。

波兰社会各界作出了迅速的反应，知识分子与青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呼吁加快民主化进程。工人们激愤万分，在许多工厂工人自治的思想又开始萌生，有的厂还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波党的反应却慢半拍，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对波兹南事件进行了评价，全会一方面认为波兹南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同时又认为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挑衅者发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工人的情绪进行的反对人民政权的罪恶挑衅。”这次全会撤销了1948年将哥穆尔卡开除出党的决定，为哥穆尔卡重返政坛铺平了道路。领导阶层内部的分歧导致了在改革问题上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10月19日，波党中央全会正在举行，由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苏共中央代表团突然来到华沙，要求与波党政治局举行会谈。

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在科涅夫元帅统率下，在华沙、弗罗兹瓦夫和波兰西部边境进行调动。华沙气氛十分紧张，许多工厂聚集了不少武装的工人，一场匈牙利式的冲突迫在眉睫。

面对来自苏联的不速之客，中央全会不得不休会。政治局全体成员加上哥穆尔卡参加了与苏共代表团的会晤。赫鲁晓夫一看到波兰代表团就出言不逊，大喊大叫：“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接着便是一长串的污言秽语。原来赫鲁晓夫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化的发展感到

不安，担心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受到威胁。这位在非斯大林化表现了非凡政治勇气的苏联领导人，在波兰问题上竟表现得如此气量偏狭、谨小慎微。会谈从19日上午一直持续到20日凌晨，波党政治局在这次艰难的会谈中终于说服了苏联人，使他们平静了下来。

全会于20日继续举行，哥穆尔卡在会议上就波兹南事件发表讲话。他说："当波兹南的工人走上街头时，他们抗议的不是人民波兰，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在我们社会制度中广泛蔓延的，并使他们感到切肤之痛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他认为，企图把这一悲剧看作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和挑拨者的活动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的。他强调指出："波兹南的悲剧和整个工人阶级深为不满的根源在于我们，在于党的领导，在于政府。"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哥穆尔卡早在法西斯占领时期就参与组建波兰工人党。1943年当选为中央书记。1948年由于主张波兰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加上了"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遭到监禁。哥穆尔卡当选第一书记，举国为之兴奋，人们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4. 新政的结束

哥穆尔卡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以争取民心：结束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扩大工人自治的作用；给人民以更多的民主与自由；根据经济学家兰格的建议，试图将价值规律引进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调整政教关系，与天主教合作；解除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在新的基础上发展波苏关系。

哥穆尔卡的新政在人民中激起了希望，但可惜好景不长，希望化为失望。经济改革未能继续进行，价格仍被冻结；重新实行新闻检查；工厂自发成立的工人委员会的权力不断遭到削弱，最终纳入哥穆尔卡倡导的工人自治代表会议的范围之内；哥穆尔卡展开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布鲁斯、沙夫等著名学者遭到打击。

1959 年 3 月，34 名著名作家联名写信，反对限制自由讨论和新闻报道。

1964 年 11 月 4 日，华沙大学的库龙和莫莱夫斯基因写了一封致党的公开信，并在大学里散发而被捕。

1967 年，哥穆尔卡当局掀起了一场反犹太运动。由于批评政府的大部分人是犹太知识分子，当局利用中东战争的时机，将这些知识分子清除出领导阶层。哥穆尔卡在一次讲话中把犹太人称为“第五纵队”。在此前后，约有 1 万多犹太人离开波兰。

1968 年 3 月，由于官方禁演诗人密兹凯维奇的《先人祭》一剧，大学生反应强烈，举行示威游行。知识分子也参加了抗议活动。当局采取行动进行镇压，将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一些知识分子被解除党内职务或者开除公职。许多大学生被开除，有些人还遭到逮捕和审讯。

上述事件在社会中没有引起反响。工人们感到这些事情就象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那样遥远。只是 1970 年的提价才真正触动了工人的利益。一位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冷漠是出于工人阶级尚不成熟和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因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刚刚离开农村，在文化上尚与农村联系在一起。”

二、喋血格但斯克

对于波兰人来说，1970 年 12 月那段殷红的日子是他们记忆中的噩梦。这场波及波罗的海沿岸的血与火的冲突不啻是向已饱受创伤的波兰民族心灵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

1. 圣诞节前大涨价

在西方，圣诞节往往是商品大减价的时节，商店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折扣优惠消费者，促销的手段层出不穷。在波兰这个天主教影响很大的国家里，圣诞节之前这段时间也是大量采购的良机。

12 月 10 日，华沙、格但斯克等城市的商店前排起长龙，人们纷纷抢购所需的食品。近来，食品涨价的“谣言”四起，搅得许多家庭惶恐不安。格但斯克一家工厂的米雅尔是位党的宣传干部，一向消息灵通。妻子劝他去抢购些食品，但遭到拒绝。他振振有词地说：“虽然涨价从经济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政府决不会愚蠢到在圣诞节之前涨价，涨价理想的时机是新年之后。”12 日的文件传达使米雅尔心情沉重，他感到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毕竟他与妻子收入并不高。

12 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一车间正在开会传达有关涨价的文件，文件宣布将有 46 种食品和工业品涨价，涨幅为 20%。这对收入微薄的工人家庭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而最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为生计操心的主妇们。一位有 3 个孩子的女工在听到涨价的决定之后泪水夺眶而出。她是一位机车司机，月收入只有 1859 兹罗提（当时合 18 美元），她不知道如何安排家里的生活。她站起来说：“现在的生活比希特勒时期更糟”。说完便失声痛哭，许多女工也开始啜泣。男工人则脸色阴沉，沉默不语。会议是在紧张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2. “要个说法”

12 月 14 日上午，寒风萧萧。

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程车间和船体车间的工人忍无可忍，开始罢工。他们曾在瑞士、丹麦受过严格训练，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是一支组织严密的队伍。

上午工间休息时，机车司机的身影出现在各个车间，他们送来了香味扑鼻的咖啡，同时也带来了船体、工程车间罢工的消息，呼

吁全厂工人行动起来参加罢工。顷刻间，罢工的消息传遍了全厂。

经理办公室前挤满了愤怒的工人，工人开始与经理进行对话。

“我们要求提高工资，作为经理你能作主吗？”

“你们要求提高工资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很同情你们，但是，嗯、嗯……，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格但斯克省的点头恐怕不好办。”

“不好办要你干什么，既然你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求与格但斯克省委进行对话。”

“这个，这个我可以与格但斯克市委联系。”

经理拨通了格但斯克市委的电话，讲了几句话便沮丧地放下了电话。

“省委不愿派人来。”经理叹口气。

“到省委去怎么样？”

“好！”

愤怒的工人离开工厂，向省委行进。他们一路上高唱《波兰没有灭亡》、《国际歌》，沿途有许多人围观，他们也情不自禁一起吟唱。工人们的歌声并不高亢，却悲壮异常。

数千人的队伍来到了省委大楼前，省委副书记已在那儿等候。

“省委书记哪去了？”

“在华沙出席中央全会。”

“开不完的全会，提不完的价，就是不知道关心工人生活。”一位腼腆的青年女工鼓足勇气嚷道，她在同事们的眼里还是个腼腆的女孩。

同日，中央全会正在华沙举行。尽管价格问题对社会震动很大，但却没有列入讨论议程。哥穆尔卡在会上发表讲话，大多数代表正襟危坐，也有的代表或闭目养神，或窃窃私语。10点左右，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卡尔科什卡、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科乔韦克等人被人叫出会场，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代表们纷纷揣测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十几分钟之后，神情紧张的科乔韦克回到会场，径直走到

主席台上就座的哥穆尔卡旁边。哥穆尔卡不再讲话，专注地听着科乔韦克的耳语，随后点点头，科乔韦克旋即离开了会场。这时会场的气氛近乎凝滞，代表们从哥穆尔卡的神情中似有所悟。

科乔韦克与出席全会的重工业部部长卡伊姆、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卡尔科什卡、书记斯塔热夫斯基以及列宁造船厂第一书记平科夫斯基立即启程前往格但斯克，但是他们都未得到明确的指示和特别授权。内务部副部长斯瓦布奇克下午 2 点 50 分也赶到格但斯克，奉命接管内务部武装力量的领导。

3. 省委大楼前的骚乱

格但斯克省委大楼前的人群越聚越多，工人们强烈要求省委与工人推选出的代表团谈判。这位可怜的副书记一再向人群解释，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和主管经济的省委书记不在，他无权与工人谈判。示威工人要求撤销制定经济政策的领导人的职务，要求改革工会组织。人群中不断有人喊："我们要面包"的口号。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笛声，一辆宣传车驶近人群，省委副书记走上前去，拿起话筒，开始讲话："工人同志们，请你们立即回去上班，我相信大家提出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大家相信他的话吗？"

"不信！不信！"

宣传车开始广播省委要求工人返回工厂的通告，但这使工人感到很不耐烦。几个身着工作服的小伙子一拥而上，把司机和广播员拉下去。当广播中传来工人的声音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工人将宣传车开到了北方造船厂，呼吁北方造船厂响应罢工的号召。宣传车又开到了工学院，工人们为没有支持 1968 年的学生抗议向学生道歉，并号召学生声援工人的罢工。游行的队伍也进入北方造船厂、工业学校和电台，要求人们加入示威的队伍。宣传车不断提醒市民："我们下午将在省委大楼前继续示威，望大家支持我们

的正义行动!”

下午，示威的工人继续涌向省委大楼。在内务部副部长的指挥下，警察开始在省委大楼附近设立防线。当示威队伍接近防线时，双方出现了对峙。3 点 35 分，警察试图驱散示威者，但由于示威者人多势众，没有取得成功。劝说群众散开的工作也没有奏效。数千人的示威队伍不断向前冲，警察薄弱的防线被冲开了。冲在最前面的工人与民警扭打在一起，人群乱作一团。人群中有人向公共建筑物投掷石块，推翻了几辆汽车，并将汽车点燃。附近的报亭也被点燃，大火熊熊燃烧，火光之中有人试图放火点燃省委大楼，但没有成功。随后，示威者又涌向火车站，阻止火车运行。冲突一直持续到深夜……

在这天的冲突中，有十几人受伤，16 个工人被捕。

为了应付事态的发展，哥穆尔卡派政治局委员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国防部副部长科尔钦斯基星夜赶到格但斯克。这时在格但斯克有 3 位政治局委员、1 位副总理、1 位部长、2 位副部长坐镇指挥，但遗憾的是这些要员都未得到明确的授权，在处理危机时难以协调。

4. 血溅民警局

12 月 15 日，列宁造船厂的气氛依然紧张，工人们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约 4000 工人涌向经理办公室，经理扎切克和党委第一书记平科夫斯基回答工人提出的问题。

扎切克首先说：“大家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

平科夫斯基严肃地说：“德国人在霍尔姆岛已经登陆，德国国旗也升起来了，希望你们提高警惕。”霍尔姆岛距格但斯克不远，二战期间德国曾在此建造潜艇，现在该岛是船厂的物资供应站。

“听着，这是圈套、烟幕弹。什么登陆？什么德国人？这不是大

白天说梦话吗？”一位名叫瓦文萨的青年工人厉声质问。他 27 岁，小学文化程度，1967 年入厂当了电工。瓦文萨性情耿直，颇受工人们的欢迎。此刻的瓦文萨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电工，决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驰骋波兰政坛的风云人物。

人群中出现了十几个身着崭新工作服的人，他们在身着又脏又破充满油污的工作服的工人中间显得十分扎眼；工人一看便知道是厂党委成员，看来他们已决定和工人打成一片。

瓦文萨问：“你能否保证释放被捕工人，能否取消食品提价？”

经理：“我全都做不到。”

瓦文萨拿起经理办公室的一个喇叭，向在厂的工人传答了经理的回答，向大家问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到省委大楼去！”人群中很多人高喊。这时经理办前拥挤的人群缓缓向外移动。

正当瓦文萨等人要离开时，经理把他们叫住了。

“看来这帮人不听我的，倒愿意听你们的。怎么样，咱们来个协议吧。我们会给你们几个人钱……。你们把他们叫回来，如果他们仍罢工，就把他们管住。”

“你要给所有的人钱，漏掉一个，你就休想与我们几个人做交易。”瓦文萨说完就离开经理办，去追赶游行的队伍。

瓦文萨挤到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不远之处站着 30 多个手持警棍的警察。瓦文萨呼吸急促，心中怦怦直跳。当他想到后面数千人的队伍时，就鼓足勇气向前冲。仅仅两三分钟，民警的防线就被冲破了。

游行的队伍来到省委大楼前时，大楼前的几辆伏尔加轿车急速驶离。省委大楼大门紧闭，只有几位士兵端着机关枪威严地站在大门前。工人们吃了闭门羹。

绝望的工人又来到了民警总部。民警局前一队队民警手持枪支，严阵以待。一些有经验的工人从民警不安的神情中判断他们仍在等

待上级的指示。

瓦文萨向民警喊话："我们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请你们撤走，免得受到人群的攻击。"民警开始慢慢撤退。而民警局前的人却越来越多。

瓦文萨听说指挥官的办公室在四楼，就冲了进去。进楼之后他发现大楼的过道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民警，知道大事不好。他向指挥官表明，如果立刻释放被捕工人，工人不会再惹麻烦。几位指挥官看来同意了他的要求。这时外面已有人向民警大楼投掷石块。

瓦文萨与几个民警来到窗前，向人群挥挥手，并把安全帽和计时卡扔下去，以使人们知道他的工人身份。

"请大家不要投掷石块，民警已经同意释放我们的人。有谁知道被捕工人名单的，请上来帮我一把。"瓦文萨手持喇叭向人群喊话。

突然从大楼一层冲出了许多民警，将大院里的工人团团围住。瓦文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必是民警指挥大楼出了问题。

人群有些慌乱，叫骂声不绝。瓦文萨本想呼吁民警撤回，话还未说雨点般的石块就向大楼飞来，数秒钟之内数百个窗户的玻璃被砸得粉碎，瓦文萨身边的两个民警也被飞来的石块击中，鲜血直流。人群中有人高喊"叛徒"、"狗杂种"、"双料特务"，瓦文萨知道他被误解了。大楼里不少民警被石块击中，民警开始向人群投掷烟幕弹，而工人则在空中接过来，再投向大楼，一时间大楼里浓烟弥漫，令人窒息。

人群中不知是谁向民警开了枪，当场有3个民警倒在血泊之中。瓦文萨感到大事不好，局势看来难以控制了。瓦文萨所在的那个办公室被民警锁上了，他用随身携带的扳手将门打开，从大楼后门逃离了民警总部。

工人与民警的冲突在蔓延，枪声不绝于耳。在通往市政厅的路上，造船厂的一个青年工人拦住了一个民警的去路，这位民警二话不说，当场将工人击毙。面对青年工人的突然死亡，愤怒的人群一

拥而上，打死了这个民警。

在冲突发生数小时之后，军人和民警全部投降。工人释放了士兵，民警则被押上了卡车。列宁造船厂内，几辆押解民警的卡车在兜圈，工人们挥舞着红白两色的国旗，打着代表胜利的手势，就象胜利者凯旋归来。这些民警被押到了经理办公楼前，工人们不知如何处置他们，党委书记乘机将民警隐藏起来。

两辆顶盖敞开、插有国旗的坦克开进了列宁造船厂。这两辆坦克是工人缴获的战利品。缴获坦克的情节是非常戏剧性的：一队在街头行进的坦克被工人阻拦。工人将泥巴糊在坦克的瞭望孔上，坦克就变成了瞎子，驾驶员只得打开顶盖，向示威者投降。前两辆坦克就这样被缴获了，后面的见势不妙，掉头就走。

这12月15日的冲突中，有6人死亡，300多人受伤，19辆汽车被捣毁，54家商店遭抢劫。

5. 下令开枪

12月14日格但斯克的工人示威使哥穆尔卡深感不安，他认定这是一次反革命性质的挑衅活动。12月15日早晨，波党在党中央大厦政治局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总理等政界要人出席，民警被杀的消息也传到了会上。哥穆尔卡在听取汇报之后，作出治安部队和军队使用武器的决定。决定规定，只有在直接攻击民警和士兵、焚烧和毁坏建筑物和威胁他人生命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武器。具体原则是：口头警告后，第一枪朝天开，5至10秒钟后，如果人群继续接近警察和士兵就朝脚下开枪。这项开枪令当天12点正式生效。

下午1点多，哥穆尔卡决定成立以国防部副部长科尔钦斯基将军为首的格但斯克指挥部，以应付正在恶化的形势。

波罗的海沿岸的驻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6. 三人罢工委员会

格但斯克在经过了几小时的冲突之后，于中午时分恢复了平静。街道上狼藉一片，到处都是石块、砖头、各种螺丝以及丢弃的手套和鞋子，斑斑血迹随处可见，民警总部里正在分发弹药，酒馆里有人在拼命酗酒……

瓦文萨只身来到民警局，一位身着便装的人似乎已接管了民警局，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了瓦文萨。他问瓦文萨有何高招应付目前的局热。瓦文萨建议，工人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再选举与当局进行谈判的代表，同时民警暂停动武准备。这位领导接受了瓦文萨的建议。

随后，船厂的所有车间都召开了会议，选举谈判代表。瓦文萨被选举为本车间的代表。各车间的代表在经理办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瓦文萨等 3 人组成，瓦文萨被推选为主席。

坐在一旁的经理在瓦文萨耳边低声说："小伙子，你年轻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的。别让他们只选你一个人。你们三人应共同负责，只靠你一个人只能把事情搞糟。"瓦文萨认真地想了想说："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同时我申明我们三人共同负责。我太年轻，可能会犯错误。"

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罢工委员会和各车间负责人晚上在厂里值班。他们焦虑不安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凌晨 3 点，经理扎切克召集车间领导和代表举行会议，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军队已把船厂包围了。当局决定见人就开枪。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随便罢工，但只许在船厂内，不许你们外出，否则军队会开枪，你们会流血的！"

瓦文萨以为经理在唬人，但在厂门口果然看到了武装的士兵。尽管大家熬了一夜，疲惫不堪，但不可能再休息了。

早晨5点半，瓦文萨按约定时间来到经理办公室，但是罢工委员会的另两个成员没有来。面对危急的局势，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三人罢工委员会只剩了一个光杆司令，瓦文萨对经理的“忠告”似有所悟。

7. 造船厂的枪声

列宁造船厂已被包围，一号门、二号门和三号门外的士兵荷枪实弹，严阵以待。附近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已处在军队的控制之下。一些主要的街道已被坦克封锁，装甲车在市内巡逻。

早上来上班的工人与士兵开着玩笑，一位女工对士兵说：“你们这些孩子不会把我打倒吗？”一个老工人对士兵说：“我的儿子也在当兵，你们不要把枪口对准工人。”士兵们没有反应。

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瓦文萨与本车间的领导一起去找经理扎切克，他们希望尽快与部队指挥官取得联系，以阻止军队向人群开枪，但扎切克称无法与部队联系。办法没有别的了，看来只好呼吁工人不要离开工厂，但许多血气方刚、情绪激愤的青年工人不听劝阻，他们决心冲上街头。

8点左右，大批工人、绝大多数为青年工人手持撬棍、钢筋和其他工具涌向二号门。门外士兵进行了口头警告，但队伍仍在前进。士兵开始朝天鸣枪，队伍仍无退缩之意。

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人群中有二人倒在血泊之中。工人们继续向前冲，有十几个工人被子弹击中。几辆救护车通过部队警戒线，把受伤的工人送往医院。一个工人因失血过多，在救护车上死去了。一个老工人不相信这是波兰人干的，他怀疑这是化装的俄国人所为。当他定睛看到这些士兵确是自己的同胞时不禁老泪纵横。他为青年工人丧生痛心，更为同胞相残而义愤填膺。

几分钟之后，船厂内升起了一面四周镶有黑色丝线的旗子，以哀悼死难的工人。厂门口也开始下半旗，并悬挂系着黑纱的死难工

人的安全帽。悲愤的工人在厂内唱起了国歌:“我们要用利剑收复敌人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厂门口装上了喇叭，工人们齐声高喊:“杀人犯！杀人犯！……。”

8. 三十六计走为上

悲剧发生了，造船厂内情绪激愤。一些工人采取措施准备自卫。工人们用截断的钢管自制了一种迫击炮，并把它架在了厂区的中央。电焊车间的工人发明了一种用乙炔瓶炸坦克的方法。工人们试图在工厂内组织起来，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车间，互不相识，为组织工作带来很大不便。他们选举了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罗列了一条又一条工人不满的单子，但没有提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

经理扎切克不断向工人发出警告，如果上午10—11点不撤离造船厂，坦克就会炮轰船厂。大门外面，工人家属在军队警戒线后焦急地张望，他们在为亲人祈祷，妇女和儿童饱含热泪。

究竟何去何从，工人们必须作出选择。在长时间的吵吵嚷嚷之后，工人们进行了表决，最后作出了撤离船厂的决定。当决定作出时，工人们失声痛哭，他们将撤离视为投降之举。民警总指挥也宣布:“所有的不满和意见都将考虑，但大家必须离开。”

当局与工人达成协议已是深夜，两万多工人开始撤离。他们心情沉重，缓缓通过士兵和民警围成的狭窄通道。

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惊心动魄的三天终于结束了，但那悲剧性的一幕却永远铭刻在了工人的心中。

9. 血染波罗的海沿岸

格但斯克的流血冲突趋于缓和时，波罗的海沿岸的形势正在恶化。

格丁尼亚。12月16日零时，格丁尼亚罢工委员会的31名代表被捕，逮捕令是由地方指挥部下达的。而一天之前，罢工委员会与

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马里昂斯基举行谈判，达成了马里昂斯基向上转达工人取消涨价的要求而工人离开市人民会议大楼的协议。工人被捕的消息在巴黎公社造船厂引起了轩然大波，工人们反应激烈。当天下午，通往船厂的道路已被军队封锁。12月17日，工人们不顾警告，企图通过部队的警戒线，双方发生了冲突，当场有4人丧生，多人受伤。冲突在全市引起了更大的不满，工人们用门板抬着被害青年的尸体在城里游行，市民们也与军人发生了冲突，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什切青。瓦尔斯基造船厂和格罗菲亚造船厂的工人在得悉格但斯克发生流血冲突之后，工人于12月17日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有些人向治安人员投掷了燃烧瓶和石块。示威队伍到达省委大楼时，有人纵火将省委大楼点燃，大楼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失去控制的人群又攻击省民警大楼和工会大楼，向停放在附近的军车投掷汽油瓶，并将民警大楼和工会大楼付之一炬。民警使用了武器，多人伤亡。一些人攻击检察机关和监狱，酿成了更大的冲突。在什切青的冲突中，共有1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18日，两厂工人举行罢工和静坐示威，并选出了罢工委员会，提出了废除工会中央理事会，建立独立工会、降低物价、提高工资等要求。经过两天的艰苦谈判，罢工委员会与政府达成了结束罢工的协议。由于协议并未完全接受工人的要求，绝大多数工人坚持继续罢工。工人在军队的包围下已精疲力尽，于22日上午结束了罢工。

埃尔布郎格。12月15日——18日，埃尔布朗格市发生了骚乱。人们用棍棒、砖头、石块攻击银行、邮局、电话局和治安人员，并焚烧建筑物和军事设备，在冲突中有数人伤亡。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冲突中，按照官方估计，有45人死亡，其中有两名民警和1名士兵。受伤者有1165人，其中治安人员600名。当时流传的消息为数百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19座公共建筑物被焚烧或毁坏，220家商店遭到哄抢，几十辆民用车辆、大量的军

车及其他装备包括坦克和装甲车被捣毁。按当时价格计算，经济损失高达4亿多兹罗提。

对于经历过1970年12月事件的人来说，这次事件是一场无人捧场的运动，自始至终使人感到孤独与恐惧。波兰导演瓦依达的影片《婚礼》中有一个镜头给人印象深刻：在一次婚礼上，一边站着同新郎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另一边站着作为新娘亲戚的农民，彼此分成两个世界，互不往来。尽管影片的背景是19世纪，但却反映了60年代末波兰的现实。1968年工人对于学生及知识分子抗议置之不理，两年之后当工人在波罗的海沿岸流血时，知识分子也反应冷漠。这场无人捧场的运动最终以悲剧结束。同时也宣告了长达14年之久的哥穆尔卡时代的结束。

面对沿海地区扑朔迷离的局势，哥穆尔卡心情抑郁，寝食不安。他没有想到类似波兹南事件的冲突会降落到他的头上，而他正是在波兹南事件后才重返政坛的。他本该是一位因1956年之后开创波兰历史的新时代而彪炳青史的人物，但现在完了，一切都该结束了。他感到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经诊断他患了脑血栓。

12月19日，当秘书通知他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哥穆尔卡称病没有出席。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当晚，西伦凯维兹总理来找他谈话，他已知来意，直接宣布辞职。20日，中央全会宣布撤销哥穆尔卡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爱德华·盖莱克为党的第一书记，政治局也进行了大改组。23日，总理西伦凯维兹宣布辞职。

1956年事件将哥穆尔卡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而1970年事件将他无情地抛弃。历史似乎嘲弄了他，每当想到这里，他就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苦涩。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70年代的波兰经历了希望、失望、迷惘和绝望。诱发1970年事件的因素并没有消失，社会仍在负病运行。暴风雨的来临只是时间问题，70年代不过是暴风雨之前短暂的平静时期。

1. 崛起的政治新星

在1970年12月风暴中坐上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这把滚烫的交椅，需要足够的政治勇气。盖莱克勇敢接受了这一挑战，他说：'我意识到了局势的危险性，但我也深知这个职位总得有人干。"

盖莱克1913年出生于西里西亚矿区，青少年时代（约22年）是在法国和比利时度过的。在西方人看来，他的思想是西化的。1948年他回到波兰，参加了统一工人党。1949年他担任了卡托维兹省的党政领导人。他在卡托维兹工作出色，业绩不凡，使卡托维兹成为现代化的、全国最繁荣的、效率最高的省份。1970年危机时，波兰人把他看作是领导国家从无所作为和停滞不前走向繁荣的合适人选。在西方，他也获得了实用主义、专家治国论和现代化倡导者的美誉。

新官上任三把火，盖莱克上任之后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以缓和冲突，争取民心。

盖莱克亲自来到冲突地区与工人对话，他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口头禅是："请大家帮忙。"在对12月事件的评价上，他似乎是在重复哥穆尔卡对波兹南事件的评价，将工人的抗议行为和反社会主义行为区别开来。1971年1月，盖莱克与许多党政官员在华沙与工人选举的代表举行对话，瓦文萨也出席了对话会。内务部长痛哭

流涕，保证再也不会发生波兰人杀波兰人的事了。格丁尼亚一个工人说，他的女朋友惨遭杀害，却未列入死难者名单。工人提出了许多问题，虽然并没有完全解决，却有助于树立新领导人的体察民情的形象。盖莱克试图与各阶层沟通，让愤怒的工人平静下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给知识分子有限的自由，同时改善政教关系。他还取消了国外旅行的限制，波兰人可以享受出国旅行的自由。盖莱克为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筹资 1800 万美元，重建被战争毁灭的王宫。这个拥有 400 间房屋的庞大建筑是根据反映城堡全盛时期的油画、绘画和图片重建的，与四个世纪前的王宫毫无二致。

在保持与苏联良好关系的同时，盖莱克力主对外开放，吸引外资。苏联率先给予波兰 1 亿美元的现款，使波兰可以购进短缺的食品和消费品。大笔的西方贷款源源不断流入波兰，据估计高达 300 亿美元。西方颇为看好这个东欧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市场。为了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波兰用贷款支持国内大型投资项目、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专利。

盖莱克实行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打算建设第二个波兰。他实行了一种高工资、高消费和高投资的经济政策。波兰人开始津津乐道“汽车文明”“住宅文明”和“电气文明。”盖莱克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更多地工作，才能获得更高的消费，才能更多地消费。外国人对于波兰 70 年代初期的变化感到惊奇，盖莱克被人称为“政治上创造奇迹的魔术师。”

盖莱克的公众形象也受人欢迎。他努力创造一种自然、和谐和非正式的气氛，在群众面前表现得和蔼可亲。据说，有一次他到一家工厂视察，看到工人都穿着崭新的工作服。他问工人什么时间领到新工作服的，工人回答是：“今天早上。”他对经理说：“我不是来竞选的”。说完扭头便走。他经常到工厂、农村视察，听取汇报，显得平易近人。

2. 昙花一现

可惜盖莱克执政初期，政通人和的局面好景不长，到70年代中期，盖莱克奇迹逐渐消失了。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石油价格的上涨冲击着波兰经济。尽管波兰具有偿债能力，但偿债条件愈来愈苛刻，获得新的资金越来越困难。国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出口减少，进口却在增加，国际收支状况也趋于恶化，这又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外国贷款支持的投资项目。

国内实行的高投资政策，使基建战线拉得过长。有些项目匆匆上马，成为胡子工程。虽然实行了物质刺激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仍不见好。价格由国家调节，很少变动，而职工的收入却在增加，这就造成了工厂亏损和补贴的增加。繁荣的景像转瞬即逝，短缺又回到了经济生活之中。

1975年12月召开的波党"七大"并没有对已出现的不祥之兆进行冷静分析，相反却沉溺于对已取得成就的炫耀和肉麻的溜须拍马。大会确认了加速发展的方针，没有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当月提出的修宪建议在社会中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由于修宪建议未经全民讨论，因此引起了不满。自1968年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沉默，他们和大学生对修改宪法提出抗议。知识界人士纷纷写信给议会特别委员会，就修宪问题各抒己见。盖莱克对于这种批评采取了敌对否定的态度。当局对这些知识分子施加压力，许多作家的名字不再见诸报端，发表作品也更加困难。尽管当局对这些敢于直言的"害群之马"猛烈抨击，但他们却在社会中获得了同情。这表明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疏离。

3. 不撞南墙不回头

价格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变化是经济学的规律，但在波兰，官方

将价格稳定（国家以补贴方式维持价格的稳定）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70 年代前期，职工工资不断提高，而食品价格一直保持不变。低价格刺激了高需求。70 年代，波兰人均肉类的年消费量为 70.3 公斤，接近法国的水平。连续几年的农业歉收加重了食品短缺，肉类、家禽、食糖、蔬菜、水果都供应不足。吃肉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时华沙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向一位美丽的姑娘求婚。小伙子说："请你嫁给我吧。亲爱的，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命令，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皮货、钻石、菲亚特轿车、海滨别墅，任何时髦的东西都会有，唯独火腿我无法给你。"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雅罗谢威奇总理于 1976 年 6 月 24 日在议会发表讲话，宣布从 6 月 26 日起提高基本食品价格，肉及肉制品的提价幅度为 69%。这个决定在拉多姆市和乌尔苏斯引起强烈的反应。

拉多姆。6 月 25 日上午 8 点，拉多姆市瓦尔泰尔将军机械厂的数千名工人由于对涨价不满举行罢工。他们走上街头，举行示威，鼓动其他厂的工人加入他们的行列。10 点，约有两千多工人在省委大楼前举行集会，要求撤销涨价决定。中午 12 点半，省委第一书记波罗科彼西克表示将工人们的要求向中央转达，并允诺下午 2 点答复。这时，一些示威者冲击省委大楼，并向大楼投掷石块。示威者还试图攻击省政府、民警局和监狱。下午 2 点半，大批民警奉命驱散示威者，他们使用催泪瓦斯、水枪和木棍还击，示威者以石块相迎。一些示威者点燃了洒在路上的汽油，以阻止民警前进。混乱之中，省委大楼也被付之一炬。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醉汉开动了装满水泥板的汽车，向民警冲去，结果醉汉受伤身亡。

乌尔苏斯。华沙郊区的乌尔苏斯机械厂的大多数工人 6 月 25 日停止了工作，要求撤销涨价决定。9 点半，400 多人走出工厂。在工厂附近的铁路上拦截了一辆近郊区的列车，此时工人已增加到 2000 多人。他们焚烧车厢，以发泄对涨价的不满。下午 5 点，示威者拆

除，并用乙炔喷嘴切断铁轨，用出轨的火车头作为路障。晚上9点多，大批民警出动，驱散了示威者，到夜里11点，局势才恢复正常。

政府对工人反对涨价的示威并没有用武力解决，盖莱克等人对1970年12月事件仍记忆犹新，他知道动用武力的可怕后果。6月25日晚8点，总理雅鲁谢维奇在电视上耷拉着头，神情沮丧地宣布撤销涨价决定，并维持目前的食品零售价格。

6月事件迅速平息了，但盖莱克苦心孤诣树立起来的开明形象就此消失了，政府的威信也一落千丈。

事件之后，拉多姆市有939个工人被开除，乌尔苏斯有180工人失去工作。新闻媒介谴责了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的闹事，连篇累牍地报道各省人民支持政府的集会，集会中最常见的标语是"盖莱克，我们与你在一起。"

4. 保卫工人委员会

1976年9月，一批同情拉多姆和乌尔苏斯被开除工人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参加者有库龙、米赫尼克、作家安哲耶夫斯基、经济学家利宾斯基、女演员米科瓦伊斯卡等28名著名知识分子。他们为工人募捐，营救遭到迫害的工人，并出版地下刊物《工人》杂志。

保卫工人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库龙。库龙原是波共党员，华沙大学讲师。1964年他在一篇论文中抨击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波兰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阶级并没有掌握政权，决定一切的只是一小撮官僚，这种情况不改变，波兰的经济危机便无法解决。由于这篇文章，他被秘密警察逮捕，坐牢3年，党籍也被开除。1968年春，获释不久，他就成为大学生抗议的组织者，又被判刑3年。70年代库龙开始筹建反对派组织。

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比较温和，主张通过现行制度实现制度的渐进变化，争取"主权与民主"，建立独立于政府的机构，保护个

人和集体的权利。后来部分不满保卫工人委员会温和性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提出了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

70年代出现的反对派组织力求根据现行法律进行活动，并在现行法律中争取地位。一些波兰政治家已意识到，这些反对派的基础已不是与资产阶级波兰藕断丝连的阶层。反对派活动的增长使当局深感忧虑，警察也加强了对于反对派活动人士的监视。反对派的出现给波兰政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

5. 飞来的色情照片

70年代的波兰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12月事件的阴影，一方面，参与纪念12月事件的工人不断被开除，另一方面，一些参加过12月事件组织工作的工人也遭到打击。列宁造船厂5号车间的诺维茨基，便是其中之一。

12月事件后工厂内部的民主有所扩大，诺维茨基被职工选举为车间工会主席。

一天，他的妻子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打开一看，是一打非常蹩脚的色情照片，拼凑的痕迹随处可见。照片上他的丈夫与几个扭捏作态的裸体女人呆在一起。她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清白的，可炮制这些照片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同时，厂方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指责诺维茨基冒领工资。厂方打算撤销他的车间工会主席职务，但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抵制。他们据理抗争，为诺维茨基辩护，并谴责了这种打小报告的卑劣手法。

许多12月事件后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会领导人都受到了类似诺维茨基那样的“礼遇”，其作法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6. 痛别造船厂

1970年12月16日，瓦文萨一回到家便被便衣带走，四天之后，他在一份“忠诚证明”上签字后才获释。获释之后，仍在列宁造船

厂工作。1971年1月，他组织了一个工人委员会，调查非法或不公正解雇工人的问题。工人委员会举行了三次会议，都演化成了厂内的抗议示威，厂领导忧心忡忡。

为了缓和情绪，活跃气氛，厂领导在厂内组织各种文娱活动，厂广播站还不断播送音乐和各种轻松节目。上级也许诺对工厂实行现代化，为工人建立娱乐中心和度假旅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但工作时间也增加了。工作环境没有多少改善，工人在风吹、日晒、高温、严寒的条件下工作。

1975年之后，工人的工资逐渐下降。工厂决定将那些积极参与罢工的工人开除，瓦文萨也被安排去干最差的工作。瓦文萨与莱纳尔恰克等人开始在不同场合讨论成立一个保卫工人利益的组织问题，有时讨论是在工会办公室进行的。1976年，瓦文萨在车间选举工会代表的会议上，将官方工会称为傀儡，并说加快船只的建造速度是迫使工人进行无偿劳动。他说："盖莱克没有信守诺言，他在向人民说谎。"

瓦文萨被召到了经理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秘密警察。他们重复了瓦文萨有关成立工人组织的谈话，向瓦文萨提出两个选择：要么听话，当选工会代表，要么以"生病"或"度假"为由不参加选举。瓦文萨对此坚决拒绝。4月，瓦文萨正式收到了开除通知，决定是由厂党委书记、车间主任和工会理事会负责人作出的，但高层有人干预了此事，担心瓦文萨会把事闹大。瓦文萨就这样离开了工作近10年的造船厂。

为了生存，他又在汽车修理厂找到了工作。在汽车修理厂当选为"工人自治会"代表。此时的瓦文萨开始与保卫工人委员会等组织建立联系，并与库龙等知识分子接触，这使他大开眼界。1978年他成为格但斯克自由工会的成员，接受了成立独立工会的思想。在汽车修理厂的一次会议上，他因指责"工人自治会"是十分荒唐的组织而被开除。

失业的瓦文萨利用找工作的机会，凭着招工办公室的介绍信，在格但斯克许多工厂进行活动，散发秘密报纸《沿海工人报》，鼓吹成立独立工会。瓦文萨此刻已将自己的命运与自由工会的命运联系起来，自由工会的活动家不断遭到骚扰和被捕的消息并没有使他畏缩不前。

7. 盖莱克门前排大队

70年代末，波兰广为流传着一个笑话：华沙街头的一家肉店从早上5时开始就排起了买肉的长龙。一个排了6小时队仍未买上肉的中年妇女疲惫不堪，显得很不耐烦。她对排在身后的一位长者说："不行，我得去找共产党第一书记盖莱克。"半个小时之后，这位妇女匆匆回到了排队的队伍之中，嘴里念念有词："妈的，盖莱克门口排的队比这儿还长。"这是对70年代末商品短缺的绝妙讽刺。

在邻国匈牙利，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科尔内在70年代末正在潜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短缺现象，短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正在确立。然而在波兰，一些学者正在做一种奇怪的学问。这些学者论证说：波兰存在的排队是一种"高水平"的排队，因为人们现在购买的是诸如洗衣机、电冰箱、建筑材料、电器、家具等商品。在他们看来，繁荣产生了排队。

盖莱克上台后曾向人民许愿：波兰人将拥有汽车。后来波兰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合作，在华沙和别尔斯克—比亚瓦生产两种不同型号的轿车。由于居民收入有所提高，加上放宽了对从事第二职业的限制，波兰人并不缺少现金。他们纷纷把积攒下来的钱用于买车，致使订单越来越多。到1987年春天，波兰人从登记买车到提货需要4年时间。住房短缺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许多结婚多年的青年找不到住房，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有房子的人则安享低房租的优越性。短缺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长时间的排队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且也使人产生精神上的焦虑与烦躁，产生了一种波兰社会学家所

称的“排队情绪”。

波兰人对于生活中的短缺日益失去耐心，但在生活中仍不乏幽默。一则来自克拉科夫的笑话是这样说的：

一位党的官员向一名工人解释下一个五年的计划的目标，他说：“同志，你第一年可以得到一双鞋，第二年得到一辆自行车，第三年得到一辆摩托车，第四年得到一辆汽车，第五年得到一架飞机。”

这名工人为之谔然，问道：“象我这样的普通公民要飞机干什么？”

“在肉类大涨价的时候，你可以迅速赶到华沙，排在队伍的第一个。”

8. 新权贵

一个波兰青年说：“每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时，总是使用‘从前’这个字眼，而当我们谈到共产主义时，总是用‘将来有一天’。”但是，对于波兰的权贵来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早已实现。

波兰有各种特供商店向高干供应商品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些商店，不仅可以买到国内短缺的商品，就连西方的高档消费品也应有尽有。

华沙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是经常接待外宾尤其是东欧各党代表团的地方。东欧各党代表团光顾总是受到良好的款待，筵席非常丰盛，甚至早餐都有若干道大菜。

在波兰，什么级别的官员乘什么样的汽车有严格规定。高级党政领导人大都喜欢乘坐豪华、舒适的西德奔驰汽车。只有在接待东德党政官员时，他们才不得不乘坐苏联轿车。

据1980年担任波兰最高监察委员会要职的一位官员透露，波兰省以上干部有新富翁800多人，其收入来源不得而知。

高级官员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情况触目惊心，令一般民众不敢想象。

盖莱克作为党的第一书记慷国家之慨，花费了7500万兹罗提（合200多万美元）在华沙郊区为自己兴建了一座豪华的私人别墅。他的妻子在巴黎出手大方，买首饰一次花了4万美元。

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什切潘斯基的个人爱好是审看各种各样的西方影片，但他更大的爱好是过皇帝般的生活。他拥有7辆小汽车，其中大多为西方名牌。他的另一爱好是打猎，每个周末他都与家人一起到16公顷大的私人牧场打猎，此外，他在国内外还拥有多处别墅。他居然还有3架专机，以应付繁忙的个人和“公务”活动。在他任职的八年内，他与外国公司签订了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合同，使国家蒙受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而他则收取了150万美元的贿赂。

1980年曝光的100多起贪污案件中，涉及到领导干部800多人。涉嫌贪污腐化丑闻的高级干部有第一书记盖莱克、总理雅罗谢维奇。按职位分，有3名中央书记、1位总理、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和副部长或同级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涉嫌政坛丑闻案。

这些人民的“公仆”，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胡作非为，作威作福，成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不可一世的权贵。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

四、凶猛的狂飙

1980年8月，烈日炎炎。一场来势凶猛的狂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了波兰，波兰再次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心。

1. 汽笛鸣响

1980年8月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响起了一阵阵汽笛鸣响声。参与罢工组织工作的瓦文萨等人对此心领神会，他们事先已

确定汽笛鸣响为罢工开始的信号。

早在7月1日，当政府宣布肉类涨价决定之后，卢布林、热舒夫等地就爆发了抗议活动。几年之内，罢工席卷了全国。官方电台作了闪烁其词的报道，称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停工”。格但斯克的工人一直在等待，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

8月14日早晨，列宁造船厂上班的工人在更衣室里发现了抗议厂方解雇瓦伦滕诺维奇的传单。传单写道：“我们呼吁你们来保护安娜·瓦伦滕维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你们中的许多人不久将陷入同样的困境。”传单的落款是“自由工会”筹委会及《沿海工人报》编辑部博鲁塞维奇、杜达一格维亚兹达、格维亚兹达。瓦伦滕诺维奇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船厂工作，她工作出色，曾获金质十字勋章。1968年，她因揭发一位工会干部挪用3000兹罗提的补助费购买彩票，差点被解雇。1978年，她与刚成立的沿海地区自由工会筹委会建立了联系，厂方为此不断给她小鞋穿。就在她再过5个月就要退休时，厂方把她解雇了，生效日期为1980年8月7日。

更衣室里几条标语赫然入目：“我们要求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涨价必须给予补贴。”更衣室外有人在散发传单，传单呼吁工人举行罢工。

10年前的流血冲突回想起来使人不寒而栗，面对罢工的呼吁更多的人在观望、犹豫。数十个工人打着横幅在厂内游行，引来了众多的围观者。游行的队伍由数十人增加到数百人，他们来到了大门口，向1970年遇难的工人默哀一分钟，并唱起了国歌“波兰没有灭亡……。”歌声低沉而悲壮。

船厂总经理格涅赫出现在工人面前，他说：“我们可以谈判，但用不着停止工作。请大家都回车间去。”工人对他的话反应冷淡。

“您认识我吗？我在船厂干了10年，可10年来我就是进不了厂，我失去了工作，可我感觉我还是个造船工人。这次，我留下不走了，我有工人的信任。”瓦文萨对格涅赫说。

瓦文萨感到宣布罢工的时机已经来到，便向人群高喊“我宣布实行占领性罢工！”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声。

罢工开始了，一切井然有序，以瓦文萨为首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这位经历了1970年事件的37岁的电工自我感觉良好，70年代的怯懦不复存在，他要鼓足勇气，奋力一搏了。

“有愿意参加罢工纠察队的人请到这儿报名。”一个青年工人高喊。人群中许多人开始向他那边涌动。转眼间，工厂内部各车间、门口和围墙外出现了许多戴有红色袖标的纠察队员。

罢工委员会也开始工作，与经理举行谈判。工人提出了如下条件：恢复瓦伦滕诺维奇和瓦文萨的工作；建立12月事件死难者纪念碑；每人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按民警条件提供家庭补贴；保证罢工组织者的安全。谈判的气氛并不好，一些工人对经理出言不逊，使他十分难堪。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工人们在车间里度过了罢工之后的第一夜。

第二天，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围墙上红白两色的国旗和白、蓝、白造船工人旗随风飘曳。围墙上写着醒目的标语“人民和造船工人在一起，造船工人和人民在一起！”、“站到我们中间来！、“给政治犯以自由！”、“造船工人不可侮！”、“人生而自由！”厂门外聚集了许多妇女，她们是工人家属，为亲人送来了食品和衣物。

与此同时，罢工委员会与厂方的谈判正在一座红色的砖楼里举行。厂方提出吸收各车间代表参加谈判，罢工委员会要求扩大有表决权的代表人数。罢工委员会又提出了自由选举工会的要求。罢工委员会与厂方代表唇枪舌剑，就工人提出的条件进行激烈辩论。各个大门都接通了广播喇叭，现场转播谈判的实况。谈判仍未达成任何协议。

2.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8 月 16 日劳保大厅内谈判仍在进行。谈判已就 12 月事件死难者纪念碑、恢复瓦文萨和瓦伦滕诺维奇的工作、自由选举工会等要求达成协议。目前正就提高工资问题进行讨论。

经理“工资问题，我保证按第五级标准处理。”

“我们只要每人 1500 兹罗提，不要什么级不级的。”

“我不能作出这样的承诺。我们尚没有计算出各类人员的数字。我们总得确定一定的原则……。”

这种持续的争论对于格涅赫经理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终于签字同意提高工资 1500 兹罗提。省委第一书记在电台宣布不对参加罢工的工人秋后算帐，但工人们仍心存疑虑。厂方与工人代表就工人不因参加罢工而受到追究而签署了保证书。

一切要求都已得到满足，瓦文萨得意扬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拿起话筒宣布：“我们胜利了！罢工已经结束，大家可以在下午 6 点前离开工厂。我将信守诺言，最后一个离开船厂。”

颇有几分得意的瓦文萨刚走出劳保大厅，就劈头盖脑挨了一顿臭骂：“笨蛋！你输了。”他尚未从胜利的陶醉中摆脱出来，便被浇了一身凉水，感到有些莫明其妙。

“你出去看看船厂发生了什么。广播喇叭被砍成碎片，电缆线被切断，到处都有你是叛徒、告密者的标语。你出去肯定会有人向你吐唾沫。”

“你们停止了罢工，我们这些小厂怎么办？还不是柿子专找软的捏。”一个小厂的代表有些愤愤不平。

“每人提高 1500 兹罗提，有你的份，别人有吗？”

“你们只为自己好，而对工人的利益麻木不仁。”

“费什巴赫的保证还不是一纸空文，波兰什么时候有过罢工权。”

瓦文萨如梦方醒，他感到当局看来很有些手腕，他们知道如何

各个击破。他深感懊悔，决心扭转颓势。

瓦文萨吩咐罢工委员会其他成员分别到各个大门劝阻准备离开的工人。瓦伦滕诺维奇来到了1号门，瓦文萨来到了2号门。

2号门前，瓦文萨站在了一辆电车上，向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发表讲话。他面对数百双充满疑虑和期待的眼睛，丝毫没有紧张的感觉。他口若悬河，神采飞扬，阐述继续罢工的理由。他从工人的反应中感受到了他和工人们心灵的沟通和默契。

他向人群呼吁："如果你们想继续罢工，那就继续罢工。我将与大家共同斗争？"

"我宣布罢工继续举行，我将最后一个离开船厂。"瓦文萨言语之间充满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努力终于成功了。

大门外一些"青年波兰运动"的成员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历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弊病。警察于下午6点将强行开进工厂的消息不胫而走，还有消息说军队将从海上攻打船厂。人们担心12月事件会重演。门外围观的群众逐渐散开，只有一些坚定分子在此守候。

港口、炼油厂、交通公司、公路运输公司、海洋电器厂等21个罢工单位的代表来到了大门口，一时冷落的大门口又热闹起来。格丁尼亚、什切青、埃尔布拉格等地罢工工人的代表也来到了造船厂。

瓦文萨："你们愿意保卫我们的事业吗？"

"愿意！"

"你们愿意坚决干到底，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吗？"

"愿意！"

3. 厂际罢工委员会

8月17日上午9点，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2号门前庄严肃穆。大门上方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柞木十字架，十字架上悬挂着红白两色花圈，十字架右侧是教皇保罗二世的画像。门前广场挤满了参加弥撒的人们，圣布列基达地区的神甫主持了弥撒仪式，虽然他事先受

到了一些官员的警告，但他还是决定来主持仪式。

巨大的十字架被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工人抬到了广场周围的一块草地上，这是1970年12月三个造船工人遇难的地方。遇难工人的家属睹物思情，不禁潸然泪下。

十字架被立在一个夜间准备好的架子上，神甫向十字架抛洒圣水，向唱起“波兰不会灭亡”的人群抛洒圣水。十字架前点燃了蜡烛，堆满了鲜花，人们的表情严肃而庄重……

这次非同寻常的弥撒使浓厚的宗教精神融入了罢工之中，来自外地的代表也深深地被弥撒的气氛所感染。

弥撒结束之后，劳保大厅举行了沿海地区罢工企业的代表参加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大会。瓦文萨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根据厂际罢工委员会第一号公报，工人将继续罢工，直到工人要求得到满足。厂际罢工委员会受权同中央谈判，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能宣布结束罢工。罢工结束后，厂际罢工委员会也不解散，它将监督要求的执行情况，并将筹组自由工会。

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之后，开始起草与政府谈判的条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了21项要求：

1. 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自由建立工会的第87号公约，成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2. 保障罢工权利，保障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不受惩罚。

3. 保障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结束对于独立的出版物的压制，保证群众性的传播工具向一切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团体的代表开放。

4. 恢复下列人员的原有权利：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因政见不同被开除的大学生；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一切因政见不同而实行的迫害。

5. 通过群众性的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

6. 采取以下有效措施引导国家摆脱危机：公开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情况；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 全体罢工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按休假办法发给并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

8. 将每个职工的月基本工资增加2000兹罗提，作为对迄今为止物价上涨的补偿。

9. 保证工资随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而自动相应的增加。

10. 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于多余部分。

11. 对肉制品实行（凭票）定量配给制（直到市场趋于稳定为止）

12. 取消政府批准的浮动价格，取消在特别的“外汇商店”用外币购买紧俏商品。

13. 实行按能力而不以党派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

14. 降低退休年龄。

15. 增加退休金。

16. 改善工作条件和卫生保健服务，对全体工人及其家属实行全部公费医疗制度。

17. 为参加工作妇女的孩子开设足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18. 实行三年带薪产假制。

19. 缩短等待住房的时间。

20. 出差补贴由40兹罗提增至100兹罗提，并增加夫妻两地分居补贴。

21. 所有星期六为公休日。对于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四班制职工所缺的星期六公休日，应以增加休假天数或用其他带薪休息日予以补偿。

上述要求成为与政府谈判的基础。

4. “大镰刀”佩卡

8月18日凌晨，沉睡的工人被飞机的轰鸣声惊醒，他们警觉地爬起来，在窗口张望。几架直升机在船厂上空超低空飞行，飞机不时抛撒传单。工厂内部也在散发格涅赫起草的传单，要求工人恢复工作。

上午，瓦文萨与格涅赫不期而遇。

“你写的呼吁书是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文件,但可惜没有签字。”

“是你们背信弃义，擅自撕毁了协议。现在已不是针对我了，而是一次团结罢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经理口中不经意说出的团结罢工却启迪了瓦文萨及其同事的思维，于是，后来成立的独立工会就被命名为团结工会。

罢工仍在继续，已有156家工厂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登记，许多工厂的工人在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和修建造船工人纪念碑捐款。列宁造船厂的广播在一遍又一遍播送厂际罢工委员会的通告，呼吁政府派人谈判。

波兰当局不得不有所反应。波党下发的一份材料历数自由工会的危害，认为自由工会有可能导致工会运动的分裂，使经济管理陷入瘫痪，不利于克服危机。盖莱克当晚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表示同意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对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并许诺对工会进行改革，举行秘密、民主不限候选人的自由选举。

深夜，格但斯克省委举行会议研商对策，出席的有副总理佩卡、卡尼亚和雅布翁斯基等。会议排除了以武力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指出当前的危机只能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会议成立了以佩卡为首的政府委员会。

佩卡15日就来到了格但斯克，直至19日才以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进行活动。这位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写过一本论述经济改革的

著作，与第一书记盖莱克过往甚密，是盖莱克的亲信。佩卡讲话坦率幽默，被公认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手。

波兰当局不愿与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宁愿与各工厂的罢工委员会谈判。佩卡秉承上边的旨意，在与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的问题上决不松口。19 日下午，他在省政府召集一些工厂的代表、厂长及书记举行座谈。晚上又与 19 家工厂的代表在省委大楼举行会谈。

晚上的会谈颇有戏剧性。佩卡在会谈一开始就自称“有政府、政治局和盖莱克本人授予的解决问题的全权”。

“副总理先生果真能解决问题吗?”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要是在华沙，人们会告诉你佩卡就是这样一把大镰刀，只要拿起来，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佩卡的能言善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仅几分钟双方对峙的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佩卡不断允诺：

“住房紧张，我们再建几个房屋工厂不就行了。”

“肉的供应不好，我们可以从欧共体进口。”

“关于书报检查制度，问题不在于书报检查，而在于出版物的质量。一些记者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报纸经常有盖莱克与膘肥肉壮的奶牛在一起的照片，好象我们这儿牛奶流成了河，其实我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黄油。”

……

尽管许多代表不断与他争论，但他还是掌握了会谈的主动。一旦他的观点遭到反驳，他便后退一步，以迎合代表的情绪。但他在原则问题上有理有节，寸步不让。

会谈持续到了清晨 6 点，双方正就协议的 12 点内容的措词进行修改，以交电视台播出。协议文本写成后，佩卡又补充了一句：“本协议交部长会议批准。”

“什么？不是你拥有全权吗?”

"这个请你们理解我，我仅是个副总理，不能绕过这个手续。"佩卡满脸堆笑。

"什么时间答复。"

"中午 11 点。"

下午 2 点多，答复来了。12 点协议中只有 3 条给予肯定：房屋工厂、进口肉以及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结束后可以活动。在其他问题上模棱两可。工人代表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下午 5 点多，佩卡与代表们再次见面。这次佩卡故伎重演，称这个好办那个也好办，此刻的佩卡再也不能在会谈中掌握主动权了，代表们将不满都发泄在他身上。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位"大镰刀"佩卡在起哄声中离开了会场。

21 日上午 10 点，佩卡登上了一架飞往华沙的飞机。他对送行的人说，他是怀着良好的愿望而来的，他选择了一种多多许愿的策略，以使罢工停止，然后再解决问题。但是他输了，输得如此之惨，他几乎是在一片嘈杂声中被轰出会场的，那种窘迫、狼狈使他难以忘却。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已来接替他，格但斯克看来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

佩卡走了，但参加与佩卡谈判的工人代表却受到了工人们的指责，工人们指责他们不能代表工人利益。与此同时，厂际罢工委员会仍在主宰罢工，甚至还管理着城市。格但斯克大多数工厂罢工，但动力、自来水、煤气、供应、医疗部门仍在坚持工作，这是瓦文萨决定的。

8 月 22 日，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登记的工厂已达 900 多个，全国各地的罢工工人代表团来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事实上已成为全国罢工的领导中心。

5. 格但斯克协议

8 月 23 日晚 8 点，雅盖尔斯基副总理率领的政府委员会代表团

乘坐的红色大轿车缓缓驶到了造船厂2号门前，愤怒的工人不断地用拳头敲打汽车。当雅盖尔斯基走下汽车时，便遭到工人的呵斥："滚开，给工人跪下！"这位经历过许多重大谈判的副总理此刻脸色苍白，表现出有节制的愠怒。进入厂区，沿途迎接他的是一张张冷峻沉着的脸。他深知这种谈判一定棘手、复杂、充满险情。他面对的不是温文尔雅的外交伙伴，而是争取自身权益的工人。

首次谈判双方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厂际罢工委员会将恢复格但斯克与全国的通讯联系视为政府有诚意的表现。

8月24日，厂际罢工委员会与专家委员会举行会晤。两天之前，马佐维耶茨基和盖莱梅克来到船厂，他们递交了64位知识分子的呼吁书，要求政府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呼吁双方选择一条妥协、谈判的道路。盖莱梅克建议组建专家委员会，马佐维耶茨基则授权组建专家委员会。

8月26日上午10点58分，政府代表团的轿车经过侧门进入列宁造船厂，会谈仍在劳保大厅举行。瓦文萨与雅盖尔斯基分别主持会谈。电视摄像机已经开动，这是一场实况转播的谈判。

"副总理先生，如您所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会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独立和真正自治的工会。我们并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也不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要成为工厂的主人。美好的诺言太多太多，我们已经听够了。我们不得不以罢工达到这一目的。"

"关于工会问题，中央全会已经研究过，对我们来说需要对工会活动进行根本的革新。工厂可以以民主、秘密的方式选举工会领导机构。如果你们的代表有威信，就一定会选进领导机构。另外，通过一个新的工会法也很有必要，法律可以规定停工的办法。"

瓦文萨："请听听我们的几位代表的看法。"

……

第二轮谈判结束了，雅盖尔斯基却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

知道如果允许成立自由工会，后果难以预料，因为社会主义世界尚未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反对肯定会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与冲突乃至流血。他原想革新工会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看来已不可行。如此重大的问题得向最高当局请示，当天他搭机回到了华沙。

8 月 27 日，造船厂流传着各种坏消息：有人说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的布道词遭到删改，昨晚电视台播放了维辛斯基的布道词，他呼吁理智、平静和劳动，他说："工厂必须开工。"雅盖尔斯基确实空手而归了，他在省委正在绞尽脑汁斟字酌句，以对焦虑等待的工人有个初步的交待。他知道这只能暂时缓和一下情绪，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雅盖尔斯基在电台的讲话和缓，很有分寸，对于罢工的工人丝毫没有敌意。

8 月 28 日，政府委员会与厂际罢工委员会再次举行谈判。双方就言论自由等问题举行了讨论，但是政府委员会在成立工会问题上仍无明确态度。厂际罢工委员会决定在政府委员会就此问题与最高当局取得一致之前不再举行会谈。专家委员会仍将继续工作。

8 月 29 日，政府委员会与厂际罢工委员会都在焦虑地等待最高当局的答复。

下午 4 点 35 分，据消息灵通人士称，当局已同意成立工会的要求，正在进行最后的修订。消息传开，工厂内一片沸腾，一些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

下午 6 点，华沙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当局不同意成立工会的要求。据说党组织正在开会，动员党员服从政治局的决定。波兰西部边界已经关闭。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工人高昂的情绪立刻降到了冰点。

工人们猜测晚间电视新闻一定有重大新闻，但晚间新闻并没有报道当局的反应，却报道了一个妇女哭哭啼啼诉说罢工给他们带来的苦恼，随后又播送了一条消息："策盖尔斯基五金工厂宣布举行 24 小时警告性罢工，呼吁双方在格但斯克达成协议；如果造船工人的

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策盖尔斯基工厂将再次罢工。”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使人迷惑，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晚8点，华沙传来了准确的消息：事情将在明天圆满解决。工人们为之欢呼雀跃。

8月30日上午10点37分，政府委员会与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与前几次谈判相比，谈判的气氛十分轻松。雅盖尔斯基赞赏厂际罢工委员会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波兰的联盟体系，瓦文萨在讨论中提出了“独立自治工会”的名称，这一提法被接受了。双方在第二项要求即保证罢工者的安全的问题也达成了协议。当双方代表团团长在第一项、第二项要求上签字，大厅里响起了一阵阵掌声。雅盖尔斯基因要参加中央全会离开了会议大厅，他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人们一起唱起了国歌。瓦文萨被激动的工人抬起，不断地抛向空中……。

21项协议就这样全部草签完毕，双方起草了联合公报。

格但斯克协议的签订，翻开了波兰历史新的一页。

6. 盖莱克下台

数月之前，第一书记盖莱克给前任哥穆尔卡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祝贺哥穆尔卡75岁诞辰。现在哥穆尔卡类似的噩运又降临到他的头上。

早在1976年工人抗议时他就感觉到他的政治地位摇摇欲坠，撤回涨价决定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1970年哥穆尔卡面临的是一群工人的孤立反抗，而1980年盖莱克面临的是得到知识分子支持的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教会也从政治生活的后台登上了前台，上台之初，盖莱克本来打算开个激流勇退的先例，但现在看来在劫难逃了。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0年前哥穆尔卡下台的情节再次重现。9月5日，中央全会解除了盖莱克的第一书记职务，由卡尼亚继任。

10年前愤怒的工人把哥穆尔卡推下了政治舞台，如今盖莱克又重蹈覆辙，栽在了工人的手中。他心情抑郁，想起了1978年红衣主教对他的警告："你必须改变信仰，改变自己，否则会身败名裂，会被砸成齑粉，彻底失败。"

7. 诱惑与挑战

格但斯克协议签订后，工人们于9月1日复工，波兰又恢复了平静。但是，新崛起的独立工会领袖瓦文萨则面临着新的诱惑与挑战。

官方的工会中央理事会向瓦文萨提出了担任该组织要职的建议，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高招，既可以提供肥缺稳住瓦文萨，又可以将独立工会纳入官方工会的轨道之内。瓦文萨拒绝了这一建议。

独立工会内部也有人压瓦文萨辞职。瓦伦滕诺维奇建议瓦文萨辞去罢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格维亚兹达、库龙或莫泽莱夫斯基担任。她认为瓦文萨过于软弱无力，不能胜任独立工会的领导工作。瓦文萨对此也加以婉拒。

瓦文萨在独立工会中属温和派，在与当局的谈判中进退有节，讲求策略。他以打网球、台球为例，说明运用策略的重要性。他认为，你不可能总靠直线大力击球得分。有时你得靠技巧，甚至要耍些花招，才会达到目的。如果你打出一个旋转球，球的路线并不是最短的，但它能够落在得分的位置。他坦率地承认独立工会在格但斯克协议中并未达到全部目的，但是已取得了目前情况下有可能取得的一切。

独立工会内部一种激进的情绪正在滋长，激进派要求不失时机地不妥协地反对政府，一些会员也决定对得罪过他们的官员进行秋后算帐。有人甚至提出了将独立工会发展为政党的建议。瓦文萨深知，不妥协的对抗，无休止的报复只会导致羽毛未丰的独立工会的夭折。独立工会争取的是政府的内部变革，政党政治不是其兴趣所

在。

独立工会面临的另一个选择是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还是一个地方性的工会。华沙的奥尔谢夫斯基主张以全国性统一工会的名义到法院注册，瓦文萨则倾向于建立一个巩固的地方工会组织。一些外地的独立工会受到了当局的不公平对待，他们开玩笑说波兰已分为自由区和占领区。他们要求成立全国性的工全，以保护其利益。有人建议各地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以团结工会的名义到法院注册，否则会被各个打破。瓦文萨采纳了这一建议。

随后专家小组紧锣密鼓进行章程起草工作。9 月 22 日，全国各地 36 个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会议，宣布团结工会成立，并通过了章程，瓦文萨当选为全国协商委员会主席。

8. "出生证"风波

团结工会诞生后，便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出生证"风波。

1980 年 9 月 24 日，团结工会代表正式向华沙法院提出了注册成立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的申请。华沙省法院对团结工会的章程提出异议，法院要求增补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内容，删除罢工权利的规定，取消有关限制党组织领导人担任工会干部的规定。团结工会拒绝修改章程，认为增加党的领导作用的规定将抹煞工会的非政治性质。10 月 24 日，华沙省法院同意团结工会登记注册，但对章程作了修改。章程增加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以及罢工只能作为最后手段等内容。团结工会对法院擅自修改章程大为光火，提出抗议。团结工会在一项声明中指出团结工会将按未修改的章程行事，同时将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11 月 9 日，团结工会作出了最强烈的反应，威胁如果最高法院不删去华沙法院强加的条款，团结工会将于 12 日举行总罢工。与此同时，政府与团结工会展开了艰难的谈判。这是一场两个阵营、两种语言的艰难对话。最后双方以互相妥协结束争执。10 日，最高法

院撤销了华沙省法院对于团结工会章程的修改意见，团结工会在工会章程的附件中加入了党的领导等条款，团结工会获准登记。瓦文萨的温和路线再次占了上风，结束了一触即发的“出生证”风波。

当晚，华沙大剧院座无虚席，团结工会在这里举行音乐会，庆祝团结工会注册。观众情绪激昂，齐声高唱爱国歌曲“让波兰重新成为波兰……。”

团结工会注册之后，到1980年底，工会会员已达到1000万人，官方的国际通讯社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它在职工中深得人心。”而官方工会江河日下，难以维持。

9. 不安的老大哥

苏联对于自己后院发生的事情异常敏感，担心波兰越烧越旺的火会烧到自己身上。苏联的报刊8月只刊登塔斯社的消息，不发表评论。9月份则开始发表评论，《真理报》的署名文章认为波兰的工人运动是反革命分子与西方反动的波兰侨民及其颠覆中心的联合行动。《劳动报》则指责团结工会具有反社会主义倾向。

10月，苏联报刊引用东欧党的首脑的看法，表明对于波兰团结工会的不安。

齐奥塞斯库：团结工会成立表明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正在波兰积极活动。

胡萨克：团结工会成立是社会主义敌人的危险的挑衅行为。

昂纳克：对于人民波兰的命运不能无动于衷。

正当团结工会就注册风波扬言举行罢工时，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在会见意大利外长时明确表示：如果波兰举行总罢工，苏军准备进入波兰恢复秩序。12月7日，美国间谍卫星提供的照片显示，一个苏联空降师已经到达波兰，来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表明苏联打算当晚对波兰动武。美国总统卡特亲自与勃列日涅夫进行热线联系，警告苏联如出兵波兰将会受到比入侵阿富汗更严重的经济制裁。苏联

被迫取消了这一决定。

波兰官方对于苏联的不安不会置若罔闻。1981 年 2 月波党举行中央全会，建议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取代平科夫斯基担任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出任总理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苏联，另一方面也表明波兰政府决心恢复秩序与安定。雅鲁泽尔斯基就职后指责可恶的政治势力试图将团结工会的部分环节引导到错误的、无政府主义的、背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同时呼吁全国保持 90 天的安定，停止一切罢工行动。

10. 比得哥什事件

1981 年 3 月比得哥什事件表明团结工会合法化后的政治格局是多么的脆弱。

3 月 19 日，比得哥什省人民代表会议举行会议。会前邀请 5 名团结工会成员列席，但团结工会实际上来了 40 多人。如此多的不速之客光临会议使人民代表会议领导人感到不快，代表们以惊奇的眼神打量这些不速之客。

正当会议开始讨论国民经济问题时，主持会议的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突然以材料准备不足为由宣布休会。团结工会对于列入议程的国民经济问题和独立农会合法化问题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感到恼怒，决定呆在会场，起草抗议声明。一位副省长和一位副检察长喝令他们退场，并指责他们赖着不走就是占领性行动。团结工会会员毫不示弱，继续在会场中起草声明。

200 多个未带武器的警察和便衣突然闯入会场，他们二话没说就连推带拉，把工会会员推到墙角和走廊。双方在走廊里发生争执和冲突，团结工会比得哥什分会主席鲁韦夫斯基首先被击倒在地。工人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鲁韦夫斯基等三个被打成重伤，还有多人受了轻伤。

事件发生后，团结工会决定取消与当局的谈判，并宣布全国处

于罢工准备状态。当天，华沙、托伦、什切青、比得哥什发生警告性罢工。瓦文萨亲自出面，到现场了解情况。各地工会举行集会，要求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

政府方面也极为重视，先后派出副检察长和司法部长前去调查。政府发言人也呼吁进行对话。但是22日的政治局会议的公报称警察是执行上级命令，并不违法。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对抗的局面再次形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代表团与以拉科夫斯基为首的政府工会委员会于22日在华沙举行37小时的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23—24日，团结工会在比得哥什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在这次会议上，激进派占了上风，会议决定27日举行全国警告性罢工，31日举行全国总罢工；如果当局实行紧急状态，将立即举行全国性总罢工。瓦文萨则主张谨慎行事，反对举行总罢工。但他的建议未被接受，瓦文萨一气之下摔门而去。这次会议还提出了25日的谈判要求：查明真相，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承认个体农民建立工会的权利；保证工会活动和会员的安全；释放政治犯。会上选出了全国罢工委员会，并表示如果会谈成功就取消罢工计划。

不出人们所料，25日的会谈没有任何进展。27日，数百万工人举行了4小时警告性罢工，这是波兰战后第一次全国性罢工。28日双方又举行了会谈，瓦文萨希望避免31日的罢工，拉科夫斯基承认政府对当前的局势负有大部分责任，但不能说一切过错都在政府方面。3月30日，团结工会与政府终于达成了协议，政府承认比得哥什省驱赶团结工会的做法违反了以政治方式解决冲突的原则；表示要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同时指出，一切团体不能以占领公共建筑物之类的非法行动来破坏社会治安。这个协定实际上是对双方各打50大板，双方都不失面子作了让步。3月31日，团结工会取消了总罢工的决议，随后又取消了罢工戒备状态。理智战胜了冲动，一场政治危机在即将爆发前避免了。

比得哥什事件发生时，华沙各国在库利科夫元帅的指挥下正在波兰举行“联盟—81”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从3月17日开始，原定1周时间，但后来一直持续到4月7日。炮火连天的演习场面不断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引人注意的是演习的消息往往安排在罢工消息之后。西方观察家认为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一次苏联武力干涉波兰的预演。在演习的同时，苏联军队在波兰境内及其周围地区集结，西方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好在苏联没有轻举妄动。

11. 瓦文萨漫游世界

1981年，尽管波兰国内局势险情不绝，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还是不时出国旅行。梵蒂冈、法国、日本、瑞士、瑞典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他都成为各国记者“地毯式轰炸”的对象，他们试图从共产党国家第一个独立工会领袖的言谈中获取波兰未来发展的信息。

梵蒂冈：“朝圣之旅”

在1980年8月那段紧张和令人不安的日子里，瓦文萨抱定一个信念：一旦独立工会合法化，他将去拜访教皇，聆听教皇的教诲。1981年1月，应意大利三大工会之邀，瓦文萨全家访问了意大利。

在罗马市中心的梵蒂冈，瓦文萨全家与教皇一起度过了美好时光：他们一起作弥撒，共进早餐……。教皇的仁慈宽容使瓦文萨倍受感动，更使他难忘的是教皇公开表达的对于团结工会的坚定支持：

“你们1980年8月在波兰沿海地区和其他大工业中心所开展的冒险事业是人们普遍要求促进社会道德利益的情不自禁的行动。如果没有这种行动，就谈不上真正的进步；波兰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要求得到进步的权利……。”

日本：“寓言式的国家”

应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邀请，瓦文萨率领工会代表团于5月9日开始访问日本。对瓦文萨来说，日本就犹如一个“寓言式的国

家”，日本用了20年的时间跻身于世界工业强国之列，令世人刮目相看。

瓦文萨的日本之行日程繁忙，但令他尴尬的是，日本政界的一些领导人竟向他许诺要给波兰经济援助，好象瓦文萨就是政府首脑似的。

13日午夜，正在长崎访问的瓦文萨，惊悉教皇不幸遇难的消息后，悲痛欲绝。随后又传来了教皇未死但生命垂危的消息。瓦文萨感到极为孤独，似乎整个世界将要倾覆。对他来说，教皇的不幸也是团结工会的不幸。教皇脱险的消息使他的心情略为平静下来。

瑞典“一切奖都愿领”

瓦文萨于5月21日来到瑞典，参加社民党《劳动报》颁发的“让我们说话”奖金。这个北欧福利国家的繁荣使他目不暇接，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而他的祖国仍在贫困中挣扎，这种巨大的反差刺痛了他的自尊心。

在颁奖仪式上，一个记者单刀直入，问瓦文萨：“如果苏联政府向你授奖，你是不是接受？“我对一切奖都愿领。”瓦文萨欣然作答。

瑞士：凡心不泯

瓦文萨6月到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年会，他是出席该组织年会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独立工会的代表。他在这里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并在会上致词。

会议代表中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引起了他的注意。每当拍照时，瓦文萨总是请这位女士站在身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瓦文萨也不例外。

法国：马拉松式的访问

应法国五个工会组织之邀，瓦文萨10月访问了法国。其间，瓦文萨与法国劳动同盟、法国总工会等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法国外长、总理及巴黎市长亲自与瓦文萨会谈，以了解团结工会对波兰的潜在影响。

尽管访问行程十分紧凑，瓦文萨还是坚持每天早晨到波兰人的教堂作弥撒。这令旅法波兰人深为感动。

国外之行为瓦文萨提供了放眼看世界的机会，使他能从更广泛的国际意义上理解波兰正在发生的变化。

12. 难以弥合的裂痕

1981年5月30日，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的葬礼隆重举行，瓦文萨神情庄重，面带忧伤，为这位团结工会的坚定支持者送行。去年9月与维辛斯基的会面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维辛斯基像父母拥抱忏悔的儿子那样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告诉他真正的当务之急是人自身的新生。主教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使瓦文萨感到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上的相通，如今，故人已去，风物依然，等待瓦文萨的又是何种挑战呢？

3月份以来，团结工会与政府的裂痕逐渐扩大。6月，官方的宣传工具对团结工会发起了宣传攻势，指责团结工会企图夺取政权。苏共中央致波党的一封信措辞严厉，咄咄逼人。信中说："社会主义的敌人正在进行夺权斗争，并已经在得到政权。阵地一个接一个转入他们的控制之下。反革命正在把团结工会的极端一翼作为打击力量加以使用，蒙骗那些加入工会的工人参与反对人民政权的阴谋。"这封信事实上发出了最后通牒，敦促波党力挽狂澜，拯救社会主义。雅鲁泽尔斯基总理也作出了强烈警告：波兰不存在交权问题，政府准备以宪法捍卫政权。这种宣传攻势对团结工会形成了巨大压力。

8月19日，波兰大部分地区看不到一份报纸，这在战后历史上尚属首次。其实，这是团结工会为分享舆论工具而发动的"全国无报日"抗议活动。瓦文萨预言团结工会与政府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对抗。近几个月来，面对全国无数次规模不等的罢工，瓦文萨四处奔波，前去"灭火"。政府指责他不能控制全国的局势，团结工会内部的激进派攻击他软弱无力，瓦文萨处于两面受气的境地。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举世瞩目的团结工会一大于9月在格但斯克举行。

第一阶段会议是在乱哄哄的气氛下举行的。瓦文萨身为团结工会主席，却对提交大会的长篇纲领性建议一无所知。他建议第一阶段讨论职务分配，第二阶段讨论具体计划，但未被采纳。在会议讨论中，库龙率先发难。他指出共产党不能垄断政权，呼吁举行自由选举，并提议在选举前由波党、教会和团结工会组成“全国联合阵线”掌握政权。一些代表主张工会建立电台和电视台，建议将团结工会改组为政党。会上代表们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这次为期6天的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工人自治、对舆论工具实行监督、自由选举、释放政治犯等要求，温和派与激进派都作了妥协。

第一阶段会议之后，波党政治局严厉谴责了团结工会背弃格但斯克协议，企图夺权和改变波兰的社会制度。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要求波兰政府采取果断行动，制止恶毒的反苏宣传和敌对苏联的行径，捍卫危机中的社会主义。雅鲁泽尔斯基总理表示已准备采取强硬措施保卫社会主义，同时希望团结工会回心转意，改弦易辙。波兰议会也呼吁团结工会与政府举行建设性合作。波兰记协主席布拉特科夫斯基等35名学者、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呼吁双方立即开始谈判，并强调波兰人能够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在紧张的气氛下，团结工会一大第二阶段会议于9月26日——10月2日举行。温和派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主席。大会通过的纲领回避“社会主义”一词，同时出现了自治共和国、自由选举和多党制的提法。瓦文萨提出的政府、教会和团结工会签定一项协议的建议未被接受。

国内危机的加剧使波兰高层发生了政治地震。10月16——18日举行的中央全会接受了卡尼亚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的请求，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一方面指出波党已无路可退，另一方面又强调继续奉行协商和革新路线。雅鲁泽尔斯基集党政军

大权于一身，作好了应付一切不测事件的准备。

一年之前，团结政府与政府走上了合作之路，一年之后双方又走到了对抗的门槛，决裂只是时间问题。

13. 最后摊牌

雅鲁泽尔斯基与红衣主教格莱姆普和瓦文萨 11 月 4 日的会晤看来是双方最后一次努力了。在会谈中，雅鲁泽尔斯基提出了成立“民族协商阵线”的建议，该阵线由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团结工会、行业工会、教会、学术界各 1 名代表组成。瓦文萨不赞成这个建议，因为团结工会仅拥有 1/7 的表决权，而在他的建议中团结工会则有 1/3 的表决权。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瓦文萨愤愤不平地离开了会场。

情况紧急，面对一天天恶化的局势，团结工会决定在拉多姆召开各省工会主席会议。

12 月 2 日，瓦文萨在下榻的索莱茨旅馆接待了政府代表工务事务部长乔塞克。乔塞克情绪异常，谈兴很浓，不断东拉西扯。劳累了一天的瓦文萨十分疲倦，但乔塞克仍在滔滔不绝，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奉陪。谈话中间，乔塞克起身去接电话时，瓦文萨发现乔塞克的椅子上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不惜一切把瓦文萨拖在旅馆里”。是乔塞克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瓦文萨在进行猜测。乔塞克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再没有回来，瓦文萨疑虑重重。紧急状态已喊了几句，莫非真要动手了……。

瓦文萨并不知道，当天在华沙消防干部学校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为抗议当局将学校划归内务部管辖。数百名学生举行了罢课，并在校园内举行示威。特种警察部队动用了坦克和直升机对示威的学生进行了出其不意的袭击，强行将示威者驱散。当局炫耀武力是杀鸡给猴看。这次动武不过是行动之前的一次彩排，也是对团结工会的严重警告。

第二天，团结工会在拉多姆召开紧急会议。华沙发生的事使代表们深感震惊，他们情绪激愤，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瓦文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么采取强硬态度，要么采取温和态度。他知道当局已选择了对抗之路，动手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他退却，团结工会的同事们将把他视为关键时刻背叛工会的叛徒，而且诞生不久的工会将会在关键时刻陷入分裂，从而面临灭顶之灾。权衡一番之后，他作出了选择：采取最为强硬的态度，虽然这不是他的初衷。

瓦文萨在会上慷慨陈词："对抗不可避免，对抗是要发生的。该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了。我是想在差不多所有社会团体都站在我们一边的时候，自然地走向这一对抗……看来我们想错了，因为我曾想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到那时我们既要推翻这些议会，也要推翻这些委员会等等。看来，继续执行这一策略已经寸步难行了。我们在选择一条道路，以便闪电般地开展一个运动。或者同我一道，或者在没有我的情况下……。"

这是团结工会迄今为止言辞最为激烈的一次会议。

12 月 12 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举行秘密会议。代表们情绪比拉多姆会议有过之而不及。一位代表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应该说，我们想夺权！想夺权！"布雅克声嘶力竭地说："在对抗中被击溃的应是当局，而不是工会。我们应积极拿起罢工这一不受监督的武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就当局的执政方式举行全民公决，决定一旦当局采取非常措施，将举行总罢工。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

零点左右，格但斯克与全国的通讯联系突然中断。瓦文萨以平静的口气把这一不祥的消息通知与会代表，并劝大家保持镇静。这时外边下起了鹅毛大雪，街头上闪烁的路灯宛如一个个幽灵游荡在这寂静的都市。

14. “乌鸦”来了

12 月 13 日早晨 6 点，一位戴着深色眼镜、身着戎装的将军庄重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就是大名鼎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雅鲁泽尔斯基，他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向波兰、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

“我宣布从今天起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

“根据宪法规定，从今天午夜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雅鲁泽尔斯基讲话之前，电视台播放了波兰国歌。他的讲话最后引用了一句名言：“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灭亡。”

电台、电视台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播送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各种通告和规定，如实行宵禁、暂停旅行、中断通讯联系、禁止集会、游行示威、禁止文艺演出、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禁止言论自由，暂停一切报刊出版、减少电台、电视台节目、解散议会、禁止工会等协会活动、大中学校停课、对企业实行军管、冻结银行的全部存款等等。

波兰与外部世界的通讯联系全部中断。

盖莱克、雅罗谢维奇等民愤极大的党政高级官员遭到拘禁。

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被捕。午夜时分，参加格但斯克会议的大部分团结工会领导成员被捕。

团结工会的顾问们也相继被送进监狱。

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坦克、装甲车开始在街上巡逻。

民警已开进列宁造船厂，逮捕了守护大门的工人，将国旗和花束撕得粉碎。

占领矿井的西里西亚武耶克煤矿工人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

团结工会的同情者在全国各地举行罢工，群龙无首使他们悲观

绝望，无所适从，人们在大街上高喊："乌鸦来了！"（在波兰文中救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与乌鸦一词相同）……。

被愤怒的群众讽刺为"穿着波兰军服的苏联将军"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则感到十分委屈与冤枉。早在5月6日，昂纳克与勃列日涅夫和胡萨克的会晤中就已提出波兰应实行战时状态。6月，苏联试图改组波兰领导机构，后来又是以不间断的警告、最后通牒式的公开信施加压力。华沙部队在不断调动，苏联军队不断在边境地区耀武扬威。更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不能容忍的是他曾被绑架到苏联的布列斯塔，就华约出兵还是自己实行军管进行最后的选择。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深知如果华沙出兵，类似匈牙利1956年的悲剧就会重演。好兵帅克的故乡在1968年尚对苏军入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更何况桀骜不驯的波兰人呢？

五、沉重的十字架

十字架不仅记载着耶稣的受难，而且也记载着波兰充满曲折的历史。

1. 不死的上帝

波兰国家的产生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966年，波兰大公梅什科一世与信奉天主教的波希米亚公主联姻，皈依罗马天主教，并在全国推广，从此波兰被纳入了基督文明的轨道。这一时期也正是波兰国家诞生的时期。梅什科一世与儿子鲍莱斯瓦夫一世在诸国争雄的战争中，以宗教保卫民族，又以民族来推广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精神融为一体。波兰在历史上虽然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三次瓜分，亡国达150年之久，但由于天主教的不断斗争才

使波兰民族及其文化幸存下来。

二战后，宗教这种被称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并未由于新制度的建立而消声匿迹。天主教会在波兰深入人心，约有97%的波兰人信奉天主教，其中90%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种统治人类1900多年的宗教渗透于波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出生、死亡、结婚、节日无不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波兰国内教堂林立，全国有1万多座教堂，平均每2500人就有一座。天主教有3所大学、30多家出版社和90多种刊物。绝大多数波党党员也是天主教徒，他们生活在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双重世界之中。一位波党高层人士曾指出：“我们统治着国家，而教会则掌握着人们的灵魂。”

2. 波兰的教皇

1978年10月16日，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正在举行神圣的教皇选举。在前五轮投票中，群雄逐鹿，相持不下。由于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施加影响，自第6轮投票起，克拉科夫主教沃伊蒂瓦票数大增，到第八轮投票，沃伊蒂瓦已稳操胜券，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个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一位主教这样评述这个事件：“一个来自前线的人当上了总司令。”一位作家将沃伊蒂瓦称为“从共产主义国家中涌现出来的精神领袖。”此后沃伊蒂瓦的名字逐渐被人忘却，人们熟知的另一个名字是约翰·保罗二世。

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荣归故里，受到了教徒们的热情欢迎。在华沙，教皇举行了露天弥撒，数百万人凝神屏息，聆听教皇的声音，渴望教皇指点迷津。

1983年6月，在实行军管的情况下教皇回国访问，参加琴斯托霍瓦市光明山圣母像在波供奉600周年大典。教皇的访问日程繁忙，不断参加各种宗教活动。6月19日，圣母像供奉600周年大典把活动推向了高潮。在晚上举行的大祷告上，保罗二世将1981年遇刺时

被子弹射穿的一条法衣腰带献给光明山教堂。在卡托维兹，数万工人冒着倾盆大雨参加教皇主持的弥撒，他在讲话中指出："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们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在克拉科夫，教皇还会见了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表示了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他还与雅鲁泽尔斯基举行了两次会谈，讨论了国内局势。教皇表示了对受监禁的受苦役的人的关怀，在他看来，拯救"精神上的沦陷区"是他的责任所在。这次参加教皇主持的宗教活动的人数多达665万。这次访问之后，政府取消了军管，团结工会开始恢复活动。

1987年6月，教皇再次访问波兰。瓦文萨当时说："教皇的第三次来访是团结工会取得成就阶段的预兆。"瓦文萨的预言后来成了现实。两年之后团结工会东山再起，重返政坛。

教皇的三次波兰之行与团结工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3. 铁血主教

红衣主教维辛斯基是教会中的铁腕人物。50年代初期曾身陷囹圄，1970年事件后不再沉默，指出一个政府不可能以工人的血赢得光荣。他并不讳言反对"共产主义与教会争雄，""毫不妥协地反对马列哲学，"并呼吁成立天主教组织、协会，发行天主教报纸。他认为，"一旦波兰实现宗教化，共产主义会自动垮台。他将波兰领导人视为"寄生品""傀儡"，但他又对这些"上帝可怜的孩子"表示同情。约翰·保罗二世对他更是感恩不尽，曾对他说："如果没有您，就不会出现波兰的教皇。"1980年工潮之后，维辛斯基多次在团结工会和政府之间斡旋，呼吁双方对话。他告诫瓦文萨"鲁莽不是有力量的表现，""要集中照顾工人的利益，不要屈从于政治诱惑。"维辛斯基十分重视朝拜圣母像运动，将天主教的希望寄托在朝拜圣母像运动上。1981年维辛斯基逝世，格莱姆普继任红衣主教。格莱姆普为人爽直，平易近人，也是团结工会的坚定支持者。他以1970年的教训告诫团结工会克制、明智和谨慎。在他看来，如果共产党乱了，

国家就混乱不堪，如果共产党能控制局势，苏联就不会干涉。重要的不是谁统治波兰，而是波兰的存在。格莱姆普主教在使团结工会东山再起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4. 倾斜的十字架

在1980年的工潮中，十字架不仅是宗教精神的象征，也是进行斗争的武器。在政府与团结工会的较量中，十字架不再不偏不倚，而是倾向团结工会。

每年的8月15日是天主教的重要节日——圣母升天节。这一天数十万人来到光明山朝圣。来自华沙的队伍步行一周，行程260公里，前来朝圣。朝圣者中有老有少，其中青年男女最为活跃。自1980年以来，朝圣节上出现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标语：

“勿忘12月13日”

“团结必胜”

“团结与玛丽亚在一起！”

……

1981年12月13日之后，波兰各地的教堂里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地上出现了用枞树、松柏枝、鲜花编成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有教皇和瓦文萨的照片，十字架周围摆放着蜡烛、油灯。

教堂也成为团结工会特殊的庇护地；团结工会会员利用宗教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或在宗教活动之后举行示威。

1983年8月14日，瓦文萨与数百名工人参加格但斯克圣布里吉德教堂举行的弥撒。弥撒结束后，人们涌向1970年死难工人纪念碑，并高喊“恢复团结工会”等口号。

1985年8月31日，华沙科斯特卡教堂举行仪式，约3000人出席，教堂里出现了支持团结工会的标语。这一天适逢团结工会成立5周年。

……

诸如此类的活动每年都有。

5. 自由的神坛

天主教会在波兰享有独特的地位，宗教自由得到了保障。神甫的布道并不仅限于宗教领域，政治问题也是他们谈话的话题。

以下就是一些神甫的布道词摘录：

“战后时期是一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建立邪恶的垄断统治，并把上帝从孩子们幼小心灵中夺走的时期。”

——波比耶乌什科神甫，1984 年

“象我们这样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不成其为政府，反对派的强大不可避免。”

“我们将用我们的念珠把俄国占领者赶出去。”

——扬科夫斯基神甫，1986 年

……

神甫的布道毫不掩饰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敌视，也毫不讳言他们对于团结工会的支持。团结工会之所以能重振旗鼓，教会帮忙不小。

六、看不见的战线

波兰作为东西方的走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后波兰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未停止对波兰的渗透。西方的战略家希望在波兰打入一个楔子，以促进东欧的自由化。1980 年波兰风起云涌的工潮为苏联的竞争对手美国提供了天赐良机。美国高层的战略家明白，如果波兰的变化持续下去，民主这种传染病会在苏联各个卫星国传播开来，最后将会威胁到苏联本身。苏联领

导人对此也心领神会，时刻提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1. 没有硝烟的战争

美国一向利用提供武器、雇佣兵和军事顾问等手段在国外进行活动，但是在东欧问题上异常谨慎。美国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恣意妄为只会导致美苏两国对抗的升级，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进行一场不动真枪真炮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里根总统执政后，制定了一项旨在造成苏联经济崩溃、破坏苏联同其卫星国关系以及迫使苏联帝国内部改革的战略。这项战略包括五个部分：

1. 加强美国的防务力量，迫使苏联与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竞争，以便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2. 进行秘密活动，鼓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改革运动；

3. 向华沙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应视各国保护人权和进行政治改革和自由市场改革的情况区别对待。

4. 经济上孤立苏联，不让苏联获得西方技术；

5. 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广播，向东欧传播美国政府的信息。

1982 年 5 月，里根总统又签署了一份秘密的国家安全指令，授权采取经济、外交和秘密活动措施以"抵销苏联为维持对东欧控制所作的努力。"这项指令的目的是通过宣传、向团结工会提供援助、维护人权、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上孤立波兰政权等途径造成波兰政府的不稳定。

2. 天将降斯人于大任

1981 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遭到枪手的射击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世界。时隔数月，里根总统遭到了美国影星福斯特的狂热崇拜者

欣克利的射击。教皇与里根都幸免于难，上帝将要交给他们什么特别的使命呢？

里根总统对于波兰出现团结工会十分感兴趣，早在竞选期间，他就接见了瓦文萨移居美国的义父，以示对团结工会的支持。里根认为共产主义世界中第一个独立工会的诞生无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世界出现了演变的希望。对于教皇来说，对于自己祖国的关心压倒了一切。东西欧的分裂以及共产党的统治是他不愿接受的现实。里根与教皇在波兰问题上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都确信：一个自由的、非共产党的波兰，是插入苏联集团的利剑；如果波兰成为民主国家，其他东欧国家也会随之演变。他们意识到在波兰事务上双方联手合作，可以有所作为。

1982 年 6 月 7 日美国总统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图书馆举行会晤，他们集中讨论了波兰以及苏联对东欧的控制问题。双方在开展秘密活动加速共产党集团的瓦解上达成了默契。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宣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联盟。”

3. “神圣同盟”

里根与教皇的合作在波兰实行军管时就已开始。里根在宣布制裁波兰的一揽子措施之前，曾打电话听取教皇的意见。里根还任命布什为评估波兰危机的“特别形势小组”组长，成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等人。早在军管之前，美国就已掌握了波兰军管的消息，11 月叛逃美国的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就是军管行动的知情人，他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相关的情报。美国对这些事未加声张，因为美国宁愿看到波兰人军管，也不愿看到苏联的入侵。库克林斯基提供的情报在军管后迅速传给了教皇。

无奈波兰与外部世界的通讯联系业已中断，教皇只得通过无线电与红衣主教格莱姆普保持联系。他建议团结工会转入地下，团结工会会员不要上街，以免华约出兵或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团结工

会听信了教皇的劝告，因而没有酿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教皇与里根在会晤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双方联手动摇波兰政府，并使军管后被宣布为非法的团结工会保持活力，就可以使波兰脱离苏联集团。共同的事业将里根与教皇联系起来，展开了针对波兰的秘密行动。美国政府参与该计划的有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务卿黑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美驻梵蒂冈大使威尔逊等人。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向团结工会提供援助和实行制裁的决定是由里根与教皇磋商后作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经济制裁计划，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特遣任务的部门采取行动配合，向团结工会提供金钱，设备，以使其快速恢复活力。教皇经常会见美国官员讨论波兰局势，并给里根带回信件和口信。中央情报局与教皇定期交换情报，互通信息。黑格任命的无任所大使沃尔特斯穿梭于华盛顿、梵蒂冈之间，传递各种信息。

里根与教皇主持下的一个秘密系统源源不断地向团结工会提供物质支持和各种建议。

成吨成吨的设备——传真机、发报机、印刷机、短波电台、电话、摄像机、复印机、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等通过教会、美国特工人员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代表所建立起来的各种渠道偷运进波兰。给团结工会的钱是由中央情报局基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梵蒂冈的秘密帐号以及西方各国工会提供的。

里根和教皇还通过教会人士以及欧洲的劳工专家对团结工会进行战略指导。美国驻波兰使馆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据点，一些具有外交身份的人员进进出出……

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成了国际情报交换站，梵蒂冈的代表、中央情报局人员、劳联产联的代表、社会党国际的代表以及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代表都在这里碰头。团结工会向他们介绍情况，并列出所需物资的清单。

教会代表、劳工组织的代表和情报人员在波兰频繁活动。神甫

在教会秘密稳藏的团结工会人士之间互相传递信息。格但斯克等港口与团结工会合作的码头工人将偷运进来的设备卸下，然后由团结工会的同情者运往指定地点。

正是由于里根与教皇的支持，团结工会在被宣布非法之后才未被摧毁。

七、漫长的七年

1982—1989年，无论对于团结工会还是对于政府来说都是漫长的七年。

在历史上，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打赢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开始改革时，生活在俄国占领之下的波兰人兴高采烈。他们以为俄国的改革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自由，一些波兰贵族前往圣彼得堡赞美沙皇，沙皇的回答是"别做梦。"1985年，历史出现了转折。在苏联帝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又有一位新主人入主，他就是通过民主化、公开化将苏联从夜郎自大的沉睡中唤醒，同时又被民主化和公开化所释放出的力量所吞没的戈尔巴乔夫。此时的苏联已不再是东欧改革的障碍，戈尔巴乔夫迫切希望通过东欧的改革促进其国内的变革。与此同时，美国与梵蒂冈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着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波兰这七年的变化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1. "流放的国王"

1981年12月13日凌晨5时，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和省委书记菲什巴赫和几位手持铁棍的警察进入了瓦文萨的住所。几分钟之后瓦文萨被押上了一辆汽车。汽车向机场方向急驶而去。早已习惯此景的瓦文萨之妻默默为他送行，她注意到楼房周围聚集了大批的警察。

省长看来有些紧张，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书记先生则把帽子丢在了瓦文萨的家里。

华沙机场，一辆警车将刚下飞机的瓦文萨接走，奇怪的是没有鸣警笛。瓦文萨透过车窗向外观望：一队队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在大街上巡逻，华沙街头似乎比往常寂静。汽车驶到了郊区的一所别墅，这以前曾是一位中央书记住过的地方。

乔塞克和几位将军在门口迎候，他们脸上堆满了无奈的笑。“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乔塞克的欢迎词。

瓦文萨在士兵的引导下走进了一间装饰典雅的房间。在这里瓦文萨有一种度假的感觉，除了卫兵以外，关在这座别墅里很难与身陷囹圄联系起来。

这所别墅如今的主人是一位高级囚徒，他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不断有级别很高的官员来拜访，拉科夫斯基和乔塞克是这里的常客。瓦文萨的司机被允许来陪伴他，并可长期住在这里。妻子达奴塔也被获准前来探视。在这儿，他还有专门的厨师、专门的警卫，俨然一位高级官员。被软禁的瓦文萨的唯一爱好是收听广播。他从一台短波收音机里不断收听到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

后来瓦文萨又被转移到了奥特沃茨克一所别墅里。当年哥穆尔卡曾在此住过，并于 1956 年 10 月从这里重返政坛。瓦文萨将这视为吉祥之兆，并耐心等待自己政治生涯中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乔塞克等官员仍然络续不绝地前来“拜访”，他们要求瓦文萨将团结工会中的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所有专家顾问、团结工会几乎所有领导人从团结工会中清除出去。瓦文萨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但也因此受到了奚弄：“你是一个不及格的政治家，因为你不知道为了重要的事情而在小事上作出牺牲。”当他对外边的流血事件表示关注时，一位官员挖苦道：“你永远成不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因为你还不够狠，害怕流血。”

后来瓦文萨又被转移到布拉尼茨基宫内的一所建筑，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接来一起居住。当局还允许瓦文萨在护城河边垂钓。不久，瓦文萨全家的照片以及瓦文萨垂钓的照片相继出现在外国报刊上，以示瓦文萨未受到任何迫害。

瓦文萨又要“搬家”了，乔塞克前来送行，瓦文萨开玩笑说：“我对这个地方已经了如指掌，我们干吗不到华沙王宫去？我们不是可以接管华沙吗？”乔塞克部长面无表情，没有反应。两天之后瓦文萨被转移到波兰东部边界一所为茂密的森林环抱的山林小屋，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但也尝到了失去自由和失去亲人的滋味。

1982年10月4日，乔塞克带来了一份备忘录，请瓦文萨在新成立的“民族复兴爱国运动”或政府下属的负责工会事务的咨询委员会中担任要职。瓦文萨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对类似的肥缺嗤之以鼻，接受这样的条件等于承认团结工会的寿终正寝。

瓦文萨继续从电台中了解到团结工会地下组织“临时协调委员会”成立了，并正在进行地下抵抗。这个组织呼吁在1982年11月11日——波兰独立日这天举行示威游行。这种示威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瓦文萨忧心忡忡，流血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与外界已失去了联系，对外面的事情无能为力。教士、妻子已有很长时间没来看他，他感到寂寞、焦躁。11月8日瓦文萨决定写信给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建议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一次严肃的会谈。起草完建议后，瓦文萨思考再三，署上了“瓦文萨下士”的名字。他知道如果以团结工会主席的名义写信，当局一定会置之不理。11月15日，就在这封信在报上发表后不久，瓦文萨终于获得了自由，回到了阔别11个月的家。数千人聚集在他的住所周围，欢迎他的归来。瓦文萨站在窗口向人们讲话，眼眶有些湿润……。

2. “将军你没有赢

团结工会遭到取缔之后，一个团结工会地下组织于 1982 年 1 月应运而生，这个组织就是团结工会地下组织临时协调委员会。该组织的传单不断在社会上散发，鼓动人们示威，抵制军管当局。

临时协调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是侥幸逃脱当局逮捕的团结工会成员布雅克。布雅克在宣布成立临时协调委员会时告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你并没有打赢这场战争，你们只有坦克、枪枝和棍棒，团结工会比任何专政都强大。”临时协调委员会提出了三点纲领：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地下组织的策略也较为灵活。布雅克赞同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斗争：建立拒绝阵线，拒绝与当局合作；抵制新组建的官方工会；利用合法手段，进行经济斗争；保持独立的社会意识，打破当局的舆论垄断；根据工人觉悟和国内形势谨慎使用罢工武器。他们的要求通过传单、地下刊物等渠道在社会中广为流传。4 月 12 日，地下电台开始播音，虽然广播受到很大干扰，但是时消时逝的电波使团结工会的同情者倍受鼓舞。当局对他们的行动十分恐慌，试图将这些“漏网之鱼”一网打尽，以除后患。

临是协调委员会组织严密，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无处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维持生存。临时协调委员会下设组织组、情报组、监督组和指导组。组织组负责全国各地区之间地下工会的联络；情报组负责提供同情团结工会的自愿者名单和安全的住处；监督组负责内部安全；指导组负责协调罢工和示威活动。虽然地下活动屡遇险情，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他们开着车不断与警察“玩”捉迷藏的游戏，得心应手地甩开警察，到安全地点参加会议。为保证安全地送 1 个人参加会议，有时出动 10 辆汽车和 30 多人。参加会议的人乔装打扮躲过警察的盘查。在举行会议时，有多人放哨。遇到紧急情况就迅速转移地点。地

下组织的领导人行踪不定，以免引起注意，被人盯梢。传单都是通过绝对可靠的人印刷和散发的，往往不露痕迹，当局很难抓住把柄。对这些地下组织领导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既紧张、危险又充满刺激。每当他们的呼吁在社会引起反响时，他们就感到十分兴奋。他们曾呼吁居民在每月 13 日晚 9 点关灯并在窗口点燃蜡烛，以示反对军管，华沙立即有人响应。当他们看到窗前烛光闪烁的情景时，心中欣慰不已。

获释之后的瓦文萨应邀于 1983 年 4 月出席临时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他对地下组织已形成了一个联络网感到欣喜。瓦文萨与临时协调委员会会晤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这一公报很快流传到了社会上。瓦文萨与地下组织的会晤成为政府发言人乌尔班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穷追不舍的问题。乌尔班强调瓦文萨是一个普通公民，他们的会晤纯属私人会晤。瓦文萨因为这次会晤被拘留了 1 天，在审问中乌尔班的话被瓦文萨不断引用。民警无可奈何，只得将他释放。

美国劳联产联的一份报告披露了团结工会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地下组织的领导成员约有 40 人，但在全国约有 20 万有固定工作的人帮助地下组织的工作。团结工会有秘密刊物 400 多份，有的刊物发行量为 3 万册，反政府的宣传品、小册子成千上万地印刷。数百万人在教堂里看过反政府录相。地下组织还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秘密电台干扰政府电台的广播节目，不断高喊“团结工会万岁”等口号，官方的电视节目也受到类似干扰。团结工会虽被取缔，却名亡实存。

3. 天使还是魔鬼

在东西方的报刊上，瓦文萨的形象截然不同。东方的报刊称他为“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成员”“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惜使用一切恶言秽语。而西方的报刊又横加吹捧，

称他为“天才的罢工领袖”“非同寻常的工人领袖”“名副其实的政治家”等。瓦文萨对于这些毁誉一笑置之。

1983 年 4 月，瓦文萨得到恩准回到列宁造船厂上班，这是第三次回厂工作。这位“电工”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人们频频与他握手，请他签名留念。

在业余时间，瓦文萨则从事政治活动。瓦文萨在华沙与全国所有工会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尽管会晤遭到警方骚扰，但这次活动聚集了 1980 年工潮时期的绝大多数工会活动分子，真是一次劫后重逢。会议参加者签署了致议会的公开信。会后，瓦文萨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团结工会的最低条件：工会应该多元化，实行工人自治，提倡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改革全国的新闻媒介。瓦文萨再次向政府抛出了试探性汽球。

8 月份，在格但斯克协议签定的地方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会。政府副总理拉科夫斯基指责团结工会在合法存在的 16 个月中不断鼓动罢工，制造无政府状态，会场上嘘声不断。瓦文萨则提醒拉科夫斯基正是由于 1980 年事件才使他们从盖莱克手中夺取了政权，而他们却以坦克和警棍来报答促使他们上街的人。

10 月 5 日，对于瓦文萨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凌晨打来的电话把他从梦乡中惊醒：“你获诺贝尔奖了。”瓦文萨在半睡半醒中对此将信将疑，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仍按原计划与朋友们一起开车去森林采蘑菇。上午 11 点他们听到了德国电台报道瓦文萨获奖的消息，朋友们欣喜若狂，把瓦文萨不断抛向空中。

下午 5 点，瓦文萨回到格但斯克，大街上的人们向他招手，并打出 V 型胜利的手势。瓦文萨的住所周围也聚集了无数欢迎他的群众。

他在窗前向群众发表讲话：

“诺贝尔和平奖是对我们所有遵循非暴力和相互理解的道路获得真理的人的奖励……。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将坐在同一张桌前，就

怎样做对波兰最有益达成谅解。因为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除了达成谅解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希望诺贝尔奖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仅仅几天之前，瓦文萨还收到几百封出自一人之手的匿名信的恐吓。官方的传播媒介不断对他进行狂轰滥炸，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叫《金钱》的电视片，该片称瓦文萨在国外拥有100万美元的巨款，以造成一个百万富翁鼓动在贫困中挣扎的工人造反的印象。现在瓦文萨将诺贝尔和平奖奖金捐献给农业发展基金会的消息使官方的宣传不攻自破。诺贝尔和平奖驱散了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瓦文萨再次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人物。

4. 天国的冤魂

1984年10月19日深夜，波比耶乌什科神甫的汽车正在托伦附近的公路急驶，突然一辆菲亚特汽车迎面驶来，挡住了去路。从汽车中跳下的三个青年人，二话没说将神甫强行拖下并反绑起来，装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随后慌忙驱车而去。当他们再次打开后备箱时才发现神甫已窒息死亡。惊慌失措的年轻人将神甫尸体扔进了维斯瓦河，企图毁尸灭迹。天国之中又多了一个冤魂，但这一切是何人所为，他们为什么要谋害波比乌什科神甫呢？

波比耶乌什科神甫是团结工会的坚定支持者，他的死亡震惊了波兰。政府发言人称：“这是一个周密地选择了时机的、针对我们的挑衅行为。”瓦文萨、布雅克等人也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这是“对1980年8月协议的践踏、为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些团结工会激进分子呼吁罢工示威，进行社会自卫。教会要求政府查清真相，严惩凶手。波兰社会又处在对抗的边缘。

波兰当局派出大批警力进行侦破。一周之后，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宣布，3名凶手都是内务部工作人员。他们分别是33岁的大尉皮奥特罗夫斯基、29岁的上尉赫米耶莱夫斯基和32岁的上尉彭卡拉。

据查，内务部副司长皮耶特鲁什卡与此案有涉，纵容下属绑架和杀害神甫。

12月27日，托伦省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第二天，被告彭卡拉突然翻供，否认在预审中关于内务部副部长同意他们行动的供词。皮奥特洛夫斯基也附和："可能是我误解了。也许这只是我的想人非非"被告的突然翻供使案件疑点重重，是他们提供了假供词还是有人对他们施加了压力了呢？

1985年1月29日，托伦法院郑重宣判，判处皮奥特洛夫斯基死刑，判处皮耶特鲁什卡25年徒刑，判处彭卡拉15年徒刑，判处赫米耶莱夫斯基14年徒刑。

虽然审判已经结束，但神甫之死仍充满迷团，人们提出了种种猜测。

一种看法是波党党内强硬派所为。他们因对雅鲁泽尔斯基奉行的革新路线不满，企图制造事端搞垮雅鲁泽尔斯基。一位教会人士把这一案件称为"放在雅鲁泽尔斯基办公室的定时炸弹。"涉嫌此案的还有高层人士，只是由于国内安定需要，不愿捅破窗户纸罢了。因此只追查到副司级便不了了之。

另一种看法是有苏联背景。波兰内务部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党内强硬派人士较为集中的地方。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报刊早在8月份就对神甫进行了攻击，如此一个年轻神甫引得苏联如此兴师动众，足见苏联对于神甫恨之入骨。神甫被害20天之后，苏联才报道案件情况，但对凶手被捕一事只字未提。

还有一种说法是神甫已病入膏肓，教会以8000美元收买内务部官员杀害他，以此使神甫获得为人类献身的圣徒地位，提高波兰教会的身价。这种说法是苏联炮制的，可信度并不高。

波比耶乌什科神甫的葬礼在斯坦尼斯瓦夫教堂举行，这是他生前讲道的地方。团结工会许多领导人出席了葬礼，悲哀的葬礼变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人们的心里交织着希望与绝望……

5. 最后赌博

1989年1月1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开始举行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身经百战的雅鲁泽尔斯基面临着自己有生以来最大的考验。

七年来，他处心积虑，试图把波兰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是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取消军管，释放政治犯，能做的让步都做了，可结果又如何呢？西方对此只是作了象征性反应，对波兰施加的压力却没有减轻。美国总统里根1987年取消了对波兰的经济制裁，但是仍在明目张胆地支持团结工会，1987年给予团结工会1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1988年又增加到了500万美元。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波兰时竟和瓦文萨举行会谈，瓦文萨俨然是波兰的政府首脑。经济制裁已使波兰损失了150亿美元，对于波兰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损失。

而团结工会也一直没有停止活动。1986年9月释放全部政治犯后，仅仅是解散了地下组织，但瓦文萨又与地下组织领导人成立了团结工会临时委员会。有人指责雅鲁泽尔斯基是放虎归山，但他没有其他办法，否则内外交困的局势愈来愈糟。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些获得自由的团结工会活动家再一次组织起来，举行各种活动。1984年、1985年的两次选举，团结工会都号召抵制。他们把每一个节日：五一节、国庆节、独立日等都变成了举行抗议的日子，甚至12月13日军管的日子也成了抗议的日子。动用武力也没有能够把团结工会摧毁，他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已是波兰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无休止的罢工使他厌烦，而他们整天提的口号便是工会多元化，团结工会合法化。1988年5月团结工会发动了一次全国性工潮，8月又是一次，而且来势凶猛，这使他不得不命令内务部长与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举行会晤，并提出了举行圆桌会议的设想。

七年来，雅鲁泽尔斯基也进行了无数次政治经济改革的尝试，但

奏效都不大。1987 年他主张就改革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但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和建议却遭到全民公决的否决，赞成改革计划的选民不足 50%，而且投票率仅为 67%。这次全民公决是对他的改革计划的严重打击，政府的改革也没有得到人民的赞同。通过改革来解决危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

1987 年波兰理论界刮起了一阵旋风，出现了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新颖概念。雅鲁泽尔斯基敏感地注意到了这场争论，看来不能老叫团结工会打多元化的旗帜，共产党人为什么不堂堂正正举起多元化的旗帜呢？既然赞同社会主义多元化，为何不把建设性反对派纳入政治体系呢？团结工会不就是要求合法化吗？但是党内的强硬派肯定不会赞成，他不得不背水一战。

这次全会原定 17 日结束，但是在工会多元化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党内的强硬派不断地攻击雅鲁泽尔斯基的投降主义。怎么办？他已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了一生，事已如此，个人的权力、地位、名誉已无足轻重了，他在大会上提出了举行"信任投票"的建议。如果得不到全会的支持他将辞去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和国防部长西维茨基也将辞职。

经过表决，除 4 人弃权外，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领导人取得了胜利，获得了全会的信任。全会终于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从此波兰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1989 年 1 月 18 日，取缔 7 年之久的团结工会得到承认。

1989 年 2 月 6 日——4 月 5 日，圆桌会议召开。

1989 年 6 月，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8 月，团结工会马佐维耶茨基当选政府总理。1990 年 12 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乌鸦钻出了红色的壳"。

第八章

布加勒斯特的血腥圣诞

——齐奥塞斯库的故事

引　言

1989年对东欧人民来说，是风云突变、血雨腥风的一年，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在短短的300多天里从蔓延进而席卷了整个东欧。圣诞节前后，正当屹立了近三十年的柏林墙倒塌，使两个从二次大战后一分为二的德意志民族再度融合的消息成为世界曝光热点的时候，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却使全球所有的人感到措手不及：在短短一周之内，45年的共产党政权、25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有400万党员的共产党、有7万多人的安全部队突然间灰飞烟灭；当周围的人在白雪纷飞的夜晚围坐在圣诞树旁聆听圣诞赞歌的时候，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却已被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处死他俩的录相则被搬上了电视屏幕，有人欢呼，有人感慨，有人叹息，但更多的人则是沉默。这一切的发生太快太迅捷，容不得让人喘息，来不及让人思考，以致于回想这段往事时，罗马尼亚人民往往赋予它神秘莫测的色彩，“布加勒斯特之谜团”何时能

解，这是自始至终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悬念。

齐奥塞斯库肿胀的、血迹斑斑的尸体在人群当中慢慢地腐烂了，消失了。过去的25年里，他曾经成功地在人民心中编织了一则美妙动听的神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则神话慢慢褪去了那奇异的光环，袒露出苍白无力的原形。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突如其来的死刑

1989年12月26日凌晨1时。

严寒肆无忌惮地侵袭着罗马尼亚素有“欧洲绿城”美誉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千疮百孔的大街小巷。昔日位于市中心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马盖鲁大街和共和国大街经过四、五天血与火的洗礼后，带着破碎的躯体，陷入死一般的冷寂之中；不远处，以往万头攒动、鲜花簇拥的大学广场和共和国广场上只剩下几堆蜷曲的、焦黑的汽车、坦克残骸，如同黑黢黢的鬼影在了无止境的黑夜里迎风晃动。一阵冷风袭来，地面上尚未燃尽的血迹斑斑的碎纸便窸窸窣窣地随风飞舞，仿佛跟着寒风的节奏，在空中唱出一首无奈的悲歌。

突然，街道两旁各家各户的窗户上不约而同地亮起了点点灯光，仿佛喻示着人们，在这激战之后的万籁俱寂中，另一场“战斗”就要开演：

罗马尼亚全国各地上千万双眼睛紧紧盯着这小小的、四方的“战场”——自由电视台于凌晨1时45分将要播放重要新闻，这会使从12月21日起在罗电视屏幕上消失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夫妇不得不以和以往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姿态出现在曾被其统治了长达1/4世纪之久的罗马尼亚人民面前。他们终于

出现在画面上了：这对夫妇衣着整齐，外表也象往常一样自信，安祥，面对摄像机镜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还不时地用手拢拢鬓发，似乎要显得和往常一样潇洒自如。只是他那凌乱的头发和粗糙的脸颊显示出这位统治者内心惶恐不安的另一面：他俩被人从一辆装甲车上带下，匆匆进入一家医院，由一名医生为他们做身体检查（事后人们得知，这是行刑前的例行体检）。

所有这一切没有口号，没有欢呼，更没有鲜花和拥抱，布景也极其简单，随便，如同一则普普通通的新闻报导，这使得早已习惯总统隆重排场的罗马尼亚人民惊讶不已，甚至感到些许惶恐和不安，这难道就是6天前还在电视屏幕上呐喊“应该行动起来……调动一切力量，以维护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吗？

接下来的镜头是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实况录像，这是自昨天电台宣布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以来，人们盼望得到验证的东西。

观众在屏幕上看不到法庭，据说这样是为了公诉人免受威胁。再次出现在画面上的尼古拉和埃列娜紧挨着坐在两张排成V字形的小桌后面。还是同样令人熟悉的装扮——大衣、围巾加礼帽，埃列娜紧握小提包；还是同样两张修饰得体的面孔，然而他俩今天扮演的角色的确让许多人感到十二分地不习惯，因为播音员在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这是审判他俩的录像片断。尼古拉一直盯着摄像机，精神虽然萎靡，但眼光还是那么炯炯有神，满含嘲笑和不屑，并不时地看看自己的手表，仿佛要急着去某地考察一样。

突然声音响起，那是公诉人的声音：“25年来，你使人民蒙受耻辱。25年来，你所做的只是空谈而已。”

尼古拉顿时愣了一愣，公诉人的语气显然使得这位威信扫地的独裁者感到难以接受。接着人们听到了他所独有的尖声尖气的声音：

“我不承认任何法庭，我只承认大国民议会。这是一次政变。”

指控的声音还在继续："被告及其妻子过着奢侈的私生活，铺张浪费……，你们被指控的罪状有：(1) 大屠杀，受害者达6万多人；(2) 通过组织反对人民和国家政权的武装行动来破坏国家政权；(3) 通过炸毁和破坏建筑物并在城市里进行无数的爆炸来破坏公共财产；(4) 破坏国民经济；(5) 凭藉着存在外国银行的10多亿美元企图逃往国外……"

尼古拉依然是一副蔑视一切的面孔，拒绝回答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

公诉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激动："今天各城镇有6.4万名受害者……下令在蒂米什瓦拉进行大屠杀的是谁？……无辜的儿童被坦克碾死……为什么要让人民挨饿？你应当谈谈瑞士银行的帐户……"。

持续约三个小时的指控使尼古拉再也难以直面摄像机，直面电视机前的人民："我不承认失败，也不承认任何东西，没有人被打死。"尼古拉似乎在用最后一点精力挤出这么一句，"你们正在背叛人民，你们正在毁掉罗马尼亚的独立！"

间歇了一会儿，公诉人的声音再度响起："我们认为，根据刑法第162条、第163条、第165条和第357条，被告有罪，特别军事法庭今天——12月25日宣布判决：没收全部财产、死刑。不许上诉。"

人们从齐奥塞斯库夫妇脸上并未看到吃惊和害怕的表情，他们似乎在审讯之前就预料到这个结果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尼古拉刚才还炯炯有神，仿佛正要向外喷射怒火的眼光突然黯淡下来，蒙上了一层忧郁，甚至是绝望的阴翳，高昂的脑袋也无力地埋进了随即不知所措耷拉下来的两肩中。

这是尼古拉执政1/4世纪以来第一次在他的国民面前显露出老态，人们终于在他身上读到了失败。

容不得人感叹，甚至来不及让人喘息，镜头又一次成功地将人们那颗已经狂跳不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荧屏上映出了躺在一条水

泥路上的两具尸体，尸体胸前千疮百孔、面部均已肿胀。随着镜头的推移，人们还是准确无误地辨认出这就是他们以前所熟悉的总统夫妇：尼古拉的眼睛微睁，太阳穴下的一个弹孔还在向外缓缓淌血，额头正中中弹的埃列娜则横尸一旁。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不前了，没有欢呼，没有呐喊，只有紧张的喘气和令人窒息的沉默。虽然电台、电视台早已宣布他们被判处了死刑，但直面这骇人的场面，尤其是总统那血淋淋的头部和肩部的特写，人们还是感到震惊和措手不及。这，难道就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东西吗？有人开始呕吐起来，几个胆小的妇女甚至开始抽泣。突然，一声"这是罪有应得！"的呼喊，打破了这沉重的、令人不安的沉默。刹时，胜利的欢呼立即充斥了刚才还寂静无声的大街小巷，布加勒斯特受害者的亲属在拥抱，蒂米什瓦拉的人民在庆祝，布拉索夫、雅西……举国上下的人民在同一时刻意识到，过去的污泥浊水已在那几声枪响中荡涤殆尽了，伴随着黎明的到来，迎接他们的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从人生舞台上消失了，在嘲笑和血腥的喧嚣中悄悄地离开了他曾拥有过的世界。据说，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刚刚结束，齐奥塞斯库夫妇即被带出法庭执刑。还来不及组织一个行刑队，早已失去自制力的拘押他俩的兵营士兵就都打出了一梭子子弹，子弹带着仇恨，如同复仇之箭，发疯似地射向目标，久久没有停息。硝烟长长地不愿散去，扛着摄像机在一旁战战兢兢等候的摄影师无法拍录到处决时的情景。刺鼻的硝烟带着股浓重的血腥味终于越来越淡，呈现在摄影师眼前的，是两具浑身都是排枪弹孔，扭曲的尸体。

人民要复仇，父母为孩子，妻子为丈夫，孩子为父亲。人们眼前还常常出现这样一幕：在布加勒斯特某公墓的一隅，一个大学生躺在一个敞开的棺材里，他的母亲跪在一旁，一边流着再也擦不干的泪水，一边用手轻轻抚摸孩子那依然柔软的头发。

一切都结束了，不管时间多么短暂，事情的发生多么突然，这一切在罗马尼亚人民面前正成为永远忘不掉的过去。

二、蒂米什瓦拉的火山

罗马尼亚西部靠近匈牙利边境的地方，有一座人口只有 30 万的小城——蒂米什瓦拉市。这座小城在 14 世纪初就闻名世界，当时匈牙利国王卡·罗伯特曾将它作过皇城。15 世纪，在这儿出生的贵族扬库后来成为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大公。近年来，蒂米什瓦拉一直以其古老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罗马尼亚独树一帜，然而历史却又让它肩负起一项更重大的使命。

1989 年 12 月 16 日晚，蒂米什瓦拉街头突然响起了纷杂的脚步声和"往教堂去！"的呼喊声，这使蒂市向来十分宁静的空气陡然紧张了起来。"出什么事了？"人们心中惴惴不安。这些天来，新教神父拉斯洛·特凯什的遭遇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这位罗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因多次发表反对政府和齐奥塞斯库的言论于当年 11 月经蒂市法院判决开除公职、驱逐出家门，流放农村。拉斯洛抵制了这一判决，躲到一所教堂避难。这招来政府更强制性的行动。对政府深怀不满的教徒们决心联合起来，自发来到这所教堂外围成一圈，用"人链"来保护这位近年来深得人心的神父。前来声援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昼夜不散，到了第二天早上，"人链"变成了有 5000 多名群众参加的抗议游行队伍。他们雄纠纠地向市中心走去，振臂高喊"打倒暴力！""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并把齐奥塞斯库引之为傲的著作扔到大街上焚烧。接着，他们占据了市政府大楼，有人点燃了国旗，还有的人索性挥舞着剪去国徽的国旗高呼口号——蒂米什瓦拉的火山爆发了，这是积压在人们心头多年的痛苦和愤恨，一旦爆

发，势不可挡。

面对急转直下的国内形势，即将出访伊朗的齐奥塞斯库忧心忡忡，他为国防部和内务部的军队居然没有开枪，没有控制住国内局势而大发雷霆。在17日召开的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会议上，怒不可遏的齐奥塞斯库向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将军呵叱道："你的军官干什么了？他们为什么不立即干预？他们应该开枪！应该把那些人打倒！先向他们鸣枪警告，然后朝腿上开枪！"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还下令关闭通往蒂市的一切交通要道，并封锁了罗保、罗苏、罗南和罗匈边界。

枪终于响了，那是保安部队出动了，他们带的是自动步枪，有人再也起不来，有人倒下后又爬了起来，鲜血染红了蒂市的大街小巷。到晚上，许多人被捕了，但更多的人从家中走了出来，手拿蜡烛，边唱"觉醒吧，罗马尼亚人"（这首歌后来成为罗马尼亚的国歌），边继续游行。国防军出现了，他们带来的是直升机、坦克和装甲车。人群被驱散了，火山喷了几口火焰，暂时熄了下去。

20日，游行队伍再度出现在蒂市街头巷尾，这次来势更猛、更烈，10万余名群众手挽手走上街头，他们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和工人，高呼"我们将打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和军队抢夺枪支弹药，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在自动武器疯狂的扫射下，人民前仆后继，上百名群众倒在血泊中呻吟，他们中有的人被拖上一辆冷藏大卡车，连夜开往布加勒斯特秘密火化。父母们因子女失踪而焦虑不安，纷纷冒着枪林弹雨在街头尸堆中辨认尸体。孩子在辗转呻吟，父母的心在流血，蒂米什瓦拉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中。

革命如同一堆干柴碰到了一点火星，瞬时燃起一场熊熊烈火，由蒂米什瓦拉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布拉索夫、阿拉德……年轻的大学生、持不同政见者、工人、农民为结束独裁终于聚集在了一起。

于18日出访德黑兰的齐奥塞斯库如坐针毡，匆匆赶回布加勒斯特后，立即在电台和电视台上发表讲话，称蒂市发生的一切是"几

个流氓团伙……寻衅闹事，攻击了一些国家机关……蒂市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动是同反动的帝国主义、领土收复主义、沙文主义集团以及一些外国间谍机构秘密配合下搞起来的……”。

不过齐奥塞斯库没有控制住局势，即使出动保安部队、内务部队也不行。20日，火山的喷发终于波及到了罗马尼亚的心脏——首都布加勒斯特。

从清晨起，有人就在市中心的闹区共和国广场、统一广场上散发写着“觉醒吧，罗马尼亚人！让我们12月30日在‘统一’广场集合”的传单，人们纷纷驻足传阅，并互相转告蒂市的最新消息，枪声和流血让不少人义愤填膺。下午5时，“大使”旅馆发生了爆炸事件——布加勒斯特的火山终于冒烟了。

21日，忍无可忍、气急败坏的齐奥塞斯库决定反击。他打出了最后一张自认为最有力的王牌——他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弟弟伊利耶匆匆赶往蒂米什瓦拉（事实证明瓦西里·米列亚将军并不愿意执行自己的命令），自己则登上了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准备发表讲话。面对共和国广场上2万多名黑鸦鸦的群众，尼古拉仿佛又回到了1968年：这年，苏联人对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发起的布拉格之春诉诸武力，消息传来，心情复杂，满怀恐惧和希望的罗马尼亚人民纷纷涌向共和国广场，就在这个阳台上，尼古拉以他大无畏的精神和誓死保卫罗独立和主权的勇气将人民和大国民议会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

然而，现在已不是1968年了。身着深色大衣的齐奥塞斯库开始发表讲话，内容和20日的电视讲话大致相同。他表情激动，声音略为嘶哑，习惯来回挥舞的双手已紧紧握成两个拳头——显而易见，尼古拉的忍耐已到了极点。突然，广场深处响起了一声呼喊：“打倒齐奥塞斯库！”仿佛为了响应这个喊声似的，“蒂米什瓦拉！”的呼声又陆续传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终于汇成一片愤怒的海洋，居然将尼古拉的讲话打断。尼古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的嘴

因惊讶而合不上，举起的胳膊仿佛已凝固在空中。倒是身旁的埃列娜十分镇定，她小声催促着："快说，快说！"尼古拉继续尖声尖气地讲下去，但声音小多了，底气也不足，1989年共和国广场上的讲话不得不草草收场。

集会的群众不愿散去，他们和匆匆赶来声援的学生、市民们在离共和国广场不远的马盖鲁大街、洲际饭店附近举行反政府和反齐的游行，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群加入，队伍不断扩大，最多时发展到了数万人。布加勒斯特在动荡。

装甲车、坦克开进了美丽的"花园城市"布加勒斯特，背着自动步枪的士兵以及特种警察涌进了市中心，他们向人群施放催泪弹并鸣枪警告，游行队伍一度被驱散。

22日清晨，布加勒斯特10万多名市民重新向共和国广场和主要街道进发，人们设置了路障，数辆汽车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在烈火中，在催泪弹的烟雾中，人们抢夺军警的武器，烧毁他们的高压水龙，人民和警察与军队的对峙已升级到了冲突。"嗒嗒嗒"的枪声再度响起，然而这枪声又怎能阻挡火山喷发的力量？中午，示威者终于占领了电台和电视台，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人民取得了胜利！"接着，人们又向最后一个堡垒——党中央大厦乘胜追击。

"树倒猢狲散"，以齐为首的党政体系不堪一击，全部瓦解，德斯克列斯库总理宣布政府辞职。同时，人们听到国防部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将军"自杀"的消息。已接到米列亚将军生前最后一个命令——停止向群众射击的国防部队开始迅速撤离党中央大厦，血的教训终于使他们和群众站在了一起。

大势已去、回天无术的齐奥塞斯库决定出逃。11时30分，他和埃列娜，以及一直追随他的罗共中央书记埃米尔·博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马尼亚·曼内斯库乘坐一架法国制松鼠SA355F型直升机，从党中央大厦的楼顶起飞，掠过沸腾的布加勒斯特，向斯纳戈夫总统别墅方向逃去。

得知此讯，早已按捺不下去的国防部队从悲愤中崛起，他们把枪口对准已潜入市中心、冷酷残忍的保安部队。当晚，两支部队在市中心交火，一时枪声轰轰，火光冲天，昔日庄严的国务委员会大厦陷于一片火海之中，宁静的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则被夷为平地。与此同时，电台、电视台向全国人民宣告，以曾被齐奥塞斯库罢免的，原罗共党中央书记扬·伊利埃斯库为首的救国阵线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接管了政权。

时间已到了 12 月 23 日，忠于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为夺回布加勒斯特和国防部队正在激烈地进行巷战，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常常从地下通道出奇不意地攻击军队和战略目标。不过国防军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手拿武器肩并肩地和他们战斗到了一起，于是这支军服和便服混杂在一起的大部队越战越勇，终于控制住了首都局势。

人们在零星的枪声中从电台和电视台得知，全国各地都已宣布站在救国阵线这一边，只有蒂米什瓦拉、锡比乌、布拉索夫等地还有零星战斗。不久，另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齐奥塞斯库夫妇已在特尔戈维什泰附近被捕。多好的消息啊！人们在硝烟弥漫的废墟中奔走相告，紧紧拥抱。

24 日，首都的形势逐渐平静下来，国防军已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25 日之后，救国阵线开始在各地建立机构——一个新的罗马尼亚在火山爆发后的余热中诞生了！

25 日，尚未平静下来的群众从清晨起就打开了收音机。傍晚，收音机里终于传来播音员那激动的欢呼声："多好的消息！伪基督死亡、真基督诞生的日子到了！"随着那突如其来的死刑判决，长达一周的群众起义终于以"君主"的殒灭而告终。

紧接着发生的，便是本文开场时的那一幕。

激动的心情刚刚平静，人们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对齐夫妇出逃、被捕、处死过程一无所知，整个消息似乎都控制在扬·伊利埃斯库那里，他一直对齐夫妇被捕详情、监禁地点密而不宣，这给刚刚平稳

下来的形势又蒙上一层疑惑、朦胧与神秘的气氛，有些人感到十分不满。不过有一个人却不以为然，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罗马尼亚人，他为他所做的一切将写入罗马尼亚史册而感到无比自豪。他，就是住在离特尔戈维什泰市 6 公里处沃克雷什奇村的尼古拉·彼得里绍尔。

12 月 22 日下午 2 点，这位特尔戈维什泰生产和购销合作社的工人象往常一样吃过午饭，去冲洗自己那辆牌照为 1301TX 的黑色达契亚汽车。他将车开出花园后不久，迎面驶来一辆紫红色的达契亚汽车，在距他 7.8 米处停了下来。随后，另有两辆蓝色和黄色的车子也刹车停了下来。彼得里绍尔有些慌乱，觉得有什么事将要发生。果然，从其中一辆汽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蓝色阔条法兰绒上衣的男人，迈步向彼得里绍尔走来，用和缓的口吻询问他是否可以给他们的车加油。彼转身向车库走去，没走两步，脖子就觉得被一样冰冷的东西顶住了。

"上车！"这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冷酷而严厉。

彼得里绍尔乖乖地随着这人上了自己的车，并庆幸脑后那冰凉的东西并未妨碍自己的思维。他发动引擎，向四周张望一下，然后灵机一动，便将车拐进他家右边的第一条小巷，但没开出 5、6 米远，身后那辆紧紧尾随着的紫红达契亚却加速超了上来，死死卡住了它。车门打开，走下一男一女两个身穿大衣，保养得极好的老人。男的中等个，表情呆板，棕色头发中掺杂着些许白发，两只惶恐不安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虽然围着长围巾，但脖子还是深深埋进了耸起的双肩中，仿佛寒冷已将他不顾一切地袭倒了。女的则显得沉静许多，梳着圆圆向上翻起发型的头上扎着一块方巾，削瘦狭长的脸庞薄施脂粉，岁月的年轮在薄薄的、微微往下挂着的嘴唇边刻下两道深深的印记，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你她是个严厉而又镇静的人。

他们一前一后向彼得里绍尔的汽车走来，彼早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就已认出了他们，他们太令人熟悉了。只是现在这种近距离的、直

接的见面方式带来的不是荣誉和兴奋，而是恐惧和厄运。彼忽然间想起中午花园大栅栏门柱上的喇叭传出的消息：齐奥塞斯库夫妇正逃往特尔戈维什泰市。沃克雷什奇村离特市只有 6 公里。一阵凉意刹时从头顶传到了脚跟，彼的腿开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齐奥塞斯库坐到了司机旁的座位上，埃列娜坐在彼的身后，她身旁那个持枪的穿法兰绒上衣的人则不时地巡视四周情况，看样子他是个忠于齐夫妇的保安人员。

"如果你想不死，那就乖乖开车！"彼的耳边响起了埃列娜冷冰冰的声音。他慌不迭地点点头，用早被汗水湿透、颤抖的双手发动了引擎，黑色达契亚汽车象老人似的咳嗽了几声，缓缓启动起来，向着特尔戈维什泰方向一溜烟地驶去。

"我们把罗马尼亚给丢了，我们把罗马尼亚给丢了……"坐在彼身旁的齐奥塞斯库不断地从车窗向后看，嘴里反复重复这句话，象个被废黜的老国王，在哀叹命运不济的同时，想竭力挽留眼前的、他曾拥有过的王国中每一块土地和每一棵树木。埃列娜则不同，越在这种时刻，她的冷静和镇定的本性便越发的表现了出来，她没有朝后看，只朝前看，密切地注视着向前延伸的道路的两旁，眼前不断闪现 3、4 个小时以来的情景：

"直升机在共和国大厦的楼顶起飞……"；

"直升机在斯纳戈夫总统别墅降落，两人吃了点面包，带上两大袋衣物和食品，直升机向博泰尼军用机场重新起飞……"；

"广播里传来罗马尼亚领空已禁飞的消息，直升机在距布加勒斯特 52 公里处的蒂图镇附近的旷野降落，扣住一辆由一位妇女驾驶的紫色达契亚轿车，两辆追随他们的保安人员的轿车此时赶到……"；

"从广播里得知，这辆紫色达契亚已被通缉，不得已在沃克雷什奇村停下碰碰运气……"。

埃列娜叹了口气。这时彼得里绍尔从汽车反光镜里看见埃列娜俯身向前用手指戳了戳仍在咕哝不止的尼古拉。这一戳终于将他从

辉煌的过去拉回到了现实，尼古拉开始用正常的语气和埃列娜讨论起行车路线来。埃列娜建议去科比亚，因为齐政权的第四号人物扬·丁卡在那里有一幢别墅可暂避风头，可尼古拉非要去特尔戈维什泰市入口处的特钢厂，因为不久前他还去那里视察过一次，受到了美丽的鲜花簇拥的人群的夹道欢迎，那里的保安人员更显得忠心耿耿，“去那儿是不会有错的。”尼古拉相当自信地补充道。

反光镜里的埃列娜皱了皱眉，似乎对尼古拉的执迷不悟感到痛心，但象以往重要时刻一样，她还是顺从了他。汽车在身体抖得象筛子一样的彼得里绍尔的驾驶下，忽快忽慢、左扭右摆地向特钢厂驶去。

前面终于清晰地现出了特钢厂的轮廓，汽车从开着的头一道栅栏处冲过，向值夜的控制台开去，在已聚集了一大群工人的地方停了下来。那位保安人员首先下车，向那些工人走去。5分钟不到，他又急匆匆地返回。“工人已经罢工了。”他只简短地说了这么一句，便挥手让彼得里绍尔发动汽车。这时那群工人已聚集到了汽车的周围，这对夫妇的标记——大衣、帽子和围巾一下子使他俩暴露了身份，工人们开始向汽车投掷石块，同时高喊：“打死杀人犯！”埃列娜忽然死死抓住彼得里绍尔的衣领，急令他冲出去。与此同时，彼的脖子上又感觉到那金属所特有的凉意。黑色达契亚如同一只丧家犬，只能从工厂的后栅栏门逃了出去。

身旁传来尼古拉已抑止不住的啜泣声，声音中满含遭受背叛的悲愤，“我年轻的时候，这儿一无所有，是我给他们创造了这一切，是我给他们创造了这一切。”

汽车又在尼古拉的指使下开往离该厂5公里远的乌尔米，当年作为地下共产党积极分子的尼古拉曾在这里躲过当时政府的追捕，现在的情形又令他感到回到了以往的岁月，但乌尔米的情形和特钢厂的没什么两样，还让尼古拉丢了他最后一个保安人员。车子倒了回去，又重新朝特尔戈维什泰市的博莱斯库大街开去。汽车开得极

慢，沿途常常被游行队伍所阻，群众喊着“打倒独裁者”的口号，挥舞着剪去国徽的三色旗从车旁声势浩大地走过。尼古拉终于明白了目前的处境，他对面色苍白直冒冷汗的彼得里绍尔说：“我们没有希望了。走小巷，不要管禁止通行的牌子。”

汽车终于开到位于特尔戈维什泰市卡洛米特卡河畔的“党之家”附近。埃列娜仿佛如释重负，“到咱们家了，咱们安全了。”但“党之家”的大门也死死关着，仿佛并不准备接纳这两位党忠实的追随者。彼得里绍尔觉得尼古拉似乎又控制住了情绪，他镇定地打开车门，下车走向路旁的一对老年夫妇。看得出来这对夫妇早已认出走向他们的是谁了，恐惧使他俩腿脚发轻，但又象被定住的电影画面，无法动弹。彼得里绍尔听见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用一种极其温和的语气询问这对夫妇：

“门开着吗？可以进去吗？”

过了半晌，彼得里绍尔才听见那个男子的声音，他说门都关了，他也没有钥匙。他的妻子则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你们别呆在这儿，人民将会杀死你们的。”

尼古拉叹了口气，边往回走边脱去那件太容易被人认出的大衣，彼得里绍尔没有听清他嘴里又咕哝着些什么。汽车无可奈何地又上路了，但目标茫茫。此时已是下午 3 时 45 分，太阳开始西斜，空荡荡的道路对齐奥塞斯库夫妇来说更透出一股苍凉和无奈，除了向前，他们已别无选择了。

从在特钢厂起，埃列娜的手就没有松开过彼得里绍尔的衣领，因为他是他俩目前唯一可以控制的东西。车内一片寂静，彼得里绍尔发觉那只抓着自己衣领的手开始变冷，发抖了。恐惧再次向彼得里绍尔袭来，他不知道这对穷途末路的夫妇接下去会对他做些什么。身旁一直茫然无神向前凝望的尼古拉突然一言未发地向身后转去，彼得里绍尔听不见他俩的声音，便猜测他俩是用眼神来交流某种东西，因为他随即就从转身过来的尼古拉脸上明明白白地看到了绝望和恐

惧。彼得里绍尔心想，这对夫妇是真正明白自己完了，彻底完蛋了，面对他们的只会是嘲笑和死亡。

夜幕开始降临，昏暗的车灯无力地照着道路的前方，两旁树木黑漆漆的影子仿佛是通向死亡之路的站牌，随着它们纷纷向后倒去，死亡之路也越来越近了。

这时彼得里绍尔从车窗向后看去，发现自己已驾车到了特尔戈维什泰市的植物保护中心，一幢灯火通明的大楼矗立在夜幕中，显得格外醒目和温暖。“有人就好办。”希望又在彼得里绍尔胸中升起，他灵机一动，自作主张地将车停在了两棵枞树之间。奇怪的是埃列娜并没有反对这么做，她甚至将手从彼的衣领上拿开了，这使彼得大大松了口气。尼古拉让彼得下车进楼找人，看看是否有人会帮助他们。看来，这次他俩是孤注一掷了。

这是彼得第一次被允许离开这对夫妇，他迈着发软的双腿，竭力想快些走进大厅，以摆脱这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纠缠着他不放的恐惧和晦气。“谢天谢地！里面有人。”彼得边想边快步走进一间正播放电视的房间，他发现里面有十来个人正在收看当天的电视新闻。

“彼得里绍尔，你来干什么?”其中一个技术员认识他，见他面色苍白、神色慌乱地从夜幕中走来十分奇怪。

“我……我……”彼的嘴开始结巴起来，再次见到人群，竟使他激动得语无伦次起来，“我……我把尼古拉和埃列娜留在外面我的车上了。”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哈哈哈的大笑声，但随即又安静了下来，彼得里绍尔惊恐不安的表情证实了这一切都是真的。人群马上散了开去，自动腾出了一间办公室，那位技术员已拨通一个军事中心的电话。

彼又来到门外，从大厅的台阶上向那对夫妇招手让他们过来，他没敢再走过去，仿佛过去了又将回不来似的。埃列娜和尼古拉一前一后地下了车，尼古拉头发凌乱，表情茫然，嘴唇略微有些发紫，冷

得直打哆嗦；同样面无表情的埃列娜手提小拎包，薄薄的嘴唇无力地向下垂落，她在竭力保持住自己的尊严，尤其在自己过去的臣民面前。彼过去扶着步履维艰的尼古拉向里走，埃列娜则一声不吭地跟着，人群悄悄自动散开，仿佛在躲避两个瘟神一般。人们的眼光有愤恨，有痛苦，甚至还有怜悯，但更多的只是吃惊，这样的场面也的确令人惊奇，就在昨天，他俩还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呢。

外面响起了卡车的刹车声和人群训练有素的跑步声，尼古拉和埃列娜对望了一眼，似乎很明白那一时刻即将到来，他俩在办公室里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开始了静悄悄的、绝望的等待……

尼古拉·彼得里绍尔无意中成了英雄，对他来说，此时此刻恶梦已经过去，黎明正在到来。

三、硝烟中的谜团

笼罩在布加勒斯特上空的那阵硝烟散尽，街头巷尾又出现自动清扫战场的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脸上有兴奋，有胜利，有希望，还有许多疑惑和不解。几天来，在社会各阶层流传的种种谜团象一层神秘而又朦胧的烟雾重又弥漫在硝烟未尽的布加勒斯特上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首先是针对救国阵线迅雷不及掩耳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一事，许多人在感到满足的同时，又感到震惊和怀疑，更有人为不对齐奥塞斯库进行公审就秘密处决感到愤怒和不解。尽管在12月26日新政府任命的彼得·罗曼总理一再重申，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秘密审判并迅速执行判决，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来自恐怖分子集团的强大压力”，他们妄图解救罗前领导人，谁也无法想象，“齐的镇压机构”有多么强大，但满意和疑虑的心情还是常常交织在所

有关心国内局势的人的心中。不错，就在电台宣布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的第二天（12 月 23 日），特尔戈维什泰附近暂时拘押这对夫妇的国防部队兵营就遭到亲齐的特种部队的猛烈进攻，虽然最终还是国防军控制住了局势，人们还是将齐奥塞斯库夫妇转移到了一辆装甲车里。不过，亲齐的保安部队在全国只有 7 万多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 2000 多万团结一心的罗马尼亚军民，这种压力又会有多么强大呢？再说就在 25 日，救国阵线即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机构，这说明新政府已控制住了局势，那种威胁又从何而来呢？

另外，关于这次秘密审判的地点和执刑地点也一直秘而不宣；群众从电视台播放的审判录相中可以看到许多静止镜头；此外，由于有大量删节，法官和公诉人的讲话及被告的答词都不连贯；当宣判死刑时，画面上出现的是齐奥塞斯库倾听宣判的一个静止镜头，人们无法得知这对夫妇的任何反应……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这些疑问成了罗马尼亚人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0 年 3 月 1 日 13 时 15 分，秘密审判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下令判处他俩死刑的波帕·吉克在他的司法部办公室里用手枪朝心脏开了一枪，因抢救无效，于 2 小时后死于医院。事后人们发现，死者只给他妻子留下一封信，求她宽恕他的这一举动，并对他的葬礼作了交代，自杀的原因却只字未提。

3 月 2 日，罗马尼亚司法部长泰奥菲尔·波普就波帕自杀一事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波帕·吉克的自杀纯粹是患了抑郁症，与判决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一事毫不相干，他并没有为此受到任何威胁。波普先生还告诉记者，波帕的妻子在他死后曾说，波帕早在 10 年前就有过精神崩溃，只是当局并不知道而已。

但舆论界却议论纷纷……

接着，参加过这场战斗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对其中遇到的许多奇闻怪事议论不已，社会、舆论界的某些人士则对导致这场剧变的

真正性质和政权更迭的真正原因提出质疑，有人说是革命，有人说是政变，还有人说是阴谋，更有人说是其中两者的结合体。为此，新产生的罗马尼亚参议院成立了“1989年12月事件调查委员会”，经过两年调查，终于发现了在1989年12月22——25日期间，罗马尼亚境内发生的某些鲜为人知的事件：

12月22日下午，两支不同隶属的部队同时奉命去保护维尔恰县的水库，因接到假情报，互以为对方是要破坏水库的恐怖主义分子，幸亏两支部队的指挥官不仅认识，而且素来是好朋友，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而驻守在首都国际机场的部队却因某个假情报而误杀了前来增援的另一支部队的数十名官兵。

12月23日，位于罗马尼亚西南部的卡拉什——塞维林县首府雷希察市的市中心忽然出现三辆呼啸奔驰而来的救护车，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向聚集在市中心焦急不安的群众散布恐怖主义分子已在直升机和装甲车的支援下，组织大规模反攻的谣言，在当地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12月24日，罗总参谋部行动处共接到800多个电话，据事后核实，其中50%提供的情报是虚假的。另外，有人还在布勒依拉县驻军某师指挥官直通电话中插进了产妇被分尸、当地水源被投毒等恐怖情报，极大地动摇了军心。

不久，布拉索夫县安全局称，从89年12月13日起就测得该地有神秘电台活动；与匈牙利相邻的马拉穆列什县的安全局也截收到了无线电匈语对话。

而罗马尼亚国防军空军则称，在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被捕后，在首都布加勒斯特、海港城市康斯坦察、“火山口”蒂米什瓦拉、工业重镇伽拉茨、克拉约瓦等重要地区的上空曾发现大量奇怪的空中目标，在22—26日短短五天里，共发现1917个，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后就明显减少，27日后再也没有出现……。

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让罗马尼亚军民如堕烟海，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难道在这场自发组织起来的革命中，有至今不知名的某种“敌对力量”在插手？于是，许多人又将此于迅速处决齐奥塞斯库一事联系在一起，这难道真是场政变吗？

不过，不管是革命、政变、还是阴谋，在这场暴风骤雨中，有一个人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里。他，就是前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将军。在12月17日的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位将军因他的部队没有向群众开枪而遭到齐奥塞斯库的怒斥。5天之后，在形势最为动荡的12月22日，罗电台突然宣布米列亚将军自杀的消息。也正是他的死，最终导致了国防部队的倒戈，这也是群众取得胜利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人们对他的死一直持怀疑态度，有人称是齐奥塞斯库亲手开枪打死了他。在审判齐奥塞斯库时，公诉人曾问到这个问题，但齐奥塞斯库一口咬定米列亚是叛徒，他是畏罪自杀。所有的一切却因无从考证，而使米列亚将军的死成了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不管怎样，这位将军勇敢而正义的形象永远印刻在所有看见发生这一切的人的脑海里，他被人们称为“伟大的英雄”，并被隆重安葬在他的故乡。

硝烟中的谜团至今尚未解开，人们也来不及多加考虑，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镇压人民的独裁者已不存在，一切都要从头建起。对于齐奥塞斯库本人来说，这个结局是残酷的，他从人民革命中脱颖而出，又在人民起义中崩溃垮台。那些20年前紧紧团结在他周围的人民，为什么在20年后又都要推翻他呢？那具弹痕累累的躯体上死不瞑目的双眼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四、齐奥塞斯库的一生

1. 农民的孩子

1918年1月26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的冬天。

灰蒙蒙、冷嗖嗖的空气笼罩在位于喀尔巴阡山山脚、奥尔特河谷的斯科尼切斯蒂村的上空，一段时间以来，白色已成为天地间唯一的色彩，每家每户挡雨披檐上往昔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葡萄藤如今也已成为枯枝败柳，在积雪的覆盖下更是透出一股苍凉和静谧。

突然，在村东一座装饰简朴的长方形木屋里传出一个男婴短促、有力的哭声——一个生命诞生了。村里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只不过向又一次成为父亲的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举杯祝贺，顺带同情地拍拍他的肩膀，哎，又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孩子的父亲则很满意，这已是家中第三个男孩了，虽然家中只有3公顷的土地，但多个劳力对祖祖辈辈务农者来说，总还是件好事。

小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慢慢长大了，他又多了几个兄弟姐妹，全家人住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靠着那3公顷的土地，的确难以糊口。为了让孩子接受最起码的小学教育，善良的父母将仅有的这点土地也抵押了出去，还让稍大点的孩子放学后给别人放羊、割草做小工。日子过得很艰难，温顺驯良的父母亲似乎让生活压弯了腰，每当家中又揭不开锅的时候，小尼古拉便开始愤愤不平。

没有寄托，没有希望，前途更是渺茫，日子整天在单调的操劳中日复一日地过去。伴随着羊群走过喀尔巴阡山山脚每一块草地的小尼古拉终于养成了沉默寡言、察言观色的习惯，他的行为在家中、学校和地主那里总是无可挑剔的。

尼古拉10岁了，家里的兄弟姐妹已有10个，眼看着父母那微不足道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尼古拉的哥哥已外出谋生，但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就在这一年，尼古拉小学毕业了，老师对他很满意。这孩子在学校安静，认真，记忆力出众，尤其在数学方面成绩出众。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也面临着外出养家糊口的命运。

1929年，年仅11岁的尼古拉离开家乡来到首都布加勒斯特学手艺，碰碰运气。然而就在这有3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经济危机的侵袭。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罢工、抗议和示威震撼了这座城市，也震撼了第一次置身城市中的尼古拉。

周围的嘈杂和喧嚣令尼古拉感到十分不快，这和以往他所熟悉的宁静、纯朴的田园乡村有着天壤之别。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里，富人附庸风雅，盲目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穷人则在肮脏的简屋陋室里挣扎。以往的那种愤愤不平重又在尼古拉的心里燃烧了起来。

尼古拉好不容易在一家鞋铺里当了学徒，并和当地和他一样出身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工人们交上了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崇尚当时民族主义右翼提出的口号：对年轻人来说，一切事情都是可能做到的。可是好景不长，这家鞋铺倒闭了，这位身材单薄、眼睛忧郁而明亮、棕发浓密而卷曲的年轻人便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在那里，他终于发现有他用武之地的地方——工会。尼古拉为他今后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迈出了第一步。

1933年初，由于卡罗尔二世的登基，罗马尼亚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6月，罗举行了反法西斯战士代表会议，成立了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因在工会出色的工作年仅15岁的尼古拉，代表布加勒斯特民主青年参加了大会。黑暗的前方终于出现了一道曙光，他踌躇满志、心情激动，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面对着这如同喀尔巴阡山汹涌奔腾的山洪的讲话，人们难以相信他就是平素少言寡语、身材瘦弱的乡村少年尼古拉，从小学起就养成的过目成诵和逻辑思维能力终于使他脱颖而出。

1933 年 11 月，年轻的尼古拉因散发反对政府的传单第一次被捕。这次被捕反而使他名声四扬，释放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布加勒斯特青年团组织的基层干部。现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名字上了政府的黑名单。在接连被捕了三次之后，尼古拉于 1934 年 9 月被遣返回了家乡斯科尼切斯蒂村。不过布加勒斯特的一切还是在吸引着他，相比之下，家乡的生活是如此单调、乏味和无望，周围都是些逆来顺受、不懂反抗的人。在家人眼里，小尼古拉是个英雄，父亲为了资助他重返布加勒斯特，卖掉了家中仅有的两只羊。

重返大都市的尼古拉立即又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接上了关系。但此时他常常被盯梢、被追捕，工作完全转入了地下。不过这不仅没有吓倒他，相反，还使他感到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这是重新塑造自己，谋求理想的社会地位以及确定要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所必须走过的阶段。当然，光靠几年小学知识是无法继续使他同愤怒的政府抗衡的，因此，尼古拉重又捧起了书本，非凡的记忆力再次帮了忙，使他此后在和当时政府对垒时，能以更激烈、更尖刻的语言发泄出令他窒息的满腔愤恨。

光阴飞转，在东躲西藏的生活中，尼古拉终于年满 18 岁了。和以前一样，他身材不高，还很孱弱，只是有一点，他眼光中的忧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伶俐的、善于察言观色的眼睛，显得神采飞扬。他已准备好同今后生活中的任何困难挑战了，只不过目标还是显得渺茫。

就在罗君主专制倾向日益严重的 1936 年，尼古拉担任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普拉霍瓦州的州委书记。在一次秘密会议中，由于叛徒出卖，他再次被捕。在法庭审判时，尼古拉身上既看不到沮丧，也看不到胆怯，他终于遇到了让自己放声呐喊的机会，他激动地挥舞双臂嘲笑法庭和当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将话说完整些。他在向人们显示，他不是懦夫，也不缩手缩脚。他成功了，几个为他辩护过的

证人在10多年后还能回想起他的坚毅和勇敢来。不过他立即付出了代价，不仅被判刑2年，而且还因侮辱法庭被罚款2000列伊。

尼古拉被关进了素有“罗马尼亚巴士底狱”恶名的多夫塔纳监狱，这是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勇敢地忍受了许多非人的待遇，而且还十分感激当局对他的“恩惠”。就在这座监狱里，尼古拉结识了一大批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对他将来影响颇大的乔治乌·德治。他们了解革命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的种种困难和解决方法，还经受过初期失败的考验。尼古拉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象海绵一样贪婪地汲取这些宝贵经验和历史知识，并和比他大17岁的德治建立了默契、友好的关系。两个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年青人虽然年龄、籍贯各不相同，但类似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许多共同语言。德治也是11岁时，在小学毕业后就当了工人，并参加了工潮运动，他比尼古拉早4年参加罗共地下组织，阅历和经验将尼古拉牢牢吸引在他的身边。

1938年12月8日，在多夫塔纳度过22个月刑期的尼古拉终于迈出了监狱黑黑的大门。此时，在20岁的尼古拉心目中，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故乡，而斯大林则是唯一能把社会主义引向胜利的伟大领袖。尼古拉为他以往迷惘的生活画上了句号，并决心向着心中这块圣地勇往直前。他的导师乔治乌·德治十分赞同他的想法，事实证明，当时的民主党人只是不想冒任何危险来获益，面对真正的斗争他们只是观望而已。不过当时国际舆论对斯大林所执行的肃反运动、官僚主义的揭露的确使罗马尼亚某些共产党员产生了失望和迷惘的情绪，但这并不妨碍尼古拉努力培养他的信仰，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他就会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更何况他的战斗刚刚开始。

他又和布加勒斯特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接上了头，继续他的充满刺激的地下冒险工作。不久，一位姑娘走到了他的身边，为那紧张而又艰险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温馨和快乐。

那是1939年的5月1日，布加勒斯特的行会组织在共产党地下

组织、反法西斯运动战士的号召下，举行了一场有 2 万多名群众参加的“五·一”大游行，抗议卡罗尔国王的君主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尼古拉决定在这天由“地下”转为“地上”。这天风和日丽，灿烂的阳光预示着炎热的夏季即将到来。尼古拉在群心激昂的游行队伍里忽然发现了一位褐发、圆脸、薄嘴唇的小个子姑娘，并对她一见钟情。姑娘的聪明、爽利和充满活力深深吸引住了尼古拉那颗年轻的心。她就是日后和尼古拉携手相伴 40 多年的埃列娜·彼得列斯库。

但这个甜蜜的爱情故事并没有持续多久。1940 年 6 月，已被选进罗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的尼古拉在一次新的示威游行中被捕。这次，他被投进了布加勒斯特南郊的另一座“活人的地狱”——日拉瓦监狱，这年，他才年满 22 岁。1943 年 8 月，他又被转移到了特尔古日乌集中营关押，并和早被关押在那里的多夫塔纳监狱的难友乔治乌·德治相遇了。这期间，尼古拉在经验、知识上又提高了一步。因为长期与比他年长的共产党员同处一室，他得到了适当的活动范围，结交了不少盟友，也借鉴了不少具有实际意义的斗争经验；难友们组织的教学小组又使他学到了小学课本以外的许多东西；此外，政治监禁又令他获取了某种“地位”，从今以后，他已属于一个集体，再也不是单枪匹马了。尼古拉信心百倍。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罗马尼亚人民却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管是卡罗尔国王还是之后取而代之的安东内斯库政权，都屈从于柏林，安东内斯库甚至还背叛了人民，不负责任地加入德国人的轴心国，迈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这使罗马尼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身陷囹圄的尼古拉及同仁对安之举义愤填膺，但此时罗共只有 1000 多名党员，在监狱狭小的牢房里，只有将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胜利上。

1943 年末与 1944 年春，国内外形势使一场旨在消灭安东内斯

库政权的人民战争迫在眉睫。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形势下，特尔古日乌共产党人的行动自由了起来，乔治乌·德治和毛雷尔、斯托伊卡、波德纳拉希等几个老共产党员开始整顿党的组织。德治向持怀疑态度的尼古拉解释，这场全国起义会得到苏联红军的支持，这使尼古拉的精神为之一振，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

春天一闪而过，酷热的夏天又来临了。敏感的尼古拉已嗅到革命的气息，不过他对仍被排斥在德治、毛雷尔等人组成的决策圈之外感到难以接受，然而 4 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学会了忍耐和等待。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44 年 8 月 20 日，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战线发起了全面进攻；由罗共领导的全国武装起义也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发动，里应外合，终于在 8 月 23 日这天迫使安东内斯库政权签署了停战协议，罗马尼亚共产党终于获得了“抛头露面”的权利。

特尔古日乌集中营的大门永远敞开了。4 年来，尼古拉第一次呼吸到了自由清新的空气，这又激发了他的斗志。的确，旧制度牢固的体制还在，忠实的信徒还有，革命虽然胜利了，但离尼古拉心中的最终目标还差得很远，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尼古拉的眼睛里再次闪动着激情和渴望，投身政治后 7 年的监狱生活无疑是所免费的大学，他学到了以往在群众运动中学不到的东西，他仍然沉默寡言、谨慎小心，其实这是一种在策略上的沉默，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寻求自我保护、以屈求伸式的沉默。他要向人证明，他不仅仅是农民的孩子，而且还是喀尔巴阡山的天才。

2. 喀尔巴阡山的天才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25 岁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又和 4 年前的那个埃列娜阔别重逢。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份柔情蜜意，相反，两人之间的那种依赖和信任却在与日俱增。他们认定，在动荡、充满敌意和妒意的环境里，只有对方才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埃列娜虽然相貌平常，但很有头脑，也会审时度势，的确是尼古拉为之拼

搏的事业中极需的帮手。这一年，他俩幸福地结合了，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休戚与共的生活。

新婚的激情刚刚过去，尼古拉又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事业，并感到忧心忡忡。罗共虽然胜利了，但远未执政。另外，他还觉得孤立无援，在多夫塔纳与之患难与共的德治、毛雷尔、波德纳拉希等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注意，而自己似乎还只是这些决策者身边的一个小弟弟，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尼古拉深感自己能力有限，眼界也不宽，为此常懊恼不已。不过罗马尼亚的革命事业还是压倒了一切计较得失，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尼古拉清醒地认识到罗共极需苏联人的帮助。他终于拿起笔来，在刚刚创刊的罗共机关报《火花报》上奋笔疾书，呼吁青年共产党人起来与苏联人并肩作战。

形势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着。1945 年 3 月 6 日，随着彼特罗·格罗查博士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罗共终于找到了一块生长发育的沃土。决策者们认为，这是将党的事业变成群众运动的最佳时机。立刻，罗共积极的活动以及公开的宣传成了当时人们关心和谈论的主要话题。1947 年，罗共人数轻而易举地猛增到了 70 万人。尼古拉兴奋地看着党的队伍的扩大，这将意味着过去的精英已无法卷土重来了。

尼古拉深感振奋，预感到十几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临近了，一种即将飞黄腾达的惊喜感刺激着他的全身。不过他立即让发涨的头脑冷静了下来。他发现自己除了是名共产党员之外，还是什么资本也没有，没有后台、孤立无援。当务之急是入情入理的分析时局，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保护神。

尼古拉将注意力又转到了同德治的关系上，这位在多夫塔纳监狱和尼古拉建立友谊的老共产党员在世人面前声名大振，目前正任格罗查政府中的经济部长之职，极有可能被提升到党的最高领导位置上去。但那个决策圈却将德治和尼古拉拉开了距离，不过尼古拉很有信心，他和德治很有共同语言，经历也极其相似，要恢复以往

的情谊还是很容易的。

1946年11月，尼古拉被派往家乡奥尔特县任党委书记。他看到的依然是10岁那年离开时的惨景：土地由于连年干旱变得荒芜贫瘠，投机分子囤积居奇，食品极端匮乏，老人、孩子在冬天冻馁而亡者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这届政府执行的土地改革丝毫未触及富农阶层，不平等的现象依旧存在。

这一切使尼古拉夜不成寐，苏联老大哥的形象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他眼前：工人们目光专注，面孔庄严；集体农庄的妇女们面庞圆润，朝气蓬勃。“对了，应该象苏联人那样，用集体化来彻底消灭私有制，摆脱目前贫穷落后的状况。这应该和德治同志好好谈一谈。”想到这儿，尼古拉脸上绽出会心的微笑。

尼古拉的想法再次和经济部长不谋而合。德治惊喜地看着他的这位小弟弟，厚厚的嘴唇因兴奋而咧得大大的。让他惊讶的是尼古拉小小年纪就有战略眼光，看得远；让他高兴的是自己已有不遗余力的支持者了。他有力地拍拍尼古拉瘦小的肩膀，仿佛往上架了副担子。“好好干吧，尼古拉！”这一拍让尼古拉明白，自己崭露头角的时机到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就如尼古拉盼望的一样：1947年12月30日，罗人民共和国成立；1948年2月，罗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队伍更加壮大；同月，乔治乌·德治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而立之年的尼古拉终于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事实证明，自己大多数的猜想总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当然，这里面埃列娜的功劳不小，她似乎也有料事如神的本领）。别的人被洗掉，被刷掉，自己却一步一步地走向政权的最高峰。尼古拉又一次夜不成寐，不过这一次是因为太激动。他看着躺在一侧的埃列娜，十分庆幸自己毫不犹豫地娶了她，他爱她，她也的确是个好帮手。

他顺利地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这是尼古拉担任的第一个部长之职。上任伊始，他就将和德治讨论过的理论付诸实践。农村的

集体化运动不仅是尼古拉为之倾倒的一种发展模式，也为他创造了施展才能的好机会。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苏联集体农庄的美好景象，只不过那些健康、红润的面庞都已换成了罗马尼亚人的面孔。

尼古拉又一次成功了，农村改革顺利进行。人们看到的是穿着节日盛装驾马拉犁的农民，是随着悠扬的小提琴乐曲围跳霍拉舞的青年男女，是着装整齐可爱的孩子们。舆论界则不时地提醒人们，别忘了这一切的缔造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尼古拉干劲冲天，只要保持谨慎从事的作风，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什么都能做到。1950年，年仅32岁的尼古拉又在一个新的部门走马上任，而且这一次终于使他跻身于向往已久的最高决策机构中了。他被任命为武装部副部长、军队最高政治部部长，而在1944年8月起义中建树颇大、大名鼎鼎的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则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出身农民的尼古拉虽然对于军人世界知之甚少，并缺乏实战的经验，但他自认为是一名战士，满怀激情地将他在农村搞集体化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同自1944年以来尚未从罗境内撤走的苏联军队的军官相处甚密。到1954年，在这些军官的指导下，尼古拉终于建立起属于将来的民主军队。同时，在同波德纳拉希的接触中，尼古拉韬光养晦的本事大增，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社交上，尼古拉从不显山露水，小心翼翼，深知言多必失，也明白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德治身旁，他出言谨慎，并不象某一撮特权人物那样整天围着德治转，花天酒地。年富力强的尼古拉，终因其刻苦工作和严守纪律赢得了各方好评。

然而这个时期苏联老大哥的表现却不尽人意，它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直接威胁到罗马尼亚的主权和独立，这让一直对苏联深信不疑的尼古拉苦恼不已。但无论是斯大林的逝世，还是赫鲁晓夫的上台；无论是搞非斯大林化运动，还是匈牙利“伊梅尔·纳吉”的悲剧，都没有影响尼古拉的步步青云和层层擢升。1954年4月，幸运之神又在向尼古拉招手——德治对

赫鲁晓夫实行的集体领导极为欣赏，便如法炮制，将党的总书记一职取消，改设四人组成的书记处，尼古拉没有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进了书记处。第二年，在罗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7岁的尼古拉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进入了党的前10名领导人的行列。

1958年，苏联撤出了驻守在罗境内的军队，压在布加勒斯特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去。罗领导人开始公开和莫斯科对抗，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德治对苏联人硬让罗在经互会内分工搞农业的主张十分不满，尼古拉更是气愤，他们认为农业固然重要，但罗的首要任务是重工业。不过德治并不想跟莫斯科闹翻，他只想让赫鲁晓夫明白，控制罗并非一件易事。1963年初，双方高层领导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成为这次谈判罗方代表的尼古拉慷慨陈词，将莫斯科的气焰压了下去。5月底6月初，苏联又派人来到布加勒斯特协商妥协，尼古拉表现得更加趾高气扬。不过此时连德治也奈何他不得。因为尼古拉对他在苏联人面前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早已不耐烦了。不过事实证明，尼古拉所坚持的独立自主方针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这一支持首先来自遥远中国的北京。尼古拉获得了被理解、被认同的喜悦，现在，再也没有人会说自己错了，岁月的流逝证明了自己是个真正有主见、有胆量、更有眼光的罗马尼亚人。

1964年的春天，德治的身体每况愈下，呼吸短促，连续咳血，情况相当糟糕，医生已确诊他患了肝癌。日薄西山的德治终于失去了大刀阔斧的魄力。望着德治决策圈里的毛雷尔、斯托伊卡、阿波斯托尔……人们纷纷议论德治的接班人，"他会是谁呢？"人群中有人窃窃私语。

1965年3月19日乔治乌·德治逝世。3月22日罗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在政治局的举荐下，中央全会一致选举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担任第一书记，斯托伊卡任中央书记。对于这个结果，广大群众没有什么异议。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尼古拉已在人民面前树立了

极好的形象，他不象斯托伊卡那样以德治继承人自居，更不象阿波斯托尔那样明目张胆地控制着工会，相反，他那坚持罗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主张深得人心，农业集体化的运动又为他塑造了年轻、热情的实干家的形象，更何况他是那群决策者中最为年轻的一个。

在德治的葬礼上，这个身材矮小的人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在送葬队伍之中，紧抿的双唇透出一股坚毅和自信，他看不见周围缓步慢行的人群，听不见周围掩面而泣的哭声，他只知道“天降大任于我，德治的一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就要开始。”

这个喀尔巴阡山的天才终于实现了童年的梦想。

3. 罗马尼亚的天方夜谭

德治作古，尼古拉如日中天。过去，报刊上大肆宣传的只有德治一人，现在，轮到尼古拉受到推崇了。不过首先得改变一下生活方式。齐奥塞斯库一家从布加勒斯特市奇斯列夫大街高干住宅区内搬了出来，住进了环境优雅宁静的加里宁大街的一座象梦一般美妙的房子里。房前一字排放着一辆德国产黑色奔驰汽车和两辆美洲豹牌汽车，房子四周是整齐地耸立着法国梧桐和橡树的林荫大道，显得越发宁静和宽阔。

院落里静悄悄的，听不到什么人声。尼古拉很少呆在家里，他正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党的九大即将召开，他得马不停蹄地在党中央大厦办公室里准备会上的发言稿，这关系到罗将来的命运和前途。埃列娜在家相夫教子的生活暂时告一段落，他俩的三个精力旺盛的孩子都已上学，埃列娜又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在随尼古拉步入上层社会之后，埃列娜对自己仅有的 3 年小学文化程度一直耿耿于怀。她并不满足做尼古拉的妻子，她也要出人头地，至少在党中央大厦里有她的办公室。在埃列娜看来，知识意味着权势，何况自己又那么喜爱科学，尤其是化学，只要稍加点拨，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定会发挥出来，这个想法当然得到了尼古拉的加倍

重视。现在，她正对着镜子用梳子梳理着垂在鹅蛋脸两侧烫起微微波浪的青发，满意地笑了笑，拎起一只玲珑精巧的手提包，出门去科学院副院长西莫尼埃斯库那儿上化学课。

尼古拉夫妇的这幢有40个房间的二层小别墅名为“春天宫”，它与这别墅的确十分相配，每个房间不仅春意盎然，而且富丽堂皇。看来，埃列娜为布置、装饰这些房间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她，创造了“罗马尼亚的天方夜谭。”

一进这幢别墅，人们仿佛置身于一座金光闪闪的殿堂。一层布置豪华的门厅顶端有一个金色圆盖，大厅内桌子上和厨柜里摆着的托盘、茶具、烟具以及精美的玉雕工艺品闪耀出夺目的金光，两个中国明清朝代的大青花瓷瓶在这一片华光中更是洁白如雪，为大厅平添了不少神韵。

大厅之外还有两间饭厅，也布置得豪气逼人。墙壁四周的暖气片上也都镀上了一层黄金，饭桌上摆放的餐具以及中央三个高达2尺，形状各异的蜡烛台都是纯金的，这将它们主人的地位衬托得更加至高无上。

二层是尼古拉夫妇和孩子们的房间，中间有一个布置得象楼下客厅一样豪华的大厅，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及十几幅罗十九世纪著名画家的原作。

尼古拉本人住在单独的套间里，屋内设施豪华齐全，每个房间都配有一台西德电视机，那是为了让他看法国和美国影片特意准备的，他在床头柜上放有三部线路不同的电话机，这为尼古拉处理日常事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浴室里铺满洁白的意大利瓷砖，热水从每个镀金的自来水笼头里汩汩而出。

埃列娜套间的豪华程度只需稍稍看看她的鞋柜便略知一二：在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一排排鞋子中，大多是由法国时髦女子皮鞋鞋匠夏尔·儒尔当制作的，有些鞋的鞋跟居然是用钻石镶嵌的，这些鞋都是要与她数以百计套时装相配穿的。

卧室中她的床象只金光闪闪的大船，床头雕刻有镀金的花纹，高级丝绸面料的被褥灿烂夺目，靠墙的衣柜里挂满了颜色和式样各异的高级裘皮大衣。

为保证尼古拉的身体健康，除为他特别规定食品的摄取量和饮食之外，人们还在这幢别墅的室外为齐奥塞斯库夫妇及孩子准备了健康中心，配有游泳池、拳击场、排球场及若干个舒适的网球场。在闲暇之余，尼古拉和埃列娜可在这些地方游泳散心。

不久，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全国各地拥有了六、七个同样规模、同样设施的别墅……

1965 年 7 月，罗共九大在布加勒斯特顺利召开。在装饰得五彩缤纷的主席台上，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尼古拉感到振奋不已，他深知这一切得之不易，要牢牢地抓住它，自己不能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大会开始了，尼古拉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两臂在绷得僵直的身躯和双肩两侧上下挥舞，这成了尼古拉以后发表演讲时不可缺少的动作。他为罗的将来规划了一张极其美好的宏图，并制定了头五年的工作计划。当然，罗首要任务是发展重工业，工业发展了，社会经济也会全面发展。同时，农村中的集体化运动也应坚持不懈地搞下去。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模式，尼古拉巧妙地用语言赋予它尼古拉本人的色彩，成功地赢得了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在党第一书记的这把交椅上，他又开了一个好头。

埃列娜干得也不错，她对科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在副院长西莫尼埃斯库的指导下，她已开始撰写有关化学的论文，当然，西莫尼埃斯库博士总能指出并改正她论文中的错误来。尼古拉渴望运用科学来征服大自然，因而在 1965 年 12 月，他成立了科学研究委员会，基于对科学的满腔热情，也由于对罗化学界所做的“不懈努力”，埃列娜顺理成章地进了这个委员会。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全国上下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第一书记那生机勃勃的形象十分满意。尼古拉一家的

生活也十分惬意，孩子们为这个家增添了不少欢乐。埃列娜对三个孩子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尤其是对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这个生下来就精力旺盛的孩子深得母亲的宠爱，她十分关注他的营养，严格按科学方法为他配餐、进餐，定期给他称体重，对他房间的卫生也刻意追求。当然，这个孩子以后应该有更好的光辉前程，而尼古拉也该有个优秀的继承人，埃列娜深明这个道理。

在别人看来，这段时间里尼古拉正处于一种忙里偷闲的自在、满足状态中，他常常在工作之余和埃列娜及其孩子去布加勒斯特近郊的斯纳戈夫小别墅度假，或者去时刻等待他的围猎场打猎。其实，这只是一种小憩，一种类似象运动员最后冲刺前的养精蓄锐。尼古拉心中并不满足现状，他野心勃勃，"齐奥塞斯库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为了这个时代的到来，尼古拉甚至准备不惜和他的导师——乔治乌·德治划清界线，然而德治过去的亲信和部下还太多，有人抱怨，有人失望，还有许多事情等待尼古拉去解决。

面对斯纳戈夫别墅前那一汪碧绿宁静的湖水，靠在湖边躺椅上的尼古拉在闭目养神中已酝酿了一系列计划。

4. 一朝权在手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正在走向权力的巅峰，他再也不是多夫塔纳监狱里的那个热情洋溢，对共产主义充满美好理想的小伙子了，他对复杂的现实表现得十分清醒和理智。在和德治共处的那些年里，他在惊涛骇浪中扬帆驾舟，在沉默寡言中养精蓄锐，他已是个十足的宦海老手了。他心中明白，目前正是自己走向权力之巅的大好时机，为了"齐的时代"的到来，自己应该走出沉默，放手大干了！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尼古拉大刀阔斧地干了几件大事，"改朝换代"的任务终于顺利完成。

首先，他以提高效率之名兼任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将党政领导权合二为一；接着，平反了50年代的一些冤案和错案，其中最著名

的是为吕克雷蒂乌·帕特拉斯卡努昭雪。尼古拉在68年4月的一次党中央全体会议上宣布：1954年4月16日以间谍罪在日拉瓦监狱里被处决的前司法部长帕特拉斯卡努是无辜的，他的死是由德治及其助理德拉吉奇一手造成的。德治过去的战友们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果不其然，厄运开始降临到了他们身上，首当其冲的是阿波斯托尔，这位处处以德治继承人自居的家伙被解除了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下一个轮到了德拉吉奇，赶走他是民心所向；在1970年的罗共十大上，以斯托伊卡为代表的罗共“元老派”全部被排挤出了中央。

在清理罗共头面人物的同时，尼古拉又抓紧做地方中层干部的思想工作。这群干部素有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对党尤其忠贞不二。不久，尼古拉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接着，尼古拉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一个没有知识分子支持的政权也是不牢靠的，再说罗马尼亚的事业也需要科学和人才。尼古拉给了知识分子许多便利条件：提供经费让科学家们从事专门研究；给作家提供了创作和发表著作较为自由的氛围；鼓励舆论界的批评……另外，知识分子还享受到了许多优裕的生活条件。

1968年，幸运之神又向尼古拉招手了。8月20日，在捷克境内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令尼古拉十分痛心，苏联太不尊重别国的主权、别国的人民，罗舆论界也为之哗然，21日，站在阳台上的尼古拉面对从四面八方涌向共和国广场上的人群，他的心脏怦怦直跳起来，他感到罗马尼亚人民正等着他出来主持正义。他终于发表了那个著名的讲话：“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各个共产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他还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建立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武装爱国卫队，来保卫罗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人民受到了鼓舞，报之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人们对尼古拉树立起来

的新形象敬佩不已，党内的反映也相当热烈——尼古拉已将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地团结到了他的周围。

这次讲话取得的另一个事倍功半的效果就是使国际上对罗马尼亚另眼相看，继法国总统戴高乐夫妇访罗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夫人立即访问了布加勒斯特。

尼古拉十分感激尼克松的点拨，他明白，自己多年来的夙愿已经实现，“齐奥塞斯库的时代”已经到来。

按说尼古拉该满足了，现在样样事称心如意，但突然间他感到十分孤独，心里不踏实。对军队不放心，对知识分子也不满意，百姓对他来说只是一群被驯服的人，党员更要时时防范，加以控制。也许这一切得到的太不容易，尼古拉就象一个吝啬的守财奴，整日里为担心财宝的丢失而心慌意乱。

他开始频频出访国外，美国、中国、朝鲜和蒙古，一站接着一站，明显地感到人们对他的尊敬。国际声望日隆让他又看到了自己的能力所在。回国之后，他立即做出决定，开展全国性的思想教育，争取忠心耿耿、准备自我牺牲的亲信们的支持。已成为布加勒斯特一所化学研究所所长的埃列娜则提醒他只能在家族内网罗这些忠实信徒，外人都是不可靠的。尼古拉点头称是，十分敬佩埃列娜的聪明。

首先该提拔的当然是埃列娜，她已成为他必不可少的帮手。这几年来，埃列娜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她已获得多种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虽然听她论文答辩的人寥寥无几，来的人中许多也是迫不得已，比如著名专家康斯坦丁·奈尼特斯库就是因为怕实验经费被砍掉才来的；虽然埃列娜周围的研究人员都对她有保留意见，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她的步步青云。1972年，埃列娜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负责领导教育和科学，她终于在党中央大厦拥有她自己的办公室了。同时，她还让人将一个房间改成了化学实验室，为和她那被世人称颂的科学头脑相配，实验室里的设备都是纯金的。不

久，她又进了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主管干部的人事工作。

母亲上去了，顺带可以提拔一下自己的爱子，为尼库编织美好未来成了埃列娜的当务之急。尼库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布加勒斯特大学的物理系，所学的专业是当时极为热门的核工业专业。他平时一般不住校，每次来上课总能在同学中引出一场不大不小的的轰动效应，因为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银灰色的“波尔舍”轿车，这在当时的罗马尼亚还找不着第二辆。1973年，尼库被任命为大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不过同学们不太可能接近这位副主席，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周围总跟着一大群保镖。

尼库大学毕业了，全国各地书店的橱窗里立即就摆上了一本厚厚的物理学专著。仿佛为了强调尼库的“才智”，他的名字被高高印在封面的显著位置上，下面才是“合著者”——罗马尼亚一位著名教授的名字。

在尼古拉三个子女中唯一投身政治的尼库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这当然得归功于埃列娜的不懈努力。顺利入党后，又在32岁时坐上了共青团领导和青年事务部长的交椅，后来又成了中央政治执委员候补委员。不久，尼古拉开始考虑培养他做外交部长。不知不觉地，人们开始称他为“继承人”了，“太子”的称呼也在老百姓中流传开来。

不过尼库并不在乎父母给他安排好的一切，也不珍惜埃列娜好不容易给他树立起来的形象，他的主要爱好是法国白兰地、狂喝滥饮的晚宴以及著名体操运动员科马内奇。1983年，在埃列娜苦口婆心劝说下，尼库不得不和比他大5岁的罗少先队员组织领导人波利娅娜结了婚。这个由埃列娜一手操纵的政治婚姻并没有束缚住尼库，一年之后他们就分手了。尼库重又回到以往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去，并和各式各样的女人混在一起招摇过市。这使尼古拉和埃列娜痛心不已。但是在尼古拉心中，尼库还是个精明、能干又忠贞的好小伙，任何流言蜚语只会使这个家庭的成员更加加强相互间的保护和联系。

尽管身边已有两名“忠实的信徒”，尼古拉还是觉得不放心。不久，埃列娜的兄弟格奥尔基·彼得列斯库成了全国工会的负责人；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担任了国防部副部长兼最高政委会书记、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和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自己的妹夫是罗共中央农业书记。好了，现在党会更加依附于他，是他给了他们一切；没有他，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推荐下，1974 年 4 月，尼古拉成了罗实行总统制后的第一个共和国总统。当然，这也意味着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广泛权力。之后，尼古拉为了更便于工作，“提高效率”，他又担任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团结阵线主席、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等多项国家最高职务。

在党组织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舆论工具的宣传也得同步进行。思想建设的激情完全吞噬了尼古拉的心。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书籍和音乐铺天盖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则成了光辉历史的化身——在罗马尼亚小学生的课本中，他象“雄壮伟岸的喀尔巴阡山”，象“源远流长的多瑙河”；他是“人民最爱戴的儿子”，作为一位“举世无双的新人”，他将永垂史册……

接着，经过周密考虑，尼古拉开始走访全国各地，同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接触，并不失时机地发表演讲。尼古拉在工农群众中如鱼得水，因为他也出身这一阶层，很了解这些人需要什么，想听些什么。他也常去大学讲演，每逢此时，他就一大早去党中央大厦的办公室仔细准备。他的话大多言简意赅，很善于将理论和实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富有哲理，又很实在；既摆出困难，又给人希望，极大地感染了听众。

这样的巡视是富有成效的：尼古拉走到哪里，哪里就会鲜花簇拥、掌声雷鸣；人民向他们所敬爱的领袖伸出了一双双粗糙的、骨结硕大的手；孩子则被举得高高的，能被领袖抚摸一下，或者拥抱

一下，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不久，各地巡视和公开演讲成了尼古拉政治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全民中集中加强的思想建设居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5. 一个时代的悲剧

步入中年的尼古拉胸有成竹、野心勃勃，他对自己在公众面前树立的威信极为满意，他还要给罗马尼亚人民另一个更大的惊喜，那就是 1965 年罗共九大制定的工业化计划。尼古拉决心让罗在 1985 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 1990 年或 2000 年必须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几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执行这一宏伟蓝图。尼古拉认为，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目标，提高积累比例不失为一捷径。因此，他决定将国民收入的 1/3 都用来积累。到了 70 年代，罗马尼亚果真取得了经济增长率高达两位数的辉煌战绩，并已经发展了能够加工 3500 万吨原油的石油化工工业，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的规模也已相当大。尼古拉沾沾自喜，对那些担心能源危机的研究者们的忧心忡忡毫不介意，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嘛。

不过没多久尼古拉就发现罗马尼亚生产的汽车、直升机、计算机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原因很简单：质量问题。与此同时，要继续维持这种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工业，靠罗国内现有的工业原料和燃料已经无法办到，一半以上的燃料必须从国外进口。“那些学者们的担忧还是有点道理的。”尼古拉心中暗想，罗马尼亚落后的生产技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工人调动不起来的积极性让他感到伤感和忧虑：“没有外汇收入，如何再进口石油？现在再购买石油的话，外贸就有逆差的危险，那就得借债了！”不得不依赖他人的烦恼重新又锁住了尼古拉的眉头。

但是尼古拉从不轻易承认失败，这只是经济腾飞前的一小段不幸的插曲，还可以想别的方法来维持经济的增长。尼古拉发现可以

减少国家投入住房、卫生保健和教育的费用；可以对人民日常生活的能源和燃料实行配给；甚至可以限量供应商品来抑制消费增长！只要齐心合力勒紧裤带度过这一困难时期，人们会理解他和感激他的。

至于极需进口的西方先进技术以及需求量越来越大的石油，尼古拉另有对策。他明白此时需要自己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既要在西方人那里保持良好的形象，以获取西方贷款和先进技术，又要与莫斯科消除十多年来别别扭扭的关系，从而达到让苏联人提供原油的目的。

这个喀尔巴阡山的天才出访的劲头有增无减，他那坚持独立自主政策的形象继续得到西方世界的欢迎，不过恢复和莫斯科的关系也在遮遮掩掩中悄悄进行。毕竟两者还有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和目标。1976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率团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尼古拉签署了苏罗联合声明——10 来年的冰河终于解冻了。罗马尼亚也获得了来自莫斯科的原油。

进入 80 年代尼古拉又遇到了另一个棘手问题，进口西方技术和石油已使罗马尼亚的外债在 1981 年达到了 110 亿美元，并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就在这年，这位天才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再也达不到 10 年前两位数的飞速增长，而是猛降到 2.5%，并且开始一蹶不振。

尼古拉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埃列娜也帮他出谋划策：现在极需解决的是外债问题，债务如果再度上升，尼古拉会失去民心、民信，尤其会失去目前倍受压力的工人阶级，也就等于向大家承认自己缺乏管理经济的头脑。另外，这也会使西方金融机构得以对罗经济施加影响。最后，尼古拉决定在 10 年后，即 1990 年前全部还清外债，办法是最大限度地限制进口和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以及一整套严格的紧缩政策。这对早已勒紧裤带以求经济增长的老百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人群中终于爆发出 16 年来第一声怨言和责难。

罗马尼亚在 80 年代中迅速地减少了外债，但老百姓却要为其英

明的领袖那无情而又不平衡的紧缩计划付出生命的代价——每年至少有1.5万名罗马尼亚人死于饥饿、寒冷和物资供应匮乏。而历史上罗马尼亚一直是以拥有“多瑙河的珍珠”——多瑙河三角洲而自豪的农业国，十几年来萦绕在每个罗马尼亚人耳边的都是“牛奶加蜂蜜”、又香又甜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在80年代初远离人们而去。随着满载肉制品、粮食等的集装箱的飘洋过海，罗国内对食品、基本物质和能源的定量供应却造成了几乎是战时的境况。忍饥挨饿，缺衣少穿的人民困惑了……

80年代后期，布加勒斯特国营商场星期天一律关门；就在平时，人们面对空空如也的商场也排起条条长龙，那是为了等有限的运货；肉店里看不见肉和肉制品，只有内脏和骨头可买。为此老百姓常常不无辛酸地说：“罗马尼亚的猪都有一颗爱国心，身子可以出国，心却必须留下。”

伴随着冬天来临的是缺吃少穿和叫苦连天，布加勒斯特的室温只能勉强维持在零摄氏度以上，老人、儿童被冻死的情况时有发生；下午5点以后，街上就很少有电灯，几乎每一个夜晚，人们都在黑暗、寂寞和冷清中度过；在别的国家习以为常的电视，在罗马尼亚却成了奢侈的享受，在每天只播送一个半小时的电视节目里，人们看到、听到的也大多是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声音和形象。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得到一次电视剧的享受。

和尼古拉一起度过漫长的战争岁月的老人们开始抱怨了：罗马尼亚在战争时期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难。形势还会继续恶化下去吗？举国上下，忧心忡忡。

人们开始怀疑，开始抱怨，似乎还泄了气，布加勒斯特甚至流行饭馆卖人肉的恐怖谣言，还有人说运动员的加餐也给取消了。更可恶的是美国新总统卡特发起的捍卫人权运动，美国人通过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居然操纵了罗的异教教会和某些知识分子，抗议在罗侵犯人权。尼古拉惴惴不安，必须制止这种恶毒的谣传，结束这种郁

闷气氛，至于抗议侵犯人权的那帮不良分子，让安全部门去清除他们，罗只尊重和保护真正的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成果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但是，奥尔特尼亚的露天煤矿工人还是罢工了，被迫流亡法国的罗著名作家保尔·戈马利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攻击在罗没有人权，连向来与罗比较亲善的法国也变得咄咄逼人起来，密特朗总统居然取消了原定于1982年9月对罗的访问。仿佛还嫌麻烦不够多似的，美国驻罗大使不断向国务院报告罗人权问题，罗美以往的良好关系就断送在他的手里。

尼古拉感到受到了威胁，这些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让尼古拉寝食不安，不过罗的共产主义事业还是不可动摇。罗马尼亚民族是个吃苦耐劳和团结的民族，这些困难就会过去，埃列娜和他必将取得胜利，值得回忆的光荣历史举不胜举，这些事就象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让人记忆犹新。即便自己顶不住了，身边还有忠诚可靠的埃列娜（现在她已是国家第一副总理了），精力、能力同样具备的尼库，内务部、国防部、农业部也还有齐氏家族的兄弟姐妹，尼古拉再次感到获得了勇气，头脑也有条不紊地思考起来。目前最需要一支训练有素而又忠实可靠、装备精良足以抗敌的私人卫队，这样，国内形势再乱，尼古拉也能控制得住，齐氏家族的安全也能得以保障。

他花大力气终于组建了一支有人员7万多名，备有装甲车、直升机、充足的小型武装和弹药的保安警察部队。他们编为17个营，分散在全国各地、个个身强力壮、勇敢、坚韧、训练有素，适合各种作战形式，尤其善于巷战，对布加勒斯特的大街小巷、秘密地道一清二楚，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发过誓忠于伟大的领袖尼古拉。相比之下，国防部由三军组成的正规部队则显得笨拙得多了，人员也只有17万，装备很差，军官待遇很低，士兵伙食也不好，“训练”也大多在田间，厂矿里进行。

另外，还要严加控制罗人和外国人的交往，“自由欧洲电台”为

何如此猖狂，这和罗以往太开放的空气不无关系。尼古拉说干就干，1986 年，第 408 号保密法令规定：罗马尼亚人不得把外国人带到自己家里，外国人去机关、厂矿参观访问只能按指定路线，指定地方，并且还应有罗方人士陪同。同时，法令还严禁罗公民私自同外国人接触。这项法令的严格执行竟使得长期驻罗的外国记者无法进行正常的采访工作，只有在本国党政高级代表团访罗时才有机会随同参观罗工厂车间。

现在全国各地都盛传些阴森可怕的流言，有人说安全部的人可以往井里放毒，监视所有可疑的人的行踪，还会毒打反对派……，尼古拉还听说农民在偷偷挖树根来烧火取暖。另外，知识界、教会中持不同政见者也越来越多，他们常常游行示威，并得到西方各界的支持。

更让尼古拉气愤的是，人群中开始散布攻击埃列娜的流言蜚语，说她发表的关于科学及其作用，以及有关化学的文章和论文都是找别人代写的；然后又称尼库为“花花公子”，说他常常喝醉后粗暴地对待一些妇女。不过自从 1987 年尼古拉将尼库调往锡比乌任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之后，有关“太子”各种各样的传说突然多了起来。有人说尼库是因为和父亲政见不一才被调到锡比乌的，他到锡比乌后，就把经过该县装载准备出口的农副产品的大卡车统统拦住，将食品卸下后摆到以往空空如也的商场货柜上，当地的食品供应大大改善了；还有人说尼古拉对尼库十分不信任，还在他的住所里安放了窃听器。有一天，父子俩就政策问题发生争吵，尼库的脸居然被尼古拉的狗抓破，还是送到法国才治好抓伤的。

尼古拉明白这些传说都是针对自己的，必须制止这些恶毒的流言蜚语，那些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因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而遭到逮捕；国内爱国宣传还要坚持下去，就目前形势看，这个问题尤为重要。不过尼古拉感到精疲力竭，在忠贞不渝的埃列娜的陪伴下，他常常在“春天宫”宽阔宁静的住所里一呆就是几天，足不出户，与世隔绝，

他太需要休息了。

然而外界并不让尼古拉有片刻喘息之机。那些知识分子的被捕遭来西方各种宣传媒介的攻击。1987 年美国决定中止最惠国待遇，甚至连同周边的社会主义同盟里居然也有人对尼古拉指手划脚，匈牙利人还挑起了民族矛盾。更让尼古拉恼火的是，布拉索夫的“红旗”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用游行挑起了一场事端，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举着“打倒齐奥塞斯库”的旗帜走遍布拉索夫。

尼古拉怒不可遏，他给了他们厂房、宿舍、平等的待遇、医疗保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而对四面八方来的挑衅和背叛，他没有退缩和让步。他让司法机关好好审理了这帮闹事者，共有 26 名暴乱分子被判了徒刑。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又向尼古拉扔了一颗定时炸弹。1989 年 3 月 11 日，6 名罗共前领导人联名通过这个电台发表致尼古拉公开信，批评尼古拉的内外政策，他们是前罗共领导人之一庚·帕尔伏列斯库、前罗共第一书记格·阿波斯托尔、前政府第一副总理亚·伯尔拉德亚努、前外长科·曼内斯库、前驻美和联合国大使、前党报总编西·布鲁坎及格里戈雷·勒恰努。这封信的内容和签名者的知名度令尼古拉不寒而栗。现在国内外的人都知道这封信了，西方国家还协调行动公开声援信作者；美取消原定的美罗高级外交会晤；欧共体中断了同罗的贸易谈判；法、德撤回了驻罗大使。面对这些压力，尼古拉毫不犹豫顶住了这些企图干预别国内政的痴心妄想，并对他们报以蔑视的嘲笑，罗马尼亚还是“齐奥塞斯库的时代”，他以间谍罪逮捕了勒恰努的儿子米尔恰，还逮捕了把 6 人信交给 BBC 记者的布鲁坎，抗议者终于又沉默了下来。

时值 1989 年，尼古拉老了，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内困外扰使他身心交瘁，除了埃列娜之外，他时常觉得孤独无援，不被理解，他深信他的敌人就要摧毁他几十年来苦心孤诣创造的一切。现在演讲对他来说也是吃力的差使，说话再也不可能抑扬顿挫，变得断断续

续，胳膊和手不由自主地也在颤动不已。

不过尼古拉是不会轻易被打倒的，否则怎么会叫尼古拉呢？他开始挺直腰板，刻意修饰仪表，把那头浓密的褐发尽量往后梳，他要让他的对手看到他的威严所在。他要让敌人明白他还有人民，还有将来会取得胜利的经济。尼古拉不禁又一次得意地回忆起1989年初全国为他和埃列娜祝寿的热闹景象。

1月7日和26日两天，全国上下接二连三地为埃列娜70岁、尼古拉71岁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祝寿会。会前，布加勒斯特市大街小巷早已被彩旗、标语和尼古拉夫妇微笑的、和蔼可亲的巨幅照片和画像装饰得五彩缤纷。报刊、电台、电视台好象为向尼古拉夫妇祝寿举行了比赛，仅有6版的党报《火花报》在两人生日前后长篇累牍地以4、5版的篇幅赞扬尼古拉的丰功伟绩，电台里爱国歌曲不绝于耳，十多个孩子用稚嫩、可爱的童音在时间不长的儿童电视节目中深情地感谢他们伟大的领袖尼古拉对全国儿童所做的一切。

尼古拉闭上眼，深深陶醉在这种荣耀之中，他承认现在自己急需再次充气。

这个主意再次得到埃列娜的支持，他们把目光转向这年的8月23日。

8月23日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这一天尼古拉夫妇照样是在举行国庆集会和盛大群众游行中度过的。

在21日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尼古拉发表2个小时的讲话期间，群众站起来为他欢呼共计56次；23日布加勒斯特又组织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人群举着尼古拉的巨幅画像，边喊着："齐奥塞斯库——和平"、"齐奥塞斯库和人民"、"齐奥塞斯库——罗共产党"等歌功颂德的口号，边缓慢地走过尼古拉夫妇所在的主席台前。尼古拉则象往常一样，高高举起双臂来回挥舞，脸上重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据说，只要置身于群众中，尼古拉就会忘掉所有的烦恼，这就是他所谓的充气。有人做了统计，在5分钟的

时间里，群众经过主席台举的尼古拉夫妇肖像最多达 400 幅，最少的也有 150 幅（其中 3/5 是尼古拉的，1/5是埃列娜的，1/5 是两人像），在长达 3 个半小时的群众游行中，群众举的尼古拉夫妇的肖像总达 6000 多幅。

尼古拉深深地陶醉了，陶醉于欢呼的人群，向他伸来的一束束鲜花和被举得高高的孩子，谁说自己在国内倍受孤立、不得人心的，让那些谎言不攻自破吧。人民的行动是最有说服力的，六君子公开信事件在国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局势仍旧平稳，人民依旧信心百倍。尼古拉望着缓步走过主席台的井然有序的群众队伍，又一次绽出笑容，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埃列娜也微微点头示意。这是自 1989 年公开信事件以来尼古拉第一次畅快、舒心的微笑，他感到十分轻松、惬意，暂时将烦恼抛到脑后。

然而尼古拉错了，他只要走进游行队伍里细心观察一下每一个游行者，他就会发现某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游行队伍组织得很好，秩序井然，但游行者的表情太机械，太呆板，他们按着早已安排好的路线，早已商量好的口号走着、喊着，似乎是为了完成某件差事不得不来的。对他们来说走过主席台不过是跟着内务部人员组成的"啦啦队"一起将口号喊得更响更齐些，将标语、画像举得更高些而已，游行过后意味着任务也就随之结束了。至于主席台上的人信不信，也只有任他自己去想了。当然，他也不会知道，当时的布加勒斯特流传的这样一个笑话：患失眠症的尼古拉只有听着有鼓掌声的录音才能入睡。

尼古拉大错特错了，他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光辉形象"散射出来的光芒照花了眼，一意孤行的他早已不明白，太阳还有黑子。他曾对美国《新闻周刊》驻欧洲记者说："一些人物，这个或那个党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奉献给劳动人民、本国人民就会赢得热爱和支持。这可不是件坏事！……人民为什么会赞同罗共和党的总书记所执行的政策？这是因为这种政策消除了罗的落后状态，把我国提高到今天

的水平。如果这是个人迷信的活动，那我希望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党和人物，以确保他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事实真是如此吗？

炎热的夏天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凉爽的秋天。日理万机的尼古拉毫不介意他的身体，他在准备他的最后一次胜利。

1989年11月20——24日，罗共十四大在布加勒斯特胜利召开。尼古拉再次被当选为罗共总书记。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受到人们30多次的欢呼。称赞他的口号更是不绝于耳。之后，他和埃列娜在人群的簇拥下走出大会会场，去接受在刺骨严寒中冻了几个小时的群众的“朝拜”。“噼啪”乱闪的闪光灯、一支支伸来的话筒、一束束鲜花以及震耳欲聋的口号让尼古拉再次相信他的胜利。远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三色国旗和罗马尼亚共产党鲜红的党旗在尼古拉心中组成了一片浩瀚无边的海洋，而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又一次冲到了这汹涌澎湃的浪涛的顶端。对尼古拉来说，这意味着成功吗？

仅仅31天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当作全国人民的罪人，血肉模糊地倒在了一堵矮矮的水泥墙前。他们还被孤伶伶地埋在布加勒斯特毫不起眼的根恰公墓中一条小路的两边，生前休戚与共的生活在死后终于被分割开，唯一陪伴他们的是野草和小鸟。

事实证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并没有胜利，相反，他还从浪顶飞落到了谷底，并立即被无情的海浪吞没。尼古拉不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五、让历史去裁判

对于罗马尼亚人民来说，十多年来的冰河终于解冻，一个全新

的时代开始了：人们可以自由谈论，放声大笑；购买打字机不用登记；打国际长途不用担心监听；妇女流产已受到法律保护；大学实行了自治；出国旅游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夜晚对于布加勒斯特的群众来说，不再是寂静、黑暗和漫长，橙黄的灯光夹杂着欢声笑语和美妙乐曲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一点点地流淌出来，为这座伤痕累累的古城增添了不少温馨和暖意。

人们对电视荧屏中齐奥塞斯库肿胀的尸体早已习以为常，有关齐氏家族的种种传闻仍旧陆续传来：人们说齐奥塞斯库一家侵吞了罗马尼亚在1986——1987年期间，为偿还外债向国际市场出售黄金所得的一部分款项；瑞士的两家银行则证明齐氏家族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已达4亿美元；人们还发现，1989年埃列娜为她的三个子女各存了近150万列伊；齐奥塞斯库的弟弟，从1973年起一直担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奥地利商务代表的马林·齐奥塞斯库在他哥哥死后的第三天（12月28日），吊死在罗驻维也纳代表处大楼的一个地下室里；已被拘捕的齐奥塞斯库的女儿卓娅仍要吸美国烟，儿子尼库自封为俘虏们的首领，还把自己说成是目前健在的、罗最杰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另一个儿子瓦伦丁只是懊丧无法再去斯蒂亚乌亚足球俱乐部看比赛了；而对齐奥塞斯库的部下：扬·丁卡，埃米尔·博布……等前罗共高级领导人的起诉则象是一出地道的悲喜剧，他们不是放声大哭，就是自我谴责，甚至表示愿意去死，现在除了懦弱，他们再也没有别的了……

年轻人欢呼雀跃，他们充满活力的肢体再也感受不到压抑和束缚，这样的年纪最适宜自由、开放的环境；但对另一部分中年人来说，事情不仅仅只是在20年前的1968年鼓掌欢呼齐奥塞斯库，在20年后的1989年给他喝倒彩，他们的痛苦在于理想的崩溃，信仰的消失，在于齐奥塞斯库自己毁掉了原来建筑在他们心间的某种美好形象，这比遭受欺骗，蒙受耻辱还要痛苦。刚刚成立的新政府又能给他们什么呢？扬·伊利埃斯库能够帮助他们吗？

欢庆鼓舞的日子过去了，改头换面的罗马尼亚刚刚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伊利埃斯库便竭尽全力收拾齐奥塞斯库遗留下来破烂不堪的局面，然而“休克疗法”收效甚微、“多元化”引来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云。刚刚欢呼自己从独裁中解脱出来的人民，面对一落千丈的经济和依然动荡不安的局势又一次陷入迷惘、失望的境地。这一次，他们选择的方法有没有错？

人们发现至少有一件事是错了。一年之后，即 1991 年初春时分，追查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家族财产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1986——1987 年罗在国际市场共抛售黄金 80.8 吨，所得 10.4 亿美元全部用于偿还外债，没有一丝违法痕迹。

于是乎根恰公墓的那两座光秃秃的坟前开始天天有人送花和打扫了，手捧鲜花、借故走进这个公墓的人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清晨，前来送花的人发现，齐奥塞斯库墓前终于竖起一块用铁片做成的黑色十字架，上面还用白油漆十分醒目地刻写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作为陪衬，十字架旁还点燃着一支长长的蜡烛。这支细细的，火苗在清晨的阳光下忽明忽暗的蜡烛轻轻地叹息着，仿佛要告诉人们什么却又欲言又止；这个小小的，薄薄的，黑底白字的十字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仿佛已不堪重负，它载负的是罗马尼亚一部沉重的历史，有光辉，有荣耀、有耻辱、也有丑恶。

1992 年 11 月的一天，敏感的新闻记者又捕捉到了这样一幕：从关押被判刑的前罗共领导人和齐氏家族的监狱大门里费劲地走出一个瘦骨嶙峋、疲惫不堪的人，他一个人勉勉强强向前挪动着，面对噼啦乱闪的闪光灯似乎毫无反应。他就是已在狱中呆了 1056 天的尼库·齐奥塞斯库，现年 41 岁的尼库因患肝硬化等顽症，体重由原来的 86 公斤降到了 49 公斤。在他的律师的争取下，这位前“太子”终于获准狱外就医。政府对此并未做出其他过多的表态，释放尼库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不过有相当自由权利的文艺界却借机大张旗鼓。电影导演米尔

恰·达内柳克终于争取到在1993年1月26日这天，去大会堂（1989年罗共十四大召开地点）举行他编导的影片《鸳鸯床》的首映式。有关这部电影的内容人们早已得知，所以入场券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卖完了。离开场还有半个小时，大会堂就被6500多名观众挤得水泄不通。

电影开演了，人们没有注意《鸳鸯床》的故事情节，也不再考虑它是褒是贬，所有的人全神贯注在等那个时刻的到来。

终于出现了，人们又一次看到那身材矮小，精神矍烁的身影置身在一群工人群众之中；用令人熟悉的姿式在阳台上向群众挥舞双臂，人们耳边再次响起雄壮的进行曲和激动的人群高呼的口号……。老人们仿佛随着这个身影和乐曲声跨过时间的年轮回到以往辉煌的日子里去了，有些妇女开始低声抽泣，年青人也屏住了呼吸，这种狂热和崇拜是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

人们终于领略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某种魅力。

让历史去裁判吧！

第九章

震惊世界的三天

——苏联“八·一九”事件纪实

20世纪90年代伊始，苏联大厦已经摇摇欲坠，1991年的“8·19”事件成了这座大厦最终倒塌的引爆线。“8·19”事件的过程持续不过3、5天，之所以说是3天，是因为从8月19日早播发由苏联副总统根·亚纳耶夫等三人签署的《苏联领导的声明》之时起，到8月21日晚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克里米亚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局势为止，共计3天；之所以说是5天，则是指从8月18日政变策划者和组织者向戈尔巴乔夫发出“最后通谍”之时起，到8月22日戈尔巴乔夫总统返回莫斯科并控制住“核武库密码按钮箱”为止，共计5天。不论是3天还是5天，在这短暂的日子里，苏联出现的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场景和画面，引人瞩目，发人深思。笔者当时正在莫斯科讲学，亲身经历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我愿把现场的所见所闻和各国关于“8·19”事件的大量报道揉合在一起，记录事件的始末，以飨读者。

一、不可或缺的引子

关于莫斯科事变的消息，是在8月19日莫斯科时间6时对苏联

国内播发的，因为时差的关系，这一消息在8月19日莫斯科时间4时向世界播送。这样，至少欧洲是在与莫斯科大致相同的时间收听到这一令世人震惊的新闻的。然而政变的前奏早已开始，只不过在8月19日公诸于世罢了。苏联各界，尤其是俄罗斯政界一再强调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因此，记述这一事变的引子，绝非可有可无。

1. 罔然的新闻

1991年8月19日清晨，莫斯科天气阴沉。6时许，不少莫斯科人按往常一样，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收听或收看当日最早的新闻节目。但是，今天的早间却是非同寻常，而且令人罔然：一位男播音员正用低沉的声音播送由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瓦·帕夫洛夫和奥·巴克拉诺夫8月18日签署的《苏联领导的声明》。声明称"鉴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7款苏联总统全权移交给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伊凡诺维奇·亚纳耶夫……"，声明宣布从8月19日4时（莫斯科时间）起，在苏联一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为了管理国家和有效地实行紧急状态，成立由奥·德·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鲍·卡·普戈（苏联内务部长）、瓦·亚·斯塔罗杜夫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阿·伊·季贾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德·季·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根·伊·亚纳耶夫（苏联代总统）8人组成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规定苏联全境所有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一切公职人员和公民必须绝对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电台随后又播发了8月18日由代总统亚纳耶夫签署的《致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书》，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在苏联全境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以及决定接管苏联国家全部权力一事通知各国国家元首

和联合国秘书长。《告各国首脑书》称业已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使经济免遭崩溃和国家免于饥饿、防止大规模国内冲突的威胁；保障每个苏联公民的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使苏联局势稳定，社会和经济生活正常化。《告各国首脑书》说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放弃改革，而是为实行社会改革，为国家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强调临时性紧急措施绝不涉及苏联按照现行条约和协定承担的国际义务；要求各国人民和政府以及联合国对此给予应有的理解。

6 时 34 分，电台、电视台播发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该呼吁书称，苏联各族人民的命运正面临严峻危急时刻，国家面临着致命的危险，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已走进死胡同，各级政权失去人民的信任，整个国家失去了控制，劳动人民的权利遭到剥夺，公民的起码人身安全日益受到威胁；新成立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担负起对国家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重大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告苏联人民书》最后呼吁苏联全体公民应意识到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并大力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随后电台和电视台又播发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卢基扬诺夫的声明。他要求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重新讨论和审议业已发表的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并进行全民公决。但令人不解的是，他签署的日期是 8 月 16 日，而不是 8 月 19 日播出的这一天。这一点在政变策划过程中才得以解谜。

过了 2 小时左右，电台和电视台又播发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一号令。该命令共 16 条。其命令说：苏联全国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必须遵守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切规定和指令；中止阻挠形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的活动；由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负责收缴一切非法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不允许举行群众集会、街头游行、示威及罢工；必要时实行戒严；对舆论工具实行监督，等等。

随后又发布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二号命令，规定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社会政治刊物的出版，仅准许《劳动报》、《消息报》、《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9种报刊继续出版。

在莫斯科，更多的人是在早晨8时的广播和电视中得知政变消息的。人们议论纷纷，疑虑重重，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年长者根据往昔的经验，谙知所谓某某领导人“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说法意味着什么。一位名叫尼古拉的老教师直言不讳地说，这同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政治斗争何其相似，无疑是一场“宫廷政变”。多数莫斯科人对发生的一切反应冷淡，但又急于想了解事态的真相。人们陆续离开工作单位回到家里静候事态的发展。对于反复重播的消息，人们已不感兴趣，很少有人公开发表意见。备受生活煎熬的莫斯科人对这类“上层争权夺利”的事早已厌烦到极点。在汽车站上，有些等候汽车的人有时也相互说上几句：

“您说说，前景会如何？”

“只要有吃有穿，管它谁上台！”

“您看，格卡契普怎样？”

“这词太绕舌，好不了。”

莫斯科人对这“格卡契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俄文缩写拚音）毕竟不怎么信任，也无好感，特别是对“酒量过人”的代总统亚纳耶夫更是嗤之以鼻。

2. 前兆种种

可能发生政变的消息在苏联盛传已久。远的不说，就在1991年初，当时刚刚辞去外长职务的谢瓦尔德纳泽曾公开发出过警告：强硬派“可能发动政变”。在舆论的渲染和民主激进派的压力下，政变之类的事情并未发生。1991年6月，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的首脑克留奇科夫和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等在议会向戈尔巴乔夫发

难，要求赋予政府以“特别权力”。与此同时，一批主张倒戈的议员征集 500 人签名要求戈氏下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公开形式的“政变”。议会拒绝了这些人的要求，戈氏也严厉地谴责这种行径。

但强硬派势力并未因此而消声匿迹。1991 年 7 月 23 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一篇《向人民进一言》的呼吁书，其中提到“只有军队才能扭转局势”。民主激进派和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明确信息。支持这一呼吁书的有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内务部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等高级将领。8 月是苏联传统的休假期，议会休会，领导人大多外出度假，被未来苏联国体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戈尔巴乔夫，此时也携家去克里米亚度假，以便在 8 月 19 日返回莫斯科签署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

戈氏在离莫斯科赴度假地前夕谈到，签定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将意味着一元集权制国家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重新安排各种力量。因此这将引起新的矛盾冲突，特别是那些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会起来反抗。戈氏的话不幸言中。利用国家首脑外出度假或出国访问的空档发动政变，在当今世界已屡见不鲜。

这次、苏联的强硬派也利用了这一时机。

3. 从何下手

被认为是“国家防务”和“苏联军工综合体”的代表人物巴克拉诺夫、具有巨大权势的内务部长普戈、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以及表面无实权和名声不佳的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对策划这次政变最为积极。8 月 17 日，在所谓的“ABC”秘密接头地点会面。他们一番秘密磋商后，他们分头进行了组织安排，并于 8 月 18 日下午开始实施政变方案。

政变策划者们拟定了两套方案。首先，争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站在他们一边。这些策划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 8 个成员），

原来都是戈氏认为信得过的人，而被安置在苏联各个最重要的政权机关。策划者正是凭借这一点，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由戈氏签署发布紧急状态的总统令，以扭转整个局面。这样，一切都将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他们考虑到，因为戈氏前不久与强硬派有所妥协，而在受到民主激进派施加压力之后又疏远了强硬派而转向激进派靠拢，因此在腹背受压的情况下，戈氏对强硬派的强硬态度有可能妥协，同时戈氏在国内的威信虽然江河日下，但在国际上尚有一定威信，这也是可以利用戈氏之处。因此，策划者们想以最后通谍方式，迫使戈氏入伙。

8 月 18 日下午，他们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舍宁、总统国防会议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副部长、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以及戈氏的亲信、直接负责总统事务和安全保卫的博尔金（总统办公厅主任）和普列汉诺夫（国家安全保卫局局长）5 人携带要戈氏签署的实行紧急状态命令的文件飞往克里米亚。

他们的第二方案是，如果戈氏拒绝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那么他们就将不惜铤而走险，自己动手。

4. 不速之客

8 月 18 日，克里米亚的福罗斯。

这里是专供苏联首脑度假的海滨胜地，别墅就建造在黑海之滨，环境优美，设防严密，是苏联普通老百姓无法接近的地方。戈氏携其妻子赖莎，女儿伊琳娜和女婿阿纳托利，以及外孙女阿纳斯塔西娅，还有秘书和 32 位保卫人员就住在这里。

戈尔巴乔夫总统虽说在度假，但这一天，他依然相当忙。因为他预定 8 月 19 日即飞回莫斯科，准备于 8 月 20 日主持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首批国家签字仪式，并举行联邦委员会会议。

早餐之后，他一直在别墅的办公室里修改讲话稿，这篇讲话稿要在新联盟条约签字时发表。午饭前，戈尔巴乔夫专门同亚纳耶夫

通过电话，告诉他说要在19日回莫斯科。亚纳耶夫当时还表示到时一定去迎接戈氏。此时此刻，戈氏万万没想到对方策划的一项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悄进行。

下午4时45分，巴克拉诺夫等一行5人不经邀请就来到戈氏别墅。因为有负责国家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普列汉诺夫开道，一行人畅通无阻。他们让戈氏的卫士长弗·麦德维杰夫将军向戈氏通报要求会见。卫士长见来者由普列汉诺夫伴随，只得放他们5人入内，并立即奔到楼上戈氏办公室报告求见之事。戈氏因并没有要接见任何人，也没有事先约见任何人的日程安排，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特别是突然来访的这5个人的身份戈氏是知道的。为了核实和了解一下事情的缘由，戈氏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机，但是没有声音。他又一连拿起6部对外直线电话机和内线电话机，都没有一点声音。而在20分钟前，他还同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通过话。这时，戈氏马上意识到：发生了异常的情况，这批不速之客绝非其平时接待的那种人。戈氏意识到来者不善，便对家人说，发生了意外，事情一定非常严重，不排除被拘留、逮捕之类的事发生。戈氏还对家人说：“我们不能屈服于任何讹诈、任何威胁和任何压力，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全家都表示准备同戈氏分担一切忧患。

这批来访者不待戈氏的邀请，径直上楼来到戈氏的办公室。戈氏对他们这种无礼之举极其气愤，但急于了解来者的意图和目的，他按捺住心头的怒气，扫了这5个人一眼，随即问道：

“是谁派你们来的？”

“是委员会。”来者答。

“什么委员会？”戈氏问：

“就是那个因为国内形势紧急而成立的委员会。”来者答。

“是谁成立的？我没有成立，最高苏维埃也没有成立。究竟是谁成立的？”戈氏又问。

来者说，人们已经联合在一起了，现在只等总统发布命令了。来

者同时还迫不急待地向戈氏发出最后通谍：要么签署由他们拟定的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要么把总统的全部权力交给副总统。巴克拉诺夫为了打消戈氏会对俄罗期总统叶利钦抱有某些幻想，他说叶利钦已被逮捕。后来他又改口说可以随时逮捕叶利钦。

尽管戈氏此时已怒不可遏，但还想能够说服来者不要玩火。戈氏对他们说，他比他们更了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更了解人民的生活和种种苦难遭遇，会尽快采取措施加以改善的。他反对用宣布紧急状态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这会造成千百万人丧生的严重后果。戈氏驳斥了来者的最后通谍，拒绝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戈氏还对来者说："你们，还有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分子。你们会害了你们自己，不过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可以自便。但是，你们会毁了国家，毁了我们已经做的一切。请把这些话转告派你们来的那个委员会……只有自我毁灭者才会在现在提出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我决不同意这样做。"这时，来访的军界人士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大将对戈氏的言词已经早已不耐烦了，他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您辞职吧。"戈氏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指出，"你们从我这里什么也不会得到，请把这个意思转告派你们到这里来的所有人。"

戈氏接着对他们说，明天可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可是你们接下来怎么办呢？全国都会反对，不会支持这些措施的；你们想利用困难、利用人民已经疲备了，你们以为他们会支持某个独裁者吗？

此时，戈尔巴乔夫显得更为平静了，他还向来者解释应当按照法律程序行事，并对他们说"我建议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由它们来决定一切。你们对现在的形势感到不安？它使我们大家都不安。你们以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我也持有同样的观点。那么我们就来开会，共同来决定怎么办。我随时准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让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问题。代表们都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事。让我们来采取措施。我将捍卫和谐的道路，深

化改革的道路以及同西方合作的道路。”来者无言以对。但戈氏明白说这一切都是对牛弹琴，于是说，“就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请你们回去报告，我坚决反对你们的阴谋，你们注定要失败。”

戈氏放眼横扫来者，眼光落在了瓦连尼科夫这位将军脸上，不觉怒气又起，他对这位粗暴的将军不无讥讽地说道：“您瞧，瓦连京·伊万诺维奇，社会和人民不是连队，不是只要您一发口令：向左或向右转，开步走，大家就会按您的口令走的。现实决不是这样的。请记住我的话。”最后，戈氏再次对来者们说，“请你们慎重考虑一下，这会引起国内战争，会大流血。你们要对此负责。你们是冒险分子，是罪犯，你们是不会成功的。人民不会屈服于你们的专政，也不会容忍失去他们这些年来赢得的东西。”

至此，戈氏不想再说什么了。他随即大声呵斥让他们滚开。就这样，这批不速之客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立即飞回莫斯科去了。

二、策划的点点滴滴

8月19日发生的事变，人们都称其为“政变”、“叛乱”、“宫廷政变”、“军事政变”、“阴谋”、“反宪法的阴谋政变”，等等，而不论给予什么称谓，策划这次事变的核心人物是早有所准备，并且在公开摊牌之前就已经采取了某些行动。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但都不是那么“周密而稳妥”。点点滴滴可寻策划踪迹。

1. 策划的踪迹

在8月17日至18日深夜，一名自称是苏联领导派遣的官员，携带着几份绝密的重要文件，来到塔斯社，他找到编辑部的负责人，并将文件交给后者，声称这是奉苏联领导之命转送的材料，责成编辑

部立即执行交办的任务。编辑部的负责人见交来的绝密文件是《苏联领导的声明》等俄文文本初稿，随即问道："什么任务？"来者回答说："立即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外文文本。听候处理。"来者临走之前特别强调说："务必严加保密！"编辑部的负责人见来者的架势，不敢懈怠，立即交给编译部安排翻译任务。

就在"格克契普"的核心领导派遣舍宁、巴克拉诺夫、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等5人前往克里米亚向戈尔巴乔夫递交"最后通谍"的同时，苏联克格勃的第二号人物阿格耶夫根据克格勃第一号人物克留奇科夫的指令，向全国直属苏联克格勃领导的安全机构下达命令：第一、组织隔离戈尔巴乔夫，并切断与戈尔巴乔夫的一切通讯联系；第二、控制一切渠道的消息报道；第三、制定攻占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因为这里是民主激进派势力的首脑机关所在地。

这项命令立即得到实施。8月18日下午4时30分以后，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休假别墅内，其办公室的对外联系的直线电话和别墅内内线电话均被切断。戈尔巴乔夫至此再也无法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系。

陪伴舍宁、巴克拉诺夫等人造访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克格勃负责国家领导人保卫安全的局长普列汉诺夫，在离开戈尔巴乔夫休假别墅时，部署了对戈氏监视的任务，其借口是保卫总统的安全。苏联克格勃部队总部下令，于8月19日凌晨4时由克格勃部队驻瓦赛斯托波尔团包围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休假别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禁别墅内外人员进出。同时，根据苏联国土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马尔采夫上将的命令，控制停靠在离福罗斯不远的别尔别克军用机场的戈尔巴乔夫总统两架座机，一架是图—134型飞机，另一架是米—8型直升机；士兵们拉来两台重型牵引车横置在机场跑道上，以防止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和卫士抢机飞回莫斯科。

8月19日凌晨4时半，俄罗斯电视台的负责人接到一个电话，

发话人自称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官员，他告诉电视台负责人说："正在准备一场政变"。要求电视台对此思想上有所准备，并控制电视台。

2. 紧急会议

在舍宁、巴克拉诺夫等人从戈尔巴乔夫那里两手空空回来之后，策划政变的核心人物决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措施，并准备公开摊牌。这时已是8月18日晚上了。

此时，根·亚纳耶夫副总统正在苏联政府总理帕夫洛夫的家里参加一个晚会。这是地处莫斯科郊区的休假别墅。正值晚会喧闹气氛正浓之际，突然从克格勃总部打来电话，要找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醉意方酣的亚纳耶夫接过电话。他听着电话里的话，一言未发，显得神经有些紧张。之后，他拉着帕夫洛夫驱车急速驶往克里姆林宫。在途中，亚纳耶夫告诉帕夫洛夫说，发生了可怕的紧急事件，克格勃要他们两人立即去克里姆林宫开会讨论。

这时，克里姆林宫内外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安全保卫措施。在戈尔巴乔夫去克里米亚休假后，戈氏的亲信和助手卡拉谢夫和亚林留在克里姆林宫，以便与戈尔巴乔夫总统保持经常性联系。他们及另一名留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卫士都支持戈氏。对克格勃首脑和亚纳耶夫等的行动十分在意和留神，并探听和见到不少有关策划政变的细节。

出席这次紧急会议的，除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外，还有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舍宁和苏联克格勃负责苏联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普列汉诺夫局长。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首先在会上发言说："发生了重大灾难。"他说，根据克格勃得到的消息，有人要发动武装起义，那些人就要包围首都的一些战略要地，其中包括电视台总部、火车站和议员们居住的两个饭店。他还说，发现了一个黑名单，其中包括在座的绝

大多数人员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的名字，这些人连同其家属在内都将被处决。

普列汉诺夫紧跟着在会上说，他通过其他渠道也了解到同样的情况。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和其他几位刚刚从福罗斯回来的人都说，他们见到了戈尔巴乔夫总统，他的病情极其严重，可能是心脏病或中风，医生不让打搅戈尔巴乔夫。看来戈尔巴乔夫已无法履行其总统职责了。显然，克留奇科夫已事先与从福罗斯戈尔巴乔夫那里回来的说客们商量好，编排好了这些谎言。

按照帕夫洛夫8月19日晚召集的部长内阁会议记录，以及帕夫洛夫对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尔巴科夫详细陈述的前天下午紧急会议的情况来看，帕夫洛夫及其他几位与会者，是在听信了那些策划的核心人物谎称戈氏病重和可能会受到所谓"武装起义的人"要砍他们脑袋的情况下，才在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文件上签字的。帕夫洛夫在政变失败后被捕时也重复了自己是受到关于戈氏病重谎言的欺骗而为之。看来，这只能说明帕夫洛夫并未参加策划政变的前期活动，而对废黜戈氏和扭转恶劣形势之举是毫无疑义的，是赞同的。

这次紧急会议除了统一思想外，还决定了需要采取的一些具体行动措施。会议首先决定正式成立名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临时组织，委员会由党、政、军、工、农、兵各界的8位领导人组成。会议决定在次日（即8月19日）凌晨4时对国外，凌晨6时对国内发布《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由根·亚纳耶夫副总统代理总统一职，并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会上还拟定了（实际上已准备好）其他一些文件和呼吁书，并要求按时发表；决定向全苏各地下达必须成立各自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指定策划核心人物所信任的6名负责人，分别负责国防部、克格勃、内务部、武装部队等机构的协调行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分工负责动员各自部门的工作，并分头与各共和国领导人联系，争取他们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中，克留奇科夫（后改由瓦连京·瓦连尼科

夫大将）联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帕夫洛夫联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耶夫，等等。

这次紧急会议为政变策划者们公开摊牌，实施自己干的第二方案，迈出了风险极大的一步。

3. 一些漏洞

19日凌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和助手卡拉谢夫和亚林来到克里姆林宫那座国家和政府首脑办公的黄色大楼，他们同往常一样毫不费劲地就进入大楼自己的办公室，警卫人员只是按惯例查看了一下证件便放行了。他们的办公室设在黄色大楼一层41号房间，旁边依次是总理帕夫洛夫和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办公室，而走廊的对面便是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的办公室。一层第15号和第17号套间是新上任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斯塔罗杜布采夫和贾季科夫的办公室。一批武装警卫人员在宣布政变之后不久来到黄色大楼，他们把一层长长的楼道走廊一分为二，只守卫着亚纳耶夫的办公室。

上午10时，一位忠于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助手、年仅39岁的最高苏维埃立法委员会负责人戈利克也来到克里姆林宫，他也未受到任何阻挠和盘问。戈利克见到卡拉谢夫和亚林之后，商量了一些对策。他们先是拨电话试图与在克里米亚的戈尔巴乔夫总统联系，但无法接通。他们打电话给卢基扬诺夫主席，但后者拒绝接见任何人。戈利克凭借其年轻敢为，又有最高苏维埃立法委员会负责人职务的身份，径直找到根·亚纳耶夫“代总统”。戈利克问道：“这是一次政变？”

“是政变。”亚纳耶夫回答道。

戈利克随后驱车来到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高兴地对戈利克说：“一切都进展顺利。”戈利克问道：“总统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关于他死亡的正式公告？”普戈回答道：“总统病重，不久将公布详细情况。”戈利克从普戈的办公室出来后，遇到了他的老熟人，内务部副部长

伊万·希洛夫。两人交谈之后，希洛夫向戈利克保证，他将设法控制住人称“黑色贝蕾帽”的内务部队。

戈利克又来到克格勃总部，克留奇科夫极不情愿地接见了他。戈利克的印象是，克留奇科夫并不象普戈那样兴高采烈。戈利克直截了当地对克留奇科夫说，他想同戈尔巴乔夫总统谈谈，但电话不通，您，克留奇科夫知道应当怎样和戈尔巴乔夫联系。但克留奇科夫一口拒绝，他说：“这不可能，戈尔巴乔夫现在的情况很糟，不能打搅他。”然后示意让戈利克离开。

克留奇科夫之所以不那么兴高采烈、趾高气扬是有其原因的，他是政坛上的老手，信息也比较灵通，不乏搞阴谋的经验和手腕。他曾找过两位著名的医生，试图让他们出具关于戈尔巴乔夫总统病重情况的伪证报告，这样才能出师有名，使政变缘由得以自圆其说。但是，两位名医拒绝了。而这一情况的细节很快便传到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里。再者，从许多方面来看，政变的进程都不象普戈所说的那样顺利，这是克留奇科夫心里非常明白的事。

三、“自己来干!”

戈尔巴乔夫拒绝“最后通谍”后，政变策划的核心人物已完全不对戈尔巴乔夫抱任何幻想，既然已经向戈尔巴乔夫摊了牌，那么退路也就没有了。克留奇科夫、普戈、巴克拉诺夫、亚纳耶夫等，尽管缺乏周密的计划，但他们下定决心、自己来干，不惜铤而走险，实施所谓的“第二方案”。

1. 加强软禁措施

18日下午，政变策划者加强了对戈尔巴乔夫的软禁措施：切断

戈尔巴乔夫与外界的一切通讯联系，派克格勃部队包围戈氏的福罗斯海滨别墅，监视并控制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助手、秘书和由32名警卫士组成的卫队的行动。为了防卫戈尔巴乔夫及其随从人员逃跑，他们封锁了通往戈氏休假别墅的一切通道，扣留了戈氏的两架总统座机，并派舰艇在靠近戈氏休假别墅的海面巡逻游弋。苏联国土防空军司令马尔采夫根据"格克契普"的指示下令：第一，关闭南方的空中航线；第二，任何船只、飞机和车辆都不得靠近地处福罗斯角的戈尔巴乔夫的休假别墅；第三，扣留所有企图靠近戈尔巴乔夫的人，并交克格勃机构处理。

别尔别克军用机场的跑道被两台重型牵引车阻断。机组人员均被扣留。19日下午6时43分，根据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杰尼索夫将军的命令，允许下列人员登上图—134型总统座机，他们是科兹洛夫、古别尔纳托罗夫、阿利克赛德罗夫和索洛金。其中古别尔纳托罗夫是总统的私人贴身警卫，阿利克赛德罗夫和索洛金是直接同戈尔巴乔夫总统一起工作的速记秘书。他们从戈氏休假别墅被带到机场，在场的克格勃人员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后，让他们登上了飞机。戈尔巴乔夫总统在休假别墅的所有通讯设备全装上了飞机。这架图—134型总统座机的机长是卡卢金，在克勃格人员的监视下，他驾机于晚7时38分飞往莫斯科沃努科沃机场。而总统的另一架座机米—8型直升机奉命由机长瓦西里耶夫驾驶飞往扎波罗热机场，但那里拒绝接受降落，于是飞往舒菲罗波尔。随后，别尔别克军用机场继续关闭。

2. 声明+动员+坦克

作为公开摊牌的首要措施，就是向苏联国内和向全世界发表声明，阐明发动政变的缘由。为了使苏联人民和世界信服，策划政变的核心人物不得不编造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患重病而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的谎言，说明将戈尔巴夫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和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及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于是，他们匆匆忙忙地宣布了《苏联领导的声明》、《致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书》、《告苏联人民书》等事先早已拟定好的文件。他们在这些声明和文告中列举了许多苏联当前局势、社会政治和经济、人民生活等方面客观存在的许多困难、问题、危机现象等。这确实是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所切身体验到的。他们在这些声明和文告中提出了改善现状的种种许诺。这也确实是苏联人民多年十分关注和翘首以待的。然而，他们却完全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按照苏联宪法规定，有关苏联总统职责的去留和更迭，以及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措施，必须经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他们在公开摊牌前也曾找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求教。而卢基扬诺夫既赞成又惧怕，他说代表们都在休假，找不到，实际上他不敢去找最高苏维埃两院主席伊·拉普捷夫和P·尼沙诺夫。因为卢基扬诺夫自己心里是明白的，这毕竟是一种违宪的阴谋。但是，卢基扬诺夫表示愿意助一臂之力。他对《苏联领导的声明》提出了只在"苏联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修改意见，以稍加缓和会引起全国范围的紧张气氛和情绪；另外，他要求在播发《苏联领导的声明》之后播发他关于要求重新审议新联盟条约和举行全民公决的声明。为了掩人耳目，他将自己在8月18日拟定的声明的日期改为8月16日签署，以这样的方式来配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并与《苏联领导的声明》内容相呼应。因此，民主激进派称卢基扬诺夫为政变的"思想主谋"，是摇羽毛扇的人物。尽管如此，政变者们的声明举措仍然缺少宪法和法律的依据。

第二、宣布涉及戈尔巴乔夫因病不能履行总统职责问题，在苏联通常都惯于发表病情公告，并由"御医"签署为证。但是，这次的《苏联领导的声明》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证明，因为医生拒绝这样做。

因此，这两个关键的问题便成为民主激进派，甚至国内外各界

人士怀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作所为，并成为反对这个委员会的有力且无可辩驳的论据。这也正击中了政变核心人物的致命要害。此外，新的“苏联领导”的种种许诺，苏联老百姓都视为老生常谈。许多人在议论时，互相询问道：他们能够兑现吗？他们有能力做到吗？人们都摇摇头，表示怀疑和悲观。

公开发表声明的步骤不可少，而内部动员更不可无。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在19日凌晨6时召集各军区司令会议。在1个半小时前，亚佐夫签署编号为No：8825的密令，向国防部副部长、武装部队各司令、远东军区司令、空降兵部队司令、各集团军司令、各军区司令、各舰队司令、国防部各总局局长发布命令，要求他们的部队进入战时准备状态。在清晨6时举行的会议上，亚佐夫除重申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外，指示各军区必须根据形势发展保持秩序，加强对军事目标的警卫工作。亚佐夫始终没有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只说“其他问题你们将从广播和报纸的报道中可以了解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瓦·帕夫洛夫根据“紧急会议”和“格克契普”的安排和指令，在8月19日晚召集部长内阁会议，根据会议的记录，帕夫洛夫在会上要求各部长支持“格克契普”的决定，搞好各部门的工作，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有些部长在会上表示对紧急状态不甚理解；更多的部长们摆出一大堆工作中的困难问题；个别的部长提出需要采取强制性措施，但帕夫洛夫说，他反对动用坦克（实际上早在他作此表态之前，坦克在上午已经进入了莫斯科市中心地区）。这次应起动员支持“格克契普”的会议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而结束。会后，帕夫洛夫因血压急剧上升而躺倒。后来，宣布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维·多古日耶夫代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时发表了关于苏联部长会议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

在部长会议的成员中，只有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尔巴科夫一人表示反对实行紧急状态。

为了显示“格克契普”的决定和力量，19日上午9时左右，即在宣布紧急状态后3个小时，在莫斯科开始出现军队调动，一批坦克、装甲军车开进了莫斯科市中心，并且部署在一些重要机关和部门的周围，在《真理报》社和《农村生活报》社建筑物附近停着6辆装甲车，这是来自塔曼近卫师的装甲车小分队。《真理报》记者问其中一位名叫阿法纳西耶维奇的上尉军官，他的任务是什么，上尉回答，奉命守卫，其他无可奉告。在俄罗斯电台电视台、马涅什广场、红场周围、主要大街道口上，都有坦克和装甲军车。莫斯科市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像特维尔大街、加里宁大街等一些主干道，已禁止其他车辆通行，但是不限制行人，在这些较繁华的大街上，一些商店照常营业，排队购物的人们仍然相当多。19日12时以后，在“白宫”即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大厦附近出现了一些坦克。与此同时，莫斯科人，以及保卫“白宫”的人们也开始迅速行动起来。有的筑路障，有的以围观的方式阻挠坦克、装甲车行进，有的爬上停靠在道路上的坦克。两军对垒的紧张形势正在发展。

到19日清晨，莫斯科军区的部队和克格勃部队已封锁了所有进出莫斯科市的通道。

3. 首次公开露面

在政变的首批措施付诸实施10个小时之后，19日下午4时55分，国内外的新闻记者应邀出席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不久，“苏联代总统”根·亚纳耶夫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奥·巴克拉诺夫、苏联内务部长鲍·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瓦·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亚·季贾科夫等5人来到会场，依次坐在主席台上。这是宣布政变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首次公开露面。这无疑引起到会记者们的极大兴趣。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

员会成员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和苏联政府总理瓦·帕夫洛夫为何未能出席这次同记者见面的会议，未作任何说明。

"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显得非常疲惫，象是有些感冒，不时取出手帕擦鼻涕。他首先重申了《苏联领导的声明》中的决定，由于戈尔巴乔夫总统因病不能履行总统职责，而由他临时代行总统职责，并说这是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作出的决定；他说，苏联目前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国家政权失控；居民普遍感到不满；出现了国家分裂、统一的经济环境的瓦解、统一的公民权利的瓦解、统一的国防和统一的对外政策的瓦解，这些都是现实的威胁。因而有必要宣布在苏联一些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他还说，"格克契普"赞成真正的民主进程，赞成彻底的改革政策，这种政策应当导致苏联国家的革新和经济与社会的繁荣。亚纳耶夫在会上还许诺"格克契普"要加强维护人权，维护最广大居民阶层的利益，与威胁人们利益最大的通货膨胀、生产混乱、营私舞弊和犯罪行为作斗争；"格克契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食品和住房问题。他还就苏联对外政策问题重申了苏联将严格遵守所承担的全部义务。

在回答戈尔巴乔夫现在何处的提问时，他答道，米·戈尔巴乔夫现正在克里米亚休养和治疗；这几年来他非常劳累，需要有一段时间恢复健康。亚纳耶夫表示希望戈尔巴乔夫恢复健康后继续行使自己的职责。

记者们随后立即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问现在有没有复兴国家经济的具体纲领，过去通过的法律是否有效，今后是否继续向市场过渡？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季贾科夫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众所周知，改革并没有带来所预期的成效；政策有许多失误，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状态，这也正是实行紧急状态的危机原因之一。他说，"格克契普"的行动将首先是稳定经济，不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

亚纳耶夫回答了俄通社记者提出的问题，即"格克契普"对叶利钦、西拉耶夫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呼吁书的看法，该呼吁书认为业

已发生的事变是具有“右派、反动、反宪法性质的政变。”亚纳耶夫回答说，他同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与各个宣布准备加入革新联邦的共和国领导人接触过，还同一些州、区的领导人接触过，他们都表示支持“格克契普”。他说，“格克契普”知道叶利钦等的致俄罗斯居民的呼吁书，“格克契普”准备同他们及其他共和国和地方的领导人合作。亚纳耶夫没有正面驳斥叶利钦等对“格克契普”的那种评价，而只是认为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号召无限期罢工是不负责任的举动。

有记者问，是由谁又是怎么作出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的。亚纳耶夫含糊其词未作直接回答。会上记者还提问有关苏共态度、立场，有关被禁报刊何时恢复出版、如何解决国内族际冲突，以及有关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等问题，亚纳耶夫等都只作了一般性的答复。

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时，亚纳耶夫说，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起为苏联国内的民主化进程做了许多工作，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亚纳耶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或许是由于过份紧张，他的手不时地在颤抖。有位苏联记者在私下悄悄地说：“代总统用颤抖的右手一挥，国家就进入了严冬。”

四、支持与反对

从8月19日清晨起，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公开下令对舆论工具实行监督和控制，取缔了大批报刊的出版发行，占领并控制了莫斯科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俄罗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一些共和国和城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被当地的克格勃占领或控制。然而，一些独立的、或被称为“地下”的电台和通讯社，诸如“莫斯科回声”电台、“追述”通讯社等、以及遍布全苏各地的新闻记者，从各

地不断地发出电波，报道消息。此外，被“格克契普”允许在莫斯科出版的《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等9份报纸，尽管受到控制，但也同样报道了自己采集到的各种似乎有悖于“格克契普”指令的新闻和消息。各共和国的电台和电视台，以及报刊并未停止自己的工作，新闻和消息也源源不断地传出。集纳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多少可以看出对“格克契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知多少。

1. 回声之一：自莫斯科

在苏联副总统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后，在莫斯科，最先表示支持“格克契普”的是苏联退伍军人和退休人员委员会。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表示完全拥护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实行紧急状态，称“我们的职责是在执行国家领导人为拯救社会主义祖国，稳定政治局势，防止经济崩溃，保证每个苏联人的安全和幸福而争取的一系列措施方面给予全面的实际帮助。”另外，莫斯科“联盟”议员团等组织表示支持“格克契普。”“联盟”议员团成立于1990年3月。主要成员为“隐退多年”的传统派议员。它共有561名成员，占苏人代会人民代表总数的1/4，是议会中仅次于共产党但大大超过跨地区议员团的第二大议员团。其政治主张是维护苏联邦制，团结和统一，反对国家解体。除此之外，在莫斯科再没有组织或团体公开宣布支持“格克契普”。相反，公开反对“格克契普”的苏联官方机构、政党和社团越来越多。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耶等发表声明，要审议“格克契普”的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并称“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才有权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

莫斯科市副市长卢日科夫发表告“首都公民书”，指出“格克契普”篡夺了合法政权，称这一批人是“匪徒”；呼吁书宣布，坚决支

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立场，拒绝执行“格克契普”的任何决定和指令；号召首都莫斯科的全体劳动者，除从事与保障首都生活的城市经济部门外，从8月19日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无限期罢工，直至将叛乱分子完全清除出政权机构。

稍后，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发表强硬的声明，宣布自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反宪法的机构，它所宣布的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无效，并由莫斯科人郑重宣布，莫斯科市不实行紧急状态。他还宣布禁止支持政变的老战士劳模协会等组织活动，禁止莫斯科银行为他们支付工资及其他资金，禁止市政机关为这些组织所在场所供电、供水和提供电讯和其他服务。波波夫市长呼吁莫斯科市民利用合法手段反对反宪法叛乱，号召市民到奉命派到莫斯科来的部队官兵中去宣传，号召所有官兵保卫俄罗斯和莫斯科机关。波波夫市长的声明最后说，只有反对独裁并在民主道路上发展才能使国家走出危机。

俄罗斯联邦议会宪法委员会谴责成立“格克契普”是“非法使用武力的反宪法叛乱”。议会法制委员会主席谢尔盖·沙赫赖明确表示“格克契普”是违宪违法的。

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阿纳托利·马诺欣和阿尔泰·佩切奥勒说，根据他们调查了解的情况，莫斯科市的大多数地方苏维埃执委会都拒绝执行“格克契普”的决定和指令。

苏联跨共和国的矿工独立工会执行局主席鲍里斯·马特金宣布，为了反对“格克契普”，库兹巴斯、顿巴斯、伯朝拉等煤矿的工人将从8月20日零时起开始无限期总罢工。

“民主俄罗斯运动”协调委员会呼吁所有工矿企业停止工作，无限期罢工，直至恢复宪法秩序。该组织还呼吁苏联军队官兵避免采取给独裁者使用武力直接借口的行动，拒绝服从“格克契普”的非法命令。该协调委员会要求民主派们在各处建立公民抵抗委员会。

“俄罗斯民主党”主席，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尼古拉·特

拉夫金发表声明，称“共产党高官的犯罪集团再次藐视我国和俄罗斯人民的意志，篡夺了权力，他们只知道一种与人民谈话的方法，即谎言和刺刀。”声明还号召举行政治总罢工作为对国家罪犯的回答。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共和党”等也发表声明，抗议“军事叛乱”，拒绝与“格克契普”进行任何合作，号召支持所有合法选举的苏俄权力机关，同时要求在劳动集团中建立罢工委员会，举行无限期的政治罢工。

全苏军人父母理事会主席团发表呼吁书，支持俄罗斯领导人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同时向苏联武装力量全体官兵发出呼吁，“在这个复杂的形势下应表现出高度的公民觉悟和镇静，不要参加政变”。

萨哈罗夫院士的遗孀、著名的法律保卫者叶莲娜·邦奈尔发表讲话，呼吁莫斯科人保卫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总统，以及苏联总统。她说，“今天我们应该证明，我们不愧于首都居民的称号，我们不是一群只关心香肠的人。”

随着时间推移，莫斯科各界的反应对“格克契普”越来越不利。

2. 回声之二：自列宁格勒

在得悉关于莫斯科已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后，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维克多·萨姆索诺夫中将根据国防部长亚佐夫的命令在19日上午10时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他说，为了确保公民的安全，确保经济、交通运输、社会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在列宁格勒及列宁格勒周围地区保持应有的秩序，从8月19日4时起应实行紧急状态。他还宣布了成立列宁格勒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萨姆索诺夫中将还宣布，在实行紧急状态期间，禁止自行解雇工人，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并对新闻传播媒介和交通及通讯实行控制。

设在列宁格勒的全苏“团结”协会的领导人尼娜·安德烈耶娃。代表该协会立即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格克契普”。几年前，她曾因

发表公开信向戈尔巴乔夫总统及其改革和新思维发难而名噪一时。

列宁格勒是苏联和俄罗斯民主激进派力量聚集的中心之一。列宁格勒激进派的主要领袖人物是列宁格勒市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8月19日上午，他恰好因公出差在莫斯科，当时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担起了反对政变的重任。他召开了列宁格勒市苏维埃非常会议。这时在议会大厦门前已聚集了成千反对政变的示威者，他们手中举着标语牌。标语牌上写着："大家去罢工！"一些人民代表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示威群众自发地将通向列市苏维埃大厦的所有入口和台阶处用卡车封锁，以保卫大厦。

"民主俄罗斯"列宁格勒分会也派代表前往各大工厂宣传进行反政变的罢工行动。

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非常会议上，代表们反对在列宁格勒实行紧急状态，指出业已成立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会议结束后，发表了由亚·别利亚耶夫签署的"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呼吁书"，指出废黜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实行紧急状态是非法的，并表示全力支持叶利钦。同时，别利亚耶夫在与市长索布恰克取得联系后发表了由他们两人共同签署的"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致俄罗斯公民和列宁格勒人的呼吁书"。呼吁书号召举行政治总罢工，并准备开始大规模公民抵抗和无限期政治罢工运动。别利亚耶夫还号召苏维埃代表带上俄罗斯总统等签署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和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呼吁书前往各工厂企业散发。

8月19日下午，列市长索布恰克回到列宁格勒，并在市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说。他说，他在同列宁格勒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副市长谢尔巴科夫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维·萨姆索诺夫等会面后认为，"所谓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罪犯"。他号召列宁格勒人8月20日到皇宫广场举行政治罢工和公民抵制行动。

列宁格勒苏维埃公开性委员会主席尤里·弗多文在市非常议会上说，由于电视中心的卫星转播被切断，所以无法通过电视转播列

宁格勒市苏维埃会议的情况。列宁格勒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鲍里斯·彼得罗夫答应尽快解决这一问题。3小时后，电视台重新工作。索布恰克立即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并宣读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的各项命令。随后，副市长维亚切斯拉夫·谢尔巴科夫和列宁格勒州苏维埃主席尤里·雅罗夫发表声明，称他们未被通知，也未得本人同意就被列入紧急状态委员会。雅罗夫呼吁州苏维埃代表应保障政权职能机构正常工作。

列宁格勒的所谓列宁格勒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宣布成立的仅仅数小时后，即告垮台，合法选举产生的列宁格勒州、市苏维埃和政府牢牢地控制了局势。原列宁格勒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列宁格勒军区司令维·萨姆索诺夫将军转到合法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一边，并拒绝服从莫斯科“格克契普”和国防部亚佐夫的命令，拒绝派兵去镇压列宁格勒的示威群众。

3. 回声之三：自俄罗斯联邦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其他各地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应。根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获得的材料，大约70%左右的州、边疆区、自治共和国和专区的地方政权，对“格克契普”采取了保留、观望、消极或模棱两可，或不明确表态的立场。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消逝，绝大多数的地方政权转向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而反对反宪法的“格克契普”。

8月19日莫斯科电台播发了“格克契普”的消息后，梁赞市首先实行了紧急状态，并成立了梁赞紧急状态委员会，其成员并非当地政权机关的主要领导人。该委员会宣布地方人民代表已失去代表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市里禁止集会、示威和游行，对大众媒介进行控制。但过不多时，梁赞市长瓦里·柳明说，梁赞市领导人指责该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为罪犯，并将他们赶出办公室。柳明还通过电话与俄罗斯的30个州属市联系，并转达了叶利钦的命令，印发

厂2万份俄罗斯总统的命令和传单，散发到市属各企业单位。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执委会主席瓦·利特维诺夫拒绝就局势发表评论。他说，“我守着电话机，等待会不会宣布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实行紧急状态。”边疆区执委会第一副主席维·伊舍耶夫则说，“早在三年前就应让戈尔巴乔夫下台”。俄罗斯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谢·马尔卡罗夫的“追述”通讯社记者称：“格克契普”里有强有力的男子汉，对他们来说，俄罗斯的命运事关重大，可以完全信任他们。”

在俄罗斯中部的重镇，也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各界对“格克契普”的反应极强烈。州苏维埃主席阿·格列宾金称，所谓的“苏联领导的声明”是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州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声明，重申支持并服从叶利钦。州里的一位最大的银行家认为，“格克契普”的行动将使西方伙伴放弃在乌拉尔地区的投资，这将给经济带来不良后果。

阿尔泰边疆区表示支持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声明文件。但阿尔泰州苏维埃主席阿·库列维夫则下令实行紧急状态。

提尔佳斯克市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只执行俄罗斯权力机构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决定和命令。广播电台也置于地方政权的控制之下，并不断播送俄罗斯领导的各项声明和文件。

顿河罗斯托夫州虽然成立了一个支持“格克契普”的非常委员会，并控制地方新闻媒介，但州苏维埃决定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在俄罗斯的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区“民主俄罗斯”组织称，“格克契普”是“无法无天的军事政变”，号召滨海人反击“格克契普”。

伏尔加格勒州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托姆斯克州苏维埃主席维·克列斯、市苏维埃主席阿·切尔卡斯基、市执委会主席弗·冈恰尔等通过电台发表告托姆斯克居民书，呼吁不支持“格克契普”，认为这是一场军事政变。

鄂木斯克市苏维埃主席弗·瓦尔纳夫斯基称“格克契普”的行动，是绝望的举动，也是退却的举动。

在著名的秋明油田所在地，秋明州电台广播发表了州苏维埃提供的俄罗斯领导人的声明，并认为“格克契普”是违反宪法的。秋明州苏维埃主席团要求执行俄罗斯总统的命令。

在远东伊尔库茨克州，州苏维埃作出决议，认为罢免苏联总统是非法的；并决定只服从合法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政权，不服从“格克契普”。州执委会主席尤里·诺日科夫号召居民服从合法的俄罗斯政权，保持平静与忍耐。

在俄罗斯最东的萨哈林州，州执委会主席瓦·费多罗夫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萨哈林将执行俄罗斯联邦的法律。

在鞑靼共和国首都喀山，大约300名人民代表、市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成员、民主党派领导人聚集在政府大厦前，打出一幅戈尔巴乔夫的画像，上面写道：“我们的总统在哪里？”喀山市执委会主席卡米里·伊斯哈科夫对政变未表态。但《喀山晚报》受到控制，未被允许刊登叶利钦的《致俄罗斯公民书》。而鞑靼总统明吉缅尔·沙依米耶夫到8月20号还发表了支持“格克契普”的声明。但遭到议会反对。

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区苏维埃主席团对“格克契普”，对叶利钦的命令均未明确表态。稍后，边区苏维埃主席弗·谢瓦斯齐亚诺夫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格克契普”和各共和国领导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合理途径。

巴什基里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穆·拉希莫夫8月19日晚从莫斯科赶回共和国首府乌法。他说，代总统根·亚纳耶夫召集原俄罗斯联邦15个自治共和国代表参加招待会，会上大家就发生的事询问亚纳耶夫，亚纳耶夫继续撒谎答道：“几个共和国领导人去找正在休假的戈尔巴乔夫，为了说明国内有必要紧急整顿，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有副手——亚纳耶夫，让他去整顿吧。”

在克麦罗沃州苏维埃发表声明，不承认“格克契普”。在居民自发的集会上，宣读了叶利钦的声明和命令。民警保护了集会。

在下诺夫戈罗德，州苏维埃主席亚·索科洛夫提出在全州范围内建立由克格勃、内务局和军队组成的非常委员会，但被苏维埃代表所拒绝。

在沃罗涅日市，州苏维埃主席维·卡拉什尼科夫发表声明，将绝对执行叶利钦的命令。居民举行了两次示威集会。州执委会表现中立。

堪察加州苏维埃主席彼得·佩尔米亚克和州执委会主席弗·比留科夫在得知莫斯科发生政变后，宣布退出苏共，因为他们反对“格克契普”的政变。

4. 回声之四：自各共和国

在莫斯科发生“宫廷政变”之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初都作出了极其审慎的反应。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各共和国都明确表示反对“格克契普”及其决定。

莫斯科国家政变策划与参与者之一、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总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大将在从戈尔巴乔夫休假地福罗斯飞回莫斯科后，根据“格克契普”的指令，于8月19日凌晨又急匆匆地飞往基辅，向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通报了苏联武装力量对戈氏“辞职”和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立场，试图争取乌克兰的支持。克拉夫丘克通过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乌克兰人民保持镇静和克制。他说，乌克兰保持着稳定的局势，不必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数小时之后，克拉夫丘克发表了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的呼吁书，要求将目前局势下产生的所有问题都应在非常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加以讨论和解决，并坚持主张戈尔巴乔夫总统必须参加会议。乌克兰共和国和州一级的大多数领导人早已明确表示反对“格克契普”。乌克兰议会中的反对派，

诸如“鲁赫”、乌克兰民主党、乌克兰民族复兴党、乌克兰共和党等，一致表示支持叶利钦，支持乌克兰政府的立场，号召举行罢工。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的共产党人却支持“格克契普”。

白俄罗斯对莫斯科发生的政变表示极其审慎的态度。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政变发生后发表的告人民书称：现在最主要的是，保持国家的完整性、稳定和加强经济，提高国家的国际威信，不容许削弱国家的防御能力；必须支持人民在全民公决中所表达的支持签定新联盟条约的意见；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立法文件在共和国全境继续有效，合法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将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反对派议员单独召开会议，呼吁不服从“格克契普”的命令，呼吁内务部、克格勃和军人忠于宪法，不服从反宪法的“格克契普”。白俄罗斯人民阵线领导、明斯克市苏维埃、白俄罗斯社会民主格罗巴达、白俄罗斯联合民主党、白俄罗斯民族民主党、明斯克罢工委员会通过声明，支持叶利钦关于举行无限期罢工的号召，并印发了叶利钦的命令和《致俄罗斯公民书》等传单。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和其他地区总的局势平静，未见军队调动。

在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基叶尼奥夫，局势保持平静。而据“追述”通讯社报道，8月17日——18日夜晚，军队在18日深夜在摩全境进行紧张调动，在重要路口布置了巡逻队。摩军区司令奥西波夫要求摩共和国总理瓦列里乌·穆拉夫斯基下令解散共和国的民警部队，但穆拉夫斯基未予理睬。特种民警部队开始保卫摩议会大楼、电视大楼和出版大楼。

莫斯科发生政变时，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米尔恰·斯涅左尔正在休假，8月19日早在得知政变的消息后，他立即中止休假，并以摩议会和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称，如果政变分子执掌政权的话，摩将支持俄罗斯关于总罢工和不服从“格克契普”的指令，并宣布成立由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莫沙努和总理穆拉夫斯基等组成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宣布“格克契普”为非法。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1991年前已宣布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但是，苏联当局并未承认他们的独立，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在三国。驻扎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波罗的海军区苏联部队司令费奥多尔·库兹明上将，被任命为该地区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

19日一早，在政变消息传来不久，驻扎在立陶宛考纳斯的苏军空降兵小分队奉命占领了首都维尔纽斯市考纳斯广播电视中心大楼。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吉斯通过独立的立陶宛电台发表讲话，称莫斯科出现的新政权可能实行军事独裁，呼吁立陶宛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而战斗，保卫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瓦格诺里斯也通过这家电台发表演说，要立陶宛人民应该充满信心，保持镇静，决不要去同军队对抗。数千名居民聚集在最高苏维埃大厦，用钢筋混凝土板块把大厦入口处围了起来，并在大厦周围架设了铁丝网。兰茨贝吉斯在中午又通过电台发表了告全世界人民与自由国家政府、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书，指出苏军以暴力强占重要设施对立陶宛居民的生命和立陶宛共和国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危险。他说，在立陶宛推行强占性的苏联统治是“希特勒——斯大林交易”的继续，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种交易将立陶宛出卖了。他呼吁国际社会对合法选举产生的立陶宛政权给予帮助。立陶宛“萨尤季斯”议会委员会也通过电台发表告立陶宛人民书，呼吁各城市和各区人民准备全面政治罢工，集会抗议苏军占领和准备粉碎苏军准备推翻立陶宛合法政权的图谋。8月19日下午，兰茨贝吉斯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立陶宛共和国及其人民决不服从“格克契普”的任何决定。他对美国政府立即承认立陶宛为独立国家表示赞赏。他说，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他将组织流亡政府。他说，一切在苏联境内违法和反宪法的事情，在立陶宛境内就更加违法和反宪法。在立陶宛，除了苏军空降兵一度占领电视中

心大楼外，军队无其他调动情况。

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8月19日举行的非常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政变。拉脱维亚人民阵线主席罗·拉茹卡斯通过电台向人民通报了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理事会非常会议的情况，他指出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和政府，以及地方自治机关对苏联“格克契普”和苏联军队的威胁将不予理睬，一旦拉脱维亚政权工作受到阻挠，拉脱维亚人将奋起发动公民抵抗运动。8月19日傍晚，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电视台被特种民警部队占领，停止电视转播。深夜，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总部曾一度遭里加特种警察部队的占领和袭击，4名工作人员遭到殴打。

在爱沙尼亚，波罗的海军区司令费·库兹明于8月19日上午通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在爱沙尼亚实行紧急状态。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主持了爱沙尼亚国防非常委员会会议，会议针对苏联“格克契普”的决定发表一项声明，指出爱沙尼亚已宣布独立，爱沙尼亚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的方针任务是，在目前继续奉行和平恢复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独立。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企业罢工委员会则发表呼吁书，表示全力支持“格克契普”。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理事会要求宣布爱沙尼亚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稍后，爱沙尼亚政府首脑爱德加·萨维萨尔通过塔林电台发表声明，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总统有病，指出“格克契普”的组织者是企图以最原始的方式来剥夺苏联总统的权力。他认为，许多事情将在最近的24小时内见分晓。午后，两架伊尔——76飞机载着100名空降兵从普斯科夫降落在塔林机场，还有大约120辆装甲运输车和20辆卡车组成的军车车队从里加向塔林开来。阿·吕特尔主席发表呼吁书，号召组织纠察队，保卫广播大厦、电视大楼和出版大楼。

位于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是个多民族共和国。在得知莫斯科发生政变后，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通过电

视台发表演说，呼吁各族人民和人士保持平静和克制，因为任何过火的、轻率的行动都有可能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动荡的开端。他特别强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不实行紧急状态，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宣言和宪法，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机关。他呼吁所有劳动集体保持高度的觉悟和组织性，防止给国民经济造成混乱。他呼吁各政党和运动，在当前局势下，极其重要的是在理智和责任感的基础上放弃眼前的分歧，不使对抗发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还呼吁驻扎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苏联武装力量、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部队的官兵，要求他们忠实于宪法准则，尊重人权和地方政权机关。随后，纳扎尔巴耶夫就苏联国家发生的事件发表正式声明，他明确地说，8 人成立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没有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参加下制定出的文件是公开违法行为”，“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他还要求听到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的意见，戈氏应当亲自证实自己不能履行其职责。哈萨克共和国境内的许多民主党派，以及阿拉木图工人运动号召不执行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和指令。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阿卡耶夫通过电台发表告人民书，他说，他是以充满忧虑和不安的心情来讲话的，他同时又表示了对理智和民主将会获得胜利的希望。他说，他将尽一切努力来保卫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国家主权，保障社会秩序和法制。他呼吁吉尔吉斯人民保持镇静、理智和明智，维护团结和统一。吉尔吉斯副总统格尔曼·库兹涅佐夫在广播电台也发表声明，指出吉尔吉斯共和国领导将根据本共和国的宪法行动。他呼吁人们排除任何冲突和对抗。副总统库兹涅佐夫还被临时指定为共和国安全委员会主席。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 8 月 19 日还在印度访问，得知莫斯科发生政变消息后，立即中断访问回国。他在电台发表讲话说，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没有必要实行紧急状态。这里的局势稳定、正常的劳动节奏得到了保障。他对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各方面

领导人说，国家改革进入死胡同的原因是缺乏明确的改革构想，以及实施改革构想的战略。乌兹别克民间有句名言："先建新房，后拆旧房。"而现在的做法恰好相反，旧房拆掉了，而新房尚未建造。由此造成的可悲后果是生活越来越糟。民主党"意志"认为，撤销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国内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行为。"比尔里克"运动也采取相同的立场。

塔吉克民主党8月19日通过告人民书指出，鉴于业已形成的政治局势，塔吉克民主党号召共和国居民不支持自封的"格克契普"，要求同俄罗斯一样宣布总罢工。塔吉克民主党主席绍蒙德·尤素波夫向塔吉克总统卡·马赫卡莫夫发出呼吁，要求总统否定"格克契普"及其行动措施，并拒绝执行"格克契普"的指令。尤素波夫提醒总统，如果不这样做，民主党将号召塔吉克人民投入普遍不服从运动。只是到8月21日，塔吉克斯坦总统卡·马赫卡莫夫才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认为保留在苏联，尽快地签署新的联盟条约是必要的。他呼吁塔吉克公民保持平静，维护法制和纪律。

在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总的形势是平稳的。土库曼总统萨·尼亚佐夫召开总统委员会秘密会议讨论对策，随后，萨·尼亚佐夫同土库曼境内的苏军部队达成协议，宣布土库曼不准备实行紧急状态。

8月19日，阿塞拜疆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中断了对伊朗的访问，他表示赞赏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阿塞拜疆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则发表了态度谨慎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说，对明智的法律，我们将遵守，而对愚蠢的法律，阿塞拜疆人民是不会去执行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则号召阿塞拜疆人民谴责政变。呼吁共和国领导人不要同"格克契普"这一自封的政权合作。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纳一卡自治州问题组委会主席维·波利亚尼契科认为"格克契普"是给人以希望的机关，他认为，由于阿塞拜疆同亚美尼亚之间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应当通过实行紧急状态加以

解决。

亚美尼亚对政变的态度也极其谨慎。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决定不停止正常工作，呼吁亚美尼亚居民保持平静和遵守纪律，不要对局势进行评价。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列翁·捷尔—彼得罗杨在电视台宣读了联合声明，并说，共和国当局支持与中央当局和部署在亚美尼亚的苏军第七集团军司令部保持经常联系。他说，地方政权机关完全控制着亚美尼亚的局势。他在致共和国公民书中要求，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境内活动的各政党、社会政治团体，新闻舆论工具，广播电视部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谨慎，呼吁人民从亚美尼亚的最高利益出发，严格遵守法律、秩序和纪律，不举行群众大会，不举行示威游行。第七集团军透露，该司令部和亚美尼亚克格勃一直未得到莫斯科的任何命令。亚美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瓦兹根·马努基扬坦率地说，在"格克契普"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之间的权力斗争结束之前，亚美尼亚将不表达自己的任何明确观点。

格鲁吉亚总统兹维阿得·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与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及部长会议联合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未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给予评价，只是号召格鲁吉亚人民保持平静、秩序和纪律。格鲁吉亚的反对党、民族民主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吕图利亚指出，格鲁吉亚应该在政变后立即重申其独立方针。稍后，加姆萨胡尔季阿向西方国家人民和政府发出呼吁，希望西方只支持苏联人民选出的政权，并要求西方立即从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对于"格克契普"，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称，现在很难对已发生的政变作出政治评价，因为现在还不清楚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或者只不过是某些领导人要想获取政治分红的一场交易。

5. 回声之五：自世界各地

世界股市被认为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动荡的晴雨表，它

的上下波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不同事件引起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苏联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总统被解职的消息传来，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世界各地的证券交易所反应迅速，股票价格和货币汇率急剧波动。

证券商们大量抛售股票，货币证券商显然指望从美元和黄金上寻求安慰。

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道-琼斯工业股票在平均下跌30.41点之后不久又下跌了65.07点，跌至2902.95点。在纽约的早期交易中，30年长期债券提高了18～32，这项交易是投资商的安全港。在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和白金的价格均上扬。

在加拿大多伦多股票交易所，开盘后的半小时内，股票平均下跌53.5点。

在欧洲市场，股票市场一片混乱。伦敦股市，100种主要工业指数锐减121.4点。这迫使英国首相梅杰不得不出来讲话，他要求投资商保持镇静。伦敦股票交易所的股值顷刻之间损失了5%，由于苏联事变带来的冲击波，大约抹掉了200亿英镑。

德国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受到损害的影响最大，股票价格在8月19日这天收盘时就下跌了8%。

法国巴黎股票交易所损失了约7%的股值。

意大利米兰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交易指数下跌幅度达到7.23%。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平均股票价格暴跌。交易所笼罩着一片异常气氛。

香港、新加坡、泰国、台湾地区、韩国、马来西亚等地的股票交易所，股票价格普遍直线下跌，跌幅都在3%—6%之间。

可见，苏联发生的政变带来的是何种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地对苏联发生政变持何种立场和态度，这对苏联“格克契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布什总统在8月18日（华盛顿时间）晚12时左右获悉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废黜的消息，他立即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进行磋商，并同英、法、德领导人通了电话。8月19日早，布什总统在缅因州的休假别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布什说，莫斯科发生的事，戈尔巴乔夫的下台是一次政变，而且是违背苏联宪法的政变；这是他多次讲过不愿看到克格勃和军方支持的政变终于发生了。布什说，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出乎美国的预料。他三周前访苏时曾询问过戈尔巴乔夫，强硬派是否会接管政权，戈氏回答说，民主气氛在苏联已如此普遍，人民不会改变它，尽管经济非常困难，人民希望民主进程继续下去。布什还说，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可能对苏联同美国和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布什表示不希望看到苏联回到“冷战时期”，也不希望东欧局势发生倒退。布什还宣布，鉴于苏联目前的形势，美国暂停对苏联的经济援助。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是苏联内部的问题。对这种事情，我们只能作出反应，不能进行直接介入。苏联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还成立了苏联局势特别小组，以监视和研究戈尔巴乔夫下台后苏联局势的变化。

8月19日，布什在华盛顿试图同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未能成功。但是，他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却取得了联系，了解到政变的某些情况。特别是从派往美国游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科洛列夫那里了解到实情。于是，布什总统又立即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拒绝承认那些通过政变搞掉戈尔巴乔夫总统的苏联领导人，并要求他们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布什的声明指出，美国将不支持对莫斯科的经济援助的计划。在短短的几小时之内，美国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而在此前，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已托苏联驻美国大使维克托·孔普列克托夫捎信给“苏联代总统”根·亚纳耶夫。但信件内容不详。

布什在电话中向叶利钦保证继续支持叶利钦的目标，并通报了

他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这些领导人对叶利钦的支持。布什还同东欧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向他们强调东欧国家的民主进程不能倒退。布什并向东欧国家领导人表示，东欧是重要的，美国仍然关心他们的国家，确信东欧国家有必要保持平静。

法国。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得知莫斯科发生政变的消息后，态度审慎，认为现在谈论对苏联进行制裁还为时过早。他说，苏联新领导必须保证遵守明确的规定，执行赫尔辛基和巴黎的国际协定，否则欧共体和西方国家将停止对苏的一切援助。

"格克契普"的代表人物、"苏联代总统"根·亚纳耶夫在事变后立即致函法国总统密特朗，向他保证苏联将坚持民主和改革；所有国际协议和协定仍然有效；戈尔巴乔夫人身安全得到完全保障，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等等。对此，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惊讶，并公布了这一信函，而其态度比较模棱两可。密持朗总统指出，"不能这样推翻一场人民运动。这场运动不久前就让人想到，如果戈尔巴乔夫控制不了局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表示不希望采取镇压、武力和暴力的措施；要求现任苏联领导保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生命和自由"。

英国。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召见苏联驻伦敦的大使列昂尼德·扎米亚金表达了英国政府对苏联事态的立场。赫德说，英国对苏联的事态表示担忧，从长远来看，苏联人民的希望是不可能被扼杀和抹掉的。他告诉苏联大使，英国关心的是，苏联应遵守它的国际义务；英国对莫斯科是否会履行尊重人权的诺言表示怀疑。赫德还宣布，英国暂停提供援助苏联经济改革的8300万美元的技术知识基金。因为如果英国一直在帮助的苏联改革破产或被取消的话，那么向苏联提供帮助的整个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德国。德国总理科尔在得悉戈尔巴乔夫被解职一事后，立即中断了在奥地利的休假，回到波恩。科尔和外长根舍及总理府部长赛特斯等在波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科尔总理对苏联发生的政

变表示极大忧虑，并表示要求苏联领导集团恪守所有国际条约和协定，要求莫斯科必须尊重欧安会最后文件和巴黎宪章，要求苏联继续实行和平政策，特别是裁军和军备控制政策；要求苏联继续推进民主化和改革政策；保证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

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表示，对苏联新政权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他希望戈尔巴乔夫被推翻一事将不会导致内战。因为他获悉在莫斯科市中心出现了坦克，人们在集会示威和呼吁举行总罢工。同时，德奎利亚尔希望苏联这次政权更迭将不会使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脱离轨道。

东欧。在获悉苏联发生政变和戈尔巴乔夫总统被解职的消息后，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和讲话，表明各自的立场，对苏联政局的突变普遍感到忧虑，因为苏联的变化与东欧国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波兰总统瓦文萨同波兰国会和政府领导人，以及各党派负责人进行了紧急磋商，随后发表了态度极其审慎的声明，指出苏联国内形势对波苏两国睦邻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苏联发生的这种形势变化可能会影响波苏两国关系，但希望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瓦文萨总统呼吁波兰人民保持平静和审慎。

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统哈韦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目前所得到的消息证明，苏联国内政局正发生重大转折。俄罗斯议会发言人称这一事态发展是国家政变。苏联最近的事件不能不引起我们对 20 多年前发生的不幸的历史事件（即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的回忆。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对此事态的发展掉以轻心和陷入幻想。”哈韦尔认为，苏联在民主道路上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捷克斯洛伐克并不面临任何直接的危险，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是同欧洲安全联系在一起的。捷联邦内务部立即成立了特别安全委员会，并下令加强对捷苏边境地区的警戒，调动边防部队加强防范措施。

匈牙利总理安托尔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就苏联国内形势发表了讲话，他说，匈牙利的立场同欧洲、北美及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立场一样，即任何政治变革只能按照宪法和民主方式进行。他说，匈牙利作为苏联的邻国，将按照巴黎宪章的基本原则执行负责的外交政策。匈牙利作为一个主权共和国已不再是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成员国，苏联军队已从匈牙利撤去，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安托尔总理还说，苏联的事态变化无论如何不会对匈牙利的经济产生好的影响。稳定对于本地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不能忘记南斯拉夫国内的危机，而现在又在一个大国且是匈牙利的邻国出现了可能危及这一地区稳定的情况，使人感到极大的不安。匈牙利政府发言人拉斯洛对新闻界表示，匈牙利国会内6个政党的代表与总理安托尔讨论了苏联的事态，认为应当表示克制和保持国内稳定。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举行了专门会议，讨论了苏联的事态发展，仅表示了对苏联事态发展将予以最大关注。南联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作为一个大国，苏联的局势是否稳定关系到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稳定，南斯拉夫联邦以极大的关心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局势的发展。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主持了罗马尼亚议会两院议长、政府代表和最高国防会议成员的联席会议。会议对苏联最新事态的发展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表示十分关注和忧虑；呼吁罗马尼亚所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及全体公民表现出政治理智、冷静、清醒和警惕，保持国内的稳定和一切领域的活动正常运转。

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总统热列夫发表讲话，认为苏联发生的事件“是一次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它是由克格勃和国防部发动的，而且宣布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热列夫总统指出，苏联的新闻封锁、戈尔巴乔夫总统至今下落不明、坦克和装甲车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共和国的首府行进，这一切都证明是一次军事政变。热列夫

总统认为，这一事件将对苏联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它可能会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后果极其严重的内战开辟道路。俄国人有着打内战的极其惨痛的传统。种族的冲突、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其后果不仅对整个东欧，而且会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和影响。热列夫总统谴责这种反民主的方法和行为。

阿尔巴尼亚。阿利雅总统在电视台发表了讲话，认为戈尔巴乔夫被解职将带来消极影响和后果。他说，苏联这一事态引起阿尔巴尼亚对安全问题的注意，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对南斯拉夫大塞尔维亚势力和反动势力将是一个鼓舞。他们有可能采取反对科索沃，反对阿尔巴尼亚的行动。因此阿尔巴尼亚人民应对此更加提高警惕。

欧共体。欧共体12国外长在海牙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中止对苏联经济和技术援助。同时建议欧共体成员国中止同苏联的双边经济合作和对苏的经济援助。会议认为，苏联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政变，撤掉戈尔巴乔夫的做法是违背《赫尔辛基文件》和《巴黎宪章》原则的非法行为；欧共体谴责苏联“格克契普”的行为，并要求恢复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欧共体决定授权欧共体主席国荷兰通过适当方式去会晤戈氏本人，以核实其健康状况和执政能力。欧共体还声明，鉴于苏联的事态，必须加快同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关于建立联系国关系的“欧洲协定”谈判，同时寻找途径扩大和加强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合作。

亚洲。在韩国汉城，韩国政府领导人召集了紧急会议，称莫斯科的事变是一场灾难，将造成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北朝鲜和越南都对苏联事态保持缄默。北朝鲜未立即报道此事件新闻。越南只简要地报道了这一消息，而未加任何评论。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报道了苏联的事态，表示“极大关注”，未作评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领导人称，苏联事态是一场灾难，将会破坏世界政治稳定。

日本对苏联事态反应强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说，据已知消息，

此次亚纳耶夫副总统取代戈尔巴乔夫就任代总统，不符合苏联宪法规定程序。他表示对目前苏联的事态十分担心，强烈希望苏联的改革不能倒退。日本外相中山说，莫斯科市内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有些地方的军队与民众处于对峙状态，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他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等改革派认为亚纳耶夫等的行为和措施是不正当的，是非法的，所以有人指出这次政变将发生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日本通产省宣布，由于苏联发生政变，日本国暂时冻结以支持苏联实施军工转民用为主的一系列援苏计划。通产省领导还说，苏联新政权是靠政变上台的非法政权，它很可能否定戈尔巴乔夫总统制定的民主化路线。前首相中曾根发表谈话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犹如触上了暗礁的航船，已左右不能转动。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说，但愿不会因为这次政变而使历史的车轮倒退。

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对苏联的事变一方面作了客观报导；另一方面表示极大担忧，因为苏联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对亚洲地区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中东。与世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欢呼戈尔巴乔夫被推翻，他致函苏联代总统根·亚纳耶夫，称他推翻戈尔巴乔夫是勇敢的、历史性的行动，并为此而欢呼。卡扎菲在信中说，希望亚纳耶夫等成立"格克契普"将把苏联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因为苏联是在由于帝国主义策划的、不仅针对苏联而且针对整个世界的大阴谋而陷入这场危机的。他表示将全力支持苏联"格克契普"，和莫斯科保持稳定的、历史性的友谊。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发言人说，伊拉克为戈尔巴乔夫下台而欢呼，这有助于重建国际平衡。伊拉克还批评了苏联政府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在海湾危机期间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反对伊拉克。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成员亚西尔·拉布说，希望苏联的事变将有助于解决苏联在国内面临悲剧性问题，其中特别包括解决大

规模犹太人移民问题。巴解领导人担心，今后从苏联来的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最后都将定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戈尔巴乔夫的倒台使巴勒斯坦人有可能恢复信心。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戈尔巴乔夫是失势于美国，而美国主宰世界使巴勒斯坦的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拉丁美洲。多数拉美国家对苏联事变表示担忧和不安。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对戈尔巴乔夫被解职一事表示遗憾，说如果戈氏倡导的开放计划出现衰退，将严重损害世界和平进程。阿根廷副总统爱德华多·杜阿尔德谴责苏联政变，认为这是企图扰乱当今世界大国宪法秩序的做法。

智利政府发表声明，对于苏联事变表示担忧，希望苏联政权更迭不要影响已在世界范围内引向一个必须保持和加强的新秩序这一健康的进程，并希望苏联业已开展的民主化进程不致倒退。

乌拉圭外长埃·埃斯波埃发表一项官方声明，表示对苏联的事态极其关注，希望不再发生意味着缓和进程倒退的事情。他还表示，乌拉圭政府希望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完全保障并给予他应有的尊重。

古巴的电台和电视台报道了苏联事变的消息，但官方未作任何表态。古巴埃非社记者试图从外交部获得官方立场，但未能成功。记者又采访了一些西方国家外交官，他们认为苏联恢复强硬政权对古巴政府有利。记者又访问了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古巴官员，他们对苏联发生的事态表示同情，并说红军不可能无动于衷地容忍苏联解体。

五、"白宫"内外

在莫斯科发生"宫廷政变"之后，经过8月19日一天，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应不一。莫斯科的一些记者对此也作过民意测验和分析，认为持支持态度的人是少数，持沉默和不置可否态度的是多数，持反对态度也是多数，如果一定要用数字量来表达的话，那么它们的比例是：2∶5∶3。而随着事态发展，这一比例又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小时、分、秒来计的，而支持者的比例越来越小、中立者的比例缩减，而反对者的比例急剧上升。在反对者中间，莫斯科的"白宫"是反对"格克契普"的司令部。"白宫"与包括苏联国防部、克格勃总部和内务部总部在内的"格克契普的克里姆林宫"的对峙，构成了在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变与反政变的场景。

1."白宫"之内

在离莫斯科市中心繁华地区不远的地方，面对莫斯科河畔的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滨河街上，耸立着一幢高19层的白色大楼，这就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所在地。近年来、在近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它总是显示出它是俄罗斯"白色神经中枢"的形象，故而被人们称为俄罗斯的"白宫"。

8月19日凌晨，克里姆林宫突发政变的消息传来之后，"白宫"内立即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及俄罗斯联邦的其他一些主要负责人，聚集在"白宫"，共同商讨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动

政变，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所造成的局势，以及抵抗这一违宪政变的对策。

面对拥有军队、特种部队和坦克的“格克契普”，叶利钦等人懂得首先要告诉莫斯科人和俄罗斯人，这场政变是具有“反民主、反改革、反宪法的实质”。因此，8月19日一早，“白宫”就起草了一份由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总理西拉耶夫和代议长哈斯布拉托夫签署的《告俄罗斯公民书》。由于俄罗斯电台和电视台已被苏联克格勃控制，一时无法将这一呼吁书播发出去。这时一些被禁报社的印刷工人，自发地组织印制了这份呼吁书的传单，并很快在莫斯科全市散发和张贴。在莫斯科的地铁站口，在一些街道的临街建筑物上，都可以见到张贴的这类传单，围观的人很多很多，有些人则直接读给大家听。

与此同时，叶利钦想方设法要与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以便了解戈氏健康的真实情况。叶利钦对“格克契普”宣布的戈氏病倒一说抱有极大的怀疑。叶利钦也懂得，“格克契普”提出的所谓“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而不能履行总统职责”一说，完全是他们发动政变的一个惯用的伎俩，因为叶利钦在8月16日还同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话。但是，这时“白宫”对外的电话、传真等通讯联络虽然畅通，而叶利钦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话取得联系。叶利钦明白了，戈氏至少已被隔离软禁。

叶利钦在“白宫”会见了一些外国驻苏大使馆的使节和官员，向他们通报俄罗斯官方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是一场反宪法的政变，并指出支持这一委员会将会恢复“冷战”，因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象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是保守势力集中的苏联军工集团的新老负责人，所以这次政变带有使“冷战”死灰复燃的企图。叶利钦没有向外国使节提出任何具体援助俄罗斯民主力量的要求，只是希望得到道义上的支持。

为了使国内外，特别是使世界各国了解俄罗斯领导对政变的立

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决定新闻中心在“白宫”大厦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直呆在“白宫”，并不断地从“白宫”发布命令和发表讲话。总统的第60号令指出：俄罗斯联邦认为自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各项通告是违反宪法的，其组织者的行为是国家政变，犯有国事罪；认为所有以所谓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通过的决定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对凡是执行上述委员会决定的负责人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叶利钦总统十分清楚，争取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部队保持中立或支持至关重要，他在“白宫”发布的总统第61号令中指出，由于“格克契普”发动政变所造成的局势，俄罗斯总统决定：第一、在召开非例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所有苏联执政机关，包括苏联国防部、苏联克格勃和苏联内务部，应直接服从人民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指挥；第二、俄罗斯联邦的克格勃、内务部和国家防御委员会暂代行在俄罗斯领土上的相应苏联机构的职权。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所有内务部、克格勃、国防部的地区性及其他机构，必须立即执行俄罗斯总统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的命令和指令；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克格勃、内务部和国家防御委员会的命令；第三、所有机关、负责人和俄罗斯公民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和决议。凡执行上述委员会决定的负责人将依法被免职并由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为了加强俄罗斯境内和“白宫”的保卫工作，叶利钦任命科别茨中将任俄罗斯国家防御委员会主席，并晋升为上将，负责领导俄罗斯联邦的武装力量。科别茨将军根据总统第61号令，发布了执行总统令的相应决定。

为了争取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克格勃和苏联内务部站到俄罗斯和民主力量一边，叶利钦还发出了向上述机构官兵的呼吁书。呼吁

书指出，发生了国家政变。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的苏联总统被非法篡权。苏联副总统、总理、苏联克格勃主席、苏联国防部长和苏联内务部长加入了反宪机构“格克契普”，从而背叛了国家，犯下了最严重的国事罪。国家已面临恐怖的威胁。在这一对俄罗斯和对全国来说是悲剧的时刻，呼吁所有官兵“不要落入谎言、许诺、军人职责的蛊惑宣传的罗网，不要成为一伙践踏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冒险家犯罪意志的盲目工具”。呼吁书说：“士兵们……你们曾宣誓效忠人民，而有人企图使你们的枪口对准人民”，“可以用刺刀建立宝座，但不会长久……阴谋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叶利钦还向东正教全俄大教首阿列克西二世发出呼吁书，请求他以其在教会和教徒中的威信，对教徒们施加影响，以反对反宪法的政变。

为了保卫“白宫”，科别茨上将宣布在“白宫”内成立一个保卫“白宫”的指挥部。指挥部由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奥列格·洛博夫为首的 22 人组成。指挥部决定将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枪支和武器，部分发到在“白宫”内的工作人员手中，共有 500 多人持有武器，大家表示要坚决抵抗到底，与“白宫”共存亡。

在“白宫”内还安装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超短波电台，不断地向“白宫”前的广场和周围广播。

为了保障俄罗斯境内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叶利钦总统发布一项命令，成立由俄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洛博夫、俄联邦国务委员会成员亚勃洛科夫、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克拉萨夫钦科组成的共和国国民经济综合业务局，以保障国家主要机构的有效活动。

俄罗斯副总统亚·鲁茨科伊在“白宫”发表了《致武装力量军人的呼吁》。他说，他作为苏联军队的上校军官、苏联英雄称号的获得者，号召官兵们不要反对人民，不要反对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们。他号召说，“决不允许发生流血！不给阴谋家任何支持，

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犯罪意图的实施。"他呼吁所有苏联武装力量的军人转到人民合法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一边来。

在"白宫"内，所有领导人都备有数名贴身保镖。一些领导人轮流上场，每隔一小时就到"白宫"大厦前的平台上，向广场上的人群发表演说，发布命令和通报情况。

"白宫"的确成了抵抗政变的指挥部。

2.“白宫”记者招待会

为了更迅速地对政变作出反应，为了更正式地向国内外了解俄罗斯领导对政变的立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决定抢先举行一次外国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以便将信息尽快传出去。于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新闻中心邀请各国记者于8月19日上午11时到"白宫"参加记者招待会，外国记者可以凭证件从"白宫"一号门进入"白宫"大厦。上午11时半，叶利钦总统、哈斯布拉托议长和西拉耶夫总理等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会议由叶利钦主持，他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这一呼吁书指出，国家总统被如此解职，无论用什么理由来加以辩解都是一次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他说，反动势力早就企图发动政变，现在他们采取不负责的冒险行动，妄图以武力来解决极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种武力方式是决不能接受的。叶利钦郑重宣布，这个夺权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它的一切决定和命令因而也都是非法的。他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徒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要求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叶利钦还要求保证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对全国人民讲话，并要求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他还特别呼吁军人们应表现出高度的公民责任感，不参与反动政变。最后，他呼吁在俄罗斯全境内进行无限期总罢工。

在记者招待会上，俄罗斯领导人回答了记者的一些提问。叶利钦说，他现在已无法与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对方的通讯被切断了。

而在8月16日他还同戈氏通过电话，当时戈氏完全健康，并告叶利钦准备8月20日回莫斯科召开联邦首脑会议。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说，准备在8月21日召开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讨论政局和将采取的相应措施。这时外面传来坦克可能驶来包围议会大厦的消息，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说，现在坦克已进入莫斯科，坦克会包围议会大厦，而我们没有坦克和枪支，只能向人民发出呼吁。

叶利钦说，他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通了电话，克拉夫丘克表示完全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但他现在已无法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乌克兰公民发表呼吁书。叶利钦说，他还想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取得联系，但是通讯线路受到限制而未果。

会上，俄罗斯联邦新闻秘书波尔塔纳宁说，目前已无法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希望外国记者协助传递消息和信息。

在“白宫”内，虽然有些通讯线路被切断，但对外联系的通讯、传真等尚能正常运转。俄罗斯通讯社、《国际文传电讯》社的工作人员表现顽强，坚持工作，不断地将“白宫”内各项决定、命令，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消息，及时地传到外界，在抵抗政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联邦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从“白宫”内发表讲话，呼吁俄罗斯境内的所有通讯设施、传真设备等应按自动接收消息系统工作。一些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们通过自制的电台，也在不断地传播各种消息。特别是非官方的“莫斯科回声”电台，尽一切可能在播发来自“白宫”和其他渠道的新闻和消息，莫斯科居民从它那里了解不少有关事态发展的情况。

3.“白宫”之外

从8月19日早晨9时起，支持俄罗斯总统的人们开始陆续不断地涌向“白宫”前广场（后来改名为“自由俄罗斯”广场），想从那

里得到一些有关事变的情况和真相。在一些街道的建筑物上，特别是在地铁出入口的地下通道中，张贴有各种各样内容的传单，其中，有反对“格克契普”的短文和口号；有号召罢工的传单；有呼吁莫斯科人前往马涅什广场集会的通告。稍晚，出现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告俄罗斯公民书》，等等。观者甚多，但发表评论的极少。在地铁车厢里，在公共汽车上，人们失去了往日的常态，昔日虽说生活窘困，但言行自由自在，也还能流露一丝带苦的微笑。然而在听到实行急紧状态，戈氏被解职的消息后，人们坐在车上阴沉着脸，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任何说笑。人们互相凝视着对方，或低着头，一言不发，沉默着，思索着，只听见车辆行进发出的轰响声。

“白宫”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人们还在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一些年轻的电工爬到广场的电线杆上架起高音喇叭和照明灯。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内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的同时，在“白宫”外，广场上的人群也听到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呼吁书的广播。人们被告知：一批坦克将包围“白宫”，接着又被告知：在马涅什广场正在举行群众集会。在广场的人群，有的留下继续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消息；有的离开广场前往马涅什广场；有的在酝酿设置路障，以阻挡坦克……在广场的电线杆上开始悬挂出各种标语：“格克契普的成员都是国家的罪犯！”“把克留奇科夫、普戈亚纳耶夫、亚佐夫交付法庭审判！”支持叶利钦的人们情绪非常激昂，但也不乏围观者。

“白宫”前广场上的人群听到坦克将向此驶来的消息后，自动组成里外三层长长的人链，并组织了纠察队，秩序井然。

不久，开来几辆装甲车。“白宫”的工作人员让这些装甲军车驶入广场，停靠在大厦正门旁边。人们一时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得知这是塔曼近卫师的军车，是因支持俄罗斯领导而前来守卫大厦的。

下午1时，叶利钦总统在数名贴身保镖护卫下走出“白宫”，他

登上停靠在广场上的一辆编号为110号的装甲车，向广场上人群，也是向全体俄罗斯人民发表了讲话，重复了《告俄罗斯公民书》所发出的呼吁。人们为见到叶利钦而欢呼不已。

这时，在红场周围，在马涅什广场附近，都开来并停着不少坦克和装甲车。红场上行人不多。而在马涅什广场这一近些年来经常举行游行集会的地方，这时已经聚集了数千人。在广场上，在一堆一堆的人群中，都有人在发表演说，表示抗议实行紧急状态，要求让戈尔巴乔夫总统在电视上露面，反对坦克和军队进入莫斯科，支持俄罗斯总统的呼吁书，呼吁人们举行罢工，等等。

在马涅什广场，有人散发了印有“打倒叛乱分子!”“成立抵抗小组”口号的传单。

广场周围停着几辆坦克和装甲车，路旁站着一些军人，他们中间也在议论，甚至争论。一些军人说，“我们决不向人民开枪!”另一些军人说，“现在坦克和推土机混杂在一块儿了，怎么办?!”但是，军队对集会未加干预。

不少群众还走到军人面前，同他们交谈，说明真相，军人只是回答奉命而来。看来，军人并不甚了解，调动和军队来到莫斯科的目的。

坦克要攻占“白宫”的消息传来后，已经在马涅什广场集会近三个小时的人群开始骚动。有的人大声疾呼：去保卫“白宫”。

这时，马涅什广场上不少人开始将停止运行的无轨电车推到广场上，以便阻挡坦克和装甲车开动。

下午，莫斯科的主要街道上已经停靠了不少坦克和装甲车。这些地方的交通完全阻断，只有地铁照常运营。在坦克和装甲车旁，围观的人很多。坦克和装甲车的顶盖都敞开着，士兵们都向外探着身子，多数士兵面带微笑。在军车队旁有官兵持枪守卫。但是，许多人都大胆地靠近军车，并同官兵们交谈。一位配带少校肩章、名叫维克多·戈戈列夫站在装甲车上说，没有开枪的命令，并让人们查

看他的手枪装的是空弹夹。

在一些有坦克和装甲车停靠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有趣的场面：有些人把鲜玫瑰花插到坦克的炮筒口上；有些人把叶利钦的《告俄罗斯公民书》等印件塞到官兵的手里，一些官兵还认真地阅读起来；不少男女青年径直爬上坦克和装甲车，竟然同士兵们谈笑自如；一些年长的妇女一边为官兵们送饮料，一边教训他们道："难道你们愿意，你们敢向自己的父母开枪吗？"甚至还有些外国留学生也在人群中看热闹，有的还与其苏联同学一起爬上坦克。

天空阴沉，夜色提早来临。在"白宫"前，在通往"白宫"的一些宽阔的街道上，在有坦克和装甲车停靠的道口，一些莫斯科人还在构筑路障。在"白宫"广场周围，人们用大大小小的粗细铁管、铁栅栏、树木等架起了一道围墙，在这特殊的围墙内外，都有"白宫卫士"守卫，在围墙的上面还部署了岗哨。"白宫"前的平台上，站立着许多持枪的守卫者。

夜渐渐深了。"白宫"广场前的人群中，因为没有更多关于攻占"白宫"的消息，不少人离去，还有不少坚持守卫在广场。

8 月 19 日从早到晚，尽管在莫斯科出现了坦克、尽管许多莫斯科人愤怒、激动，但是，可以说还是一种"沉默的对峙"。

4. "影子内阁"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苏联、俄罗斯和当前的局势，有自己比较周密和长远的构想。他思考的是，如果政变分子一旦大规模地动用武力、用坦克、装甲车以及军队占领"白宫"、并镇压民主激进力量，那么应该怎么办。尽管从 19 日一天与"格克契普"对抗的态势来看，抵抗是相当有成效的，"格克契普"的成员表现得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但是事态的发展还是存在着许多未知数，阵线还不那么分明。他还在想，一旦发生上述不测之事，退路又何在。于是，突然一个方案在他脑海中出现，他决定在自己的故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立

自己的后备基地，以便今后在那里再谋宏业。为此，叶利钦总统在“白宫”首先签署并发布了第61号总统令，命令俄罗斯政权相应机构接管目前由“格克契普”控制的苏联国防部、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克格勃。这样，被外界认为是叶利钦“影子内阁”的雏型出现了。

建立“影子内阁”需要有基地，需要有专门的领导班底。于是，叶利钦总统发布一项命令，成立一个由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洛博夫、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成员亚勃洛科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克拉萨夫钦科组成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民经济综合业务局。其任务在名义上是保障俄罗斯境内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但是，这正是叶利钦设计的“影子内阁”的筹组班底。

这个“影子内阁”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领导取得直接联系，那里的领导和政权机构都坚定的支持叶利钦。他们决定启用在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70公里的一片森林中的备用无线电转播站。在这里可以用文传机和电传机发布俄罗斯总统的命令和其它决定；在这里还可接收各方面反馈来的信息，使俄罗斯总统能够了解有关俄罗斯境内各州领导人、克格勃、内务部和军队地方机关领导人的态度、立场和行动，以及地方经济生活、企业的情况，等等。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领导人和俄罗斯邮电和新闻的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努力下，迅速地将该州范围内的转播站改装成可向全苏范围转播的转播站。当时决定在8月21日前，必须开通这一转播站，并将不断地播放俄罗斯无线电广播。

驻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军区司令马卡绍夫将军，对俄罗斯总统和民主激进派在其眼皮下的活动不可能毫无觉察，尽管这位将军宣称支持“格克契普”，但是，马卡绍夫将军也清楚，这场政变看来注定要失败，因此他对“格克契普”和苏联国防部的命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对眼下森林中发生的事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或极端的措施。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内务局和克格勃，显然是支持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的。设在森林中的备用转播站和州的转播站，都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特种民警部队守卫保护。此外，在森林中还埋伏了一支不知来路的队伍，防备对备用转播站可能发生的袭击。

在执行和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森林中，还是在州转播站，没有听到响过一声枪响。

与此同时，叶利钦总统于8月19～20日先后发布的接管苏联国防部、内务部和克格勃，将俄罗斯联邦国家防御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并任命科别茨上将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部长、任命海军少将维·谢尔巴科夫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等命令，都是作为苏联“影子内阁”在行事。

从“白宫”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所建立的“影子内阁”，对叶利钦总统，对莫斯科的抵抗政变，以及对叶利钦此后的权势急速上升，却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莫斯科一些报刊所作出的评价。

六、戈氏在做什么

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休假别墅拒绝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他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最后通谍，并把从莫斯科派来的说客赶走。此后，他逐渐被与外界隔绝起来，不再了解莫斯科和全苏事态发展的消息。但戈氏和其家人，以及随他前来的工作人员和卫队，并不想束手待毙，而是千方百计在这座别墅的小天地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似乎要同谁也无法说清的命运抗争一番。

1. 寂静又不平静的别墅

克留奇科夫、普戈、亚佐夫等派来戈氏别墅的5位说客表演拙劣。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打动戈氏的心，反遭戈氏一顿训斥而无言以

对，只好带着毫无价值的“最后通谍”回到莫斯科去。

说客们走了，在福罗斯的戈氏休假别墅周围，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和安宁。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想到，政变策划的核心人物和组织者早已紧锣密鼓地加紧对他实施严厉的软禁和隔离。

离戈氏休假别墅不远的海滩上，同往常一样，看不见人的踪影，黑海的海涛不断冲击着沙滩。

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在稍远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十余艘舰艇，从福罗斯角向东驶去。原来，这是“格克契普”领导交给苏联克格勃总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及其副手格涅拉洛夫负责指挥的边防部队的舰只，共16艘，其任务是巡逻和封锁通往福罗斯总统休假别墅的海域。

与此同时，苏联国土防空军司令马尔采夫上将下令，进一步采取封锁总统休假别墅的措施，由克格勃部队来执行；将两架戈氏的总统座机调离别尔别克机场；对凡企图靠近戈氏休假别墅的人，一律加以扣留并交克格勃机关处置。

这样，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家属，以及戈氏周围的人企图从海上或空中逃跑的途径，被完全切断了。

戈氏从卫士长麦德维杰夫将军处了解到，休假别墅已被克格勃部队的官兵严密包围，甚至在别墅内的行动可能也被监视。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显得十分镇静。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行动。他立即召集和调动起别墅内的所有人员，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于是，在这远离尘世喧嚣，看似寂静无声的别墅里，人们的内心经历了最不平静的数十个时辰。

2. 应变措施

随戈尔巴乔夫总统来福罗斯休假别墅的有戈氏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女儿女婿和孙女、戈氏的秘书和助手阿·切尔巴亚耶夫，两位速记秘书（索洛金和阿列克赛德罗夫，后来，在第二天，他们

被克格勃带走送往莫斯科），还有由卫队长麦德维杰夫将军率领的32名卫官，其中有担任总统贴身保镖的古别尔纳托罗夫（他也是在第二天被克格勃带走送往莫斯科），总统的医生等。

戈氏首先通过卫队长麦德维杰夫弄清了卫队所有卫官的态度和立场，他们都表示坚决与戈氏站在一起，并决定坚持到底。他们根据别墅的情况，划分了警卫范围，在各个地点安排了岗哨，昼夜值勤。

戈氏和在别墅里的所有其他人员只能从已设法修好的电视中了解到一些情况，而电视除了播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和公告外，只是转播电影和音乐演奏的节目。戈氏在收看到"格克契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情况之后，他明白了，这批冒险分子在会上是以所谓"健康原因不能行使总统职责"为借口夺取政权的。戈氏和随从人员都考虑到，这批冒险分子既然敢于用欺世谎言，那么他们也敢于做出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特别是卫队长麦德维杰夫将军及其卫队深深地懂得，冒险分子是敢于不择手段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会采取下毒方式残害戈尔巴乔夫总统和被软禁在别墅里的所有人。因此，卫队决定靠储存在别墅里的卫队食堂的食品来维持生活，而不再要求每天从外面运来食品。大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采取了相应措施并提高了警惕性，以防止冒险分子有机可乘。

另一项措施是必须设法了解到莫斯科和全苏的情况和政变后事态的发展，以及国外的反应。可是，在休假别墅，除了电视外，其他任何消息来源都被切断了，因为克格勃不仅切断了电话通讯联系，而且将其他可用于接收和传递消息的无线电设备全都收缴了。因此最困难的是没有消息来源。总统卫队的军官们都是一些心灵手巧的人，他们在别墅内的办公地点竟然找了旧收音机，接上天线，开始搜寻外国广播。戈氏的女婿还找到一台索尼牌的微型收音机。在收听外国电台时，英国广播公司和自由电台的广播最为清晰，后来又

收到美国之音的广播。大家开始把收听到的消息，加以综合和分析，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估计。尽管听到的只是一些外国的消息报道，但它们仍使戈氏和其他所有人都感到振奋。虽然它们并不都是令人乐观的，但至少可以使戈氏对事态的发展作出各种应变的对策。

他们采取的下一个措施是，必须想方设法让外界能够了解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健康状况、对政变的态度和立场。于是决定由秘书切尔尼亚耶夫不断地向监视和守卫别墅的克格勃负责人和其他人员交涉并提出：戈尔巴乔夫总统要求立即恢复通讯联络，要求派飞机来接总统回莫斯科。随后，戈氏决定每天上下午各一次亲自提出上述要求。虽然这一切始终没有得到答复，但是此招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戈尔巴乔夫总统身体健康，以及总统反对政变的坚定立场，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会将情况传布出去。俄罗斯总统顾问谢尔盖·斯坦克维奇正是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渠道将福罗斯总统休假别墅在8月19日～20日期间的一些情况带到莫斯科，并向叶利钦总统和议会作了汇报。

戈氏不断要求家人坚定信心和信念，顶住各种身心的压力。他对妻子赖莎说，“发生了严重的事，甚至也许是可怕的事。我不想冒险，也不想搞交易。我决不会上讹诈的当。但是这一切可能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全家应当作好一切准备。”赖莎说：“我们全都意见一致，全都表示支持你。我们将和你在一起。”赖莎还说，这也许是最困难的时刻，但是当全家作出这种决定后，全家人都感到轻松多了。

3. 记下这段历史

安排好应变措施之后，戈氏考虑到，虽然他被软禁在别墅，但他应表明自己仍然在履行总统的职责，表明他坚决反对阴谋夺权的立场，有必要将这短短几天里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

8月19日夜间，戈氏利用家人带来的摄像机，在家人和秘书、医

生等在场的情况下，摄下了自己在福罗斯别墅内发表声明的图像和录音。

戈氏说："我希望，现在我在电视摄像机前所说的话能使这一切为苏联人民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公众和世界公众所知晓……我声明，有关我健康状况的一切说法都是欺骗。这样，就是靠欺骗实行了违反宪法的政变……我休假所在地的克里米亚别墅已被军队包围，我已被软禁……我被切断了同政府的联系，我在这里的飞机和直升机也已被调离，不知去向。我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和接触……谁也不准进入别墅区。我被部队从海上和陆地上包围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能否将这盘录像带带出去，但是我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盘录像带能够让人看到……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他们派了代表来，他们来到我的别墅后我才知道，我对他们的代表说，我反对实行紧急状态……"

"现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所干的一切是最危险的，它可能导致内乱、对抗的升级，可能还会导致内战……这就是我要说的，并请你们恰当地评价我所说的话。"

随后，戈氏向秘书切尔尼亚耶夫口述了总统的呼吁书。其内容为：

我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如下声明：

第一、亚纳耶夫在以我有病和无力行使自己职责为借口，履行总统职能的做法是对人民的欺骗，因此这不能被称作别的，只能称之为政变；

第二、由此，也就是说，这以后的所有行动都是非法的。

无论是总统，还是人民代表大会都没有赋予亚纳耶夫这样的权利；

第三、请向卢基扬诺夫同志转达我的要求：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目前形势。

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才有权在讨论了所出现的局势后，决定关

于采取必要的国家措施和实施措施的机制的问题。

第四、要求立即中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直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上述决定。

如果继续这样的行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的措施进一步升级，就会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灾难，使局势更加激化，甚至完全打乱中央和共和国为摆脱危机而一致同意并开始进行的工作。

苏联总统　米·戈尔巴乔夫

1991 年 8 月 20 日于克里米亚

为了证明文件的真实性，戈氏在文件上亲笔签了字。此外，戈氏还拟定了一份呼吁书。戈氏决定马上将这些文件摄制成录像带，一共录了 4 次，由戈氏的女儿和女婿剪成 4 份。戈氏的医生鲍里索夫医学博士也把自己写好的关于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健康状况报告书复制了数份。戈氏和家人整整干了一整夜，然后，戈氏将这些文件交给了完全可以信赖的人保存，一旦有机会便带出去，并公诸于世。

在福罗斯休假别墅软禁的三天里，戈氏和其秘书切尔尼亚耶夫一起推敲并最后完成了他撰写的一篇大作。在文章中，戈氏本人反思了他从 1985 年推行改革以来所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这篇文章以后在戈氏撰写的《八月政变——（原因与后果）》(1991 年 9 月）一书中，以“在福罗斯写成的文章”为小标题成为该书的最后一章。

七、军警怎么啦

由国防部长、克格勃首脑和内务部长直接策划和组织的这场政变，从苏联现代史看，原本应该是最有力量、最有基础、从而也是成功把握最大的政变。然而，这次政变却一反常规，遇到了似乎是令人难解的麻烦。他们所领导和掌握的军队、特种部队和警察，究

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十分使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1. “军令如山倒”?!

如前所述,“格克契普”成员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早在8月19日凌晨4时30分即签署了一项命令,命令全苏境内的苏联武装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一个半小时后,亚佐夫又召开各军区会议,下令进入战备状态应采取的各种措施。但亚佐夫对两道命令都没有说明原因。苏联武装部队及各军区只是在听到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广播新闻之后,才明白亚佐夫命令的缘由。

亚佐夫所下达的命令几乎没有起到任何重要作用,因为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苏联武装部队和军区司令部收到命令,并立即作出了调动军队的部署;但是全苏境内的大部分军区和武装部队,或者是接到命令后未作任何行动决定,而采取观望的态度,或者压根儿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与此同时,亚佐夫下达的命令内容相当含混,只是原则性指令,并未指出各军区和武装部队的任务和应采取的明确措施,特别是未能解释为何要实行战备状态,令多数军区和部队的领导和官兵不解。

苏联国防部和武装部队总部的高级将领中,除亚佐夫和副部长瓦连京·尼连尼科夫等人是公开参与这次政变外,其他大部分将军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消极对抗,甚至公开反对,但是对亚佐夫参与的这场政变却保持沉默或观望。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目前苏联的形势下,国家已不是过去的国家,社会已不是过去的社会,人民已不是过去的人民,官兵也不是过去的官兵了;他们对动用武力来改变现状都抱有怀疑。因此,苏联军队的高级将领极少公开露面和表态;就连亚佐夫本人,发布了两道命令之后,再未见他露面和发布其他命令。

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将军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他是

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在政变过程中，他根据国防部长亚佐夫的命令，签署过一些关于武装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和部队应维持社会秩序和与犯罪分子斗争等内容的命令，但是在这些命令上签署的日期有的是"8月19日"，有的是"8月20日"，有的甚至是"8月30日"，而且这些命令文本迟迟未下达。同时，这位将军对于迅速安排军事领导机关同各武装部队的无线电通讯联络采取了消极态度。这样，上面的命令无法下达，下情也不甚清楚。

整个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始终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统一的指挥部，以配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的实施。

在全苏境内，许多军区都是在收听广播后得知政变一事。远东军区司令维克多·诺沃日洛夫上将说，他8月19日中午才和大家一样收听到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广播消息。他制止了共青团城驻军指挥官对地方施加压力和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企图。8月19日，亚佐夫专门签署了一项命令给远东军区，因为这是离莫斯科最远、且海、陆、空军力量雄厚的军区。然而军区司令部却称未收到任何命令。第二天，远东军区才接到命令，但那里的部队除了极个别地方有少量坦克在调动以维持秩序外，大部分地区的部队仍留在兵营中。西伯利亚军区只是规定不与当地人民代表接触，未采取任何行动。鄂木斯克卫戍区司令莫罗兹中将宣布支持并忠于俄罗斯的政策。20日2时，普利沃尔日斯克—乌拉尔军区的一批军官签署忠于俄罗斯、忠于人民的告公民书，号召军人决不要把枪口对准人民。

一些苏联武装部队公开宣布保持中立或支持叶利钦。太平洋舰队司令根·赫瓦托夫海军中将说，舰队和水兵都保持中立。苏联海军司令部的军官宣布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在政变期间拒绝向紧急状态委员会提供飞机用以袭击"白宫"大厦，并且宣布苏联空军反对实行紧急状态和"格克契普"的军事政变。苏联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不仅反对政变，而且还命令其下属部队派坦克分队前往保卫"白

宫”。

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军队直接卷入并参与了政变的军事行动，但情况也是极其复杂，参与同反参与的斗争十分激烈。

在立陶宛，驻扎在该国的苏军在8月19日晨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后，首先采取了军事行动，派出苏军小分队占领了地处考纳斯的立陶宛广播电视中心大楼和电话局。电视和广播节目中断，军舰封锁了塔林港湾。但在街上无军队调动。立陶宛总统以及各政党和人民群众对莫斯科的政变和苏军在立陶宛首都的行动，作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不过，军队没有采取其它进一步的行动。

在爱沙尼亚，8月19日由波罗的海军区司令费·库兹明上将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波罗的海军区副司令费·梅利尼丘克将军要求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吕特尔执行“格克契普”的决定，同时要求拆除街垒，但遭到吕特尔主席的拒绝。当地苏军一直到8月21日凌晨5时才派出一排军人占领了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电视中心，由于大楼的电梯被升至楼顶，占领者受阻，仅控制了电视大楼的一、二层。下午2时，一架伊尔——76型飞机在塔林机场降落，运来了100名空降兵；两队军车进入爱沙尼亚边界向塔林方向驶来，其中一队军车由120辆装甲运输车和20辆卡车组成，从普斯科夫方向驶来；另一队由载有军人的汽车和几部机动无线电台组成，从里加方向驶来。8月21日下午5时半，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理埃德加·萨维萨尔与苏军弗·梅利尼丘克中将在电视大楼进行谈判。当军方代表确信莫斯科的政变已经失败之后，才于当晚将空降兵部队撤离。

在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库兹明上将于8月19日下午在里加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但没有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到8月19日晚上，一支民警特种部队奉命占领了里加的电视大楼。8月20日又占领了拉脱维亚共和国内务部大楼和长途电话局大楼。电视大楼在争夺中被毁。20日晚深夜，空降兵部队和里加特种民警部队进攻拉脱

维亚部长会议大楼，收缴了大楼内的枪支。8月20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部分舰船离岸开往公海，宣布只服从苏联海军司令部的命令、而不服从由军区司令管辖的海岸司令部的命令。一直到8月21日深夜，进驻里加市的军车和装甲车奉军区司令库兹明上将的命令撤离里加市。

列宁格勒是“格克契普”试图重点控制的地方，这是伟大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又是战略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获悉亚佐夫的命令之后，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列宁格勒卫戍司令维克多·萨姆索诺夫上将立即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并调动军队前来包围列宁格勒。数小时之后，列宁格勒市市长阿·索布恰克从莫斯科飞回，同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会面，告之莫斯科政变的事实和违宪性质。20日2时56分，索布恰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萨姆诺夫上将以军人的名誉向他保证，军队不准备进城。

此时，一支坦克部队正从卢加开来，梁赞空降兵师和普斯科夫空降兵师也正向列宁格勒市方向驶来。8月20日凌晨5时左右，在距列宁格勒52公里处的公路上发现有一支装甲车队向列宁格勒进发。此外，苏联克格勃部队的维捷布斯克师的坦克和装甲车队也向该市驶来。到20日上午9时半，列宁格勒已被军队包围。后来，根据列宁格勒市长与军区司令达成的协议，规定所有的列宁格勒调动的军队一律停留在距城市70公里以外的地方。

列宁格勒军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应急小组领导人伊·伊万诺夫上校称，列宁格勒的军人对俄罗斯总统的呼吁书反应良好，并请军区所有的部队都呆在自己的驻地。

20日晚19时20分，业已接管了苏联国防部职责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任命海军少将维亚切斯拉夫·谢尔巴科夫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并命令驻扎在列宁格勒军区的所有苏联武装力量执行新军区司令的命令和指示。索布恰克市长等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完

全支持叶利钦的命令，并宣布成立公民抵抗司令部，由北方舰队第一核潜艇大队司令叶·切尔诺夫海军中将指挥。

这样，列宁格勒地区的军队完全转到反政变的一边来了。军队没有进城，也未发生任何军事武装冲突。

在莫斯科，军队不仅调进了莫斯科市，而且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流血事件。但是，进入莫斯科的军队，大多采取消极态度。对事变的缘由开始时一无所知，进入市区后的所见所闻，使他们动摇了，倒戈的有之，如塔曼师的部队、图拉空降兵师的部队等；拒绝服从命令的有之，如驻扎在莫斯科市近郊的几个摩托化步兵团接到进驻市区的命令后，部队指挥官拒绝执行。

在政变过程中，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誓言，什么“军令如山倒”的说法，都成了无稽之谈。

2. “黑色贝蕾帽”的懈怠

苏联内务部的部队被称为“黑色贝蕾帽”。政变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是苏联内务部长鲍·普戈，他是“格克契普”中显得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然而，他的下属及其“黑色贝蕾帽”却令其十分懊丧。因为“黑色贝蕾帽”在政变过程中，表现消极、懈怠、无所作为。

在实行紧急状态之后，苏联内务部在全苏各地的下属机构和部队，大多不愿卷入与人民群众对抗的漩涡中去。各共和国内务部长对来自莫斯科内务部总部的指令既不表态，也不执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长弗·巴拉诺夫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保障模范地遵守秩序，使得右派不要同左派干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内务总局表示中立。捷尔任斯克市内务局则表示只服从忠于俄罗斯总统的市苏维埃，并且准备派特种民警部队去莫斯科支持叶利钦。伏尔加格勒州内务总局领导人称，他们将执行俄罗斯合法选举产生的政权的命令。秋明州内务局长维·巴沙林声明，他服从俄罗斯总统。克麦罗沃州内务局长尼·什库特拉将军发表声明，民警不得妨碍居民

举行集会，等等。从各地传到内务部总部的消息大多如此。这使得普戈像被戳破的皮球一下子泄了气。

波罗的海三国的内务部却支持各共和国领导反对政变的立场，完全不听从苏联内务部总部的任何命令。

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列宁格勒内务总局副局长维·弗罗洛夫也只是说，总局已作好准备以应付非常形势；为了协助列宁格勒民警，增派了一些内务部队；民警部队寄希望于居民的支持和冷静。总局还得到俄罗斯内务部的指令，要总局服从于其领导。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反对实行紧急状态，市内务局长阿·克拉马罗夫声明，只执行市苏维埃的决定。

在莫斯科，苏联内务部与莫斯科市、州内务总局，以及警察部队都没有采取明显支持和执行“格克契普”的决定的措施。除在这些机关的所在地警卫有所加强外，街道上很少见到“黑色贝蕾帽”。8月19日上午，在离红场不远的马涅什广场和马雅科夫斯基广场先后举行人数众多的集会时，能见到人数不多的警察散立在集会场所附近各处，他们或相互说笑，或观望集会情况并倾听各处的演说。看来，内务机关出动的人，仅仅是想协助维持秩序，而不是准备进行干预！此后，属于内务机构的警察部队和人员，则越来越少露面。

在“白宫”周围，只有自动组织起来的保卫“白宫”的志愿卫队，而无一顶“黑色贝蕾帽”。

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完全服从俄罗斯总统和政府，它下属的三所内务部队学校的学员还派出学员及军官前来保卫“白宫”，其中布良斯克内务学校派出190名学员，奥尔洛夫内务学校派出19名军官，警官学校派出124名学员。

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科别茨上将，从8月19日下午到8月21日晚，先后分别发出了5项命令，其中都包含了要求内务机关及部队反对违宪政变；呼吁他们站到俄罗斯和莫斯科的合法选举产生的政权一边，并服从它们的领导；宣布直接接

管莫斯科市和州的内务机关，停止它们原来由苏联内务部直接领导的关系。

总之，在政变的几天中，莫斯科市和州的内务机关，对于“格克契普”来说，对于普戈来说，没有发挥任何他们预想的作用。

根据苏联内务部的内务部队总队负责人之一巴斯卡耶夫少将所述，足可以见到“黑色贝蕾帽”的一斑。巴斯卡耶夫少将说，8 月 19 日早晨 6 时 他被叫醒到内务部队总部看阅苏联内务部长普戈签发的关于紧急状态的秘件。交给巴斯卡耶夫的任务是，加强履行职责，只执行内务部的命令。这时他懂得是发生政变了。但他心里明白，参加政变就是犯罪。此后的三天里，巴斯卡耶夫没有得到上级指挥部的任何命令和指令。8 月 20 日 9 时 45 分，巴斯卡耶夫被召去参加内务部总部会议，会议由总部首长梅里科夫将军主持。会上，巴斯卡耶夫当众声明，他只执行符合法律和内务部队章程的那些命令。梅里科夫将军默默地听着。巴斯卡耶夫问道：“什么命令？”梅里科夫答道：“亚佐夫命令沿环行路立即包围莫斯科。”会后，巴斯卡耶夫说，他在会上拒绝执行不属内务部部队职责范围的命令，如让他派 200 名内务部队士兵交给克格勃指挥保卫卢基扬诺夫主席，又如梅里科夫将军要他派部队保卫莫斯科市内各街道上的作战技术装备，等等。对此，巴斯卡耶夫少将都一概拒绝，宣称这是军队的事，而内务部队只履行维持秩序的任务。国防部长亚佐夫在 19 日午后的国防部会议上了解到内务部队“罢工”的情况，显得极其沮丧。

巴斯卡耶夫少将来到在布蒂尔市场附近值勤的内务部队官兵中，了解到他们都不愿参与袭击“白宫”和人群的行动，而准备帮助俄罗斯政权。晚间，新建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部长科别茨上将接见了巴斯卡耶夫少将，请后者对保卫“白宫”给予帮助。

就这样，“黑色贝蕾帽”懈怠了。

3. 克格勃也是“俄罗斯人”

“克格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缩写词拼音。过去苏联老百姓一提到克格勃总有一种神秘和畏惧的感觉。在苏联政治舞台的历史上，克格勃具有的权力，不说是超越一切的，也可以说是特殊重要的。虽说近些年来，戈氏公开性的推广，使克格勃的权力有所限制，但仍具有特殊地位。在这次政变中，从策划到实施，克格勃的首脑都扮演了主要角色。

8月17日，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召集了紧急状态委员会部分成员的策划预备会。会议是在克格勃总部安排的所谓“ABC”秘密地点召开的。8月18日，即公开宣布政变的前一天，克格勃的第二把手阿格耶夫按照克留奇科夫的直接命令下达了相应的措施，即软禁和隔离戈尔巴乔夫、控制消息报道、制定攻占“白宫”计划并拘留“白宫”领导人。这些措施相继得到了实行。8月19日克格勃总部还签发一份4号绝密文件，指令对俄罗斯领导人，包括叶利钦、西拉耶夫、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科别茨等在内的共22人，实行监视，并防止上述人逃出莫斯科或逃往国外。

尽管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的领导人显得信心十足，但它在各地的直属机构却并不是象它想象的那样积极配合。

在一些原加盟共和国，大部分克格勃机构也不再与总部保持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出于维护本共和国和民族的利益，它们都听命于本共和国的政权。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等地，莫斯科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后，虽然出现了克格勃的特种部队配合苏联军队的活动，但这些克格勃部队并非这些国家的克格勃，而是从外派来的。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对于克格勃总部来说，也不太妙。梁赞州克格勃总局局长尤·奇切洛夫宣布他将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和宪法行事。科米共和国的克格勃保持沉默。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克格

勃总局局长维·波罗日尼亚克少将宣称该边疆区将不实行紧急状态。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克格勃总局长爱德华·沃伊齐茨基表示中立，对“格克契普”未表现出好感。伏尔加格勒州克格勃总局领导人表示将执行俄罗斯合法选举产生的政权的命令。鄂木斯克市克格勃局长亚·班尼科夫声称，他对政权更迭一事一无所知。只有秋明州克格勃总局局长瓦·叶弗列茨将军声明他服从苏联克格勃的命令。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克格勃机构也未表态。由于俄罗斯领导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的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多次发表声明、呼吁书，使两市的克格勃左右为难，感到不采取任何行动和措施为上策。因此，在政变期间，两市的克格勃基本上均未公开露面。只有苏联克格勃总部的维捷布斯克师奉命向列宁格勒市调动。但最后仍被勒令停留在离列宁格勒市外 70 公里处。

苏联克格勃总部所属的边防部队只得到口头的命令，要求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克格勒边防部队的政治部部长尼·勃里特文中将说，在未接到书面的命令和文件之前，边防部队将按常规进行边防巡逻。

虽说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被认为是政变策划的主要核心人物，但在克格勃总部这座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后改名为卢比扬卡广场）一侧的黄色大楼里，情况异乎寻常的闲散。在总部工作的大部分军官从 8 月 19 日起就未曾接到任何行动命令。大部分人感到惘然，只有极少数被称之为“傻瓜蛋”的人在相互祝贺“节日”。一连两天在克格勃总部大楼的办公室里，军官和工作人员都只是在喝茶和咖啡。他们一再询问各局处领导人应当干些什么，但始终未得到回答。只是到了 8 月 22 日，领导人下命销毁有关的文件。然后，大家都回家了。他们对克留奇科夫的行踪一无所知，也未见他露过面。他们只知道克格勃第五局副局长根·多勃罗沃尔斯基将军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逮捕了一些民主派人士。

8 月 21 日中午，人们见到在克格勃黄色大楼的院落内，有人把

装好的东西塞进克留奇科夫的两辆轿车内，然后轿车驶出，去向不明。

一些克格勃总部的干部和克格勃部队的军官对记者说，这次国家政变主要矛头是针对俄罗斯联邦的，“而我们，大部分干部自己都声称：‘我们也是俄罗斯人’。我们不能反对俄罗斯！”

从“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进攻“白宫”计划到克格勃总部的状况可以看出，本来在这场政变中应发挥特殊重要作用的克格勃已经完全瓦解了。

八、生死存亡的星期三

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控制的苏联国防部、克格勃和内务部及其部队越来越动摇时，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激进力量的反击势头却越来越高涨。8 月 20 日的深夜到 21 日凌晨，在莫斯科市内，围绕着进攻“白宫”与保卫“白宫”的行动和较量，显得格外尖锐与白炽化。这是一个乌云密布，生死存亡的星期三，正是在这个星期三，所谓进攻“白宫”的计划和传言破产了。

1. “阿尔法”的进攻计划

“白宫”就是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它是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民主激进派核心力量的中心。政变主要策划者之一、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早在 8 月 18 日就下达了攻占“白宫”的命令。具体执行这项任务的不是一般的武装部队，而是克格勃部队中一支经过特殊训练的精兵，它的代号为“阿尔法小组”。这个“阿尔法”小组成立于 1974 年，它直接服从苏联克格勃首脑领导，直属苏联克格勃第七局管辖。它曾多次完成过营救儿童、人质、解除武装犯罪分子的

武装等各种艰巨任务。这次“阿尔法小组”由20名指挥官负责，小组组长为卡尔普欣。8月上旬，立陶宛宣布独立时，苏联军队和克格勃进行了干预。就在8月13日凌晨，“阿尔法小组”曾奉命执行了占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电视台的特别行动。这个小组的领导人之一罔恰罗夫说，在那次行动中，小组成员每人只装备了一个无子弹的空弹夹，一支自动步枪，一支装有16发实弹的马卡罗夫式手枪，手电筒和匕首，穿上防弹背心，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未放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电视台。

8月18日“阿尔法”又被克格勃总部召去接受战斗执勤任务。8月19日，“阿尔法”小组组长卡尔普欣向小组宣布准备攻占“白宫”。发动攻占“白宫”的时间定为8月20日凌晨3时。在此之前要进行侦察、制定行动计划、选择装备等一系列战斗准备工作。在接受命令时，小组的其地领导人询问卡尔普欣这是谁下的命令，卡尔普欣回答说：“是政府的命令”。因为卡尔普欣是通过单线联系接受任务的，所以他未作任何具体的回答。这次“阿尔法”小组配备有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先进的特种武器。他们的任务是，着便装，迅速穿过“白宫”四周水泄不通的人群，控制大厦入口，并从各个方向向大厦一层发动粉碎性攻击，对所有的目标开枪扫射，然后直取总统办公室，抓获叶利钦总统及其他要员，如果叶利钦企图逃跑，则可以向他开枪。“阿尔法”小组还持有一份需要捕获的11人名单，除叶利钦外，还有俄罗斯联邦的其他领导人。

但是，“阿尔法”小组的成员除小组长卡尔普欣外，大部分人员对执行这项任务犹豫不决。“阿尔法”小组的副组长戈洛瓦托夫说，根据已侦察到的情况，大厦里有一个大约500人的武装组织，如果发动进攻，必然导致大流血。于是，戈洛瓦托夫与冈恰洛夫等其他一些负责人一起商量，决定不执行这项攻占“白宫”的命令。然后戈洛瓦托夫又把“阿尔法”小组的各分队队长召集在一起，请他们对执行这一道命令发表意见。他们都表示不执行这项命令，因为这

项命令是违法的。戈洛瓦托夫和冈恰洛夫让各分队队长通知“阿尔法”小组的全体官兵聚集在体育馆，向他们传达了关于攻占“白宫”的命令，并询问每个成员对该项命令的意见。结果所有成员一致表示拒绝执行这项命令。

8月22日，戈尔巴乔夫通过叶利钦得知“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攻占“白宫”命令之后，立即指示，“阿尔法”小组将服从于苏联总统本人，而在苏联总统本人被软禁的情况下，则服从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指挥，并且任命“阿尔法”小组原副组长米哈伊尔·戈洛瓦托夫为新任组长，冈恰罗夫为副组长。戈洛瓦托夫事后说，当时我们拒绝执行攻占“白宫”的命令，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我们都被告之违抗命令会遭到逮捕和处决的，上级对我们施加了极大的威胁和压力。如果我们执行这项命令，坦率地说，“阿尔法”小组可以在半小时之内攻占“白宫”的，但是这将造成一场大流血，甚至由此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冈恰罗夫等还说，六年来的改革使我们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我们决不能走上互相残杀的危险道路。我们拒绝执行这项违法的命令，使国家避免了一场内战。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赞扬了“阿尔法”小组的明智行为，认为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反“格克契普”政变的一个转折点，“阿尔法”小组的全体官兵被看作是“俄罗斯、苏联和全世界的救星”。

然而，“阿尔法”小组虽然拒绝攻占“白宫”，“白宫”的高度戒备状态却没有松弛，因为仍然不断地传来坦克和装甲兵车进攻“白宫”的消息。一场保卫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2. 保卫“白宫”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动的坦克和装甲部队进入莫斯科市中心后，许多莫斯科人便开始了保卫“白宫”的行动。人们用无轨电车、卡车、铁栅和树干……构成街垒和路障，把坦克和装甲车阻挡在通往“白宫”的街道上。人们还用鲜花、饮料、传单……来说服

官兵们。

在“白宫”的周围，堆砌的“围墙”也已具规模。即使坦克和装甲车撞入，也难以动弹。

在莫斯科市中心，人们的热血在沸腾。

上万人汇成的人流，行进在通向“白宫”的加里宁大街上。一幅不知何时制成的，长几十米宽几米的俄罗斯三色旗被人们顶举在队伍的上方，远远望去，场面甚为壮观。这是前去保卫“白宫”的人们，他们不断地呼喊着：“自由！自由！自由！”

“白宫”里的俄罗斯领导人，不时地向人们发布消息、命令和呼吁书。他们谈到了坦克进攻的危险性始终存在，呼吁人们保持秩序和镇静，不要向军人挑衅，不要同军人发生冲突，指出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叶利钦总统几次向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普戈等发布命令，指出他们犯有国家罪，并警告他们不要玩火，否则要对流血负完全责任。

8月19日晚21时，发生了奇怪的事。10辆插着俄罗斯三色旗的侦察巡逻装甲车和坦克车向“白宫”驶来。率领这支装甲坦克车队前来的是苏联空降兵部队副司令列别季少将。为了防止意外，“白宫”令坦克和装甲车原地待命，列别季少将随“白宫”卫士进入大厦。鲁茨科伊问明情况后，遂带将军会见叶利钦总统。叶利钦对列别季少将率部前来保卫“白宫”表示欢迎。列别季将军说，他和他的部下是根据苏联空降兵部队司令格拉乔夫将军的命令来保卫合法的俄罗斯政权的，并说他们都反对“格克契普”。

于是，“白宫”广播电台向广场广播了保卫“白宫”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人民代表维克多·米罗诺夫的通告，他说坦克和装甲车队是列别季少将部下，是来保卫“白宫”的。要求广场上的人群立即拆开部分路障，让坦克装甲车部队通过。他说这是一支忠于誓言、忠于俄罗斯人民的部队。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切断通向“白宫”的所有

通道，以防止对“白宫”的袭击。

8月20日凌晨4时，由列别季少将指挥的图拉空降兵部队已有近50辆战车来到“白宫”附近。参加保卫“白宫”的武装士兵布置在大厦的各个角落。俄罗斯联邦总理西拉耶夫视察了各个岗哨，并表示满意。

清晨6时起，又有数千名莫斯科人来到“白宫”，继续筑造路障和街垒。

业已倒戈的列别季少将得知在“白宫”不远处还停靠着一些载有空降兵的卡车和步兵战车时，命令车队指挥军官立即远离“白宫”，指挥军官请求让车队开往地铁“白俄罗斯”站，而列别季少将则斩钉截铁地命令：“回梁赞去！”

6时左右，西拉耶夫通过“白宫”电台向所有参加夜间值勤的纠察队员发表讲话，感谢他们辛勤的保卫工作，宣布值勤人员工资加倍，并要求他们坚持到早晨9～10点钟，等待新来人员接班。

上午，在各条停有坦克和装甲车的街道上，军民接触仍然很多，甚至还很和谐。一些莫斯科姑娘爬上坦克和装甲车，和官兵有说有笑，姑娘们问官兵：“开枪吗？”答曰：“不！”

上午，“白宫”外的群众自发组织了“百人”志愿突击队，誓死保卫“白宫”。

与此同时，在“基洛夫”地铁站、列宁格勒大街、库兹涅佐夫大街，又出现坦克和装甲车的调动，但同其他街道一样，不时受到人们的阻拦。

晚上21时20分，莫斯科军区司令、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上将宣布莫斯科市从晚23时起至早5时实行戒严。这一消息顿时使人感到，军队要发动进攻了。

接着，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科别茨上将发出警告，午夜1时特种部队可能发动进攻，袭击“白宫”。俄罗斯联邦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通告“白宫”卫士及附近的人们，请求他们不要冲向坦克或装甲

车，要躲开军车的行进道路，以防止流血冲突，他说："我们在道义上是胜利的！"

8月21日（星期三）零时45分，从美国大使馆方向传来了第一阵自动步枪的枪声。有5、6辆坦克和近20辆水陆两用装甲车从不同方向向"白宫"驶来。

有人从"白宫"大厦顶上向坦克和装甲兵车发射了曳光弹。"白宫"大厦内的灯光全部熄灭。广播通告，不准任何人接近大厦的窗下，否则不加警告即开枪；要求广场前的人们，除最靠近大厦建筑物的手挽手组成的第一链队外，其他人都到离开大厦50米的地方去。

零时3分，俄罗斯副总统亚·鲁茨科伊警告人们说，便衣克格勃分子有可能冲进大厦。他命令"白宫"守卫者向进攻者开火。

由于"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进攻"白宫"的计划；由于驶向"白宫"的其他坦克和装甲车被人群所阻；还由于苏联国防部慑于各方面施加的压力未敢动武，攻占"白宫"之举终未得逞。然而，在外围的一些街道上却发生了流血冲突。

3. 流血冲突

星期三零时起，在"白宫"内外形成的极其紧张的状况，是与外围追近"白宫"的街道上发生的直接冲突相关联的。

在斯摩棱斯克广场附近的街垒区，响起了枪声。守卫在那里的纠察队员纷纷涌向空降兵的装甲车，用帆布将战车的瞭望孔蒙住，战车队不得不退到新阿尔巴特大街下面的隧道里。人们又推来几辆无轨电车横放在街上，堵住了坦克和装甲车的退路。

在加里宁大街上，一辆装甲车在行驶中撞倒了试图登上战车的青年。

在新阿尔巴特大街下的隧道附近，一位少校军官拉住一位俄通社记者告诉他说，有30辆坦克和40辆装甲车正从列宁大街和捷普

雷斯坦大街方向开过来，准备立即进攻“白宫”。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群情激昂，纷纷涌向形势紧张的地方，呼叫声、坦克、装甲车的轰隆声，造成了相当混乱的场面。

被围困在隧道里的坦克和装甲车试图撤退，但是人们坚定地围立在路障前后，不让坦克和装甲车冲过去。天空不时闪现的曳光弹，照耀出隧道附近的场面和对峙势态。

装甲车、坦克车队试图再次冲过障碍物，从隧道中脱身，但遭到燃烧瓶袭击。有两辆装甲车起火，一辆开始原地打转，正在这辆装甲车旁的一名青年被辗压，另一名青年爬上装甲车，遭到枪击；另一辆着火的装甲车立即停下，车组人员爬出装甲车，弃车逃之夭夭。其余的坦克和装甲车打着白旗冲出，将安置在大街上的作为路障的13 辆无轨电车撞开，围观的人们将燃烧瓶不断地扔掷过来，砸在无轨电车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此过程中，有一名青年爬上坦克又摔了下来，后面的战车从他身上辗过。

怒不可遏的人们向坦克和装甲车挥拳，不断地大声呼喊：“可耻！可耻！”一些人还奔跑着追赶战车。

这场惊心动魄的隧道战，持续了近 2 小时。

另一冲突地区，是在“突击队员”电影院附近。一辆车号为NO536 的装甲车向街垒路障开了火，有两人受伤。有人从路边建筑物的窗口扔出燃烧瓶，装甲车立即起火燃烧，车上的官兵爬出装甲车，迅速跑开了。

来自“白宫”电台的消息说，在这黑色星期三的冲突中，共有7 人丧生，并说，冲突是由士兵首先开枪引起的，随后“阿富汗参战者”（指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复员军人）才向坦克和装甲车投掷燃烧瓶的。

后来据军方人士说，坦克和装甲车的任务是试图形成包围“白宫”的态势以显示力量，没有打算向“白宫”发动进攻。进攻“白宫”的计划和命令来自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不久，苏联内务部

副部长鲍·格罗莫夫断然否认被烧毁的3辆战车是内务部所属。莫斯科军区、莫斯科市、州克格勃也否认这些战车是属于它们的。看来，他们都害怕为这场冲突承担责任。

流血冲突促使俄罗斯领导对“格克契普”采取最强硬、最坚决的立场，而“格克契普”则被迫节节退缩。

4. 最后通谍

当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宣布在莫斯科实行宵禁之前，俄罗斯领导已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发出最后通谍，要求卢基扬诺夫在24小时内安排俄罗斯领导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并在最近3天内安排有国际卫生组织专家参加的对戈氏身体健康状态作出鉴定，取消紧急状态并将军队调回原驻地等。

加里宁上将宣布在莫斯科实行宵禁一小时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科别茨上将发布命令，宣布宵禁决定无效。

随后，叶利钦发布了告塔曼摩托化步兵师、捷尔任斯基独立摩托化步兵师和坎捷米罗夫坦克师军人书，号召他们立即毫不犹豫地站到合法选举产生的苏联和俄罗斯政权一边，不要使用暴力对付平民。

向卢基扬诺夫发出的最后通谍尚无回音，但向三个师军人发出的呼吁书略见成效。塔曼师和坎捷米罗夫师的部队实际早已动摇并开始转向俄罗斯政权方面来。

流血冲突发生后一两个小时内，“白宫”领导人多次与亚纳耶夫、莫伊谢耶夫（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加里宁上将、以及卢基扬诺夫主席通电话，责成他们阻止军队的行动。

星期三3时42分，莫斯科市的行政负责人叶·谢瓦斯季雅诺夫说，市内的军队正在撤离，并说队伍十分混乱，看不出有在莫斯科市内有其他调动计划的迹象。他还说，根据刚收到的情报，一部分军队已经穿过莫斯科环线公路，离开莫斯科。其他部队也都在撤离。

4时，莫斯科城防司令斯米尔诺夫中将对俄通社说，关于进攻“白宫”的谣言是“愚蠢的谎言，近似于挑拨”，他说军队的领导中没有人能下达这样的进攻命令。军队不管是明天或后天都不会去占领“白宫”。殊不知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确实下达过进攻的命令，只是遭到执行者的抵制和拒绝而未实现。

6时，在斯摩棱斯克广场还有6辆装甲坦克被愤怒的人群团团围住，不得脱身。这是正在撤离的坎捷米罗夫师的部队。在“白宫”派俄罗斯人民代表前往说明缘由之后，这6辆战车才被允许撤离。

莫斯科的形势发生了转折。军队的撤离使莫斯科人松了一口气。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控制的一些机构却呈现一片混乱。苏联国防部直到星期三下午4时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决定从实行紧急状态地区撤出军队。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也在晚7时半宣布解除莫斯科宵禁令并承认过去几天的情况表明，在首都实行宵禁是不合适的。

同一天，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弗·谢尔科夫宣布一项声明，表示苏联政府完全执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指示和命令。

各加盟共和国和主权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的绝大多数共和国、州、区，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俄罗斯的反违宪政变的行动和立场，对莫斯科局势的转变表示欣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一些共和国、州和边疆区，这时都转到俄罗斯领导一边。只有4个州的领导人因支持“格克契普”而被解职。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政变期间经常保持同西方首脑的联系，这时西方国家都赞扬和支持叶利钦的勇敢行为。

当天晚9时30分叶利钦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最后通谍：“根·亚纳耶夫、奥·巴克拉诺夫、弗·克留奇科夫、瓦·帕夫洛夫、鲍·普戈、瓦·斯塔罗杜布采夫、阿·季贾科夫、德·亚佐夫：

意识到对祖国今后命运的责任，根据俄罗斯公民的政治意志，我向你们提出下列要求：

1. 命令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从1991年8月21日22时起，停止其反对法律和宪法的活动，从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之时起作出的全部决定应无条件地废除；

2. 责成委员会立即取消阻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履行其宪法职责的全部决定；

3. 不执行上述要求时，我将采取法律规定的一切措施，取缔委员会的违法活动，保障国家的宪法秩序和法制。”

下面的落款是“俄罗斯联邦总统鲍·尼·叶利钦　1991年8月21日”。

这时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已是树倒猢狲散，叶利钦的这份最后通谍自然也就无法得到回音了。

九、从福罗斯到莫斯科

8月21日上午，亚佐夫下令调进莫斯科的两个师陆续撤出市区，这场政变已接近失败。就在这个时候，所谓的“8人帮”成员、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以及俄罗斯领导人相继飞往福罗斯戈尔巴乔夫的休假别墅。三路人马分赴福罗斯这一消息使莫斯科人感到某种困惑，因而十分关注，并对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翘首以待。

1. 向戈氏求救

8月21日上午，莫斯科人继续进行保卫“白宫”的行动。在“白宫”大厦广场上到处可见架起的帆布帐蓬，一些卫士和纠察队员因连夜的紧张战斗而疲惫不堪，靠在帐蓬上就入睡了。

正当紧张气氛尚未缓解，紧张的余波未平之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人帮”的成员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季贾科夫匆匆飞往福罗斯，去会见戈尔巴乔夫。他们的目的何在，一时谁也说不清。一些分析家评论说，上次携带“最后通谍”飞往福罗斯的说客是“8人帮”中的巴克拉诺夫和另外几个人，而这次飞往福罗斯的是“8人帮”中的最核心人物。他们此行目的可能有三：一是推卸发动政变的责任，将这一责任加到副总统亚纳耶夫、普戈和说客巴克拉诺夫身上，甚至还可将责任推到戈氏的办公厅主任博尔京和戈氏信赖的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身上；二是向戈氏全力辩解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性，并告戈氏对他的软禁和隔离是保护他，使其在政变成功和排除异已之后能东山再起；三是向戈氏认罪，请求宽大，以便使他们今后能有机会紧跟戈氏再干，并鼎力相助。

无论亚佐夫等抱着什么样的目的飞往福罗斯去见戈氏，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求救于戈氏是他们寄予希望的最后一招。

在福罗斯休假别墅，戈氏虽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等外国电台，了解到有关莫斯科和苏联境内事态发展动向的一些消息，但他并不十分清楚事态发展全过程及详情。戈氏从获得消息中已经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俄罗斯的民主力量在抵抗，政变看来即将失败。

8月21日下午5时左右，执行包围别墅的克格勃部队军官告诉戈氏，亚佐夫和季贾科夫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已经乘坐总统座机飞抵克里米亚，并即将到达别墅区。戈氏不敢肯定他们来此的真正目的。作为总统，戈氏下令把亚佐夫等押起来，并要求立即恢复通讯联系。亚佐夫等通过警卫转告戈氏，说接通政府通讯联系需要很长时间。戈氏让转告亚佐夫等说，他可以等候接通线路，并表示，在这之前，他不同任何人谈话。

通讯线路很快被接通了。电话报务员告知戈氏，克留奇科夫想同戈氏谈话。戈氏没有答应，而是立即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克拉夫丘克、卡里莫夫等一些共和国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戈氏开

始以苏联总统的名义下达各项命令。戈氏同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将军联系，以总统令免去亚佐夫的国防部长职务，由莫伊谢耶夫将军履行国防部长职责；下令所有军队返回驻地；指示政府电讯部门切断所有阴谋分子的电话。随后，戈氏命令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拘留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所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分子。他还责成莫伊谢耶夫和民航部长帕纽科夫保证以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俄罗斯代表团座机在贝尔贝克军用机场降落。与此同时，他从福罗斯同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

这时，戈氏早已将亚佐夫等人提出同他谈话的要求抛到九霄云外。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季贾科夫等人不仅被拒之门外，而且被看管了起来。这样一来他们求救于戈氏的目的宣告落空了。

2. 迎接戈氏

8 月 21 日午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叶利钦总统决定，派副总统鲁茨科伊、总理西拉耶夫、苏联总统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组成代表团立即飞往福罗斯，以阻止亚佐夫等人玩弄其他阴谋，防止他们要挟戈氏使政变合法化，以及防备其他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同时了解戈的健康状况并将其接回莫斯科。

俄罗斯代表团乘坐的是一架图—134 型客机。前舱坐的是鲁茨科伊、西拉耶夫、巴卡金和普里马科夫，还有几名俄罗斯人民代表，两名医疗专家。在另两个机舱里是几名俄罗斯政权信得过的报刊记者，如《消息报》副刊《联盟》报评论员记者 A·卢戈夫斯卡娅等，以及哈萨克斯坦驻莫斯科代表捷米尔巴耶夫,法国驻苏公使佩西克。此外，还有 36 名全副武装的民警特种部队官兵也在机上。鲁茨科伊副总统在临行前已同海军总司令切尔纳温和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联系，两人均坚决拒绝执行亚佐夫的任何命令。鲁茨科伊请切尔纳温将军派海军陆战队增援，万一政变者仍然控制着离戈尔巴乔夫总统别墅最近的别尔别克军用机场时，则保证俄罗斯代表团专机在

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军用机场降落。

飞机于傍晚5时左右起飞。在飞行途中，鲁茨科伊等人商议了营救戈氏的作战方案：决定先在离戈氏别墅10公里处向包围别墅的克格勃部队发出最后通谋，要求他们撤离并保证戈氏安全；然后实施突击营救戈氏。

晚7时左右，飞机已到达别尔别克机场上空。机场指挥塔开始推说跑道已满，后又允许降落。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巴格罗夫在机场迎接俄罗斯代表团。然后，代表团分乘4辆汽车前往福罗斯总统别墅。

在俄罗斯代表团到达别尔别克机场之前不久，卢基扬诺夫主席和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弗·伊瓦什科已先期到达。

在总统别墅里，俄罗斯代表团被请进别墅电影厅等候会见戈氏。这时，代表团才得知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也已到达。

伊瓦什科和卢基扬诺夫断言他们与阴谋分子没有牵连，坚决要求戈氏接见他们。戈氏遂接见了鲁茨科伊、西拉耶夫、巴卡金、普里马科夫、伊瓦什科和卢基扬诺夫、总统秘书切尔尼亚耶夫也参加了谈话。

西拉耶夫后来说，在戈氏会见他们时，卢基扬诺夫脸色苍白，低声下气地辩解自己为何不能及时召集议会以阻止宣布紧急状态。而西拉耶夫称他是“政变者的军师”。

深夜，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乘车来到别尔别克机场。为防万一鲁茨科伊没有让戈氏一家乘坐亚佐夫等人飞来的总统座机，而让他们乘坐俄罗斯代表团的一架图--134型客机。同时机上带着克留奇科夫作为人质。

8月22日莫斯科时间2时12分，载着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飞机抵达莫斯科伏努克沃机场。鲁茨科伊先让一名突击队员下机，确信是忠于叶利钦的斯坦凯维奇等在场后，才请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和总统下飞机。

俄罗斯检察长斯捷潘科夫得知前往机场迎接戈氏的官员中不少人前三天是背叛戈氏的，于是他组织了由20名检察员和民警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隐藏在暗处，以防不测并准备逮捕政变分子。迎接戈氏的过程未出现异常，一切顺利结束。在机场，戈尔巴乔夫总统简要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后，即被送往总统官邸。

而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等随后到达者，则被押送到管押高级人物的“水兵寂静”监狱。

十、悲剧的后果

发动这场政变的首要分子或是相继被捕，或是自杀身亡。在短短的三天政变中，谁是赢家，谁又是输家，明眼者一清二楚。70多年建造起来的这座苏联大厦，虽然已经动摇，但尚未散架，而这场政变却像击中了这座晃晃悠悠的大厦的支撑点，使之一下子崩塌。戈尔巴乔夫也因此经历了“八月废黜”之后再次被废黜。

1. “唉！我们晚了一步！”

8月21日下午4时左右，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飞往福罗斯之后，“代总统”亚纳耶夫孤身一人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见大势已去，遂饮酒销愁。一直呆在克里姆林宫总统的黄色大楼里的戈氏助手卡拉谢夫和亚林，制服了亚纳耶夫办公室外的一名守卫者，破门入内，亚纳耶夫问道：“都被捕了吗？”亚林说：“是的。”亚纳耶夫开始为自己辩解，说他加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只是为了避免流血。但是，亚林打断他的话，对亚纳耶夫说：“我不是受权来此同你进行讨论的。”亚林命令亚纳耶夫不要离开办公室。然后离去。这时，亚纳耶夫伸手拿过一瓶伏特加酒，仰脖一喝而光，随手又取过一瓶。第二

天早晨，亚林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捷潘科夫处取得逮捕令，来到亚纳耶夫办公室，这时他已恢复理智，穿戴整齐，被送走看押起来。

帕夫洛夫总理在8月19日晚召开内阁会议之后病倒进了医院，22日在医院被捕。帕夫洛夫说，他没料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竟会如此迅速地垮台。

22日2时30分左右，当载着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克沃机场时。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已组成了由50名工作人员的小分队在机场等候。当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见到亚佐夫后，随手拍拍亚佐夫贴身保镖的肩膀，说道："行了，你的任务完成了。"亚佐夫对走在自己身边的巴克拉诺夫说："好像是在抓我了。"巴克拉诺夫因为还具有苏联人民代表的豁免权，这时受到监视而尚未遭逮捕。他默默地走着，无言以对亚佐夫。

亚佐夫被带进汽车。他懊丧地把苏联元帅帽往车座上一摔，自言自语地说道："唉！我们晚了一步！"当俄罗斯总检察长瓦·斯捷潘科夫向亚佐夫宣布他被捕时，亚佐夫以军人的方式简单地说："全明白了。"

克留奇科夫和季贾科夫也是在机场被捕的。执行逮捕命令的是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副部长杜纳耶夫少将，他问克留奇科夫："您知道会受到什么惩罚吗？"克留奇科夫答道："对我和对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审判不会给俄罗斯和苏联带来荣耀。"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后，巴克拉诺夫和正在外地的"格克契普"成员瓦·斯塔罗杜布采夫也被逮捕。

另一名"格克契普"成员、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在其寓所先向其妻子开了两枪，然后他自己对准嘴开了一枪，自杀身亡。俄罗斯内务部人员赶来后，立即将普戈的妻子送往医院。

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也被捕入狱。

亚佐夫在被捕时何以会感慨而又遗憾地说："我们晚了一步"呢？

政变失败后，苏联国内和外国的舆论界和评论家认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 人帮”走错了一步棋，没有首先将叶利钦搞掉，这是他们政变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亚佐夫感慨之语的含义可能也正在于此。

2. 赢家与输家

这场政变的失败，明确地说明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激进力量的胜利，舆论界无不认为叶利钦总统是赢家。叶利钦不仅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为数众多的群众，粉碎了政变，为维护宪法的尊严在道义上占据了无可辩驳的优势，而且叶利钦个人的威望也从此直线上升。他一方面成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解救者；另一方面由于在政变期间宣布接管苏联政权的主要机构，他的“影子内阁”由此“显灵”而逐渐成了“真身内阁”。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叶利钦都是赢家。

8 月 22 日中午，成千上万支持叶利钦的人聚集于“白宫”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者集会”。广场上的各种各样障碍物仍然保留在那里，被人山人海所淹没。人们举着沙皇时期的白蓝红三色旗这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刚刚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旗（尽管此前人们早已打出了这种三色旗）。会场上，“叶利钦！”“俄罗斯！”“自由！”“乌拉！”等欢呼声此起彼伏，“打倒苏共！”“审判苏共！”的口号声连连不断。

已经再也听不到“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这一欢呼声，而送给他的却是一幅“米哈伊尔，你该清醒了！”的标语牌，还有一幅画着戈尔巴乔夫像而旁边写着“请带着爱妻离开俄罗斯”的标语画。

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以及“民主派”元老和“民主改革运动”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讲。叶利钦向人们、向保卫“白宫”的莫斯科市民表示感谢，赞扬了人们的勇敢精神。他宣布从今天 22 时起禁止

反对宪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切活动。他还接受人们的提议，发布命令正式命名“白宫”前的广场为“自由俄罗斯广场”。而其他人的讲话则大力颂扬叶利钦本人。

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阐述了民主派取得这次胜利的原因，同时他提出确保民主的最后胜利应采取的措施：军队非政治化、克格勃由议会监督、苏联政府下台、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追究卢基扬诺夫的责任、建议戈尔巴乔夫立即退出苏联共产党，等等。

法国总统密特朗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庆功大会，并向大会表示祝贺，对叶利钦总统表示钦佩。这无疑标志着西方对叶利钦的支持，是西方对苏外交政策新动向的象征。

晚间，莫斯科市施放了庆祝胜利的焰火，五光十色的焰火将全城照得通亮。

这次“胜利者集会”发出的最重要的信号，是苏联政治事态的下一步发展将针对苏联共产党，从而也将是针对戈尔巴乔夫。

政变分子是输家，这是毫无疑义的。

至于戈尔巴乔夫，他绝不是赢家。而他的节节败退，最后使他自己成了真正的输家。

3. 再次被废黜

当福罗斯的总统别墅对外通讯线路接通时，戈尔巴乔夫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他不停地与国内外通话联系，重新认真地履行起苏联总统的职责，为此他感到十分兴奋。然而，当他回到莫斯科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国家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戈氏在莫斯科几番发表声明，发表谈话，严厉谴责政变分子，把全部愤怒之情都倾泻到他们身上，并发誓从今以后绝不再对那些不应与之和解的人作任何妥协。可是，他完全忽略了一点：另一个始终是他对手的人正虎视眈眈地在盯着他。

叶利钦首先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以代理另一方的职务。这不仅表明，在政变期间叶利钦接管苏联政权主要机关的命令和做法，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默认，而且使叶利钦的身价倍增，成了与戈氏平起平坐的人物。

就在戈氏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共同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时，叶利钦当场拿出关于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文件，当着戈氏的面签署了这一命令。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早已看透了叶利钦总统的心计和行动，也早已估计到苏联岌岌可危的命运和戈尔巴乔夫总统摇摇欲坠的地位。他们唯一可供选择的是立即宣布各自的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以避开大俄罗斯主义重新兴起。这样，戈氏在政变前设计的“9+1”的新主权联盟方案再也难以实现。

政变后，反共的浪潮越掀越高。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被扫地出门，苏联共产党的带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落地。苏共中央的报刊被勒令停止出版发行。在苏联其他多数地区，共产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加里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塑像被大吊车从广场上卸下，抛在荒郊野外。一些街道和广场的名称先后更改。在苏联其他一些地方，列宁的塑像也被推倒。

戈氏根据叶利钦的提议改组了苏联部长会议。他连续不断地签署各种命令，试图表明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依然存在。而这些命令无不正合叶利钦的心意。

在涉及戈尔巴乔夫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的最关键时刻，在8月24日即在返回莫斯科后第二天，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竟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这意味着苏共的瓦解。这一恰似五雷轰顶的新闻，不仅使苏共普通党员和老百姓口瞪目呆，而且就连戈氏一些反对者也感到意外和惊奇。

这样，戈尔巴乔夫一下子使自己成了无本之木，失去了自己政治生命赖以存在的根基。

尽管在戈氏被解救出来前恢复履行总统职责后，西方大国给予了戈氏以支持，但它们多少对戈氏有所保留。西方国家领导人并不希望偌大的苏联分裂瓦解，他们懂得这将可能引起象南斯拉夫那种民族冲突迭起，内战频仍的局面。因此，西方支持戈氏为苏联保持一个联盟国家所作的努力。而戈氏此时此刻所能做的也就是为建立新联盟国家而奔波了。戈氏考虑的其他问题和措施，尽管发布了不少命令，但是各加盟共和国在宣布为主权国家、独立国家之后早已各行其是。

也正是在这时，12 月 8 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于是，起草新联盟条约一事已进入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建立独立国家已成为现实。

三国的行动表明，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已被排除在苏联政治进程之外，而戈氏事先连一点点情报也未获得，连一点点迹象也未发现。继 8 月 19 日戈尔巴乔夫总统被废黜之后，仅仅过了不到 4 个月，戈氏事实上又被第二次废黜。

再也没有谁来营救戈氏了。因为现在谁也无需再用他拉大旗了。

戈尔巴乔夫表示，如果苏联的各共和国都赞同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那么他也将同意这一选择。

12 月 21 日苏联独立国家首脑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宣布参加独联体的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土库曼、塔吉克、乌兹别克和乌克兰等独立共和国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格鲁吉亚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布 1922 年 12 月 30 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会议通知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已停止存在。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忧虑和不无遗憾的心情，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将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这时，在克里姆林宫上飘扬的苏联国旗徐徐降下，代而升起的是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

至于“8·19”事件引发的苏联悲剧是否从此结束了，人们还不得而知。